

·世界经济畅销书系(获诺贝尔提名奖)·

〈克罗地亚〉勃朗科·霍尔瓦特
吴宇晖　马春文　陈长源　译

SHEHUIZHUYIZHENGZHIJINGJIXUE

YIZHONG
MAKESIZHUYI
DESHEHUILILUN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世界经济畅销书系●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

〈克罗地亚〉勃朗科·霍尔瓦特
吴宇晖　马春文　陈长源　译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吉)新登字 01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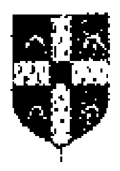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

著　　者　勃朗科·霍尔瓦特
译　　者　吴宇晖　马春文　陈长源
责任编辑　陈余齐　　　　封面设计　翁立涛
责任校对　东　文　　　　版式设计　东　文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0431—5649710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制　　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0431—5637018
印 刷 者　吉林省梅河美术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2.625
字　　数　50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3856-5/F·796
定　　价　35.00 元



中文版前言

现在的这本书是第三种文字的版本。它首先在英国和美国出版（1982年），然后被翻译回克罗地亚文（1984年），并多次再版。克罗地亚文版增加了《论新国际秩序》一章，这一章被包括到中文版中了。所以本书的中文版是第二个完整的版本。

本书背后的基本思想是，我试图以如果马克思活在今天他可能会写的同样内容，完成一本现代的政治经济学。我是否达到了目的，当然要由读者来判断。虽然我非常熟悉当代经济理论——我是在英国和美国完成了我的研究生学历的，而且我毫不犹豫地运用了我所学的当代经济学的知识，但不管怎样，马克思对我思想的启迪是巨大的。我遵循的是，不管白猫还是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最有效率的猫。尤其是，马克思也研究了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的经济理论。他以斯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作为他的主要分析工具，所

以，可以把马克思看做是最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在我的书中，我显示出，古典的劳动理论是不正确的——取代它的新古典理论也是不正确的——但它至少是我进行推论的一个起点。我试图提供一个以真实的（修改过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替代理论——我称之为系统理论，这当然是马克思的基本意图。系统价值理论的基本特征是，它自然地适合社会主义经济效率，并使我能够设计出一种统一的社会经济制度（这也是马克思的想法）。

经济学本身是关于投入既定下的最大产量（不是利润!），或产量既定下的最小投入。这种对（最大或最小的）极限值的追求取决于技术和社会制度。因此，我的任务是设计这样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使利用可获得的技术和资源生产最大产量成为可能。无论是制度，还是技术，必须被认为是动态的，处于永久的变化之中，而不是静止不动的。这使我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每一个成员必须有充分施展自己的知识、能力和创造力的可能性，当个人的自由主动性发生碰撞时，社会必须进行仲裁。政府不能掌握每一个公民知道的或打算做什么的信息，所以，国家主义制度必定是低下的。另一方面，公民不能知道每一个其他公民现在或将来的意图，他们的行为必然要相互冲突；所以，资本主义制度必定也是低下的。因此，我们需要个人活动之间的协调——这个任务大部分是由市场完成的，但不是全部。换言之，我们需要经济计划。经济计划纠正了早已为经济学家所熟知的市场失灵。效率最大化的社会前提是，每一个经济主体面对平等的起始机会，这反映了著名的按劳分配原则（它提供了刺激）。

由此得出了各种结论。如果每一个公民面对的起始的经济

条件应该是平等的，他就必须在**社会上**（而不是在体力上或脑力上）是平等的。这反映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废除阶级的思想。它也反映了马克思的这样一种思想，即只有每一个人是自由时，社会才是自由的（反过来说，也是一样）。所有制这个基本的经济范畴，经历了一个改变。罗马的和通常是欧洲的所有权制度，现在已经分离为两个组成部分：资本所有权和企业所有权。在前者由股东来代表、而后者由自己管理企业和进行决策的经理来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分离过程已经走得相当的远。在资本主义，是资本雇佣劳动；而在社会主义，关系被颠倒了过来：劳动雇佣资本。这意味着，资本的所有制是社会的（属于社会所有的成员），以及企业的所有权属于那些在企业中工作的人们。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由资本属于全社会所有的社会所有制和由工人进行管理的微观组织组成。

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成，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几个世纪了，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很可能如此。在此期间内，制度是混合的。正像在资本主义可以发现有合作社一样，你将在社会主义里发现许多小业主，特别是在一个小农和手工业者占多数的社会里。主要的任务是仔细地设计出合适的平衡来。制度越是自然地朝着需要的方向发展，越好。全书的目的不是别的，而且企图应用上述的原则建立一个一致的社会—经济理论。如果任何成份是缺乏的，设计将（完全）不会成功。

仍然需要对这个理论的经验验证说几句话。在马克思的时代，因为没有实践，所以不可能对这种理论进行验证。南斯拉夫是把工人管理的理论应用于全国规模的惟一国家。经常有人说，工人管理是行不通的，因为南斯拉夫解体了。这种论断是nonsequitur〈不符合逻辑的推论〉。在4个十年内，南斯拉夫是

欧洲发展最快的国家。这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期跨度内的发展，超过了自从南部斯拉夫人定居在巴尔干半岛以来的1100年的发展历史。并且，经济的成功不可能是政治失败的原因。不幸的是，南斯拉夫没有一个邓小平作为铁托的继承人。如果有这样的继承人，近来的历史将会是非常不同的。在铁托去世后的十年里，当权的政客们显示出是平庸的和不负责任的。潜在的民族主义复活了（存在着7个民族），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同时在（6个共和国中的）两个最大的共和国掌握了权力。内战和国家的解体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最终导致的是，极度的失业，比20世纪30年代还要糟糕的经济危机，极端的两极分化——以及资本主义的复辟。南斯拉夫经验的这一事实有助于澄清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在历史上作用的热点论战。除了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之外，政治权力关系也显示出是至关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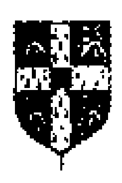
虽然我曾经访问过中国，并且学习了她的历史——甚至是她的语言，但我对这个国家的知识是非常贫乏的。所以我斗胆说一两句我自己的观察意见。中国在最近的20年内发展得特别地快，这说明她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很清楚，改革必须是渐进式的。但是，一个不发达的国家（譬如说人均国民收入不到100美元），特别是一个大国和一个没有受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多大影响的国家，它的经济结构是简单的，可以借用技术和组织，实现高速增长并不是很困难的事。在最初的发展阶段，利用较强的政府干预，既是自然的，也是有用的。一旦达到了一定的发展水平，人口的大部分由农村拥入城市，教育的平均水平大幅度提高，以及投入产出表上的空白格子很快就被填满——社会变得复杂起来，社会的有效运行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因此，准备——经济上的、社会上的和政治上的——必须

现在已经开始。这对于一个经历了社会革命的社会（就像南斯拉夫和中国），一个发展如此之快以至于人民没有足够的时间在心理上和文化上进行调整和承受巨大改变的社会，特别是正确的。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改革进程的结果可能会变成灾难性的。南斯拉夫的例子应当作为一个历史的警告。

最后，我对吴宇晖教授表示感谢，是他发起了本书的出版工作，他本人也参加了本书的翻译。我也对陈长源女士表示我的感激之情。她从克罗地亚版翻译了英文版没有新增加的一章。在我14年前访问中国时，她也负责接待了我，作为我的向导，陪伴我走遍大半中国，并且使我喜爱了她的国家。

勃朗科·霍尔瓦特

2000年8月于萨格勒布



英文版前言

在某种意义上，本书代表了我的毕生之作。这并不是就本书的实际写作时间而言的，写这本书只用了我最近六年的时间；而是说我这一生都在思考着它的内容。中学时，我所在的班级离开了克罗地亚的一个小镇，加入了游击队，参加了南斯拉夫革命。从那时起，社会主义就成为我关注的对象。我们这一代承担了完成马克思在其著名的费尔巴哈论纲中所号召的这样的使命：不但要解释世界，更要改变世界。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世界的事业中。

后来我才明白，改变世界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与我们最初的想法相反，社会主义是含糊不清的和很难把握的事物。虽然仅仅解释世界是不够的，但解释世界仍然是按意愿改变世界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忽视严肃的理论研究必然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我们的许多“科学”解释未能经受住社会实践的检验，被证明是天真肤浅的，有些甚至是愚昧错误的。在武装

斗争结束后不到三年的时间内，重新全面思考正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必要性很快就显现出来了。从那时起，我一直在思考这部著作。

中学毕业时，革命刚结束一年多，我还不知道自己怎样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尽最大的努力。我学过工程学，然后转过来学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最后，我选定了研究社会“基础”的经济学。就这样，我成了一名经济学家。

我的长期计划是获得发展计划工作的实际经验和写一部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著作。开始时，计划进行得还算顺利。我的第二本书《走向计划经济的理论》，是一种理论的探索，后来被译成多种文字。为了不让西方的出版商感到恐惧，我有意略去了标题中的“社会主义”一词。在实际工作方面，我应邀参加了联邦计划局，负责计划方法研究。几年后，我所在的部门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经济科学研究所，我在以后的七年里一直任该所的所长。这段时间，我集中对经济、社会发展和计划问题进行经验性研究。

然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著作不得不一缓再缓，而且一拖再拖。终于，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不研究社会关系和政治，是无法研究好经济学的。遗憾的是，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的研究未曾出现，因此，必须建立一种同时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政治的理论。这就是现在这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由来。

也许应该提一下，**政治经济学**在我用法中多少有一种特殊的含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是三个世纪前被发明出来的，表示与家庭管理相对的国家经济管理。时过境迁，这一含义有了变化。古典政治经济学将政治经济学看做是一种特定社会的经

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理论。后来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象的正是这种理论。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出现，社会和政治的内容被剔除了，后来就只有纯粹的经济学了。此后不久，纯经济学日益成为与现实世界经济决策或解决实际问题无关的模型建造。只是在最近，古典的政治—经济方法和经济社会学一起，再度令西方产生兴趣。在东方，政治经济学停滞在19世纪的发展阶段上，仿佛至此之后，世界或思想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从这种政治经济学中获得说明世界和思想变化的任何帮助。另一方面，我要致力于解决的问题要求采取肯定是非正统的方法。尽管有许多令人憧憬的开端，但社会主义尚不存在。因此，古典方法是不适用的。不论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都必须先设计出来，然后才能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故而，政治经济学需要将经济学和政治学融合起来，形成统一的社会理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解决许多方法论上的困难。

首先，设计一种社会制度的想法可能会遇到很大的怀疑。这不是乌托邦或空想吗？约瑟夫·熊彼特十分强调“超科学的”(extra－scientific)努力①。工程师的任务是设计新机器，社会科学家不一样，没有人指望他们设计新社会，他的任务是批判地分析并解释社会。然而，在逻辑上，这两种任务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设计新社会更困难而已。例如，一座新桥的设计可能独一无二、完全独创，前所未有；如果所有的计算正确无

① “因此，协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是超乎科学之外的，因为它本身所关切的主要并不是（批判的）分析——而马克思主义则是——而是一定的计划和将其付诸实施的办法”(J.A.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 454.)。事实上，我与熊彼特之间的意见分歧要比引文中所包涵的含义严重得多。我不仅企图证明，对“一定的计划和将其付诸实施的办法”的关切是合理的科学分析，而且还企图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协会主义的社会主义。

误，建筑材料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充分相信，这座桥不会坍塌。爱因斯坦的理论在1905年可能显得荒诞不经，几乎无人接受。但没人说它是乌托邦。在经受理论的一致性和现实对应性的检验后，它便被人们所接受了。

社会设计与此不同，因为它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而为了这些价值观念，人们愿意奋斗到死。还有一点不同的是，社会现象有另一个至为重要的方面——意识。与桥梁设计不一样，"建筑材料"本身会变。这就使得社会设计更复杂、难度更大。此外，社会理论不只是设计的部分，它还是现实本身的一部分。本书是对这一无人踏勘领域的探索，它旨在满足罗伯特·海尔布鲁诺所期望的，"将经济学变成一种社会科学工具，这种工具的目的和存在的理由不是阐释社会实际运行的方式，而是指出社会运行应该有的新方式……规定必须采取的行为方式，使社会达到所设立的目标。"①

整个问题远比关于方法论的学术讨论所显示的更为重要。不关心未来社会设计的这一传统——实际上还将这些设计公开贬斥为乌托邦和伪科学——在社会主义运动中长期存在并获得了广泛认同。它起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之所以如此，也许是有理由的，因为并不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他们所生存于其中的社会距离社会主义还十分遥远。然而，这一传统目前依然健在，并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准备爱尔福特纲领时，部分党员要求该纲领包括为过渡时期准备政治性的和制度性的设计。当时党的主要理论家卡尔·考茨基拒绝了这一要求，认为这一要求不合道理，因为时机尚未

① "On the Limited Relevance of Economics". In D. Bell and I. Kristol, eds., *Capitalism Toda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pp.91–92.

成熟。25年之后的1918年，时机成熟了，该党却没有任何行动纲领，在战后的混乱中彷徨徘徊，丧失了政权，引起了工人阶级的对立和分裂，把国家带入了恶性通货膨胀。随之而来的社会经济动荡、大规模失业以及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的争斗，为希特勒和纳粹铺平了道路。奥地利社会主义的历史几乎与此完全相同。同样，俄国的社会主义者也在1917年面前张皇失措，因为没人告诉他们应该干些什么。惟一肯定的是，他们要掌握权力，但掌权后做些什么？这个问题没有人考虑过。列宁是当时惟一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1916年底，他在与布哈林的一场争论中受到启示。为了找出马克思、恩格斯和考茨基的有关建议，他在苏黎世图书馆重新阅读了他们的著作。回到俄国后，列宁以此为基础在1917年2月和10月革命期间极其兴奋地编著了他的《国家与革命》。但他的工作并没有起多大作用，因为书中的思想未能或者说不能适用于俄国的实际。不久后列宁去世，随意的、失去控制的社会和政治过程终结于斯大林的反革命。

举这三个例子并不是想证明，科学制定的行动纲领和制度设计在革命后的初期本来会阻止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社会世界不是如此简单的。但我的确是要通过这些例子说明，缺乏有意义的长期的纲领，极大地援助了反革命运动。

本书的副标题指明，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探索。“马克思主义”一词也必须在特殊的意义上来理解。它不是对马克思结论的重复，这些结论适合于100年前的历史状况。重复马克思的结论属于马克思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方法，即如果马克思活在今天他可能采取的方法。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反驳说，这是使用不能被事实检验的假设，毕竟马克

思已经死了，没法向他请教。由于我的理论在某些重要方面与马克思不一致，在另外一些方面，我要解决的是马克思未曾遇到的问题，因此，有人可能会说，这些理论是我自己的。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我显然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人们可以使用本·沃德对我早期著作使用过的术语来概括我的思想，即带连字符的马克思主义—霍尔瓦特主义。我对此并不在意，但我仍然偏爱我自己书中的副标题。

至少有两条理由使本书应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会为成功发现这基本上是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而感到快乐，然后他们就可以十分方便地把它丢到一边。我就是要剥夺他们的这种快感。事先就让他们知道这是一本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除非他们提供一种令人满意的对抗观点，否则便不能拒绝我的发现。这是把本书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由。另一个理由更为重要。我的一位朋友，一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曾经说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就，是因为他站在一个思想巨人——黑格尔——的肩膀上。至于讲到我自己，我也是站在马克思的宽阔肩膀上。没有哪一种科学是从零开始的，一个人承认得益于其伟大先驱者的惠泽并不是虚伪的谦虚。

十分凑巧，我读的第一本社会理论著作是《共产党宣言》。同样凑巧，读过这本书后，我参加了革命，这场革命是我们时代几场不多见的、真正的社会革命之一。马克思与革命是如此完美的一致，我单纯的头脑把这一切都当做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很自然地接受了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成了我自己理论的一部分，成了我自己研究社会现象方法的一部分。我不是“教”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实践着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我自发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我自己的思考方法，所以，在实

践需要修正理论时，我丝毫没有顾虑。马克思也会做同样的事。

我自己并不喜欢如此大量地引用马克思的语句。在某种程度上，我也不喜欢如此引用其他作者的语句。但我还是这样做了。之所以如此，有四方面的原因。像所有的大思想家一样，马克思被人严重误解，他的思想有许多错误的解释。因此，对那些不熟悉马克思教诲的读者，我这样做可以帮助他们发现思想源的本来面目。对那些熟悉马克思的读者，这些引语可以表明一个特定的陈述不是没有根据的。第三个原因是：如此大量地引用对探索我们所用概念的思想源头是值得的。我不止一次地惊讶于我个人的发现在以前已有人提出了。另一些引语看上去似乎多余，但它们的目的在于避免偏见的指责。在一个激情四溢的领域，完全避免误解是不可能的，但还是值得尝试避免误解。加尔布雷思曾有言，一个人应该时时刻刻地爱护自己的批评者，尽可能保护他们，使他们不犯愚蠢的错误。

我在批判西方社会时引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在批判东方社会时则引用东方学者的观点。生活在某个特定社会之中的人应该对该社会最为了解，应该被看做该社会最好的代言人或裁判。我未能完全一致地坚持这种原则——不仅原始社会有禁忌，我们的社会也如此，某些问题是不能触动的。但我搜集了十几种语言的文献，已做了最大努力。

为了使本书的观点受到有效的批判，我在许多国际学术会议上讨论过这些观点。我的经历很有趣，有时很难与别人交流。这使我想起卡尔·曼海姆的一句话：“每一种改进社会制度的新观点在那些把现有制度视为理所当然的人看来都似乎是乌托邦。”参加讨论的人经常不加分析，坚持认为某种特定的社

会制度的设计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切实际的。仔细考虑他们的说法，我发现他们总是暗中假定**其他一切保持不变**。显然，如果社会**系统**保持不变，任何一种重要的社会制度——即一种子**系统**——都不可能被彻底改变或改善。因此，我必须请求读者注意，本书是一种制度设计的尝试。现存秩序不仅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要在各个方面受到质疑。我请读者和我一起探索改变和改造现存社会制度的可能性。

本书至少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它的制度设计局限于民族国家的范围。然而，社会主义是一种世界现象。如果不考虑全球规模的社会主义关系，这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不可能是完备的。在被分割开来的当代世界上，这一点特别明显。我之所以决定考察一个国家，理由有两点：一是方法论的现实意义。如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兴趣是改变世界，他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一个民族国家主权的世界中，改变只能在该国家的范围之内进行。因此，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开始探讨是适当的。第二个理由是实用主义的。写这本书已经花了我太长的时间，如果要把国际经济政治关系这些困难的领域也包括在内探讨，出版时间必定还要推迟。我承认，一种更一般性下的全球性方法可能会改变研究的某些观点。我预料到学者会如此进行批评。将来的新版将加以改善和拓展。①

从事写作本书这样的工作，作者可能会过分狭隘。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受我们自己的社会和民族环境的影响，被我们自己的经验和偏好所左右。将民族特性说成是全球性真理是愚蠢

① 1984年，霍尔瓦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语在南斯拉夫国内出版。在这一版中，他增写了《论新国际秩序》一章。中文译本以1982年的英文本为原本，并根据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语翻译了《论新国际秩序》一章。见本书第19章。——译者注

的。避免这种错误的惟一办法是把个人观点暴露于国际性的批评之下。我是这样做了，像任何学者通过发表著作和论文做的一样。但这还不够，作者还必须在不同的社会和民族环境中生活，使自己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我在这方面十分幸运。我曾经在许多国家学习和教学。我从曼彻斯特、伦敦和麻省剑桥的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的学生遍布斯德哥尔摩、巴黎、华盛顿、安拉伯和圣母，智利的圣地亚哥和达累斯萨拉姆，当然也遍布于我的祖国，她是一个文化大宇宙的缩影。他们是我的最初批评者，也是提供信息最多的批判者。很难说清楚我是在他们同意我的观点时学到的东西多，还是在不同意时学到的东西多。我为那些对自治和社会主义有兴趣的外国政府出谋划策以及我作为被邀请的讲演者在全球50多个大学和研究机构演讲的经历补充了我在这方面的经验。如果，经过如此过滤后，还残留少许狭隘的痕迹，这只能是我自身局限性中最顽固的那部分在起作用。

我有幸成为一个社会科学家团体的成员，这一团体在鲁迪·苏克〈Rudi Supek〉和欧根·普希克〈Eugen Pusić〉的指导下在萨格勒布聚会，这种活动已持续了多年。这些会议的共同主题是“人与制度”。本书的大部分思想都在这一团体的会议上做过讨论。我从同行友善但无情的批评中受益匪浅。

乌夸娜·瓦索维克〈Vu? ina Vasović〉和罗伯特·雷恩〈Robert Lane〉阅读了第10章和第11章，乔索·朱巴诺夫〈Jozo Zupanov〉阅读了第14章。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很有价值的评论。然而，他们无须对这几章的观点负责。我对允许我可以引用其他作者的话和我本人以前著述的资料的许多出版商和编者也深怀感激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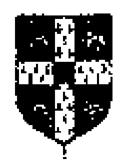
一个精力旺盛的社会主义者也需要有闲暇时间来思考社会主义和从事写作。我感谢瑞典国际经济研究所和它的所长阿瑟·林德贝克，他们无条件地邀请我在该所度过了七个月的时间。环境的变换（瑞典与南斯拉夫是如此不同!），研究所友好、活跃的气氛，行政的和其他责任的压力的消失，以及资料丰富的图书馆，种种这些提供了启动一项长期拖延的工作所必需的一切。第一篇全部写于斯德哥尔摩。其他部分大都写于贝尔格莱德的经济科学研究所。我要对该所对我的资金支持和其他帮助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特别感谢柳芭·马丁诺维克夫人（Ljuba Martinović）。没有她的帮助，本书的写作时间将会更长，缺陷更多。我曾用长长的索书单把马丁诺维克夫人逼到窘迫的境地，有些书在贝尔格莱德甚至在国内都无法找到。她日复一日地耐心寻找着我的“必读书目”，最后，这些书总会出现在我的案头。我深深地感谢她无私的帮助。

勃朗科·霍尔瓦特

于贝尔格莱德





代译序

霍尔瓦特和霍尔瓦特主义

本书作者勃朗科·霍尔瓦特（Branko Horvat）是前南斯拉夫现克罗地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因对经济学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特别是因本书）而成为198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候选人，这使他成为迄今为止东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惟一最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但他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注定了要被拒之门外，虽然他也许是东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惟一一个有资格获此殊荣的人。他的思想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霍尔瓦特主义”（Horvatism）。值此霍尔瓦特代表作的中文版出版之际，向读者介绍一下霍尔瓦特本人和他的思想，是为译者序。

(一)

霍尔瓦特于1928年出生在克罗地亚一个叫彼得里尼亚的小镇。16岁时离开了小镇的中学，参加波日加游击队，与德国法西斯做过英勇的斗争，被授予人民功勋勋章，并且在暴虐面前自始至终都是一名真正的战士。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他于1946～1951年在萨格勒布大学学习工程学、经济学和哲学，于1952年经济学专业毕业。1952～1955年任该校石油研究所及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55年获理学博士学位，随即调往联邦经济计划局参加编制五年计划的工作。1955～1958年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攻读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生，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58～1962年任南斯拉夫联邦计划局成员和研究主任。1963年任贝尔格莱德大学教授，兼贝尔格莱德大学研究所的研究员。1963～1970年任联邦经济计划局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1964～196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研究。1975年起任萨格勒布大学经济学教授，做过四大洲十几个大学的访问教授、富布赖特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授、杰出教授或客座教授，其中包括剑桥大学、巴黎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密歇根大学、伯克利大学和美国一些大学。应邀在世界上80多个大学和研究所主办的学术研究班任教、带研究生或讲学。

此外，霍尔瓦特曾任前南斯拉夫联邦经济委员会委员（1963～1965），联邦执行委员会市场和价格委员会委员（1967～1971），联邦经济委员会主席的经济顾问（1971），秘鲁、孟加拉、巴西等国政府或总统的经济顾问（1972～1976），克罗

地亚社会民主联盟的主席。他还是前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协会、经济数学和组织科学会等学术团体的创建人及第一任书记，国际性杂志《经济分析》的创建人和主编（1967～1993）和国际自我管理经济学会的创建人和终身荣誉会长。

霍尔瓦特在政治经济学、宏微观经济学、自治理论、计划理论、经济制度比较、经济思想史、经济活动分析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他发表了几百篇论文和30多部著作，主要著作被翻译成18种语言。其中，用英文发表的并在西方国家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走向计划经济的理论》(1961)、《论南斯拉夫社会文集》(1969)、《南斯拉夫的经济周期》(1969)、《联邦的经济职能》（合著，1970）、《战后南斯拉夫的经济政策》(1971)、《南斯拉夫的经济体制》（1971）、《自治社会主义》（合著，1975）、《价值、资本和利息理论》(1994年)、《国际贸易理论》(1999)，等等。

（二）

霍尔瓦特的代表作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纽约，夏普出版公司，1982年出版）。用霍尔瓦特自己的话说，这本书是他的毕生之作。仅写此书就用去了六年的时间，而思考着它的内容的时间则更长。改变世界的实践和对社会主义的长期思考，使霍尔瓦特认识到，虽然仅仅解释世界是不够的，但忽视了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严肃的研究必然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三年之后，霍尔瓦特就开始考虑要写这本书。他承认，他在联邦经济计划局从事计划工作的长期实践经验和他以前发表的著作，

只是他写此书的前期准备。

这是一部厚达近700页的鸿篇巨帙，除序言外，它包括4篇和一个跋，共20章，以及约占全书篇幅1/4的长长的尾注。本书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它覆盖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所有方面：社会所有制理论、计划与市场、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平等和效率、微宏观经济组织的模式及其运行、国家的经济职能，等等。但是，从这本书的副标题来看，它不是或者主要不是一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及其经济理论的著作，它还包括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及其理论、社会主义的社会学、社会主义的伦理学、社会主义的哲学、社会主义思想史和社会主义运动等内容。不仅如此，它还涉猎了到它出版时为止人类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差不多所有的成就：社会发展史、思想史、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道德伦理学和心理学。仅仅从这本书的知识含量来说，它就是一本极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它是对人类制度发展史、思想史（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哲学的和伦理的）和运动史的深刻总结，一部有关所有这些方面的百科全书。为写此书，霍尔瓦特就搜集了十几种语言的文献，充分表现出作者的严谨的科学态度、博学多识和对历史、现实和理论的深邃的洞察力和高超的驾驭能力。

然而，这些材料并不是杂乱无章地堆砌在一起的，它们服从一个更基本的目的——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无情批判和对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设计。对一种更美好、更人道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的设计是本书的基本思想。霍尔瓦特为这种社会主义奠定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一切，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作者对建立一个超越现代资本主义和他所谓的“国家主义”、更平等、更

公正和更有效率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强烈渴望和为之不懈奋斗的坚强决心。

此书出版后在东西方学术界和实际部门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西方学者认为，这部代表作表现了一个熟悉西方政治、经济和哲学思想的经济学家仍然忠于其社会主义信念，这就使西方人士对社会主义理想看到了希望。《选择》杂志对本书的评论是："霍尔瓦特在他的这部名符其实的杰作中，以其鲜明的对比和丰富的历史经验发展了一种切实可行的人道社会主义理论。处于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商标的苏联冒牌货）的压迫之间，霍尔瓦特要求我们的社会必须紧密地关注工作的意义、平等、正义、效率，等等。他在这部朴实无华的力作中领导我们从事这项工作。"罗伯特·莱卡茨曼（Robert Lekachman）这样评论道："在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析家中，很少有人像霍尔瓦特这样，运用如此丰富的资料和如此老道的技巧。"而美国著名的激进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伦纳的评论是："对霍尔瓦特来说，社会主义已成为一系列极端重要的教训。人们必须吸取这些教训，而不管这是多么的痛苦或漫长。或者，换言之，霍尔瓦特描述了这些教训，逐步吸取这些教训是创造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在我看来，恢复人类自我塑造无以复加问题的一致性和实质性是［他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

在南斯拉夫国内，此书引起了不同的看法和激烈的争论。但多数学者认为，霍尔瓦特的这部著作对科学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有推动力和贡献的，它启迪了人们的思路，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论点和分析。

(三)

霍尔瓦特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霍尔瓦特告诉我们，他应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这里，之所以用带引号的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霍尔瓦特赋予它以一种特殊的涵义，这种涵义也许是那些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方法而是当做教义、当做结论、当做不能修正的真理而学习和“应用”的人所不能理解的；也是那些把马克思当做一条“死狗”、把马克思主义看得一文不值而弃之如敝屣的人所无法理解的。这是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即“它不是对马克思结论的重复，这些结论适合于100年前的历史状况。重复马克思的结论属于马克思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方法，即如果马克思活在今天他可能采取的方法”。在中文版序言中，霍尔瓦特再次强调：“本书背后的基本思想是，我试图以如果马克思活在今天他可能会写的同样内容，完成一本现代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著作。”

乍看上去，这一假设是荒谬的，马克思不可能活到今天。我揣测，霍尔瓦特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奇怪的、不切实际的假设是有其深刻的涵义的：(1)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分析方法和工具，不必因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分析现代的社会经济问题而感到羞愧。霍尔瓦特公开承认他是这位伟大思想家的学生，是站在马克思的宽阔肩膀上的。对于那些一发现这基本上是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就把它丢到一边的批评家，霍尔瓦特就是要剥夺他们的这种快感。(2)像所有的大思想家一样，马克思被人严重误解了，他的思想有许多错误的解释。霍尔瓦特

借助于这种假设，也是要剥夺那些利用这位伟大思想家的权威而背离了其精神实质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快感。(3)马克思对100多年前所做的许多结论不是不可以更改的，因为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霍尔瓦特说：“我不是‘教’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实践着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我自发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我自己的思考方法，所以，在实践需要修正理论时，我丝毫没有顾虑。马克思也会做同样的事。”他还说：“由于我的理论在某些重要方面与马克思不一致，在另外一些方面，我要解决的是马克思未曾遇到的问题，因此，有人可能会说，这些理论是我自己的。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我显然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但在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不灵了的今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应用，以及这种方法具有怎样的科学的思考能力、理性的判断能力、否定的批判能力和自主的创造能力。

第二，在中文版序言中，霍尔瓦特指出：“我试图提供一个以真实的（修改过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替代理论——我称之为系统理论（systemic theory），这当然是马克思的基本意图。”在给译者的信中，他告诉我们，他一生的兴趣是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用“系统理论”代替不令人满意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什么是“系统理论”？通读全书之后，我理解它就是首先由古典经济学家发展起来的、并由马克思发挥到了极致的社会经济分析方法（socioeconomic analysis）。本书的副标题也指明了这一点。这种方法突破了西方经济学所谓技术分析即人与物的狭隘界限，而从哲学、社会学、道德伦理等更为广阔的角度和视野来分析社会经济问题，从而把对人们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行

为的分析放到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进行。它探索人们的经济活动和产生这些活动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探寻人们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角色转换的内在联系，目的是提供一幅完整的关于人类社会的生理解剖图。这难道不是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任务吗？马克思指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熊彼特也说过，经济学家的任务不是像医生那样，对病人进行诊断和提出药方，而是应该像生理学家那样，提供人体的生理学和解剖学。

社会经济分析方法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主要分析方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将政治经济学看做是一种特定社会的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理论。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出现，社会和政治的内容被剔除了，后来就只有纯粹的经济学了。此后不久，纯经济学日益成为与现实世界经济决策或解决实际问题无关的模型建造。这正如凯恩斯所批判的那样，"近年出来的所谓'数理经济学'，绝大部分只是杂凑，其不精确程度正如它们赖以成立的假设条件一样。而其作者却在神气十足但毫无用处的数学符号中把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互相依赖性置于脑后。"①

应该指出，社会经济分析方法就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关于这一点，熊彼特已经认识到了，他说："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论证中，社会学和经济学如何互相渗透着。在意向上，某种程度内也在具体的实践上，社会学和经济学是一回事。因此，一切重大的概念和命题既是经济学的又是社会学的……这样的分析所增加的活力是不能有什么怀疑的。经济

---

①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哈考特布赖斯公司，纽约，1936年，第298页。

理论的幽灵一样的概念开始了呼吸。无生气的定理下降成为agmen，pulverem et clamoren（活动、奔驰和呐喊）。它并未失却它的逻辑性，但不再仅仅是一个抽象体系的逻辑性质的命题了；它是描述社会生活的激烈动乱的画笔的笔触。这样的分析不仅传达了比经济分析所描述的更为丰富的意义，它也涉及更为广阔的领域。”①

第三，本书与其说是一部关于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实证分析的著作，毋宁说是一部关于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规范分析的著作。霍尔瓦特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未曾出现，她还只是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水平上的一种可能的选择。因此，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设计出一种兼具平等和效率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来。霍尔瓦特在英文版序言中告诉我们，本书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设计。

霍尔瓦特问道，工程师可以设计桥梁，为什么社会科学家就不能设计社会制度呢？这两种任务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设计新社会更困难而已。爱因斯坦的理论在1905年可能显得荒诞不经，几乎无人接受。但没人说它是乌托邦。为什么社会科学家对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制度的设计反而被人类认为是乌托邦呢？不关心未来社会设计的传统——实际上还将这些设计公开贬斥为乌托邦和伪科学——在社会主义运动中长期存在并获得了广泛认同。霍尔瓦特指出了这种态度对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危害性，以及设计社会主义社会的迫切需要性。当然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细节的天真描述实际上玷污了这一神圣

①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61页。

的任务，以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拒绝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做更多的说明。但是，如果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是非常糟糕的，如果我们有向着更美好的社会前进的愿望和选择社会制度的能力，那么，对未来社会的设计就变得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拒绝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就可能失去了改善社会和自我的可能性，而永远成为异化的和物化的社会秩序的牺牲品。为此，霍尔瓦特批判了"历史决定论"，他认为，这种理论忽视了人的主动精神和选择能力，并且使人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

很明显，对社会制度的设计、不能采取实证分析方法，而只能采取规范分析方法。这就突破了西方经济学所谓科学实证主义、价值中立原则和技术分析的狭隘界限（顺便说一下，哈耶克一直就对这种忽视物理的与非物理的现实之间差别的所谓"科学主义"——他又称之为"弄虚作假主义"——展开讨伐），而把价值判断放到社会经济分析的显著位置上。任何现存的社会都必须在价值的天平上掂量其分量，那些被掂量得无足轻重的制度，没有存在的理由。霍尔瓦特的价值判断体系，是一种非目的论的伦理学，它从来就不是"至高的善"，个人没有被贬低到成为追求净利润最大化的商人，也没有被贬低成为服从一个独裁主义集体意志的臣民。它来自于人类的真正需要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意义。在这个价值体系中，正义和效率是两个首要的价值。这两个价值必须同时得到满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正义（平等）与效率是矛盾的，他们往往为了效率而牺牲了正义。而霍尔瓦特认为，在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二者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的。他还引用罗尔下面的话来强调正义的重要性："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

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

（四）

对霍尔瓦特来说，任务有两个：一是对现存的社会进行无情的批判，全面地暴露和披露它们的丑恶之处，使人民认识到它们是不合理的和非正义的；二是设计出一种理想的、更合理的、更有效率的和更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正义社会。第一个任务说明了我们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第二个认为说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及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第一个任务只是为第二个任务扫清道路。因此，霍尔瓦特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从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批判开始的。

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这种批判也许可以与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及其它的政治经济学所做的批判相媲美。因为他们俩所用的批判方法是相同的，并且站在同样的高度上——人的解放和人性的全面发展。本书不仅全面地审视和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哲学、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资产阶级的政治学和道德伦理，而且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道德等角度分析和批判了高度极权的苏联式的社会经济体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霍尔瓦特显然超不过马克思。但对国家主义的批判，霍尔瓦特更胜一筹。因为这是马克思无法完成的任务。霍尔瓦特生活在东欧国家里，他更熟悉和了解斯大林模式，因而对这一模式的弊端的批判是极为深刻的。

霍尔瓦特把现存的基本社会经济制度划分为“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①] 两大基本模式。他把国家主义视为一种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社会主义的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他为国家主义下的定义是：“如果一个社会的统治阶层信奉诸如消灭私人生产性财产，解放被剥削阶级等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但在国家的作用这一至关重要方面做了改动，这个社会就是国家主义的。”他指出，社会主义者有一种认为国家是压迫工具的思想传统，因此，应该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来代替国家统治人民的职能。然而，在国家主义那里，这一思想传统被一种完全相反的意识形态所代替，即“一个强有力的、集权的和权威的国家成了社会的轴心”，所有的经济和政治权力都被集中到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组织手中，它公开声明政治权力的垄断。而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它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国有制、中央集权制和官僚的管理。如果国家在一种社会制度中扮演着一个绝对支配的角色，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毫无疑问是“国家主义的”。

按照传统的宿命论的划分标准，我们只知道有两种社会经济制度，如果一个社会不是社会主义，那它一定就是资本主义。既然斯大林模式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那么社会主义者自然地拒绝承认它是社会主义的。包括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在内的世界上所有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激进人士都持有这种观点。

---

① 霍尔瓦特用“Etatism”这个概念来概括现实存在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模式。“Etatism”来源于法文的“Etatisme”，这个词的原意是政府对个人权威或这种权威的增加。《新汉英词典》对“Etatism”一词的解释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如果把“Etatism”翻译为“国家社会主义”，则与德国法西斯的“国家社会主义”（Nazism）相混淆。许多西方左派经济学家也往往把斯大林模式称作“国家社会主义”，但所使用的英文名词是“State Socialism”。鉴于霍尔瓦特把“Etatism”视为不同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我们把“Etatism”翻译为“国家主义”。

他们认为，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国家拥有所有的资本，雇佣劳动者，和以私人资本主义的同样方式诈取剩余价值，因此，这个社会同国家资本主义没有什么两样。霍尔瓦特认为，这种观点隐含着一个未被证实的假设，即一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社会必然是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但历史很容易证明它是错误的，例如，在古代埃及，国家也拥有所有的生产资料——在那个时代是土地和灌溉设备——和榨取剩余价值，但它显然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主义的经济基本特征（中央行政计划）、社会基本特征（没有私人财产、不同的社会阶层）和政治的基本特征（政党的特殊性质）是与资本主义根本不同的。

对于认为国家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观点，霍尔瓦特认为，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是无阶级，因此，检验社会主义的一个最关键的标准是不存在阶级，不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不存在命令者和被命令者。国家主义未能通过社会主义的检验，就是说，国家主义并没有消灭阶级，国家主义的社会仍然是阶级社会。

霍尔瓦特认为，国家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都是社会权力分配不平等的社会。国家主义是按等级制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典型的官僚结构，活像一个上窄下宽的金字塔。具有强制性的指示，从社会金字塔的权力顶峰，单方面地向底部贯彻。但在金字塔的两端，等级制度关系消失了：在顶尖，它在没有上级的意义上消失了；而在底部，它在相反的没有下级的意义上也消失了。社会的顶部和底部不存在直接的对话联系，联系这两个部分的中间部分是官僚。官僚机构行使代表权力和执行服务的功能，它的任务是指派的，完不成任务将被处罚。由于国家主义是一种一致性的制度，所以在每一层次的官僚管理都是按等

级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

这样一种权力结构和权力配置必定使社会分裂成为为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因为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产生了另外两个非常重要的社会不平等：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社会名望（social prestige）的不平等。权力、财富和名望的不平等是与社会阶级的形成高度相关的，对这些值得弄到手的东西的累积性分配产生了客观上不同集团利益之间的不相容和主观意识上的冲突，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支配同样的权力、有同样生活水平和社会名望的私人集团会组成一个社会阶级。在阶级的范围内，权力、财富和名望这三个因素之间是可以替代的，特别是权力可以很容易地变成其他两种因素；同时，权力也制约着其他两种因素。这三种因素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决定着一个人或集团的社会地位。组成统治阶级核心的人表现为对这三种有价值东西的高度占有，因此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对这三个有价值东西占有的同样的社会地位，造成了一种类似性，并且产生了作为一种独立的阶级的意识。社会阶级就是以上述三种因素为其基本特征的，并且由个人集团在社会工作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决定。在社会工作组织中，社会阶级可以被权威的界限所识别；在组织之外，它可以被住所、朋友圈子、文化背景和联姻关系所识别。

在国家主义社会里，可以明显地观察到阶级地位的继承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阶级地位的继承主要是靠财产的继承；而在国家主义社会里，阶级地位的继承主要有三个工具：家庭、教育和同类圈子（peer group）。所有这三个社会化的力量在阶级区分方面发挥作用，并且产生一个合适的阶级意识，以这种阶级意识为武装，个人准备继承社会精英的地位。高级

政治领导人的儿子不一定必然成为高级领导人，但可能成为将军、部长或有影响的编辑。地位稍逊些的政治官僚的后代也是如此，他们可能在既定的精英圈子内选择各种工作。只有一件高度靠不住的事情是，他们有可能加入作为“统治阶级”的工人阶级。霍尔瓦特认为，“即使国家主义代表一个纯粹的和理论上的能人统治的典型，它仍然意味着一个有阶级的社会。更何况它离理想的能人统治模式很远。社会阶级的区分是明显的和既定的事实。三个构成阶级区分的基本成份存在着，它们是：权力、收入和统治阶级享有的社会名望。这三种成份事实上如此紧密相连，如此强烈的存在，以至使组成统治阶级的政治集团比资产阶级更一致更连贯。”统治精英并不企图掩盖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统治国家这一事实，“精英们的（历史）使命是领导，而群众的使命是被领导。这种基本的‘劳动分工’是清楚的、一致的和严格的。”

一种更为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国家主义是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第一个阶段。这种观点来源于关于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转变成社会主义，因此将有一个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内，国家将把一切生产资料集中在自己手中，并且执行必须的有关制度变革，这就是国家主义社会。霍尔瓦特认为，这种观点似乎有道理，但容易受到下列观点的反对：如果国家主义是一个过渡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应该很短，并且存在着这样一种明显的可以观察到的趋势，即为了使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国家的角色被减少到一个合适的范围。但在现代国家主义社会里，没有观察到这一趋势；相反，本来应该作为过渡阶段的国家主义却结晶为一种非常稳定的社会结构，观察不到基本社会结构变动的趋势。相反，在国家主义的社会里，国家不仅保证

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且更重要的是，再生产出统治和等级制的社会关系。这样一种不断地自我繁殖并且鲸吞整个社会的国家决定了国家主义的生产方式。

国家主义之所以成为一种非常稳定的社会结构或社会结晶体，它的意识形态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诺思虽然正确地分析了意识形态对现存制度安排所起到的稳定作用，但他没有也不可能分析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的那种压迫性和庸俗性，这就是异化（alienation）和物化（reification）。

“异化”是黑格尔提出的一个概念，它的最初含义是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相脱离。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将黑格尔的异化概念加以批判地改造，使之成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范畴。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私有制以及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使劳动、劳动的物质条件和劳动产品，与劳动者对立起来，前者本应与劳动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现在却变成了一种异己的、统治劳动者的力量，只有消灭了由社会分工所造成的三大差别和私有制，才能消灭异化现象，使人得到彻底的解放。解决和消灭异化问题，是马克思关于自由人全面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霍尔瓦特运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认为它们都是不合理的和异化的社会。他指出，对异化现象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过程来进行分析：即劳动的异化、劳动产品的异化、个人与其他人和社会的异化。劳动的异化意味着劳动者与他们的创造能力的隔离，他们被变成一种客体，一种可以被别人占用的产品，这就使个人与他们的生命能动性之间的基本关系被割断。劳动产品的异化是劳动的异化的直接结果。一旦犯下了自我异化的原罪之后，人类的创造物就会以异

己和威胁的力量与他对抗。“人生产了产品和创造了市场，然而，市场的非人格的力量开始统治他们的社会关系；人创造了政党、工会和国家，然而这些机构以独立的生命生存着，避免了它们创造者的控制。”当人与他的生命活动和他的产品相异化时，他注定要使他自己与其他人相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来是相互实现的关系，现在，他人却变成了可以利用来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或手段。“社会分裂成为敌对的社会阶级。竞争和阶级仇视使合作的大多数形式变得不可能了。社会成员变成了一个个竞争的和自私自利的个人，变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变成了工人和官僚，变成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不再是人类了。”

霍尔瓦特认为，产生异化的条件有三：①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②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③劳动和政治活动以产生经济和政治权力高度集中方式的等级制原则组织起来。第三个条件可以被认为是另一种特殊的分工，即专业的发布命令和专业的执行命令之间的分工，决策和仅仅执行决策之间的分工。实际上，它是产生异化的充分的和必然的条件。

物化是指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被表达成为或经历成事物之间的关系，社会关系丧失了它的社会性质而被神秘化为技术、交易和管理之间的关系。人们之间衡量彼此就好像衡量客体一样。把一定阶级、一定时期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变成了自然的、永恒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种物化的工作是异化的社会环境的必然结果。物化 = 异化 - 理性的批评能力和否定的思考能力 + 维持现状的理性。它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理论对现存社会关系的一种解释。

“物化”是匈牙利著名哲学家卢卡奇在20世纪20年代首先使用的概念，但这个概念来源于马克思。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在《资本论》第三卷对三位一体公式的分析，已经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问题。霍尔瓦特的贡献就是把马克思—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的物化分析运用于分析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从而完成了对职位拜物教（office fetishism）的分析。

正如商品拜物教倾向于把人与人的关系当做物与物的关系，职位拜物教则将人的实际关系隐蔽在非人的官僚规则的面纱背后，是对任职者活动的一种神秘化。市场的裁判是不会错的，一个官员对其下属的裁判也永远是正确的。拥有某个职位说明任职者更聪明、更诚实、更可靠、更有智慧，比在职位等级上处于较低位置的人更优越。霍尔瓦特还把马克思用以分析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话稍加改动，这样惟妙惟肖地讥讽国家主义的职位拜物教：“职位的力量有多大，我的力量就有多大。职位的特性就是我的特性、我的本质力量，因为我是任职者。因此，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什么，这决不是由我的个性决定的。就我的个人特点而言，我是跛子，可是职位使我获得了24只脚，因此我不再是跛子。我是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可是职位是受人尊敬的，所以，任职者也受尊敬；职位是最高的善，所以，任职者也是善的。此外，职位还使我不必为成为不诚实的人伤脑筋，所以我事先就被认定是诚实的。我是没有头脑的，但职位是万物的头脑，任职者又怎么会没有头脑呢?”

社会关系的异化和物化，导致了病态的社会和病态的心理。在现代生产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庞然大物面前，个人是无能

为力的。他只是某大机器上的一枚螺丝钉而已。在社会上，他没有权力，没有自由，没有自主性。他只有服从和顺从，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同，有了归属感。于是，资产阶级人和官僚人都成了一种消费人（Homo Consumens），一种没有价值地选择（价值判断的抑制）、没有意义地工作（精神的抑制）、没有共性地结合（共同体维度的抑制）、没有感情地思考（感情的抑制）和没有希望、神话和乌托邦地活着（幻想维度的抑制）的"单向度的人"（one – dimensional man），一种"两面人"（Homo duplex）。总之，"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生灵都是商品人和职位人。这些物化的生命以一种物化的方式思想、行动，进入物化的关系。他们的生命目标不是发展个性，尽可能充分地享受生活，而是积累和命令。换言之，目标不是是而是有——物和职位。他们无法形成自发性的人类联系：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连着货币——甚至可以说货币与货币共舞；在国家主义社会，职位连着职位。总之，都不是人连着人。"

霍尔瓦特认为，国家主义是由社会主义因素与反社会主义因素所构成的混合物，这种奇怪的混合物产生了同样是奇怪的结果。国家主义中的反社会主义因素由斯大林主义发挥到了极致。在描述完斯大林主义之后（农业集体化、政治大清洗、克格勃、古拉格、入侵芬兰、瓜分波兰；以及在斯大林之后的进军匈牙利、占领捷克、入侵阿富汗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等等），霍尔瓦特认为，所有这一切都与社会主义无关，而是在没有任何道德束缚下，为了绝对的权力而进行的肆无忌惮的斗争。虽然一个控制经济和其他活动的强有力的和集权的国家不一定必须会产生一个政治上的镇压体系，换言之，国家主义不一定就是斯大林主义，前者可以与一个更为民主的政治体制相

结合；然而，不利的历史环境——极端的落后，军事干涉，经常性的威胁，在国际上孤立和隔绝，领导人的病态心理，缺乏政治民主的传统和经历，缺乏合适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理论，忠于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主义蜕变成为以斯大林主义为其标志的畸型物。

霍尔瓦特还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对比了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效率，他的结论是：由于它们都是阶级社会，因此两者的经济效率都是低下的。

作为结论，霍尔瓦特对资本主义阶级社会和国家主义阶级社会的性质做了比较。他这样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权力主要来源于经济权力，在国家主义社会，这种关系正好颠倒。在前者，国家归根到底被财阀统治；在后者，它被政治贵族（politocracy）统治。正如他们各自的名称所表示的那样，在资本主义，工人阶级受资本的统治；在国家主义，他们受国家的统治。两个统治阶级是资产阶级和政治官僚，前者包括经理、其他统治精英和为其服务的阶级；后者包括政治领袖和官僚。在资本主义中，收入主要来源于一个人在经济等级制中的位置；在国家主义中，它决定于在政治等级制中的位置。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相对应的是国家主义的政治霸权。""在统治社会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主要使用经济强制，伴随着强迫思想一致的压力，最后才是政治强制；在国家主义，政治强制之后是意识形态强制，最后才是经济强制。由于政治强制是个人的，它比非人格的强制更难以忍受，所以国家主义比资本主义更有压迫性。作为使用各种不同类型的压制的结果，资本主义以经济不稳定为其特征，而国家主义以政治不稳定为其特征。"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经济周期，并且不断地被深刻

的经济危机所打断；国家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政治性的周期，并不断地被深刻的政治危机所打断。这种终极异化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是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无产阶级革命是为建立社会主义而战，结果建立的却是国家主义。

霍尔瓦特对现存社会经济制度所做的批判是具有相当的震撼力的，它显然比把现存的当作合理的，从而在所谓的既定制度下所做的运行分析更能发人深醒。对于那些把既定的生活方式当做美好的生活方式，从而把一定阶级、一定时期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变成自然的、永恒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物化”的人来说，霍尔瓦特要求我们思考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和真实的自我。

（五）

霍尔瓦特在本书奠定了在政治上以自我治理（self - government）为基本特征、经济上以自我管理（self - management）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和心理的基础。

霍尔瓦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一个正义的社会。因此，社会主义的正义论是社会主义社会设计的价值基础。社会主义正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自由、平等和团结，这些基本价值彼此包含，我们可从其中的任何一种价值观开始作为分析的起点。由于平等是社会主义正义论的核心价值，所以，霍尔瓦特是从社会主义的平等观着手来设计社会主义的。由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扮演三个基本的社会角色：一个生产者、一个消费者和一个公民，因此，平等必须在生产领域中、在消费领域中和在

社会领域中实现。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实现生产者平等、消费者平等和社会平等。前两者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后者是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经济或每一个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平等是由以下要素所组成的：保证了社会上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在平等的条件下参与管理的社会所有制；在微观企业层次上既保证了决策的民主最大化又保证了效率最大化的沙漏模式；在宏观层次上最优地利用所有五种类型的调节机制（“看不见的手”、“看得见的手”、“间接的手”、改善了的“看不见的手”和改善了的“看得见的手”）和利用市场机制的社会计划；对纯粹的市场产品的按劳分配必须辅之以对能力塑造产品（教育、医疗和基本的社会福利）的按需分配……“社会主义经济意味着一个市场、自治和自我管理的生产单位。因而，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可以做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在生产上能做的任何事情。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社会财产的基础上的，这也意味着社会计划。因此，它也能够取得一个中央计划经济可以取得的所有的生产性利益。由于它至少和每一个其它的经济制度一样地有效率，并且有能力取得这两个替代制度之外的利益，所以它是更有效率的。”

社会主义政治或每一个人作为公民的平等意味着政治权力的分散、分立和社会主义民主，意味着消灭了任何政治垄断组织（国家、政党），而由公民们直接进行政治事务的管理和参与，意味着公民们自由地和平等地进人政权的职位……

这是霍尔瓦特对作为更人道的、更符合人类正义观念的和更有效率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设计，这是一种全面而又庞大的设计；要想了解其中的细节，就必须仔细地通读全书。霍尔

瓦特竭尽全力地证明这种社会制度的正义性和效率性，并且极力向世人推荐。

这是乌托邦吗？是的，对一种未曾存在的社会的描述就是乌托邦。然而，正如已故的新左派的领袖马尔库塞在《论解放》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乌托邦这一概念今天已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它的内涵，当代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已经使“乌托邦”失去了它传统的非现实的内容，被人们谴责为“乌托邦主义”的东西，不再是那些在历史领域中“没有地位”、不可能有任何地位的东西，而是由于现存社会力量的阻碍而不能发生的东西。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不是已经在以色列的“开布兹”实现了吗？

如果一种关于未来理想社会形态的理论不是空想，那么，它所主张的这种新的社会形态就不应该是头脑的产物，它必须发轫于现代生产方式和交易方式的矛盾运动，理论必须能够解释出这种新的社会形态是怎样从旧社会的母体中孕育而生或脱胎换骨；它还必须能指明实现这种理想社会的物质力量，必须解决由此及彼的路径问题和手段问题。问题还可以具体化为：它在现实中有其存在的客观基础吗？这种现实因素是未来社会的胚胎组织形式吗？希望的种子能够生长成为参天大树吗？霍尔瓦特花了很大的篇幅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霍尔瓦特指出：“工人自治作为一种产物，是由历史发展、伦理动机和即将进入21世纪的社会所需要的体制设置所造成的。”① 他回顾和总结了追求这一正义社会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运动，分析了传统的等级制组织对即将来临的信息社会的不适

① 霍尔瓦特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的“劳动者自治经济”的词条，见该书第三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

应，探讨了当今世界三大类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家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过渡途径和所面临的各种过渡问题。他论证了，社会主义根植于人类的历史发展、制度发展、技术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事实之中，她根植于人类对社会正义和经济效率的追求、奋斗的实践活动之中，她也根植于人类低级需要（衣食住行的需要和安全的需要）满足之后（前提是必须达到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水平）对高级需要（人类自我塑造或自我实现的需要）满足的追求之中。

最后，霍尔瓦特指出，社会主义不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她不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然的下一个阶段，不是只需要被发现的某些自然法则演化的必然结果，她仅仅是一种可能性。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设计，她应当被创造出来。但由于社会主义无疑地是更合意的和更符合人类的真实需要的，这样一种社会是值得为之奋斗的。他还指出，自治的社会主义当然不是一个纯粹的祝福，也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产生了自己的问题和危险，因此，需要不断地改进和修正。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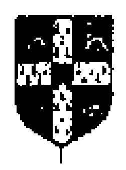
1989年，我国一些翻译工作者曾试图翻译此书，但由于“动乱”而夭折。我们这次的翻译主要根据1982年夏普出版公司的英文本和1984年克罗地亚文本，后者新增了《论新国际秩序》一章。具体分工如下：吴宇晖：中文本序言、第5、6、7、8、9、10、11、17、18、20章；马春文：英文本序言、第1、2、3、4、14、15、16章；陈长源：第12、13章，并从克罗地亚文本翻译了新增的第19章。

前面已经指出，尾注占的篇幅很大，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关观点的文献索引；二是正文观点的补充和引申；三是引文的出处。由于考虑到篇幅的问题，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主要对尾注进行了如下技术上的处理：①为了方便读者，我们把尾注变成了脚注；②忽略了第一方面的内容的翻译；③没有完全翻译第二方面的内容，而只是翻译了译者认为是重要的内容。这当然是一种含糊的、无法统一的标准，好在它只是正文的补充和引申，这样处理无伤大雅；④引文的出处是一定要标明的。但霍尔瓦特引用了大量的各种文字的文献，除了英文以外，还有法文、德国、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俄文、塞尔维亚文和拉丁文。这就增加了翻译的困难，而且是我们的能力无法企及的。一个简单的做法就是按原始的文字照搬，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此，对所有的引文出处（包括英文的）我们都没有进行翻译。此外，对正文中凡是没有把握的人名、地名和词汇的翻译，我们用尖括号“〈〉”标明，以示与作者所加的圆括号“（）”和方括号“［］”的区别。

由于我们的翻译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吴宇晖

2001年春节于长春·吉林大学



目　录

第 2 篇　寻求另一种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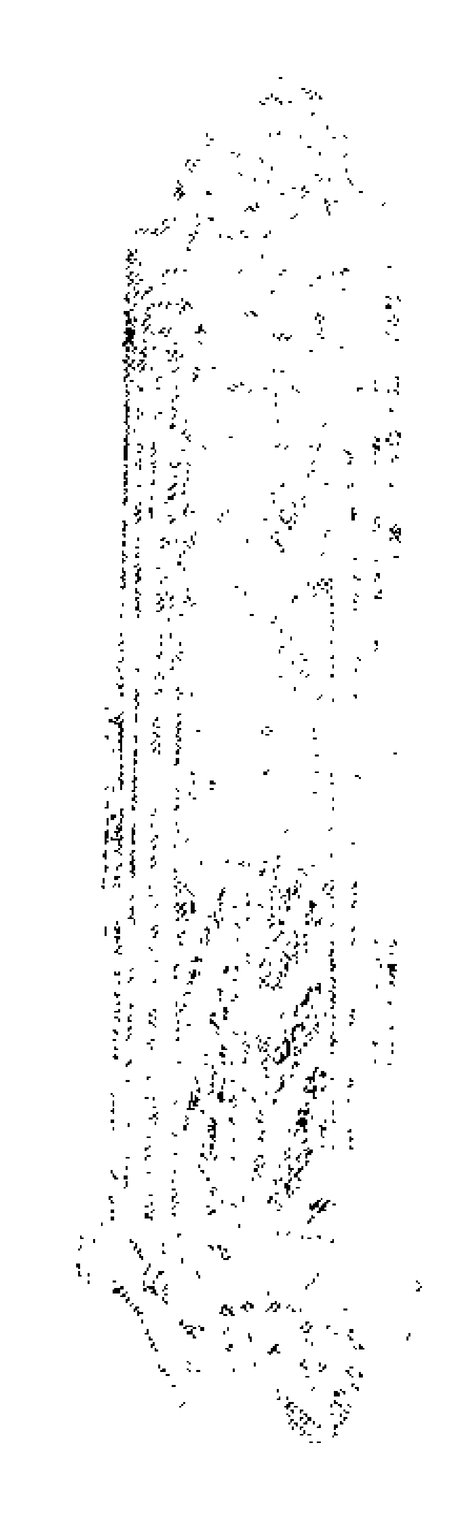
第3篇　自治社会主义的设计

第4篇 过渡时期

跋

第 1 篇

当代社会经济体制批判



我指的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做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

——马克思致阿诺德·鲁格（1843）

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

20世纪后半期，两大国家集团一直在争夺世界霸权。两大集团被等同于两种社会经济体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自由市场和私有财产，社会主义的特征则是中央计划和国家财产。人们争论这两种体制是否能（以及是否有必要）和平共处，两种体制的发展路径是否会趋同。近期解放的不发达国家只能在以市场为取向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国家控制的社会主义之间进行选择。

这就是关于当代世界景观的流行观点。它是如此流行，就连大多数社会科学家也毫无疑虑地坚持这种观点。只是在对问题的答案上，特别是谁将最后赢得这场斗争的问题上，才有不同的意见。

然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就连它所使用的术语都是混乱的。诚然，大国在争夺霸权。大国总是要争夺霸权的。现在、两次世界大战中、19世纪……从来如此．但这与社会主义无关。社会主义在这种争夺中也没什么好处。实际上，这两大集团所共有的惟一重要利益是在各处阻止真正社会主义的发展。它们经常彼此容忍对方对希腊、中国、越南、拉丁美洲、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和武装侵略。共产国际对南斯拉夫进行了全面封锁，美国则对古巴进行了全面封锁，这些都充分证明了我们的论点。对进步人士不胜枚举的审判和迫害也在这些国家内部事务方面说明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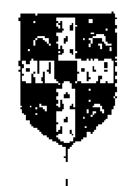
对许多头脑单纯的人来说，这一点令人困惑。俄国十月革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吗？当然是！这些革命胜利以来，并没有出现反革命，苏联肯定是社会主义国家嘛。当然，斯大林应该对许多重大错误负责——数以百万计的人在集中营里消失了，他还应当对许多偏离社会主义的方面负责．这些是个人

崇拜的不幸后果。但错误可以纠正，偏差可以消除。一旦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将拥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

稍做思考就可以明了这种推理也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并且，这种推理一直为人们所使用着。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一样，是由许多堂皇的理想激发出来的。不幸的是，实际操作未能达到人们所向往的标准。但资本主义的缺点一经消除，我们将拥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社会，如果人们愿意，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或“自由社会”或其他随便什么社会）。

这类推理的困难在于它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为了消除资本主义的根本弊病，必须消灭资本主义本身，有时还必须通过暴力来实现这一目的。人们认识到这一简单的真理是花费了一段时间的，而且还必须有一位马克思为此付出毕生的努力。难怪关于斯大林的真理至今仍未为人很好地理解。历史以某种方式重复着自己。在上一世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将资本主义神化为所有人的自由和机会平等的化身。在现今这一世纪，统治官僚的意识形态将他们自己的社会神化为最好的社会。现在——和那时一样——是戳穿神话的时候了。

我们首先对两种相互竞争的社会体制的突出特征做一简要的批判性的考察，以此开始我们的探讨。



第 1 章

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至今已伴随我们两个世纪了。因此，可以认为其特点已为人们所熟知，我们可以概要地探讨我们的问题。

马克思清楚地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和对抗性的阶级关系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因素．如果生产力超越了生产关系——人们在参与生产时结成的社会关系——的旧体系，要消除冲突，就必须变革生产关系，形成一种新的、与生产力相容的社会体制。在先进国家中，冲突通常是由改变社会阶级结构的革命来解决的。

第一节　资产阶级革命与政治自由化过程

最著名、最重要的资产阶级革命无疑是法国大革命。这一革命本意不是要造成与封建秩序相比的微小的社会改良。这场

革命是要解放全人类。它是在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三面旗帜下进行的。它的倡导者相信，为实现这些目标，必须粉碎封建障碍，解放那些在法律面前平等的个人的自由意志。这种意志要由一个代议制政府来保障。[1] 作为结果，自由、平等、博爱自会水到渠成。

建立在18世纪政治理论基础上，由1789年法国革命大会通过，后来又纳入1793年宪法的著名的《人权宣言》指出："人生而自由，并在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这些自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方面平等。"第四条将自由定义为："能够或有能力做不损害他人的任何事情。"一般说来，每个人自然权利的行使除保证社会其他成员享受同样权利以外别无限制。这些限制只有法律才能规定，法律对所有人都应该是相同的（第六条）。

注意，平等没有被认为是不可剥夺的权利。人们只是在权利方面、在法律面前平等。作为宣言的撰稿人之一——艾比·西耶斯曾提出了两条，清楚地指出，如果特权犹存，自由就不会存在，但平等只适用于权利而不适用于手段。立宪会议对这两条完全赞同，但由于某种原因却未能接受。因此，从一开始，资产阶级平等的含义就未能说清楚。

人们后来才明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在消极意义上定义的，是免于……的自由而不是为……的自由，只是会议参加者未能意识到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只是假定，一

① 一个半世纪前，平等派和掘地派在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17世纪的英国革命——中提出了类似的思想。平等派为普选权、宗教自由和法律面前的平等而战，掘地派或真正平等派试图消除经济不平等，他们指出，没有经济民主，政治民主是不可能的。掘地派影响了罗伯特·欧文（第一个协会主义者，也是现代社会主义的一位空想派先驱）的思想。

个在形式上自由的人总是能够为了其自身的利益而充分地利用他的自由。这种消极意义上的自由——后来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同义语——不仅不会自动地产生平等和博爱，相反却常常会毁灭平等和博爱。

与封建主义相比，政治自由是一个重大的进步。然而，这种自由是由有权有势者（而不是由所有人）使用或滥用的。它起初只是一个宣言或一种要求，而不是事实。其发展过程极为缓慢。1893年〈原文如此，疑为1793年〉的法国共和国宪法一直未能实施。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对直到州一级的选举权未能规定，直到19世纪中期，成年男子的选举权才得到普及。女子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获得选举权。在美国，不加歧视、一视同仁的选举权只是最近10年中才出现的。因此，在这方面，《美国独立宣言》中包涵的政治自由要求要花费几乎两个世纪的时间才付诸实践。

英国的政治民主化过程也是缓慢、逐步地实现的，这一事实对我们是富有启示性的。在17世纪40年代的革命中，被称为“平等派”的一些士兵和公务人员首次提出了成年男子选举权的要求。平等派未能成功。在近两个世纪后的1832年，暴动、示威席卷全国。在民众压力下，中产阶级获得了政治上的胜利：1832年的改革法案〈the Reform Bill〉确立了有产者的选举权。当时，议会成员是完全附属于大贵族土地所有者的。一位作者曾评论说，大贵族土地所有者甚至不须发号施令，他们在议会中的代表在每一次会议选举之前，都会殷勤地揣摸他们的每一个愿望。长达10年之久的宪章运动在1848年以失败告终。20年后，在1867年，城镇大多数技工获得了选举权。1885年，选举权普及到了农村生产者。1911年，贵族院丧失

了否决权，但直到1948年，他们仍然拥有相当大的延期权。女子直到1918年才有了选举权，当时只有年满30岁以上的才被允许参加选举。这项限制于1928年被废除。1945年，有产者和大学毕业生的双重选举权〈Double votes〉被废除。选举年龄到1966年才降至18岁。贵族院和皇室依然健在。按照拉斯基〈H. Laski〉[①] 和南丁格尔〈R. Nightingale〉的研究[②]，到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发展的末期，统治着英国社会的家庭不超过1000个，他们占据着英国社会的领导地位。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对此评论说，"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英国一直是一个由逐步扩大其选举基础的寡头统治的政治民主制国家。"[③] 虽然这种逐步推进的方式不是精心设计的，但其他国家政治自由化的方式大都相似。在整个欧洲，工会不得不为选举权而斗争。到19世纪末，即法国和美国资产阶级革命100多年后，英国革命200多年后，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实现了普选，成年男子的选举权只出现在少数国家。如果我们将常态的民主定义为男子选举权、无记名投票和责任政府制，这种民主从出现至今还不到一个世纪。如果再加上女子选举权，民主的历史就更短暂了。女子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选举权。在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女子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有了选举权。在瑞士，女子迟至1971年才有了这种权利。然而，选举权仅仅是有意义的民主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甚至在最成功的时候，

---

① H. Laski, *The British Cabinet: A Study of Its Personnel*, Fabian Tract No. 223, London, 1928.

② R. Nightingale, *The Personnel of 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 and Diplomatic Service*, 1851－1929, Fabian Tract No. 232, London, 1930.

③ K. Mannheim. *Freedom, Power and Democratic Plann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P99.

资产阶级民主也意味着政党控制的政治生活，而政党又由党的核心集团及其头目所控制。普通公民有权每三年、四年或五年从社会统治阶层为他们预先选举的政治首脑中选择相对较好的。资产阶级民主是一种将**多数人的形式上的**意志转变为**少数人的实际**意志的制度。

资产阶级的发展实际上是从法律面前的平等开始。这种平等比起封建时代随意性的司法管理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实际上，它是政治自由不可或缺的基础。然而，人们很快就看到，富人和穷人在法庭上的待遇并不真正相同。前者来自与法官相同的阶级，具有和法官一样的价值观和偏见，而且能够购买高质量的法律辩护。列·塔迪奇〈Lj Tadic〉评论说，“资产阶级社会虽然在形式上标榜普遍平等，但实际上只承认私有者和有全部权利的社会成员。”①

法律平等的一个特例是市场平等。在此，雇主和雇员、富人和穷人显然处于很不平等的地位。阿内多尔·弗兰思〈Anatole France〉用一句著名的话总结了资产阶级的平等：“庄严平等的法律既禁止穷人也禁止富人在桥下睡觉、偷面包。”在整个19世纪，一方财富的积累伴随着另一方苦难的积累。19世纪上半期，在工业革命率先发生的英格兰，尽管经济发展了，生产力增长了，但实际工资一直停滞不动，甚至下降。这当然意味着利润和私人财富不成比例的增长。本世纪初，工作日长达15小时，童工为12小时。大规模失业不断出现：钢铁工人的失业率达到了33%，纺织工人达到了50%。贫民窟和少数民族聚居区、营养不良和明显的饥饿、疾病和高死亡率以及城

① Lj Tadic, *Tradicija i revolucija* , Belgrade: Srpska Književna zadruga, 1972.

市很大一部分人口中令人震惊的脏乱和苦难——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在无产者方面的表现，年轻的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在《资本论》有关历史的章节中都对此做了生动的描述。

尽管存在不可剥夺权利的学说，工人阶级却没有自己的政党，因为工人甚至不能享有最基本的政治权利——选举权。周期性的不满被军警镇压。在英格兰和其他地方，各种形式的工人集会都被视为犯罪的共谋，工人不能建立工会。1791年6月，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正方兴未艾，国民大会通过了夏皮里埃法（the Chapelier Law），指责非法工人组织和集会"阻碍工业的自由发展"。更具体地说，它规定"任何行业的工人和手艺人都不能制定决策、不能制定任何有关他们认为是其共同利益的行动的条例。"在议会辩论中，夏皮里埃竭力避免造成误解："我们不是不让商人讨论其共同利益。"① 几年后，英格兰制定了违法者可能被放逐七年的立法（1797年的伪证法和1799年的集会法），西欧各国也都实施了类似的共谋和集会法。比利时法典第415条对工会行动处以2—10年的监禁。在工厂主和工人发生争端时，雇主只需要做出口头陈述，而工人却必须为自己的证词提供证据。直到1883年，按照法律，每个工人都必须有一本工作手册。雇主持有这本手册，并进行评点。在法国，工作手册规定于1890年废除。在英国，这种压迫性规定在1824～1825年间开始放宽。工人集会成为合法，但仍然受到许多法律限制。尽管如此，在8年后，欧文工会变得重要起来时，雇主还是采取了意欲使之毁灭的联合行动。在法国，禁

① A. F. K. Organski, *The Stag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New York Alfred A. Knopt, 1965, P. 7.

止罢工的法律于1863年被废止，在荷兰，此种法律于1872年被废除。在美国，直到19世纪中期，工人集会仍被认为是共谋。在1871年的英格兰、1884年的法国，工会才开始成为合法性的，工人才有了建立行业组织的自由，其他国家则更晚才做到这一点。在美国，雇主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才最终接受工会，法国则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1946年的宪法中）。

不要以为残酷的、无耻的阶级剥削只是上个世纪的事，它出现在工业化初期，至今仍与我们同在。迟至1918年，美国最高法院仍然裁决国会对童工八小时工作制的规定违宪。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隆（A. Gerschenkron）讲述了本世纪初维也纳城市的故事（德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大规模的、迅速增长的无产阶级地区的存在意味着工人子女的学校与中产阶级的学校实际上是分离的。某些道路只是为那些位于社会之梯较高处的人保留的，工人不准进入……维也纳电车的第一节车厢通常由那些穿戴出众的人使用，而工人只能在第二节和第三节车厢入座。这一惯例，一直延用到1918年的革命之后……这确实是工人的一种深层的异化……它的基础是歧视性法律（例如劳动合同法）、行政手段、司法实践和社会禁忌的复合体。"① 阶级剥削的许多最坏的方面目前仍在全世界许多不发达国家重演。

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工人阶级政治组织和专业组织的压力逐渐带来了重要的改善。今天，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早期原始积累的恐怖或多或少已成为过去。然而，甚至在最发达的资本

---

① A. Gerschenkron, "Reflections on European Socialism", in *Essays in Planning in Honour of Carl Landauer*, ed. by G. Grossma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 Hall, 1970, P6.

主义国家，收入分配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财产的分配尤其不平等。例如，在1960的英国，5%的人口拥有75%的个人财富、92%的财产收入。英国上层阶级拥有的财富多于他们的国家创造的财富。就该制度的运行来说，这一点令人莞尔。也就是说，他们不仅拥有物质财富，还拥有国债。

平等不存在，自由就没有了太大意义，博爱也就荡然无存了。后者显然不是宪法中所规定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资产阶级世界，仍然有很多关于自由的说法——我们不断地被灌输关于自由世界的理念，但却很少有关于平等的讨论，至于关于博爱的则几乎没有。即使对那些辩护士，把博爱和资本主义竞争硬拉到一起，也是离谱的。对此不用惊奇。这三大理想是大革命的要求，不是胜利后的资产阶级的要求。资产者相信的是私人财产、自由市场和家族世袭。法国大革命的三大理想仍然被一起刻在法国的硬币上——这是一种多么奇怪的象征啊。

第二节　对独立生产者的剥夺和经济权力的集中化

现在人们都知道，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资本、就业和权力的集中。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导致个人经济自由的毁灭，导致对私人生产者的大量剥夺。表一对此做了描述。英格兰在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大多数人口都是自己的老板，但到了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末期，近90%的劳动者（不包括经理和高层官员）不得不向雇主——私人和国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在别处，这一过程的发展有点滞后，但最终的结果大都相同。

表一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就业结构%

	17世纪晚期	1921
雇主	14	4
雇员	34	90
独立生产者	52	6

资料来源：W. F. Oakeshott Commerce and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6) P. 215

上述无产者化的过程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结果。表中的简单数字背后是说不尽的人间悲剧、破碎的希望、压抑的需求和毁灭的家庭。资本主义制度像一只铁铸的巨灵之掌，它粉碎独立生产者，约束离经叛道者，压榨弱者，迫使每个人都遵从资本积累的逻辑。竞争资本主义市场力量的自由运作使生产逐步积聚（通过积累增长）和集中（合并）。独立生产者消失了，小企业也消失了——或者变大了。企业平均规模不断扩大。企业越大，越有生命力。之所以如此，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的原因是技术性的——（1）大企业有规模经济，另外两个原因则与市场控制有关——（2）大企业能控制其供给来源，能影响对其产品的需求；（3）它在财务上更强大，因而更少依赖性；特别是它掌握着进行巨大的研究与开发所必需的开支的资源。大企业之所以像癌细胞一样增长，主要是第（2）、（3）个原因，而不是由（1）产生的超级生产率。因为（2）和（3），大企业能对其较弱小的伙伴施加压力，能按其自身意愿操纵买卖条件。这种市场控制意味着风险的最小化，大企业能经受住周期性的衰退。而在周期上升阶段，合并和其他形式的

联合是有利可图的。大企业通过三种途径扩大其市场份额：内部增长、合并、通过竞争毁灭对手。它们还建立行会、卡特尔和辛迪加，并实行其他形式的或明或暗的勾结。因此，市场竞争常常毁灭其自身的基础，逐渐被大公司的寡头垄断计划所取代。

早在19世纪下半期，大公司就出现了，它的出现与铁路建设有密切的联系。19世纪70年代的严重萧条之后，大企业扩张到制造业。美国1890年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对大企业的出现产生了应有的关注。世纪之交，美国制造业的全部劳动力中，1/10是由1000人以上的大企业雇用的；法国非农业企业的全部工人，1/10或更多在雇佣500人以上的企业工作。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伯利和米音斯指出的事实使沉迷于竞争的经济学家感到震惊。他们指出，1929年，不足200家美国大公司控制了非金融资本的1/2，另外1/2则由300 000家较小的企业控制。考虑这种数目上的不相称，大企业的有效市场控制远远不止1/2。连锁董事会也起着同样的作用。这意味着美国经济的大部分的运行是由125 000 000人口中的2500人控制的。当然，自1929年以来，企业一直在增长。1929年，100家最大公司拥有制造业44%的固定资产，到1962年，这一数字增加为58%。在英国最大100家公司的净产量份额从1880年的10%增加到1930年的26%，到1970年则增加为50%。

近些年来出现了新现象，巨型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实行业务计划。尽管资本输出很久以前就已出现，但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贸易才逐渐被少数巨型公司所掌握。1969年，最大的3家公司——全部为美国公司——中每一家公司的销售

额都高于120个主权国家任何一国的总产量（国民总产值+中间产品)。据估计，到1985年，300家公司将控制资本主义世界75%的资本资产。关键产业，例如汽车、计算机和化学工业，都将被四五家跨国公司有效地控制。跨国公司成倍增长的原因有技术经济方面的，也有制度方面的。如果不出口商品，而是将产出能力本身拓入国外市场，就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使用当地比较廉价的原材料、能源和劳动力，产量也能够根据当地需求加以调整。并且，公司在几个国家经营，能够保证自身的供给来源并利用大市场的优势。但最重要的优势也许是制度方面的，公司能够摆脱令他们不愉快的政府控制，而且通过操纵内部价格在税率最低的地方公布利润。

数量的增长常常带来质的变化。首先，单个人拥有的企业已被联合持股的公司所取代。之所以如此，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公司已超出了单个家庭的财务能力。另一个原因是遗产税（英国于1894年实行）使永久性的家庭控制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资本收益不纳税（英国直到1965年才对资本收益征税)，或是只被课以远远低于收入所得税的税率。因此，通过开办公司结束家庭利益是有好处的。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所有权与管理控制权分离了。在美国非金融业200家最大公司中，1929年只有12家是家庭企业，1963年则一家也没有了。1929年另外的57家和1963年的23家企业中，控制权是以股票所有多少为基础的。1929年，有88家企业是由管理人员控制的；1963年，管理人员控制的企业则有167家。在英国，50家最大的矿业和制造业企业中，管理人员控制的比例从1936年的50%增加到了1951年的72%。第二，管理层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自主和自我壮大的寡头。最后，公司倾向于在内部积

累必要的资金。这样做至少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可以避免股票市场上的交易成本和新资本发行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股东喜欢这种政策，因为资本收益的税率比派发股利的税率要低得多。自我融资使公司在财务上有了独立性。管理层全面控制了资金。由于这种三重的变化，竞争资本主义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

这一术语多少有些含糊。在这种情形下，“垄断”并不是指对销售的完全控制。在许多行业，三四家企业控制了全部产量的2/3或更多；一家企业控制的情形只是例外。因此，严格地说，这也许应叫做寡头，而不是垄断。但垄断这一术语还是可以用的，因为需求曲线是下斜的，企业不再是竞争中的价格接受者。这种情形是由于企业的大规模和产品差别造成的。但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原因。一旦一个行业由三四家大企业控制，竞争性价格削减就成了一件很危险的事。它可能会造成普遍灾难。在早些时候毫无经验的伙伴对此进行实验时，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因此，计划和协调对所有人都是有利的。卡特尔和其他形式的公开勾结通常会受到反垄断法的限制，但心照不宣的勾结却是可能的并被广泛地实践着。企业仔细研究对手，十分清楚他们可以采取什么行动而又能避免报复。价格按反映共同利益的方式确定。不必彼此商议。心照不宣的勾结在价格领袖制下表现得最为明显：被认可的领袖率先改变价格，其他企业则跟随仿效。结果，寡头行为开始变得与垄断行为极为类似。统计证据表明，寡头价格在萧条中下降的幅度要小于竞争价格，大企业和寡头行业企业的利润一般要高于小企业和竞争行业的利润。

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既要求劳动集中也使劳动集中成为可

能。面对雇主的经济力量，工人组织建立了工会。为了有效地发挥作用，工会必须是大型组织，它们不断增长，直至成为全国性协会。在这一阶段，垄断劳动与垄断资本相对抗，每一方都为在全国性的大饼中分得更大一块而斗争。这一冲突当然十分明显，不十分明显的是这两种垄断有非常重要的共同利益。在资本主义早期，工会对小企业主的利润是致命的威胁。因此，国家权力便被用来查禁它们。巨型公司的利润是有保障的，它们只是畏惧工人方面无组织行为的毁灭性后果。如果一个组织愿意尊重管理特权，保证劳动纪律，公司将极为愿意与之讨价还价。现代劳动合同明确声明，没有工会许可不得罢工。斯道顿·林德（Staughton Lynd）在评论美国制度时指出："今天，不经工会许可而罢工的工人可以在工会的帮助下（实际上是在工会的坚持下）被解雇。"[①] 因此，工会逐渐成为该体制的一部分。工资上升，利润也增加，而公司能够进行计划并使风险最小化。

第三节　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模式

资本主义以竞争为基础并不断地产生垄断，它以市场为基础却又不断试图毁灭市场，使其所有决策内部化。公司为了控制价格和其他供给条件，力求纵向一体化。横向一体化是为了消除销售市场竞争而建立的。较高程度的自我融资——100%最好——为脱离金融市场，获得独立性提供了保障。高压广告被用来塑造消费者偏好，甚至创造需求，这些需求如果没有那

① S. Lynd and G. Alperovitz, *Strategy and Program*, Boston: Beacon Press, 1973, P.38.

些高压广告是不可能出现的。限制性专利、伤脑筋的法律诉讼和排他性的集体折扣设置了进入壁垒。不断扩大的公司试图使关于生产、采购、销售和融资的所有决策内部化。也就是说，全面的计划化。然而，即使200家企业控制了全部经济，而且每一家都理性地计划，我们仍然缺少某种东西。整个经济没有计划。该体制中没有能保证总需求的充足性、价格的稳定性，并因而消除周期性衰退的因素。20世纪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危机令人信服地展示了这一点。国家必须介入，填补计划过程的空白。很快，社会民主党一方的沃依廷斯基〈Woytinski〉、维格弗斯〈Wigforss〉和卡莱斯基〈Kalecki〉和另一方的凯恩斯便指出如何做到这一点。资本主义获得了另一种称号——**国家资本主义**。两次世界大战对加速这一过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政府和企业都学会了如何在控制经济和社会的合作事业中进行合作。

简短的历史回顾也许是有用的。国家对经济过程的干预并不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才出现。垄断也不是在19世纪70年代后才出现。资本主义实际上正是以这两者为出发点的。它的第一个、准备性阶段被称为商业资本主义。

在西欧，这一阶段持续200年左右，直到18世纪初才结束。为了扩大贸易，创造新的制造业工场，商人要求——也被允许——垄断。年轻的民族国家，在达到“开明专制”阶段之前日益走向集权，寻找新的财政收入来源。贸易公司，在极不稳定的条件下开展贸易，需要政府保护。商业资本和国家的共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法国柯尔培尔时代的皇家工场是很说明问题的例子。但贸易扩大，终将破坏限制和垄断的基础。到17世纪末，受管制的公司〈regulated companies〉不再是外贸组

织的主导形式。到18世纪早期，发包制〈putting－out，在文献中，尚无统一译法，此处按其发放原料并包销产品的特点暂译为“发包”。〉被工厂生产所取代。18世纪60年代，由改良的蒸汽机和纺织机械开始的工业革命所需要的舞台已经搭好。不久以后，工业资本主义活跃起来，消灭了其余的贸易障碍。其竞争阶段终结于1873～1896年的大萧条，故事的其他部分我们就十分熟悉了。当一家企业相对于一个特定的行业增长起来后，它会进入一个在该行业的范围内进一步增长导致利润率降低的阶段。这迫使企业走出去，在产业上多样化经营，在地域上更广泛分布。“因此，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典型生产单位是一个集混合联合公司（经营多种行业）和跨国公司（在许多国家经营）于一身的巨型公司”①。少数这类大公司在政府的支持和协调下，有效地控制着局势。

这四个发展阶段的每一阶段在经济理论中都有忠实的反映。重商主义是商业资本的理论。它坚持商业利润和国家利益的同一性。工业资本主义的竞争阶段由古典政治经济学做了勘探。其第一批代表人物是威廉·配第（《政治算术》，1672年）和理查德·康替龙（《商业性质概论》，1775年）。重农学派普及了laissez－faire，laissez－passez〈自由放任〉原理，亚当·斯密使“看不见的手”深入人心。古典传统中的最后一部具有独创性的著作是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1867），它同时标志着一种新的反资本主义思想的出现和发展。19世纪70年代，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及20世纪30年代初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理论（琼·罗宾逊和E．张伯伦）划定了新古典时代的

① P. M. Sweezy, *Modern Capitalism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P.8.

边界。它由竞争理论开始，以垄断理论结束。1936年，《通论》出版。凯恩斯经济学仍与我们同在，国家资本主义也仍然与我们同在。

其他分类法也是可以的——例如，一种三阶段的分法：商业、工业和后工业资本主义。由于我主要着眼于最后阶段，我发现将竞争阶段和垄断阶段合并为自由放任阶段，使之与最后的、受管制的阶段相对比，是很方便的。但上述四个时期似乎在历史上就很分明。任何发展阶段的分类都必须考虑它们。它们表现了该体制的动力学。它们也说明了发展的加速现象：每个阶段都变得越来越短。表二对这一讨论做了总结。为全面起见，我加入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我在后面第14章（第Ⅰ节）还会更多地谈到这点。

表二 资本主义发展的分类

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小商品生产，14世纪中期~16世纪中期	
第一个受管制的阶段：	商业资本主义，至18世纪中期	
自由放任阶段：	竞争的，至19世纪70年代	工业资本主义
	垄断的，至20世纪30年代	
第二个受管制阶段：	国家的，至20世纪70年代	
	跨国的（?）	后工业资本主义过渡的（?）

我们现在可以回头分析国家资本主义了。

国家迅速增长的作用很明显地表现在政府支出占国民总产品的份额上。世纪之交时，这一份额在发达国家约为5－10%。世界性危机前，这一比率没有多大提高。但从世界性危

机开始，这一比率迅速上升，到20世纪70年代已达到1/3，在斯堪的纳维亚和荷兰甚至达到40%和50%。对稳定的目的来说，这已是足够多的一笔资源。一个庞大的公共部门，实际上承担着两种不同的稳定任务：既然政府购买不受市场自发波动的影响，它们便为避免累计性的升降波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岛屿；除此之外，财政和货币武器可以用来产生反周期效果。

在政府部门内部，国防支出有特别的重要性。在美国，这种支出几乎是政府支出的两倍。这便导致了通常所说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如艾森豪威尔所注意到的那样，其"全部影响在每个城市、每个州、每个联邦办公室都可以感觉到"，这很有点像激进分子的说法，当然，艾森豪威尔总统无论如何也不会被人看成是激进派。当钱花在军备上时，甚至对征税的反对意见都烟消云散了。因此，军事支出有助于维持总需求。不仅如此，它们还为"某些领域的尖端技术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工业体系的计划提供了保障。没有它们，这些领域会因为成本和风险因素而无法发展。"① 因此，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与军事支出是利益攸关的。但对这一方面的作用也不能过分强调。在这方面，空间竞争能有效地取代军备竞赛，直接用于研究与发展的资金也能起到这种作用。人们也许会注意到，联邦德国的军事支出很少，日本的军事支出也微乎其微，而这两个国家的增长率都比美国高出很多。一般说来，公共部门的规模越大，军事支出的重要性越小。

除了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药方外，技术进步的加速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之一。提供受过培训、受过教育的人力也

---

① J. K. Galbraith, *New Industrial Stat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7, P.229.

是国家的任务。国家还参与投资并直接从事生产。资本密集型的基础设施——道路、铁路、航空、能源供应——一般也都是由国家提供的。国家挽救破产公司，资助不能赢利的企业并担保出口风险。在必要的时候，它也调节工资和价格。一般情况下，只要公司体制出了问题，国家就会介入。因此，这种体制被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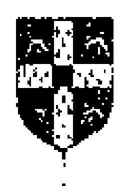
有一件事情是民族国家无法完成的，它不能在国际水平上实行计划。公司可以超越民族界限，而国家不能。当前国际经济秩序的危机便反映出了这一事实。因为现代经济是高度相互依赖的，国民计划无法防止商业波动，除非经济活动在世界规模上受到协调。计划化的国际化也许是制度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因此，它可以被认为是跨国的。

大企业意味着大劳动，这两者又意味着大政府。在资本主义背景下，政府是以政党为基础的。政党，像工会一样，是官僚性的介体。没有工会，工人不能谈判或罢工；没有政党的许可，代表也不能投票或采取行动。政府要有效地发挥作用，就必须是稳定的。为了稳定，政党数目逐渐减少，直到两个大党控制政治生活为止。并且，这两个政党还有一种将它们自己与两大垄断集团联系在一起，并有代表这两大垄断集团利益的强烈倾向。因此，就可能出现代表私人资本利益的“保守党”和由工会支持的“工党”。

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景观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四大巨头：有组织的资本，有组织的劳动和两大政党。由于政党清楚地将自己与两大对抗性集团相认同，寡头就成了双头。但即使没有这种认同，人类事务被巨型组织所左右仍然是一个事实。企业经理和国家官员都是组织人。

技术结构和官僚是组织控制、协调和管制的工具。占据这些组织制高点的集团拥有巨大的权力。在组织的重压之下，个体和竞争、自由放任的市场一起消失了。实际上，每个个人的生活都受某种组织的管制，每个人对这种组织都无可奈何。由于组织的这种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我打算将这种资本主义的现代阶段称为**有组织的或受管制的资本主义**。

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间为界，资本主义的最后两个阶段可以清楚地区分开来。自由放任阶段终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充分发展起来。两次大战之间，政治动荡、经济停滞、世界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都标志着资本主义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十分不安定的转变。以下我将主要考察后一阶段，即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在这一阶段，国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它与当代另一种社会体制有某种相似性。在后者中，国家起着更大的——实际上是绝对的——作用。这种体制并不十分为人们所熟悉，因此需要我们在下一章进行较详细的分析。



第2章

国家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作《共产党宣言》时，他们距离法国革命的时间恰好与本书作者现在距离十月革命的时间完全相同。此时与那时一样，新社会体制已足够成熟，可以对之进行系统的分析和评价了。

为了更好地理解后面的分析，我们先对国家主义下一个临时的定义。如果一个社会的统治阶层信奉诸如消灭私人生产性财产，解放被剥削阶级等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但在国家的作用这一至关重要方面做了改动，这个社会就是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在传统上把国家视为镇压机器。它是对人的治理，应当为对物的管理所取代（圣西门，恩格斯）。“为了表明他们自己是个人，他们必须推翻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有政府官员只能领取与工人同样的工资，而且可以被随时罢免。所有的政治岗位都必须是临时性

的（倍倍尔，列宁）。对政治的完全控制应交予全体人民，国家应逐渐消亡（蒲鲁东，恩格斯）。为了实现这一点，决策必须是分散的，以公社和协会为基础（无政府主义者，巴黎公社，马克思）。资产阶级民主，与其诸种社会约束一起，将被更有意义的社会安排所取代。在新的社会制度下，每个人的自由是所有人自由的前提条件（《共产党宣言》）。不断进步是一个社会的至高原则，只有完全的思想自由才能实现这一原则（倍倍尔的《未来社会》、卢森堡）。

在国家主义背景下，所有这些思想都被一种相反的意识形态代替了。强大的、集权的、权威的国家成了社会的轴心。所有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都集中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组织，这一组织公开宣告它对政治权力的垄断。1930年，斯大林颇为辩证地解释了这种修改，他声称：为了消亡，国家必须首先强大起来。这与另一个“辩证的”发现，即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阶级斗争必然更加残酷，密切相关。“消灭阶级，不能用熄灭阶级斗争的办法，而只能用激化阶级斗争的办法。国家的消亡，不能通过削弱国家权力的方式，而只能通过最大程度地强化国家权力的方式……”① 1939年斯大林在苏共十八大会议上抨击了恩格斯关于国家发展的著名观点。恩格斯认为，国家作为全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渐渐消失。斯大林认为这样的观点不适用于苏联，因为苏联是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国家，被虎视眈眈的资本主义

① Stalin, *Voprosy leninizma*, Moscow: Ogiz, 1945, p.394.

世界所包围。从那时起，资本主义包围已经被打破，在人口占世界1/3的国家中，资本主义已被消灭，但同样的理论却仍然被全盘接受。

因此，简单地说，国家主义是传统社会主义和权威性国家的混合物。这种不协调的混合物是如何出现的？产生了什么后果？这些问题有待于探讨。为此，我们先要回到上一世纪的前半期。

第一节 错误的二律背反

早期资本主义积累对没有力量，实际上也没有地位的工人阶级造成了没有必要的苦难，这种景象不能不产生强烈的反响。19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正是因此出现的。经历过这种令人发指的剥削现实，人们开始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理想失去了信任。这个社会肯定出了什么毛病。很快，人们发现自由（法律面前的平等）和私有制没有产生博爱，面是产生了资本主义剥削。在理论上，分析家们很快达成共识，拿出了解决方案。这一方案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命题：（1）私有制是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原因。经济不平等导致政治不平等，产生阶级剥削。因此，一个无阶级社会的基本前提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2）自由放任的市场造成周期性衰退和失业。为了合理利用资源，社会应实行中央计划。（3）既然在当时，工人根本没有政治权利，改良主义的社会改造是无法实现的，暴力革命似乎是惟一的选择。“共产党人……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宣言》）

在应用层次上，即当它被广泛的政治运动所接受时，上述

理论又添上了一种心理学上的特色。似乎不是出于理论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强烈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压迫，社会主义者才成了社会主义者的。像对所有令人生厌的事物的自发反应一样，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往往变成了对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价值观念的幼稚的、直截了当的否定。基本方法又一次成为否定性的。为了解放全人类，这一次要消灭的不是封建障碍，而是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凡是存在的都是错误的，都要被与之正相反对的事物所代替。人们经常忘记了，资产阶级社会不仅仅是资产者的，它也是人类迄今为止全部发展的产物。因此，对社会要做全面的分析，要能够准确地辨识并区别在人类发展的这一阶段上那些较为根本性的行为形式和较偶然的现象特征。然而，人们的态度和推理却大致如下：

——资本主义剥削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因此，私有财产必须废除而代之以共有财产。沿用继承下来的资产阶级法学术语，所有者只能是自然人或法人，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及追随者能够想象的公有制只能是国有制。因此，国家拥有的生产资本的百分比就成了在某个特定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最适当的指数。

——（自由放任的）市场带来周期性衰退、失业、资源浪费和异化。因此市场就应该被废除——人们意识不到除了资本主义市场还有别种市场——而代之以资源的行政性配置。市场被与一种特定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等同起来了，并与计划绝对对立，也就是说，市场与计划是不相容的。

——在没有了市场的经济中，货币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党领袖倍倍尔在其《未来社会》一书中极为简单地，也是片面地，表达了这一思想："没有资本就没

有商品，也就不可能有货币。”人们普遍接受了这一结论，曾经用多种方式消灭货币，引入“精神鼓励”等等。与货币密切相关的利息被认为是一种非劳动收入，在中世纪天主教会看来是一种高利贷。因此，利息也是必须被废除的。长期以来，社会主义理论家一直不清楚利息的配置功能，他们不知道作为私人收入的利息可能也必须被废除；而作为社会资本使用的价格，利息则应该被保留。

——无情无义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由私有财产和不受驾御的竞争所产生的个人主义）创造了一种人对人是狼的非人状态。因此，个人主义是邪恶的，必须代之以集体主义。社会的利益至高无上，个人要听从社会的差遣。而社会由——也只能由——国家所代表。与此紧密联系的是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私人积极性导致了富人对穷人的剥削。因此，私人积极性和自由主义是反社会主义的，必须被严格的政府控制和监督所代替。其次，个人积极性是自发的，因此自发性就是坏的。它造成了危险的资产阶级情绪，使社会无组织化，导致无政府状态。因此，它必须被代之以国家的自觉的，包罗万象的控制，使标准化行为得到保证。由此出发到对个人自由的全面否定就只有一步之遥了，物质财富匮乏的社会尤其如此。马克思已经观察到了这一现象，并把它描述为一种原始的、或粗陋的共产主义：

> 这种共产主义，由于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私有财产就是这种否定。普遍的和作为权力形成起来的忌妒，是贪欲所采取的并且仅仅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隐蔽形式 一切

> 私有财产，就它本身来说，至少都对较富裕的私有财产怀有忌妒和平均化欲望，这种忌妒和平均化欲望甚至构成竞争的本质。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这种忌妒和这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化的顶点。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单纯倒退，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①

这种错误的、尽管是一致性的二律背反还有更多。从俄国十月革命以来，这些二律背反越来越粗陋，也越来越强化了。因为俄国是一个落后国家，本身自成一类，且处于虎视眈眈的资本主义的全面包围之中，它有一种强烈的自卫冲动，外部的一切都首先被认为是反社会主义的。于是，相对论、基因生物学和经济计量学，都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发明，是非科学的，不能被无产阶级国家所接受。并且，与马克思对非自然的单纯倒退的描述相一致，抽象派艺术、爵士乐、文学表达方式的实验和无调音乐都被认为是腐朽的并因此受到禁止。反过来，所谓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其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视野和口味的一切，和它由国家赋予荣耀的教育目的一起，被规定为对工人阶级惟一适当的艺术。

这些二律背反中的一个，在革命后有了充分发展，造成了

① K.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trans. By T. B. Bottomore, in E. Fromm, Marx' s concept of Man ,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1961, P. 125. 中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118页。——译者注

悲剧性后果。它是关于政治民主的，直接来自前面谈到的对个性的否定。民主是资产阶级的发明，因此肯定是坏的。它保护富人，使穷人受穷，受剥削，因此应该被取代。被什么取代呢？被“无产阶级专政”取代。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社会主义民主。这一术语多少有些含糊（它代替了《共产党宣言》中使用的“无产者的统治”）。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是从布朗基那里继承了这一术语，但赋予了不同的内容。对这一术语的误用有意无意地创造了本世纪最大的混乱之一。这一概念首先是被作为一个描述政治体制阶级性的社会学范畴使用的，并具有将有利于无产者（代表大多数人的阶级）的统治与有利于资产者（只代表人口中一小部分）的统治相对比的含义。在其本来的布朗基主义意义上，这一术语主要是执政党用来为其政治专政进行辩护的。这并不是难事，因为在革命性的劳工运动中，在政治压迫下，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有一种偏好彻头彻尾专政的倾向。甚至在布朗基以前，巴贝夫分子就已想过“革命领袖专政”了。魏特林在其《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注意到法国共产党人很大的一个团体“倾向于专政，因为他们很清楚主权在民的原则……不适用于从旧组织向全新的组织过渡的时期”。①

1848年，巴枯宁在布拉格设计了一种“拥有无限的专政权力”的体制的种种方案②。这种体制与列宁1920年“以暴力为基础，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威”方式相似。1864年，巴枯宁为他在意大利建立的秘密组织写下了一份文件，他指示说，

---

① 转引自 H.Draper, “Marx and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Cahiers de l'INSEA*, no. 129, September 1962, series5, no. 61, 5—74, 引自 p. 14.
② 同上。

“国民政务会的所有成员由中央理事会任命，在任何情况下，国民政务会对中央理事会要绝对服从。”① 革命成功后，他的组织实行“看不见的专政”。至于布朗基分子的态度，恩格斯的描述也许是最恰当的：“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数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实现了变革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又事先服从于一个或者几个人的专政。”②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当然与此截然不同，以下的对话会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在评论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时，恩格斯写到：“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③ 但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又一次背离了恩格斯和一般社会主义运动：

> 在俄国第二次革命（1917年2月）之前，所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议会共和国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最适当的政治组织形式……恩格斯在批评1891年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时的权威性表述，即“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使马克思主义者继续毫无疑问地将民主共和国看成是

① 转引自 M. Nomad, “The Anarchist Tradition,” 见 M. M. Drashkovich, *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s*, 1864—194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57—94, 引自 p.64.

② 转引自 H. Draper, “Marx and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p.63.

③ K. Marx and F. Engels, *Correspondence* 1846 – 1895,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5, p.63.

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态……如果列宁拘泥于马克思词句，没有勇气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古老思想……不用关于苏联共和国的新思想来取代它们，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会是什么样子。[①]

斯大林轻松地赢得了支持。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历史性悖论：受虐狂般的知识分子与权力饥渴的统治者共生并存。在一个贫困，不公正的社会中，知识分子——他们本身是特权阶层——常常会产生一种严重的负罪感，这种负罪感通过对“革命领袖”独裁的屈从而得以发泄。这是一个世界各地都有的现象，斯大林是清楚如何利用这一点的。

一旦民主被肆无忌惮地变成独裁，其他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资产阶级民主既然是多党制，社会主义民主就只能是一党制。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家的资产阶级式的思维方式中，无党制是不可想象的，结果，政治发展带来的不是对资产阶级民主不完善性的清理，而是对民主本身的拒绝。对民主的要求被轻蔑地看成是无政府自由主义，是纪律严明的共产党人所不能容忍的小资产者的弱点。

一种特别的政治体制由此产生，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弗罗兹米尔茨·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将这种体制描述为集权体制，这种体制具有以下四大特征：

①在整个政治结构中，官僚机构操纵通过正式选举而形成的实体。

---

① Commis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SU (b),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9, pp. 356 - 57.

②高层官僚任命党、国家和工会岗位的候选人，有意义的选举被取代了。

③党领导一切，其他机构必须完全服从党的机构，所有独立的政治主动性都被全面禁止。

④垄断对大众传媒的控制，包括对传媒进行全面的预防性审查。

布鲁斯得出结论说："因此，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成员都面对着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国家机构，被剥夺了表达和控制的政治和法律手段，成为原子化的个人"①。

第二节　意识的宗教结构

在上一节，我们看到，单纯的否定并不会改变资产阶级的思维框架。单纯的否定基本上还是处于同样的意识结构之中。现在，假定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出现在一个落后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可以预料，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资产阶级态度会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就连前资本主义的态度也会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实际发生的一切正是如此。

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特征是意识的宗教结构。我所谓意识的宗教结构是指一种重权威不重证据，重信仰而不重事实的前理性或非理性的思维方式。此外，信仰的对象被看成是神圣的。这种权威——信仰取向所产生的态度不仅仅是非理性的，而且还具有与宗教教派相同的形态。这种认知性成份与另外两种互相补充。一是对领袖或组织的认同。一个人自己的个性被浸

---

① W. Brus, "The Polish October: Twenty Years After", in R. Miliband and J. Saville, eds.,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77, London: Merlin Press, 1977, P.183.

没、消融于崇拜对象之中。第二，作为结果，后者就被视为是神圣的。每种宗教都会有一种对神圣与世俗的区分。反过来，只要一个人、一个组织或一种观念被置于批评之外，它便被置于包含着宗教态度的神圣王国之中。

既然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出现在落后国家，由此产生的社会主义就弥漫了宗教意识，令人想起中世纪听命于宗教的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期待着一种真正的人类社会的来临，而实际出现的却是物化的、并在意识形态方面异化了的“社会主义”。他们和他们的追随者坚持科学社会主义，而实际出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神学社会主义。这种神学社会主义仍然被称为是“科学的”。神学之所以要带上科学的面具，理由是很明显的：(a)“真理”比单纯的主观“信仰”更有力量；(b)“科学意识形态”为既得利益提供了一种辩护，因面为之提供了一种有效率的防卫。但这种神学的面具为什么可能，就不是人人清楚的了。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分析。

(一) 宗教

神学当然是某种形式的宗教。也许有人会说，革命后的执政党不是宗教信徒，相反，他们是无神论者。他们确实是无神论者，而且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但无神论是对有神论的否定，因此无神论的倡导者仍然是有神论的俘虏。像马克思很久以前针对巴枯宁主义所说的那样，无神论“被规定为会员必须遵守的信条”。[①] 党员所必须具备的反宗教热忱和它的对头一样，都是与宗教有关的，且都是一种狂热。无神论可以用与任何其他宗教一样的宗教狂热来鼓吹，并经常伴有各种迷信，就像更

---

① Letter to F. Bolte, November 23, 1871.

原始的宗教那样。迄今为止，已经有很多人看到了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运动的宗教特征。例如，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指出："犹太人对于历史的理解方式，在任何时期都会强烈地投合一般被压迫者与不幸者。圣奥古斯丁把这种方式应用于基督教，马克思则将其应用于社会主义。"① 这一结论很令人感兴趣，但并不正确。这种相似性并不是源于被压迫者的心理——特权阶级、领导者和大部分人口都有同样的心理，而是源于一种宗教性的意识结构，在这种宗教性意识中，为了获得救赎（社会冲突得到了解决），对社会相互依赖性的理性分析是不必要的，所需要的只是超越性的信仰。

非洲政治家裘力斯·尼雷尔约束自己只描述其亲眼所见的事物，他非常准确地看到：

> 在某些社会主义者之间有一种建立新宗教——社会主义本身的宗教——的倾向。这种宗教通常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成了圣典，其他所有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行动都要根据这些著作进行评判。当然，这种教义并不表现为宗教：它的倡导者经常将宗教贬斥为"人民的鸦片"，他们的信仰是"科学"。然而，这些人的言与行都和最僵化的神学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谴责彼此的行为，因为这些行为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教士们所决定的那些 100 多年前问世的著作的真实含义。实际上，我们正迅速

---

① 为了从心理学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罗素列出了下面这张词汇表（《西方哲学史》，伦敦：艾伦与昂温，1941 年，第 383 页）：耶和华＝辩证唯物主义，救世主＝马克思，上帝的选民＝无产阶级，教会＝共产党，耶稣再来＝革命，地狱＝资产阶级的惩罚，千年王国＝共产主义社会。

地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此，基督教的不同教派关于圣经真实含义的争论比起那些声称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真正阐释者之间的争论是小巫见大巫。①

许多其他作者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他们都没有详细地探讨这一问题。以下，我们试图填补这一空白。

宗教需要教会，执政党非常成功地扮演了这一角色。教会从不犯错误，党也永远正确。在斯大林指导下写就的著名的《联共党史》中，党在它几十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做过错误的决策。党员会错，但党是不会错的。当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Rudolf Slansky）及其他领导人被指控为犯有叛国罪并被处决后，有人问党主席古特瓦尔德（Gottwald）以后还能相信谁，他回答说："相信党。"1956年，赫鲁晓夫痛斥斯大林是罪犯，但他对党未做任何批评，而所有的罪行都是以党的名义犯下的。

教会必须要有高级教士。这一角色由被称为主席或总书记的党的首脑来担任了。像教皇一样，主席是永不会犯错误的。他永远正确——至少在其任期内肯定如此。他也从未受到过公开的批评。实际上，任何批评他的企图都被认为是严重的政治冒犯，是社会主义死敌的卑鄙行为，冒犯者都要受到适当的惩罚。像阿列克桑德·索尔尼仁琴所注意的那样，即使是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对之进行私下里的批评，也会使人获得一张进入古拉格群岛的门票。

主席是天才，经常被看作是第四位经典作家。他的讲话、

① J. Nyerere. *Freedom and Socialism* , Dar es Sala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14.

报告和祝酒辞都被厚厚地结集出版，被人们在党的会议上、在学校里认真学习。对那些头脑较为简单的人则备有选集——成百万册印刷的简明教义手册，例如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或者林彪（后来发现这是一个暗藏的阶级敌人）编辑的毛主席语录。主席不仅是天才，也是尊敬的、被人民爱戴的领袖和人民的主人。在教室、办公室、商店橱窗里都挂有他的肖像，更忠诚的公民甚至把他挂在私人房间里。这些肖像取代了以往的基督教十字架和国王像。在他依然健在时，全国各地已树立了他的雕像；街道和城市都以他的名字命名。还有印着他肖像的邮票。他的生日是一种全国性的节日。伟大领袖逝世后，他的遗体经防腐处理，放在水晶棺中展示，供忠诚的公民瞻仰。这些公民大批大批地来向他们的神圣领袖致敬。

有了一个大领袖，还必须有许多小领袖。在上帝的王国中，有严格的等级组织，有各类圣者和天使，最坏的罪人下地狱。在地球上也是这样。在中世纪，等级是一出生就确定了的；在国家主义时代，则是按表现——不论是什么表现——定下的，而且同样严格。在 12 世纪，修女赫洛伊斯〈Heloïse〉在写给她的成了修士的前夫阿贝尔德〈Abelard〉的信中说，她很吃惊，他竟然“放弃了惯例和自然秩序”，将她的名字放在了他的前面。她提醒他说，“当我们写给上级或与自己平级的人时，秩序和礼貌要求我们把他们的名字放在我们的名字之前；然而，当我们面对下级时，名字的顺序必须符合职位的顺序。”这一声明也许可以放置在任何一个官僚办公室的大门口。不服从者，严加惩处。我们在读报时，只要看到名字的顺序，就可以知道一个人的相对（政治）级别。政治分析家从名字顺序的微弱变动上就可以推测出政策的巨大变化。

（二）宗教意识

埃米尔·涂尔干对宗教意识已做过一些论述。这些论述对我们是有意义的。涂尔干强调说，在任何时候，权力严重集中的原因都不应在统治者的特殊地位上寻找，而应该在统治者统治的社会的特质中寻找。一个特定的酋长的个人优势仅仅只有第二位的意义。它可以解释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拥有权力，但却不能解释权力为什么集中。权力之所以集中，是因为意识在结构上是宗教性的。之所以如此，至少有两个原因。只要一个共同体共同拥有某些强有力的信仰，这些信仰就不可避免地获得宗教性。他们像宗教信仰一样令人敬畏。既然革命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和强有力的信仰，革命就成了宗教态度的沃土。

第二个原因可以在涂尔干所谓的不发达社会的机械式团结中找到。在这种社会——它产生马克思所谓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大众是由相似的个体组成的，这意味着集体类型是非常发达的，而个体类型——社会劳动分工的产物，它导致"有机的"团结——仍然处于很幼稚的水平。个人不属于自己，他是由社会随意支配的某种东西。社会的心灵生活在结构上不可避免地具有宗教性。人的第一个道德义务，是像其他所有人一样，放弃信仰或行为方面的任何个性或个体性。一旦社会有了宗教性的、超人的特性——来自适当的意识结构——这种特性就会传递给领导人，领导人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远。权力集中不是出于高压政治的需要；它源于一种集体性意识，权力之所以巨大是因为集体意识发达。

宗教环境的一个特点是惩罚性法律的极端膨胀。从古代斯巴达不适当的发型到迄今为止所有社会中的异常行为，所有这

一切——也就是说，任何不符合规范的行为——都被认为是可惩罚的犯罪。冒犯（即批评）权威，做反对官方教义的公开（或私下的）演讲，与现行秩序不一致以及对之进行有组织改造的企图也都是要被惩罚的对象。我们会马上看到，这些行为在发达社会都是正常的政治活动，但在宗教性环境中则都是犯罪。因此，涂尔干的观察是正确的：迄今为止，惩罚性法律最大程度的减少是因为反对宗教不再是犯罪。① 国家主义社会对政治罪的惩罚远远重于刑事罪。人们对此经常感到惊讶。上述分析应当有助于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就连在古代雅典那种开明的环境中，渎圣也要被判处死刑。

在我们做进一步分析前，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做两点说明。我正在分析的是集体意识而不是个体意识。总有一些有宗教情感和神秘体验的个人。他们自行其是，既不因此受到谴责，也不因此受到赞扬。一个诗人和一个会计师，一个形而上学的哲学家和一个保险代理人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是好事，它使生活多样化，也有利于人尽其才，从事各种不同的工作。然而，这种神秘人物占活动人口的百分比与千差万别的集体类型是相容的。这些集体类型是由发展水平和社会体制表现着的集体经验所决定的。第二，（早期）教会与（早期）共产党的相似性不仅在于二者相类似的意识结构，还在于其类似的革命态度。二者都是被压迫者反抗世界强权的组织。“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条标语，经常与劳工运动联系在一起，殊不知，这条标语本来是圣保罗的杰作。据说耶稣说过，天国是穷人的。米兰的圣埃姆布罗斯（Saint Ambrose of Milan，340～397）曾说过

① 以上涂尔干的有关思想均出自其《社会分工论》一书。

自然创造了公有财产，暴力创造了私有财产。非西方的教会也有类似的语录。这类态度产生于这样一种事实：早期基督教（在成为国教和官方秩序的一部分之前）与早期共产党（在成为大权在握的执政党之前）都面对着革命性社会形势，都做出了类似反应。这种早期革命传统可以用来确立政治活动的合法性或用于其他战术目的。但这些不是本章要分析的对象。

（三）世俗化的宗教与魔鬼——教人的角色

教会必须有神。这是历史。在 x 主席领导下的党了解历史规律并对这些规律进行阐释，领导劳苦大众走向光明的未来天堂。

有神就要有魔鬼。魔鬼有多种伪装。撒旦、比埃尔兹巴伯、巫婆、反基督、魔鬼的部下、引诱者、异教徒、迪蒙（demons）、邪性，所有恶人都属于魔鬼王国。有意思的是，一切新事物——新工具、新发现、新艺术——也经常被说成是魔鬼的作品，创新者是高度可疑的，有时被认为是玩弄巫术而受到惩处。在国家主义社会，魔鬼被称为敌人（中世纪经院文献中也经常用敌人一词）。虽然官方总是宣传成绩巨大，但生活不尽如人意；我们永远正确的领袖的思想是光辉灿烂的，只是没有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总得有人为此承担罪责。既然领袖永远不犯错误，责任就只能由敌人来承担了。敌人一般是不确定的，它不是指具体的个人，它是一切邪恶的人格化。因此，我们在大多数时候不说这个那个敌人，而只说敌人。如果一位内政部长要强调敌人的复数意义，他会用“敌人的集团”这种说法。敌人也是以各种伪装而出现的，这些伪装甚至比魔鬼还多。魔鬼—敌人附体于所有邪恶的个人，包括左右倾分子、修正主义者、反党分子、内奸、特务和破坏分子、左右倾机会主

义者、技术贵族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走狗、反革命分子、受雇佣者、宗派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野心家和阴谋家。它也可能以连字符的形式出现，例如暗藏的富农、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无政府—自由主义者以及左倾—宗派主义者。站错队的人——托洛斯基分子、斯大林分子、赫鲁晓夫一样的修正主义者——是敌人的一个特别危险的部分（当然，在特定的时间地点，这些人不都是敌人）。以当局的公开意见和报纸报道为基础，可以编出几十种敌人的名册。普通罪犯几乎不被说成是敌人。敌人在国家主义环境中有很大的功能性价值。他的存在实际上是领导人政治专制的惟一理由。没有敌人，政治专制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如果没有敌人，也要创造出敌人。

所以，敌人有重要的动员功能和合法性功能。此外，他还有另外一种功能性价值。既然敌人没有明确的定义也不是清楚可见的——昨日英雄可以成为今天的敌人——每个人都可能因党派政治的变幻莫测而成为敌人。个人的存在状况因此变得很不安全、不确定、不稳定，难以预料，充满焦虑。在这种状况下，个人总是愿意默认、认可并追随。结果，有效控制的可能性达到了最大化。诉诸神化的权威可以服务于这一目的。

除了上帝和魔鬼，教会还要有圣典和四位福音传教士（但愿如此）。这里的“科学”在语言学上等于信仰，因为它不能被另一种科学所取代和非难。斯大林死后，他的经典作家身份被否定了，各地的福音传教士取代了他在当地的位置。教会不再是普世的，而且按照中世纪的 cujus regio ejus religio〈一地区的居民应接受当地统治者的宗教〉原则，地方宗教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治权，有时甚至是完全的自治权。圣经的存在使得解

决有争议的问题变得相对容易。哥白尼是错的，因为圣经上说太阳绕着地球转。只需要找一段适当的语录就足够了。经验证据是不相干的，因为它不能否定经典的论述。

教会有特别的教士学校：学习班。党的积极分子和未来官员在特别党校受教育。神学注释被代之以意识形态的注释。神学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区别是，如久罗·．苏森季奇〈Djurošušnjić〉所说的那样，神学谈天堂，而意识形态谈未来。[①] 纯粹的信仰由基督教世界联合会定期决定和定义，党的总路线则由党的大会定期决定，二者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四) 党性论

在我们这里的用法上，宗教信仰的基本点是只有一个上帝，只有一种真理。既然宗教是关于善恶的，教徒基本上是不宽容的。如果犹太教和基督教被同等程度地尊重，基督就不会被钉上十字架了。背离正统在神学语言中被称作异端，在党的术语中则被称为修正主义。两者都是不被容忍的，修正主义者要被清洗。有时，连说法都是一样的。例如，同一派别内部的反对者都被称为叛徒。“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就马上会成为叛徒、机会主义者和受雇佣者”，意大利作家和党的活动家伊格纳佐·西隆〈Lgnazio Silone〉写道，“有好信仰的敌人是不可想象的……”[②] 不同意见和批评是敌对行动，这就是为什么按照官方公布的，在“无阶级的”国家主义社会中，竟然有如此多的敌人。

在整个中世纪，宗教都被等同于社会和政治。经院派的奠基者，坎特伯雷大主教圣安瑟伦（Saint Anselm，1033～1109）

---

① *Ribari ljudskih duša*, Belgrade. mladost, 1976, p.176.
② A. Gide et al *The God that Failed*,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45, p.102.

声称“为理解而信仰”。他的意思也许是“信仰先于知识”。后来各代人参考他在别处的说法，用更简单、更实用的方式解释了这一思想，使之适用于于时代的需要。如果一种思想与启示的真理有矛盾，它就不是正确的；如果它是正确的，它就不会与启示的真理有矛盾。哲学——当时的科学——被认为是神学的侍女。诚然，早在15世纪初，帕多瓦的教授尼克莱图·维尔尼亚（Nicoletto Vernia）就表示，科学真理与神学真理无关。但这一思想在几百年后才被普遍接受。神学社会扭转了这一趋势，声称二者不可能分离——每一种真理都是意识形态决定的真理，科学研究必须受政治思想的指导。这就是所谓党性论。人们通常把这种理论与斯大林或斯大林主义者联系起来，实际上它历史更久，被更多的人所接受。正如托洛斯基所述：“一个人只有和党在一起并通过党才可能是正确的。”①

在较为极端的形式上，这种理论严重阻碍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如上所述，曾几何时，在苏联，相对论、孟德尔基因学说、现代社会学和控制论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颓废派的作品。那种本来是正确的说法——科学家（和普通人一样）受其社会经验和地位的限制，往往持有偏见——被颠倒过来了。奥地利共产党人恩斯特·费希尔（Ernst Fischer）说法是正确的：如果真理与一个阶级的利益一致，这个阶级就是进步的。而他的同志们则将之颠倒成：如果一种事物有利于“进步阶级”，那它就是正确的。

在绝对政治化了的生活中，所有活动都服从于政治考虑。因此，党性不仅适用于政治学本身，也适用于科学、艺术、专

① I. Deutscher, *The Prophet Unarme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139.

业技术等一切的一切。大学职位的申请人也必须信奉官方意识形态，承认党的领导地位。仅仅学识渊博、正直诚实还远远不够。科学像特伦托委员会（The Council of Trent）于1563年明确决定的那样，是神学的侍女，艺术也是如此。在现代，它们则成为了政治的侍女。因此，由党的领袖决定一种艺术是或不是社会主义的，就是很自然的事。同样，由“社会主义国家”像天主教会那样（天主教会1559年编制了禁书目录）为了其公民的利益，决定哪些书不能带回国内，哪些书必须经特别许可方准阅读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党性的一个特别的方面是不断地重写历史。只有未来是确定可知的，历史则不断地变化。这意味着古罗马的damnatio memoriae制度——成为被排除在考虑之外的人。这种制度在中世纪、在集权主义意识形态中都有对立物。

（五）对个体自我的压制

执政党组织就像修士会。由于它是一个战斗性组织，故而它特别像那种战斗性的修士会，例如16世纪的耶稣会。耶稣会是高度集权的团体，该团体的全体大会拥有最高权力。可以选举或罢免会长。修士发誓完全服从。服从的结果是接受任何分配下来的任务。执政党也是类似地组织起来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对这一原则做了明确解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① 团体成员和党员受鼓励报告其同事及他们自己有问题的行动。团体的制度和党的制度要求个人意愿和个人意见完全服从组织。它也是一种政治要求。作为宗教义务，

---

① Mao Zedong, "New phase", Report at the Central Committee Session in 1938, *Speeches and Articles*, Serbocroatian edn: Belgrade: Trideset dana, 1949, p.84.

这是无可厚非的。苏联政治局委员拉扎尔·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pvich）曾在某个场合说，一个布尔什维克必须“时刻准备着为党牺牲。不仅要准备牺牲生命，也要准备牺牲他的自尊、他的情感。”① 墨索里尼的一句话非常好地概括了这一切：信仰、服从、战斗！

个人的自我否定与党性密切相关。二者是一致的，有共同的根源，而且意味着普通道德的毁灭。在社会主义文献中，这两种文献最早都是由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和涅恰耶夫（Nechaev）明确阐述的。他们的《革命手册》——书名显然不是随意定的——第一段就说：

> 革命者没有自己的利益，没有自己的事业，没有情感，没有习惯，没有个人财物；他甚至没有名字。他的一切都献给一个简单的、彻底的利益、一个单一的思想、一种纯粹的激情——革命。

在第四段，作者又说一个革命者

> 蔑视舆论；他蔑视并仇恨现有社会伦理的一切要求和说法。对他来说，所有能实现革命胜利的一切都是道德的，所有阻碍革命胜利的都是不道德的。②

这种不可思议的自我否定产生了严重后果。如果一个人完

---

① 转引自 V. Kravchenko, *I Chose Freedom*, London: Robert Hale, 1947, p.275.
② 转引自 F. Venturi, *Roots of Revolution*,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0, pp.365－66.

全消解于他所属的政党之中，如果他完全放弃了个人的精神自由，那么他对自己的行动完全不付个人责任。一切都是可能的。捷克斯洛伐克诺弗特尼政府〈the Novotny government〉的安全部长巴西列克〈Bacílek〉对这种情况做了透彻的解释：

> 我支持了党的决策是最高法律的观点。在 1952 年土地会议上，我说过党决定谁对谁错。我只是陈述事实。我不能负任何责任……无论怎样，我只是服从党而已。①

信不信由你，但你对上帝不能枉加批评。既然教会解释上帝的意志，你也不能既反对教会又加入教会。反对永远正确的党不是政治行为而是道德行为；是犯了道德错误，是对神圣的亵渎。1926 年，季诺维也夫〈Zinoviev〉、卡门诺夫〈Kamenev〉、托洛斯基、皮亚塔科夫〈Piatakov〉、索科尼克夫〈Sokolnikov〉以及耶弗道基莫夫〈Evdokimov〉在《真理报》上发表声明，承认错误，表示忏悔。从那时候起，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古巴诗人赫伯特·迪帕拉〈Herberto Padilla〉的被捕和公开认错，对个人信仰的公开忏悔一直是家常便饭。天主教会在许多世纪以前创造了同样的程序。不仅耶稣会安排公开谴责，参加者在长老和上级面前一个一个地接受批评，而且教会还坚持让当时的一些名人公开忏悔。伽利略的个案也许是最著名的。教廷裁判所指控他赞成哥白尼理论，没能做一个好的天主教徒，还进行欺骗。伽利略愿意“放弃、诅咒并仇恨”自己

① Danko Grlić "Marginalije uz Cehoslovacku i nove tendencije u socijalizmu" Praxis, 1969, p.316.

的错误和异端邪说，但他请求裁判者不要强迫他承认自己是一个不好的天主教徒或伪善者。在20世纪30年代的莫斯科审判中，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了。所不同的是伽利略被饶恕了，而布哈林和他的同事则被处决了。在通常情况下，天主教和党的裁判对象，无论是被饶恕，还是被处决，都愿意承认除了对他所属教宗的不忠不信之外的全部错误或罪行。无论受什么惩处，承认不忠不信就等于在道德上和心理上被彻底毁灭了。

按上述原则组织起来的国家可能看上去像一个神权国家。16世纪加尔文的日内瓦可以看成是这种国家的雏形。在其1536年的《基督教原理》一书中，加尔文声称人类行为的指南是圣经而不是理性。国家官员和候选人都是按照教会的要求选择出来的。“相应地”，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评论说，“教会监督着世俗官员的忠诚和可接受性……对教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提异议被看成是阴谋诡计”。如果将这里的“教会”换成“党”，这一描述就完全适用现代国家主义国家。1925年，斯大林清楚地指出，党是“国家的最高统治力量”。摩尔得出结论说：“像布尔什维克一样，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对错误及其后果极为恐惧，他们认为必须防微杜渐。”①

（六）功能方面的考虑

也许有人会说，在特定环境下，从特定角度看，神学社会主义在功能上比科学社会主义更为便利。如果像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所论述的那样，所有知识都是存在性地决定的〈determined existentially〉，那么在一个极度多样化的社会中，社会内部的各团体间不可能存在有意义的交流，不可能达成共

① B. Moore, Jr.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5, p.73.

识。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和一个有教养的市民之间通常是难以交流的；前者是臣民，后者是公民。如果再加上阶级利益，就会出现不可调和的阶级冲突。通过一系列的、暴力性的阶级战争，社会可以逐渐同向化，阶级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共识可以出现。这是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但对有序的社会生活至为重要的共识也可以通过信仰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人不需要理解，只需要相信。中世纪社会就是这样运行的。国家主义社会的统治集团也就是这样利用继承的宗教意识结构，以对具有人格感召力的领袖和制度的信仰为基础建立共识的。当代国家主义国家的政治稳定和高速经济发展从经验上证实了这种策略的生命力和效率。

一旦共识转移到了超理性领域，所有的逻辑困难就都消失了。换句话说，任何矛盾都可以容忍。在逻辑上，基督教对每个人的爱——爱人如己——与兽行、剥削和战争是不相容的。基督徒蓄奴者、基督徒封建领主和战争指挥官都是一种 contradictio in adjecto（术语的矛盾）。然而，这些矛盾还相当普遍。而且，这些高贵的人一旦去世，还会被正式葬在基督教堂里。同样，社会主义的平等观与权力等级制、个人自由的缺失和权力政治也是不相容的。权威性的人民政府、没有异议的民主、科学的意识形态以及其他类似的制度和观念当然在逻辑上都是不可能的，但它们却非常现实地存在着。宗教和理性有不同的工作方式。

“科学的意识形态”不仅成功地调和了逻辑矛盾，而且还大大扩充了世界的知识（幻觉）。莱斯泽克·科拉克斯基（Leszek Kolakowski）在描述波兰的情况时曾说过：

> 1950年的马克思主义者知道李森科的遗传学是正确的，黑格尔哲学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贵族式反应，陀斯妥耶夫斯基只是一个颓废派等等……．化学中的共振〈resonance〉理论是反动的胡说。每个1950年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这些，即使他从来都没有学过什么是染色体，从来不了解黑格尔生活的年代，从来没有读过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任何一本书，从来没有上过中学化学课。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由党决定的。①

不受矛盾困扰、拥有绝对知识的人有一种绝对安全的感觉，这种感觉使他拥有比他的同胞更高的地位。比起那些摇摆不定、困惑不安、愚昧无知的人，他是高高在上的。这有助于解释“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成功和流行。

中世纪的人是教会和社团成员；他不是一个个人。如果他是农奴，他就更微不足道了。中世纪的建筑师和艺术家创造了重要的艺术作品却没有留下名字。社会是完全独裁的。家庭中的父亲、世俗生活中的封建领主和国王、宗教生活中的教皇或其他高级教士以及天堂的上帝一起掌管着世界。个人不仅不重要，而且，按照假定，他还是有罪的。法律的规定是，被告在被证明无罪前是有罪的（法国资产阶级修正了这一规定，但同样的规定却仍然适用于维辛斯基和索尔仁尼琴的俄国）。直到16世纪晚期，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仍然相信只有愤世嫉俗者

① “Aktueller and nichtaktuellter Begriff des Marxismus”, in W. Oelmüller, ed, *Weiterentwicklungen des Marxismus*,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engesellschaft, 1977, p. 15.

和颠覆分子才喜欢民主共和国。直至18世纪，几乎还没有作者相信法国那么大的国家作为共和国能维持下去，而且他们的怀疑似乎还很有道理。同样，今天，劳苦大众也被认为没有能力在政治上自治自决。

除了少数例外，共和制和政治民主是19世纪的成绩，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使之成为可能。革命完全动摇了旧社会。自由和平等——至少在市场上——使个人个性和责任的发展成为可能。市场缓慢而全面地侵蚀了旧制度和旧意识。为了运行良好，市场需要严格的法制。为了成功，企业家必须理性地行动，计算收益和成本，使净收益最大化。除了做守夜人和对外保护国家商业利益集团外，国家的干预既不可取也不必要。于是，政治权力机关的活动范围被大大缩小了。宗教权力机关的活动范围也是如此。教会与国家分离，成为私人领域。货币没有宗教信仰。教育、艺术和科学世俗化了。新的统治阶级为了繁荣需要实证知识。旧的权力机关被毁灭了，各种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进行斗争，这些斗争造就了政治民主——这种民主当然是有限的和有阶级偏见的，但它与中世纪的政治体制有根本性的不同。在两个世纪前，这种新体制是无从想象的。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受阻，当代国家主义社会未能经历资产阶级发展的理性化过程。在最古老的国家主义国家俄国，农奴制被废除只是100年前的事，沙皇专制则在60年前才被革命推翻（在斯堪的纳维亚，农奴制几乎不存在，在英格兰和瑞士的一些州，农奴制在500年前就已被废除了。但在德国和奥匈帝国，农奴制直到1848年革命时还存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三个国家都有过不令人愉快的政治经历。）除了捷

克斯洛伐克，没有哪一个国家主义国家有过长时期的政治民主经验。从前资产阶级到后资产阶级世界的跳跃产生了上述的意识类型。对党员的迫害也产生了同样的后果。在半宗教性环境中，对原来社会主义理论在国家理论方面所做的修改，不是偶然为之，应该是意料之中的。国家和党必须取代教会和国王。随着时间的流逝，现代技术、普及的教育和科学不断上升的重要性一定会对意识产生理性化的影响。人格感召力将被务实的态度所取代。一个官僚机构要运行，领袖的个人专断必须被代之以规则的法律形式，这也将产生类似于资本主义市场作用的理性化影响。个人富裕程度的不断提高将有助于个人实现自尊、自信和自我解放的发展。毕竟，国家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继承者，也不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体系。它只是为了完成与资本主义相同的任务——使生产力和社会意识的发展达到社会主义产生的要求的程度——而出现的另一种社会组织模式。

第三节　一种新的社会体制

（一）内部爆发的反革命

支持着我在第一节所描述的错误的二律背反的推理和态度有两个共同的特征。一是社会主义被定义为是对资本主义的简单否定。社会主义只与资本主义有关系。如此这般，它必然会停留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视域中。第二是目标被手段置换了。社会主义不再首先是一个人能够全面发展其官能、压迫被社会责任所代替、每个人的自由成为一切人自由前提的无阶级社会了。相反，它成了国家所有的、中央计划经济和一党专政政

体。尽管如此，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是被所有的人——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表一所描述的趋势被用做了这种方法的正确性的经验证据。通过资本积累和对生产者的剥夺，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铺平了道路。胜利后的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只是剥夺生存下来的4%的雇主——在纯粹主义者的眼中，还有6%的独立生产者——将社会改造成一个中央计划的大企业就万事大吉了。所有人都成为工人、无产者，阶级斗争消失了，社会就成了社会主义的。

虽然几乎所有人都将这样一种体制称为社会主义，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种社会主义是令人满意的或如愿以偿的。在这种体制尚未建立以前，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就对这种体制做过批评。早在1891年，在评论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时，恩格斯补充说，扩大国有财产意味着经济剥削权力和政治压迫权力的结合。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倾向个人人道主义的社会科学家从一开始就可以预见到该体制的发展后果。俄国革命者也清楚对他们的策略及其固有危险的批评。党的最大的理论家尼古拉·布哈林在1921年出版的、被用做党的教材的一本书中，评论了R·. 迈克尔的观点。迈克尔认为社会主义的行政管理者拥有与资本主义的财富所有者同样的权力。布哈林指出，这种观点是建立在错误的假定基础上的，假定人民大众永远是群氓。随着教育和文化的普及，“在未来的社会里，将有大量过剩的组织者，因此领导集团的稳定性也就不会有了。”然而，接下来布哈林就改变了他的乐观态度：

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问题就要困难得多了。（工人阶级是在它绝

> 不是——并且也不可能是——单一成份时取得胜利的。它是在生产力衰退和广大群众物质生活没有保障的条件下取得胜利的。）因此，“蜕化”的倾向，即分化出一个作为阶级的萌芽的领导阶层的倾向，是必然存在的。另一方面，这个倾向将被两种相反的倾向所抵消：第一，生产力的发展；第二，教育垄断的消灭。从整个工人阶级中扩大再生产出技术人员和组织者，将动摇可能发生的新的阶级分化的根基。至于斗争的最后结局，取决于何种倾向更为强大。①

在半个世纪的历史经验之后，我们知道分层的倾向是极为强烈的。既然等级制度被采用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这种结果并不令人惊奇。此外，如果我们对前述内容细加思考，我们一定会得出结论说，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却并未超越资本主义的局限。它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反面创造出来的。它是反转的资本主义。它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国家主义。

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我们已经亲眼目睹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戏剧。一个大社会为了摆脱落后和苦难，砸碎历史、传统和既得利益集团锻造的锁链，解放自己并解放全人类，目标坚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承受了重大牺牲。这样一种革命不可能通过分步到位的改革进行，也不可能以对资源和任务的从容不迫的分析为基础。它不能半途而废，它只能拥抱时代所产生的最高贵、最先进、最有尊严的意识形态——社会

---

① N. Bukhar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 system of Sociolog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9, pp.310 - 11.

主义意识形态。它在实现社会主义以前不能止步。全世界成百万被压迫、被剥削和被羞辱的人类的希望都寄托于十月革命的成功——即使它不能成功！其他革命将接踵而至。让希望活着，这是顶顶重要的事。有朝一日我们将拥有社会主义——一个博爱、无阶级、剥削和压迫都永远消灭了的社会。不论付出多大的牺牲，我们都要实现这个目标。并且，它一定会实现，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灭亡之后，社会主义是人类的惟一选择。这就是国家主义的人性意义，包括着希望、牺牲和失望的意义。

然而，历史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它的判决是简单而残酷的。在我看来，这一判决包括了三方面的教训。首先，在人类事务中不存在简单的决定论。除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还有其他可能。在俄国的情形下，物质落后规定了一种心理，它像前面谈到的那样，“不仅未能超越私有财产甚至还未达到私有财产”。因此，积累，包括生产工具的社会积累和消费品的个人积累，成了新社会的首要目标，它取代了其他各种目标。由于持续存在的来自敌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威胁，一个只有沙皇专制政治经验的社会的权威主义倾向被大大强化了，政治专制是最可能出现的后果。积累加权威主义等于全能政府。因此，国家主义选择成了历史事实。

第二个教训是一个在表面上是矛盾的现象：一场成功的革命可能会失败。以往人们都假定革命后的真正危险是可能出现的反革命。反革命是复辟。因此，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巩固和加强权力地位上。这又意味着国家机构及其各种权力机制（如官僚主义和秘密警察）的过度发展。斯大林主义体制的经验表明保持权力并不就是保证了社会主义的成功。实际上，绝对权力成了像成功的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一样的反革命。它是反

革命，但却不一定是复辟。

最后，第三个教训也提供了一种对误置的决定论的反驳。无疑，社会主义比其他选择更能迎合工人阶级的客观（有时被说成是历史的）需要，这是事实。然而，我们并不能从这一事实推论说工人阶级必然是社会主义的继承者。当代苏联工人支持苏联体制，拒绝美国体制；美国工人则支持美国体制，反对苏联体制。对此，很少有人会公开表示怀疑。苏联是国家主义，美国则是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权威主义可以建立在任何社会阶级的基础上。传统的权威主义建立在上层阶级（上一世纪的欧洲贵族、拉丁美洲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基础上。中产阶级在许多国家支持了法西斯主义。工人阶级对斯大林主义和庇隆主义〈Peronism〉的支持也遍布许多国家。庇隆主义是反资本主义的民粹派和常常与军队联盟的民族主义运动。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讨论这一问题。(见第十四章第二节)

一种国家在其中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体制可以被恰当地描述为国家主义，对此人们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异议。然而，为什么国家主义应该被看成是一种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相分离的独立的社会经济体制？这个问题就不那么好回答了。在这方面，有两种倾向：或是把国家主义等同为资本主义，或是把国家主义等同为社会主义。

一旦新社会体制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社会主义者就自然不再把它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在继承下来的决定论框架内，只有两种体制是已知的：一个社会不是社会主义的就只能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国家的至高无上地位，这种体制就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世界各地的许多激进派人士（包括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都持这种观点。社会主义革命只是在表面上成功了。实

际上，斯大林和他的同党攫取了权力，进行了一场血腥的反革命，因此，该体制蜕化成了国家资本主义。该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国家拥有全部资本、雇佣工人，用与私人资本同样的方式榨取剩余价值。

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它无根据的假定：一个国家主导的社会必然是国家资本主义。找出并非如此的历史个案是十分容易的。例如，在古埃及，国家拥有生产工具，当时的生产工具主要是土地和灌溉设施，也包括工匠、店铺，但埃及显然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国家主义的经济特征（中央行政计划）、社会特征（不存在私有财富、不同的社会分层）和政治特征（共产党的特征）使之与资本主义有根本性的不同。后面我们将有机会通过比较分析证明这一结论。除此以外，资本主义——私人的或国家的——意味着资本家的存在。在国家主义社会中找出资本家是不那么容易的。

第二种观点——把国家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一个阶段，即国家主义阶段——流行更广。社会主义的试金石是不存在社会阶级、不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不存在发布命令者和执行命令者。我们在后面会看到国家主义不能通过这一检验，所以它的第一种变体就很容易被否定了。第二种变体更为复杂。它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一夜间变成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或是从一场议会斗争的胜利开始，或是从一场胜利的革命开始。在过渡时期，国家将全部生产工具收归国有，实行必要的制度变革。这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说法似乎言之成理，但它要面对下列的反对意见：（1）国家所有制不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阶段；（2）对经济权力和政

治权力的国家垄断不是过渡的前提；（3）如果国家社会主义是一个过渡时期，它应该十分短暂，并且应该表现出十分清楚的趋势——国家的作用将适当减少，典型的社会主义制度会发展起来。在当代国家主义社会中，情况不是如此。本来应该是过渡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时期，成了一种牢不可破、没有根本性结构变化倾向的体制。

在此，我们可以注意到，尽管马克思从未设想一种与资本主义并存的独立的社会形态——我所谓的国家主义，但他却提出了准确无误地辨识这样一种形态的标准。其基本指标是对生产者剩余劳动的控制。"使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些剩余劳动的形式。"① 在任何一种等级式地组织起来的社会，统治精英都处于榨取和控制剩余劳动的地位。以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和以国家主义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之间的基本区别是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不同：在前一种社会，这一方式是由私有财产决定的；而在后一种社会，决定了这一方式的是国家财产。国家不仅保证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且首先保证了支配和等级关系的再生产。这样一种吞并了整个社会并自我复制的国家，像亨利·列菲弗尔指出的那样，决定了国家主义的生产方式。

（二）后果

国家主义既有社会主义的特征也有反社会主义的特征。二者的奇特组合产生了奇特的结果。让我们从那些属于社会主义的成份开始。国家社会主义无疑大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30

① K. Marx, *Capital*, vol. 1.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 p.217.

年代初,全部资本主义世界正经受着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苏联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获得了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在持续高增长半个世纪后,一个曾经是落后、半封建的经济被改造成了生产能力居世界第二位的现代经济。卫星的发射是这种改造完成的标志。其他国家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同样出色。

经济发展可能导致收入分配的日益不平等,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但它也可以用来改善以前下层阶级的地位。国家主义社会中出现的是后一种情况。我近期从事的一项关于各国普通人基本福利的研究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证据。基本福利是三种基本产品的可获得性:生命(用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来衡量)、教育(用人口总数中的大学生人数来衡量)和健康(用医疗服务,即医生和病床的相对数来表示)。为了消除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我将60个是发达国家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序,再将这种顺序与社会指标顺序进行比较。如果后者高于前者,那么所观察的社会就比其他社会为普通人提供了更多的基本品。每个指标的最好结果列为一等,最差的列为60等。国家被划分为一组:国家主义国家、福利国家(工党长期执政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结果如表三。

表三 国家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福利

	GNP 1970 (1)	预期寿命 (2)	教育 (3)	健康服务 (4)	基本福利 (5)	差异 (1) - (5)
国家主义国家 a	26.6	24.4	25.7	16.3	22.1	4.5
福利国家 b	11.3	11.9	15.5	13.6	13.7	-2.4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c	7.0	10.3	13.4	18.3	14.0	-7.0

来源：B . Horvat, "Welfare of the Common Man in Various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June 1947, pp.29 – 39.

a. 包括：德国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古巴。

b. 包括：瑞典、挪威、新西兰、英国、芬兰、以色列、奥地利。

c. 包括：美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联邦德国、比利时、荷兰。

这一比较证明在国家主义社会中，广大群众比在同一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其他社会安排中寿命更长，接受了更多教育，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国家主义社会的基本福利（平均为22.1）比其人均收入（平均为26.6）要高。其他两组国家则相反。如果我们比较福利差异，那么平均说来，国家主义社会在基本福利方面比福利国家领先6.9（4.5+2.4），比更传统资本主义社会领先11.5。这些差异多少有些夸张，因为国家主义集团比其他两组国家更不发达，我们的衡量办法多少有些偏向于不发达国家。但它们足以证明真实差异。可以得出结论说，在国家主义国家，对人民大众福利的关切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如果我们考虑比较收入分配，这一结论会更加确定。可以得到的数据仍很粗糙，并非严格可比，但它们的确可以表示出差异程度的次序。我们可以将不平等的吉尼系数（洛伦兹曲线以上的面积与全部三角形面积的比例；该系数数值在0与1之间，数值越大，不平等程度越高）作为收入不平等的平均尺度，把最高收入的5%的家庭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作为收入组距。结果可见表四。在两种指标下，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相

比再次显示出重大区别。在后一组，〈原文如此，疑有误〉劳动制度显然成功地改善了收入分配，缩小了最高收入水平和其余收入水平的差距。

表四 收入的规模分配

	吉尼系数		5%最高收入家庭的百分比份额	
	范围	中位数	范围	中位数
国家主义国家[a]	0.19－0.26	0.21	9.2－12.2	10.9
福利国家[b]	0.33－0.47	0.36	13.2－20.9	15.1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c]	0.32－0.52	0.40	13.7－24.7	13.4

来源：S. Jain, Size Distribution of Income（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1975）

a. 包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

b. 包括：瑞典、丹麦、挪威、新西兰、英国、芬兰、以色列。

c. 包括：美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联邦德国、荷兰。

为了实现完全平均的收入分配，必须进行再分配，将国家主义国家总收入的16%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总收入的30%——两倍于国家主义国家——给予人口中较贫困的阶层。注意下面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财产收入只使吉尼系数提高了0.03到0.06，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主要源于挣得收入〈earned incomes〉的不平等。因此，一般说来，国家主义社会更平均。

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遗产。我们在关于国家主义分层那一节中讨论其他证据。

国家主义生活的政治方面有很大不同。苏联科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告诉我们，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有1000万到1500万的人被秘密警察逮捕或送往劳改营。[1] 在十月革命后的30年代，苏联的犯罪人数比美国（作为一个例子）高出20倍。在1940年占领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国家后，数以万计的波兰人、立陶宛人、拉托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主要是知识分子——被放逐或杀害。成族的人（克里木鞑靼、伏尔加德意志人、Meskhetians、Kalmyks和其他民族）被放逐。数以百万计的人被处决或死去。至今仍难以理解，这种魔鬼般的罪恶行径怎么能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做出来。俄国作家阿列克桑德拉·索尔仁尼琴（在其小说大事记中）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卡罗·斯塔季纳〈Karlo Stajner〉（在其回忆录中）——二人都曾被监禁多年——都描述了被降为奴隶的罪犯的无意义的苦难，丧失起码人性的迫害者的无意义的兽性和古拉格的地狱般的景象。古拉格是一个巨型的镇压工具，如果它不是活生生的事实，描述它将需要但丁的想象力。

所有这些都被简单地用阶级斗争日益激烈的"理论"来解释。但为什么——在过去的统治阶级成员已经在革命时期离开了国家以后——全部人口的10%如此激烈地反对社会主义，甚至不惜被从肉体上消灭或毁灭，这一点已经难以解释。而当那些进行这场革命的人也被宣布为阶级敌人之后，这种理论就彻底破产了。萨哈罗夫指出，仅在1936－1939年间，就有超

① A. Sakharov, *Wie ich mir die Zukunft vorstelle*, Zurich: Diogenes, 1973.

过120万共产党员——全部党员的半数——被捕。[1] 只有5万人后来又放了出来；60万人被枪决。第十七届党代会的1962位代表中有1108位被杀害，中央委员会的139位委员和候补委员也被杀害。[2] 苏联最高政治实体是中央政治局，创建于1917年的十月革命，列宁为主席。到1951年，有27位领导人任政治局委员。时不时地，总有几位被指控为进行反革命、谋杀、恐怖主义、叛国、间谍、分裂等活动或企图破坏国家军事力量。这27人中，6位死掉了，12位被处决或谋杀，1位在被捕前自杀。[3] 根据赫鲁晓夫在党的二十大上的报告，斯大林显然打算消灭剩下8人中的2人。既然几乎半数党的最高领导人被处决，大约半数共产党员被逮捕，人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说，半数的革命先锋都是阶级敌人。这当然是个奇怪的结论。更常识性的解释是所有这一切都与社会主义无关，但却与不受任何道德规范约束，对绝对权力的无耻争夺关系很大。更准确地说，是在极权主义条件下对绝对权力的争夺。极权主义起源于宗教性的意识结构与现代技术效率的结合。

斯大林的恐怖不仅针对积极的反对者，针对潜在的敌人，还以一种预防性的方式针对普通大众。所有独立的人，所有那些通过革命活动获得职位的人都是潜在的危险，都必须被消灭。

这些内部的发展不会不反映在对外关系上。共产党和工人情报局〈the Cominform〉对南斯拉夫的抨击与美国对古巴的抨

---

① ibid, p.46.

③ A. Inkeles, *Social Change in Soviet Russ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58.

③ G. K. Schüller, "The Politburo", in H. Lasswell and D. Lerner, eds., *World Revolutionary Elit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5, pp.97-115.

击非常一致。几年之后，接踵而至的对匈牙利的武装干涉导致了匈牙利工人委员会的毁灭。1968年，华约军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扼杀了该国的社会主义萌芽。10年后，本来是一次恐怖战争受害者的越南攻击了它较小的邻国——柬埔寨。苏联与中国间的政治对峙，有时是军事对峙，成了永久性的事务。1965年捷克斯洛伐克学生詹·．帕拉奇〈Jan Palach〉在布拉格自焚身亡，抗议“社会主义”军队对其祖国自由的蹂躏。4年后，立陶宛学生罗马斯·卡兰塔〈Romas Kalanta〉高呼着“自由属于立陶宛”在考纳斯〈Kaunas〉的一个广场自焚。

警察镇压必定紧接着社会的道德沦丧。普遍的不信任、互相刺探、缺乏对个人尊严的看重以及告密，作为全国性的制度深入人心，成了这种社会的特色。政治警察成了至高无上的道德权威。各个国家、各个时代的哲学家都倾向于培育批判性思维和社会问题的人道主义方法。国家主义不是如此。

在斯塔季纳和索尔仁尼琴之后，关于清洗和古拉格，似乎已没有新东西可说了。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下面的故事将证明这一点。我碰巧对这一故事有第一手的信息。在战争中，匈牙利的著名哲学家吉奥尔吉·卢卡奇〈Gyorgy Lukócs〉生活在莫斯科。他的继子，一位工程师，也迁移到了莫斯科。不幸的是，年轻人讲德语，这本身就是被关进集中营的最佳理由。卢卡奇利用了他在高级官员中的所有关系，试图营救他的继子，但一切都无功而返。1945年，官方为卢卡奇安排了某种庆祝会，他借此机会向出席的最高层官员求助。那人很负责，说按通常情形，下周三他会和贝利亚〈Beria〉打桥牌。如果贝利亚赢了，他会有好情绪，那时就可以和他谈谈这事。贝利亚的牌不错，卢卡奇继子的事提了出来，内务部长抓起了话筒——匈

牙利工程师被释放了！这件事令人想起尼禄皇帝的罗马。

对政治民主的嘲弄、对权力的吹捧和对国家所有制、传道的激情一起自然而然地造就了一个集权主义国家。“后者”，著名的波兰哲学家和共产党前党员莱斯泽克·科拉克斯基写道，“包括了一种不变的倾向——摧毁一切现存社会纽带和社会的全部自发结晶体，并代之以国家强加的组织。在完全的极权主义社会中，除了国家所计划或特许的活动以外，任何形式的人类活动，不论是经济的、思想的还是政治的，都是不允许的。个人被认为是国家的国有财产。”① 极权主义国家与法西斯主义国家是类似的，但国家主义不是法西斯主义，后者属于另一种社会类型。政治上的相似性不应模糊极本性的系统差别。古代政治民主和现代政治民主在许多方面都很相像，但各自的社会体制却有明显的不同。

为评价所有这些发展，我们必须选择适当的比较标准。例如，拿 30 年代的苏联与同时期的英国相比，没有太大意义。应该将苏联与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做比较。当时，英国广大群众还没有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生活在肮脏贫困中，受有权有势者的压迫。从那时起，英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俄国也在变。斯大林的暴行不大可能再出现了。其他国家主义国家——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都经历过各自的、由秘密警察实行的莫斯科审判，但这些并非正常情形（阿尔巴尼亚是个例外）。中国比起 1917 年的俄国还要落后，但它却避免了大量逮捕、处决，也没有建造古拉格。

① Kolakowski, “The Eurocommunist Schism”, *Dissent*, Winter, 1978, pp.33－37, 引自第 3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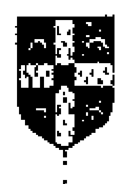
因此，在未来，我们可以预计，政治强制会放松，更合乎人性的关系将会发展起来。虽然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以及国家对经济和其他活动的集中控制总是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但这未必就会造成政治压迫。例如，在瑞典，国家控制和干预比美国和其他国家更广泛，但一项均衡各国政治民主程度的努力将瑞典放在了无可置疑的第一位；在所研究的10个国家中，美国名列第八。①

我的结论是，不幸的历史环境——极端的落后、军事干预、不间断的危险和在国际上的孤立，领袖的变态个性，缺乏政治民主主义的传统或经验；没有像样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以及对反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的坚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今天斯大林主义表现出的畸形特征。国家主义不一定产生斯大林主义，国家主义与更民主的政治体制是相容的。

然而，社会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是完全不相容的，正如社会主义与极权主义国家和其他政治压迫体制不相容一样。个人崇拜，斯大林主义有时被如此婉转地称呼，不是一种通过改变个性就可以修正的错误或偏离，它属于一种与社会主义有结构性不同的体制。如果无阶级性是社会主义的检验标准，那么，政治支配就像其他形式的支配一样，是必须被消灭的。

---

① R. A. Dahl, "The Evaluation of Political Systems," in I. de Sola Pool, ed.,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McGraw-Hill, 1967, p.173.



第3章

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社会分层

第一节　社会阶级

我们可以从社会权力这一概念出发开始分析，这样做是很方便的。社会权力概念是分层框架中最一般的概念。它可以使我们推导出其他分析性范畴，描述观察到的关系。我所谓的**社会权力**是指通过以一种重要方式影响他人生活的决策，为社会体制的运行动员必要资源的能力。重要不重要只能由有关各方来评价。对社会权力下这样一个定义，为的是既反映权力的功能性方面，也反映权力的冲突性方面。权力是**功能性的**，因为它对社会体制的运行是必须的。它本身不是一种零和博弈概念。换句话说，在社会或社会的子系统中，权力的数量不是固定的，

并非是那种某些参与者享有的份额多了，另一些就少了的情形。由制度安排决定，权力总量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也就是说，所有参与者可同时获得更多或更少的权力。没有充分大的权力，某种特定的任务可能就无法完成。权力对体制运行是必不可少的，但从这一事实并不能得出某个集团必须拥有这种权力的结论——人们经常得出这种结论。权力可以被分割、分散、非专业化〈deprofessionalized〉。最后一种可能性意味着，那种由一个小团体专业化地行使专业性权力的劳动分工不是一种突然的必要性，而是一种历史性地决定并可以改变的社会安排。

在对分层的考察中，权力显然不是惟一可选择的分析性范畴。如果我们像马克思那样，假定社会体制决定于经济力量，那么财产似乎就是分层的主要载体。如果我们像莫斯加〈Mosca〉和帕累托那样，把政治力量看成是第一位的，那便自然会去讨论统治阶级、政治权威和精英的流动。然而，权力是一个更为一般性的范畴，财产、权威或统治都是其中的特例。它们只是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因此，财产和权威假说能解释的，权力假说也能解释——而且能更好地解释，因为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它还能解释其他一些现象。

上述考虑也说明为什么权力是冲突的潜在源泉。社会体制可以用多种方式设计，以满足不同利益集团的需要。有较多权力的集团比那些权力较少的集团更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意义上，权力是一个关系性概念。如果两个人拥有同样数量的权力，他们在彼此的关系上就没有权力。通常情况下，可以很容易地根据语境判断出权力是指绝对权力还是指相对权力。在关于分层的分析中，权力通常是指相对于他人的"超量权力"〈excess power〉。

超量权力是单向性的，它产生等级。在一个权力不平等分配的社会中，有较多权力的集团拥有特权，能够影响权力较少的集团的生活。社会以这种方式形成阶层，上层能够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下层。如果这一意愿受自我利益的引导或由自我利益决定，像意愿的拥有者所设想的那样——这当然是一个关于分层社会中人类行为的合乎实际的假定——那么，**将己之意愿施之于人**就意味着**剥削**。剥削可以定义为“生活机会的任何一种社会性规定的不对称生产形式”。这里的“生活机会”是指“个人分享社会性地创造的经济和文化产品的机会”。[①] 被剥削集团对这种状态不满意，其成员将会努力保卫自己，甚至反攻。这被称做阶级斗争，它反映着命令者与被命令者之间、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主宰者和被主宰者之间、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以及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根本性社会冲突**。

权力可以用多种方式分类。一种显然的方法是按照使用的手段分类。一个人可以被强迫服从，或被诱惑服从。后者可以通过物质报酬、非物质的身份象征报酬或说服来实现。因此，对他人行为的控制可以用物质的强制手段、用补偿或剥夺的经济手段、用补偿或剥夺的象征性手段或规范操纵手段来达到。在第一种情况下，统治集团使用蛮横的暴力；在接下来的两种情况下，使用产生效用的资产；在最后一种情况下，使用观念。因此，权力可以是强制的、经济的、象征性的和说服的。这种排列顺序同时也是普通人感受到的权力压制顺序。这一顺序可以由监禁、货币性激励、荣誉和勋章以及洗脑来表现。

① A. Giddens,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3), p.130.

象征性权力和说服性权力的区别很少有人注意。前者由诸如勋章(特别是在军队中)、知名度(从工厂墙报到全国性媒体)、头衔(如英国的“爵士”、苏联的“英雄”)、等级(制服、办公设施或公车类型)、特别聚会(通常是空洞的庆祝)和地点(如俱乐部、体假地点)的准入以及在公共事件中的地位(如站在主席台上)等等非物质性的、产生地位的、象征性报酬的分配所构成。说服性权力则是对信息和思想的控制。既然二者都是心理上的压迫(与物质的或经济的压迫相对),二者通常被混合为说服性的、规范性的、操纵性的或道德性的权力。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某些国家从意识形态上坚持将“道德性的”激励作为最高贵并与物质激励截然不同的激励。“道德”激励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的,而物质激励则是资本主义的。然而,激励就是激励,与真正的道德情感无关。那些有能力操纵激励——物质的或道德的——的人拥有补偿性的或效用性的权力。

本项研究并非着眼于权力本身，而是着眼于社会权力。为此，采用一种多少有些不同的、与制度化的社会权力的实际形式更密切相符的分类更方便。我将区别**政治的**、**经济的**、和**操纵性**的权力。这三种权力类型之间的关系及获得顺从的手段可以概括如下：

获得顺从的手段			权力类型
I 物质性强制（强迫）		}	政治的
II 激励：(a) 产生地位的	}效用性的	}	经济的
(b) 物质的			
(c) 规范的	意识形态的		操纵性的（说服性的）

政治权力最为人所熟悉，通常所谓权力往往指政治权力。这种权力的基本特征是它以使用或威胁使用物质力量为基础。这种权力可以用作大棒——强制性权力；也可以用作胡萝卜——象征性权力。地位象征，如等级和勋章在高度强制性组织——军队——中比其他组织中得到了更集中的应用，这不是偶然的。

第二种形式的权力，**经济权力**在传统上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家的主要研究对象。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经济权力常常决定并塑造着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经济权力以对生产性财富（生产工具）的所有或控制为基础，这些生产性财富是权力关系的工具。因此，经济权力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被命令者在形式上是自由的，可以不接受命令，而且在理论上他们可以建立自己的企业。但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拥有货币、适当的关系、好的信誉和像样的教育。此外，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组织起来的：活动人口中只有1/10左右的人成为雇主或产品和服务的独立生产者。其他8/10或9/10必须接受那些控制生产过程，或更一般地说，那些控制社会劳动过程的人的命令。

操纵性权力比其它形式的权力更不起眼，也较少为人所了解。它比经济权力更为间接，是对他人心灵的控制。这种权力的最佳榜样是孟恩伊乌斯·阿格里巴〈Menencius Aagrippa〉的成就，他在公元前503年，对叛乱的平民讲了那个身体的各部分反对肚子的寓言。更一般地说，每个社会都是一个道德共同体，统治规范被同样的制裁机构和控制这些机构的人维护着。换句话说，“每个社会都荣耀那些支持着社会，即支持着统治

阶级的顺从。"[①] 因此，如马克思所说，一个社会的统治思想是其统治阶级的思想，被命令者被诱惑着相信他们的位置是天经地义的。亚里士多德和奴隶都相信奴隶制度合乎人的本性，对奴隶和奴隶主都有好处：主人需要人来做工，奴隶需要有人发布命令。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企业家理论表述了同样的思想：出类拔萃的人，被称为企业家，雇佣劳动（甚至不是工人!）和其他生产要素，组织企业，在企业中，他们为了所有相关者的利益发号施令。像亚里士多德时代一样，管理者和工人都相信这是事务的惟一自然状态。同样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也反映在这样一种理论上：发布指示，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领导无产阶级是先锋队党及其领袖的历史使命。这种社会理论在国家主义社会中被普遍接受。那些拥有操纵性权力的人能说服其他人，让他们相信做那些实际上有害于他们的事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一种专业于说服性权力的特定机构是教会。（在国家主义国家，教会在很大程度上被统治党的宣传鼓动局所取代。）我们可以套用马克思的话，说统治的教会总是统治阶级的教会。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如斯堪的纳维亚，直到今日，统治教会仍是国家教会。

操纵性或说服性权力不像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那样独立，它们更多地是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派生出来的。只有一个团体可能是独立的说服性权力的来源：知识分子。但教育是阶级社会中的一种特权，许多知识分子来自统治阶级或与统治阶级有密切关系的家庭。那些阶级出身不同的人则被统治阶级用金钱、头衔和地位等收买。聪明的统治阶级时刻准备着将这些东

---

① R. Dahrendorf, "On the Origin of Inequality among Men", in E. Lauman *et al*, eds., *The Logic of Hierarchies*, (Chicago, Markham, 1970), p. 26.

西授给有才能、有雄心的人。因此，知识分子的进步和改革潜力被极大地削弱了。然而，他们仍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变化来源。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拥有超越其阶级出身的能力，而且他们也经常这样做。潜在的利益要成为公开的，必须说出来。就像马克思用黑格尔的语言所说的那样，自在阶级需要意识才能成为自为阶级。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创造被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想一想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就足够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更高的教育，知识分子独立的说服性权力有可能加强。

权力一旦付诸实施就成了强制。三种形式的权力产生三种形式的强制。政治权力从肉体上强制他人服从权力使用者的命令。它的第二种手段是分配地位象征，诱导服从。国家，与其镇压机器一起，是为完成这两种任务而设计出来的制度。经济权力通过饥饿强制，它让一个人选择：或者服从，或者被剥夺像样的生活标准。与政治权力不同，经济权力总是隐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此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把自由市场表述为自由社会。政治权力主要用大棒，经济权力主要用胡萝卜。资产阶级用了一段时间才明白胡萝卜有时比大棒更有效。例如，在1834年之后，英国才有了不再强制穷人工作的特别法律，因为更有效的建立工作纪律（和政治纪律）的办法已经发明出来了。

操纵性权力从心理上强制。教师被雇佣来塑造年轻一代的心灵。文化的创造者获得报酬来生产与统治阶级需要和口味一致的文化。娱乐行业控制闲暇时间。媒体按不同标准获得许可、补贴等等。政党和实业界利益集团投入巨额资金为竞选活动做广告，做某种宣传，或对大众不停歇地洗脑。教会——宗

教的或世俗的——争夺人的灵魂。有人格感召力的领袖是强制性说服的一种特定形式。因此，广告、灌输、宣传、隐瞒信息或选择性地发布消息以及有人格感召力的领袖是强制人们从心灵上服从的工具。这些操纵性活动可以是分散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经济、政治和地位上的利益愿意投入资金对它们做松散的协调。他们也可以是拥有政治垄断权的统治阶级严格控制的。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表面上微弱、平和的操纵权力都有令人震惊的巨大力量。它俘获人的心灵，诱惑人们为统治阶级服务并相信这是最有利于人们自己利益的。

人们经常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个社会中真有根本性的阶级冲突，被剥削阶级人数又如此众多，为什么他们——特别是在现在资产阶级政治民主条件下——不罢免该统治者呢？对这一问题，我们现在可以直截了当地回答了：因为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处于底层的人们感到别无选择。

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导致两种重要的社会不平等：不平等的**消费**财富（和/或可支配收入）和不平等的社会名望。限定词消费表示我们在此是考虑财富的某一方面，它与财富的另一方面经常被混为一谈。财富能用来行使对他人劳动的权力（这时它是资本，属于权力的范畴），也能转换成消费对象，使所有者能够采取某种生活方式。明确区分财富的这两个方面，不仅有重要的分析性后果，而且还直接反映出现实生活中实际发生的功能性分化过程。既然财富的权力方面已经做过考虑，剩下的就是其生活方式方面了。这一方面可以很方便地用生活标准来表示。虽然生活方式比生活标准的意义更广，但生活标准决定着生活方式。有了高收人，作为高收入结果的高消费、教育

和口味、行为的形成才有可能，才可能享有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

社会名望决定于价值体系和一个人所从事工作的功能上的重要性。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一个人所拥有的经济或政治权力的数量，它也决定于血统和职业本身。英国的法官、德国的大学教授、波兰的创造性艺术家、苏联的科学家、南斯拉夫和美国的医生，从名望的角度看都是最高或接近于最高的，虽然他们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很小，收入也有高有低。一般说来，名望是教育和知识的增函数。好坏名望的一个独立来源是一个人所出生家庭的社会地位。尽管在正常情况下，名望是权力和收入的结果，但它也是权力和收入的价值前提。“如果荣誉的分布与物质利益的分布不相一致，不平等的体制将会失去其规范性的支持……名望顺序通过控制维护现有经济特权的社会正义观念起着稳定不平等并为不平等提供合法性的作用。”[1] 如果一个社会团体开始失去社会名望——例如，因为它未能完成重要的社会功能——它将很快失去权力和财富。

在一个社会中，权力、收入和名望的不平等往往是高度相关的。可欲价值〈desirable values〉的累积性分配产生了各团体利益的客观上的不相容性和主观上的冲突意识。这就是为什么在权力、生活标准和社会名望方面拥有类似地位的某个团体的人群构成一个**社会阶级**。在适当的范围内，这三个因素是可以彼此替代的。各种权力形式就更是如此了，不同权力形式之间可以更容易互相转换。这一点对于其他因素来说也是正确的。三种因素的一致程度反映在一个人享有的社会地位上。构成统

---

① F. Parkin, *Class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Order*, New York: Praeger, 1971, p. 44.

治阶级核心的人的特征是他们在所有这些因素上都具有高价值，因此有高社会地位。各因素之间差异过大，会使一个人失去社会地位。如果人们在三种最可欲的社会产品方面地位相近，就比较容易产生共鸣，产生一种阶级意识。由上述三个因素赋予特征的社会阶级，是由社会劳动组织中较大的个人团体的作用决定的。社会劳动组织既包括经济活动也包括政治活动。在微观组织——企业、政府机构中，社会阶级是按权威系统区分的。在这些组织以外，社会阶级常常由居住地点、朋友圈子、文化环境和婚姻区分开来。

阶级概念除了这种一般定义外，还有另一种特别的意义。在后一种意义上，阶级——作为一个开放性团体——与种姓截然不同，后者是一个封闭性团体，其成员身份来自刻板的世袭。阶级与等级也是不同的。等级是一个由法律规定的、拥有独特权利和责任的团体。阶级概念还有第三个、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加批判的用法，这种用法将阶级与私有生产财产的存在联系在一起，与资本主义社会联系在一起。因此，在一般性意义上，阶级是指分层社会中较大的社会团体，不论这种社会是什么性质。在其特定意义上，阶级用来表示特定社会（与财富所有制或开放性相联系）中的特定团体。如果这一含义是特指的，我们必须使用另外的术语来描述国家主义的社会分层。从理论上说，它还是使人迷误的。种姓、等级和阶级属于相继性的社会组织。而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则与此相反，是同时性的。并且，这三个概念间的特征性区别（differentia specifics）是不同的开放程度，而不是财富或别的因素。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分层都是以成绩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出身为基础的，因此两种社会都是开放的。所以，阶级概念也应当用在国家主义

的背景中。

既然一个社会阶级在法律上是开放的团体，出身于某个特定阶级的人不一定要保留在其中。一个社会越开放，纵向社会流动，即超越阶级界限的流动的程度越高。向上社会流动的重要工具是积累财富、取得政治地位和受教育。不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它们都是对各种社会权力形式的占用。

第二节 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层

为了理解一个特定社会的社会分层过程，我们最好分析与其基本生产单位有关的社会境况。“如果有目的生产活动是人类存在的基础，”米洛斯拉夫·培奇乌伊里奇〈Miroslav Pěcuj－lić〉说道，“那么，对劳动条件的权力就基本上决定了生产过程中的地位。”① 对劳动条件的权力意味着等级式地组织的生产过程和对人的存在具有重要意义的劳动分工。

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单位是企业。企业是一种典型的具有等级结构的组织；所有者及其代表位于等级金字塔的顶端，职员位于中层，操作者位于等级金字塔的底层。既然所有企业都是如此组织起来的，处于不同金字塔的同层次的人自然有交往、联系、发展和保卫共同利益的倾向。基本生产单位内的分层已把这种方式放大到了整个社会（见图1）。

① M. Pěcujlic, “Teorijski okvir za proucavanje klasnih promjena u socijalizmu” *Sociologija*, 1966, pp. 5—26, 引自第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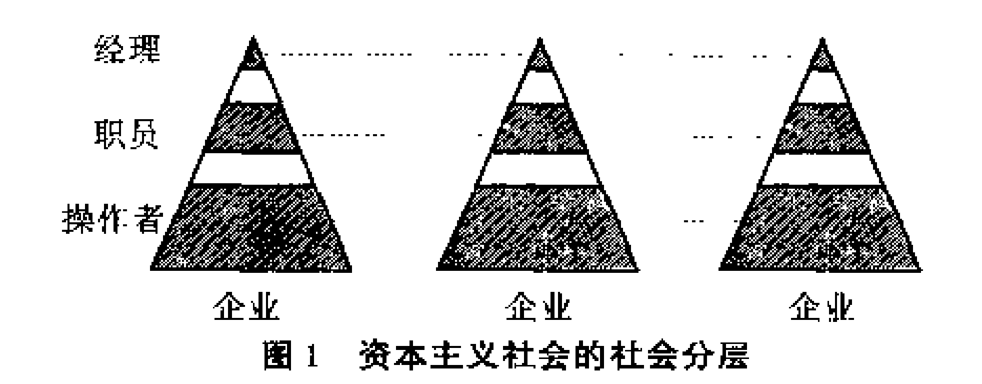


图1 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分层

这种分层产生了三种为人们所熟知的阶级：统治阶级、中间阶级和工人阶级。我们从其中定义最含糊的中间阶级开始分析。

老的、早期的中间阶级由工匠、小商贩和富农组成。他们的共同特征是生产性财产的某种所有制。马克思和社会主义者预计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竞争将在很大程度上消灭这些团体，社会将两极分化为少数的资本家阶级和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后者占人口的大多数。古老的中间阶级的确衰落了，但社会并没有两极分化，一个新的中间阶级诞生了，而且大大地扩张了。新的中产阶级是功能分化的结果。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管理功能又分解为命令发布和基本政策制定、专业活动、控制和监督。为此，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根据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卡尔·雷纳（Karl Renner）的说法，将中间阶级称为**服务阶级**，这是有道理的。服务阶级包括两个阶层。上层是专业人员；下层是白领职员和行政管理雇员。专业人员与高层管理者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显而易见。但职员只是接受上级命令，从事或多或少是例行公务的工作，与工人又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应该与专业人员放在一组？我们对此需要做特别的解释。像以往一样，这里的解释也是从历史着手。

从历史上看，最基本的社会鸿沟出现在体力劳力和非体力劳动之间。古希腊的自由人、中国的大人〈mandarin〉、近代的英格兰绅士、西班牙贵族或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统治阶级成员从来都是不会让体力劳动弄脏双手的。例如，在希腊，学校〈school〉一词的意思是“闲暇”，教育显然是面向有闲阶级的。物质生产劳动是奴隶的事，因为它使头脑粗鄙，使人德性有亏。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劳动是苦难，是对罪的惩罚。直至历史上很近的时期知道如何读写的人仍然很少。就是在目前，世界多数人口还是不识字的。因此，写作知识和书本的使用表现着特定的社会地位。既然职员工作需要识字——手是干净的——他们因而拥有较高的社会名望。

职员工作不仅是管理（治理）功能分解的结果，而且领薪雇员也与雇主保持着密切关系，这使他们具有权威性地位。一般说来，职员工作有被授权的特征。结果，领薪雇员的就业情况与工人的就业情况是不同的，前者有更安全的职业生涯和更好的升迁机会。他们的工作时间一般较短，工资与服务期限和经验一起增长。而体力工人在生产性生命的后半期，赚钱的能力还有可能下降。领薪雇员享受着工人没有的小额优惠（病假工资、更好的养老方案、较长的假期）。工作条件（如饭菜、卫生、工作环境）比较好，专业风险也比较小。由于所有这些原因，非体力劳动的领薪雇员不常建立工会，而是将他们自己与雇主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并形成了相应的将从事例行事务的白领工人整合为服务阶级的社会价值。在政治上，这些人倾向于选择保守党。

既然服务阶级将自己与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三阶级的社会结构就变成了两阶级结构：工人阶级和其他。分界线落在了

体力工人和职员、工资劳动和领薪劳动之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社会的这两个阶级是明显分离的：体力劳动者和职员是两个互相分离、没有社会交往的阶级。在本世纪后半期，线成了带，成了某种缓冲区。大多数流动都是进出这一区域，但并没有超越这一区域。跨越分界线或分界带，成为另一个阶级的社会流动本身是有严重障碍的。工人阶级的语言反映了这些事实。在英国，是他们 up there 和我们 down here；在瑞士，是 ceux qui sont en haut 对 ceux qui sont en bas；在德国，是 die da oben 和 wir hier unten。许多经验性研究都确认了这种两阶级的分化。

我们现在可以简短地讨论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了。简单地把经理或所有者或富人等同于统治阶级显然是不正确的——虽然常有人如此做。同样，认为统治阶级的成员身份意味着拥有政治权力，而经理只是专业于经营企业，并不管理国家，因此便将这些人排除在外，也是不正确的——虽然这样做的人也不少。最适当的办法也许是考虑一种中间性的精英概念。精英也许可以定义为在一个较大的功能性团体内具有最高社会地位的团体。

在封建主义条件下，要确定统治阶级是很简单的。同样团体的人统治、管理地产、管理司法和基本公共服务、指挥军队。像 T. H. 马歇尔所说的那样：

> 封建贵族是明明白白的统治阶级。现代资本家却不是如此……资本家是在经济领域中利用一种部分是政治性的权力，这种权力来自社会的法律和制度。如果一个阶级足够强大，能保障或保存这些有利于其行

动的制度，它就可以被认为是“统治”阶级。[1]

对这一观察可做进一步阐述。

资本主义确立了四种不同的、互相分离的功能性团体。一个团体管理企业事务，而其余三个管理国家事务。这四个团体是：企业管理人员、政治家、公共管理者（通常被称为文官）和军事人员。在每个团体内部，少数精英实施控制。四种专业化的精英行使着四种不同的功能，这些功能是由原来的治理功能分解而成的。因此，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四种功能性精英—高层管理者、政治领袖、高层文官和军事指挥员—组成了统治阶级。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精英在所有国家都同样发达。例如，在新西兰或加拿大那样的国家，军事精英所起的作用不大。由于政治分赃制和缺乏综合性的职业文官，美国的行政管理精英不很发达，特别是在高层。但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精英（这实际上就是前面马歇尔指出的那种统治精英）都十分发达。随着福利国家的出现，也是适应为维持充分就业而进行政府干预的需要，政治精英也获得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在任何一个时刻，一个人通常只属于一种精英。但从一种精英向另一种精英的运动是经常性的而且十分容易。企业家可以成为大使或政治家，军事指挥员进入政府或成为国家总统。前政府官员和退役将领进入大公司的董事会。个人在统治精英间的这种持续流动有助于保持适当的阶级价值观和阶级意识。这些价值和意识是在较早的阶段形成的，因为精英身份的候选人大多来自统治阶级家庭，在同样的专门学校受教育，在这种

---

[1] “The Nature of Class Conflict”, in R. Bendix and S. M. Lipset, eds., *Class, Status and Pow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66), p. 85.

学校里相识。他们在本阶级内部择偶，并通过同样的俱乐部、慈善机构和文化组织，在本阶级内部实现社会化。他们时常出入于专门的夏日旅游点，参与诸如猎狐、马球和赛快艇等专门性娱乐活动。这些活动是他们与其他公民保持了距离并感受着自己的优越。

如果将统治阶级和工人阶级从物质和文化的角度进行比较，他们就像两个不同的种族。统治阶级的成员个头较高，寿命较长，有更好的医疗服务，受非常好的教育，甚至讲的语言也和工人阶级不一样。在描述美国高层社会——其他高层社会也是一样——时，苏珊·凯勒（Suanne Keller）写道：

> 他们进入历史悠久的私立学校和适当的学院，加入适当的俱乐部。骑术和舞蹈学校、以每年的成年晚会和首演为高潮的现代形式的大巡回这些正式训练大大补充了非正式的社会化。他们交叉婚配，经常出入同样的俱乐部、同样的店铺、交同样的朋友。他们自己的成员徽章就像是将军的制服一样醒目……他们学习自我控制的价值，服从种姓规则，培养良好的风度以及贵族应有的高贵……世人并不总能认出他们，但他们却认识彼此，能够一眼就辨认出一种特定的风格是不经意的，生来就有的地位的赐予，还是费尽周折辛苦得来并小心维护的硬壳。①

从我们前面谈过的内容来看，我们有必要区别特定意义上

---

① Suanne Keller, *Beyond the Ruling Cla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305.

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和权力精英。虽然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交叉的，但交叉并不是重合。阶级更多是生就的，而精英则主要决定于成绩。这一区别只是相对的，统治阶级时刻欢迎新鲜的血液，除非过于不称职，权力精英的成员不会被赶出来。统治阶级中可能有一些不发挥功能的成员，“参与那些不比赛马、遛狗、在国际富翁旅游团中闲聊更有意义的事务”。① 但如果有太多的统治阶级成员不履行统治功能，他们的阶级将很快就不是统治阶级了。因此，在正常情况下，统治阶级家庭将垄断对社会战略性精英位置的进入权，并用自己的成员填补空缺。另一方面，来自下层阶级的人即便成功地进入权力精英位置，也不一定就会成为统治阶级的成员。在他被接受、被确认之前，他必须能够长时期地保持自己的地位，积累足够的财富，取得适当的生活方式。因此，在任何特定时刻，统治阶级的某些成员将不属于权力精英，而权力精英中也有一部分人不属于统治阶级。

随着成绩重要性相对于出身的提高，统治阶级和权力精英间的差别将趋于消失。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消灭私有财产。国家主义已经这样做了，我们下面来分析国家主义社会的分层过程。

第三节　国家主义的社会分层

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若干阶级：在竞争阶段，企业的所有者同时是企业家。后来，企业的所有权日益与管理权相分

---

① G. W. Domhoff, *Who Rules American*,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67, p. 9.

离。在国家主义中，所有权与管理权完全分离，生产资本由国家所有，但由官僚机构控制和管理。

国家官僚当然是等级式地组织起来的。一个典型的官僚机构看上去像一个上尖下阔的金字塔。指令只按一个方向流动——从上到下——而且是必须服从的。两端是松散的。在顶端，等级关系消失了，因为没有上级；在底端，等级关系在相反的意义上消失了。也就是说，没有下级。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和底端没有直接的交流。既然在每一个特定的企业内的官僚管理只是一个一致性系统的组成部分，它也必然是等级式地组织起来的。于是，我们又得到了反转的资本主义。分层是直接的，因此比资本主义更明确、更有效。全部官僚性上层建筑对抗着工人基础（Workers' base），而它们正是代表这一基础进行统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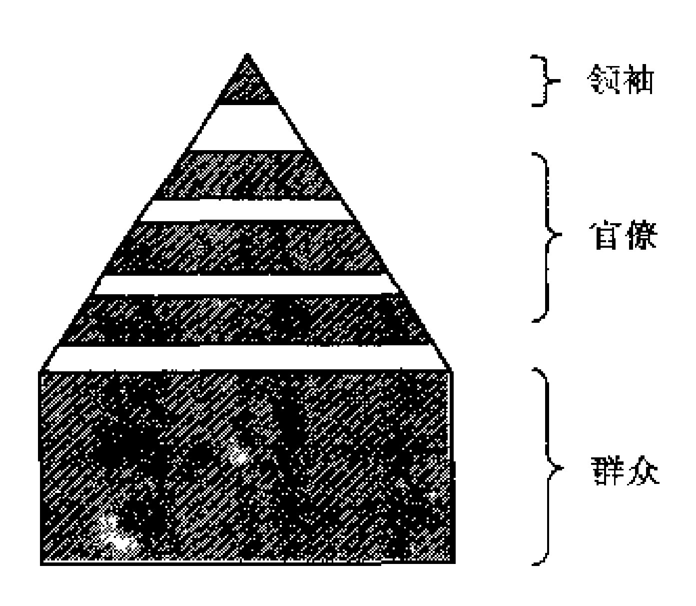


图2 国家主义社会的分层

该体制的运行是相对简单的。南斯拉夫政治家和政治理论

家爱德华·卡捷埃〈Edward. Kardelj〉曾对此做了简洁的描述：①指示从国家机器的最高机关发布到最低机关；②最低机关将指示传达到每个人；③上级对下级实行严格控制；④任务是分配的；⑤未完成任务要受惩罚。[1]

要使该体制适当运行，官僚权力机关的各层之间要有相当大的收入差别。因此，国家工资差别的比例就从革命后的1:1.8提高到了1950年的1:40。苏联社会科学家几乎没有做过关于阶级结构的经验研究，其他国家主义国家也很少有这方面的研究，这些国家的政府也未出版过必要的数据——这一事实本身就令人深思，因此，这些关系是无法量化的。可以得到的有关经验证据表明，阶级分层的一般型式与资本主义是类似的。体力劳动（无产者）和非体力劳动（官僚）这种基本的阶级划分被保持下来了。这同样也反映在工人的语言中，my（我们）是无产者，oni（他们）是发布命令者。匈牙利的一位诗人，米科洛斯·哈拉斯兹提〈Miklos Haraszti〉，曾在一家拖拉机厂做过铣工，他这样描述了其工厂同事的情绪：

> 在所有的工作场所……，他们都意味着同样的东西：管理者，那些发布命令、制定决策、雇佣人手、支付工资的人，那些负责人及其代理人——即使近在眼前但仍然远在天边的人……他们不受工厂院墙的限制，拥有说话的人所不拥有的一切。他们是说话者以一种难以捉摸、不可限定的方式所依附的人；他从他们那里接受这个、接受那个；被他们命令着……组织

① 参见"The Practice of Socialist Democracy in Yugoslavia", in C. Wright Mills, *The Marxists* New York: Dell, 1962, p. 418.

> 官员、政治家、电视节目制作者、医生、警察或足球场上的官员……撇开他们是某人开始向上爬的第一个信号。①

苏联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苏联公民中有和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多的人不愿意做工人或农民，大多数工人不愿让他们的孩子再做工人。但既然技术发展的现有水平需要大量的体力劳动，社会必须建立一种选择机制。它的最重要的工具是教育，而受教育是以阶级为基础的。N. A. 阿伊托夫〈N. A. Aitov〉发现无产者的孩子平均受教育水平是7.66级，而那些出生于白领雇员家庭的孩子则为12.22级。② 86%的城市白领工人子女接受了高等教育，45～64%的体力劳动者的子女接受了高等教育，只有10%的农业青年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农民实际上是社会最底层的团体——而他们则用低水平生产来实施报复。分化在大学里继续，分数与社会出身有相关性。学校越有名望，进入这些学校的人就必须越有社会背景。为出国工作提供培训的学校完全是留给精英们的。竞争性入学考试是存在的，但有钱的父母可以为其子女请辅导教师。据查有多达85%的学生接受过这种特别辅导。

事情总是这样，那些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人享受着各种特权。既然一个国家主义经济是建立在中央计划基础上的，货币的作用就不太重要了，最重要的特权是以实物形式给予的。这

---

① M. Haraszti, *A Worker in a Worker's Stat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7, p. 175.

② 引自R. Dobson "Social Status and Inequality of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SSR" 载J. Karabel and A. H. Hasley, eds., *Power and Ideology in Educ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254－75，特别参见256页。

些特权与在官僚阶梯上所处的位置直接联系在一起，包括在专门的度假处度假，享受特别的医疗服务或在一个封闭的医院、诊所和药房系统中的接受治疗，拥有豪华住宅，使用公车和昂贵的国有财产，享受专门的狩猎特权和其他专门的娱乐活动。在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可能经常会撞到写有“私人道路”的路牌；在一个国家主义社会，在为官僚精英准备的乡间别墅区或专用猎场的入口处，则常常可见到“禁入”的标志。也许还有卫兵。更大的特权还包括进人摆满进口商品和普通人难得一见的商品的封闭的商场网络。在苏联，这就是所谓 Kremlëvskii Paëk（克里姆林宫的配给）。与市场上的情形相反，这里的商品优质低价。而且在这里，你不必排到处可见的长队。例如，一台车送上门只需要两天——普通公民一般要等两年——而且大约只收半价。国家主义精英的成员经常有国家供应的个人司机、保姆、园丁、护士等等，当然还有开支账户。在所有的火车上、机场、旅馆、剧院、足球场及其他娱乐场所，总有一定数目的座位是留给“权威人士”的，因此，一个人只需要证明他的官衔，票就准备好了。党校学生有特别津贴，级别足够高的人还可以得到免税的附加工资。不经上级许可，官员是不能出庭的。别人犯了错误要受惩罚，他们却可以逍遥法外。出国旅游的机会是人人看重的，但它只对精英成员开放，对“群众”则是严格限制的。外国报刊消息，在特别内参上摘要刊登，供严格控制数目的人参考。一句话，似乎存在一个设计完备的、综合性的小额优惠制度，使官员的生活比群众更容易、更舒服。此外，像莫尔文·马修斯（Mervin Matthews）所说的那样，“被允许使用外人不得接近的物品、服务甚至信息所带来的心理感受对那些领袖最大程度地依赖的团体肯定是一个强有

力的凝聚因素和成功象征"。[1] 领袖与群众是分离的,人人都清楚——至少在实践中是清楚的——他们属于不同的社会阶级。这种情况与公开的意识形态相矛盾,因此,特权就被遮掩了起来。

我们已经指出国家主义的阶级划分与资本主义的阶级划分是类似的,但二者并不完全相同。已有人看到了它们之间的重要区别。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并未能消灭阶级社会,未能建立社会主义,但它们的确提升了体力劳动工人,特别是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结果,体力劳动工人与低级的例行事务类非体力劳动者在分层的等级表上互换了位置。这一点在工资上也有反映:在苏联工业部门,职员和办公室工作者的工资比体力劳动工人的工资低19%。因此,原来那种基本的、从历史上继承而来的体力/非体力划分变成了一种更为一致的划分:以教育为基础,将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人与执行例行事务操作的工人区分开来,而不论他们是蓝领还是白领。结果,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界带上就有了更多的流动。蓝领工人和那些例行事务白领工人生活方式上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可见的。但这不应模糊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基本划分。与通常情形一样,这里也有一个中间性的缓冲团体,他们的工作不是专家性的,但也不是体力性或是完全例行事务的。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划分是清楚可见的,这种划分是从工作成绩角度对原有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阶级划分的修正。同样的过程在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可以见到。在那里,特别是在大公司中,低层白领工人被解雇的方式与其蓝领同行是一样的。

---

① M. Matthews, *Privilege in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8, p. 54.

工人社会地位提高的最好的指示器也许是他们在更大程度上享受了社会的教育设施，表五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表中所示的所有国家中，工人都占活动人口的1/2左右，但他们进入大学的情况却有显著不同。

表五　欧洲国家工人阶级出身大学生的百分比，1960年前后

国家主义国家		福利国家		传统资本主义国家	
苏联	30	英　国	25	法国	8
波兰	32	挪　威	25	荷兰	5
		瑞　典	16	西德	5
		丹　麦	10		
		奥地利	8		

资料来源：

苏联：M. Matthews, *Class and society in Soviet Russia*, London: Penguin 1972, p. 297；福利国家和传统资本主义国家：F. Parkin, *Class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Order*, New York: Praeger, 1971, p. 110；波兰：D. Lane and G. Kolankiewicz, *Social Groups in Polish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1973, p. 129。

受教育机会的增加当然促进了社会流动。社会流动还有另一种有力的载体——执政党。虽然工人并不是党的最大群体（一般只占30%～40%，与知识分子相比，他们远未被较好地代表），党是一个精英俱乐部，它提供了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存在的进步机会。结果，工人阶级子女向精英职业阶层的流动在苏联两倍于美国。1966年，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的个人占据了苏联政府机构和政治局/主席团成员中1/3的位置。在美国，这一比例要小得多。另一方面，瑞典政府则表现出了较大的工

人阶级基础。但请注意，不要误解这种比较。更多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出现在权威位置上表示着更大的社会流动性，但这一现象本身对权力机关所遵奉的政策并没有做出任何证明。不论是管理自己的私人企业还是进入政府，或是在他的地产上享清福，资产者就是资产者。但如果一个工人变成了经理或部长，他就不再是工人了。即便一个政府完全由过去的工人组成，它也不会是一个工人**的政府**，更不会代表无产阶级专政。

妇女社会地位的改善是在更大社会平等这一方向上的第二个重大变化。妇女在家庭中和整个社会上的地位都上升了。在国家主义国家，比在资本主义国家多得多的妇女加入了劳动力队伍。在苏联，72%的医生、68%的教师、63%的经济学家、52%的专业雇员是妇女。妇女占了最高苏维埃成员的28%和党员的20%——但只占科学院成员和企业领导人的9%和中央委员的3%，在党的主席团中则没有位置。

工人和妇女的地位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农民的地位却与此相反，对这一点必须做出说明。在一个像样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任何没有私产的人都是弃儿；而在国家主义社会，那些有私产的人则受到了同样的待遇。拥有一个有大花园的国家夏日房屋是件荣耀的事，但拥有一个人自己的房屋和一小块耕地则是资产阶级秩序的痕迹，会惹来社会蔑视。因此，农民，不论是个体农民还是集体化了的农民，都受到了歧视，他们在党内的人数要少得多。在苏联，农民如果没有许可证不准到集体农庄以外旅行，这些许可证掌握在管理者手中。进城是很难的。他们的子女受教育的机会明显要小得多。1974年调查的74种职业中，农民工人的社会地位最低。

我们现在来看官僚的地位。我们首先要面对国家主义官僚

或其统治精英不能被看成一个阶级的观点。立场不同的社会科学家，如法国保守主义社会科学家雷蒙德·阿隆和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米洛斯拉夫·培奇乌伊里奇，都坚持这种观点。阿隆认为，“所有工人都成了惟一一位雇主——国家的雇员”，他得出结论说，“在这一意义上，苏联类型的社会确实是无阶级的”。他接受官方国家主义的观点，“一切社会成员都有他的所有制份额，因为生产工具属于社会，每个人都是工资劳动者，一切收入都来自劳动”。但他也承认个人收入在这种社会可以像在阶级社会中一样不平等，政治上的不平等还可能加剧。

> 消灭阶级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消灭政治权力的不平等。一个社会的政府不可能不由少数人掌管。

> 这些少数人与民主国家的政治统治者相比拥有无限的权力，因为政治权力和统治权力都集中在他们的手中……政治家、工会领导人、公务员、将军和经理都属于一个党，都是一种权力政治的组成部分。所有中介组织、所有个体团体……实际上都由精英代表控制……无阶级的社会使人民大众没有任何可能的手段与精英对抗。

阿隆承认，在理论上，一个不同的、分权的和多元化的无阶级社会是可能的，但在当前的环境下，这样一种社会却是极端不可能的。阿隆得出结论：

> 无阶级社会将在名义上消灭无产者，在实际上消灭资本家，但它将首先消灭各种团体间的区别，将一个统一的精英强加于一个无差别的群众之上。这种转变不会终结劳动的异化并进而消灭全部异化，而是用群众与精英间的单一对抗代替了民主社会中那些无数的对抗。①

因此，阿隆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也许仍存在同样的**阶级不平等**、非其他社会可比的更大的**政治不平等**、强烈的异化和统治精英与被统治大众之间的一种**对抗性的社会关系**。除非阶级分层概念被剥去它的常识性意义，这样一组命题是一个内部矛盾重重推理的罕见例子。然而，既然这一说法似乎表示，一个阶级社会比一个无阶级社会要好，其中的逻辑矛盾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对被认为是一种天才分析的、常见的、不加批判的引用也是如此。

培奇乌伊里奇的分析更为认真。他也指出，官僚垄断了政府，但它不是以自有财产为基础的，而是建立在授权的基础上。“产权与管理权的这种分离正是官僚阶层形成并从一个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历史基础。官僚没有建立在个人财产基础上的自有经济基础，因此，它在生产过程中，没有一个阶级所具有的历史的延续的稳定的地位。”②

如果说，统治阶级按定义是与个人财产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官僚当然不是一个阶级。但这一点并不重要，它只是一个

---

① R. Aron,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Ruling Clas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50, 1 (16), pp.126－143.

② Pecujlic, "Teorijski okvir za proucavanje klasnih promjena u socija lizmu" *Sociologija*, 1966, pp. 5－26, 特别参见第14页

语义学问题，找一个新术语出来表示国家主义社会的阶级就可以了。我们已经处理过这一问题了。然而，如果说在国家主义社会不存在类似阶级的纵向分层，这是与经验证据相矛盾的。培奇乌伊里奇真正想说的似乎是，与传统社会阶级相比，官僚不得不是更功能性的，如果它不能提供足够的服务，就会被立即颠覆，因为它没有自己独立的基础。某些学者，如S．斯托扬诺维奇（S．Stojanović）试图将马克思—韦伯的**经济阶级**理论（economic theory of class）与国家主义社会中的社会现象调和起来，认为官僚似乎是生产工具的集体所有者。[①] 这在形式上是正确的，但却要求对所有制概念做不必要的扩展。再者，与其它集体所有制例如教会所有制不同，这种所有制不是法律上承认的。另一种调和的可能性是稍微拓宽财产权的概念。例如，拉尔夫·达伦多夫区分了管理资本主义的狭义的财产权（法律上认可的所有权）和广义的财产权（对生产工具的控制）。然而，将权力关系——而不是财产关系——看做是社会分层的终极源泉显然更简单、更适当。

培奇乌伊里奇也提到继承是私有财产因而也是社会阶级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我们必须再次小心，不要把阶级一般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重要的不是财产本身的继承，而是社会地位的继承。奴隶社会中的奴隶和种姓社会中生为特定种姓的人都是直接、完全地继承其社会地位，他们别无选择。在封建社会，一个农奴——甚至一个自由农或市民——有一定机会超越其阶级出身。战斗中的勇敢、对自由和贵族头衔的购买是常见的途径。统治阶级地位——贵族成员出身—— 一般仍

① Stojanovic. "Eatisticki mitsocijalizm" *Praxis*, 1967, pp. 33-34.

是世袭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人首先是继承财富，其次才是社会地位。在国家主义社会，社会继承进一步瓦解了。一个人继承的只是在官僚等级中占据某种位置的机会。学校教育机会的不同就是对这一点的反映。我们前面已经谈到，受高等教育的城镇白领工人子女和农民子女的比例为 8.6:1（如果用最高层和最低层的数据替换平均数，这一比例会大大提高。），进入权威位置的机会也不同（被信任的党务工作者的子女会成为同样被信任的官员——这样想通常也是有道理的）。继承的不是工作而是社会地位。最高政治领袖的儿子不一定会成为最高政治领袖，但可以成为部队将军、部长或有影响的编辑。与政治关系不那么紧密的子女也同样如此，他们可能被分配工作，只要他们留在精英圈子内。只有一件事是不可能发生的，那就是他们加入“领导”阶级——工人阶级。

国家主义社会通常比资本主义更加开放，阶级地位的继承进一步弱化了，但继承仍然存在。通常情况下，家庭是最重要的继承载体。

家庭提供了生活成功所必要的文化和社会背景。特权阶级家庭为他们的子女装备了在社会关系方面更有意义的知识，鼓励他们追求更高水平的发展。这些孩子受教育时间长，进入更有名望的学校，取得更好的成绩。如果他们不是特别聪明，家里会聘请私人辅导教师，帮助他们克服关键性的教育障碍。既然父母都是党员，儿子也可能会成为党员，他们的人生因此会更加顺利，障碍更易清除。如果父亲是有权势的官员，他当然会有有权势的朋友和许多机会，他的子女肯定也有更好的起点。一个叔叔“或舅舅”也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我们有一种

“按叔叔分配”〈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uncle〉的体制，塞尔格·科姆〈Serge Kolm〉对亲戚关系就是这样定义的①。最后，非常英明地安排的婚姻也发挥了传统作用。在特定水平之上，人们倾向于与自己同一阶层的人成婚，新人最好也是“共产主义者”（即党员），至少也应出身于一个好家庭（即其父母是党员）。有了教育或技术资格证书也就有了有价值的资源，有了无形的但却高度有效的资本。这种资本像有形资本一样是可以继承的。

家庭的教化不是惟一可以得到或实践的教化。在产生适当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方面，党校代替了私人学校和俱乐部。共产主义者是特别类型的人，吟诵着指定的课本，党永远正确。只要条件允许，人总是从自己所属的阶层或比自己更高的阶层选择朋友。“外人并不总能认出他们，但他们却能认出彼此”：对词语含义做少许改变（例如，人总是要“负责的”，即人总是要服从），在适当的时候利用适当的术语（即各种表示忠诚的象征），不经意地提一提与有权人的亲密关系（“我们的同志”，“x同志告诉我……”）。还有其他种种方式可以表明他们属于统治阶级。但他们这样做都是由衷的，不像那些野心勃勃的外人。

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或她是如何被社会化的，社会化是“一个过程，个人通过这一过程获得知识、技能和性情，并因此有能力作为团体或社会的有用成员参与世事。”② 家庭、学校和同类圈子〈peer group〉是三大社会化机

---

① S. C. Kolm, *Les elections sont elles la democratie*? Paris: CERF, 1977, p. 12.

② O. G. Brim and S. Wheeler, *Socialization after Childhood*,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66, p. 3.

构。既然国家主义的上层阶级成员常常过着一种与其他人相隔绝的生活——居住在独立的住宅区的豪华公寓和特别区域的乡间住房内，在特别高级的商店中购物，出入特别的俱乐部和度假处，交叉婚配，送他们的子女去有名望的学校——所有三种社会化机构就都在阶级隔绝的方向上发挥作用。它们培养特定的阶级意识，装备了这种阶级意识，也就为在社会中取得精英地位做好了准备。

即使国家主义在理论上是纯粹的能人政治，它仍然存在社会分层。但它当然不是理想的能人政治，社会分层是显而易见、确定不疑的事实。阶级分化的三种要素都出现了：权力、收入和统治阶级享有合法性时的社会名望。实际上，这三种要素是密切联系的，也是高强度地出现的，政治贵族成了比资产阶级更一体化、成分更纯粹的统治阶级。

官僚金字塔不是匀质结构。它包括两个不同的部分：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最高领袖和被授权的、发挥服务阶级功能的官僚机器。要找出谁属于哪一部分，我们有非常简单的线索。这就是苏联的 nomenklatura 或其他各处的干部名单。其中开列着“那些体制本身认为是非常重要、需要中央组织部予以特别注意的人的姓名”。[①] 很自然地，我们能辨识四种精英：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和军事的。与资本主义有所不同的是，政治精英是主导性的，起着统合的作用。统治精英在此远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更为统一：高级经理、高级行政管理者和军事指挥员都是党员。这四种精英的领导人物一般都是党主席团的成员。统治精英不讳言这一事实：它认为治理国家是它的适当工作。

---

① A. Nove, “Is there a Ruling Class in the USSR?” *Soviet Studies*, 1975, no. 4, pp. 615 – 38，引文见 p. 635 页。

在1970年12月的危机中，波兰工人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经济政策。危机之后，有报道说，波兰党主席爱德华·盖莱克——以前是矿工——说："你们好好工作，我们会好好治理。"①

根据上述分析，国家主义的社会分层似乎是这样的：统治精英，可以称为统治贵族，由专职的党的官员和最高官僚（民事的或军事的）组成。干部在技术（官僚）工作和政治（党）位置间不停地、系统地流动。干部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统治社会所必需的技术经验和政治经验。名义上，党的官员是民选的，但实际上组织部门决定将正确的人分配到正确的位置。下层官僚——即领袖之下——是国家主义的服务阶层。其余——人口的大多数——是群众：工人和最底层的农民。被强迫劳动的人则扮演着国家主义的流氓无产者。精英的（历史）作用——先锋队的作用——是领导，而群众的作用是被领导。这一根本性的"劳动分工"是清清楚楚、持续一致、坚定不移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分层机制在一个正式可见的政治约束很少而实质性的、不可见的政治约束很多的环境下独立运行，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是这种运行过程的结果；国家主义的统治阶级则是有目的政治设计的结果，执政党通过这种设计进行政治垄断。党员通常是终身制的，党公开宣布它自己是先锋队、是社会精英，按它的设计改造社会是其历史使命。它本身不容忍任何反对。因为按定义，没有人比它更有资格解释劳动人民的利益并找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国家主义社会的这种一元化组织解释了一种明显可见的情况：这种社会更开放，但

---

① 引自R. Bahro, *Die Alternative*, Cologne: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77, p. 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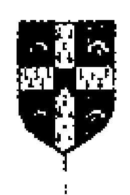
同时其分层也更刻板。

作为结论，我们来对比一下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特点。在资本主义中，政治权力大多来源于经济权力。在国家主义中，这种元素颠倒过来了。在前者，国家归根结底是由富豪统治的；而在后者，统治由政治贵族统治。顾名思义，在资本主义中，工人阶级服从资本；在国家主义中，工人阶级服从国家。处于支配地位的两个阶级分别是资产者和政治贵族。前者包括经理和其他统治精英以及服务阶级；后者包括政治领袖和官僚。在资本主义中，收入主要来源于一个人在经济等级制中的地位；在国家主义中，收入则来源于一个人在政治等级制中的地位。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相对应的是国家主义的政治霸权。

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是由深重的经济危机（19世纪70年代、20世纪30年代）标点出来的，发展在经济周期中行进。国家主义发展阶段很可能是由深重的政治危机区分出来。国家主义当然是经历了政治危机的（20世纪30年代的莫斯科审判；20世纪40年代末共产党和工人情报局对南斯拉夫的封锁；斯大林之死以及接踵而至的比尔森〈Plzeň〉工人示威、东柏林的工人暴动和1956年波兹南〈Poznan〉及匈牙利更波澜壮阔的起义；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推动了欧洲共产主义的发展；中国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继之以政治变革（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新政）；国家主义的政治危机则推动了经济改革。但体制的基本特征并没有变化。

在治理社会时，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主要使用经济强制，接下来是施加压力强制思想上服从，最后是政治强制。在国家主义中，意识形态的强制是第一位的，其次是政治强制，经济强

制则处于最后的位置。由于政治强制是人身性的，它给人的感觉就比非人身性的经济强制更显压迫，因此，国家主义似乎比资本主义更有镇压性质。作为各种强制类型重要性不同的结果，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经济上的不安全，国家主义则是政治上的不安全。这两种类型的不安全是建立和维护两种体制中分层社会秩序的两种主要的组织手段。随着经济安全的加强，资本主义开始与通货膨胀、缺乏劳动纪律以及相伴随的无法抵御的参与决策的要求一起走向瓦解。在国家主义社会，政治安全则侵蚀了党的政治垄断——就像捷克斯洛伐克所出现的那样，导致类似的改变社会关系的要求。但在此之前，两种体制都仍然是分层的阶级体制。无产者在两种体制中都是被剥削阶级。两种体制的主要区别在于这一事实：在资本主义中，剥削和社会权力的分配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进行的；在国家主义中，这些则更主要地是通过政治手段实现的。



第4章

异化和物化

第一节　异　化

在黑格尔和马克思本来的用法上，异化是指人类存在与本质的分离。存在是一个人在世界上的实际存在。本质是一个人的潜在能力〈What the individual can be potentially〉，如果一个人的存在与其本质分离，他就是异化的。

什么是人的本质？什么是人的潜质〈potentialities〉？这是哲学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南斯拉夫哲学家米海洛·马尔科维奇〈Mihailo Markovic〉的见解为人们广泛接受。他将人的本质描述为一种自由的、创造性的、充分发展的、社会化的存在。然而，这显然是一个规范性的（哲学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科学性的）命题。同样，我们可以追随巴西教育家保洛·弗来列

〈Paulo Freire〉，描绘人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人可以改变世界，而且能对世界、自我和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活动进行反思。而动物却不能将自己与其行动区别开来，因此只是纯粹的活动存在而不是实践存在。① 马克思主义者的想法与此相似，人是一种实践存在。② 他本身是自由的，因为他可以有意识地在客观给定的不同行动路线间进行选择。如果他能够自由，他就应该自由，否则他将失去他的本质的人性。这种自由实现和自我决定是非异化性存在的特征。人不是他应该所是〈What he ought to be〉，他应该是他所能是〈What he can be〉，这一点是异化的哲学考虑的另一个规范性的命题。

上述方法经常被认为是唯心主义的或乌托邦的：人当然与动物有所不同。但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家并不是如此幼稚。米海洛·马尔科维奇指出，人是矛盾的生灵。人总是试图扩大他的自由——然而他也发明了奴隶制。人的最突出特征是其创造性——但他的毁灭性也极为可怕。人是社会存在，是社会的产物，没有社会他不能存在——但他也可能是自私的、贪婪的、权力饥渴的。人当然是一种理性存在——但正是我们的时代证明，他可以变得何等的非理性。这一切都使人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人类的构成特征中有哪些应该让我们喜爱呢？按

---

① P. Freire,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 pp. 70, 96.

② 参见 G. Petrovic, "Man and Freedom", in E. Fromm, ed. *Socialist Humanism*, New York: Doubleday , 1965, p. 273. 实践（praxis）是一个多少有些不明确的概念，不同作者有不同的用法。在其基本意义上，它有描述性和规范性两种含义。就描述性来说，实践是指人的活动，其中主要是劳动，此外还有艺术创造和思维活动。M·马尔科维奇对规范性意义作了充分阐述，他的定义如下："实践是人类创造其存在的最优可能性的活动。它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Dialectic today", 见 M. Marković and G. Petrović, eds., *Praxis* , London: Reidei, 1979, pp. 3-43, 引自第 27 页）

我们目前的行动，谁应该主宰未来呢?"① 答案当然是规范性的。但如果我们确立了价值标准，也就明确了行动路线：人应该努力发展人性的积极方面，控制或限制其消极方面。无疑，在这方面，在实际情况和可能的成绩之间还有很大距离。这就是"人表面所是与其所能是、人的实质与潜质出现差别"的根源，异化描述了这一差别。"如果一种社会哲学，不能指出这一差别，假定人就是他在实际存在中表现出的那个样子，那么这种社会哲学就会被看成是对现有秩序的最后的意识形态维护，并因此受到鄙视。"②

因此，按照一体化的社会理论方法，价值判断是无法回避的。另一方面，如果命题能设计成可证伪的形式，取得共识就容易得多了。因此，最大程度地减少规范性内容是值得追求的。科学家比哲学家更可能达成共识。但为了提高共识出现的可能性，我们必须付出代价。

异化现象除了哲学的方面，还有社会学的和心理学的方面。为了本书的研究目的，我们主要着眼于社会学方面。一种可能的方法是像加约·佩特洛维奇〈Gajo Petrović〉把人的本质看成是历史地规定的人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异化意味着一个人没有实现他的历史地创造的可能性。说人没有发生自我异化意味着他已达到了他的潜质的水平，而且通过实现他的潜质——以往从未完全开发这些潜质，他不断地创造新的潜质。历史的、社会学的和心理学的研究可以提供给我们关于人类希望实现的各种可能性的知识。

---

① M. Markovic, *From Affluence to Praxi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4, p. 75.

② M. Markovic, *From Affluence to Praxis*, p. 12.

对这种方法显然需要做专项的活动。它也要求作者具有不同专业背景（显然，在某种意义上，全部研究无非就是探讨当前给定的人的可能性)。因此，我们需要找出一条捷径。马克思又一次成了我们的向导。这条捷径就是把劳动作为基本的分析范畴。

如果，为了像他们所估价的那样满足他们的需要，人们不得不工作的数量大大超出人们愿意工作的数量，这种状态可以被认为是严重稀缺。严重稀缺是到今天为止全部阶级社会历史的特征。在这种状态下，生产性劳动的条件具有了存在上的重要性，经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他社会关系。不仅如此，人通过劳动成为人。人通过实践活动改变客观现实——自然和社会，将它变成人的现实，即改变为人类劳动的结果。通过这种方式，人也改变了其自身的存在条件，改变了作为类的自身〈himself as a species〉。社会劳动过程成为自我创造过程，任何对劳动过程产生消极影响的事物必定也会从消极的方向影响劳动过程的结果，即自我的创造。人受到了阻碍，不能实现他作为人的可能性。他被异化。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探讨在各种社会经济体制下生产性劳动的条件来分析异化。

经常有人说异化概念天然就是哲学的，不能用作科学概念。裘阿奇姆·伊斯拉尔〈Joachim Israel〉即持这种观点，他主张放弃异化这一概念，代之以物化〈reification〉。拉尔夫·达伦多夫也认为，不论异化在哲学意义上对产业工人有多大关系，“它在经验科学中没有任何位置，因为没有经验研究能证明或证伪异化。”① 这类观点是以方法论上的误解为基础的。首先，

① R. Dahrendorf,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Society* , London :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1968, p. 13.

实际的和可实现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只是一个观察问题或实证知识问题。在这种意义上，异化是一个可证伪的命题，因为在道理上可以说明没有对实际情况加以改善的方法。第二，异化的概念意味着关于可观察到的差别的某些重要后果的痕迹。并非所有的科学命题都能被直接证实，记住这一点是有好处的，它们经常只是理论假说，可以被证伪或通过考虑其后果而间接地证明。如果一个假说没有价值，就会被拒绝；反之，如果它是富有成效的，也就是说，它能够帮助我们组织关于经验现象的知识，导致对观察行动的一致性解释，并形成其他有意义的假说，那么它就会被保留下来，直到更有意义的假说形成或新发现的事实不能在旧的理论框架中得到证明。在这种意义上，异化劳动已被证明是一个极其有效的假说。

社会劳动过程有三个要素：人、人的活动和人的活动的产品。每一个要素都可能被异化。因此，异化现象可以很方便地用三个过程来证明：劳动的异化、劳动产品的异化和人与他人和社会关系的异化。

1. 当工人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售给雇主，与自己的劳动力分离时，异化劳动就出现了。出售通常是用劳动力交换货币，但也并不总是如此。雇主—雇员关系是异化的充分条件。一旦雇主支配了工人的劳动，劳动对工人来说就成了外在的东西，与他的个体分离："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而，它不是满足劳动需求，而只

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① 这一点在资产阶级理论的一个基本假定——劳动是负效用——上得到了反映。"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的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②

在国家主义社会，劳动同样是异化的。米洛斯·哈拉斯兹提对此做了很好的描述，他讲述了他在布达佩斯工厂做工时的经历："我发现自己有了变化，原来我对物质生活很讲究，想办法节省力气。现在我则被一种对金钱的迷恋主宰了。我屈从于一种无人明言但却力量巨大的禁忌：决不要让工作更准确、更容易、更有趣或更安全。"③

异化的劳动被看成是商品，是与其他生产要素一样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使用价格由市场决定。工人的价值是他作为一种生产性资产的价值：即在生产性寿命期内，收入流量的贴现值。一个工人和一个奴隶之间的区别是工人拥有自己的劳动力因此能出卖他自己，而奴隶则是由别人销售的一种商品。人们有时推销自己，而不仅仅是出售劳动力。推销员、官僚野心家和妓女都是如此。他们出卖自己的个体——微笑、个人魅力、思想和肉体——以此提高商品的成交率，不论这种商品是新产品、服从、爱或是别的什么。如果工人是受过教育的，他的"人力资本"——使用现代经济的术语——价值提高了；受过教育的奴隶也更值钱。简单地说，劳动的异化意味着工人创造能力的疏离，工人变成了物、一种商品，然后又被某人所占

---

① K.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中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93－94页。

② 前引文，第94页。

③ N. Harastzti, A Worker in a Worker's State, Harmondswork: Penguin, 1972, p. 53.

有。工人丝毫不能决定做什么、怎么做。这是个人与他的生命活动之间的一种根本性的断裂。这种**自我异化**是异化的基本方面。

2. **劳动产品的异化**是劳动异化的直接后果。“劳动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① 劳动一旦卖出，劳动的所有产品就都被雇主占有。劳动的产品现在“作为一种异化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② 占有了劳动产品，雇主也就占有了剩余价值，即产品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差额。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增强了雇主的经济——社会的——权力，并为对劳动的进一步剥削创造了条件。然而，主人也并不安全。产品一旦与直接生产者疏离，它便倾向于逃避各种控制，开始过一种完全独立的生活，成为一种自主的、威胁性的力量。人生产了产品，创造了市场，然后，市场的非个人力量便开始主宰他们的社会关系。人创造了党、工会、国会，然后这些制度便开始了它们独立的生活，逃避它们的创造者的控制。因此，在一种较为一般的意义上，一旦异化的原罪犯下了，人的创造就常常作为异化的和威胁性的力量与他相对立。

3. 当一个人疏离他的生命活动和他的产品时，他也必定疏离他人。劳动的产品表现为资本，即对劳动的支配。社会分成了敌对的社会阶级。竞争和阶级对抗使大多数形式的合作变得不可能。异化的社会成员表现为相互竞争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表现为无产者和资本家、工人和官僚、被压迫者和压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 91 页。
② 前引书，第 91 页。

迫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但却不是表现为人类。

异化既影响统治阶级，也影响被统治阶级。“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①

按照马克思，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条件既是异化劳动的原因，也是异化劳动的结果。这三大条件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劳动分工和交换。这种思想写在《手稿》中，本意并非想发表，因此还很粗陋、很含糊。也许可以得出——而且经常有人得出——下面的结论：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将消灭异化；既然技术发展加强了劳动专业化，劳动分工必定永久存在，异化也将永久存在；任何一种市场交换的存在都意味着异化。这三个结论除了不一致外，都是明显错误的。因此必须更准确、更一般地确定异化的条件。

劳动异化的充分条件似乎如下述：

1. 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只要存在这种情况，就不会有自我决定，而自我决定是对异化的否定。

2. 存在着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分工。这一分工主要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只要这一分工存在，一些劳动就会是强迫劳动。现有经济发展水平已经使大多数人口有了享受大学教育的机会，消除了大多数有害的、令人堕落的劳动。

3. 劳动和政治活动以一种使纪律和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

① K. Marx *The Holy Family*，中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4页。

方式等级式地组织起来。这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劳动分工的一个特例，即专业化的命令发布者和接受者、决策者和单纯执行者的分工。实际上，这一条件既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充分的，因为如果没有条件3，条件1和2是不会出现的。

如果商品劳动不存在了，其他商品仍然存在，市场不会成为一种造成异化的制度，仍会被用做配置手段。如果教育可以同样地普及每一个人，劳动状况就会改变，劳动会更有趣，劳动将不再是别的东西的手段，不再是强迫劳动。最后，如果权力的集中不存在了，阶级异化将不再存在。这样，才能逐渐建立对生产性劳动的产品和人的各种创造物的真正的社会控制。

这三大条件的消失对消灭异化显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它是不是充分条件，我们尚不清楚。既然在社会科学中，实验一般是不可能的，充分条件是不能事先确立的，只是在事后，在历史过程完成了自身之后，充分条件才能被发现。

显然，异化的所有三个条件在当前的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中都是存在的。劳动是一种出卖给雇主——私人或国家的商品；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有特定的社会后果；不平等的权力分配产生了阶级。

第二节　物　化

劳动过程造成了劳动的对象化。人占有了客观世界，并通过自己在其中的对象化使之成为他自己的、人的。当这一对象化在特别的、异化的条件下进行时，我们就遇到了物化〈reification〉现象。这一术语最先是由匈牙利哲学家吉奥尔吉·卢卡奇于20年代初提出的，只是在近来，才获得了较为广泛的接

受。

物化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表现和体验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社会关系失去其社会性质，被神秘化为技术的、交换的或行政的关系。人们像评价物一样评价彼此。人的意识成为物化的。"人类成为彼此的手段，可以被利用来达到某些目的的手段。然而——这是马克思主义物化观点的核心之一——人们对这种现象却似乎并不感到奇怪，并不觉得这是'异于其本性'的事。相反，物化过程取得了一种'自然'关系的特征。"① 马尔科维奇指出，在物化的社会情境中，主体获得、体验或被赋予物的特征，这种概念可以应用于下列三种不同水平上："（Ⅰ）客体（人类行为在某种历史条件下实际取得了物性：劳动成了重复性的，政治生活成了形式化的，社会被异化的社会力量统治）；（Ⅱ）关于客体的理论（寻求客观知识，人类行为的个人的、主观的特征必须被弃而不论）；（Ⅲ）元理论（对我们客观方法论的限度的批评意识消失之时和我们的知识工具变得过于固定、僵化之时）。②

下面我们来考察所有三个水平上的物化。

物化过程在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中多少有些不同。我们从资本主义开始，在此，市场关系的泛化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如果一个人能出卖劳动力，他实际上就能出卖一切。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这一事实作了生动的描述：

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一切东西，这时都成了

① J. Israel, *Alienation*,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71, pp. 59-60.
② M. Marković, "The Problem of Reification and Verstehen - Erklaren Controversy", *Acta Sociologica*, 1972, 15, 27-38.

> 买卖和交换的对象，都能出让了。这个时期，甚至像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而在以前，这些东西是只传授不交换，只赠送不出卖，只取得不收买的。这是一个普遍贿赂、普遍买卖的时期，或者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找最符合它的基本价值的评价的时期。①

如果一切都可以出卖，市场就开始作为普遍的评价标准发挥着特别的作用。因此，资产阶级意识结构将基本上由市场关系的普遍性决定。日常语言对此有所反映：某某人打算"卖"他的思想或不愿"买"别人的意见。马克思也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在现实中和语言上，交换关系都是其他一切的基础：propriéte 和 property 即表示产权也表示特性；valeur、value、Wert、commerce 和 Verkehr"既是商业用语，也是个人的特征和关系的用语"。② 用一种更微妙也更深刻的方式，有取代了是。人们说他们有问题、有失眠症、有不幸的婚姻，而不说他们感到痛苦、不能入睡，或与妻子争吵。现代人有了一切：汽车、房子、职业、孩子、婚姻、问题、愤怒、音乐——如果这些还不够，他还有一位心理医生。然而，他却什么都不是。

自由是用"非个人的市场力量"不受外部干扰的程度来度量的。这样，资产阶级意识就将市场自由与人类自由混为一谈了。经济效率（所谓的帕累托最优）来自（理想化的）市场关

---

①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 79 - 80 页。

② K. Marx and F. Engels, Njemacka ideologija. Belgrade: Kultura, 1964, pp. 257 - 58.

系。**人力资本**（!）按贴现的工资来计算，这一点前面已经谈过了。学院经济学家在分析家庭模式时将子女视为耐用消费品，计算相应的需求弹性。市场盈利率成了社会合意性的决定性标准，收入和财富的巨大差别被解释和辩护为边际生产力的差别。就业机会的缺乏、商业周期、低速经济发展以及与这一切相伴随的社会成本，都被归结为需求和供给条件。需求和供给被视为是与社会制度无关的客观力量，它们改变市场条件，就像自然力量改变气象条件一样。雇主和雇员的基本社会关系隐蔽在劳动市场的背后。私人劳动只是通过劳动产品的交换才表现为社会劳动的组成部分。结果，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不是如其所是地表现，而是表示为人与人的商品关系和物与物的社会关系。大多数的社会现象都被追溯到商品关系并在商品关系的基础上评价。在宗教世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①] 在经济的世界中，劳动产品——商品——扮演了类似的角色。这种相似性使马克思将物化的基本方面称为**商品拜物教**。

用物化思维的具体例子来证明上述分析是会令人感兴趣的。为此，我选择了奥地利——盎格鲁——美利坚经济学家F. A. 冯·哈耶克的《自由的宪章》。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有感于这样一个事实：哈耶克是一位深孚众望的大经济学家，他远比其他专业同行更对社会问题感兴趣，是著名的人类自由斗士。他的这部著作很受欢迎，他的思想有很多追随者。发现物化自由的局限是十分有趣的。这个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自由人士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八个方面：

---

① K. Marx, *Das Kapital*, Hamburg, 1867, ch. 1 sec. D, 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9页。

1. 由于某种原因，被剥削阶级不满意他们的地位。异化在感觉上成了压迫。哈耶克使用这一术语，也不明白其含义，但他说下面这段话时，他想到的是同样的现象："的确，为了被雇佣者所在社会的一般利益，因面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长期利益，他们应当维护一些条件以使少数独立人士能够达致多数所不能获得的或认为不值得去努力和冒风险的地位；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试图说服被雇佣者并使他们认识到此点，将被证明是一项艰难棘手的工作。"①这的確是一项艰难棘手的工作！

2. "被雇佣者的自由还依赖于数量多且行业不同的雇主的存在，这一点已极为明显，当我们考虑下述假设条件下所发生的情况时尤其如此。这个假设条件即是，社会中只有一个雇主。"② 要增进自由，就是消灭雇主—雇员关系——这是常识性思维够得出的明显结论。雇主的数量必须大大增加，这是物化的资产阶级头脑的结论。换句话说，自由成了选择主人的自由。（见第 4 点）

3. 劳动的异化理所当然是生产者的最自然的状态。"有一点则是毋庸置疑的，即被雇佣不仅变成了人口之多数的实际地位，而是也成了他们所偏爱的地位。这是因为他们发现被雇佣者的地位能够满足他们的主要欲求：获得足够支付日常开支的稳定且确定的收人、工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自动和稳步的增加、而且能够在步人老龄时得到一定的养老金。"③

4. 市场是非个人性的，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并不重要，出卖劳动力是行使自由意志。"所恶者，恰恰不是权力本身——

① F. A. Hayek,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此处中译文引自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7），第 147 页。
② 前引书，第 148 页。
③ 前引书，第 150 页，略有改动。

即实现一个人愿望的能力；真正的恶者只是强制的权力，亦即一个人通过施加损害的威胁而迫使其他人去实现其意志的权力。某个领导者为了实现某项伟大的事业所运用的权力，并无恶可言，因为在这项伟大的事业中，人们将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和为了他们自身的目的而自愿联合起来。"①

5. 服从权威的管理规则被看成是自由意志，对工人团结的坚持则被认为是强制。"工会被允许实施的强制，主要是对同行工人实施的强制，因此我们说它与法制下的各项自由原则相违背，实乃不争之事实，而且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会过分。"②

6. 然而，工会的最致命之罪是他们破坏市场的运行。"即使工会运用其工资政策实际达致的结果，比一般人认为的要少得多，他们在该领域的活动也还是在经济上有害、在政治上极端危险的。工会运用其权力的方式往往使市场制度失去效力……"③

7. 如果市场理性与人类理性出现冲突，后者要为前者让路。"在自由的条件下，那些具有充分工作能力的人所得的不具危险的暂时伤痛，通常都会得到迅速的医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忽视老年人的疾病和绝症的医治为代价的。这种做法看上去颇为残酷，但很可能会'符合所有人的利益'"。④

8. 最后，与我前面对异化条件的分析相一致，哈耶克得出结论："因此，对私有财产的承认是阻止强制的必不可少的条件。"⑤

① 前引书，第165页。
② 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下册）第24页
③ 前引书，第27页，邓译有误，此处据原文改译。
④ 前引书，第63页。略有改动。
⑤ 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上册），第173页。有改动。

哈耶克的另一些言论也会令人产生兴趣。这些言论选自哈耶克的近期著作，是商品拜物教的典型例子。哈耶克承认，“市场机制分解收益和负担的方式在许多时候都不得不认为是非常不公正的，如果它是有意分配给特定人群的结果”，但是，他说，“事实并非如此。那些份额是一种过程的结果。当这一制度最初出现时，这一过程对特定人群的影响既不是任何人有意为之也不是任何人预见到的……对这样一个过程要求公正显然是荒唐的……”换句话说，“在一个个人和团体的地位不是任何人有意识设计结果的自由社会……讨论报酬上的差别是否公正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他的“基本论点”似乎是“在一个自由社会中，社会成员被允许为自己的目的使用他们的知识，‘社会正义’这一概念是完全没有意义或空洞无物的……”结果，对社会正义的寻求，意味着对市场的裁决进行干预，是不可取的，也是无意义的！

物化推理包揽了比上述例子所表明的更大的范围。市场理性和严格的可计算性以一种非常具体的方式塑造了意识的结构。社会意识成了“一维的”，专注于直接给定的事实，沉迷于事实而无法自拔，不能仔细考虑潜在的一切。仅剩下来的一维实际上就是经济维度，即用货币计量的商品生产。其他维度都被压抑了。“西方人”，瓦尔特·韦斯科普夫（Walter Weisskopf）写道，“因此与他的各个部分发生了异化，因为他的存在的多维度性已被简化为技术和经济的维度。西方社会要求个人没有价值的选择（对规范性的压抑），没有意义地工作（精神上的压抑），没有共同体的聚合（对共同体维度的压抑）。人们还可以加上：没有情感的思想（对情感的压抑），没有希望、

没有神话、没有乌托邦的活着（对超越性维度的压抑）。”①

以上关于资本主义物化的讨论大都适用于官僚世界。但物化的根源不同。在官僚世界，物化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市场关系的泛化而是官僚关系的泛化；人不是被简化为一种商品，而是被简化为他所拥有的职位。就连卢卡奇都注意到，官僚制是异化的根源。官僚制引起了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以及作为其结果的意识适应国家主义社会基本条件而进行的调整。这种调整类似于无产者在资本主义中所进行的调整。法律、国家和行政形式上的合理化，意味着社会功能在其诸元素间的类似分解以及劳动与个人能力和工厂运行的分离对意识产生的类似后果。官僚受其角色约束，本身也是自我异化的。但卢卡奇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官僚结构产生的结果更强有力地出现在国家主义（他将它等同于社会主义）中，官僚关系在国家主义中变得更加普遍。

我们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话，以此引入我们的主题。

“我可以做的、职位使我有能力做的以及通过职位成为我自己的东西，就是我——任职者本身。职位的力量有多大，我的力量就有多大。职位的特性就是我的特性、我的本质力量，因为我是任职者。因此，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什么，这决不是由我的个性决定的。就我的个人特点而言，我是跛子，可是职位使我获得了24只脚，因此我不再是跛子。我是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可是职位是受

① W. Weisskopf, *Alienation and Economics*, New York: E. P. Dutton, 1971, p. 190.

人尊敬的，所以，任职者也受尊敬；职位是最高的善，所以，任职者也是善的。此外，职位还使我不必为成为不诚实的人伤脑筋，所以我事先就被认定是诚实的。我是没有头脑的，但职位是万物的头脑，任职者又怎么会没有头脑呢？”①

这段文字描述了国家主义中与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相对应的现象，我主张将这种现象称为**职位拜物教**。

熟悉马克思著作的人对这段话可能感到吃惊。马克思在这段话中描述了职位拜物教，虽然他没有使用这一术语。马克思不是一直专门谈作为异化的首要条件的货币，商品和市场关系吗？的确如此。吃惊是有理由的，我对这段话玩了一点儿小花样，用**职位**、**做**和**任职者**代替了**货币**、**买**和**所有者**。但这段话的意思却完全保留了下来，这说明了马克思对异化的分析同样适用于国家主义社会。

因此，正如商品拜物教倾向于把人与人的关系做是物与物的关系，职位拜物教则将人的实际关系隐蔽在非人的官僚规则的面纱背后，是对任职者活动的一种神秘化。市场的裁判是不会错的，一个官员对其下属的裁判也永远是正确的。拥有某个职位说明任职者更聪明、更诚实、更可靠（在政治上或其他方面）、更有智慧——一言以蔽之，比在职位等级上处于较低位置的人更优越。这种相似性当然可以进一步并列下去。自由市场和官僚结构都有独立的生命，对它们无法进行有意识的控

① K. Marx and F. Engels, *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 Fruhschriften*, (*Leipzig*, 1932), *trans. by Karl Mannheim in Freedom, Power and Democratic Plann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p. 238.

制。这种终极异化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是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无产阶级革命是为建立社会主义而战，结果建立的却是国家主义。

第三节　某些心理的和道德的后果

既然"被物化"意味着获取或被赋予一种物的特性，既然不论其本质是什么，人肯定不是物，人的存在与其潜质间的差别一定会产生非常确定的心理的和道德的后果。结果，整个社会而不仅仅是其个体成员，就成了病态的。米海洛·马尔科维奇总结了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社会的物化特征：

> 当一切生产工具都由一小撮精英所拥有，当生产的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当一切评估标准都倾向于效率，以及作为结果，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达到了最大程度，个人劳动就失去了全部人类特性而变得像动物活动一样，成为重复的、固定的和刻板的。劳动丧失了任何主体的意义，工人成了活的机器，成了物。我们会在政治生活中遇到同样的现象，如果少数特权者垄断了政治权力，实际决策发生在紧闭的门后。群众会议、选举和公开辩论就成了空洞的形式，普通人参与其中却丝毫不起作用，他是纯粹的物。①

资本主义的市场和国家主义的国家毁灭了人类，把个人变

---

① M. Marković, "The Problem of Alienation", p. 29.

成了商品生产者和群众。

在现代条件下，工厂和官僚机构中的异化劳动成了碎裂的劳动。个人只从事总体劳动中细小的、重复的和无意义的片断。他们对总体劳动无法控制。劳动被剥夺了任何内在的回报，它是纯粹工具性的。工人不能决定他自己的劳动，为了生存，他接受分配给他的任何任务。人成了他自己的存在的工具，这使得存在失去了意义。在现代生产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庞然大物面前，个人是无能为力的。他只是某台巨大机器上的一枚螺丝钉而已。在社会上，他没有权力，没有自由，没有自主性。他只有在闲暇时间里才能摆脱其私人存在的束缚，才有希望获得某种人的机能。然而，既然人的机能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这种摆脱终将遇到新的挫折。在商品拜物教和职位拜物教的面纱后面，市场和国家表现为非个人的力量——对神性的现代替代物，使个人完全无助。个人因此被简化成了由他人操纵，由非人的力量主宰的物。一维的思想不能想象多种的可能性。无意义、无能为力和无助，这些泛滥的感觉似乎成了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社会的特征,这些感觉产生了其他三种更深刻的影响。人不可能过一种被剥夺了意义、完全从属于他人、为盲目的社会力量所左右的生活。人会反叛,脱离常轨的行为将会出现。一些人在非人存在的重压下崩溃。因此,这样那样的神经病就可能成为一个高度异化社会的特征性疾病。这就是工人缺乏参与兴趣、公民普遍对政治冷淡的原因。有人试图用前者证明工人并不真想要工人的管理,面此不应该搞这一套。至于后者,人们常常争论说,政治冷淡是政治民主顺利运行的前提.如果每个人都热衷于政治,就不可能出现任何有秩序的政府!

如果每个人都脱离常轨或是完全冷漠，社会是无法运行

的。因此，主要的逃避机制是另一类的，它运行在生产领域和政治领域之外，运行在人感到自在的惟一领域——消费领域和闲暇时间之内。因此，资产阶级和官僚的人都成了一种消费人〈Homo Consumens〉。然而，如果一个人在他的生产角色和政治角色上是异化的，那么他的消费活动大概也将以一种异化的方式出现。实际情况确是如此。

当通往有意义生活的其他道路被阻塞以后，人们试图建立他作为消费者的自尊和自主性。这首先意味着取得和积累物品。人们学会了用他们拥有的交换价值评价他们自己，并“认为他们作为人类通过他们拥有的物的交换价值而拥有了使用价值。”① 一台昂贵的或新型的车、一台彩电、一座避暑别墅、一艘划艇，等等，并不是为了实际需要购买的——不那么贵的或租用的也可以同样、甚至更好地满足需要——而是为了让邻居或客户羡慕。在美国，一个成功的律师应该开卡迪拉克或与之类似的车，因此不成功的律师也被迫开卡迪拉克，否则他有失去客户的危险。一位美国社会学家讲述了一个大银行经理的故事，他没买时髦的车，而是买了便宜的车，这一行动使银行股东失去了对他的信任。某一街区的贫穷阶层的屋里没有电视也要在屋顶上装上天线。在国家主义国家，在一般的官僚机构中，一个人的办公室设施、有司机或没司机的公车、夏季别墅或其他耐用消费品都是社会身份的直接反映，是生活成功的一种量度。人们买他们不读的书、不弹的钢琴、不欣赏——有时甚至根本不看的画。艺术不是提供最深刻人生满足的一种手段，却成了一种身份象征，资本积累手段精心编制的手册指示

---

① Israel, *Alienation*, p. 32.

富人如何投资于艺术，富人买油画，买雕塑，或雇佣专家为他们购买，然后把它们锁在银行的保险箱里。

为了满足被强加的而不是真实的需要，积累物品，这只是异化的消费者的一个方面，也许还不是最重要的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消费主义。消费人

> 是这样一种人，他的主要目标主要不是**拥有**物，而是越来越多地**消费**，以此补偿其内在的空虚、被动、孤独和焦虑。在一个以大企业、大工业、政府和劳动官僚为特征的社会，个人对劳动环境是无能为力的，感受到的是虚弱、孤独、厌倦和焦虑。同时，庞大的消费工业对利润的需要，通过广告的媒介，将他变成了一个贪婪的人、一台要越来越多地消费的永动机……新的、人造的需要创造出来了，人的口味被操纵了……对消费的贪婪……变成了现今工业化社会最重要的心理驱力。消费人处于幸福的幻觉之中，而他在潜意识中却忍受着厌倦和被动……他把刺激和激动误认为是快乐和幸福，把物质上的舒适当作活力；满足贪婪成了新的宗教。消费自由成了人的自由的核心。①

这些行为特点在国家主义社会中更为隐蔽，因为这种社会更加贫困。然而与西方的竞争和统治阶级保持权力的决心——它要求用消费来满足被统治阶级——也一定会在国家主义中造成消费者生活物化。

---

① E. Fromm, "The Application of Humanist Psychoanalysis to Marx's Theory," in E. Fromm, ed., *Socialist Humanism* , New York : Doubleday, 1966, p. 236.

为了运行，社会必须塑造其成员的性格结构，让他们愿意做他们不得不做的事并对强加于他们的条件感到满意。让异化者喜欢他的异化。头脑狭隘而且本身也是由社会塑造的经济学家把异化的消费者至上权当作他们经济理论的基石。然而，社会性格——“任何一种社会为了有用于该社会的运行而塑造的特定的心理能量结构”①，却不仅仅是由消费决定的。因此，我们来讨论某些较重要的、反映着现代异化条件的性格特点。

消费置换了生活，这在社会的价值结构中留下了确定的痕迹并产生了特定的世界观。在西方，世界被看成是一个居住着互相竞争的小生灵的地方，每个小生灵都带着一个大账簿。他们在账簿中细细地记下所有的收入和损失，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最大的净收益。人被简化为会计师，只关心他的净收益——这就是为现代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和大多数社会理论提供了哲学基础的功利主义人类学。由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巨大不一致，功利享乐主义在国家主义中不是显而易见的。在此，人被视为是一种职位的所有者，对国家奉献劳动和忠诚并以此获得许可，享用消费品、荣誉和权力。这里，账簿的政治色彩更为浓厚，但原理都是一样的。

如果等价交换是一切活动的基础，那么每一个人都会从他人中孤立出来，神圣的自我主义变成了基本动力原则。其他人被看成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对他人生活的关注在方法论上是不合理的（两个人的幸福或福利是不可比较的）。在国家主义背景下，这些原则也有所改变。国家决定什么是好的，因此在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时，个人是被隔离的。著名的心理认同现

① 同前书，第231页。

象，个人据此将自己与另一个人的位置联系起来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起着解决自我中心主义与利他主义矛盾的作用，但这种现象未受到重视。利他主义被认为是需要自我牺牲、需要放弃自我的。但不论是私人会计还是国家会计，其簿记生活都不是特别振奋人心或令人满意的。波兰哲学家马列克·弗里兹罕德〈Marek Fritzhand〉在讨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时评论说："生活必须集中、完全，人必须能发展他的所有能力、满足他的一切需要，只有这样，生活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人只有将自己的幸福和完善与他人的幸福和完善联系在一起时才能达到真正的幸福和完善。"① 当前的异化条件一经克服，我们会看到新的道德。"在这个新社会中人类的道德将不是那种把互爱视为责任、把爱视为自我牺牲，与个人实际利益相对立的异化的道德。按照新道德，爱是人的生活的自然现象，是人与他人关系的自我肯定。"②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国家主义社会中，

> 从儿时起，真正的确信就受到了打击。很少有批判的思想，很少有真实的情感，只有与其他人一致，才能将个人从不可忍受的孤独和失落中拯救出来。个人在他自己之外，并不作为他自己力量的承担者感受自我，而他的活体却正是被抛在他自己之外，人是自我异化的，并拜倒在他自己的劳动面前，拜倒在国家和他自己创造的领袖面前。③

① M. Fritzhand, "Marx's Ideal of Man", in Fromm, *Socialist Humanism*, pp. 172-173.
② 引前书，第180页。
③ E. Fromm, *Let Man Prevail*, New York: Socialist Party, 1967, p. 14.

在关于现代社会的一种富有启发意义的分析——《孤独的人群》——中，大卫·李斯曼〈David Riesman〉表明了，看他人眼色行事的人被剥夺了个人的确信和价值，如何成了强迫型人格的人。他是一个完全的服从者，对他人的期望和偏好十分敏感，在心理上受泛滥的焦虑的引导。孤独的人群的国家主义变种是一种官僚机构的集体。集体性的人也承受着永久性的焦虑；他不是社会性地整合入了团体，而是仍然保持着孤独，按标语和指示牌思考、工作。在这两种社会，人都丧失了自发接触的能力，将他们的关系建立在计算好的利害关系的基础上。

E·弗洛姆在他的几部著作中分析了产生上述行为特征的社会机制：既然一个人的个性意识是一个人实践活动的产物，既然在物化的存在的条件〈the conditions of reified existen-ce〉——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受雇于私人和国家——下，这一活动变成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个性异化了。物没有个性。人不再是人，而是采取了他必须（按照别人的期望）有的个性。一旦人丧失了个性，重新获得认同的惟一办法就是顺从。为了被接受，人必须做其他人所做的事情；人不能与众不同；不能置身于标准或教条之外或超越标准或教条；人不能坚持正确的，而只能坚持被期望、被接受和可接受的。大众认为是对的才是对的，国家认为对的才是对的。作为个人，我们只是大众和国家的沧海一粟。我们没有权力、没有分量——没有个性。我们完全依赖于大众的情绪，依赖于国家的命令。任何与被接受的标准的偏差，与党的路线的偏离都创造了一种极端的焦虑感。只有重新建立起顺从，焦虑才能缓解。

如果我们的个人认同的源泉在我们以外，我们就可能沦为

这一外部力量的支配对象。特别是当我们将自己与有势力的主人认同，将我们自己置于他们的权威之下时，我们感到强壮和安全，我们没有了焦虑，甚至感到幸福。这就是我们时代如此流行的权威主义性格结构的起源。作为个人，我是无足轻重的，但作为某种大的东西——国家、民族、党——的一部分，我也就变大了。因此，为了防止我们自己的退化，我必须捍卫权威。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在越南、阿尔及尔和葡萄牙人的非洲展示了顽强性的殖民主义，反映了权威性性格结构的某些后果。

权威主义的社会结构，国家主义社会特别具有此种特征，自然会形成权威主义的意识结构。而后者又产生了一种个性结构，按拉德·波雅诺维奇（Rade Bojanovic）的说法，这种个性结构有下列特点：谦恭，尊重等级关系，反对主体性和想象，尊重权力、纪律和权威，僵化思维，热衷于教条。这些社会的物化程度可由下列事实得到说明：在党的手册中，上述特征被说成是革命个性的突出表现。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只要对术语做一点改变就可以了。我们不用波雅诺维奇的术语，而是用他的术语的同义词来替换："责任"代"顺从"，"民主集中制"代"官僚等级制"，"小资产阶级主观性"代"情感和想象"，"革命纪律"代"对上级的无条件服从"，"党的路线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代"不加思考"。

波雅诺维奇接着说，"权威主义的思维方式，要求被完全纳入到集体关系或等级关系之中。它完全否定独立性和个体性。这些人耻于谈论个人……逃避人的个性……逃避个体性

……是权威主义个性的基础。"①

只要人的个性的统一性受到了某种程度的破坏，某些部分异化，一种特别的、可以被称做"两面人"（Homo duplex）的现象就会出现。同一个人既是服从权威性的规则的生产者，也是自由的消费者。同一个人在他的私人角色上是一个温柔的父亲，但在官方的角色上，他是一个残酷谋杀其他孩子的人。例如，在他"戡乱"时就是如此。只要有权威发布命令，完全理性的人可以麻木不仁地犯下任何兽行。私人的思想和官方的声明往往是不一致的。还有很多。虽然两面人也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但他更是国家主义的特征。这是因为，在统治阶级公开宣称的社会主义理想与统治阶级的实际社会实践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因此，言语与行动常常（而不是偶然）脱离。结果之一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语言现象，词语有了双重含义：语言学上的含义和实际的含义。为了顺利交流，人必须对这两种含义都有了解。两面人说着这种特别的语言，这直接反映了实际意义与表象的疏离。上面的例子说明了消极性格特征是如何被翻译成积极特征的，把服从称为责任，等级称为民主集中制，对权力和权威的尊重被称为革命纪律。同样，军事占领（例如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被称为"对兄弟国家人民的友好援助"或"团结互助"（例如越南对柬埔寨的"干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意味着无条件地服从苏联，而真正的国际主义则成了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主义"。道德价值受到了攻击，诚实成了"机会主义"，正人君子是"小资产阶级"。对同胞公民的谩骂是爱国主义，当间谍是光荣。政治机会主义和道德沦丧被称为

① "Zimski filozofski susreti, Tara 1972," *Filozofija*, 1972.

"阶级方法"、"行政措施"意味着镇压（例如不合程序的监禁）"革命法制"意味着无法无天。"进步的"或"反动的"是指对苏联国家的态度。当前的政治观点是科学的标准，而苏联国家的实用主义措施成了"客观历史规律"。因为"同志"意味着加入统治党、获得高位和放弃了同志关系。"我们"实际上是指"他们"。两条大标语在莫斯科大街上互依互靠："一切权力归人民"和"按党的指示办事"。逻辑上的一致性要求将第二条标语改写为"党按我们的指示办事"。既然这种改变未能出现，逻辑的一致性只能通过改变第一条标语的意义来实现："一切权力属于党，党代表人民。"这种道德—政治的异化俯拾即是，但上述两面性的例子已足够说明问题。

没有别的地方像国家主义那样官、私分明，也没有任何地方像国家主义那样，自发的社会关系完全毁灭，社会分解成了孤立的个人。南斯拉夫哲学家弗拉尼基（Vranicki）评论说，"人也许能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他的异化条件，但结果是他的个性与其本身分离，形成了两面人。作为人，他不感觉自己是一个较大的共同体的一部分。作为一种官方的存在，他不感觉自己是人。"①

我们已接近了我们研究的终点。两大阶级社会都是严重异化的。结果，人与人的关系消失了，被物和功能所取代。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生灵都是商品人和职位人。这些物化的生命以一种物化的方式思想、行动，进入物化的关系。他们的生命目标不是发展个性，尽可能充分地享受生活，而是积累和命令。换言之，目标不是是而是有——物和职位。他们无法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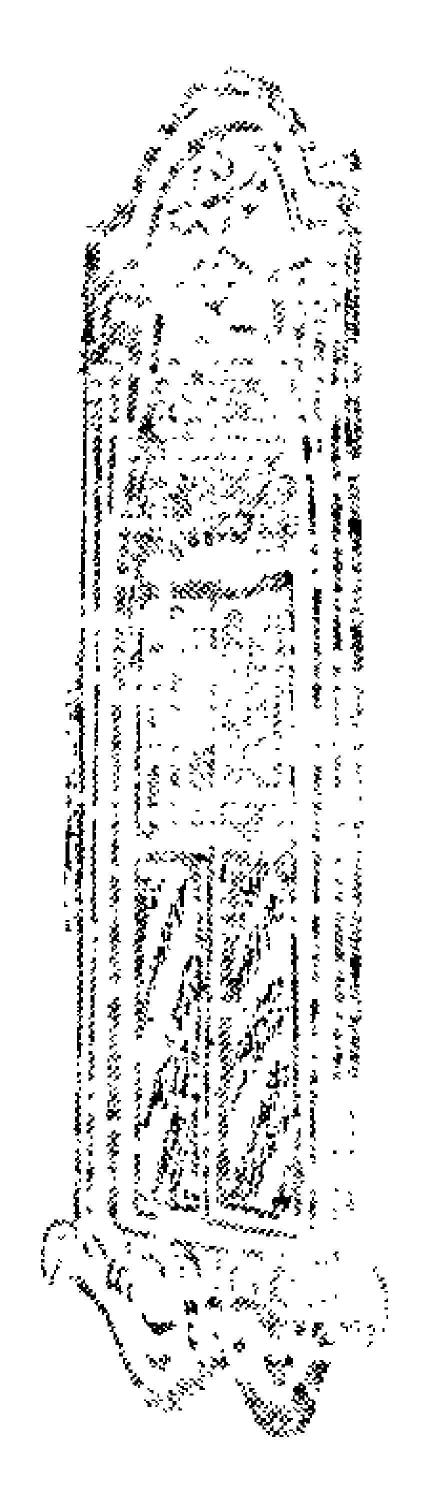
① P. Vranicki, "Soci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Alienation", in Fromm, *Socialist Humanism*, p. 303.

自发性的人类联系：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连着货币——甚至可以说货币与货币共舞；在国家主义社会，职位连着职位。总之，都不是人连着人。“在这一阶段，问题不再是人怎样不损人而利己，而是人怎样不损己而利己。怎样通过他的追求和满足，不再复制他对那种在使他的需要得到满足的同时永续他的奴役的剥削机器的依附？自由社会的出现将以这样一种事实为标志：福利的增加变成了本质上全新的生活质量……社会有机体不再能够对支配下的福利所要求的竞争表现进行调整，不再能容忍现有的生活方式的进攻性、兽性和丑陋。而自由将成为这样一个有机体的运行环境。”①

① H. Marcuse, *An Essay on Libera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p. 14.

第2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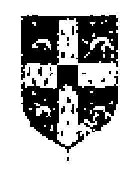
寻求另一种模式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人民的需要的程度……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一切关系**。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 年）



第5章

历史实验室：孕育中的新社会制度

第一节　导　论

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非常不完美的。我们可以试图改变它。如果我们要改变世界，自然要遵循下面的方法：首先，我们设计一个消除了现存社会明显罪恶的美好社会的蓝图；其次，我们在社会事务方面引进国民中央计划；最后，我们要求社会成员按照设计的规则提高他们的福利或幸福。这就是为什么贯穿社会主义思想史中鲜明的中央集权导向的原因：从乌托邦社会主义阶段的托马斯·莫尔（1478～1535）和托马斯·康帕内拉（1568～1639），到昂利·克劳德·圣西门（1760～1835）和

埃蒂耶纳·卡贝（1788～1856）；从19世纪的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民主党，到试图将这种思想付诸实施的第二个阶段的列宁、共产国际和20世纪的共产党。

只是到了很晚之后，在19世纪，联系到自由资本主义出现，社会改革者才开始怀疑中央集权的理想。如果美好社会意味着每一个人的最大自由，那么很清楚，消灭国家和完全的分权化，应该是人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威廉·葛德文（1756～1836）、一定程度上的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米哈伊尔·巴枯宁（1814～1876）、彼得·克鲁鲍特金王子（1842～1921）和现代无政府主义者，发展了这一条思想路线。

到目前为止，无政府主义者未能在民族范围实现他们的思想，所以，他们的教诲可以被认为仍然属于乌托邦阶段。中央集权主义者或国家社会主义者，在若干场合取得了胜利。然而，他们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却和所期望的相距甚远：代替社会主义的是国家主义。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虽然不是完全一样，中央集权主义倾向就是精英统治论。如果你知道什么对人民是好的，你有权告诉他们应当怎样去做。圣西门——就像柏拉图一样——相信知识应当统治，工业家是劳苦大众的当然统治者（在这里，他和柏拉图不同。因为哲学家在工业的布景下看起来没有太大的用途）。列宁和现代共产主义者把所有的权力授予先锋政党，这个政党被期望领导觉悟不高的大众走向更好的社会。在一个有着很高文盲率的落后国家里——这只是阻碍发展的一个方面——精英统治可能很有意义。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愿的善意和在最终理智引导下的个人对正义的判

断力。

有关社会主义思想分歧的第三个方面涉及到实现新社会的手段。在 19 世纪上半叶，工会当时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里是非法的组织，在这些国家里，也没有普选权。工人阶级受到野蛮的剥削和遭受资本主义强加给他们的不必要的苦难。相信统治阶级会自动地放弃特权地位，允许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这是没有希望的天真想法。因此，实现社会改革的惟一现实的方法是，用暴力手段强迫统治阶级进行变革，或者通过被剥削群众爆发革命能量的致命一击，推翻整个制度。事实上，19 世纪的欧洲经历了无数次的起义、暴动和社会革命。第一个革命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是格拉古·巴贝夫（1760～1797）和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由于激进的社会改革的合法手段被禁止，就不得不使用非法的手段。小的、组织得很好的阴谋团体，代表着一个觉悟的少数，将夺取政权，并带领被剥削群众为推翻现存的剥削秩序而斗争。之后，minorité consciente（少数觉悟者）的原则，为革命的工团主义者所普遍地接受。在其成熟的形式上，这一原则被详细阐述成为一个准备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秘密的）工人政党的理论。俄国的十月革命代表了这一理论的最成功的运用。齐·格瓦拉和拉丁美洲的图帕莫里斯（Tupámaros）是更原始样式的布朗基主义的最后实践者。还要指出，某些无政府主义者的团体——他们和社会主义毫无关系——相信暴力的必要性。他们热衷于个人的恐怖主义，从事“用行动来说话”。

在上一个世纪的下半叶，政治自由在欧洲的发达国家广泛发展，工会合法化，第一个出现了大规模的工人政党。和平地改造社会似乎是可能的了。很快地，为了与早期的暴力革命的

意识形态区分开来，诞生了和平的改良主义思想。路易·勃朗（1811～1882）和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就是第一次企图依靠国家进行改革的实践政治家中的代表。甚至是到了晚年的恩格斯也成为一个深信不疑的改革主义者（至少在关系到德国的时候，虽然他认识到在某些其它国家可能存在革命的需要）：“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的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① 在历史的惰性推动下，虽然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继续表白忠于暴力革命的思想，但是他们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者。更有甚者，他们成为权力机构的重要部分。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所有的社会民主党都毫无例外地在议会上投战争赞成票，以支持他们民族的资产阶级的战争叫嚣②，这明显是与他们所表白的社会主义思想背道而驰的。结果是，在世界工人阶级运动中出现了分裂。一个新的共产国际出现了，改良主义者被宣布为叛徒，并且暴力革命再一次地被宣布为社会主义信仰惟一可以接受的原则。因此，排斥性的改良或是革命的坚决主张是区分社

---

① 引自1895年写的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5年版，第22卷，第610页）。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为评价他的朋友和他的思想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关于他们对1848年革命的期望，恩格斯这样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9年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同上，第597－598）他继续讲道，斗争的条件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同上，第603页）他认为，德国的工人应当把选举权由欺骗的工具变成为解放的工具。这会导致无产阶级的崭新的斗争方式。“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同上，第603页）

② 只有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人、俄国社会主义者和爱尔兰工会代表大会公然反对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美国社会主义党和意大利社会主义党也是如此。（美国和意大利是稍后些参加战争的）

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的根本标志。苦难的政治斗争继之而起，并且在斗争中，两种方法变成了信仰的教义，完全脱离了使这种或那种方法可能更有适用意义的历史环境。当在"激进的"和"渐近的"或"进步的"和"反动的"意义上频繁地使用革命主义的和改良主义的这对流行的术语时，混淆进一步提高了。希腊的独裁政府称自己是"革命的"，而瑞典的政府毫不迟疑地用"改良主义"这个词来形容它的性质。

这三种相互对立的理论和战术——集权对分权、由少数精英统制国家对无政府（在其原始的意义上是指没有政府的社会）、革命对改良——反映了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错了再试的发展历程。Ex ante（事前），所有这6个天真的和极端的对立的传统似乎是非常自然的试验过程；ex post（事后），经历2个世纪的实验之后，它们没有一个能实现宣布的目标。很清楚，需要一个更为精练的理论。虽然不是以折衷的方式，但这个理论将非常可能把6个对立的传统包含进去。在这一方面，发现历史能教给我们以什么样的教诲，是非常重要的。

本章下面的内容，不是要试图提供一部充满着迂回的、失败的、受挫折的和错误观点的社会主义简史，而仅仅是要从这样一种不加区别的历史中蒸馏出那些似乎导向作为自治社会的社会主义设计的思想观点和发展。

在建设一个自治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识别出四次重大事件发展的浪潮——它们部分的是相继而起的，部分的是彼此相互叠加的。首先出现的是空想家，他们关于一个美好社会的概念，虽然在立即实现的意义上是乌托邦，但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变成了现实的和有意义的。其次，人民组织起来，出现了

社会运动。第三次浪潮产生了建立一个新社会的实际企图。最后，一个新的制度正在逐渐地建设中。

第二节 空想家

18世纪的后半段，已经明显地看到一个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来临。新社会产生了新的阶级斗争。很快地，被剥削阶级就有了自己的第一批知识分子辩护者。不能确定他们是被剥削阶级的非常自觉的辩护者——因为，正像恩格斯所观察的那样，他们宣布不是要解放某一特定的阶级，而是要立即解放全人类。他们中间的最非凡的人物都是来自于当时的最发达国家——英国和法国。

罗伯特·欧文（1771～1858），第一个、也许是最杰出的改革者，设计的未来社会是一种由生产者治理的合作公社的联邦。他的基本观点来自于约翰·贝勒斯（John Bellers）。后者是一个教友派信徒，他在1696年提倡建立一个工业学校，在这里，穷人可以共享他们的努力，不是为富人而是为自己而工作。这个学校或公司，将包括300名从事各种有用行业的劳动者，并且用劳动而不是货币作为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值。贝勒斯的主要目的是使失业者进行工作。

欧文是威尔士一个贫穷的铁匠的儿子，在很小的年纪就开始工作。他的思想是在苏格兰新拉纳克镇上一家较大的棉纺厂当经理的20年间发展起来的。在此期间，他在这里改善了他的工人们的住房，组织他们的子女接受教育，把劳动时间从14个小时缩减至10个半小时，废除了童工，创立一种形式的失业保险，并且使他的工人们大致不差地预先享受了一个世纪

以后工人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的待遇。1824 年，欧文去了美国，在印第安纳州买了一块地，建立了新和谐村，第一个实验性的合作村。它的性质有点像当代以色列的开布茨。实验并不成功，但在以后的几年里，成立了 18 个公社。欧文让他的儿子们留在了新和谐村，自已返回英国，在那里，他开始参加工会运动。这个运动刚刚非法地出现，并且开始刺激生产合作社的形成。欧文的思想鼓舞了合作运动，不久以后，在 1844 年，他的信徒们成立了罗奇代尔先锋合作社。在此期间，欧文为刚成立不久的建筑工人联合会设计了通过一个建筑工人基尔特全国大联盟接管整个建筑行业以消灭私人承包商的计划—未来的法国的工团主义和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计划的前兆。在 1833～1834 年，成立了全国统一工会大联盟，其目的是团结整个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实行直接的攻击，并以一种工人管理的体制取而代之。然而，雇主们和政府很快就进行了反击，几个月后，欧文的工会主义的末日来临了。[①] 甚至在他被击败之后，曾经备受欢迎的"慈善家欧文先生"，这是上流社会对他的普遍知道的称号，就被逐出了"有教养的社会"，并且冠之以企图推翻教会和国家的阴险分子的称呼。临死时，他躺在病床上，对来看他的大臣说，他的思想之所以没有被接受，是因为人们并不理解它，是因为他是先于他的时代而来的。

沙尔·傅立叶（1772～1837）来自一个中产阶级的商人家庭，他本人也是一个店员和旅行推销员。他生活在工业化尚未充分发展的环境中，所以更强调农业的合理组织。与欧文相

---

① G. D. H. Cole,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 Movement 1789–1947*,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038, ch. 4, secs. 3, 4.

反，傅立叶相信，人的本性是不变的。所以，必须创造出符合人类本性的社会环境。为此，最好的组织是自治的**法伦斯泰尔**。它是由大约1600个劳动者所组成的，在5000英亩的土地上耕作。因为农业上的所有的坏事都是土地的私有制造成的，所以，在法伦斯泰尔中，土地必须集体化。为了消除城乡之间的差距，工业机构应当分散在和坐落于农业的法伦斯泰尔之中。工作由一种受饥饿的恐惧而驱使的不愉快的活动变成了非常吸引人的，这是通过按着各自的兴趣把工人们编成工作小组并且经常轮换工作而实现的。另外，雇佣劳动被废除了。一个法伦斯泰尔的收入用来支付生产的成本和一般的社会管理费用（食宿、医疗和教育）。剩余的部分成为才能、资本和劳动的报酬。一个个分散的法伦斯泰尔是在一个被称作万能的独裁者〈an omniarch〉的协调统治下结成联邦的。

傅立叶非常关心个人的自由。法国大革命宣布了政治自由，但是并没有为穷人提供可以利用它的物质工具。当一个穷人表达了与富人相反的观点时，即使他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他也将受到迫害。如果自由不是普遍的，那它就是虚假的。如果人们在经济上依赖着他人，那就没有充分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法伦斯泰尔保证劳动的权利和为其成员提供物资保障的原因。一旦完成这些之后，国家将消亡，因为对立的利害关系的消失将使强制成为不必要的了。对傅立叶来说，社会组织的悲惨状况来源于人类的愚蠢。当他们发现了真理之后，未来的一代将会为他们的极大幸福而感激他。

傅立叶登广告，把建立法伦斯泰尔的希望寄托在富有的慈善家们的乐善好施上。他每天中午坐在饭馆的餐桌旁等待着他们的来临。但没有一个人来过。然而，在他死后，他的门徒们

的确筹集到了钱，并且建立了许多的合作公社。它们大多数都在美国，因为这里的社会气氛特别适合于进行这种冒险。在 1843～1853 年之间，建立了 40 个法伦斯泰尔。在欧文的公社里，收入是按相等的份额分配的；而在傅立叶的公社里，带来更多资本的成员，或显示出更有能力的成员，所得的份额更多。两种公社以相同的速度瓦解。最成功的生存了 10 年左右。①

另一个法国人，**路易·勃朗**（1811－1882），一个律师和新闻记者，决定探索另一种可能性。作为稳健的和非暴力主义者，勃朗认为，国家可以被用来作为社会改革的工具。在其著名的著作《劳动的组织》（1840 年）一书中，他争辩道，只有国家才能保护社会的弱小者。关键的产业、银行、保险和铁路都应该国有化。国家必须承担调节国民生产的任务，和在最重要的产业部门中为创立 ateliers nationaux—国民工场—提供资本。国民工场的经理在第一年是由国家指派的，以后由工人民主选举产生。国家投入的资本不应该获取利润，而只能获得利息。勃朗指责了傅立叶主义有资本主义成份，因为傅立叶允诺在他的法伦斯泰尔里资本在劳动产品中享有一个永久的份额。在开始的阶段，收入分配是不平等的。然后逐渐越来越平等。勃朗的理想是建立这样一个平等的社会，在这里，个人的利益被融入到普遍的利益中。他把这种普遍的利益总结为：á chacun selon ses besoins, de chacun selon ses facultés（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他的这一思想后来经马克思之手，成为共产主义著

① A. Austin, *The Labor Story: A Popular History of American Labor (1786－1949)*, New York: Coward－McCann, 1966, ch. 4. 一个很好的对傅立叶的一般研究，见 O. Blagojevic, *Charles Fourier* (Niš, Univerzitet u Nišu).

名的公式。国民工场应当在民族范围内建立一种真正的博爱，然后，通过逐渐的改进，转变成为一种国际关系，和一种仁慈的和平组织。1848年革命使勃朗出乎意料地进入临时政府。他的同僚们并不喜欢他的计划，之所以容忍他留在政府，仅仅是因为希望他能使工人们保持安静。不久，他被骗离了政府，去当“政府劳动委员会”即卢森堡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的任务是研究工人问题并提出对策报告。傅立叶的大弟子，维克多·孔西德朗，也在该委员会任职。不用说，这个委员会既无权力也无财力。在1848年3月的一次演讲中，勃朗号召实现一个真正的社会革命，以实现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即“de produire selon ses forces et de consommer selon ses besoins”（按能力生产，按需要消费）。① 勃朗领导的委员会起草了一个法律草案，该草案规定了所有利润的四分之一作为互助储备基金被保留下来，以便在社会需要时使用。以这种方法，相当大数量的资本将被积累起来——这种资本不是属于任何个人，而是属于所有的人，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将对这种资本的分配进行控制。② 就在此时，政府开始了自己的行动。政府所创立的类似救济机构的国民工场确是对布朗国民工场计划的极大讽刺。因为这个工厂将失业工人集中起来从事毫无意义的劳动或完全不劳动，其主要目的是在当时骚动的日子里使工人们远离街头。在议会否决了布朗提出的成立劳动部的提议之后，他的委员会被解散。就在1848年同一年，他本人被宣判驱逐出境。20多年后，他才回来。

---

① S. Vidalenc, *Louis Blanc* (*1811 - 1882*), Paris: press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1948, p. 37.

② Ibid., pp. 38 - 39.

当勃朗成为临时政府的成员时，另一位合作主义者，菲力蒲·布齐兹（Philippe Buchez）（1796～1865），成为制宪议会的主席，虽然他很快就从这一职务上被撤了下来。布齐兹，一个内科医生，预先实践了勃朗的主要思想。他在1831年成立了“木工协会”，它是以后的生产者合作社的雏形。布齐兹相信，这个协会是在旧社会的母体中分娩新社会的催生剂。[①] 他在宗教和社会进步之间充当调解人，因此，启动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发展。

路易·勃朗要求实行普选以使工人强迫国家建立国民工场。受勃朗的影响，德国工人领袖斐迪南·拉萨尔在19世纪60年代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拉萨尔希望国家提供资本和贷款，帮助工人组织生产合作社，消灭雇主们，和工人自己占有他们集体生产的全部产品。

法国自我管理的工厂的出现，以及路易·勃朗的著作，影响到了一些英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他们成立了“促进劳动者联盟协会”，并成功地建立了几个工场。在匈牙利，勃朗思想的追随者，约瑟夫·克里陶维克（Jozsef Kritovics），提倡引进成年人的普选制，和建立由国家提供最初资本的国民工场。在1860年以后，拉萨尔对匈牙利的影响相当大。所有这些发展都受到了马克思的严厉的批判。马克思认为，想要靠资产阶级国家来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背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是对的，这一点已被勃朗和拉萨尔的彻底失败充分地证明了。然而，在差不多一个多世纪之后，智利政府为自治的农业合作社提供资本，秘鲁政府也为工人管

---

① G. D. H. Cole, *Socialist Thought*, London: Macmillan, 1953, vol. I: *The Forerunners* 1789 - 1850, pp. 177 - 178.

理的乡镇企业和工业企业提供资本。勃朗的在工业委员会管理下的互助储备基金，以相同的名称被引入到南斯拉夫的经济之中，用来弥补遭遇困难的集体的损失。

自我管理的社会的全景第一次在**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的多产的著作中得到展现。蒲鲁东出生在贝桑松，傅立叶出生的地方。在空想家们中间，蒲鲁东是惟一的无产阶级。他极有天分，但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他的父亲是个木桶匠和啤酒厂的雇工，他的母亲是个农妇。蒲鲁东在一个印刷厂做学徒，成为排字工人。他是通过学习他校对的著作而自学成材的。之后，他自学了簿记，并开始了各种商业的冒险活动。作为里昂的一个年轻的印刷工，他为新版的傅立叶的主要著作 Le nouveau monde industrial〈《经济和谐的新世界》〉(1829年）排字。1848的年革命，把蒲鲁东和布齐兹、勃朗和孔西德朗一起送进了国民议会。但是，蒲鲁东的政治活动很快就使他被关进了监狱。在监狱里，他呆了好几年。在1858年发表 De la justice dans la revolution et dansl'église〈《论革命和宗教中的正义》〉一书后，蒲鲁东被指责为“攻击家庭的神圣，强暴公共的和宗教的道德，蔑视法律”。为了避免迫害，蒲鲁东移居比利时，在那里一直呆到1862年。

和傅立叶一样，蒲鲁东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完成法国大革命未曾完成的工作。他认为，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只局限于政治改革，自由和平等必须被推广到经济领域中去，以建立**经济民主**。和傅立叶一样，蒲鲁东是从人的本性推出他的美好的社会的。最高的原则是**正义**。正义和劳动一起，代表着人类不可改变的本性。**自由和平等**是从正义原则中推导出来的，自由是正义的基本前提。因此，社会秩序应该建立在

使每一个人享有充分的自由基础上。所有的人，由于同样的原因和渴望保持尊严，在正义面前是平等的。觉悟的发展最终决定了社会发展和人们之间关系的发展步伐。当一个人知道了他的真实的本性，外部的维持纪律的强制将成为不必要的。如果财产大体上平均地分配，人们可以在不存在权威国家的社会里互助合作。废除国家的途径是把它融解到经济组织之中和通过把所有权力移交给社团这个地方单位而使权力分散化。在这两个方面，主要的工具是建立在互助的正义基础上的契约，它防止对任何人的自由的侵犯。这意味着每一个人是自愿和自由地与他人签订契约的，这种契约是在自由的谈判的基础上订立的。

建立在这种自愿契约基础上的经济组织将导致 Mutuellisme（互助主义），即平等的交换，贸易条件的平等化，和在保存个人自由基础上的平等合作。为平等交换提供保障的负责机构是 the Banque d'échange（交换银行），蒲鲁东社会里惟一存在的中央经济机构。交换银行的任务是决定产品的劳动价值，并发给生产者以相应的凭证（这使我们想起了欧文、反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约翰·格雷（1799～1850）和 J. F·布雷（1809～1895）已经提倡的古老而又天真的劳动货币的思想。这种思想在 1936～1938 年的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的集体中，在柬埔寨革命以后，和在其它地方，得到了复兴）。货币将不存在，而信用将被限制在这样的范围，"在这里，交换的一方立即让渡产品，而另一方分几次付款获得它，所有的情况下，都没有利息"。[①] 由于生产是按照消费者的订单来进行的，所以，供求将是平衡

① Quoted from R. L. Pavićević, *Drzava kao federacija komuna*, Belgrade: institut za meotunarodni radnički pokret, 1969, p. 96.

的。大的生产性私有财产与互助的正义相矛盾，因而应该被废除，但小的私有财产可以被接收。当技术条件需要使用大量的劳动时，私有财产应当被工人联合体的集体财产所代替。工人将在订立各自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上组成企业。最初的资本是由交换银行提供的。当一个工人离开企业时，他将带走与他的过去的劳动相等数量的货币。单个生产者和联合体在契约的基础上形成行业联邦，后者又以联邦的形式组成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将是一个工农业的联合体。与路易·勃朗的公式相反，反映平等交换的互助的正义，要求按照服务的比率对劳动支付报酬。

互助主义在政治领域表现为联邦主义。一定数量的家庭在契约的基础上结成社团，后者又以联邦的形式组成省和国家。中央组织的决策只有被社团接受时才具有强制性。蒲鲁东认为，传统的通过代表的民主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它通行的多数人原则会限制少数人的自由。而且，没有人可以真正地代表其他人。因此，所有的人都应参与政治决策。在社会的政治组织中不存在等级制。最重要的中央政治组织是联邦议会，它由各省的代表组成，后者同时又是社团的代表。议会代表选举执行委员会，它的主要任务是执行联邦议会的决议。在公民充分享有他们权利的社会里，政党是多余的。总之，新的社会次序将在经济互助主义和政治联邦主义的基础上形成。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没有非劳动收人和剥削，不存社会阶级，社会革命完成了。通过互助主义而产生了各个个人利益之间的均衡，代表着一种新的、无需强制便可维持的社会秩序。从一个世纪以后的观点来看，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蒲鲁东的观点是现代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未来的——自我管理的社会

的不同凡响的前奏。蒲鲁东接触到了这个社会的所有的重要方面。但是，他对问题的处理却是无可救药的天真、混乱和经常充满了非常明显的错误。劳动货币的思想在经济上是站不住脚的，交换银行的成立之日，也就是它的破产之时。集体所有制与以劳动为惟一基础的收入是不相一致的，免费的信贷也是如此。供求的均衡，比蒲鲁东曾经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自由的谈判，并不能自动地消除不平等和政治权力的滥用，等等。蒲鲁东的解决方案之所以是不合时宜的或错误的，部分是因为在 19 世纪中期的环境中，要解决 20 世纪社会的问题，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有许多至少可以避免的错误，部分是因为他的无知和缺乏系统的训练，这种情况也是真的。蒲鲁东是在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背景下广泛地讨论了经济学、政治组织、哲学和法律的各种问题的。因此，丝毫也不奇怪，马克思是首先和直言不讳地批判蒲鲁东的人之一。开始时，马克思和蒲鲁东是朋友，他们有共同的观点，如国家的消亡，消灭非劳动所得和剥削，消除货币，和建立无阶级的社会，等等。但是，马克思，一个极为博学多才的人，很快便发现蒲鲁东在专业上的无知和在智力上的傲慢（一种经常伴随无知而出现的品质），彻底被激怒了。在 1847 年，马克思用一本书的厚度（《哲学的贫困》）来批判蒲鲁东的观点，特别是他在一年以前发表的《贫困的哲学》一书中所表达的观点。马克思指责蒲鲁东不是把经济范畴看作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把它看作永恒的观念。他发现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他正在进行对它的批判——的知识，是支离破碎的和完全不够的。在蒲鲁东死后的 1865 年，马克思在应《社会民主党人报》之邀而写的一篇评价蒲鲁东的文章中，这

样尖刻地描写蒲鲁东："（以）自吹自擂的、大言不惭的语调，特别是总是以极其无聊地胡扯'科学'……这伴随着自学者炫耀自己学问的极为笨拙而令人讨厌的伎俩。"① 通过"胡扯科学"，蒲鲁东还制造了"科学的社会主义"这一著名的术语。

马克思在蒲鲁东的混乱的业余水平的著作中所发现的错误，必是感染了其他的很少受过训练的人们——另外，当然是受他思想内在的价值的感召。在19世纪50～60年代，蒲鲁东的影响在巴黎的工人运动中占主导。在第一国际的早期阶段，蒲鲁东主义者控制着法国支部。法国的合作运动和工会运动同样受他的思想的影响。1871年的巴黎公社，受蒲鲁东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支配，前者负责制定公社在经济方面的种种法令。蒲鲁东也是第一个制造**无政府主义**这个词的人②，他在无政府主义者中间有非常大的国际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中也能发现蒲鲁东的思想。记录蒲鲁东主义在一个世纪之后、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的复活，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虽然在南斯拉夫，没有人知道蒲鲁东——除了被马克思彻底否定了的观点外，但20世纪60～70年代的官方指导思想和制度改革方案却明显地与蒲鲁东思想的某些方

---

① 蒲鲁东的综合症——无知加自大——经常可以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被发现，所以，值得增加点篇幅评论一下。约瑟夫·熊彼得在讨论蒲鲁东的经济学时评论道："我们只是对于他的经济学感兴趣，因为它为在一个没有威望的科学中不幸经常遇到的一种类型的推理提供了一个绝妙的例子：这种类型的推理，由于完全没有能力进行分析，也就是说，由于完全没有能力去使用经济理论的工具，而达到了无疑是悖理的、并且为作者所完全承认是悖理的结果。但是作者不是由此推论说，在他的方法上可能有某种错误，反而推论说，他所研究的对象一定有某种错误，以致他的错误被以极大的自信心宣布为得出的结果。……他提不出一种可以运用的市场价值理论。但他得出的结论不是'我是一个蠢人'，而是'价值是极端愚蠢的'。"（*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 457）为了正确地了解蒲鲁东的复杂的品性，最好还要了解他持有的某些奇怪的反动观点，例如，反犹太主义和在美国奴隶问题上对南方持同情态度；他还认为，妇女是低人一等的，种族之间的不平等是与生俱来的。

② G. D. H. Cole, *Socialist Thought*, London: Macmillan, 1953, vol. I: p. 202.

面极其相似。企业被设计成为建立在工人们之间的契约基础上的一种联合体。联合体之间的谈判，反映了更高水平的互助主义。反映局部利益的谈判结果，被称作 samoupravno sporazumijevanje（自我管理的协议）；当谈判反映的是普遍的利益，并涉及到国家权力机构时，它被称作 društveno dogovaranje（社会条约）。“过去劳动的权力”，由宣布除现行工资外工人与企业的资本休戚相关的宪法得以保障。在政治思想上，国家和政党的消亡是作为一种目标而被接受的。联邦主义是政治组织的基本原则。公社享有很大程度的自治。规模相对小的联邦州至少在原则上仍然保留着主权。联邦政府是议会的一个执行委员会，而且它就是这样称呼的。在各州对某一特殊的决定未同意之前，政府不能行动。直接选举的代表被劳动共同体和地方政治团体代表所代替。

蒲鲁东去世后——19 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开始之时——设计乌托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要解决的问题是紧迫的和具有非常实际的性质。然而，乌托邦的计划和思想仍然在继续存在着。两本有趣的书值得简要地提一下：W·莫里斯的《来自无名地的新闻》(1891 年)和 T·的赫兹卡的《自由之地》(1890 年)。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一个艺术家和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活跃人物，在其书中——正像他的书的题目所表示的那样——描述了一种他感觉更像是在家里的社会：代替工人们在异化的环境下为市场而生产的是，制造的每一件东西，应该“既使制造者喜悦，又使消费者喜悦”。[1] 当足够数目的人们的思想得到改造，并领导群众向自由联合体前

---

① William Morris, *News from Nowhere or an Epoch of Rest, Being some Chapter from a Utopian Romance*, London: Macmillan, 1967, vol. II: *Marxism and Anarchism*, p. 420.

进之时，国家将会消亡。社会和经济生活将建立在相对较小的团体的自发行为的基础上。

桑德尔·赫兹卡（Theodor Hertzka）（1845～1924），出生在布达佩斯的奥地利犹太人和记者，是在大批英国—法国空想家们中的惟一的外国人。像其他社会主义者一样，赫兹卡也憎恨资本主义，但他认为，摧毁资本主义的方法，既不是发动暴力革命，也不是乞求政府发动改革。前者使他感到讨厌，后者他认为没有用。他将带领一组开拓者进入仍然没有被资本主义感染的地方——在他的小说《自由之地》中，他选择了肯尼亚高地——建立一个新型的自治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劳动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将消除所有的非劳动收入和剥削；每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工作；因为收益递减，将导致收入分配均等化和消灭了租金和利润；各个经济单位依靠社会提供无偿的信用进行结算，这就消灭了利息；自由之地的繁荣昌盛将使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地采取同样的制度。不用说赫兹卡的经济学和政治学是十分天真的，但就他坚持完全竞争作为社会组织的工具之一而言，赫兹卡预示了下个世纪出现的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1893年，赫兹卡宣布开始第一次自由之地的远征，准备第二年由汉堡到非洲的航行。但这个计划由于英国当局拒绝为其发放去肯尼亚的签证而夭折。在他的最后的日子里，赫兹卡吸引了相当数量的追随者，他们中间主要是知识分子。许多的自由之地联合体在欧洲大陆国家、英国和美国成立。据说，赫兹卡的书对澳大利亚的劳动党领袖威廉·雷尼（William Lane）有影响。后者率领500名开拓者来到巴拉圭，并于1893年在那里建立了新澳大利亚殖民地。6年之后，内讧和恶劣的气候使这次实验结束。

空想家们清理了场地，他们提供了概念的框架，他们或他们的追随者甚至发明了社会主义这个词。正是在1827年的11月，欧文的信徒在英格兰创立的《合作杂志》中，首先使用了Communionists〈公会主义者〉和Socialists〈社会主义者〉这样的概念来形容欧文思想的追随者，因为对欧文本人来说，"社会"是"自私"的对立面。1832年2月，圣西门主义的Le globe〈《环球》〉杂志，它的主编是皮埃尔·勒鲁〈Pierre Leroux〉，它的一个记者是奥古斯特·布朗基，介绍了Socialisme〈社会主义〉一词。第二年，在"De l'individualisme et du socialisme"〈《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文中，勒鲁成功地普及了这一新的术语。Communism〈共产主义〉这一名词，是1834～1839年间在巴黎的秘密革命团体中制造出来的。在埃蒂耶纳·卡贝于1840年发表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以后，共产主义这一名词主要代表他的理论。到了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社会主义便与乌托邦联系在一起；而共产主义则与工人阶级运动密切相关。

第三节　运　动

到了19世纪中期，资本的原始积累已经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完成，工业革命已经在进行，并且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正在迅速地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孤立的个人为广泛的运动代替。新的社会秩序——资本主义，产生了新的被剥削阶级——工业无产阶级。无数次的罢工，工业战争和非法的工会组织，表明了这个阶级的阶级觉悟在逐渐形成。社会迫切地要求提供一种对新秩序的动力学的理论解释，道德也要求对它的受害者进行捍卫。这两种任务都被卡尔·马克思（1818～1883）和弗里德

里希·恩格斯（1820～1895）极为出色地完成了。因此，历史上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历史上出现的工人阶级的解放的理论。由于无产阶级是被剥削阶级，解放他们将在更大程度上解放社会；他们将摧毁阶级社会，并建立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运动在本质上是工人阶级运动，这里的“工人阶级”，主要是指工业无产阶级。

在上一个世纪的中期左右，政治民主仍在襁褓之中，投票权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工会是非法的组织。国家完全由有产阶级控制，这个阶级绝不允许他们的特权哪怕受到一点点侵犯。因此，不用说根本性的变革，甚至是小小的社会改革，也不可能通过政治的渠道来进行。激进派只能有社会变革的一种工具：即由法国大革命预先演示的暴力革命。的确，19世纪的欧洲历史，就是一部许多国家举行无数次革命起义的历史。

十分自然地，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工人阶级的革命的解放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这种革命的解放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将上升为统治阶级”（《共产党宣言》）。为了成功地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无产阶级必须被很好地组织起来。由此产生了政治集中化和有纪律的政党的要求。一旦工人的政党在上一个世纪的后半期形成之后，它们普遍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①

然而，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和它的灭亡的（批判

① 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开始创立之时，马克思还活着。很快地，社会民主党就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成立：1869年在德国，1879年在西班牙（由巴伯洛·伊戈莱西斯（Pablo Iglesias）创立）和丹麦，1882年在法国（儒尔·盖德创立的法国工人党），1883－1884年在英国（海德曼的社会民主联邦），1883年在俄国（普列哈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德的劳动解放社），1887年在挪威，1888年在奥地利和瑞士，1889年在瑞典和荷兰（社会民主联盟），1892年在意大利、波兰、芬兰和比利时，1903年在塞尔维亚，等等。之后，它们在非欧洲国家成立。

的）理论，而不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甚至在他的早期的书信中，马克思就宣布（这也是马克思在1844年当编辑的《德法年鉴》杂志的目的）："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么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①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论述是很少的和极不情愿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不得不做的时候，他才论述社会主义。他认为，论述一种并不存在的社会是乌托邦，而且没有必要这样做。由于资本主义只能为社会主义所代替，所以最重要的问题是发现摧毁资本主义的道路和手段。恩格斯补充说，在决定下一步做些什么的问题上，未来的人并不比我们更缺乏智力，目前有许多迫切的问题需要解决，因此偷闲思考未来的问题会分散对当前重要问题的精力和注意力，因而是非常有害的。这后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在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领袖中间非常普遍，作为其结果，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却很少与社会主义有关。他们的精力在与资本主义的战斗中散失殆尽，如果可能的话，煞费苦心地实现小小的改进。更糟糕的是，在与一个强敌进行战斗时，他们不情愿地采取了他们的敌人的态度。当伟大的日子最终来临的时候，在革命胜利日之后，除了简单地把资本主义颠倒过来之外，他们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他们不知道如何用完全不同的社会来代替它。

这些历史地决定的矛盾引起了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评价的极大混乱。因此，要澄清这些混乱，必须让马克思自己讲话。作为25岁的年青人，和一个资产阶级的激进分子，马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译者注

克思对人类的解放这一思想满腔热情：

> 人，总是一个精神的存在，一个自由人——一个共和主义者。小市民去却不想成为这样的人……。他们只想要动物所要的一切：生存与繁衍……人对自己的价值和自由的感觉，应该和这些人一起被唤醒：只有这种感觉能够再次使社会成为一个人的共同体，实现他们的最伟大的目标：一个民主的国家。

7年以后①，在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同样的思想在成熟的形式上表达了：

>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

许多年以后，马克思指出（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

> 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③

恩格斯自然同意这种观点，并详细解释道（1878年的《反杜林论》）：

---

① 马克思生于1818年，1843年马克思25岁。5年后即1848年，他和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所以，这里的"7年"，疑是笔误。——译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译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页。——译者注

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当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①

最后一段引文，当然是重述圣西门的著名思想；前面的引文使人想起了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全部引文都意味着，一个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一个统治的和强制的国家——本身就是一个阶级社会的明证，而相当多的以马克思主义相标榜的现代政治运动却起源于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即“占有生产资料”并用任命的国家官员来进行操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丝毫也不奇怪，持有上述引文观点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都以极大的热情为 1871 年的巴黎公社而欢呼。“公社”，马克思写道：

一开始就得承认，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20 页。——译者注

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①

不仅如此：

巴黎公社自然应当作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的榜样。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和各个次要的中心确立起来，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得也在外省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机关。(着重号是作者加的)②

分权并不意味着排他主义：

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破坏，相反地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法兰西内战》，1871 年)③

恩格斯在 10 年以后讲到工人生产者时指出："只有当成为他自己的生产资料的主人时，工人才能获得自由"，在这里，所有制被解释成为社会的所有制，而不是国家的或集体的所有制。

这就是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意味着摧毁专制主义的国家、公社制分权和生产者的自治。这与今天的许多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还是反对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非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34 页。这是恩格斯为 1891 年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单行本而写的导言中的一段话，不是马克思的话。——译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75 页。——译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76 页。——译者注

常不同。但并不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也有集权主义倾向这一事实。在他们的思想中，包含着或暗含着这样的观点，即在自治社会主义中的个人自由，可以通过集权的手段来实现；主要是通过废除了市场、货币和商品关系的中央行政计划来实现。毫无疑问，历史的经验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手段和目的并不完全一致。同样也毫无疑问，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能活到看见以后的发展，他们将改变的是手段，而不是改变目的。而当面临着抉择时，他们的许多庸俗的追随者们却与他们所做的正好相反。

1864年，英国工会和法国工会（后者仍然是非法的，并在兄弟会的伪装下存在）的代表，与各国的流放者们一起，在伦敦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即以后被称为第一国际。马克思为第一国际写了**成立宣言**。宣言回顾了1848年革命以来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且指出了，在英格兰和威尔士，3000人的年收人，比全体农业工人的年收人还要大。对我们的目的来说，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对合作劳动的评价。宣言指出，虽然合作劳动在原则上是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但它始终不能阻止垄断势力的增长，也不能减轻贫困的重负。为了解放工人阶级，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但是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防止它发生。一年以后，马克思在给国际的日内瓦会议的总委员会的指示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合作运动的功绩在于，它指明了以自由和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代替旧的资本奴役劳动的制度的可能性。然而，这只有在生产者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才能做到。

第一国际的日内瓦会议（1866年）、洛桑会议（1867年）

和布鲁塞尔会议（1868年），讨论了生产者合作社的问题。第一个会议宣布支持和促进生产者合作社的发展，但强调把自愿的合作社作为社会制度的基础是不合适的。第二个会议号召工会通过向其投资和提供道义上的援助来支持合作社。第三个会议宣布赞同通过互助银行的免费信贷来援助工业上的合作所有制（蒲鲁东的影响）和由农业集体合作社来进行耕作的土地的公社所有制。第二国际的哥本哈根会议（1910年）也讨论了合作社问题。然而，决议仅仅涉及到消费者合作社，没有提及生产者合作社。列宁建议通过一个修正案，内容是：表明只有在资本家被剥夺之后，合作社将可以在社会化和民主化方面发挥作用。但是，这个修正案被大多数否决。

在这里，评价一下合作社在社会主义发展上的作用是有益的。第一个法国的生产者合作社和第一个欧文的生产者合作社是作为社会改造的工具而设计的。在19世纪70～80年代之间，在美国，劳动骑士团组织了200多个合作磨坊、合作矿山、合作商店和合作工厂——大多数都是不成功的。在资本主义的环境下，生产者合作社大都失败了。除了农业合作社外，它们或者蜕变为资本主义的合伙制或股份公司，或者就是解散了。合作社在获得必须的贷款方面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这因此导致了许多人企图建立各种形式的互助银行的努力。并且，收入分配的平等主义，不能吸引最好的管理人才。如果它们克服了这两个障碍，并且在竞争中生存了下来，那么，最初创立合作社的成员将把新成员当作雇佣劳动者来对待，这当然就是合作制开始瓦解的信号。至于消费者合作社，它和社会主义没有任何的关系。到了19世纪的50年代，在英国，消费者合作社丧失了它与欧文的新社会之间的联系。当收入较高的熟

练工人承担得起对合作社的投资时，他们主要对直接获得的利益感兴趣：不掺假的产品、公道的价格、购买之物的红利和投资的安全性——任何善良的商人都会同意的目标的清单。更糟糕的是，合作社偶然地被用以防止任何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德国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典型。在这里，保守主义的合作社的促进者，维克多·胡博〈Victor Huber〉，把合作社作为传统的秩序和工人反对资产阶级权利的联盟来对待。而另一个著名的自由合作社的组织者，赫尔曼·舒尔茨－德里克〈Hermann Schulze－Delitzsch〉，则希望通过教育工人阶级的企业家来加强自由企业的力量。

第一国际最后一年的一个特征是，在赞成政治行动和集权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反对这两点的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不间断的斗争。在海牙会议上（1872年），这是第一国际的最后一次会议，无政府主义者和联邦主义者被开除出国际。被击败的少数人然后决定重建国际（这个企图失败了）和在未来组织分裂的会议（他们做到了这一点）。在日内瓦会议（1873年）和布鲁塞尔会议（1874年）上，比利时工人领导人凯撒·德·帕比〈César de Paepe〉（1842～1890）是赞同工人自我管理的主要发言人。他主张，工人团体应当在地方公社的监督下生产；公社应当拥有土地和主要的资本财产；每一个工人应当通过给其代表以必要的指示来参与政治决策；公社将被联合成为一个联邦。人们可以看到蒲鲁东的影响，后者的思想已经成为当时无政府主义者的教义。

无政府主义者又可以分成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者、无政府集体主义者和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前者的人数很少——他们中间有德国的马克斯·施蒂纳〈Marx Stirne〉，美国的本杰明·杜克

〈Benjamin Tucker〉——并且和社会主义毫无关系。后者的人数很多，有巴枯宁、克鲁鲍特金、勒克吕〈Réclus〉、吉尼·格瑞夫〈Jean Grave〉、埃米尔·波盖特〈Emil Pouget〉，和某种形式的乌托邦自由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他们主张消灭私有财产，和自下而上地组成一个自由的联邦代替强制国家。在19世纪的90年代，无政府主义集体主义者以革命的工团主义者的面貌重新出现，并且组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人阶级运动。工团主义也有一个非同寻常的乌托邦主义的前驱者——在我们的乌托邦的收藏馆中的惟一的女性：费劳拉·翠斯塔〈Flora Tristan〉(1803～1844)。她在1843年发表她的最重要的著作，L' union ouvrière〈《工人联合会》〉。在该书中，她建议，所有的工人每年捐献一小笔钱，成立劳动解放基金；把工人协会转变成为类似于一种自治公司和工人的国际合作组织。后者成为工人国际第一个发表的计划。

工团主义是法国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与受盖德工人党影响的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syndicats〈全国工会联盟〉相对抗的工会运动发展的结果。那个时候，脆弱的法国工会被5个互相争斗并寻求工会支持的社会主义政党搞得四分五裂。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政治的中立性似乎是最好的政策。运动立志要建立一个地方的工会联盟，叫做bourses du travail〈劳动交易所〉，它是在工会的控制下的劳动交换场所，和从事宣传、组织和教育活动的工会委员会。1892年，交易所联盟成立。三年以后，费尔南德·皮罗蒂〈Fernand Pelloutier〉(1867～1901)成为它的秘书。皮罗蒂为运动奠定了基础，这个运动吸引了所有那些像他一样的人们，这些人们从争吵不止的社会主义的派系斗争中醒悟过来，并且赞同独立于政党的革命的工人阶级运

动。工团主义要把工业交给工会来管理。工会将联盟成为地方的劳动交易所，后者将垄断劳动，接管工业的所有制，和在地方的自治公社下进行管理。工团主义拒绝议会的行动，依赖"觉悟的少数人"来代替组织完备的大工会或政党，并且希望以总罢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运动的这些特征——这在工会的会员非常少、严重缺乏资金和没有谈判的权利的情况下是明显合理的——立即说明了，为什么无论是雇主还是正统的工会主义者都同样地憎恨工团主义者，为什么他们的行动通过扰乱了工人阶级的运动而给其造成了损害①，和为什么他们没能实现工人管理的目标。

1902年，交易所联盟和工业工会联盟合并成为Confédération generale du travail（劳动总同盟，CGT）。在以后的几年里，法国工团主义工会的工业战争达到了高峰，激起了政府和一个雇主大联盟组织的强烈反击。结果，工团主义者被迫撤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的观点从根本上缓和了。下述的事实也在这个过程起了一定的作用，即由于战争，工会的成员成倍地扩大，工会发展成为庞大的官僚组织。赫伯特·拉格戴里（Hubert Lagardelle），重新积聚工团主义的力量反对议会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团体运动的领导人，曾对工团主义的遗产做过很好的总结："工团主义总是制定这样一个原则，即只有当按比例地为工人阶级的机构取代时，资产阶级的机构才能被消灭。"②

法国的革命的工团主义促进了工业工会主义在盎格鲁·撒

---

① 同样地，工团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在工人阶级的词汇中成为一个贬义词。注意到下面的现象是有趣的，工人自我管理的反对者经常用这个词来表示——和贬低——那些赞同它的人，即使他们与工团主义没有任何关系。

② 引自 Cole, *Socialist Thoughts*, vol. III, p. 347.

克逊国家的发展，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在其他民族特别是罗马民族的发展。在19世纪70年代的早期，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吉塞比·法尼里（Giuseppe Fanelli）把巴枯宁的思想介绍给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工人团体。从那时起，无政府主义对西班牙产生了连续的影响。在1872年海牙大会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分裂以后，国际的西班牙支部仍然由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着。1916年，仿照法国的CGT模式，西班牙成立了Confederación natcional del trabajo（全国工会同盟，CNT）。目标是：el comunismo libertario（公社的解放）。20年后，在内战时期，西班牙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有了在实际中试验自己的理想的机会。在意大利，无政府工团主义发展成为地方的劳动议院。在1912年，成立了Unione sindicale italiana（意大利工会联盟）。它在米兰和都灵有绝对的支配力，并且在1920年的占领工厂中起了决定的作用。在德国，无政府工团主义的Freie Arbeiter-union Deutschlands（德国自由工会，FAUD）是由1897年成立的德国工会的反中央集权主义的反对派发展起来。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会在阿根廷扎下了根。在1909年总罢工失败以后，它也在瑞典扎根。

席卷美国的工团主义是被称作**工业工会主义**的变种。对其负责的组织是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WW）。该组织是在1905年由大西部的矿工团体、伐木工人团体和中西部和东部州的莱昂主义团体和其它团体合并成立的。IWW反对正统的工会和改良的社会主义，并认为工人阶级的基本政策是，为完全推翻资本主义而进行的革命的阶级斗争，和通过组织工人征服政权。在其它的重要问题上，IWW的成员分裂为几个不同的派别：从完全反对政治行动的无政府主义者，到主张通过革命的政党

联合革命的工会采取政治行动的莱昂的追随者。丹尼尔·德·莱昂（Daniel De Leon）（1852～1914），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法讲师，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在 1890 年加入社会主义劳动党，并且很快成为它的领袖。莱昂清楚地看到了，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工会和政治组织。于是，他和他的支持者们克服了工团主义的两个基本缺陷。但是，接连不断的派别斗争阻碍了建立一个有效率的组织。IWW 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低收入的移民工人为基础的，因而不能牢固地在美国工人阶级中间扎根。革命的工会主义，与其说是美国社会持久力量表达的产物，不如说是大西部新开拓的矿业和采伐业地区的无法无天——在那里，痛苦的工业战争肆行无忌——的结果。最终，它逐渐地被赶退，和被正统的工会主义所代替。与此同时，它惹来了甚至比法国的工团主义所招致的更加暴力的镇压。若干个州制定法律，使传播工团主义思想成为刑事罪犯。反映这种心情的是在 20 世纪的 20 年代麻萨诸塞州对两个移民工人——沙科和维塞梯（Sacco and Vanzetti）——的不公正的死刑判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当许多成员离开了组织，加入到新成立的共产党时，IWW 逐步地衰弱下去。

工团主义和工业工会主义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爱尔兰和其它国家传播。工业工会主义在英国的开路先锋是爱尔兰的工人领袖詹姆斯·康纳里（James Connolly）。他后来因在参加 1915 年都柏林复活节的起义被英国处死。在丹尼尔·德·莱昂的思想传播运动以后，康纳里从当时的社会民主党联盟中分裂出来，于 1903 年创立了以它的美国兄弟党的名字命名的社会主义劳动党。工业工会主义的思想很快地反映到著名的威

尔士矿工宣言“矿工的下一步”（1912年）[①] 中。这个宣言宣称的目的是“矿山是矿工们的”，以反对官方工会的国有化政策。威尔士的工人们争辩道：国家并不比私人雇主更不残暴，并且要强大许多。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采取威逼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战斗性政策，直至使所有者无利可图，然后矿山将被接管，并在工人们的控制下管理。如果其他工人采取同样的政策，那么，资本主义制度将不能运转，这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

英国也产生了土生土长的运动：**基尔特社会主义**。这个有点奇怪的名字的产生是由于历史的偶然原因。在1906年，A. J. 培第〈Penty〉，一个憎恶资本主义的工业主义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建筑师，写了一本名为《基尔特制度下的餐馆》的书，主张回到中世纪的手工工艺。不久，S. G. 霍布逊〈Hobson〉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了这个词——工人是生产资料的主人，而基尔特作为管理工业的机构，这成为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最成熟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思想充分体现在G. P. H. 科尔〈Cole〉(1889～1959) 的著作中。

科尔论证了基尔特社会主义运动的三个基本原则：⑴最重要的社会价值是人的价值，而社会被认为是按其成员的意愿所结成的一个复杂的联合体；⑵仅仅得到被统治者消极承认的政府是不够的，因为普通公民的权力仅局限于选择他们的统治者；公民应该是他自己的统治者，社会应该是自我管理的社会；⑶民主不仅运用于政治领域，而且运用到社会活动的每一

① 这个文件是由中央劳动学院的研究生们起草的。该院成立于1909年，由卢斯肯（Ruskin）学院的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和教师从中分立出来而创建的。（见K. Coates and T. Yopham, eds., *Workers' Control*, London: Panther Modem Society, 1970, p. 5.）

个领域；现代社会的最大弊病，不是贫穷，而是奴役和不安全。一个人在日常劳动中的地位决定了他作为公民在社会中的地位。没有工业民主，政治民主仅仅是一种伪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所有的精华就是这样一种信仰，即社会应当被组织起来以便使给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的个人和集体的自我表现以最大可能的机会。它包括和意味着自治在社会所有领域的延伸。"① 为了这个目的，全权的国家和全权的议会是不合适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借用蒲鲁东、克鲁鲍特金和威廉·莫里斯，来反对所有的政治问题仅仅通过集权的政治权力才能得到解决的观点：没有人能真正地代表其他的人。只有当关系某种特殊的目的或团体的目的时，公民才必须选出某些人来代表他的观点。这种**职能性民主**将导致一个没有单一的统治者和政治权力分散在各个职能性集团手中的多元社会。

以工会为基础的工人基尔特将在国家的特许下进行生产。"一个国民基尔特将成为某一个具体工业部门或服务业部门的所有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联合体，它的功能将是代表整个社团管理那个工业或服务业。"② 除生产者的经济基尔特组织外，另有三个职能性组织：消费者组织或合作事业委员会；市政服务组织或市政基尔特（排除政府部门的职业）；公民组织或文化和健康委员会。与这四个职能性组织相对照，存在着这样一个社团组织，它的任务是：①协调这些职能性团体使之成为一个社团；②协调在较小区域内活动的团体使之成为一个较大的社团。所有的职能性团体都在社团委员会中有自己的代表，所有这些代表们一起代表社团。

---

① G. D. H. Cole, *Guild Socialism Re-Stated*, London: L. Parsons, 1920, p. 13.
② Ibid., P. 46.

社团有五项任务：①配置地方资源和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价格和收入；②为各个职能性团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充当仲裁法庭；③它将决定各种职能团体之间的分界线；④它将决定作为乡镇整体的事务；⑤它将执行一个强制性的决策。总之，"基尔特社会的国民调节机制与现代国家有本质的不同。它将具有很少的直接行政性职能。它将是主要地进行少数的最基本的政策决策，在职能团体之间分界，……一旦出现纷争做出上诉的最后终审判决……并入国民社团……进入国民基尔特、农业、工业和市民基尔特、经济和市政国民委员会和地区社团的代表团"。①

在政治领域，职能性代表导致的多元政治，传统的极权主义国家的严重削弱，和所有的劳动组织的自我管理——这是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治组织的本质。

基尔特社会主义最初包括少数知识分子，其中包括牛津大学的教师和研究生。只是在 1912 年以后开始吸引了工人。1914 年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影响扩大，1915 年，成立国民基尔特联盟，它对工人代表运动和几个工会的影响特别大。另一方面，工人代表运动的经验，促使 J. M. 巴顿〈Paton〉形成了逐步侵蚀资本主义独裁政治的"蚕食控制政策"，② 即通过逐渐地掌握工业的控制权，通过积极地或有意义地参与他们在其中工作的产业的管理，工人将剥夺所有者。所有者将变成为没用的阑尾，很容易在最终的过渡时期被消灭。拥有财产的阶级的功能萎缩，摧毁了他们在道义上对权利的索取权："繁忙

① G. D. H. Cole, *Guild Socialism Re - Stated*, London: L. Parsons, 1920, PP. 136 - 37.

② N. Carpenter, *Guild Socialism: A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Analysis*, New York: D. Appleton, 1922, p. 205.

的富人”将成为“闲散的富人”，然后被最终“消灭”。基尔特的另一个过渡时期的任务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便使工业成为公有制。在此之后，在议会的许可的范围内，议会将管理的任务移交给国民基尔特组织（以前的工会组织）。

这个政策并不可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一些小的基尔特组织成立。最主要的是把建筑业重新组织成为国民基尔特的运动，这个运动使雇主们成为拿薪水的管理者，服从于经过选举而产生的雇用工人——1834 年欧文的建筑基尔特的非凡的复兴！在开始的阶段，建筑基尔特非常成功，科尔解释说，这是因为造普通的房屋并不需要固定资本，并且对房屋的需求也很大。基尔特索取的价格较低，提供服务的质量较高，并吸引了最好的工人。然而，在 1922～1923 年的战后第一次经济衰退中，基尔特运动破产了。一年以后，基尔特社会主义作为有组织的运动在英国消失了，它的一些骨干工人参加了共产党。战争刚一结束，国民基尔特联盟就发展到南非、奥地利和日本——但后来也都一一覆灭了。

第四节　革　命

如果第一次浪潮产生了个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孤立的团体，第二次浪潮出现了有组织的运动，那么，第三次浪潮开始了第一次实现。一般而论，1848 年的欧洲革命标志着工人阶级自我解放和作为独立的社会阶级显示力量的时代的开始。可以假定，在随之而来的革命中，工人阶级将试图建立一个自我管理的工业社会；也许更广泛地、建立一个自治社会。让我们用实际发生的事件来检验这一假说。

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开始于1871年的**巴黎公社**。职能上的自治和领域上的自治是自治的两个基本内容。从一开始，公社就发展了这两个方面的自治。在政治上，它发展起一个充分的参与制民主；在经济领域，公社通过一个法令，这个法令要求在合作的基础上组织工业和由工人管理企业。巴黎公社的宝贵经验，公社社员的英雄主义行为和他们斗争的悲壮的结局，鼓舞了许多的个人（他们中间包括马克思和列宁）、团体和整个工人阶级运动。特别是在80年以后，通过马克思的著作，巴黎公社对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南斯拉夫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理论反映了蒲鲁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许多思想，但它们之间没有历史的联系。在南斯拉夫，没有人知道蒲鲁东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思想，只是此后才重新发现了它们；但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评价是非常熟悉的，并且以最直接的方式影响了南斯拉夫的思想和行动。

下一幕是1905年的**俄国革命**。它产生了苏维埃，一个俄国特殊的革命政权机构。由于苏维埃在未来的革命发展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概略地描述一下它的起源是适宜的。1905年1月，在一次罢工之后，军队耀武扬威地在彼得堡街头枪杀了1 000名工人，5 000多人受伤。这一事件引发了全国性的罢工浪潮。3月，伊凡诺沃·沃兹涅欣斯克纺织中心的3万工人罢工，并选出由151名成员组成的工人代表大会。这个团体不仅指挥罢工，而且是政权机构，并组建了自己的民兵和法庭，这就是第一个苏维埃。其它的苏维埃很快相继成立。其中最著名的是托洛斯基领导下的彼得堡苏维埃。10月2日，200万工人举行总罢工，之后，在50多个城市成立了苏维埃。工人们聚集在一起选举城市苏维埃的代表。最初的工人要求带

有传统工会主义的色彩：包括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但是，这些要求很快就为更激进的要求所超越，如 8 小时的工作日，它在十月总罢工以后变成了大规模的政治要求（结束独裁政治，成立制宪大会，言论和集会自由）。沙皇被迫同意让步，许诺保证公民的自由和成立议会。一旦局势在控制之下，苏维埃就被扼杀了，大部分让步被取消了。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苏维埃是在由政党参与下的罢工委员会中发展起来的。它的出现完全是自发的，与任何的理论或政治战略无关。然而，它看上去好像是工业工会主义的产物。在苏维埃中，职能—领域—政治的自治成份并没有区分开，但是政治成份是处在支配地位的。在总罢工期间，苏维埃成为大规模地代替市政机构的地方行政权力机构。

巴黎公社和俄国革命都被镇压了，工人自治也没能拯救它们。然而，第二次俄国革命的命运，伟大的十月革命，却完全不同。事件的链条开始于彼得堡纺织女工在 2 月 23 日（公历 3 月 8 日）的罢工。4 天之后，成立了彼得堡工人和士兵联合苏维埃。苏维埃的数目——工厂代表团和军事单位代表团——很快就超过了2 000个。大多数苏维埃的成员是士兵，苏维埃的第一号命令是所有的军事单位都应该建立由下级官兵选举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一个月以后，列宁在他的著名的《四月提纲》中要求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他的战斗口号是：政权归苏维埃！土地归农民！给人民以和平！不久，工人们加上一条口号：工厂归工人！在同一个月，在一次布尔什维克的会议上，乌拉尔地区的代表斯维德洛夫报告：在他的地区里，工人们已经接管了一些工厂；工人们相信，如果工厂主拒绝开工，苏维埃将承担管理工厂的任务。在 5 月 23 日，

地方政府发布一个法令，使**工厂委员会**合法化，但试图将其限制为一种咨询性质的团体。然而，工厂委员会很快就超越了这一界限，特别是当工厂面对濒临倒闭的危险时，它承担起生产管理的任务。从这时起，这样的工人接管成为自发引进自我管理的典型的形式，并且在许多国家实践过。在拉丁美洲，它被知道是 las tomas de fábricas①。

农民苏维埃在稍后些出现。但是到了 1917 年的夏天，已经存在了 400 个这样的苏维埃。在 5 月，第一次工人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彼得堡召开。会议声明，没收大地产和工人控制工厂。在同一个月，第一次工厂委员会彼得堡会议举行。列宁提交了一个议案，证明工人控制是避免灾难的惟一方法。这个议案获得大多数通过。会议选举了工厂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以后，列宁更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观点，指出工人控制意味着苏维埃控制，不是“可笑地把铁路交给铁路工人，把皮革厂交给皮革工人”。

在 10 月 24～25 日（旧历）的晚上，彼得堡的起义使布尔什维克获得了政权。然后召开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一切权力归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的苏维埃。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了。

两周后，新政府颁布了“工人控制法令”，规定由工人控制委

---

①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工人接管资本家工厂的历史与工人运动的历史同样悠久。在 1819 年的 2 月，英国烟草工人在罢工 11 周之后，开始自己组织生产。在一个半世纪之后的 1964 年的阿根廷，3 百万工人在总罢工中占领了 4 000 个工厂，并开始组织生产。（E. Mandal, ed, *Contrôle ouvrier, conseils ouvriers, autogestion*, Paris: Maspero, 1970, pp. 7—8.）在一项对哥伦比亚的研究中发现，工人接管工厂有三个主要的原因：因为工厂负债累累，停发工人的工资；因为工厂濒临倒闭；和在长期罢工之后。哥伦比亚最大的被接管的企业雇佣 250 名工人，工人自己或他们的工会经营企业。（Centro Colombiano de Investigaciones Marxistas, *Las tomas de fábricas*, Bogotá, 1967, pp. 60－61.）在智利，企业由工人组成的、叫做 Empresas y Brigadas de Trabajadores 的国民协会接管，该协会在 1972 年有 100 个成员。

员会负责监督企业的全部运行，全体工人必须遵从它的决定。从那以后，这个有希望的运动走上了一条非常不同的道路。

工厂委员会对地方工人控制委员会负责，后者的成员是由工厂委员会、工会和工人合作社的代表组成的。地方委员会隶属于"全俄工人控制委员会"。由于老的工厂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仍然存在，它是在5月到10月从工厂委员会大会发展成长起来的，新的组织意味着双重的领导制度。更有甚者，两个机构对工人控制的解释是完全不同的。中央委员会发布的"手册"说明，工厂的资方必须遵从工厂委员会的决策，不服从者将受到没收财产的处罚。在另一方面，全俄工人控制委员会则为所有者保留着管理的权力，并且禁止工厂委员会在任何情况下没收企业。激烈的论战开始了。对中央委员会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是布尔什维克的工会主义者A·洛扎夫斯基〈Lozovski〉，他在他的《工人控制》一书中争辩道，"废除企业家"和使工厂委员会"成为企业的老板"，这种把工厂转移给工人的做法，"虽然是沿着新的路线，但不仅不是社会主义的，而且相反，是一种倒退，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强化"。①

争论很快就被实际措施解决了。12月1日，成立了最高经济委员会，它废除了全俄工人控制委员会，并且把控制的职能变成为管理经济总任务的一个部分。它调节着一个由地方经济委员会组成的网络。一个敌对的团体被消灭了。

布尔什维克现在认为，在获得政权以后，没有必须使工人组织分立。而当时工厂委员会负责对工厂的工人控制，工会负责组织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1918年1月召开的第一次全

---

① In M. Brinton, *The Bolsheviks and Workers' Control*, Montreal: Black Rose, 1975, p. 21.

俄工会代表大会，决定把工厂委员会转变成为主要的工会机构。这一设计——通过把它加以工会化而扼杀了工人的自我管理——在以后也被其它国家采用过。拉里尼（Larin）在全俄工人控制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对这种做法的解释是："工会代表全体阶级的利益，而工厂委员会代表的只是局部的利益。"①这一决定的获得通过不是没有人反对。在第二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团继续把工厂委员会——直接生产者的组织——看做比工会更革命，后者通过领导来运作。但是，会议赞成二者的合并。在3月份，彼得堡的中央委员会消失了，被并入北部工业区的地方经济委员会。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列宁写道：必须学会把喧闹的民主和劳动时铁的纪律协调起来，与劳动过程中的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苏维埃领导——结合起来。他指出："革命要求，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群众**无条件地服从**劳动过程中的领导的**个人意志**。"这些观点不是没有遇到挑战。1918年4月，V. V. 奥欣斯基〈Osinsky〉在他的Kommunist〈《共产主义者》〉一书中这样写道：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建立，"只能通过工人们自己的阶级创造性，而不是通过'工业船长'的敕令。……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组织，必须是无产阶级自己创立的，否则社会主义将完全不能建立。建立起来的其它东西是国家资本主义。"②

在5月和6月，国民经济的大多数部门都被国有化了。与此同时，举行了第一次苏维埃国民经济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在

① In M. Brinton, *The Bolsheviks and Workers' Control*. 非常鲜明地，罗莎·卢森堡在1919年1月的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把这个论断颠倒过来了，她宣布，工会将会消失，为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所取代。(Ibid., p. 30.)

② Quoted in R. V. Daniels, *The Conscience of Revolution*, New York: Clarion, 1969, pp. 85–86.

国有化的企业中，管理委员会由工会选出的工人代表（占三分之一）和地区或国民经济委员会指派的代表（占三分之二）组成。

由工厂委员会控制向工会控制的转变在 1919 年继续着，并且在 3 月的第八次党代会达到了高峰。新党章的著名的第五点指出：

> 社会化的组织机构应该首先建立在工会的基础上……已经参与……所有的地方和中央的工业管理机构，工会应当最终实际把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权集中在自己的手中。工会对经济管理的参与……也是构成反对经济机构官僚主义化的斗争的重要工具。①

一个法国的工团主义者对此应该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但是，宣布的未必是必须执行的。在一年以后举行的下一次党代会是一个转折点。残酷的内战，伴随着短缺和破坏的出现，要求——至少看来是如此——严格的集中制和所有的社会组织的军事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y〉和民主集中主义者攻击一个人管理的观点。沙里阿普尼柯夫〈Shliapnikov〉，前苏维埃政府的劳动委员，号召党、苏维埃和工会之间的权力分立。列宁坚决主张，党不能同意政治领导权单独属于党，而经济领导权属于工会。列宁的观点获得了大多数的支持，他们争论道，一个人的管理不是对工人阶级或工会的权利的侵犯，因为阶级可以在方便时采取任何形式来行使统治权，因为正是统治阶级任命担任管理职务的个人的。多么真实的解释！

① Quoted in Isaac Deutscher, *Soviet Trade Union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p29.

紧张局势开始了。残酷的事件接踵而来，很快就达到高峰。1920年7月，住在德米特洛夫〈Dmitrov〉的克鲁鲍特金给列宁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包含着一个警告："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即使党的专政是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的工具……**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障碍**"（着重号是原来的）。[①] 列宁既没有复信，也没有理解这个警告。[②] 1920年7月，托洛斯基这样写道：

> 把无产阶级统治地位问题和工人委员会作为企业主管问题混淆起来，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无产阶级专政是指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指对工人集体意志的苏维埃的总体支配，而完全不是指管理各个经济企业的形式。[③]

沙里阿普尼柯夫、亚历克山大·考洛尼塔〈Aleksandra Kollontai〉和其它一些工会代表组成一个叫做"工人反对派"的团体。工人反对派要求在工会的控制下实现工人的自我管理，党不能撤换由工会提名的候选人。但太晚了！

---

① P. Kropotkin, Oeuvres, Paris: Maspero, 1976, p. 338.

② 这两个人之间完全缺乏沟通。在一次和克鲁鲍特金谈话之后，列宁——按照他的秘书的记载——评论道："他已经太老了。他生活在一个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的国家，到处都在战斗。而他除了合作运动之外却找不到其它什么可以建议的。这里你知道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是多么的贫乏……"

③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1, p. 162. 这个观点不是托洛斯基为形势需要而提出的一种策略，而是他的一贯主张，从来没有改变过。在1931年，他已经被驱逐出国，托洛斯基写道："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我们将不实行工人控制，而宁愿通过工人国家在准备好了的一个令人满意的国有化的政权制度下对生产进行控制。对我们来说，工人控制的概念还局限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的范围之内……因此，一个工人控制的政权制度……仅仅被认为是在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期间的暂时性的和过渡性的一种制度。"（"A Letter to a Comrade", Berlin, 1931, *in New International*, 1951, vol. 17, PP. 175—178, New York: Greenwood Reprint, 1968）

在12月的中央全会上，布哈林提出了一个关于工业民主的议案。列宁愤怒地反驳道，工业民主最终会引起一系列的误解，可以从否定专政和一长制的意义上理解它。在12月30日的党的会议上，布哈林试图沟通官方党的观点和反对派的观点，但被列宁驳回。沙里阿普尼柯夫，一个铸造工人和工人反对派的领袖，要求召集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以选举国家国民经济的中央管理委员会。1921年1月25日的《真理报》发表一系列由沙里阿普尼柯夫和37位工会领导人准备的论工会任务的论文。第15、17、18和20篇论文号召工会成员积极参与经济管理，为此目的，将选出工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作为特定产业的基本组织形式在工会的领导下管理企业。一个多月以后，克琅施塔（彼得堡附近的一个小镇和海军要塞）的水兵们起义了。寒冷和饥饿遍布于充满怨恨的彼得堡。内战结束了，工人们期盼兑现革命的诺言。2月24日，罢工爆发了。2月28日，一条战舰的水兵们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以后被普遍接受——要求重新选举苏维埃，工人、农民和所有社会主义者的言论和出版自由，集会的权力，和释放社会主义的政治犯。3月2日，在一个群众大会上成立了地方革命委员会。在3月7日，政府发动了对克琅施塔的军事攻击。第二天，第十次党代会在莫斯科召开。在内战刚刚结束不到三个月和克琅施塔的水兵们号召进行“第三次劳动者的革命”的形势下，代表们觉察到新国家处在严重的危险之中，赞扬统一，并废除了派系的权利。到了3月17日，起义被血腥地镇压了。“工人反对派”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和被粉碎了。工会很快就被要求作为劝说工人们完成生产任务的主要工具来开展工作。以前的工厂委员会被生产组织所取代了，并在1923年变成了其主要任务是负责协

调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生产商讨会。工人们很快就清醒了，商讨会甚至在没有正式解散之前就名存实亡了。工人控制的最后残存物在某一时期徘徊在管理的三位一体中：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而厂长变得越来越重要。在20年代的后期，斯大林甚至把这最后的残留物也给消灭了，他以真正的韦伯式的方式宣布：纪律和效率的根本保障是厂长行使绝对的完全的控制企业的权力和服从上面的命令。Edinonachalie〈一个人的管理〉——由列宁预先制定的，他要求绝对地服从一个人的意志——被接受成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具有充分象征意义的是，当工人的工资和经理的薪水之间的差距扩大几倍之后，工人控制从那时起便被埋葬了。

俄国革命对欧洲其它国家的革命骚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苏维埃在整个欧洲生根开花。1918年和1919年，苏维埃国民大会在奥地利、德国和挪威成立。在波兰，各种政治团体组织了数千个工人和农民委员会。在其它国家，如英格兰（1917年在利兹）和瑞士（1919年1月在苏黎士），苏维埃也零星地出现。在推迟的十年之后，苏维埃发展到了亚洲，在1930年的印度支那起义中，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了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工人们被证明有能力行使立法的和法律的改革，并且偶尔地承担（当然是暂时地）他们工厂的生产管理任务。在这方面，最有戏剧性的事件是**匈牙利革命**，它产生了1919年春天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列宁送去了祝贺。早在1918年的10月，主要在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下，在布达佩斯和其它地方成立了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在大的工厂里，管理权转移到工厂苏维埃的手中。1919年3月在布达佩斯的工人和士兵代表委员会的一次行动中，苏维埃政府获得了政权。政府将工业和贸易实行国有

化，并授权生产委员和工厂苏维埃进行管理。苏维埃共和国立即遇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强烈抵抗，并且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使局势进一步恶化。这个错误是：采取一种僵硬的和教条的路线，以及专横地对待人民，特别是对农民。内战开始了。匈牙利受到罗马尼亚军队和捷克军队的攻击。在生存了135天之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法国、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匈牙利和由一小撮移民组成了联合军队镇压了。在8月，罗马尼亚的军队进入了布达佩斯，伴随着海军上将霍西〈Admiral Horthy〉在11月的来临，白色恐怖开始了。代替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是，匈牙利走上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在另一个战败的国家，**德国**，革命的形势也是如此。但不像匈牙利，德国是一个更发达的国家，有一个很长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和一个组织得很好的、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并赞同用革命的手段改变社会的社会民主党。然而，当事件爆发时，旧的理论被证明是完全不适用的，而党的主要团体没有行动。发展是自发的，并以意想不到的形式出现。革命运动是由驻扎在基尔〈Kiel〉的舰队在1918年11月拒绝出港去攻击英国舰队而一触即发的。当然，当局采取了行动，数百名水兵被关进了监狱。水兵们要求释放他们的同志，并在11月3日占领了海军基地。第二天，士兵委员会成立。一天以后，士兵委员会和工人汇合在一起，宣布总罢工。同一天，汉堡爆发了总罢工，并在11月6日工人和士兵委员会接管了政权。在卢比克〈Lübeck〉、不莱梅和其它海港城市，运动同样迅速发展。在斯图加特，王朝被推翻了；1月7日，在慕尼黑也是如此。在这里，工人和士兵委员会掌管了政权，宣布成立在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领导下的巴伐利亚共和国。艾斯纳是

1917年成立的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在两天之内，革命发展到更多的省份。11月10日，新政府在柏林宣布成立，这个政府由两个社会民主党的团体所组成：右翼的多数社会主义者和更激进的独立社会主义者。在同一天，新政府宣布，它的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纲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前马鞍工匠和继倍倍尔之后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成为政府的首脑，以后又成为国家的首脑。在柏林的一个工人和士兵代表大会，代表了德国所有的革命运动，选举了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声明支持政府。11月23日，委员会和政府联合声明，政治权力授予德国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23名德国的君主们被处死。

在1919年的1月10日，不莱梅社会主义共和国宣告成立。它生存了25天，直到在战斗之后联邦政府的军队占领了城市。在巴伐利亚，革命的骚动特别激烈。2月15日，艾斯纳被迫辞职。四天以后，在多数社会主义者的动议下，决定解散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把政权归还给慕尼黑的州议会。然而，就在2月21日，州议会即将召开之前，艾斯纳被刺身亡。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在4月6日~7日的夜里，巴伐利亚委员会共和国宣告成立。它生存到5月1日，直到被前帝国军官创立和领导的、并被社会主义联邦政府派遣的Frekorps〈自由军团〉镇压。成百名反对者被杀害。“对慕尼黑革命者的斩草除根”，G. D. H. 科尔评论道，“和随之而来建立起来的军事统治，摧毁了巴伐利亚的社会主义，并且使城市变成了反革命极端势力的大本营”。[①] 正是在慕尼黑，希特勒开始了

① *Socialist Thoughts*, vol. IV: *Commun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London: Macmillan, 1958, P. 150.

他的险恶的生涯。他在 1924 年的暴动预示了 10 年后发生的事情。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当两个共和国被镇压之时，在柏林，一个由抗议的罢工发展起来的起义，被多数社会主义者的司令官古斯塔夫·拿斯基〈Gustav Noske〉在 Frekorps 的帮助下镇压了。一年以后，the Reichswehr〈帝国卫队〉被派去镇压鲁尔的叛乱。这一切都意味着工人的政府对整个国家的工人的迫害。

在 1918 年 11 月革命爆发以来，一个普遍的社会化的要求遍及全国。工人、知识分子、市民，甚至是资产阶级都期望社会化将把国家从混乱中拯救出来。作为经济秩序的资本主义崩溃了，社会主义是避免社会和经济完全瓦解的惟一希望。但是，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没有人知道。普遍的社会化要求应该如何实现？也没有人知道。[①] 社会民主党已经存在半个世纪了，但是，除了几个陈词滥调外，党的理论家们从来也没有为提供一幅关于社会和经济改造纲领这一类的问题烦恼过。回到 1892 年，联系到党的爱尔福特纲领，党的主要理论家卡尔·考斯基这样写道："再也没有比要求社会主义者提供一幅描述他所为之奋斗的共和国的图画这类事情更幼稚的了。……革命党能够预见和单独决定它努力引导的新社会秩序的形式，这类事情在人类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②] 这一愚蠢的教条一直被忠实地被墨守着，因此当社会民主党出乎意料地被带进政府时，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他们至少知道他们不想做什么。就像他们的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同事一样，他们

① 甚至像艾斯纳这样的人也宣称，他对社会化概念的认识是非常模糊的。如果它意味着接管和由工人管理，艾伯特认为，"它是一种危险的乌托邦，一种新形式的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K. Eisner, *Sozialismus als Aktion*, Frnkfurt: Suhrkamp, 1975, p. 127.）

② Quoted in D. Bell, "Socialism",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vol. 14, New York: Macmillan, 1968, PP. 506 – 534, quote from p. 509.

决定防止 Rätebewegung〈委员会运动〉力量的加强。11 月 24 日，在来自下面的压力下，成立了以卡尔·考斯基为首的社会化委员会。委员会开会，但不能决定如何进行社会化。委员会中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巴洛德〈Ballod〉、莱德瑞〈Lederer〉、熊彼特和维尔布兰德〈Wilbrandt〉——变得比党和工会的代表更激进。这个委员会在以后所做的事情，被一个参加者，约瑟夫·熊彼特，简洁地（和赞许地）描述如下：

> 认为工厂的经理应由本厂工人选举的想法，受到了坦率的全体一致的谴责。在普遍崩溃的几个月中成长起来的工厂委员会，是厌恶和猜疑的对象。这一委员会，设法尽可能躲开工业民主这个通俗观念，尽其所能地把它塑造成为无害的模型，毫不去发挥它的作用。①

1918 年的 12 月，国民委员会代表大会在柏林召开。党的主要经济学家卢多尔夫·希尔福丁〈Rudolf Hilferding〉宣读了他的论文《社会化和经济》。他抱怨说，社会民主党曾希望在大危机中获得政权。在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出去的商品，然后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做。相反，他们继承的是一个被战争破坏了的、饥饿和贫穷的经济。为了不玷污社会主义，最好的做法就是让资产阶级承担重建经济的任务。因此，让工人接管工厂是

---

①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1950, P. 310. 在这方面，卡尔·考斯基完全同意他的死敌列宁的观点。他承认，德国的条件比俄国的更有利，但坚持认为，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足以进行自我管理。

不可能的，这将会产生无政府状态。阻碍越小，恢复就越快。① 受多数社会主义者支配的代表大会投票赞成尽快把权力移交给即将成立的制宪大会。当立宪大会在 1919 年的 2 月在魏玛成立时，这个决议被执行了。同时，社会民主党政府允许两个斯巴达克派的社会主义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希和罗莎·卢森堡，被自由军团杀害。它看起来似乎革命是在控制下开展，正统的议会方法将完成必要的社会改革。

然而，希尔福丁、考斯基的无知的谨慎，他们的同事和政府不负责任的野蛮行为，确实玷污了社会主义。1920 年 6 月，多数社会主义者在选举中被击败，右翼党上台。事实上，结果比这次政府的更迭本身所意味的更糟。无知和无所作为，不仅没有为困难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有所贡献，反而加剧了无法修补的局势。德国的问题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帝国崩溃，经济瓦解，而战胜国以强加一个经济上不能承担的重负在政治上羞辱这个国家。有能力的领导应该把这种困难变成动员群众和社会改变的动力。然而，艾伯特政府却不是如此。任何建设性行动的一个最明显的先决条件是，在军队、警察和官员中消除反对共和国的、折衷的和怀疑的力量。利用强烈的反军国主义和反独裁统治的情绪，在当时既是可能的，又是受欢迎的办法。然而，它们从来没有被考虑过。艾伯特和他的政府，不是把这些情绪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结合起来，而是依靠"传统秩序的力量"。在解除左翼的柏林警察局

---

① Rühle, *Baupläne für eine neue* Gesellschaft, pp. 123－25. 艾斯纳分享这种观点。他在 11 月 15 日发表的巴伐利亚政府的纲领中宣布："我们非常坦率地说，在当国家的生产力已近乎枯竭的时候，把工业转变为社会所有制，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在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社会化时进行社会化是不可能。但是，希尔福丁赞成煤矿的快速国有化和建立某种形式的工业民主。在企业中，工人委员会被选举成为对管理的控制团体和执行社会化的辅助机构。每年召开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并选举一个中央机构。

长和授权拿斯基动用自由军团清洗全国的社会主义者等方面，艾伯特个人和将军们签订了一个秘密的协议。多数社会主义者的经济政策也很糟糕。除去政府根本没有能力来处理的复杂的社会化问题不说，无论是从社会理论的观点来看，还是从专业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抑或从意识形态的承诺来看，紧急的经济形势需要立即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把银行置于公众的控制之下，以防止资本的外逃；把组成卡特尔的产业置于公众的控制之下，以防止毫无责任感的权力的集中；和瓦解大地产，以摧毁臭名昭著的反革命容克的力量。这三个措施和社会主义一点关系也没有，每一个像一点样子的资产阶级政府都能执行它们。明治维新就做到这些。然而，一个鼓吹了半个世纪社会改革的社会民主党的政府却没有做到，甚至没有对这些措施进行过严肃的讨论。当外汇赤字增加时，资本逃离国外；失业提高；通货膨胀野马奔腾式地向上攀升。到了 1923 年，货币的价值被摧毁了。在 11 月 20 日这一天，1 美元值4 200 000 000 000马克。工人的苦难加深，中产阶级被毁掉了，投机盛行，财富积聚起来，雇主们无视宪法赋予工人的权利。容克们和军队开始玩旧的游戏。富有工业家们开始资助纳粹党。革命似乎被彻底击败了。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希望都失去了。1928 年的选举又向左翼摆动。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获得了大多数的支持，而所有的其它政党丧失了选票。作为议会的强大政党，社会民主党组成了以海尔曼·姆勒〈Hermann Müller〉为总理、卢多尔夫·希尔福丁为财政部长的联合政府。不久，世界经济危机开始了，政府必须采取行动。它干了些什么？人们可能期望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两党似乎都忠实于老马克思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将会联合至少是全国的力量来与失

业作斗争。然而，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憎恨，更胜于他们对资本主义和纳粹的憎恨。共产党仍然和纳粹党一起站在积极的反对派的立场上。作为执政党，任何积极的行动都被党内的空谈家们关于他们是否应该作为阶级斗争的政党还是作为执政党来行事的喋喋不休的争论而瘫痪了。结果，姆勒没有得到他自己的政党的支持，而于1930年3月辞职。这是大联合政府完结的标志，也是德国议会主义开始完蛋的标志。社会民主党人丧失了他们的大好的历史机遇。

在这里，提一下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相关故事是很有意思的。在希尔福丁成为财政部长的几个月后，维拉德米尔·沃亭斯基〈Vladimir Woytinsky〉，一个很有能力的经济学家，成为德国工会的首席经济顾问。经济很快地陷入大危机之中。沃亭斯基提出了一个反通货紧缩的纲领，号召举办公共工程，放松信贷，扩大货币供应量，以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和增加购买力。正是这一整套政策被后来的凯恩斯重新发现并加以理论上的解释。到了1931年，沃亭斯基成功地使工会领导人确信他的纲领是正确的。但希尔福丁（这时已不在政府）反对这一纲领，继续支持传统的通货紧缩政策。以一种美丽的教条主义的方式，希尔福丁（内科医生出身）争辩道：萧条"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政府状态的结果。无论它必定要过去，还是导致这种制度的崩溃……［没有］纲领能减轻萧条。"① 党的领导人站在希

① 引自E. Kassalow, *Trade Unions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 P. 45. 另一个同时代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却提供了一个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例子：瑞典。在1932年的瑞典议会的辩论中，爱奈斯特·魏格福斯〈Ernest Wigforss〉，社会民主党内的主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他的资产阶级同僚们说明了一种以后被知道叫做需求和就业的乘数的经济现象。扩大政府的支出，成为同一年大选的主要问题，社会民主党组成了一个少数派的政府，魏格福斯成为财政部长，并执行希尔福丁所反对的政策。以后的两代瑞典人，都选择了社会民主党的政府，并且他们现在享受着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

尔福丁一边。[1] 到了 *1931* 年，登记的失业人数达到了4 300 000人；在 1932 年的春天，失业大军达到了8 000 000人。一年以后，希特勒上台了。

按照某种意见可以把俄国革命和德国革命做一番比较。俄国人有勇气、有能力，但缺乏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成熟的条件；而在德国，则恰恰是相反。在这里，很清楚，领导缺乏处理社会革命巨大任务的能力。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极不情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列宁为点燃革命的烈火而竭尽全力地做了所有的事情，而工人和工会的组织者艾伯特却雇佣帝国军队极力牵制革命和摧毁它。如果德国革命成功了，它可以帮助俄国革命者避免某些致命的错误。在另一方面，如果布尔什维克的恐怖没有玷污革命的社会主义，如果共产国际没有鼓励德国毫无意义的起义，如果它的"越糟一越好"政策和"社会法西斯主义"政策没有使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合作成为不可能，那么，德国人可能会更加理智地行动。而且如果两个革命能相互合作，它们将触发其它地方的革命，因为整个大陆就像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2] 正如实际发生的，这两个失败的革命殊途同归。带着古希腊悲剧式的不祥的相同的结局，和不

---

① *Joint Consultation over Thirty Year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50, p.16.

② 在匈牙利，有一次革命。在维也纳，有一次流产的起义。在芬兰，有一场内战。在波罗的海的三个国家，有共产党人的政府。在意大利，发生了占领工厂和剥夺土地的大规模运动。在南斯拉夫，对共产党人的同情和选票迅速增加。在瑞典，"迸发出宪法民主化的强烈要求；群众要求立即进行这种或那种改革……许多人相信现存的资本主义政权的丧钟敲响了……战争和海军事务部长发现，'气氛非常像是一次革命'。在许多方面采取了小心谨慎的措施。特别是，不值得信任的军队被遣散了；所有军队的军火库里都换上了值得信任的军官，而将变节者撤职了。"（引自 B. Abrahamsson and A. Broström, *The Rights of Labour*,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1980, P. 103）甚至胜利的英国人也没有了安全感。在军队和海军中都曾爆发过兵变和拒绝执行命令。但被驯服的工会和工党制止了。在英国，"当局积极地考虑叛乱的可能性。不能使英国无产阶级中最好战的份子的斗争超过工会的性质"（Walter Kendall,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Britain*,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1, P.168.）。

动摇的无知的教条主义，俄国向斯大林主义方向前进，而德国朝着法西斯主义方向前进。托洛斯基、布哈林和其他俄国革命者在斯大林的命令下被杀害。希尔福丁、姆勒和其他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在纳粹的监狱和集中营中被害。

自发形成的苏维埃和德国的委员会，引起了对它们的作用和性质的广泛争论。甚至产生了一个叫做 Rätekommunismus（委员会共产主义）的运动。它的主要理论家是阿顿·帕尼考克（Anton Pannekoek）（1873～1960），一个荷兰的天文学家，以后成为荷兰科学院的院士，和奥托·茹尔（Otto Rühle）（1874～1943），一个德国的教师。茹尔是德国的国会议员，曾和李卜克内希一起投战争反对票。在11月革命期间，他在德勒斯登担任过工人、士兵联合委员会短期的主席。委员会共产主义的教义从来没有被精确地阐述过。随着革命的退潮，这个运动消失了，虽然直到今天在荷兰和法国还存在着与世隔绝的某些组织。委员会共产主义的教义是建立在四个主要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引进工人的自我管理，消灭工作场所的权力等级制；政党是资产阶级发明的和代表着权力的集中，因此政党必须被禁止，和用苏维埃制度来代替议会制度；通过选举可撤换的代表，在工作场所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将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建立政治组织（这个观点写进了南斯拉夫1974年的宪法）；这个政治组织将为准备革命和促进接管经济和国家服务。

在革命的影响下，工人的自我管理得到了其他两个重要的拥护者：德国共产党党员、哲学家卡尔·考尔茨（Karl korsh，）（1886～1961年）和受过哲学训练的工人领袖、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

1937)。考尔茨的观点与工业工会主义的观点很接近，并试图把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工团主义嫁接起来。他争辩道：在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特点的政治过渡时期，应该在工业民主的基础上，在每一个车间、产业和整个经济中建立劳动者的无产阶级联合体；这个联合体将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对葛兰西的思想的研究把我们带到了革命骚乱的另一个中心：意大利。

虽然在战争中胜利了，**意大利**发现自己处在一场革命的边缘。在1919年的选举中，社会主义者赢得了550万张选票中的200万张。党的左翼领导人宣布，下一步的任务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工人们开始占领工厂，而南方的农民们则剥夺了不在所有者们的未耕种的土地。1919年8月，在都灵的费亚特中心，对现存的commissione interna（内部委员会）① 感到强烈不满的一个工人大会成功地迫使它辞职，并第一次选举了由工人代表组成的工厂委员会。在同一年的同一个城市，葛兰西创立了《新秩序》周刊，探索在意大利的传统中可以作为未来苏维埃胚胎形式的制度。葛兰西和他的团体赞成建立工人委员会。葛兰西是那些清醒地认识到工会不能超越资产阶级社会框架的工人领袖之一。但是不像列宁，他认为，单是工人委员会就可以在工人中间培育一种新的觉悟，并帮助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结构。他也对区分两种不同的自治——职能性的和政治性的——必要性有深刻的理解。他在《新秩序》的第一篇文章中（1919年6月2日），把这种

① 第一个内部委员会（*commissione interna*）是在1906年在都灵的"意大利"汽车制造厂的管理层和制造工人的集体谈判协议的基础上建立的。它的任务是解决集体协议中产生的纠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政府建立使内部委员会成为合作的工具，并在若干个工厂建立了内部委员会。

观点表达为这样的口号："在工厂，所有的权力归工人委员会"；在这里，工人必须开始选举他们的工人代表大会，并且应该和这样的口号相结合："所有的国家权力归工人和农民委员会"。这种观点非常自然地不能被工会的官僚主义者们所同意，后者阻止工人委员会向都灵以外发展。

在1920年的8月，米兰的金属制造业工人的一次长期罢工使雇主关闭了工厂。工人们通过占领一个又一个工厂来进行报复。甚至在此之前，工人们就偶尔地占领工厂，并在没有资方下继续工作。当时，米兰和都灵的大多数工厂都被工人们占领了。但是，整个行动没有充分地准备好，以至于在雇主们和政府的联合压力下，不久就瓦解了。政府答应进行改革，但在谈判结束后，它又放弃了通过关于工人控制法律的想法。工厂重新回到所有者的手中。面对工人们争取更大的工业控制权力的要求，雇主们变得忐忑不安起来。他们开始组织起来，并且到了1919年的春天，许多大工业家把法西斯看成似乎能够挟制工人阶级运动的力量，开始资助法西斯。1922年8月31日，工会号召的一次总罢工失败了，中产阶级开始更加倾向于法西斯。在1922年的10月，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几年之后，法西斯在意大利牢固地建立起来。葛兰西被捕，并被判处20年徒刑。

下一个被历史选择的国家是**西班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多年里，西班牙经历一个政治极不安定的时期；在这期间，军事独裁政权之间的交替更迭使政府几乎不存在。旧的君主制已经明显完蛋了，但国家似乎还没有成熟到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尽管如此，1931年还是宣布成立了共和国。一年以后发生了军事政变。1933年，政府镇压了一次广

泛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下一年，在亚斯都里阿斯，军队镇压了一个更广泛和更强大的运动。在这样一种气氛下，左翼政党在1936年2月中赢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在7月份，佛朗克将军开始了在摩洛哥的军事叛乱。内战开始了。

在内战的最初岁月，地方工人委员会主要执行着有效的政权职能，甚至军队也主要是由工人民兵组成的。在整个国家，工人们接管了被遗弃的工厂，而农民们接管了被遗弃的土地。工人们选举的委员会管理工厂，而农民们建立了公社。土地的集体化开展得更广泛，因为它遇到的阻力很小。公社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组织，货币在这里经常地被废除了。委员会是由 the 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 trabajo〈全国工会联盟，CNT〉中的坚定分子所组成，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很深，远离党的政策，并宣布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松散的地方公社的自由联邦的社会组织。CNT在加泰隆尼亚的影响最大，正是在这个地方，1936年10月颁布了著名的“集体化和工人控制法令”。这一法令要求，所有雇佣工人人数超过100名的工厂，那些被遗弃的工厂，所有者参加了叛乱的工厂，和那些有五分之三的工人要求集体化的工厂，都必须实行集体化。在集体化的企业里，管理权掌握在由企业委员会代表的工人手中。私营企业是在工人控制委员会的批准下由所有者经营管理。企业委员会选出工厂的经理，也包括政府的视察员，其责任是保证它遵守法律。各个企业委员会之间的协调和为各个产业制定计划的任务，交给了由企业委员会代表、工会代表和政府任命的技术人员组成的工业总委员会。在内战的环境下，这些措施没有得到试验的机会。加之，不仅敌人，而且据称社会主义的政府（如俄国和德国）也反对工人管理，并试图摧毁它。两年多以后，西班牙革

命终结了。1936年CNT的"*comunismo libertario*"（公社解放）被法西斯专政所代替。从匈牙利、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历史中学到的教训是：不成功的和半成功的革命非常可能导致法西斯专政。

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新的革命骚动，和新的实现工人自我管理的努力。1941～1945年和1948年的**南斯拉夫革命**（以后将要详细讨论），产生了一个完整的工人自我管理体制的第一次成功的实践。就像俄国革命影响了其它国家中许多模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一样，南斯拉夫革命使工人委员会广泛传播，并影响到它在若干国家中的建立。

受南斯拉夫影响最深的可能是**阿尔及利亚**。在那里，作为民族解放战争（1954～1962年）的结果，有利于社会改革的条件产生了。像以前的俄国、匈牙利和西班牙，工人们和农民们占领了被遗弃的地产和法国殖民地的机构。在1962年的春天，在工会的支持下，作为基本的民主形式和作为反对全国解放阵线独裁倾向的对立物，comités de gestion（管理委员会）自发地建立起来。1962年9月举行了第一次选举，并宣布在空闲农村土地上建立的管理委员会的合法性。第二年，著名的"三月法令"把建立管理委员会作为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的关键。南斯拉夫的模式被接受了：所有的全职工人组成一个职工大会，并在工人人数超过30人的企业里，选举工人委员会；该委员会选举管理委员会。但是，许多国家和党的官员们反对自我管理。国家机器一步一步地提高了对企业活动的控制，掌握了企业的资金，和用行政管理企业。最后，委员会被解散了。除了农业，企业被并入 societés nationales（国家协会）。南斯拉夫型的自我管理的企业制度被法国式的公共公司型的企业所代替。

自我管理再一次地退化成国家主义。但它的思想仍然存在着。1974年，当在国有企业中选举工人代表大会时，出现了一个新的开端。然而，工人代表大会仅仅是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

战后在更为发达的东欧国家中发生的事件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所有这些国家都是被苏联红军解放的。在1944年底和1945年初的所有这些国家里，各种形式的工人管理都曾自发地出现了。在东德，Betriebsräte〈工人委员会〉重新出现；在1945年2月的匈牙利，工厂委员会合法化；同一个月在波兰，通过了关于工厂委员会的法令；在捷克斯洛伐克，通过了建立企业委员会的法令。在国有企业中，最高的管理机构是由选举的工人（占三分之一）和当局在与工会商议之后任命的代表（占三分之二）组成。到了1948年，共产主义政治制度巩固了它的权力，工人委员会很快地就在这些国家中消失——被Gleichschaltung〈统一〉的苏联模式所取代。

斯大林逝世后，一个新的革命浪潮席卷了这些国家。斯大林死于1953年的3月。在7月，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示威游行，要求对工厂管理的更大的参与和自由选举。两个月后，东柏林的工人造反。在匈牙利，同一代匈牙利人第三次试图建立工人的管理。在1956年4月的布达佩斯，年青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成立裴多芬俱乐部，它很快就成为批评和抗议的中心。到了9月，工人们开始活跃起来，并开始要求实行“真正的工人管理”。到了10月底，整个国家处在革命的边缘。在1956年的11月份，自发形成的工人委员会得到了法律的承认。按照这个法律，由工人选举的委员会对企业进行管理，并对企业所有重要方面的事务做出有约束力的决定。地区工人委员会不仅协调各个企业之间的活动，而且也作为政权机构发挥作用。

对布达佩斯的工人委员会来说，上述情况特别是真实的。

俄国的军事干涉使这次运动结束。在一个月之内，中央委员会和所有的地方工人委员会解散了。不像1917年的革命，当时匈牙利被列宁当作一个同盟而热烈地欢呼；在1956年，它被当成是敌人。这绝不是偶尔的，也不是在历史上头一次发生的事情。在1917年，这两个国家都曾经历了社会主义的革命；在1956年，国家主义的苏联镇压了匈牙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像在1849年封建的俄国镇压了匈牙利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样。在被击败之后，企业的工人委员会继续存在；以前曾经使用过的一个策略又有了用武之地：工会被催促承担领导的角色。工人委员会在1957年丧失独立性，并被在工会领导下的作为咨询机构的企业委员会所取代。工会委员会的主席内定就是企业委员会的主席。11月17日，正式宣布立即取消所有的仍然存在的工人委员会。

在**波兰**，1956年的波兹南叛乱之后，各种形式的工人委员会在一系列的企业建立。在11月，通过了一个法律，规定由所有工人选举产生的工人委员会管理企业，提名和罢免总经理。然而，一旦局势得到了控制，当局就侵害了工人们的权利，使工人的管理越来越难以进行。1958年通过的一个新法律，明确规定了一个人的管理原则，自我管理为联合参与所取代。工人委员会、工会委员会和党委会一起代表自我管理的代表大会，这个大会被授权制定计划，但所有的决策都是由厂长做出的。

捷克斯洛伐克落后了大约十年。然而，当时间到来时，捷克人的努力显得更有希望，因为工业民主是在一个成熟的政治民主之内发展起来的。第一次自我管理的成份，和经济改革一

起，出现在1966年。但现存的国家主义机构成功地阻止了它的发展。布拉格之春，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在1968年的春天，旧的斯大林主义者丧失了权力，自我管理成为报纸和杂志主要讨论的对象。在企业，为未来的工人委员会而成立的预备委员会开始在全国建立。工会对此表示支持。实际上，在6月份，所有预备委员会的2/3就已经建立，它很快地就在1/2的产业机构中出现。政府宣布，将在年底公布一个解决所有关于自我管理事务的社会主义企业的法律。保守派当然反对。代表他们观点的是由两个党的最高主席团的委员为党的8月21日的决定性会议准备的、并在党员中传阅的一份文件。这个文件宣称，工人委员会的建立，产生了"无政府主义分子和反共产主义分子在委员会中窃取最重要的职务、并利用来削弱和摧毁党、工会和经济机构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的危险。必须注意发生在管理结构的这一转变，这一事实将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① 俄国的领导人赞同这个观点。实际上，它是一个引起灾难的信号。就在党的最高主席团讨论这个文件的那个晚上，华沙条约国的军队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占领当局的第一个政治命令就是解散工人委员会。预备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然而，它们的存在是非法的。宣布的关于社会主义企业的法律在1969年的夏天撤消了。1969年11月12日，最重要的工人委员会——即在普尔森的斯柯达工厂的委员会——的解体，标志着工人的管理的结束。旧的国家主义制度重新建立起来了。

我们现在可以总结我们的发现。在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

① M. Bárta, " Les conseils ouvriers en tant que movement socil ", Autogestion, 1969, pp. 9—10, pp. 3—36.

世纪中，除两个革命例外，所有的革命都产生了建立自治的努力。两个特例——中国革命和古巴革命——也许可以由它们的特殊性质来解释。[①] 例如，中国是一个欠发达的国家，军事政变和宣布与社会主义相联系的民族解放战争，可以被认为是和发生在某些不发达的非洲国家和亚洲国家的革命的性质是一样的。但是，这些革命都没有产生工人的管理。似乎是，除了社会革命外，一定的发展的最低水平也是产生工人管理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到，中国的农村公社和工业革命委员会极大地提高了普通工人和农民的参与程度。在毛泽东以后的更自由的时代，这种倾向可能继续向宣布的更加自治的方向发展。至于古巴，这个国家一直处在围攻之中。在这种环境下，分权作为明显的制度安排没有出现。另一个拉丁美洲的革命，1952年的玻利维亚革命，工人委员会在国有化企业中迅速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和自治是同一回事。

经常有人这样说，无论在哪里，建立工人管理的企图都失败了。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如此。在这个企图失败后，国家或者陷入资本主义，或者陷入国家主义。但因为失败就推论出，工人管理必定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这种观点是明显错误的。在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不经过反对即得利益的艰苦斗争和无数次的失败就能成功地一蹴而就的。在我们回顾

---

① 在中国，自1927年之后，苏维埃零星地组织起来，但它们与俄国革命时的苏维埃根本不同。毛泽东很好地说明它的性质："一些地方有了代表会，亦仅认为是对执行委员会的临时选举机关；选举完毕，大权揽于委员会，代表会不再谈起。名符其实的工农兵代表会组织，不是没有，只是少极了。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缺乏对于代表会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引自 E. Mandel, ed., *Contrôle ouvrier*, p. 296.（参阅《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中的"政权问题"一节）1927年12月，广东公社在一次起义中成立。E. 加洛蒂·皮斯切尔（Calloti Pischel）在她的论中国革命的专著中评论道："人民对民主选举红色政权的参与非常有限，根据可靠的消息，这纯粹是虚构的。"（*Storia delle rivoluzioni del XX secolo*, vol. IV: *La rivoluzione cinese*）

的这些事件中有意义的东西，不是目标实现的失败，而是不管所有的失败，仍然持续不断的努力。

第五节 建 立

到目前为止所描述的三次浪潮不能不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并且塑造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和神圣的社会生活的范例。权力机构开始改变。这是我们试图考察的第四个也是最表层的历史趋势。我们把这种趋势称作建立。

各种形式的工人委员会和劳资联合委员会（前者仅仅由工人组成，而后者还包括雇主的代表）与工会运动本身的历史一样的久远。这些委员会或联合会负责处理申诉、福利工作和就业的条件，它们的工作总是属于咨询性质的，雇主保留最后的决定权。但是，长期以来，它们的出现仅仅是偶然的①，并不代表一种制度。同样地，与处理工人在工厂内以某些形式进行参与的劳动立法（它总是局限在有关福利事务方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一个世纪的几个国家（例如，普鲁士和奥地利）。它们也是偶然出现的。在历史上，工人参与管理运动发展的第一次里程碑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中。

在战争期间，为了提高军需产品的生产，英国、法国和德国政府寻求（并且得到了）工会的合作。结果发展起来了各种形式的劳资双方的合作。发生在这些国家的事件是如此的重

① 最早在英国存在的劳资联合委员会，是一家生产可可和巧克力的叫做卡德伯里兄弟有限公司〈Cadbury Brother ltd〉．的“保尼维里劳资联合委员会”〈Bourneville Works〉。它是在本世纪初在该企业建立的。其目的被定义为雇主和工人的亲善。（A Works *Council in Being*. *An Account of the Scheme in Operation at Bournville Works*, Publication Department, Bourneville Works, 1921）

要，以至于有理由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按照魏特林委员会的历史学家J.B.沙默尔的观点，大战爆发的前三年是英国工业最动荡的年代。大战开始时，发生了100多次罢工。[1] 正是在这一时期，工团主义的运动在英国达到了最高峰，并且在1912年，矿工们和最大的四家铁路工会接受了由工人完全控制产业的要求。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即将到来的工厂的工人代表运动〈shop stewards' movement〉开始了(格拉斯哥工程师在1912年的罢工)。

一战前，工厂的工人代表是由工会从车间工人中间指派的小干事，他们主要负责收会费和组织新工人。他们没有代表不满的工人进行谈判的权力，也没有得到资方的正式承认。然后，大战开始了。这场战争，正如用一个雇主的眼光观察整个事件的C. G. 雷纳德所描写的那样，“没有得到认为这是‘他们的战争’的劳动人民的同情……大多数人认为，这场战争是资产阶级的战争，限制、控制和缺乏与憎恨同比例地增长……”。[2] 再加上1915年的“财政部协议”就足够了。在这个协议下，工会领导人自愿保证工会在战争期间不支持罢工。普通的工会成员的怨恨沸腾了。在1915年早期的克莱德〈Clyde〉的工程师大罢工中，罢工委员会蔑视了高层的工会领导人，取得了罢工的胜利，并始了以后被知道叫做“工人代表运动”，

---

① *Joint Consultation over Thirty Year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50, p. 16.
② *Joint Consultation over Thirty Year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50, p. 16.

并为这个运动树立了典范。[1] 由一个机构的所有的工人选举产生的工人代表委员会发展到了全国。在一定区域内的机构委员会组成地方工人委员会，后者又联盟成为非官方的全国的工人委员会运动。这个自发的运动和俄国的苏维埃运动极其相似。所以，十分自然地，在俄国的二月革命后，苏维埃在英国非常普遍。上面提到的1917年6月的利兹代表大会，号召建立工人和士兵的委员会。

不管所有的封杀，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工人代表运动使罢工造成的工作日损失的数量不断提高——在1915年，损失了200万个工作日，1916年是250万个，1917年，这个数字提高到550万个。这种紧张的形势召来了政府的干预。1916年政府任命了一个叫做“魏特林委员会”的组织，负责研究永久性地改善工业关系的方法。第二年，该委员会提出了它的雇主-工人的合作计划：在每一个产业里，组成一个能把雇主和工会联在一起的中央联合委员会和地方联合委员会；各个机构的劳资联合委员会应该提供一个在劳资之间进行商议的双方认可的工具。然而，除了政府部门之外，整个计划如同一纸空文：“雇主们，作为一个整体，从来就没有赞成过这个计划

① 克莱德工人的《声明》表达了工人们的典型心态：“我们认为，工会官员是普通会员的仆人，而不是主人。他们有时需要给一点压力，以便把他们推到普通会员希望他们走的道路上去。”（H. Wolfe, *Labor Supply and Regul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3, p. 151）克莱德工人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D. 克科伍德〈Kirkwood〉在1915年12月的一次会上，对来访的劳德·乔治首相说，他们组织的罢工是“公然蔑视你，公然蔑视政府……和公然蔑视工会官员”。（B. Pribićević, “Demand for Workers' Control in the Railway, Mining and Engineering Industries 1910 - 1922”, doctoral dissertation, Nuffield College, Oxford, 1957, p. 568.）可以和英国的工人代表运动相比较的是德国在1918年之后的工人委员会运动。与克莱德罢工声明相类似的是后来的1924年在杜塞尔多夫的制造工人的《罢工声明》：“在大多数的城镇，工会已经忠于由工人委员会宣布的总罢工。在那些没有发生罢工的地方，工人必须强迫工会参加罢工运动。拒绝的工会领导人必须被撤职。”（Guillebaud, *The Works Council*, p. 191）

……被工人代表运动吓坏了的工会主义者，对给予普通会员权力，显示出畏首畏尾，离中央组织远远的。”① 到了1929年，在响应魏特林委员会的建议而成立的大约100个劳资联合委员会中，仅有一半还存在。战争之后，政府否决了矿工们和铁路工人们的国有化和自我管理的要求。1921年开始的战后的第一次衰退，扼杀了工人代表运动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运动。② 局势再一次正常化了。资本主义的机器可以像从前一样运转。但并不完全像从前一样，因为种子已经播下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当上了战争部长的社会主义者在生产军需产品的工厂里发起了由工人的代表组成的企业委员会运动。在战后，这些委员会被解散了。德国政府在一战期间（1916年）也建立了工人委员会，宣称的目的是，为工人和雇主之间的更好的理解做贡献。不像英国和法国，德国在战争中战败。于是事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战败和伴随着俄国革命的巨大影响，爆发了1918年的德国革命。工人和士兵委员会遍布全国。极度恐慌的雇主们准备逃避全方位的社会主义。所以，在1919年的7月，德国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宣布了下述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宪法：“为了保护他们的社会和经济的利益，工资劳动者和挣薪水的雇员有权在每一个

---

① Seymour, *Whitley Councils Scheme*, p. 191.

② 在建立工人自我管理的理想破灭之后，工人代表运动经历了一个有趣的转变：从自我管理的热情支持者变成了它的可怕的敌对者。G. D. H. 科尔在为普里比塞维克（Pribićević）的《工人代表运动和工人控制》一书所写的“前言”中，这样评价在战争期间和战后领导了工人控制的两个运动：“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弱点是，他们从来不曾面对关于权力、大规模组织和计划的基本问题；而那些领导工人代表运动的人的弱点是，他们被车间的日常事务问题占去了大量的精力，从来不专心致志于阶级权力的中心问题，忘记了所有的对工作和车间的控制，甚至否认这种控制的意义，因此丧失了他们为之呼吁的群众基础。他们因此变成了集权主义者和极权主义的民主党人，并看不见与普通百姓相联系的工人控制运动的根本目的。”

企业中选举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并且有权选举每一个产业地区的地方工人委员会和联邦工人委员会的代表。"

在宪法的基础上，1920年通过了一个法律，该法律规定，所有的超过20名工人的企业必须建立劳资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职责是：监督集体协议的执行，进人制定劳动条件和未受更广泛协定调节的事务的协议过程，监视雇用和解聘，并且也向雇主提出改进效率和组织的建议。然而，如果没有积极的社会力量的支持，宪法和法律就是一纸空文。当时的德国工人阶级运动被深深地分割成为两个部分：工会和议会。掌权的多数派，是优柔寡断的，妥协的，和犹豫不决的，国家的官僚是怀有敌意的。工会是持批评态度的，并帮助扼杀了一个关于在企业之上参与管理的法案。这就给雇主们一个喘息的空间，革命的果实逐渐地被破坏了（1924年的经济危机也充当了一个不太重要的角色），然后消失了。1933年3月，当工会和劳资联合委员会二者都被禁止时——法西斯主义时代来临的标志，整个过程达到了它的终点。

至于讲到其它国家，提一下以下的历史事件就足够了。在1919～1920年之间，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挪威，出于同样的原因，颁布了关于企业委员会或工人委员会的法律。在南斯拉夫，提出了一个保护工人的法令（1922年），该法令要求从车间选出工人的委员，他们的任务是保护工人的利益和与雇主合作。雇主们和工会的态度不久就使这一法令形同虚设。在迟来的十年之后，在一个罢工时期后，法国的大众阵线政府〈the Popular Front government〉在1936年颁布了同样的法令，使工人的代表得到了承认，并给予每月与资方开会的权利。在美国，当一家铁路工会为了获得工作保障而要求降低成本时，一

个稍微不同形式的工会—资方在生产问题上的合作，在20世纪的20年代在的一家铁路开始了。其它企业和工会也试验着同样的方法，直至1929年的大萧条使这项试验夭折为止。十年后，钢铁工人协会在若干个小钢铁企业中发展了十分成功的合作计划。这个计划在二战中继续在30多个企业里发挥作用。①

在美国，第一个劳资联合委员会在世纪之交建立。到了1926年，它们在400多个公司存在着，包括像贝斯莱海姆钢铁公司〈Bethlethem Steel〉、通用电气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International Harvester〉和西屋电气公司这样的大公司。但它们的数量没有增加。足以使人奇怪的是，30年代的同情工会的立法，阻止了劳资联合委员会的发展。工会领导人认为它们是“公司的联盟”。在1937年，最高法院判定劳资联合委员会为非法组织，因为它们属于“受雇主影响、控制和设立的雇主的联合会”。很明显，“阶级合作”是不可取的。因此，美国的立法者和工会的领导人不自觉地接受了欧洲激进分子的“正确的阶级斗争方法”。我们在以后有机会讨论它的后果。

工人参与管理的第二个里程碑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出现。恰似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虽然在更大的范围内，事件的发展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循环。政府为了提高军需产品的生产寻求与工人的合作，并且许多国家（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建立了联合生产委员会。英国再一次胜利了，而德国又一次失败了。在英国，这种运动是自发的；而在德国，是采取立法手段。英国的矿工们再一次要求自我管理，这次他们得到了联合

① C. A. Myers,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Sweden*, Cambridge, Mass: Technology Press, 1951, p. 55.

商议。但是，这次运动也有若干新的特征。其中，最主要的特征是，在一些国家中的大规模的国有化；在另一些国家中的全面的国有化（东欧和远东亚洲国家）。当然了，在所有的国有化的企业中，工人和资方之间的联合商议，是作为一种重要的东西被引进来的。

在英国，战争期间，两个国民协议为联合生产委员会的建立树立了榜样。这个委员会是一种咨询性质的机构，它为雇主们和代表工人的工会之间就生产、福利、就业的期限和条件等有关问题交流意见提供了一个渠道。1947 年，国民联合商议委员会建议，没有建立雇主组织和工会联合商议机制的机构应该建立这种机制。这个建议被采纳了。不久，在英国，出现几百个这样的委员会。

在西德，魏玛时期的立法不仅复活了，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联合商议到共同决定。在两个基础产业——煤矿和钢铁——中的监视会上，一个任命管理委员会成员的机构，工会为工人的代表上赢得了的平等的权利。更有甚者，管理委员会的三个成员之一——人事经理——是由工会提名的（1951 年的法律）。在其它的产业里，工人的代表属于少数派，但这个少数（占三分之一）仍然比魏玛时期的人数大得多。雇用不少于 5 名永久性雇员的企业，必须选举代表工资和薪水劳动者的工作委员会（1952 年的法律）。为了促进工作委员会和雇主之间的合作，在超过 100 名雇员的企业中，必须建立一个经济委员会，其中，资方和劳方的代表人数各占一半。

在法国，1946 年通过了一个法律，规定超过 50 名工人的企业必须建立代表体力劳动者和技术工人的劳资联合委员会。资方的每一次重大的行动都必须得到该委员会的同意。如果出

现了意见分歧，就必须进行仲裁。

也在 1946 年，瑞典的工会和雇主联合会达成了一个协议，规定在有 25 个或 25 个以上雇员的企业里成立企业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被广泛地描述为在所有重要事务方面的联合商议。记录一个 1923 年发生的事件是很有意思的：当时，由 E. 魏格福斯（Vigforss）领导的一个皇家委员会提议：建立一个同样的联合生产委员会。无论是雇主还是工会，都反对这个建议，结果使之付之东流。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 1950 年，企业委员会在2 650个企业中建立，雇用600 000个工人。[①] 同样的联合商议委员会被引进挪威（1945 年）和丹麦（1947 年），并且通过一个特别的法律被引进芬兰（1946 年）。在奥地利，1948 年的法律使劳资联合委员会再次出现，并授予这个委员会参与管理的权利，这种情况在 1919 年是不曾存在的。在比利时，1948 年的法律创立了企业委员会。在荷兰，同样的委员会在 1950 年创立。在稍晚一点的 1966 年，内部委员会在意大利建立。各种形式的联合商议也在东欧的国家主义国家中发展起来。在苏联，1957 年有过一个尝试；之后，已经死亡的生产会议复活了；最后，在 1973 年，通过了一个相关的法律。

在许多其它国家，战前曾经实践过联合商议的国家，在战后继续发展它；战前未曾实践过的国家，在战后首次引进了联合商议。1951 年，“国际劳动者办公室”（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登记的具有**永久性**的工人参与管理机构的国家的数目超过了 30 个。工人参与管理的各国实践虽然不同，但

---

① C. A. Myers,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Sweden*, Cambridge, Mass: Technology Press, 1951, p. 56－58.

它们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它们都无一例外地局限在联合商议之内。但是，这仅仅是开始；在下一个20年中，参与运动变得更加强大，并获得了新的基础。发展不可改变地朝着共同决定的方向前进；偶然地，也朝着同等代表的方向前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人参与管理的运动也在非欧洲国家展开。阿尔及利亚的例子已经提到了。在独立的第一年(1947年)，印度通过了一个法案，该法案规定，一个正当的国家政府应该要求雇主成立具有咨询性质的、由雇主和工人代表组成的劳资联合委员会。在1957年，一个自愿的联合管理委员会的计划启动了。这个计划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观点的基础上，即“在社会主义的民主中，劳动者在发展的共同任务中是一个伙伴……应该有联合商议，并且，在任何时候，只要可能，工人和技术人员应该逐步地被结合到管理之中。”① 到了1969年，大约150个联合管理委员会和3 133个劳资联合委员会成立了。巴勒斯坦要求所有超过50名工人的企业的管理董事会中必须有工人的代表。在玻利维亚，1960年通过了一个关于联合委员会的法律；在革命后，又在1963年通过了另一个关于工人委员会的法律。在坦桑尼亚，1966年建立了咨询性质的工人委员会，并且在1970年把工人委员会引进公共企业。在土耳其、埃及和叙利亚，国有企业中引进了参与制。在委内瑞拉，1966年的一个法律要求在国家占主导的企业里，管理委员会中要有工人的代表。赞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其它国家也在进行各种形式的参与的试验。

一个特殊形式的工团主义在以色列发展起来。这个国家的

① Quoted in K. G. Alexander. *Participative Management*, New Delhi: Shri Ram Centre, 1972.

经济是公共部门占主导的混合经济。工会联盟，希斯塔德鲁特〈Histadrut〉，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工业康采恩，雇佣 1/4 的全国劳动力。希斯塔德鲁特证明了——虽然以前显示是不可能——工会可以同时作为讨价还价的代理人和作为雇主的代理人行事。1945 年，希斯塔德鲁特在它自己的企业里，建立了由工人代表和雇主代表组成的联合生产委员会，并且在和私人制造业者的谈判中达成了在私人企业里鼓励成立生产委员会的协议。然而，因为雇主的反抗和工人的冷淡，这个努力并没有成功。1956 年，努力重新开始，采取了“联合委员会计划”，该计划提供了除工资和福利之外对工厂内所有经营决策的控制。这个计划试图追求的是共同决定，结果却出现了联合商议。

以色列经济的另一个特征是**开布兹**〈kibbutz〉。开布兹这个词来源于是希伯莱语的 kvutzah，意思是“群体”。第一个开布兹建立于 1909 年。开始时，开布兹仅是农业公社的移民点，后来也进入了制造业。它们的产量占农业产量的 1/3 和占工业产量的近 1/10。每个开布兹的人数从 40 或 50 人到1 000人不等，但大多数开布兹的人数为 250～500 人。开布兹代表了当今世界上最激进的自我管理。开布兹的目标是个人与社会的完全的认同。所有的成员都参与决策，管理建立在轮流执政的基础上，成员的需要由在平等的基础上由公社的机构提供的。然而，开布兹雇用了不到 4% 的全国劳动力，这个比例没有变化。

就像开布兹主义一样，智利的“阿塞塔米托斯”〈Asentamiemtos〉也是农业移居地。它是在 1964～1970 年耕地改革所获得的土地之上建立起来的。经过几年的过渡之后，它发展成为具有不可分割财产的自治的农业合作社。在这个国家，在工

业领域，同样的运动自发地产生了——不顾政府、反对派和工会的阻挠——它代表了真正的工人自我管理运动。1968年以来，智利工人一个接一个地接管了被工厂主遗弃的工厂、已经或即将倒闭的工厂和经营不善的工厂。工人们承担了工厂的管理，继续生产，结果是避免了工厂破产，改善了企业经营。到了1972年，工人接管了100个工厂，雇用大约1万名工人。与此同时，政府和工会达成了在公共部门建立带有共同决定因素的联合商议的机制。军事政变终止了运动的发展，但每年仍有新的工人所有的企业成立。

智力的邻居秘鲁，也执行了土地改革政策，建立了自治的农民合作社。1968年的一个军事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建立了一个新的军人政权，这个政权以非正统的和非军事化的方式进行统治。它以大致的下列意思宣布了它的社会哲学思想：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了许多无法忍受的社会问题，经济发展缓慢，并且使秘鲁变成为经济殖民地，因此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东方的共产主义产生了极权主义的国家，在那里，劳动人民的政治自由被剥夺了，或受到严格的限制，因而也同样是不能接受的。幸而它们不是像人们曾经相信的惟一的两种选择。第三种选择，自我管理的社会——秘鲁人叫做democracia social de participaccion plena——是人民应该做出的选择。大规模的国有化，农业合作社的建立，制糖业的自治，是第一步。对于私人企业，政府则遵从一个古老的原则采取行动：企业必须按法律每年将一定比例的利润转入由工人委员会代表掌管的信托基金中，当工人委员会掌管的资金在企业总资本所占的份额的比重增加时，工人在管理上的投票权也将按比例地提高，这个计划的聪明的和有效的运用，实际意味着

用资本主义的机制剥夺资产阶级。但国家遭到意想不到的经济困难，维拉斯科〈Vlasco〉总统，改革的发动者，被推翻，工人管理部门的扩张终止了。

最后，要记录的是在全国范围内第一个成功地建立了工人自我管理机构的范例。1941～1945 年的民族解放战争使南斯拉夫革命成为可能，并得到了加强。由于游击队战争需要极大地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创造力，早在 1941 年，就建立了第一个地方政府组织和第一个工人参与管理的游击队工厂。武装斗争阶段过后的第一个五年是具有决定性的。1945 年通过的一个法律，要求作为工人的法律代表的工人委员与管理层、政府和工会建立联系，以保护工人们的社会和经济利益，提高生产力。在第二年，主要的经济部门开始实行了国有化，1948 年国有化完成。与此同时，工人的委员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工会的工厂分委会获得了向管理方提建议的合法权利。这代表着从控制到商议的倒退——类似 1917～1920 年期间使苏维埃运动倒退的危险的一步。然而，早在 1949 年，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机：在许多工厂里，管理人员（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积极地亲自参加了南斯拉夫的革命）和工人之间的协商自发地出现了。同时，共产国际自 1948 年起发起的持续多年的猛烈的进攻，作为一种力量，制止了阶级分化。1949 年 12 月，政府和工会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组建具有咨询性质的工人委员会的指示。在 215 个大型企业中，选举产生了工人委员会，其它企业也要求组建这种性质的委员会。到了 1950 年的中期，国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把委员会从咨询机构转变成为管理机构的法律：每一个企业的劳动集体都要选举一个工人委员会，只要这个委员会得到了工人们信任，它就作为企业的最高决策

机构发挥作用。委员会选举它的执行机构，即管理委员会，后者的职责范围涉及工人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决策的执行和由总经理、行政专家和技术人员承担的日常企业经营活动的调节和管理工作。资方—劳方的对立这个永久性的问题，并没有因为这个法律的一击而消失，但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已经创造出来了。到了1950年，已经充分地认识到，官僚组织产生了低效率和有害的社会关系。因此，引进工人的管理，将为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的制度改变扫清了道路。反过来，自治在社会生活的其它领域的发展，又加强了新的工业组织。生产者的自治，扩大到了工作场所之外的所有的代表机构，从地方委员会发展到联邦代表大会，并且产生了第二个议院——生**产者委员会**。1953年修改的宪法，充分地考虑到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工人的管理已经成为制度的一个部分。**

南斯拉夫的解决方案，不应该被看成是这一发展过程的结束，而应被看成是一个真正的自治社会的有希望的开始。到目前为止，自我管理已经在南斯拉夫的企业层次上合理地建立起来了，剩下要做的事情，是把它发展到其它的层面上；特别是发展到一种与自我管理社会相适应的、平等的、新的政治制度上去。

第六节 评 价

从历史上和从逻辑上来说，有两种关于工人参与管理的方式：一种是消极的、抑制性的；另一种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前者是首先发展起来的，并且是建立在下述的理由和行动的基础上：雇主和工人是两个利益对立的社会阶级，高利润意味着

低工资；反之亦然。因此，以或多或少的文明手段进行的阶级之间的战争，是一种正常的状态。在此基础上，工会作为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被创造出来了。在激进的形势下，当阶级的冲突加剧时，传统的集体谈判的手段辅之以**工人的控制**的要求。"工人的控制"是用来概括消极的和抑制性的工人参与的术语，它的历史起源已经在论"革命"一节中做了分析。它涉及的是，在资本主义或国家主义的制度框架内，工会或非官方的团体对管理权力的进攻性的蚕食。通过加强自己的组织，工人们迫使雇主们做出让步。工人们并没有对企业的经营做出积极的建议，他们并没有被要求这样做，因为这是资方的特权，工人们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因为企业不是他们的财产，工人们决定什么事情**不能做**。因此，通过限制雇主们的专制权力，他们提高了自己在蛋糕中所占的份额。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或国家主义），就不可能有合作。由于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废除资本主义，所以，这种态度有助于资本主义长治久安。曼德尔列举了现代的激进的工人控制的四个主要目的：①接触资金文件（公开账目！）；②控制报酬体制；③控制工作的速度；④控制解聘和拒绝关闭工厂。"我们要求完全的控制和工人的否决权，但我们决不为企业的资本主义管理承担一点点责任。"[①] 按照这种观点，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共同决定和自我管理才是可能的。

虽然雇主和工人的利益基本上是对立的，但并非总是完全如此。在某些领域里——例如福利、安全和健康问题——他们的利益并不对立，并且存在合作的可能性。因此，当工会仍然

① E. Mandel, "Contrôle ouvrier", *La gauche*, Brussels, 1970, p.50.

保留着关于工资率和工作条件的谈判权力时，工人将参加有关非矛盾冲突方面的事务的决策。以这种方式，消极的控制将被辅之以积极的参与。参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联合商议、共同决定**和**自我管理**。第一个阶段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制度框架，但对管理的独裁发起了一种重要的心理攻势。第二个阶段已经意味着权力的分享和权力结束的开始。前两个阶段的参与是过渡性的和高度不稳定的，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参与在第三个阶段达到了稳定，但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才会出现参与的第三个阶段。大多数发达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国家主义的，都处在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然而，到了 1977 年，九个国家（西德、瑞典、挪威、丹麦、奥地利、荷兰、法国、卢森堡和西班牙）通过了法律，要求主要公司的监视会和董事会中要有工人的代表参加——这已经是共同决定了。工人在管理中的代表仍然属于少数派，但有强大的施加的压力使工人代表的人数朝着对等和超出的方向发展。

在评价工人参与管理的发展时，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显得非常重要：

1. 建立联合商议的动机可以分为四种类型。首先，来自下面的革命的压力迫使雇主们和政府放弃了管理的独裁主义。因为这是非常激烈的利益的碰撞，所以，斗争的果实必须得到法律的保障才能保持（虽然法律的保障经常被证明是虚构的）。德国的例子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其次，在现代的极权主义的战争期间，政府对加快生产极为重视，因此对试图在雇主和工人的鸿沟之间构建桥梁的联合商议的计划和设计感兴趣。这方面的典型是英国和美国的事例。关于美国，"国际劳动者办公室"的研究表明："建立劳资

生产委员会的一般目的是，在每一个军需物品的生产工厂里，通过劳资双方的共同努力，提高战争物品的质量和数量。”从同一项研究的评价中可以看到这一目标的实现的程度，“虽然看起来没有理由怀疑这个委员会对工厂产量的提高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但许多的委员会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做出更大程度的贡献……”① 在得到战争合同的工厂中，建立5 000个这样的委员会，但大部分在战后消失了。

第三种类型的动机是，私人雇主不是由于法律的强迫，而主要是出自经济的理由接受联合商议的。这一点可以由C. G. 罗纳德下面的陈述得到说明，他本人就是在他的企业中成功地引进联合商议的一个工厂主，“首先要阐明的观点是，整个发展是导源于一个非常实际的需要：即资方为了顺利运转的实际利益而感到的更密切联系他们的工人的需要。”② 当一个人的管理过分生长时，就会出现这种需要。③ 在战争的动乱和工业的动荡的局面下，它变得更加迫切了。一旦劳资联合委员会成立，它很可能会在随之而来的军事和工业的和平时期继续生存下去。战争还有另外一种效应：它提高了被剥削阶级的自我意识，并使社会上层人员人道化，因此构建了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心理桥梁。④ 也有一小部分的雇主们是由于自己的缘故而对

---

①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Labor - Management Co - operation in United States War Production*, Studies and Reports no. 6, Montreal, 1948, pp. 197 and 257.

② *Joint Consultation*, p. 100.

③ “在许多的事例中，当各个雇主们或经理们面对飞快膨胀的人事问题时，就会产生这种想法。它的最初目的不外乎是寻找某种代替者，因为当工资花名册不断变长和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的比例不断提高时，直接的人事接触的丧失变得非常容易了。”这是另一个工厂主G. S. 华尔波利的证言。（*Management and Men*, London: Jonathan Cape, 1952, p. 69.）

④ “国家工业心理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小组记录道：“许多年轻的高级行政官员告诉我们，他们对联合商议的赞成态度是来自于他们在战争期间的服务的经历。”（*Joint Consultation in British Industry*, London: Staples Press, 1952, p. 69.）

联合商议感兴趣的，因为他们把它视为一种更人道的制度。这种欧文式的企业主，在早期阶段实际并不存在，他们人数的可能的成倍增加，会减少来自敌对的社会压力——无论是来自于他们的同伴，还是来自于整个制度——的程度。个别企业主的榜样、政府的反复干预，以及工人的教育水平的持续提高，逐渐会营造出使联合商议成为必不可少的管理常规的一种气氛。这种情况确实在当今的英国发生了。这正像国家工业心理研究所在调查了大多数企业之后发现，出现了另外一种类型的企业主，这些企业主“把联合商议看作是一种改善劳资管理的现代技术”。①

第四种类型的动机是最新酿造的。例如，在英国和意大利，工厂主催促工会承担起管理的责任，把这看成是使工人保持和平的手段。在经济萧条时，公司仅有微利，甚至一个小小的罢工也会使公司退出竞争的行列。因此，按照英国工业联合会的一个发言人的观点来说，共同决定是为了提高世界市场的竞争力而减少工业争端次数的最后手段。

竞争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因此，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竞争，即使改善了和工人的关系。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在资本主义充分就业的条件下确是如此。很清楚，如果坚持不懈地追求下去，这种竞争最终必须会导致资本主义关系的毁灭。但是，这并没有超出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的毁灭”，竞争毁灭了利润，又提高了利润。

国有化产业和国有化经济代表了一个特殊的情况。联合商议是这种制度得以运行的不可缺少的最低限度——就是说，使

① Ibid., p. 59.

它们为社会所接受。人们可以看到的惟一发展趋势是，工人参与管理的程度不断地提高，它或者是由统治官僚们授权的，或者是由工人们通过革命的手段挣得的。

2. 如果每一个人都按照各自的标准有权利和有机会怀疑来自上面的命令的合法性，那么，行政权威将被破坏。在这样一种组织中，纪律会怎么样？对我们具有“韦伯头脑”的一代人来说，这正是在涉及到工人管理计划的可行性时要问的问题。一个有效率的组织难道不需要服从吗？在这里，服从被定义为“仅仅以命令的内容作为行动基础的一个过程。”①

然而，实际上，关于联合商议和工人的管理的文献，包括更多细节的研究，并没有显示出有任何的“纪律问题”。在这方面，我不能比引用两个工厂主的证言做得更好了：“当我第一次在我的工厂里大规模地实行联合商议的机制时”，C. G. 华尔波利这样写道：“我的雇主伙伴们告诉我说，我正在向敌人投降。第一个结果将是工厂纪律的崩溃。在两年的实践之后，我发现，正好相反，工厂的纪律改善了。而且所有其它方面的所有权的合法利益也都部分地得到了迎合，这是我在4年之前相信是不可能的：生产提高了，缺勤减少了，消耗量下降了，并且节约了高贵的时间。”② 罗纳德解释了这一现象的秘密：“把管理的权威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这正是联合商议的全部哲学——比建立在专横权力的基础上，更加强了权威性。”③

几乎用不着再加上将同样的原则更有力地运用于一个以自

---

① M.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London: W. Hodge, 1947, p.300.

② *Management and Men*, p. 166.

③ *Joint Consultation*, p. 119.

治哲学为基础的制度的情况。1960年，一个在南斯拉夫的国际劳动组织的代表团发现："当劳动关系的自治机制剥夺了管理人员以前的权力时，并没有显示出他们的权威受到了损害……这无疑加强了集体对管理的地位，但没有显示出劳动纪律的破坏。"① 在智利，一项研究成果发现，在实行自我管理之后，工人的纪律改进了。② 自治代替了对服从的理解，即对行使专制权力的同意。通过消灭了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二元性和利益的两极对立，自我管理减少了冲突，改善了协调。

3. 到目前为止，成功的联合商议非常有限，我们在这里分析它的原因。按照麦肯德里克和罗伯茨对魏玛时期劳资联合委员会的评价，委员会"在保护工人的利益方面是有用的，但在真正参与管理方面没有取得任何成绩。"关于战后的发展，两个作者认为："在工人委员会存在的地方，一般的经验是，雇员们对他们的活动有强烈的兴趣……"③ 在英国，广大的工人群众对此是冷淡的，但委员会中的五分之四的工人代表是支持这种制度的，并对它有浓厚的兴趣。有意义的是，在调查中，有39%、48%和58%的例子分别显示出，联合商议的经历使董事长、高层管理人员和工人的代表采取了比以前对联合商议持有的更积极的态度；只有9.5%和1%的例子显示了他们对联合商议更加不赞成的态度。④

4. 其次，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基本关系出现了问题，因为，

---

①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Workers' Management in Yugoslavia*, Geneva, 1962, p. 203.

② J. Espinosa and A. Zimbalist, *Economic Democrac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8, p. 14.

③ T. E. M. McKitterick and R. D. V. Roberts, Workers and Management, Fabian Research Series no. 160, London, 1963, pp. 9 and 20.

④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Psychology, *Joint Consultation*, pp. 64—65.

这两个对立的双方用**联合**商议这个真正特别的术语来反映他们之间的关系。雇主一方在他的工厂里主动引进联合商议机制，不是要故意地和先发制人地阻止工会主义的发展。[①] 但即使它不是目的，联合商议也提高了工人对企业的忠诚，这种忠诚和忠实于所属的阶级是两种不同的和确实互相冲突的忠贞。[②] 联合商议产生了不属于工会官员的工人领袖，所以，它是“机器”控制范围之外的东西。因此，很清楚，工会并不热衷于联合商议的计划，并经常反对它。另一方面，如果工会或工人的代表寻求在联合委员会的参与，雇主们也将害怕侵犯了他们自己的特权。这一种不可救药的情形根源于双方的恐惧都是合理的这一事实。雇主们基本不愿意放弃他们的专制的权力，而工会基本上不愿意为生产组织承担责任——因为双方什么都得不到，而且丧失了他们各自的独立，以及丧失了所属团体成员资格所必需的忠诚。现状可能会继续保持下去，潜在的改变被阻止了。这种情况的逻辑结果是，工会和雇主勾结在一起反对工人；更加动荡的时期，这种勾结会公开化。这对我们观察的事情给予新的启示：可怕的社会力量已经并将继续反对工人参与管理。

5. 工会的自相矛盾代表的是**官僚组织**工作方式的例证。在一个利益对立的世界里，一个它的制度与工人们做对的世界

---

① 在描述美国的情况时，国际劳动者办公室引用上面的研究成果指出：“相当大数量的战前工厂的联合商议计划是主要由资方发展起来的，其目的是为了使工人对工厂成功的经营感兴趣；并且在许多例子里，是为了在下面切除工会主义的发展。

② E. Jaques 很好地描述了由此导致的工人内心的心理冲突：“它看起来似乎是，只有劳资双方相互斗争的时候，工人委员会的代表才能趾高气扬；如果没有出现斗争，他们就有一种犯罪感，仿佛他们没有做到他们被期望做的事情。”“……在企业中就业的愿望使工人们在就业的安全性方面更依赖厂方，而不是工会。这引起了工人的领导者对企业的忠诚和对工会的忠诚之间的尖锐的矛盾。”(*Culture of a Factory*, pp. 122, 179)

里,工人们为了保卫他们自己而组成强大的官僚组织:工会和政党。一旦这些组织建成以后,它们就获得了与那些支持全部结构人们的利益不同的独立的利益。在这里,不存在道德上的错误;即不是因为领导人的缺德而发生这种情况。它的出现是自发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走出死胡同的办法,从逻辑上来讲,是非常容易的:首先,必须运用组织来消除产生利益的两极对立的基本原因——在这里,是生产的私人控制;然后,组织的官僚原则必须被自治的原则所取代。然而,实际的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不大可能马上遵循这一条路线,它们已经成为现存机构的一部分,并在其中扮演明确规定的角色,所以不倾向于脱离生活的常规,而匆忙地进入全面社会化的不确定的环境中。另一方面,自我管理对官僚精神来说,是一种如此陌生的思想,以至于它必然会遭到猛烈的抵抗。

然而,这种情况不可能完全不变。没有人相信经济周期会消灭。但是,有某些理由相信,在我们这个世纪的后半段,工业国家的政府经受不住容忍严重的失业而甘冒社会动荡的风险。通过医治经济萧条,引起改变的第一个因素出现在过程之中:即社会控制的程度提高了。福利国家就是它的标志。然而,不间断的充分就业有一个彻底的反资本主义的效率:它促使资本主义在改善劳资关系方面进行竞争。因为雇主们对避免劳动人员的更新感兴趣,对躲避罢工感兴趣,和对克服引进新工序的阻力感兴趣;而工人们有了安全感,并且为了这个缘故,对他们的权利和行使这些权利的可能性有积极的觉悟。通过提高工人们的地位,雇主们逐渐放弃了他们的独裁权力,从而丧失了他们的社会功能。以这种方式,引起改变的第二个因素出现在过程之中:即工人参与的程度提高了,过程不可能总

是平稳地向前发展；然而，在革命的情形下，趋势更加明显。

自从欧文第一次在新纳拉克郡的试验以来，150 年过去了。雇主和工人的关系一直在经常地改变着。这种关系反映到雇主和工人之间的会面的性质上。这正像英国国家工业心理研究所非常恰当地描述的那样："过去的 150 年显出了一个从代理、谈判到协商的历史发展过程。"①我们可以在这个发展过程的终结处，再加上一个直接管理阶段。这个最后的阶段取代了劳资双方会面的性质，并联合了自治制度中的所有有关的利益。

过去的 50 年已经产生了大规模的联合商议。在最近的 20 年里，第一次做出了超越纯粹商议的努力。德国的共同决定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秘鲁的完全参与也是一个例子。各个企业已经开始朝着共同决定甚至真正的工人的自我管理的方向移动。遵循法国南部瓦伦西亚的宝梦达〈Boimondau〉表壳厂树立的榜样②，一个共产主义的运动出现在欧洲的好几个国家。通过把生产性财产看作是不可分割的社会财产，通过废除

---

① *Joint Consultation*, p. 29.

② 见 C. H. Bishop, *All Things Common* (New York: Harper and Brouthers, 1950)。在生存了 30 年后，宝梦达于 1971 年被出售。它的生命史是在其它的同样事业中非常有建设性的和代表性的。这样一种性质的公社，就好像是不同的文化海洋中的一个陌生的小岛。其创立者通常对这个充满着敌意的环境有免疫力，因为他们信仰他们的事业，并浸透着一种使命感。然而，新来者是被资本主义社会化了的，他们是为工资而工作，并对公社没有责任感，工作之后就退回到他们的隐居所里。生意萧条时，工资下降，新来者退出了；而生意兴隆时，就有使公社变成为一个资本主义企业的倾向。为了生存得更长久些，通过强烈的宗教信仰把公社封闭起来，与外面的会引起混乱的世界相隔绝，是有帮助的。因此，与各种欧文的公社、傅立叶的公社和其它公社相比，宗教公社生存得更长久。最显著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惟一的例子是美国的胡特里德〈Hutterite〉教友会。胡特里德人是 16 世纪在摩拉维亚组织起来的再洗礼教徒的后裔，并继续保留了这个教派的完整存在。考茨基在他的历史研究著作 *Vorläufer des neuren Sozialismus*〈《新社会主义先驱》〉(Stuttgart: Dieta, 1923. vol. II, chs, 1-5) 中认为，摩拉维亚的胡特里德公社，"对社会主义历史，具有最伟大的意义"，"因为它代表了异端共产主义的最成熟的产物。"胡特里德人于 1874 年移居美国，他们的定居地实行的是产品的公有制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度。重要的决定是由委员会或由男人的宗教集会做出的。1964 年，在加拿大和美国，有 154 个胡特里德聚居地和14 700人口。(见 V. Peters, *All Things Comm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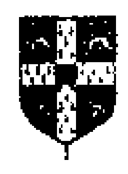
了工资劳动者，和通过渴望其成员的人类潜能的全面发展，这些自治的公社——这个词最初看上去非常的陌生，但以后在南斯拉夫（radna zakodnica）和秘鲁（comunidad laboral），它变成了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甚至宪法意义的一个术语——超过了生产者合作社。少一点雄心勃勃的，和少一点苛刻的社会要求的，但在经济上更适合生存的，是蒙德拉贡〈Mondragón〉计划，1956年在巴斯克地区开始的一个合作社的体制。蒙德拉贡证明了，在合适的制度安排下，生产者合作社不仅可以不经退化就能生存下去，而且甚至可以在像弗朗克的西班牙这样的环境中很快地发展。① 天主教教会的态度改变了。1961年罗马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在Mater et Magistra的通谕中宣布："沿着我们的先知们指引的方向前进，我们也感觉到，积极地参与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和在其中工作的企业的活动，对工人们是合理的……由工人对生产组织负责的锻炼，不仅反映了人性特有的合理的要求，而且也是和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历史发展和谐一致的。"

参与不仅是需要的，而且在经济上它也是比传统的极权主

① 计划是由唐·荷塞·马利尔·阿里曼德（Don José Maria Arzmendi）发动的。他于1941年定居蒙德拉贡，并为自己从来不为他人出谋划策而感到骄傲。作为曾经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站在共和国一边的参加者，他不能从事政治或工会活动，因此试图通过合作社来实现社会改革。他通过两个复活的教堂协会创办了一个工艺学校。第一个合作社于1956创立，有40个成员。到了唐·荷塞去世的1976年的年底，合作社已有了包括65个工厂和14 665个成员。两年之后，它继续扩张，增加了4个企业和1 500名成员。蒙德拉贡制度的基本特征是：（a）最高和最低的工资差距由15：1缩至3：1；（b）每年选举管理董事会和选择关键经理岗位的人选；（c）新成员分期支付最初贡献费；（d）剩余按比例地在再投资和其成员的个人信用账号之间分配；（e）"具体劳动"是对工人的年利息支付的源泉；（f）过去的劳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例如，当工人退休时，拿走了本金；（g）一个信用合作社作为投资银行发挥作用。因此，蒙德拉贡消除了导致其它生产者合作社失败的两个源泉：缺乏资本和随着就业扩张而造成的分享份额的减少，后者将使创立者把新来者当作雇佣工人来对待。（A. G. Johnson and W. F. Whyte, "The Mondragón System of Worker Production Cooperatives", *Industrial and Labour Relations Review*, 1977, pp. 18－30.）

义的管理更可行的。经济计量的结果表明，参与提高了效率。[①] 在英国、美国、拉丁美洲和其它地方，破产的或濒临破产的企业，在转变成为工人管理的企业之后，又有了新的活力。当遭遇到特殊的经济问题和传统的政策失败时，工人管理就试图作为一种解决办法。土耳其政府试图通过使工人参与管理来改善臭名昭彰的国有企业的亏损。在北部瑞典，由于私人企业为了得到政府补助而进入该地区，之后又宣称无利可图而撤离，使政府的工业化政策失败。于是就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应当建立工人管理的企业，并资助它们，因为它们不会撤离。在法国，参与制被认为是经济中增长的官僚主义化的惟一替代物。在英国，在资本和劳动的对立陷入僵局的地方，逐渐形成这样一种意识：如果经济的雪崩要被制止，传统的工业组织就必须被真正不同的组织所代替。在来自他们的成员的压力之下，工会已经开始改变态度。在修改的法律中，或在工会——资方的协议中，联合商议的范围不可避免地扩大了。共同决定被引进了社会福利的领域之中，并偶尔地超出了这个领域。毫无疑问，世界正在朝着一个社会主义的、自治的社会加速前进。

① J. Cable 和 F. Fitzroy 研究了 42 个被分成高参与和低参与的德国企业的样本。与后者相比，前者的人均产量高出 5 %，每一单位资本的产量高出 177 %，和盈利率（资本收益率）高出 33 %。（"Cooperation and Productivity: Some Evidence from West German Experience", P. 19, mimeographed.）



第6章

组织与效率的比较

我们的历史分析揭示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趋势，即社会正朝着自治方向发展。为了理解这一趋势，我们必须识别决定它发展的因素。至少有三个这样的因素：组织的可行性，经济效率的改进，和新社会秩序的需要性。一个历史上是可能出现的、更可取的和更有效率的社会，也是历史上必然的社会。在这里，“必然”表示这种社会最终建立起来的高度可能性。但是，高度可能性并不是绝对的；“最终”可能变成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如果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自治的社会主义就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梦想，而是一种可实现的规划，但它不是自动地实现的。在人类社会里，事件是作为人类行为的结果而出现的。社会主义可能很快就实现，也可能很晚才实现；社会主义可能有不同的特征，这些都取决于行动是否恰当。成功的行动的一个基本条件是，有一个好的理论。下面对促使社会向自治发展

的三个因素的分析，将使我们领悟到一个可以操作的社会主义的含义。一旦这个分析完成以后，就为一个有意义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　组织的比较

(一) 资本主义的组织模型

构成不同生产组织和整个社会组织的两个基本原则是：等级制和参与。前者产生阶级，并且在当今时代产生了资本主义或国家主义的秩序；后者意味着无阶级，并且是社会主义的组织前提。

这两个组织原则不是在形式上可以任意安排的逻辑分类，我们不能不顾及它们的社会内容而随便选择这一种或那一种。因此，同样需要我们进行一个简单扼要的历史分析。等级制原则出现得较早些，并且作为这种制度的两种表现之一，资本主义的组织更老一些。

封建社会是一种依附性的社会，一个家长式秩序的原型。农奴是完全依附于他的主人的，他不得不为他的主人工作和服从他。在另一方面，主人有他自己的义务：保护村庄，在危难时刻给予帮助，提供指导等。十分自然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这种依附的家长式的意识形态非常盛行。甚至像罗伯特·欧文这样的社会改革家，也完全是家长作风式的。贵族统治阶级，把对穷人的命运负责视为是上层阶级的责任。

在所有影响到全体穷人的事情上，穷人的命运都应受别人的摆布，而不应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不应

> 要求或鼓励穷人独立思考，不应要求或鼓励他们对自身进行反思和展望，以对自己的命运有所掌握。考虑穷人的事，对穷人的命运负责，这被认为是上层阶级的义务……上层阶级应有意识地展行这一职能，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应给穷人以信赖感，使穷人被动或主动地服务于为他们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同时在所有其他方面安心在上层阶级的保护下不闻不问国事，过太太平平的日子。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关系只部命是命命式的，应是融洽的、合乎道德的、富有感情的，一方给予慈爱和保护，另一方感恩戴德，表示尊敬和服从。富人应是穷人的父母，像教导和管束孩子那样教导和管束穷人。①

当资本的原始积累进行时，这个意识形态成为资本主义的有效经营的障碍。企业主需要高度流动的工人，需要保持一个失业大军，并需要最低成本的就业。因此，他们不想为工人们和他们家庭的私事所烦恼。发现了比肉体强制和自然责任的意识形态更有效的使工人服从的方法：这就是饥饿。早在 1789 年，约瑟夫·唐森德牧师就这样写道：

> 饥饿会驯服凶猛的野兽，饥饿使大多数邪恶的人

---

① J. S.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ook IV, New York: Kelley, Reprints of Economic Classics, 1961, p. 753. 注意到这一贵族的理论与在国家主义早期阶段上的一种杰出者的先锋政党的领导角色的惊奇的相似是很有意思的：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关系为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所取代。领导们不仅命令，而且说服和教育——一种慈爱的监护。群众不必自己思考，或试图决定自己的命运；他们被指望遵从。群众的命运受别人的摆布，而不是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党有绝对的政治垄断权力。

> 学会高雅和文明，服从和臣服。在一般情况下，只有饥饿才会刺激和驱使穷人劳动。然而，我们的法律却说，穷人们将不再饥饿；必须坦白，这种法律同样是再说，他们将被强制地从事劳动。但是，用法律强制劳动，会引起过多的麻烦、暴力和骚动，产生邪恶的念头，和从来不会生产出令人满意的产品和服务；而饥饿不仅是和平的、无声的和持续不断的压力，而且是刺激勤勉和劳动的最自然的动力，会唤起最大的干劲。……奴隶必须被强制劳动，但自由人应该自己来判断和决策，应该自己来保护他自己的享乐；并且当他侵犯了他邻居的财产时，他应该受到或大或小的惩罚。①

因此，为使毫无顾忌的资本主义剥削成为可能，个人自由、法律和秩序是必需的。同样，进一步认识到这样一个新的、与之完全一致的意识形态也是必需的，即服从和剥削是在契约关系的自愿基础上完成的。几年以后，在 1795 年，保守党的政治理论家爱德蒙德·博克〈Edmund Burke〉精确地和清晰地表达了这个原则：

---

① *Dissertation on the Poor Laws by a Wellwisher of Mankind*, Quoted in K.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71, pp. 113－14. 在《资本论》中（第 23 章，第 4 节），马克思说唐森德是"高雅的僧侣式马屁精"，因为他不仅发现了饥饿皮鞭的威力，而且把它作为一个神学的原则合理化了："这似乎是一个自然规律：穷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轻率的，所以，总是有一些人去担任社会上最卑微、最肮脏和最下贱的职务。于是，人类的幸福基金大大增加，比较高雅的人们解除了烦劳，可以不受干扰地从事比较高尚的职业。"正像我们将要马上看到的，唐森德准确地预言："济贫法有一种趋势，就是要破坏上帝和自然在世界上所创立的这个制度的和谐与优美、均衡与秩序。"

> 劳动是一种商品，并以这种身份，它是买卖的对象……当任何商品被带到市场上时，不仅卖主必须提出价格，而且买主也必须提出价格。但这一原则完全不适用于那些为了维持生存而把自己的劳动带到市场上去的人。惟一的问题是，它对买主值多少钱。①

中世纪的社会意识仍然非常强大，唐森德的忠告和博克的结论不能马上照办。完全相反，在 1795 年，布克郡〈Berkshire〉的法官通过他们的判决建立了被知道叫做“斯宾翰兰德法律”〈Speenhamland Law〉。通过给那些工资达不到生存收入的工人以户外救济，这项法律保证了“生存的权利”。“没有哪一项措施比这一项措施更受到普遍的欢迎”，卡尔·波兰依〈Karl Polanyi〉评论道，“父母们免除了子女的忧虑，孩子们不再更依赖父母们。雇主们可以任意降低工资，而工人们不管是勤劳还是懒惰，都免除了饥饿。慈善家们是把这项措施当作仁慈的法律而不是当作正义的法律来欢呼的……”② 然而，对它的欢呼很快就消逝了。“生存的权利”是与资本主义不相容的；这正像唐森德所预言的那样，它破坏了“和谐与优美”。这一个在开始时是为了雇工们的利益而援助工资的法律，变成了动用公共手段资助雇主们的措施。劳动的后备军大到足以使工资下降，工资和最低收入之间的差距是由公共基金来弥补的。低工资不利于生产率，这又为雇主不把工资提高到最低收入之上提供了进一步的口实。无论是工资下降，还是劳动生产率下

---

① 引自 Bendix, *Work and Authority in Industry*, New York: Harper and Son, 1959, p. 75.

②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 79.

降，都摧毁了工人们的士气，他们丧失了自尊，下降到乞丐的地步。到了1834年，人性的退化和社会的退化已经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至于任何东西都比工资的补助要好。斯宾翰兰德的慈善主义被更粗鲁的“济贫法改革法案”的合理性所代替。这个法案产生的结果，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社会主义朋友们的多年的注意。生存的权利为劳动市场上竞争的权利所代替，为像其它商品一样人们出卖自己的劳动的权利所代替。

从这时起，资产阶级的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把劳动作为一种商品来对待，把就业作为一种买卖关系来对待。如果某人是穷人，那一定是自己的毛病；或者是因为他劳动得不够努力，或者是因为他没有顺从非人格化的市场的命令。这是自然的情况。同样自然的是社会关系的等级制：像任何其它的商品，买主有权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置他所购买的商品——即劳动。这意味着雇主发号施令，而雇工必须服从。

国家在经济过程中的角色被缩小到了一个非常适度的范围。它应该保护法律和秩序，远离生产和劳动的就业。资本主义企业主的完全自由，被认为是理想的安排——在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也被认为是最有效率的安排。于是出现了被知道叫做laissez - faire〈自由放任〉的安排。

到目前为止所描述的发展，在企业内产生了权力的金字塔结构。雇主所有者站在金字塔的顶端，而工人们被压在塔的底部。命令向一个方向传递：自上而下。由于下述的原因，这种结构被证明是高度不稳定的。

如果工人是人身自由的，而雇主对工人的生活状况不负有责任，那么，封建社会的组织统一必定遭到破坏，于是出现了

两个不同的、分离的、独立的和敌视的集团。社会开始分裂成为两个新的社会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封建社会也明显是阶级社会，但在那里，为成功的剥削阶级组织而准备的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的工具并不存在。然而，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创造了这些工具，并且它们很快地就被使用起来。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共产党宣言》。在同一年，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用下面的话来描述新的情况：

> 可以断言……工人不会再屈从于宗法式的或家长式的政治制度了。我们之所以能这样说，是因为工人现在已经认识字了。能够读报纸和政论书籍，各种持不同观点的人已走到工人中间，诉诸工人的官能恒久感情，反对上层阶级所宣传和支持的信仰，许许多多工人已聚集在同一场所从事社会化的生产，铁路能使工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能像更换上衣那样更换老板和雇主，工人已可以通过参与政治生活。总之，工人阶级已开始自己照顾自己的利益，并正在不断向世人表明，他们的利益非但与雇主的利益不一致，而且是正相反的。①

工人们开始自己组织起政党和工会。在工业内，工会的存在意味着在同样这些工人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相反的结构。因此，完整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模型是由双重的金字塔构成的

①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 756.

(图3)：工人以工会的权力来对抗和抵消雇主的权力。现在，市场上的竞相争斗伴随着雇主和工会之间的竞相争斗，厂方接受了工会的存在。劳动是商品，而工会为这种商品的卖价而讨价还价。整个结构封闭起来，社会地位稳定了，而工会不再是革命的力量了。

另一种发展的出现要晚10年或更晚些。如果劳动恰好是一种商品，它就应该被当作商品来对待。一旦价格确定之后，劳动商品就和其它商品在生产过程中结合在一起。“科学管理”诞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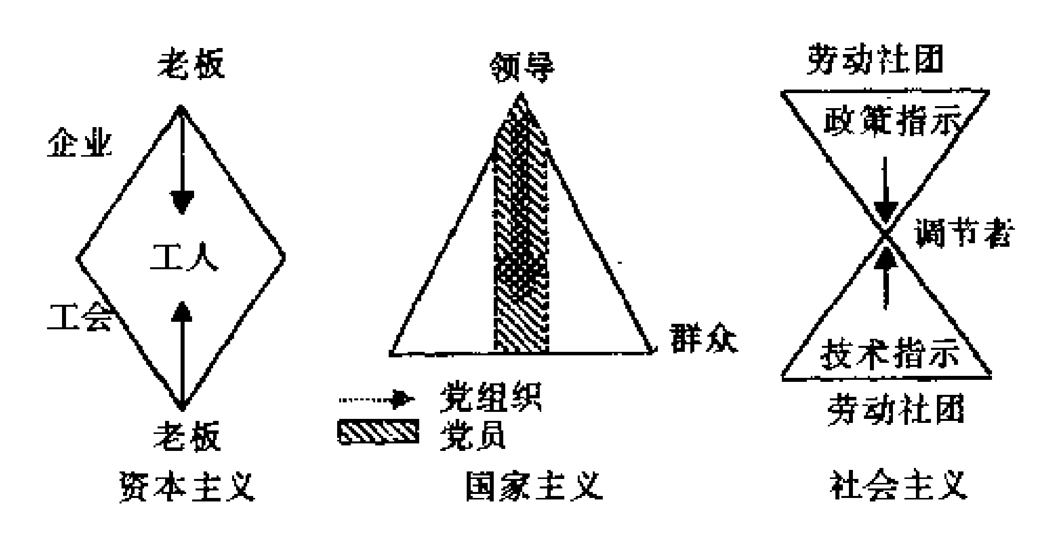


图3　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组织模型

科学管理浓缩了这种组织结构，并把工人看作是非人性的一堆肌肉和神经，它的创始人，弗里德里克·泰勒把这种方法概括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忠告：“为了成功，在所有的忠告当中，我的最简单：在每一年的每一天，每一个人都应该反反复复地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现在为之工作的头儿叫什么名字?’必须明确回答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这

个人现在要我做什么?'"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危机——它被委婉地说成是一个萧条——代表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个有读写能力的、受过教育的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工人阶级不再接受把他们自己当作劳动力商品来对待。工会发展成为有很大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全国性组织。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要求全面的国家干预。企业的规模增大了,而所有者逐渐被以前是企业的雇员的专业经理所取代了。竞争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演变成为有组织的、国家资本主义。资源继续通过市场来配置,安卓斯·帕潘德里欧〈Andreas Papandreou〉注意到[1],但不再由市场来配置。

这些变化意味着管理思想和就业关系的改变。"科学管理"遇到了麻烦。它发现,工人不仅仅是劳动商品和一堆肌肉,他们也是人。这种人憎恨等级制和没有意义的劳动。

然而,这两者都是不可避免的。没有等级制,全部制度将会崩溃。因此它宣称,效率需要等级制,而等级制是管理的固有特权,容不得工会讨价还价。在另一方面,做出了这样一个尝试,即用对工人表示出兴趣来代替有意义的劳动本身。以这种方式,"商品—劳动者"方法被称之为"人际关系方法"所取代。本第克斯〈Bendix〉这样描述了这个新方法的显著特征:

> 到了20世纪的30年代,把工人当人看的意识在美国雇主们中间非常普遍。不把工人当人看,被认为是士气低落、工艺低劣、不负责任和混乱的原因。管

① *Paternalistic Capitalism*, Toronto: Copp Clark, 1972, p. 6.

> 理层被他们的发言人指责为，忽视了给他们的雇员以“每一个人类所要求的生活：人格的尊重，人性的尊严，对环境的理解，和进一步发展的保障”……由于鼓舞工人们对他们工作的创造性兴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雇主们经常想的是，如何在工人中间营造出一种令人满意的感觉。“把工人当人看，表示你对他们的个人进步和福利有兴趣。”这就是说，如果工作被认为是没有意义的，就显示出你对工人们有兴趣。①

这当然是和弗里德里克·泰勒的忠告完全不同的。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使个人的自由成为强制性的。同样地，为了避免破坏性的不满，晚期的资本主义需要文明地对待工人。但是人际关系方法只不过意味着熟练地操纵人的情感，以保持企业能赢利。它看起来是可行，至少暂时如此。② 一个成功的经理被定义为，他能够控制他自己的情绪，而他的雇员和工人却做不到这一点。这就是一种情感的推销术或社交的技巧，它们确实是需要的。由于人类的尊严和社会的等级制是矛盾的，这种把工人当人看的新方法正好就是旧的家长制度的新形式。由于公司的规模巨大，工会的规模巨大，现代国家的复杂化，以及见多识广的精英们做重要决策的需要，这种家长制作风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中被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到处弥漫的意识形

① *Work and Authority in Industry*, p. 294.

② A·唐纳博姆〈Tannenbaum〉和他的同伴观察道：“美国工厂的工人……并不比其他地方的工人更感到异化。但事实上，他们在有关基本政策问题方面是无权的。因为‘人际关系方法’，在主观感觉的异化和客观经历的异化之间出现了不一致。……这种方法毫无疑问地减轻了某些等级制的心理效应，但是，它没有使等级制度有任何基本的改变。”（*Hierarchy in Organization*, San Francisco: Jossy - Bass, 1974, p. 220.）

态。普通的人并不参与决策，他充其量是承认他的领导的选择。

在20世纪的50年代，人际关系方法变成声名狼藉了。工会一直就持敌视的态度，而工人们不再愿意成为披着一层薄薄面纱的弄虚作假的对象了。不得不试验一些新的方法，如“使工作丰富多彩”了，“人力资源管理”了，等等。后者可以被解释成为：与传统的人际关系相对照，管理的任务不仅仅是摆弄雇员，使之服从经理的权威，而且发展雇员的“伙伴”关系或“家庭”关系，使每一个成员都能按照各自的能力和兴趣对组织的目标做出贡献。[1] 因此，资本主义组织的历史发展画完了一个圆。资本主义是通过摧毁传统（即封建）组织的社会的和情感的约束面开始的。它似乎通过以“家庭”和“伙伴”的情感关系补充自由契约关系来重建这些约束而结束的。最近由马斯洛发展起来的一个关于人类需要的理论（第15章第1节将更详细地讨论这个理论），被应用来指导制定一个关于开发未被利用的人力资源的政策。如果人是有创造性的、有责任感的和自我指导的，那么，管理者的工作就是营造出一种气氛来，使所有的“家庭”成员在这种气氛下都能做出最大的贡献。如果这意味着参与，那就让他们参与好了。

现在，在等级制度中，下属仍然是部下，尽管他开始参与了。工会仍然还有敌意，并且察觉到，这种人性化的运动，“是管理权力玩弄的把戏，是非工会状况在‘人性化企业’占优势的证明，是这个理论的从事者反工会或企图代替工会的花

---

① R. M. Steers and L. W. Porter, *Motivation and Work Behavior*, New York: Mc-Grw-Hill, 1975, p. 20.

言巧语”。[①] 工会并不反对工作上的自我决定，但不把它解释为自我实现。由于在当代资本主义企业里，自我实现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工会坚持集体的自我决定，这明显意味着强大的工会组织。

工会仍然是工人的组织。然而，如果这一制度要被保留下来，就必须对他们的活动施加非常严格的限制。“工业和平的实现”，帕潘德里欧观察道，“在大多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就是等于有组织的劳动者领导阶层以同等的资格被同化成为统治阶级的同盟，以同等资格被那些掌握关键控制权的人们接受。”[②] 工会的民主，就像“一党制的国家”，是受到严格的限制的。由于再回到车间意味着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大大下降，被认为是耻辱和失败，所以，工会领导人竭尽全力地限制民主，来保持执政的生涯。图3所示的双重的金字塔得到了最后的说明。在冲突的年代，两个官僚组织——工会和企业——的老板为达成协议而讨价还价。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种制衡的权力，只有在等级的官僚结构的条件下才能组织起来。官僚机构和它的老板的利益并不是必须与他们所代表的那些人的利益相一致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事实上，所有的有权势的官僚集团都有一个压倒一切的共同利益：保持权力机构的现状。

因此，制衡的权力受到了未被触动的制度的严格限制——即受到了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限制。

（二）国家主义的组织模型

英国是最古老的资本主义国家，研究资本主义的组织发

---

① J. Barbash, “Humanizing Work——A New Ideology”, *The AFL – CIO American Federationist*, July, 1977 pp. 8 – 15.

② *Paternalistic Capitalism*, p. 108.

展，最好是通过研究英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来进行，就像我们在上一节做得那样。同样地，苏联是最古老的国家主义国家，它为我们研究国家主义的组织提供了非常有用的经验材料。

与西欧的国家相比，俄国的经济发展落后了大约一个世纪。它的第一个两条长约1 000公里的铁路，直到1850年才建成。当时，国家仅有不超过2 800个工厂，雇佣大约860 000人。许多的受雇佣者并不是工业工人，而是农奴。农奴的解放始于1861年的法令，但是，这个过程持续了许多年才结束。国家是专制主义的，并且在这方面一直未被触动地持续到了今天。缺乏政治民主的经历，意味着人民是被当作臣民、而不是公民来对待的。工会是遭受压制的。第一次的工会代表大会是在十月革命之后才召开的。两个世纪的缓慢的工业化过程，靠的是的政府的支持和监督。由于这些原因，当1917年革命爆发时，早期的封建社会的家长制的意识形态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实际上，革命就是沙皇的独裁统治如此长久地生存到了当今时代以至于成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一事实的直接结果。

在革命期间，紊乱的国民经济逐渐发展到了完全崩溃的地步：生产大幅度地下降，纪律和责任心遭到严重的削弱。列宁在1918年敦促用法庭来灌输劳动纪律，以及工人在工作场合必须认识铁的纪律和无条件地服从苏维埃经理的一个人的命令。[①] 我们已经指出了处在蓓蕾之中的工人的自我管理是如何被掐掉的（第五章，第四节）。在革命之后，俄国社会在被围攻之中生存了20多年。这部分地是由于敌视的资产阶级的包

① V. I. Lenin, "*Immediate Tasks of the Soviet Government*" (April, 1918), and "*Left – Wing Childishness and Petty – Bourgeois Mentality*" (May, 1918)

围。但围攻和不安全的气氛，也是斯大林和他的宣传家们为内部镇压制造理由而故意创造出来的。这些特殊情形结合在一起所导致的最终的结果，我们已经在前面做了分析。沙皇和贵族们被国家和新的精英们取而代之。新的官僚机构继承了沙皇官场上的好的和坏的东西。国家的权力毫无阻碍地发展，直至社会的所有方面都受到了国家的调节和控制。以这样的方式，一个国家主义的组织体系发展起来了。

国家主义的组织是以 edinomachalie 或一个人管理原则为基础的铁板一块的模式。指令是单方向的：从社会金字塔的顶部向它的底部贯彻。波兰经济学家布罗尼斯拉夫·明克〈Bronislav Minc〉已经注意到生产资料国有制导致的四个方面的结果：在国家的账户下进行生产；国家管理和控制生产和分配；产生保护公有制不受集体所有制侵害的需要；和国家任命管理生产和分配的机构。[①] 由于明克不能设想存在着不是由国家来运行或由国家来控制的社会，所以他经常把社会和国家混为一谈，并且交替地使用这两个不同的术语。任何的控制权力和制衡权力的保护机制的缺乏，通常为解释为或辩护为，在这种社会里，不存在阶级和阶级矛盾。从而，每一个人都被放到属于他的位置上，任何的不同意见或反对，都被当作是捣乱的和反制度的(用一个相关的政治行话来说，就是反革命）而被粉碎了。

必须有领导和被领导，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后者是劳苦大众，前者是有天才的技术专家。“没有管理，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F.B. 沙迪柯夫〈Sadykov〉这样写道：“但是，管理劳苦大众是那些有才华的人的责任……他们拥有各个生产领

---

① *Ekonomia polityczna socjalismu*, Warsaw: Pañst wowe wydawnictwo ekonomiczne, 1963, pp. 56, 58.

域的高深的知识，对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非常熟悉，他们有很高的文化和智力。”当然了，这个制度的理论家知道，等级制度会产生利益的冲突。但是，沙迪柯夫很容易就处理了这个问题：“领导和劳苦大众在完成生产职能上的职务阶梯的差别不会产生矛盾，因为照顾社会的利益和为人民的福利而斗争，是领导的客观职责和使命。”①

国家主义的社会科学家不仅坚持等级制度，而且认识到他们的管理等级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是相同的。在缺乏一种批判的科学研究的气氛下，哲学家I·沃尔柯夫〈Volkov〉，党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所的一个部门的头，展示了这个问题是如何得到解释的：

> 在社会主义下，社会管理体制在外表上和那些以前存在的体制相似：以国家的形式进行管理，有一个专门从事各种职能操作的特殊的阶层。在认识论方面，这完全为反共产主义和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专家……捏造大开方便之门。在现实中，无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组织是如何形成的，无论它在外表上与资本主义的管理体制多么相同，管理的**本质**，管理关系的**本质**，具有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性质，是与资本主义的完全不同的。②

---

① In the anthology edited by V. G. Afanas' ev, *Nauchnoe upravlenie obshchestvom*, Moscow: Mysl, 1967, p. 61, 69. 这本书是苏联社会科学院的科学共产主义所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起准备的，所以可以被认为是最权威的观点。

②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Function of Management", in M. Yanowitch and W. A. Fisher, eds,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in the USSR*, White Plains, N. Y.: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1973, p50.

(顺便说一句，请注意附加词**反共产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涵义，并把它们与我们在第五章第五节的分析相比较)。

按照社会主义的传统，国家是镇压的机器，它的作用应当被减至最低。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和希望国家的消亡。而国家主义的理论家却不是如此。他们设想，国家的作用不断地提高，甚至在社会主义以后的社会里也是如此。N.A. 芬里弗洛夫〈Feliforov〉指出：

> 在共产主义建设时期，作为中央管理机构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作用提高了，国家管理共产主义建设的所有过程：共产主义的物资—技术基础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向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的转变，精神的发展，和对苏联人民的教育。①

这种被芬里弗洛夫称之为社会主义的特殊社会次序，不但不是缺点，反而被看作是它的主要优越性：

> 与以前所有的社会制度相比，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就在于，在这里，社会是作为一个单一的和完整的体制发展的，统一了（在民主原则的基础上）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为了取得这种统一，对社会所

① In. Afanas' ev, *Nauchnoe upravlenie obshchestvom*, p. 88. 这似乎已经忘记了列宁本人在他的经常被引用的1917年的《国家与革命中》一书中强调的："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并宣布马克思的关于过去一切革命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但这个机器必须打碎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86，194页)

有方面的集中管理是必不可少的。①

以这个模型为基础的组织原则叫做民主集中制。集中成份的涵义现在应该清楚了。另一个成份即民主，是以令人非常困惑的家长制的术语、一种人际关系方法的国家主义变种的术语来描述的：它“被表达为管理机构活动和训练的一种方法，以提高劳苦大众对直接管理的吸引力，发挥他们在建设一个新社会中的广大积极性和自我主动的创造性。”② 当这种自我主动的创造性与中心发布的命令不一致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却一点也没有谈到。米洛斯拉夫·福曼尼柯〈Miloslav Formanek〉表达了占领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当局的观点：“民主”意味着为社会主义和人民服务。至于由谁来评价人民的利益这个明显的问题并没有被解决，但是答案隐含在下面的段落里：“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民主给予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以最大的平等、自由和权利，但同时对少数人、对资产阶级和受其影响的人实行镇压。”③ 因此，任何反对的人，都可以非常方便地被宣布为一个资产阶级或受资产阶级影响的人；对他们的镇压是正当的。

为了能运转，迄今所描述的这个模型还需要一个精英集团，这个角色由执政党完成了。“苏维埃国家和其它管理社会

---

① In. Afanas' ev, *Nauchnoe upravlenie obshchestvom*, p. 97. 本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关于国家的思想，读起来仿佛直接启发了引文的作者：“正是国家教育了公民，使他们觉悟到了他们的使命，号召他们团结起来，公正地协调他们的利益，把在科学、艺术、法律、人类团结方面的成就传递下去。”（in A. Arblaster and S. Lukes, eds, The good Socie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 p. 317.）

② Feliforov, in. Afanas' ev, *Nauchnoe upravlenie obshchestvom*, p. 96. 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更精确的定义，见第二章第二节的毛泽东的解释。

③ M. Formanek, “*Preimućstva socijalističkog političkog sistema i čehoslovčko iskustvo*”, *Socijalizam u svetu*, 1977, no. 7, pp. 33–53.

过程的机构成功运行的基础，就在于党的管理和指导作用。”[①] 福曼尼柯争辩道，党的领导作用是社会主义民主的表现，因为党实现了人民的利益。国内的等级制度非常一致地被扩散到国家领域：“国家已经成为在苏联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世界的一个强大的组成部分。”[②] 作者想说的是，国家已经成为一个卫星国。亚姆波斯卡解释道，党“不仅表达了人民中间进步阶层即它的先锋队的意志，而且积极地影响了一般大众意志的形成。”[③] 党的意志和大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之间不可能出现分歧，“因为人民的利益——它们也是共产主义者的个人利益”。“共产党首先是从它自己阶级选拔领导者的”。[④] 这是一个新的组织成份，值得走得更近些看一看。

没有党，具有松散两头的金字塔将是高度不稳定的。在等级制上的位置，不是以出身或传统为根据的，也不是以在竞争的市场上的成功为理由的；而仅仅是根据（政治上的）功绩。在集权的——因而也是独裁的——背景下，需要有一个特殊的、能决定相对业绩的鉴别机制。党执行了这一职能。因此，党的作用就好比一个自上而下地穿透整个金字塔的螺栓，把所有的层面巩固在一起（见图3）。党从所有的社会阶层中间招募新成员，这代表着——与其它的等级制度相比——一个相对有效的社会向上流动性的渠道。这种流动性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下选拔党的预备成员。在他们成为党员之后的第二个阶段，其中最有前途的领导者被挑选出来

---

① Feliforov, in. Afanas’ev, *Nauchnoe upravlenie obshchestvom*, p. 88.
② Formanek, “*socijalističkog političkog sistema*”, p. 52.
③ C. A. Yampol’skaia, *Obshchestvennye organizacii i razvitie socialisticheskoy gosudarstvenosti*, Moscow: Iuridicheskaia Literatura, 1965, p. 32.
④ Sadykov, In. Afanas’ev, *Nauchnoe upravlenie obshchestvom*, p. 79.

承担党的各种专业职务。一旦党组织的某一个成员，不论男的或女的，也不论他或她的出身，提升得很快，这证明了这个攀升者有合适的能力并与相应的标准保持严格的一致（对领袖的绝对服从）。

相对高的社会流动性加强了党对社会的控制。这使人想起了马克思对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描述："当时的天主教会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来建立其教阶制度，以此作为巩固教会统治和压迫俗人的一个主要手段。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①

按照官方的意识形态，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实际上并非如此，按事情的真正性质，也不可能是如此。例如，在苏联的革命时期，党内的工人代表占党员总数的57%，10年之后，这个数字下降到仅为36%。一个政治的精英总是一个统治的精英，因此，它的人数是非常少的，而且主要来自较高的社会阶层。实际上，要发现国家主义社会里社会阶层的等级，最简单的方法是看党员成份中来自各个阶层所占的份额。表6就是对苏联共产党有关这一方面的分类。

社会集团的社会地位越高，该集团中党员的比例就越大。官僚阶层中的党员人数大于四分之三，而工人和农民中的党员人数不足十分之一。在1967年，工人的人数占总人口的54%，但仅占党员人数的37%。② 工程师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这与沙迪柯夫在前面的引文中所强调的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观点是一

---

①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79页。——译者注

② M. Matthews, *Class and Society in Soviet Russia*, London: Penguin, 1972, p. 218. 在列宁格勒，非熟练工人中，仅有3.7%是党员。

致的。然而，即使是统计的资料也会产生误导。真正的决策不是由党员做出的，而是与民主集中制原则相一致，由党的组织做出的。在 1966 年的第 23 次党代会上，4 934名代表中，仅有 23%的工人代表和 11%的农民代表。代表大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会中（360 名委员），工人和农民所占的比重下降到了无足轻重的程度。①

表 6

苏联共产党的组成，1966 年

社会各阶层的种类（重叠）	总人数（百万）	党员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占全体党员的百分比
行政干部、管理者	1.2	76	8
工程师	4.4	40	15
知识分子	11.2	36	38
工人	51.0	9	37
集体农民	30.0	7	16
商业、服务业和其它职务的工人	14.4	4	4

资料来源：K. W. Deutsch,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0.

另一种分析党员成份的方法是按受教育的程度来对其分类。下面显示的是按 5 个受教育的级别对全体党员的分类（以

① K. W. Deutsch,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0.

每一个组别中党员所占的比重来衡量)①:

受过8年级或少于8年级教育的人中党员人数占7%

没有完成高中教育的人中党员人数占11%

完成高中教育的的人中党员人数占18%

完成高等教育的人中党员人数占22%

有硕士学位的人中党员人数占46%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就越有可能成为党员（反之亦然）。在受过最好的教育的人中间，每2个男人或女人中就有一个是党员。政治精英同时又是教育精英。

我们可以总结我们的发现。

不像是资本主义，在那里，政治领域（民主）和经济领域（独裁），宏观层次（市场）和微观层次（管理），应用的是不同的组织原则；国家主义的组织是完全一致的，同样的原则应用于所有的地方。这些原则被叫做“列宁主义的管理原则”，其特征如下：

①政治和经济领导的统一表现在党的领导作用；

②民主集中制，在任何的管理体制中，都意味着经理人员总是由上级权力机构任命的，而不是选举产生的；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总是对他们的上级负责，从来不对被他们管理的那些人负责；

③一个人的管理，按照苏联的一个作家的观点，意味着

① M. Hzirszowicz, " Is There a Ruling Class in the USSR? —A Comment ", *Soviet Studies*, 1976, no. 2. pp. 262－273, espec. P. 267.

"在每一个生产单位……国家指定一个惟一的行政官员担任领导，他具有发号施令的必要的权力，并对该单位的工作负全部责任。该单位的所有人员都必须执行这个领导的指示。"①

在国家主义的组织模型中，等级结构的完成，靠的是把金字塔的顶端和底层联系起来的一种特殊的装置——党。除了执行保持结构稳定的一体化职能之外，党还是一个权力的工具。党支配社会，党的组织支配党员；党的最高领导，由专业的政治家所组成的，支配党的组织。W·布鲁斯观察到，不是党的代表大会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而是中央委员会选举党的代表大会。与资本主义的不同，政治的和权力的金字塔是重叠在一起的，实际上是同一的。整个社会组织得就像一个单一的、内部分层次的、靠党保持统一性的巨石般的金字塔。按照上面引用的国家主义理论家芬里弗洛夫的观点，这正是它超过所有以前社会的巨大的优越性所在。

（三）社会主义的组织模型

正如已经提到的，一种社会主义的组织模型的构建原则，必须使产生阶级分层的等级制度消灭。这是通过这样一种特别的方法来完成的：没有制衡的权力，因为这会产生竞争的官僚集团；没有党的箭头，因为这会产生单一的、有无限权力的官僚集团；而是由同样的人民把劳动和管理结合在一起——这就是自我管理。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组织模型可以被形容为双重的和单一的金字塔，而社会主义的组织模型被我的学生形容为"沙漏"（图3）。我们也可以说，资本主义的组织意味着双重的权力，国家主义的组织意味着一种单一的权力结构，而社

① M. Yanowitch, *Social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in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Robertson, 1977, p. 137.

会主义组织的权力结构是真正多元的。最后，我们可以从所有制方面来区别这三个模型的特征：资本主义的组织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国家主义的组织是建立在国有制的基础上；而社会主义的模型是建立在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

在这里，应当澄清一下等级制的概念。等级制涉及到与主要的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如果要想避免无可救药的混淆，就必须把这两种不同的等级制明确地区分开来。等级制可以与协调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也可以和控制的活动联系起来。在后者的情况下，它是授予权力的基础和控制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在前者的情况下，它是没有利益冲突的中性的权力。协调的等级制是劳动分工的产物，因而是永远存在的；指挥家总是要指挥乐队的。控制的等级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因而它是一种社会的现象，并将随着剥削的社会关系的消亡而消失。

像其它的许多社会关系一样，等级制可以是形式上的（涉及到手段），也可以是实质性的（涉及到结果）。不能区分这两种不同的等级制，也会导致频繁的混乱。等级制的这两个方面不一定必须是正相关的。形式上的等级制的减少，会导致非正式的等级制的提高。例如，当等级层次的数目减少或被取消（每一个人都决定每一件事情）致使局面混乱到非正式的派系掌握了控制权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沙漏模型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察的基础上的，即存在着两个基本不同的活动或决策的领域：第一个领域与价值判断有关，因而，每一个人都应包括在内；在第二个领域内，有关技术方面的决策，是在技术的能力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做出的。第一个领域的决策是政策方面的指示，第二个领域的决策是技

术方面的指示。前者是在组织的所有成员都行使的政治权力的基础上做出的；后者是在每个成员在劳动分工中生长起来的特殊的专业权威的基础上做出的。很清楚，这样一种组织涉及的只是协调的等级制度，但消灭了权力的等级制度。

一旦沙漏组织模型为社会所接受，我们可以期望，无论是社会所希望达到的觉悟，还是实际的关系和行为，都将出现根本的改变，生产活动民主化了，而异化减少了①；经理们成为协调者，而不再被当作比工人们更有权力的集团来对待；与传统的预计相反，虽然经理们被剥夺了专制的权力，但为解决问题而获得的权力总量增强了；与"经理们"相比较，工人们不再对他们的收入和地位感到不满意，最高和最低的收入之间的差距缩小到了几倍；流动的**机会**提高了，但沿着社会等级阶梯向上爬的**野心**，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着，减少了；控制的机构不再主要是监督的机构——虽然它们还有这种职能，而是一种处在同等地位的机构；并且，主要的控制手段，不是胡萝卜和大棒，而是社会的批评和表扬。总而言之，我们将期望一种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出现。并且，上面列举的这种生产关系的种种显著的特征并不仅仅是一种合理的期望；实际上，它们已经通过经验性的研究被发现了。②

在沿着这样一条路线组织起来的社会里，第二章第一节所描述的二律背反，由于不真实而消失了。没有私人所有制，也

---

① 可以在 A·怀特霍恩（Whitehorn）的比较南斯拉夫和加拿大的企业的著作中发现这一点。（"Workers; Self－Management—Socialist Myth or Prognostication", *Revija za sociologiju*, 1976, no. 2－3, pp. 17－30.）

② 见 A. Tannenbaum et al. *Hierarchy in Organizations*, pp. 73, 77, 86, 100, 108, 143, 213. 这是由一个国际小组承担的国际比较研究项目。这个项目比较了南斯拉夫、以色列（20 个工人管理的工业企业）和奥地利、意大利和美国（30 个创传统的资本主义企业）。我们仍然缺乏比较国家主义企业的经验数据。

没有国家所有制，只存在社会所有制；既不是单独依赖市场，也不是单独依赖计划，因为它们是相互补充的，并且市场是计划的 sui generis〈独具一格的〉工具；货币和利息成为单纯的经济调节的工具；既没有个人主义，也没有集体主义，有的是每一个合作的个人的人性的全面的和自由的发展；既没有私人的竞争性，也没有政府的命令，有的是联合劳动组织中的个人的积极性；既没有（资本主义的）民主，也没有（官僚主义的）专政，有的是自我治理。

在我们目前的研究阶段，我还不能对所做出的陈述给予详尽的说明。随着分析的进程，它们将得到说明和证明。在目前的阶段，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和理论范畴与那两个阶级社会的制度和理论范畴加以对照，就已经足够了。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不同的，她是与我们时代存在的这两种社会秩序完全不一样的。

第二节　效率的比较

这里使用的**效率**这个术语，是指可获的资源的最好的可能的利用。如果“最好的”关系到经济的福利，我们就说是经济效率。这一节研究的是经济效率。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可获得的资源是指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不同的社会制度以各种不同的效率程度来利用这些可以获得的经济资源。在这方面，我们感兴趣的是，比较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效率。

经济效率——或低效率——可以方便地就微观经济或宏观经济的内容加以讨论，就是说，它可以关系到单个的生产单位，也可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据说，在资本主义，企业是

合理地组织起来的；而由于商业循环、失业和缺乏经济活动的协调，这个制度在宏观上是低效率的。另一方面，据说，国家主义在宏观经济水平上是合理的；但由于官僚组织的窒息效应，它在企业的微观水平上是不合理的——即低效率的。这两种结论既不是正确的，也不是完全的。它们仅仅是以两种有关的标准来对待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国家主义（国有制）。以下的分析将显示出，这两种制度无论在微观上或是在宏观上都是低效率的。

（一）资本主义组织的低效率

可利用资源既定时，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经济能实现的目标，要低于客观可能实现的目标。这种制度的低效率在两个水平上——即在企业（微观）和国民经济（宏观）——都是显而易见的。

企业。低效率的根本原因可以在雇主和雇工之间的基本社会冲突中被发现。阶级冲突至少导致了 5 种类型的低效率。

1. 由于工人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譬如说为老板而工作，他的工作努力不是最佳的。他缺乏合适的**动机**。这一事实早已被半个世纪以前的精确的经验的证据资料所揭示了。在 20 世纪的 20 年代的末期，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爱尔顿·马尤〈Elton Mayo〉教授和他的研究小组在美国的西电气公司的哈绍尼〈Hawthorne〉工厂进行了一项社会学研究。这项研究发现，在一个工人的灵巧和智力和他的劳动产品之间没有相关的关联。只有存在一个合适的动机，一个工人的潜在能力才会转化为实际的工作努力。这项研究发现，工人是在大大地低于他们的潜在能力下进行劳动的，而且，无论雇主采取什么样的刺激手段，劳动的生产率是由劳动团体的一致的默契来控制的。第二

次世界大战严重地削弱了资本主义的专制秩序的合理性。出工不出力已经成为最明显的现象，甚至用不着再进行专门的研究了。1959年，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观察道“关于当今美国工厂的工人的最明显的事实是……他缺乏对劳动的兴趣。”①这种对劳动缺乏兴趣表现为：旷工、很高的劳动消耗量和很差的劳动纪律——在贝尔的观察之后，所有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糟了。莱纳德·伍德考克，美国主要工会领导人中不太保守的一个，在1974年的一次会见时，非常有特点地指出：

> 旷工在过去的5～7年翻一番这一事实说明了，这不仅仅是一个工厂的问题，因为今天干活的方式和7年前的没有任何特别的改变……足以令人奇怪的是，旷工不仅发生在装配线上的全体工人中间，而且也发生在那些不是应用装配线技术的工厂里……我们真的不知道原因何在，我们就是不知道。②

但是，我们知道原因何在。让我以引用华盛顿的美国大学的威廉·哈勒尔（William Halal）的话来结束这个美国的对话——同样地，也可以构建法国的、英国的和瑞典的对话。

---

① D. Bell, "Work, Alienation and Social Control", *Dissent*, Spring 1974, pp. 207-212. 一个官方的特别工作组报告说：“工人的生产率低下——这是用缺勤、自发罢工、故意损坏、产品的粗制滥造和工人们非常勉强地完成他们的工作任务来衡量的。更有甚者，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由于劳动问题的提高，可能会导致身心健康的下降，家庭的破裂，和对社团参与和凝聚力的下降；而吸毒、酗酒、打斗和犯罪会提高。”（J. O' Tool et al., Work in Americ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3, p. XVI.）

② Interview with Leonard Woodcock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Automobile, Aerospace and Agricultural Implement Workers of America), "There's Still a Car in Your Future". *Challenge*, May-June 1974, pp. 29-36, quote from p. 30.

> 因为官僚机构提供的典型的劳动角色是高度专门化的，结果是常规的工作不能提供足够的兴趣和挑战，以满足当今更熟练的工人的需要。而且，官僚机构所使用独裁主义的和集权的方式变得日益不能接受了，并且经常产生了一种被压迫的感觉，因为雇员们被阻止有效地影响他们自己的劳动生命。结果是，工人异化的问题，在许多的雇员的团体中间，在大多数蓝领和白领工人中间，甚至在中级的经理中间，已经成为普遍经历的现象。①

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工人，为了减少老工人的替代成本和新工人的训练成本，雇主们甚至发明更为精巧的劳动分工和任务的专门化，与可以控制劳动速度的装配线技术一起使用。结果是：劳动变得令人厌恶的，工人的自治减少了，工作的自豪感被粉碎了，工人的不满和抵抗提高了。出自于工资要求原因之外的罢工更加频繁地爆发了。②

2. 为了从工人那里诈取劳动，雇主必须严密地监督工人的工作。正像德姆塞茨所指出的，在没有主人监督时，人们有一种停止工作的自然倾向。在管理文献中，一个监督者最有效的监督范围被认为是监视37个工人，而在较低水平上的日常管理中，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比例可以高达1：30。按照这样

---

① "The Post -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Bureaucrat*, 1974, pp. 285 - 300, quote from p. 291.

② 在英国，所有罢工中的四分之三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罢工，特别是与冒犯劳动的安排、劳动的规则和劳动的纪律有关。See C. Patema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56.

的比例，一个有4000人的工厂就会有11个权力层次。[1] 不用说，监督成本十分巨大。此外，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也必然地提高了。如果每增加一个等级，报酬提高25%，那么，最高的薪水就会是工人平均工资的20倍。另一方面，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指出，在社会主义的农场或工厂里，工人不是受他的主人监视，而是受他作为其中一个成员的整个公社的监督。

3. 在独裁主义的制度背景下，管理当局对**创新活动**的推动力是很弱的。至少有三个理由可以说明这种情况。由于工人被当作工具来对待，创新活动的必要的社会气氛是没有的，而创新活动被认为是管理人员的事，虽然设立了对创新的奖励，其作用被证明不是十分有效的。其次，由于创新的收益归“他们”所有，为什么“我们”要为此操心？最后，作为工人和管理层正常的中介的工头，为了他自己的生涯，有充分的理由可能会——并且通常这样做——蔑视在他管理下的工人的创新才能。一个有创新能力的工人就是工头无能的证据。创新是危险的和不受欢迎的，因为创新可能破坏了现存的地位和权力的均衡。

4. 在公司制中，经理的行为和对经理的**制裁**机制之间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被破坏。经理犯错误，而股东受惩罚。对管理无能的制裁机制是缓慢的和低效率的，虽然市场的最后裁决

---

① 在20世纪60年代的早期，洛克希德火箭和宇宙公司（Lockheed Missiles and Space Co.）有两个层次的监工，4个层次的经理，和一个理事会——共7个等级。如果把这一条监督线的助手们包括进来，就有11个等级。该企业在最高水平上的管理的比例是：1:5～10（一个上级对5～10名下属），在中级水平上的比例是：1:15～18。（H. Koontz, “Making Theory Operational”, in J. H. Donnelly, H. L. Gibson, and L. M. Ivanchevich, *Fundamentals of Management*, Dallas: Business Publications, 1971, pp.77－91, p.84）

——破产——将起作用，但它对社会而言是非常昂贵的制裁机制。

5. 最后，**讨价还价**的程序是非常昂贵的和费时费力的。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工人们必须组成工会；维持工会机器的运转，当然包括真实的费用。维持雇主的组织也同样如此。罢工和不准〈工人〉进厂〈lockout，是资本家用以胁迫工人接受其条件的一种手段〉，就是资源浪费的明显例证。如果不是在进行的相互斗争中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牵扯进去的人们本来可以从事更有价值的生产性工作。P·查鲁〈Chaulieu〉很好地总结了这个问题：

> 如果一个自我组织可以容纳1 000个人。资本主义从中任意挑选50个人，授予他们管理的权力，并决定让其他人成为这些人的下属。比喻地说，95%的社会主动性和干劲已经丧失掉了。但是远不止如此。由于这950被忽视的个人不是**下属**，只是资本主义强迫把他们塑造成那个样子的，这些个人将对社会强加于他们的制度进行反抗和斗争。创造性的才能，被代表这一社会次序的势力拒绝承认（它们也拒绝承认这个社会次序）和禁止施展，现在被运用来反对这个社会次序。一个持久性的斗争在社会生活的中心发展起来了。很快地，它就成为进一步浪费的源泉。一小撮发号施令者不得不把他们的时间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时间花费在组织那些下属进行劳动，另一部分花在寻求抵消、分化、瓦解或操纵他们的反抗。管理机构的职能不再单纯是组织的工作，很快地就采取了所有

> 种类的强制手段。事实上，那些在现代大企业掌权的人，花在组织生产方面的时间，要少于直接或间接地花费在对付被剥削者反抗的时间——无论是监督问题，质量控制问题，计件工资问题，“人际关系”问题，还是和工人代表或工会代表讨论问题。当然，除了所有这些以外，为预先处理工人们可能发动的反对新的剥削方法的反抗，永远占据那些掌权人的注意力的是，必须确保每一件事情都是可以度量的，可以量化的，和可以控制的。①

在**国民经济**的水平上，人们可以识别下面的低效率的原因。

1. 阶级的对抗妨碍了可利用的人力资源的最佳利用。存在着巨大的**智力资源的浪费**。社会的教育、文化和医疗设施不是为了那些将从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人而使用，而是按照申请者的阶级地位而有差别的使用。这个问题已经在第3章的第1节和第2节触及到了，值得在这里做进一步的讨论。在战前的英国，所谓的公立学校（私人资助的索取学费的学校）的毕业生占总人数的2%，但是他们统治国家的机会——即成为国会的议员——比那些不能进入这个特权学校的学生大115倍。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较大的商人阶级和掌握能力的专业阶级家庭的子女都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办事员和商业雇员的相应数字大约是50%，熟练的工资劳动者的是30%，而非熟练的

① *Workers' s Councils and the Economics of a Self - Managed Society*, London: Solidarity, 1972, p. 59.

工资劳动者的是20%。"① 在美国这样一个有着比其它国家看多得多的大学的国家里，在50年代，根据智商排在最高的1/10的人中有58%没有接受大学教育。这个比例清楚地反映了经济发展的水平，并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有所改善。但在任何发展水平上，达不到入学标准的特权阶级的子女都是以被剥削阶级最聪明的子女不能上学为代价接受教育的。②

在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里，当教育可以更广泛地为人们所获得时，统治阶级却设法进行歧视。在美国，在较大企业的高级主管的家庭中产生的企业领导人，和全部劳动家庭产生的企业领导人一样多，而企业主家庭所产生的是其两倍。一个大企业主管或所有者的儿子，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的机会，要比一个非熟练工人或半熟练工人的儿子的机会大12倍；比农场工人的儿子的机会大100倍，因为他们根本不可能渗透进商业精英的圈子内。③

2. 与上一点密切相关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私有经济产生了**不合理的收入分配**。这种**分配**之所以是不合理的，是因为更平等的收入分配——这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安排下是可能的——将会导致经济福利的提高。然而，还有另一个理由说明它

① J. L. Gray and P. Meshinsky, " Ability and Opportunity in English Education". in L. Hogben, ed., *Political Arithmetic*,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38, p. 416. 1967年，在美国，收入少于3 000美元的家庭的子女中有20%能上大学。而收入超过15 000美元家庭的这个比例上升到76%.（S. Bowles, "Portiver? nosti u visokom skolstvu", Marksizam u svetu, 1975, no. 1, pp. 53-90, p. 60.）

② 达不到入学标准的穷人家的孩子几乎不可能进入大学接受教育，而相当大量的特权家庭的同样的孩子却是可以的。如果把学生分成交费的和其它的两组，那么，在1933-1934年的英国，交费一组的不够入学标准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在其他一组的同样学生的58～162倍。（Gray and Meshinsky, " Ability and Opportunity in English Education", p. 372.）

③ W. L. Warner and J. C. Abergglen,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American Business and Industry* 1928-1952,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55, p. 38, 41.

是不合理的：它降低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潜在的生产效率。生产的总量——因而消费的总量——取决于所有资源的有效利用，也包括劳动的资源。然而，劳动资源不是恩赐的，它必须通过培育才能形成，并且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培养劳动资源。其中，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最大限度地提高居民的健康、教育和创造性劳动的意志。合适的居所，合适的饮食，和医疗照顾，不仅产生了健康的身体——它本身就是一种财富，而且，正像心理调查所毫无疑问地揭示的那样，它们也培育了智力的发展。一个更平等的收入分配，由于它非常可能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仅仅是缘于经济本身的理由，也是需要的。同样的理由也适合于教育。如果让市场不受控制地来运作，它将导致才能的浪费。因为不是最有培养前途的孩子们，而是他们父母的支付能力，决定了谁来接受教育。教育的问题不仅仅是上学的问题，它在分享一个既定社会的整个文化传统方面还有更为广泛的涵义。在这里，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再一次对培养更有效率的劳动力资源起到了促进的作用，相反地，收入的不平等分配减少了社会的流动性，这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说，与减少了其它资源的流动性一样，都是不可取的。

3. 由于基本的决策是由董事会中的一小撮人做出的，社会的控制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个厂商可能从事投机和欺诈活动，它可能利用它的国际商业网络逃税，或使惩罚资本外逃的规定失败；它也可能从事虽然不是非法的但却是反社会的各种活动，碰不得的“商业秘密”为所有这些活动提供了一个保护伞。

4. 私人企业有超过最佳生产规模之上的生长动机，企业规模越大，它的财力就越强，这意味着它可以支配信用和控制

市场。因此，**寡头和垄断**是资本主义的自然趋势，并且，它当然导致了资源的不合理配置。

5. 私有制严重地**妨碍了社会计划的实行**。无法协调的经济决策导致商业波动、失业、通货膨胀和物质资源的巨大浪费。结果是，实际的经济增长率低于可能的增长率。特有的通货膨胀是经济不稳定的最时髦的表现形式，也是私有制的最新结果。在最近的30年里，真正的大规模的失业已经变成了政治上不能容忍的事情了。更有甚者，即使是在充分就业的形势下，工会强大到足以提高他们在社会大蛋糕中所占的份额。由于同样的原因，厂商也强大到足以把抬高的价格转嫁到一般百姓的头上，而使自己的利润或多或少地保持不变。价格因而提高了。如果利润减少了，那么，增长率将会消失；如果降低工资——工会偶尔地被用来成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那么，私人的财富提高了。这种恶性循环的组合效应通常是在通货膨胀中得以解决的。

6. 与上一点密切相关的是，甚至是在充分就业下，资本主义的经营过程也存在着浪费。由于利润是通过出售商品和劳务获得的，所以**高密度的广告轰炸**成为生产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为了生存，企业在市场上的份额必须得到保证；如果没有市场，就必须创造出一个来。这意味着大量的广告费的支出；招待费的支出；如果必要，贿赂的支出——就像国际洛克希德事件生动地展示的那样；保持过剩的销售渠道的费用的支出；在公共关系方面的支付院外活动集团的费用支出；保持豪华的办公大楼和企业诉讼费用的支出。不断膨胀的金融、保险、不

动产和法律咨询方面的成本，也应该加上去。① 人造需求的社会成本，不合理的消费结构的社会成本，和生态环境破坏的社会成本，虽然难以计量，但也应包括在内。

7. 劳资之间的利益冲突，需要一个复杂的、精密的和昂贵的**国家调节**程序。为了减少由于私人资产阶级集团在第3点和第4点所描述的投机活动和反社会活动造成的社会福利的损失，国家必须支付巨额的监督成本。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分配机制产生了总量的不平等——它的后果在第2点中提到，国家必须用重税进行干预。但是，除了管理成本之外，重税也包括确定的真实成本，例如，(a) 它削弱了劳动的动机；(b) 它导致了不诚实和避税，因而影响了公共的道德；(c) 无论税制是多么的复杂，它从来是不完善的，存在着法律上的大漏洞，这些漏洞主要被居民中的一小部分富有的人加以利用。

(二) 国家主义组织的低效率

一个国家主义制度将展示一个官僚制度低效率的所有特征。1952年，马林柯夫在一次党代会上的发言中，在评价他的国家在这方面的情况时，列举了这些低效率的某些特征：害怕向上级汇报缺点，隐瞒地方事情的真相，行为松懈，过分沉溺于发号施令，用人方面的裙带关系。② 为了使比较分析成为可能，我将采取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时的同样分类方法对国家主义的种种低效率进行分析。我们从考虑在企业水平上发生了什

① 根据J. D. 菲利浦斯的计算，在60年代初的美国，在分配、公司广告方面的浪费，和对金融、保险、不动产、和法律咨询服务方面的多余雇员的报酬，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近十分之一。(P. A. Baran and P. M.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66, p. 389) 在60年代末，仅仅广告和促进销售方面的支出就达到了600亿美元，相当于整个国家用于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支出。(C. Lindblom, *Politics and market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p. 214)

② S. E. Finer, *Comparative Government*, London: Penguin, 1970, p. 389.

么开始。

1. 由于国家主义的社会同样是分为阶层的，所以，它与资本主义一样面临着激励机制缺乏的问题。已经清楚地知道，像法庭、监狱和强迫劳动等这类设计有时被用来对付缺乏劳动纪律的工人和失败的经理。① 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劳动者的工作热情可能不是很高。捷克斯洛伐克前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奥塔·锡克，描述他的国家的有关情况如下："低劣的劳动生产了日益增多的大量废品，旷工和盗窃在提高。许多工人……以为私人干零活作为副业来贴补他们的收入。"② 劳动生产率可能也是非常低的，因为管理人员在指导企业事务方面缺乏操作的自主权。

2. 作为企业外部增加的新的一层等级，除了企业内部必须支付的监督成本外，还须加上企业外部的监督成本。亚诺什·科尔内在描述1956年匈牙利的情况时注意到，首先，对企业实行监督和控制的是工业委员会和主管部；其次，是国家控制的部委，并且对更重要的企业，还有国务院、计划局和统计局。党也应该包括在内。并且"在可疑的案件中，警察和检察

① 1940年苏联的一个法律把动作缓慢和逃避当作刑事犯罪来对待，最高处以6个月的矫正劳动和工资下浮25%的惩罚。这个法律一直执行到1956年。该法律使人回想起英国在1875年以前有效的"主人和仆人法令"。在该法律下，那些违反契约插嘴的工人可以受到刑事犯罪的指控和被关进监狱。这两个法律的惟一重要的区别似乎是，英国并不假装是由工人统治的，所以，所使用的术语是与事实相一致的。

② *Czechoslovakia: the Bureaucratic Economy*, White Plains, N. Y.: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1972, p. 20. 南斯拉夫政治领导人J. B. 铁托在国家主义的发展时期也曾用同样的语调抱怨说："在1949年……全体工人和雇员中的18%没有正常地进行工作；其中的9.5%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便在劳动中缺勤。"E·卡德尔在1948年这样评论道："在某些企业，存在着满足那种使计划制定得近可能低的需要的理论观点。……并非罕见地……控制机关发现，机器的使用率仅仅在50%到60%之间……控制机关发现，造废品和劣质产品的主要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管理人员在克服困难上……准备不周"。(quoted in D. Bilandžic, *Historija SFR Jugoslavije*, Zagrab: školska knjiga, 1979, pp. 124–25.)

机构（将）进行调查。"① 控制权力机构忙于对犯有各种各样过失的各级经理进行处罚。因此，匈牙利的厂长们已经为所犯的各种各样的过失受到了惩罚，例如，忽视了对仓库的管理，没有亲自到部里去讨论超额工资部分的支付问题，没有减少技术人员的数量，没有注意到原材料使用的规定的标准，不忠于计划的假期。② 1966年在波兰，有关处理经理决策体制的法定的规章制度有84 000条。③ 这就是说，有许多的机会使经理们违反规章制度，这使多样化的监督和控制成为必需的。

3. 关于创新，科尔内观察到，企业没有生产新产品的动机，因为这对它们无利可图。企业也不热衷于使用新的技术发明，或采用由其它权力机构介绍的新的生产工艺，因为任何的改进立刻就被政府纳入第二年的生产计划之中，较高的生产能力意味着较高的生产责任。由于反对改变现存技术的这双重理由，除非中央当局从外部强迫命令，否则企业不会引进创新。"各式各样的指示和命令的起草和管理，使中央权力机构的全体工作人员成为必不可少的，因此，一个大的、管理技术发展的行政机器诞生了。"④

4. 下一个类型的低效率稍微有所不同。破产作为管理失败的惩罚机制是不可能，但是制裁的机制比资本主义企业的更快、更有效，因为总经理他自己不是老板。然而，制裁的内容完全不同。经理主要地被期望的是政治上的效率，这意味着他

---

① 为了说明，科尔内举了一个布达佩斯工厂的例子。这个工厂在7周之内遭受了来自7个权力机构的16次检查，这还不包括地区和城市的党委会的检查。(*Overcentralization i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110–11.)

② Ibid., p. 112.

③ A. A. Matejko, *Social Change and Stratification in Eastern Europe*, New York: Praeger, 1974, p. 136.

④ Kornai, *Overcentralization i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p. 208.

必须忠实地执行上级所有的命令，他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事实上，经理本身就是一个官僚，他害怕做出独立的决策，结果管理的效率和管理的创新能力被严重地削弱。当指示没有下达时，经理们就变得神经兮兮的，因而尽可能地推迟做决策。经理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他不是对问题而是对规则和命令做出反应。结果白白浪费了时间，并提高了经济的复杂性。由于缺乏市场，控制管理效率的主要机制是完成生产计划，这意味着经理们为了避免过分拉紧的计划强制，有隐瞒他们的生产能力的动机。由于其他的经理们也以同样的方式行动，所以，整个经济在低水平上运行，而且，产品的质量相当糟糕。

5. 国家主义的经济避免了讨价还价的费用，（几乎）不存在罢工。但是，工会官僚的存在，和灌输、教育、宣传和执行政策的各种成本，同样是必须支付的。

6. 不像资本主义企业，国家主义企业由于缺乏经济上的自治还遭受增加的一种低效率即第 6 种类型的低效率的折磨：它不能合适地利用一个分散化的市场和价格体系。市场是一种传递信息的机制。正像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正确地指出的那样，集中的决策需要信息的集合。① 在信息的集合过程中，许多相关的细节必然地会丢失。统计的总计要求标准的数据，和

---

① “社会的经济问题是……如何在只有任何社会成员个人才了解其资源相对重要性的目的的情况下，保证资源能够得到最优利用，或者简要地说，它是一个在任何人都只能得到部分信息的情况下，如何利用信息的问题。”“如果……社会的经济问题主要是一个迅速适应特定时间和地点的情况的变动的问题，由此似乎可以引申出，最终的决策必须留给那些熟悉这些情况、直接了解有关变动并了解可以即时用来满足这些变动所需资源的人去做出。”哈耶克论证了他的关于自由市场比中央计划具有优越性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提一下哈耶克在 1945 年所做出的下面的一个判断是有历史意义的：“迄今还没有人成功地设计出一种可供选择的体制，这种体制保留了即使是最猛烈地指责价格体系的人也珍视的某些特点——例如，特别是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个人都能自由选择职业，从而能自由地利用他自己的信息和技能。”（“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45，pp. 519－30）我就是要对这一挑战提供一个答案。

把在质量、位置和其它细节方面不同的项目放到一起考虑。有效的决策要求考虑所有的特殊的区别。在集权制的背景下，这两个要求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并且，信息的渠道越长，最终信息的扭曲就越大。所以，集权在本质上意味着**信息的损失和扭曲**，信息必须通过等级制度各个层次的过滤；换言之，集权意味着社会可利用知识的巨大浪费。我们还可以加上另外两种结果。由于企业完全依赖于中央当局，并在供给来源上受其控制，它企图在超出通常的需要之上尽可能地囤积劳动、原材料、多余的部件以及其他东西，以确保必要的供给。从而，国家主义的企业经常存在着过度就业（因此劳动生产率很低）和巨额的存货（不然的话，它就会被生产地加以利用）。① 另一方面，企业的动机是完成计划，而不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也将导致存货（没有需求的产品）的提高，和产生了特有的供求结构的失衡。在资本主义，有的是商品，而货币是稀缺的；在国家主义正好相反，有的是货币，而产品是稀缺的。

在**国民经济**的水平上，在关系到前三种类型的低效率方面，国家主义做得相当不错。

1. 由于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和较高的社会垂直流动性，国家主义在智力资源的浪费上要小得多。但在另一方面，政治一致性的严格要求大大地减少了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培养人才的可能性。

2. 收入分配要更平等些。②

3. 没有贸易秘密和私人的投机活动，勾结的活动非常少，

---

① 存货是一般的资本主义企业的两倍。见 B. Horvat, *Business Cycle in Yugoslavia*, White Plains, and N. Y.: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1971, p. 92.

② 但是，没有平等到足以鼓励经济效率的程度。一个官僚主义的等级制度，为了运转，要求实在的收入差别。这种收入差别是这种制度的维持成本。

而且主要表现在计划调节渠道之外的各种贸易中。

4. 关于第4种类型的低效率，情况比较特殊。代替私人企业垄断的是国家的完全垄断。结果是消费结构的曲扭。另外，出自于明显的理由，官僚有追求大企业的偏好，所以，明显地缺乏能满足人民特殊需要的小企业和小小企业，和经常是有用的创新者。

5. 缺乏在企业方面的自治是国家主义的组织的主要缺点，而中央计划是它的主要优点。中央计划使资源重新配置和快速流动成为可能，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平衡以及积累量可以预先确定，没有失业，通货膨胀可以很容易控制，经济周期相当可观地减少了。但是，僵硬的行政计划阻碍了计划者有效地协调经济活动的所有可能性。据估计，由于供给体制的故障，损失了全部劳动时间的25%。[①]"笨拙而又延长的决策，参与活动的糟糕的协调，经常改变的计划，有限投资的重新分配，投资责任的消失，都是在直接计划下投资配置的众所周知的缺点。"[②]当正式的渠道不灵时，非法的活动发展起来了。企业利用一个叫做tolkachi（推动者）〈即苏联企业设立的催促任务代表，其职责主要是到部里催促落实原料供给〉的特殊的供给代理人的服务来查找货源和安排交易。由于实际的市场不能很好地运转，它经常被黑市所代替。而贿赂是非常普遍的，它的范围包括：从感情的交换，到在公路上向运送他们工厂产品的卡车司

① 苏联的估计引自M. Ellman, *Planning Problems in the USSR*,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32. 爱尔曼比较了在国家主义卖方市场的tolkachi的角色和在资本主义国家买方市场的推销员的角色。

② T. Buaer, "Investment Cycles in Planned Economies", Acta Oeconomica, 1978, pp. 243-66, quote from p. 246.

机们购买紧俏的物资，到给重要人物送金钱和非金钱的礼品。[①] 贿赂减少了行政的僵硬性，但是它败坏了道德，并且也破坏了正常的动机和生产。

其次——这是与第5种类型的资本主义低效率相匹配的，信息的扭曲，等级制度的僵死，相伴而生的沟通的障碍，都使官僚组织对国民经济具有很低的协调能力。只有当非常严重的损失已经出现以后，才会引起这个体制的反应。所以，无止无休的危机是国家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迈克尔·克罗歇〈Michael Crozier〉曾经恰当地评论道，危机是官僚体制的内在的组成部分，因为只有当危机出现以后才能引起必要的调整。

6. 由于有中央计划，**广告驱动力**和**金融中介**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相关的。

7. 最后一种低效率——即**国家的仲裁**和相关的费用——在国家主义里更严重。国家发动每一件事，并且控制每一件事，为此需要庞大的行政机构和镇压机器。维持由统一的组织金字塔所代表的国家的垄断地位，也需要特别的费用。由于绝对的一致是必需的，异端的变革思想被禁止，所以只有一个真理：它体现在党的路线之中和党的主席团的领导人的报告中。当任务简单明了时——就像在不发达国家可能发生的情况，这种统一正统性的成本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它的优越性是明显的：整个民族可以被有效地动员起来追求一个明确的目标，如

---

① “来自螺钉厂的买者贿赂钢厂仓库保管员，以便长久等待的钢……一到就能立刻接到电话通知。……或者他送点什么东西给销售部的职员，如果有许多买主的话，产品将不卖给别人而给他留着。贿赂有时用现金，有时采取‘送礼’的方式。……每一个‘买者’在某些方面也是‘卖者’。每一个在这里受惠的人都能在那里报答。如果互惠的链条全面建立起来，那必然会给选择过程带来相当大的影响。这种互惠链条比一般直接贪污腐化更加重要。后者容易被发现，因而风险太大。”（J. Kornai, “Economics of Shortage”, prepublication manuscript, [Budapest, 1979] pp. 123 - 123.

消灭饥饿和获得经济发展。然而，当任务由于纠缠在一起而使选择变得不明确时，这种绝对的正统性将减少成功发展的机会。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僵硬的中央计划的缺陷，下一步自然是分权。但真正的分权化将会导致一个多元的社会和摧毁国家主义的次序。[①] 因而，一个国家主义的权力机构只能在非常狭小的限制范围之内进行实验。正统性是它生存的条件。

（三）效率的比较

资本主义的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的，因而导致的企业的自治实现了相对较高的微观效率；但是，缺乏在国民经济水平上的协调产生了宏观的浪费。国家主义的经济是建立在国有制的基础上的，因而导致的中央计划实现了宏观效率；但是，它也在企业内产生了巨大的浪费。尤其不明显的是，根据某一个优先的理由，来判断这两个制度中究竟哪一个在总体上更有效率。可以遵循下列的方法来分析这个问题。

如果以可利用的资源所生产的产量作为效率的标准，那么，衡量总体经济效率的指标是可以获得的产量的增长率。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国家主义似乎是在不发达国家更有效率，而在发达国家更缺乏效率。统计研究证实了这一判断。不发达的国家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古巴除外）远远高于可以比较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在苏联的发展水平上，国家主义国家接近了一般的趋势线；超过了那个水平，它们似乎是落

---

① "在60年代执行的经济改革和各种形式的给等级制各个管理部门的'松绑'，在几个国家里，伴随着紧张局势的出现。即使在分权的程度与混乱的麻烦之间没有显而易见的联系，由于这种紧张局势是在当前的形势下出现的，所以执政党和国家机构在这种形势下通常的反应是，强化控制的行政因素和等级制。"（T. Bauer and L. Szamuely, "The Structure of Industri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European CMEA Countries: Change and Continuity", *Acta Oeconomica*, 1978, pp. 371－393, quote from p. 386.）

到了趋势线之下①。

对增长率的结构分析将会揭示关于不同社会秩序的经济轮廓的新的和有意思的信息。由于资料的缺乏，这种分析仍然特别的少。表7总结的是培拉·巴拉萨〈Bela Balassa〉和传特·伯兰德〈Trent Bertrand〉对5个东欧国家主义国家（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发展水平大致相等的4个资本主义国家（希腊、爱尔兰、挪威和西班牙）和南斯拉夫的比较分析

表7

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国家中制造业的产量增长率、要素投入率和要素生产率

1953—1965	年增长率			
	产量	资本	劳动	联合要素生产率
资本主义经济	7.1	6.3	2.5	3.3
国家主义经济	8.7	8.1	4.1	3.0
南斯拉夫	11.8	7.5	6.7	4.7

注：未加权平均数。运用的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多布—道哥拉斯生产函数，劳动的弹性 $\alpha=0.65$

资料来源：B. Balassa and T. S. Bertrand, "Growth Performance of Eastern European Economies and Comparable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1970, p. 316.

① 这个结论在统计上不能核实，因为只有两个国家（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算在这一组里，并且没有国家主义国家达到了经济发展的最发达阶段。另一方面，东德和西德分享着相同的民族和文化环境，而后者发展得更快些。战前两个国家的人均GNP是一样的。在1976年，西德的GNP高出了17%，而平均工人的产量增长得更快。在另一方面，自从1960年以来，两个国家的GNP增长率和工业增长率大体相等。柏林墙和几百万人的大批离去可以被认为是说明了问题。

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主义国家的产出率和要素投入率都比较高，后者意味着大量的积累和更多的就业。要素生产率以稍微低一些的比率提高。人们可以得出结论说，较高的增长率主要是由于较大的投资和就业的较快的提高。可以想象，劳动力资源在工业化的较高阶段上的枯竭，将导致资本替代劳动的比率提高，替代弹性减少，和联合要素生产率下降，以及因而导致的增长率下降。这些都是工业化的一般效应。在此之上再加上制度的僵化效应，则要素生产率进一步下降。

在当代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主义的国家；因此，对这些国家的统计比较的数据，必须小心谨慎地加以解释。社会主义经济还不曾存在，所以，对她的统计比较是不可能的。由于南斯拉夫的经济接近于一种自治的组织，所以，可以把它视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近似物。根据表7所显示的数据，南斯拉夫的表现是与我们的期望相一致的。但是，仅仅考虑一种情况没有统计上的意义，它被认为主要是一种解释。除了增长和生产率之外，基本福利（它的定义和数据见第二章第三节的第二小节）和收入分配的情况也是分析不同制度效率的重要指标（表8）。

表 8

基本福利和收入分配

	基本福利的区别	收入分配	
		基尼系数	最高的5%家庭占收入的%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7.0	0.40	17.4
福利国家	-2.4	0.36	15.1
国家主义国家	+4.5	0.21-0.26[a]	10.9-12.2[a]
南斯拉夫	+5.0[b]	0.25	12.7

a　保加利亚和波兰

b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是+10.0

一般意义上的数据，是非常粗糙的，收入分配的数据更是如此，而且后者充其量也只能排出等级，而不能测量出绝对的距离。此外，收入分配是发展水平和继承下来的地区之间差距的函数，后者在南斯拉夫比在其它任何地方都大得多。为了获得至少的部分可比性，在国家主义国家中只考虑波兰和保加利亚的情况，而且用工人数代替了居民人数作为统计的人口。把所有这些都考虑进去，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南斯拉夫的基本福利可能比国家主义国家的要高，而收入分配大致是一样平等的。

另一种测验制度的方法也是可能的。在一代人的时间跨度内，南斯拉夫是经历了所有这三个当代的基本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它在战前经历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战后建立了中央

计划经济，并且自此以后开创了自治经济。这三种不同制度在相对短的时间内的运行效果，为分析这些制度的比较效率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因为经济分析中的其它变量完美地保持不变。表9显示了相关的结果。

表9

1911～1967年南斯拉夫在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和手工业的产量增长率、要素投入率和要素生产率

	年增长率			
	产量	资本	劳动	联合要素生产率
资本主义，1911～1940年[a]	3.7	3.2	1.5	1.5
国家主义，1940～1954年[a]	5.9	10.0	4.8	-1.0
自治，1954～1967年	10.3	7.8	4.4	4.4

资料来源：B. Horvat, " Technical Progress in Yugoslavia", Economic Analysis, 1968, p. 48

a　1914～1918年和1941～1945年的战争时期除外

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1.5%的年增长率符合当代拉美国家经济的年增长率。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相比，国家主义的中央计划的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长率提高了3倍。由于产量的增长率滞后，所以全要素增长率是一个负数。如果南斯拉夫继续实行中央计划，当然了，它可能是个正数，就像其它国家主义国家一样。对我们的数据最可能的解释是这样的：引进中央计划加快了增长，但相对于产出的投入提高了，这与其它的经济制度相比，降低了生产率；从而联合生产率的投入率以相对高

的比率上升，但是，它在任何时期的绝对水平，都比属于另外两种制度经济的水平要低。自我管理时期似乎是前两个时期的积极特征的某种综合。就业与在中央计划下一样快地继续增长着，但是产量的增长更快，所以，取得的生产率的增长率超过了以往已知的任何时期。到目前为止，经验的数据充分地证实了我们的期望。然而，在1965年，出现了一个改变。在加快经济和政治的分权化的努力过程中，执行了一个准备不周的改革，开始了极端复杂的社会过程。对这个社会过程的分析，不在目前研究的范围之内，我把自己局限在仅仅讨论要点上。从经济上来说，改革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天真的思想的基础上，即“劳动集体最知道什么对他们是好的”。这意味着政府投资基金和专业联邦银行的解散。改革导致了大部分有效的计划杠杆的取消，而单纯地依赖于货币政策（开始时，是极端紧缩性的）。一般而论，改革意味着19世纪的自由放任方式的复活。毫不奇怪，经济立刻就陷入到衰退之中，而且在2年之内工业产量的增长率下降到了零。随之而来的是，国家遭受了失业率的快速提高——这在革命以后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从政治上来讲，改革意味着一种怀旧的自由主义传统，这导致了真正的分权，并且也助长了由6个共和国组成的南斯拉夫的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发展。如果人们记得，这个国家是在当前这一代人生命时间之内刚刚统一起来的；它是由许多的民族组成的，它包括来自三种不同的世界文化的三大部分——西方的天主教、东方的东正教和南方的东方穆斯林；以及它是由经济发展水平悬殊的最发达的和最不发达的两部分民族所组成的，以人均产量来衡量的差距是6:1，那么，他们就不会对经济失败和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很快就使休眠的民族仇恨苏醒和产生了政

治热情的真正爆发感到奇怪了。在经济衰退之上又加上了政治的不稳定。

在1971年，这一趋势被一个政治行动颠倒过来了，这个行动阻止了民主化的进程，和用被知道叫做“社会契约”的超国家安排取代了自由放任的市场。国家在政治上稳定下来了，但是丧失了它的开拓驱动力和热情。经济运行稍微有所改善，但即使扣除了1972年以后的世界通货膨胀和衰退的影响，增长率仍然大大地低于以前的成绩和处在客观的可能性之下。前一时期的遗产是国家组织变成了某种性质的联合会。没有得到由州代表或州政府总理所组成的州际委员会的一致同意，联邦政府根本不能发布任何重要的经济决定。货币和信用政策由8个国民银行共同决定。关税实际上是联邦政府收入的惟一独立的来源，因此执行财政政策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它也不存在。在一般情况下，所有的经济政策——无论是形成还是执行——在拙劣的政治的讨价还价中成为过分的负担；这种政治的过程致使它们成为无效的，因为经济的决策不是建立在专业分析的基础上，它们也不能及时地得到执行。

国家正在经历着一个成熟的危机。所有的各种观点都在被试验着，在各种力量之间的所有类型的政治妥协达成了。在这方面发生的一个良好的迹象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11年间已经通过了两个宪法（在1963年和1974年）和50个宪法修正案。南斯拉夫仍然是世界上惟一的工人管理的经济，开拓者所走的道路从来就不是笔直的或是捷径。不管怎样，南斯拉夫已经取得了相对不错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如果从南斯拉夫的例子中吸取一个教训，那么，它很可能是：在劳动组织一级的水平上向自治的转变是相对容易和简单的。引进自我管理可能

会加快增长，但不能自动地保证这一增长趋势的继续。真正的问题是与宏观经济组织和宏观政治组织相联系的问题。在这方面，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解决方案仍然在设计之中。虽然我们在此刻不知道解决的答案，但是我们的分析已经指明了——如果我们被允许遵循数学家的方法论的指导——答案确实是存在的。

如果我们从社会主义的组织模型的具体特征中推出相关的结果，我们就可能做一个更为一般的比较分析。在一个工人的自我管理的团体中，**工作的动力**，从而**劳动生产率**，可能会提高；许多的研究已经表明了，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下，参与也提高了生产率[①]；**监督成本**减少了[②]；束缚**创新推动力**的因素去除了；对不好的管理人员的**制裁**相对较快和适当，劳动集体的收人取决于企业的经营业绩，所以，一旦经营得不好，立刻就能感觉得到，那些对企业的损失负有责任的人可能会被解雇；由于资本是社会所有的，使从管理上帮助遭遇困难的企业变成一种制度化和避免破产，是很容易做到的；最后，即使罢

---

① 关于有关文献的一个总结见 Blumberg, Industrial Democracy, pp. 123－124. 布伦姆博格总结道："在整个文献中很少有人研究，由于工人决策权力的提高而产生的对劳动满意的提高或其它的一般承认的有益的结果。我提出的这种发现的一致性在社会研究中是少有的。"（p. 123）S. 莫尔曼（Melman）比较了以色列同一产业中的传统管理企业和属于开布茨的自我管理企业的效率并发现：自我管理企业中的劳动和资本的生产率以及盈利率都是较高的，而管理的成本较低。（"Industrial Efficiency under Managerial vs. Cooperative Decision－Making",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1970, no. 1, pp. 9－34）

② 以萨柯·阿迪芝报告说，在两个工人管理的工厂里，监督成本没有了。(Ishak Adizes, Industrial Democracy, New York: Free Press, 1971, p. 192) 艾宾尼萨和津巴里斯特发现，在智利，参与改善了劳动纪律，减少了旷工和罢工的频率，并对创新行为产生了有益的影响。（Espinosa and Zimbalist, Economic Democracy, pp. 141, 148）保罗·伯恩斯坦报告说，一个生产者合作社被它的老工人所有者卖给了一家大的联合公司，结果，虽然只有不到100名工人，却需要8个工头。（Paul Bernstein, "Workplace Democratizat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75, p. 29.）E. S. 格林博格报告说，合作社每班共同雇用一个或两个监工，而标准的企业每一班使用6人到7人监工。（Greenberg, "Producer Cooperatives and Democratic Theory: The Case of the Plywood Firms", Palo Alto: Center for Economic Studies, July, 1978）

工不能消失，它们也变成了稀少的事情，并且在经济上没有意义。不管工会的职能可能是什么，它当然不是与雇主进行工资的谈判，因为老板不复存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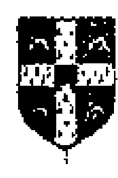
在国民经济的水平上，**教育**变成为人人都能得到的，社会阶层之间的障碍被侵蚀了；从而，人们之间的社会的垂直流动性提高了；收入的分配比在其它任何的社会制度下的都更平等得多[①]；**社会的控制**是最有效力的——并且滥用管理权力的可能性急剧地减少了——因为管理的操作是在工人委员会和整个劳动集体的眼皮底下进行的，使社会的重要决策成为秘密，既是不可能的，也是非法的；与其它地方的**垄断的**倾向相反，资本的集中是受不到鼓励的，一个工人管理的企业的劳动集体并不倾向于由经理使企业过度膨胀，因为这将失去了对企业事务的控制；在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组织的不同，金融权力不再如此的重要了，既不能买也不能拥有一个竞争的企业，因此，一个劳动者管理的经济的运行，非常接近于教科书的竞争市场模式；社会所有制**意味着计划**，但是**并没有取消市场**，从而，劳动者管理的经济正好实现了哈耶克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有这样一种的可供选择的组织形式，在这里，企业方面的真正的自治是与经济活动的 ex ante〈事前〉的协调相容的，现存的知识得到了充分的利用，而避免了由于市场失灵而造成的损失；计划和社会财产致使金融投机几乎成为不可能的，并且大大减少了广告的浪费；**由国家进行的干预**是最低限度的，因为每一个阶段的决策都自动地得到了控制，由于平等的收入分配，税收是简单的。

---

① 第9章将进一步讨论收入分配问题。

我们可以总结我们的发现。国家主义在集中使用经济资源方面是成功的，但效率水平很低。资本主义取得了较高的效率，但由于经济周期，使大量的资源闲置着。这两种制度都没有一个清楚的、净的优势——或者，可能的优势充其量是发展水平的函数。社会主义经济意味着一个市场、自治和自我管理的生产单位。因而，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可以做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在生产上能做的任何事情。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社会财产的基础上的，这也意味着社会计划。因此，它也能够取得一个中央计划经济可以取得的所有的生产性利益。由于它至少和每一个其它的经济制度一样的有效率，并且有能力取得这两个替代制度之外的利益，所以它是更有效率的。

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当然不是一个纯粹的祝福。她通过解决了许多的老问题面提高了效率，但也创造了新问题。随着我们分析的进程，我们将能够考虑这些问题中某些问题，以及详细地阐述它们并把本节的发现放到历史的观察中。



第 7 章

对社会主义的渴求

第一节　价值判断

现代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分析。在这方面，可以区分两种类型的判断。**实证的判断**涉及的是客观事物的性质，这些判断可以或是真实的或是虚假的。在另一方面，**价值的判断**是关于做出这些判断的人的意向状态的陈述，它们不能被证伪，因此，应该被排出在科学之外。我们不是用“真实的”这一尺度作为衡量价值判断的标准，而是用“公正的”、或“正义的”、或“对的”这些理由来为我们的价值判断而辩护。当我说“社会主义好”时，我并没有对社会主义的性质做出陈述——即使我反过来认为社会主义不好，社会主义的性质也完全不受影响。我只是对叫做“社会主义”的这个客观事物

表达了自己的评价。我实际是在说，“我爱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是值得想望的”。这个评价既不是真的，也不是伪的。任何人都可以反驳我的观点，而不至于犯或者是一种逻辑上的错误，或者是犯一种事实上的错误。

明确地区分实证判断和价值判断，当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不如此，注定要导致无可救药的混乱。但是，区分描述现实的这两个方面是一回事，要求把价值判断从科学的研究中排斥出去是另一回事。后者完全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全部的科学是建立在一个价值的前提之上的：这种价值被叫做真理。没有真理作为一种标准，科学将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尤其需要科学？这个问题可以显示出，在更一般的意义上，科学与价值判断是不能分割的。科学需要思考，但思考本身不是目的；思考意味着意向。当一个人思考时，他企图做某件事情，他意愿出现某些事情。因此，正是这种事情的性质决定了实证的判断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

要分析人类的活动，我们需要区分它的各个方面。但这不是意味着精神分裂的假定。各个方面可能是不同的，但它们既不是独立的，也不是完全隔绝的。它们属于同样的人类的活动。无论我们做什么，总是关系到事实和价值这两个方面。在确定的意义上，价值的维度是人类特有的维度；把它拿走，你就消灭了人类的存在。

虽然每一个科学研究都有价值的判断，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价值判断有着特殊的性质。在这里，我们的利益——特殊场合的既得利益——是很危险的，从而，社会科学中的价值判断，它们大部分是隐含的和藏匿的，会以自然科学中的价值判

断无可比拟的程度来歪曲对事实的分析。[①] 马克斯·韦伯，他本人也坚持区分价值和事实，指出价值在两个方面进入到我们分析的视野中：它们决定我们选择要研究事物的主题，和它们影响到我们对某一特别事件的原因的判断。这种观点受到了批判，理由是：自然科学家也受到了同样的影响，虽然受影响的程度公认为小一些，问题不是逻辑上的，而是真正实际的。"因此"，恩尼斯特·奈格尔（Ernest Nagal）这样评论道：

> 由于社会科学家们的价值导向不同这一事实，挡在获得有关人类事务可信赖的知识道路上的令人不愉快的困难，是实际的困难。这个困难并不必然是不可以克服的，因为由于通过假设，区分价值和事实不是不可能的。所采取的步骤是：当一种价值的偏见出现时，把它识别出来，如果不能把它的干扰效应完全排除，也可以降至最低。[②]

困难比奈格尔在引文中提出来的要大一些。并没有一个提到的可以指导每一门科学研究的简单框架。为了发现规律和因果关系，我们必须简化世界。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建立了模型。在一个模型里是真实的东西，在另一个模型里并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具有基本相似性质的一类模型组成一个范式。范式是我们对世界的基本观察。在一个既定的范式之内，奈格尔的

---

① 因此，社会科学家们毫无例外地赞同他们各自所处的环境的现状。为了保持"价值中立"，他们把占统治地位的价值体系当作是既定的。激进的社会变革将不予以考虑。随后的分析导致了符合被观察的事物的发现，这是对现存制度的有利的解释。因此，不应该进行激进的社会变革。

② "The Value - Oriented Bias of Social Inquiry", in M. Brodbeck, ed., *Reading 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oronto: Macmillan, 1969, pp. 101 - 102.

分析是适用的。但是，两个不同的范式通常是不能毫不含糊地彼此通译的。含糊的产生，是由于最初的价值立场的不同。在社会科学里，一种范式的选择基本上是由社会的形势决定的；归根到底是由阶级地位决定的。① 超过了某一点之后，一个新古典经济学家和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个保守派社会学家和一个激进派社会学家，他们之间很难沟通。他们之间的讨论会以某种形势的僵局而收场。例如，“如果我们假定 A，B 和 C，那么，将会出现 Y”，一个参加者说明他的研究模型。“但是 A，B 和 C 是没有意义的假设，所以，Y 是不相关的”，另一个参加者反驳道。什么是有意义的或是没有意义的，取决于一个人所接受的范式，并且后者当然是由他持有的价值决定的。一个极端的但是非常普遍的例子就是我所说的物化的思考。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就是这种物化思考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第 4 章，第 2 节）。

让我现在指出某些补充的涵义。价值不能是真实的，或是虚假的，但它也不是任意的。价值是主观的，但也是客观的。价值不同于事实，但它不是缺乏认识内容的。价值是价值的，因为它能满足确定的人类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需要是社会地决定的。价值不仅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价值的客观性是由个人的需要和意志的一致性组成。客观化的价值成为一个团体的行为准则，并以这种资格成为对这一团体中的个人行为的一种要求。评价是主观的，但有效性是客观的。也许描述这种

① “社会研究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使研究者以不同于自然科学家的方式卷入他研究的题目中去。对于后者来说，一个反常的现象的发现，可能对他的智力上的‘信誉’构成一个打击，可能甚至对他的心理上的‘诚实性’构成一个打击；但它没有威胁到他作为一种社会秩序成员的道德上的地位。”（R. L. Heilbroner, “Economics as a ‘Value – Free’ Science”, Social Research, 1973, pp. 129 – 143, quote from p. 139.）

现象的更合适的方法是把它表示为公认〈intersubjective〉的：一个价值判断的公认有效性符合一个实证判断的客观有效性。

一个价值判断的认识内容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说社会主义好，和如果它被知道我是憎恨阶级剥削的和我拥护财富和权力的更平等的分配，那么，我是在做出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的陈述，而不仅仅是关于我的意向状态的判断。换句话说，在我的陈述和我的价值知识的基础上，一个观察者可以推论出社会主义的性质。而且，这种陈述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假的。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即与社会主义有关的社会既不是平等的，也没有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判断完全是错误的。因此，为了使一种价值判断成为有意义的，它的事实基础必须是真实的；换言之，蕴含的世界状态必须符合世界的实际状态。

由于价值与需要有关，由于主观感觉到的需要尤其取决于我们对我们的真正需要的知识、真实的自我和关于这些需要的可能性，所以，在评价和知识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我们对事实的知识，使我们能够对为实现需要的目的而设计的另一种行动路径的可能的结果做出诊断。这些预测然后作为反馈对我们最初的评价产生影响。保罗·史卓顿〈Paul Streeten〉描述了分析和诊断对修正计划的四种不同的方法①：(1)更好的信息使计划更加一致，因而更有效率；(2)事实的发现可以激活那些以前仅仅是隐含的或甚至不存在的价值标准；(3)有关事实的更好的知识可以帮助清除关于人们自己需要的混乱，经济化原则和虚假的利益让位于对真正利益的理解；(4)言行之间和行动与信仰之间的不一致，变得显而易见了。

① In the Introduction to G. Myrdal, *Value in Social Theory*, edited by P. Streete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8, p. xvii.

科学分析和评价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意味着可以用和实证判断的同样方法来证实价值判断；① 但这确实意味着，通过合理的辩论，可以说服人们改变他们的计划和修改他们的评价。② 本书的目的正是要实现这一点。说服的过程可能进行得相当长，直至达到真正利益的最低点；超过这一点之后，个人计划的协调和社会的综合通过一个社会—政治的过程来继续进行。

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使由价值判断所引起的纠缠降至最低。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价值判断和实证判断之间的基本区别，所有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观察人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其次，我们研究人们这种需要的一致性；在我们的例证里，就是对自治社会主义的一致需要。如果不能满足这种一致性，我们就试图设计一个更好的替代方案。这种方法除了用**满意的**和**更好的**这些术语来表述的价值的涵义之外，还涉及价值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即它对人类需要的满足是好的。但是，为什么它应当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愤世嫉俗者可以想象一种使人类遭受痛苦的制度。我们可以通过仅仅提供下列问题的答案而以一种价值中立的方式来重新表述我们的任务：哪一种可能的社会制度将会最充分地满足被合适地定义的和被观察是人类的大多数所接受的基本的价值？换言之，哪一种可能的社会制度最接近于一个好社会的理想？在我们进行分析之前，我们还必须考虑"一个好社会"是由什么构成的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使我们能

---

① 严格地说，即使是实证判断也不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

② 在这里，说服意味着没有感情操纵的一个合理的认识过程。马克斯·韦伯在 1913 年的一个讲座中（"der Sinn der 'Wertfreiheit' der soziologischen und ökonomischen Wissenschaften"）对价值判断的科学讨论的范围做了很好地描述：(1)最终价值公理的一致性的详细阐述和检查；(2)对其它的价值判断的涵义的推导；(3)关于对手段和不合需要的副产品两者的事实结果的分析；(4)对冲突的价值判断的揭露。

够在价值的领域内继续我们的对三种社会制度的比较分析。

第二节　两种版本的功利主义伦理学

一个好社会的理想显然是历史地决定的。不同的共同体将对社会应当如何来组织有不同的答案。基本上说，有两种可能的方法：(1)假定一个或多个最高的善，目标是使这些善最大化，无论什么，只要是能帮助实现这一目标，都是值得的；(2)假定合适的行为，然后任何与被接受的行为规则相一致的目标被认为是善，至少不是恶。在伦理学上，这两种方法的区别就是著名的目的论和道义论之间的区别。在前者，善是独立地决定的，而正当是从善的最大化目的中衍生出来的；在后者，首先定义什么是正当，然后从中推导出善来（不是以决定论的方式)①。因此，正当和善是两个伦理学的基本概念。

很明显，在一个资产阶级的社会里，目的论有非常大的吸引力。诞生于同宗教的神秘主义和封建特权秩序厮杀的战场上，资产阶级的社会强调成就和合理性。合理性意味着，以最小的牺牲取得既定的目标，或在有限的资源内获得最大的满意状态。合理性作为一个重要的价值而被接受，导致了科学的发现和快速的经济发展。尤其是经济学，它充其量只是收益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而已。收益最大化原则扩展到伦理学，导致了目的论伦理学的产生。

如果有许多最终的善的话，那么，使它们都达到最大化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只有在躲避了量化和客观检验的直觉的基础

① 这被认为是第二种方法的一个重要的优点。通过避免了坚持认为有一个单一的、对世界是最好的安排，它可以保留个人的自由。

上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对于有数量观念的资产阶级的头脑来说，这是令人不愉快的。因此，它想到应当选择出单一的目标，并宣布为至高的善。非常自然地，发现了这个至高的善就是效用。资产阶级的效用主义当然在有其先驱。古希腊的幸福说和快活说，就是在更早的相似的社会环境中运用相似的伦理方法的两个这样的例证。前者把幸福当作至高的善，而后者认为是愉快。在资产阶级的社会里，效用主义当然不是惟一的伦理学派，而且它在以前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到处弥漫着，也没有哪一个其它的现代理论像效用主义那样被普遍的接受。在一个经济价值和交换关系占支配地位的制度里，所有的其它的价值都变成了可以交换的，因而可以量化的。耶利米·边沁的"道德算术"就是对这一根本价值的最恰当的反映。"把所有的各式各样的人类的相互关系都归结为惟一的功利关系，看起来是很愚蠢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评论道，"这种看起来是形而上学的抽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一切关系实际上仅仅服从于一种抽象的金钱盘剥关系"。①

边沁的原始的效用主义后来在理论上被精雕细琢，原始的快乐说为一个乏味的欲望满足的最大化的理论所取代。经济理论在效用的微积分中完成了特殊的圆满：基数效用被序数效用所代替，并以这样的方法避免了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然而，所有这些只是帮助清理了这种伦理学的社会基础。社会被看作是孤立的、像效用最大化机器一样行动的个人的混合体。惟一承认的社会要求是，在此过程中，没有使个人的处境比最初的状态变得更坏（所谓的帕累托最优），而最初的状态是好或是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79页。——译者注

坏不在科学研究的合理性之内。

老式的、粗糙的基数效用主义采用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个公式。[1] 这个公式首先是在18世纪的早期由格拉斯哥的道德哲学家弗兰斯·哈奇逊〈Francis Hutcheson〉提出来的。他的学生是亚当·斯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也是一个道德哲学家。斯密的道德哲学理论与他的老师不同。他证明了，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通过市场竞争的机制实现的。通过追求他们的私自利益，个人最大化地提高了社会的福利。斯密辩护的最远的回声是当代的福利经济学的"定理"，它声明完全竞争使经济福利最大化。每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学生都被期望能够复制这个证明，并相信他生活在所有可能中的最好的世界中。

普通的交换关系是效用主义成为统治的道德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所有的产生效用主义的必要条件是一个充分异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最高的善是在人的本身之外找到的。因此，官僚的合理性也能产生效用主义的伦理学。这实际上正是事实。两种伦理学不是完全相同——在资产阶级的世界里，个人与社会相对抗；而在官僚的世界里，集体与个人相并列——但是它们产生了相同的思维框架：盲目地因袭了效用积累的最大化观点（物质产品和权力杠杆）。效用主义通常被认

---

① 这个著名的公式在表面上似乎是简单的和明确的。考虑这样两种幸福总量相同的情况：一个情况是幸福总量在整个社团中平等地分配；另一种情况是分配得极端不平等。哪一种情况是更好的？如果在第二种情况中总效用稍微高一点，一个效用主义者将选择它。因此，效用主义正是反平等主义的。为了说明这一点，阿马亚·桑〈Amartya Sen〉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残疾人从收入增量中得到的效用小于平均个人的效用量。由于当收入的边际效用在整个社团相等时，总效用达到了最大化。所以，残疾人得到的较少，而健康的人得到的较多。不幸的残疾人被惩罚了两次：首先被自然，然后被效用主义者。（*On Exnomic Inequ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3, pp 16 – 18.）

为是个人主义的，这与它的历史的起源有关；但是，效用主义也恰恰可以很自然地被加以集体主义的解释。所有需要做的就是，把个人选择的原则应用于社会，这正是官僚在所有的时间里做的事情。因此，“在原则上没有理由否认”，约翰·罗尔斯评论道，“为什么一些人的较大得益不应该补偿另一些人的较少损失，或更重要地，为什么可以为了使很多人分享较大的利益而剥夺少数人的自由……正像最大限度地满足一个人的欲望体系对他来说是合理的一样，最大限度地增加一个社会所有成员的满足的净余额，对这个社会也是正当的”①。如果我们把“社会”这个词换成“国家”，引文就可以转换成为国家统治者从事任何事情辩护的一个典型的理由。这不是新的发现。这种现象已经被观察很久了。南斯拉夫道德哲学家米兰迪·吉沃狄奇〈Miladin životić〉引用苏联的《科学的共产主义》（1965 年）（“即使在共产主义，一个人的意志也必须服从于整个集体的利益”）一书，说明了以效用原则作为衡量行动的社会目的性的一个价值标准是如何导致个人对集体的臣服的。② 澳大利亚哲学家尤金尼·卡孟科〈Eugene Kamenka〉指出：

> 社会主义者［读作国家主义者］眼中的社会，正像罗莎·卢森堡曾经对列宁说的那样，是资本主义者眼中的由一个工头操作的工厂。经济计划的概念，正像熊彼特已经指出的，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概念：资本主义的经理是社会主义管理者的原型。两者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上都依靠效用主义的商业道德，都依靠这样

① *A Theory of Justic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e 1973, p. 26.
② *čovek i vrednost*, Belgrade: Prosverta, 1969, pp. 76 – 77.

> 一个概念，即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被当作和被估算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目的可以被减少到仅仅一个共同的尺度。①

我们再一次地如此惊奇地发现国家主义变成了一种颠倒了的资本主义，不是吗？在这两个社会里，阶级关系的存在产生了同样的推理模式和同样的价值导向。

第三节　正义的伦理学

前面的分析指出了效用主义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主导伦理学。是否存在着另外的选择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看一看当它们作为历史的真正主题而出现时，社会团体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时刻的评价。我想到的是革命和解放战争。

是什么驱使革命者和爱国者甘愿冒生命的危险？当然不是效用主义的微积分。资产阶级革命者在街头设置路障并不是为了建立市场竞争，工人们和农民们为民族解放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中央计划。如果存在着一个单一的和普遍的价值可以驱使革命者和爱国者的英雄行为，那它一定就是正义的理想，和寻求一个公正的社会。由于社会主义只能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然而，它可以是渐进的和非暴力的——的结果而建立起来，所以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可能会发展起一个正义的伦理学。

从技术上讲，它是一种非目的论的伦理学。按照定义，它从来就不是 Summum bonum〈至高的善〉，也不需要是。个人没

① *The Eth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s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2, pp. 163 - 164.

有被贬低到成为追求净利润最大化的商人，也没有被贬低成为服从一个独裁主义集体意志的臣民。人类的生命被允许尽可能是丰富多彩的。多元的价值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人的目的是他本身——这种价值观可以追溯到从《圣经》到康德、马克思① ——正义就不是一种约束，而是真正人类生活的一个前提。

当效用主义理论按照一个很长的时间顺序发展起来之时，非常奇怪地（不是吗?)，没有任何的一个关于正义的伦理学。只是到了最近才由哈佛大学的道德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提出了第一个这样的理论。这一事实值得对罗尔斯的理论进行一个简要的批判性的探讨。

首先要回答的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为什么选择正义作为社会伦理学的基础？罗尔斯的回答似乎是：这是因为选择正义是合理的，这也是因为正义理论可以克服效用伦理学的某些困难(需要的信息较少，受约束的压力较弱，等等)。这第二个理由是次要的，无须我们在这里关注。第一个理由乍看上去似乎是矛盾的：一种价值不是被逻辑的或事实的分析加以证明，它或者是一种公理，或者是由另一种价值来证明的。让我们看一看罗尔斯是怎么样对付这个困难的。

基本的价值是作为源于人类本性的直觉观点而被引进分析中的。道德的决定应该能表达我们的作为自由的（包括自由地

---

① “你应该像爱你自己一样爱你的邻居”（Mark, 12: 31)。“总是以对待人类的方法来行动，无论是对你自己，还是对其他的人，从来不要简单地当作是一种手段，而是同时作为一种目的” （I. Kant,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 of Morals*, trans. By H. J. Paton, originally titled *The Moral Law*, London: Hutchison, 1956, p. 96)。“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时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享受私有财产)、有理性的和利己的人的本性。并不出乎意料地，人类的本性碰巧是一个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者具有的所有的重要特征。然而，罗尔斯认识到，单凭他的资产阶级道德哲学家们本人是达不到正义的王国的，所以，他在他们的态度上强加了两个重要的原则：公正的原则和他称之为亚里士多德原则。对罗尔斯来说，正义是公正这个伦理学的概念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对应物。后者意味着，除非补充以积极的和实质性的自由，形式上的和消极的自由是不充分的，因而是不能接受的。它还意味着，没有人的基本的权利可以为了效用总量提高的缘故而受到伤害。亚里士多德原则意味着，“人们总是以运用他们已经获得的能力（天赋的或从教育获得的能力）为享受，而这一享受又提高了他们的已经获得的能力并使其具有更复杂的形式。”①这一原则指向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方向，虽然罗尔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而，实践原则的丰富的可能性没能得到利用。

沿着契约主义的传统，罗尔斯把他的资产阶级风格的自由主义者放到了一种最初状态里，在这里，他们参与一种据说是会产生公正安排的社会游戏。这一企图失败了。在一个受阶级折磨的社会里，一致的同意是不可能的，因而公正的原则不可行。罗尔斯因此被迫沉入到一种无知之幕中，在这里，参加者被剥夺了他们的个人历史和他们的社会地位及前途的知识。他的描述所采取的程序是这样的：假定我们有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这个社会被定义为受一个正义的公共观念调节，它的成员

① 参见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13 页。以下凡此书的引文，都以该中译本的译文为准，并只在引文后注明页数。——译者注

是自由的、平等的道德人，以及它的基本社会机构对正义的观念给予有效的支持。哪一个正义的概念是更适合于这样一个社会的？很明显，它将是在这个假设的情形下彼此处在公平地位的社会成员一致同意的东西。这个假设的情形就是原初状态。

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是那些在最初状态下关心促进他们利益的自由和有理性的人将接受的平等原则，对公正的检验是由相互协议的可能性所组成的。一个有理性的人被设想为“对他可选择的对象有前后一贯的倾向……他遵循那个将满足他较多的欲望并具有较大成功机会的计划。”〈p. 137〉在最初状态中，作为各方在最初的契约中都患了健忘症的一种结果，所有参与者都是平等的和自由的。每一个人都被剥夺了不相关的道德信息；没有人知道他在社会上的位置，无论是阶级地位还是社会身份；参与者不知道他们属于哪一代人；关于自然资源和技术的信息是无法获得的；也没有人知道他在先天的资质、智力和体力等方面的运气；最后，参与者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善的概念，和不知道他们的最终的目的和利益，以及他们的特殊的心理倾向。进行这种心理切断手术的理由是，罗尔斯需要参与者按照康德的观念自律地行动：即他们的行动原则是他们作为自由的、平等的理性人类的这一本性的最合适的可能表现而被选择的。如果社会的环境，或自然禀赋，或特殊的倾向，影响了一个人的行为，他就会他律地行动。“无知之幕使原初状态中的人不具有那种使他能够选择他律原则的知识。”〈p. 243〉这不是真实的。正像罗伯特·沃尔夫已经指出的，康德的自律是需要由善的理想而不是由理性的自私来驱动的选择原则。因此，罗尔斯的本体资产阶级所做的可以被称作不能适应特殊环

境的他律。①

在“所有人的处境都是相似的，无人能够设计有利于他的特殊情况的原则，正义的原则是一种公平的协议或契约关系的结果”〈p. 10〉这样的一种环境中，正义的原则是：

①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

②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a. 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b. 依系于在机会公平（不是形式上！）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pp. 56，292〉

第一个原则调节政治生活和要求平等的公民权。第二个原则调节经济生活和要求对偏离平等的经济分配的条件给予合理的解释。社会最少受惠者的利益是由社会的基本的善的指标来衡量的。基本的善被定义为假定个人为满足他们的最终目的和其它欲望而需要的东西，它包括：权利、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和自尊的社会基础。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在自由和经济福利之间不存在着替代关系。这种优先性的基础是在人类需要满足的非对称性中被发现的。一旦基本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之后，相对于自由的兴趣而言，经济和社会利益增量的边际重要性就会递减——财富的边际效用递减，而由于亚里士多德原则，自由的边际效用提高——超过了确定之点后，为较大的经济福利和舒适的职务的缘故而选择较少的自由便成为不合理的了。

机会的平等应当是公平的，即是实质性的，而不应当是形

① R. A. Wolff, *Understanding Rawl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85.

式上的。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是只有形式上的平等——相对于封建主义而言——的一种社会制度，因此它们将被排除掉（虽然不是被罗尔斯排除的，我们马上就要看到这一点）。和其它原则结合起来，原则 2b 也消除了能人统治论。能人统治论可以被设想为独特地建立在机会平等的原则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理想化的国家主义的类型——而没有出现生活水平、权力和特权的巨大不平等。

最有意思的和最新颖的原则是 2a，它又被罗尔斯称之为差别原则。它的涵义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接受了经济和其它东西（政治的和组织的权力，等等）的平等分配的标准，不平等的出现，也仅仅是为了每一个人的利益。如果我们从一种现存的分配开始，如果和只要最少受惠者的福利能够提高，改变就应当进行，然后按照一种词典式的次序达到每一个更高位置的条件。"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p. 96〉更一般地，"在社会的基本设计中把人们视作自在目的就是要同意放弃那些不能有助于代表人之期望的利益。相反，把人视作手段就是准备为了别人的较高期望而降低他们的生活前景。"〈p. 172〉

结合起来，"两个正义原则等于……把自然能力的分配看作是一种集体的资产，以致较幸运者只有通过帮助那些不幸者才能使自己获利。"〈p. 171〉罗尔斯知道，这个结论在他的最初健忘症的人造模式中不是必然地被接受，所以，他在最初的分析中警告说："一种正义观不可能从原则的自明前提或条件中演绎出来，相反，它的证明是一种许多想法的相互印证和支持，是所有观念都融为一种前后一致的体系。"〈p. 18〉罗尔

斯想要设计一种道德的几何学。为此，他颠倒了数学家的程序。罗尔斯不是从自明的公理出发推导出定理，而是从正义的直觉观念开始，并试图从这些直觉的观念演绎出原则来。两个原则就是例子。因此，假定和结论之间的一致性构成了罗尔斯的《正义论》的基本内容。但不仅仅是如此。寻求一致性和删除了矛盾和冲突，导致了最初的洞察力的澄清和修正。这个过程最终把绝对的原则和我们对正义的直觉带到了一种熟悉的、被称作均衡的状态里。如果我们对什么是正义的确信是从一套绝对的原则演绎出来的，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有理由的，因为这些原则由于在内容上更浅薄因而更普遍，将更容易地被接受。

上述理论演绎的每一个步骤都是成问题的，每一个主要结论都是可以批判的。为了我们的目的，我将把我的批判局限在几个主要观点上。整个结果最薄弱的环节当然是最初状态。它甚至与任何偏僻的现实世界都不符。如果反驳说，它本身并不是一种目的，最初状态纯粹是一种逻辑的构建，一种思维的实验，那么，当这个理论被应用时，我们就会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正像约翰·查文特〈John Charvet〉评论的那样，罗尔斯假定，人们是在组织得很好的制度里从事实践的，并以这种资格获得了人的品性；但是他又假定，所有的人在权力和能力上是平等的，没有人知道他在社会中的地位，这意味着参加者完全不可能从事社会实践，并且在事实上，这不是人类。[1] 更简单和更一致的假定是，人类在从开始时就喜欢平等和有一种正义

[1] J. Charvet, "*The Idea of Equality as a Substantive Principle*", in A. de Crespigny and A. Wertheimer, eds., *Contemporary Politicl Theory*, New York: Atherton Prss, 1970, p. 159.

的观念。罗尔斯本人为后者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理由：

> 对一种正义感和道德情操的能力是人类适应它在自然中的地位的结果……对一个以稳定的社会群体形式生活的种系的成员们来说，那种和公平的合作安排一致并发展支持这种安排的必要情操的能力是极其有利的，尤其是在人们拥有一个漫长的生命并相互依赖的条件下。这些条件保证着在无数场合，人们一贯坚持的共同正义对一切人都有利。(p. 489 - 490)

政治自由的优先权被假定是人们认识到彼此作为自由、平等和有理性的人的期望的表达。如果我们按这一优先权的隐含假设的逻辑进行严密的演绎，我们必须得出结论认为，或者以物质财富来衡量的政治自由的成本在边际上是无限的，或者"生产可能性边界"——借用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技术术语——是这样的，超过了某一点之后，政治自由和经济财富不再是替代品，而成为互补品。第一个假设代表一种价值的判断，第二个假设代表一种经验假说。它们都不是从罗尔斯的前提中严格地演绎出来的。

源于最初状态的最有意思的原则——差别原则——并不是真正必然的演绎的结果。它似乎是有理，但它不是在签约各方之间可能的公正协议的惟一基础。从分析上说，它意味着一种无限的风险厌恶。罗尔斯明确地剥夺了他的参加者的关于他们的风险偏好的任何知识。但是，他继续指出为什么他们应当是风险规避者的几个理由。在最初状态中，他们选择的是永远统治他们生活的规则，所以，他们注定是特别小心谨慎的。而

且，参与各方要通过某些原则来调节机会的影响，否则自然禀赋和社会生活的偶然性将威胁到他们作为自由的、平等的道德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因为运用的是最大—最小原则，除非每一个人的地位都得到了改善，否则没有人会从自然和社会的偶然性中受惠。然而，这些抽象的原则，如果被一贯地运用，就会导致一种僵局。最大—最小原则也是如此。为什么对最少受惠者的一个无限小的伤害在社会上和道义上应当比社会其他成员的较大利益更重要？如果最初的契约具体规定了总是必须得到满足的基本需要的一个确定的最低量，那么，未来可能的困苦就可以令人满意地被避免。罗伯特·诺齐克建议另一种可能性。如果参与者有平等主义的思想，假定处境最差团体获得了一个微小的利益，那么，选择这样一种原则是更可取的，即“如果一种不平等使处境最差团体获得的利益……大于……这种不平等的成本，那么，只有这种不平等才是正当的。”[①]

罗尔斯没有认识到一个真实的和基本的涵义。他注意到，“分配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体系的选择”（p. 265），但同时他又指出，“对私有制或社会主义经济的选择始终是不限制的。仅仅从正义的观点来看，不同的社会基本结构都能满足它的原则。”（p. 249）所有需要做的就是，操纵补贴和税收（臭名昭著地带有偏见），[②] 限制垄断（臭名昭著地无效），和诸如此类的东西。例如，对罗尔斯来说，“财富继承的不平等并不比智

① R.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p. 211.

② 罗尔斯自己国家的几个例证就足以了。在1960年的美国，年收入为20万美元的名义税率是91%，而收入为5百万美元或之上的实际税率仅仅是24.6%。在1958年，价值为2千万美元或之上的不动产的名义遗产税率是69%，实际支付的遗产税率是15.7%。（G. E. Lenske, *Power and Privilege*, New York: McGraw-Hill, 1966, p. 343.）加布里尔·卡尔卡（Gabriel Kolko, *Wealth and Power in America*, New York: Praeger, 1962, p. 34.）发现，最穷的人交付的税大大超过了他们从社会福利支出中所得到的总量。似乎是富人不交税，而穷人不获益。

力继承的不平等在本质上更不平等。”① 与 2a 原则一致的强加的遗产税可以对付这个问题。罗尔斯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社会关系的根本改变，是不能“选择”一种社会制度的。实际上，给定社会制度，选择是预先决定好了的。即使这两个原则被写入到一个资产阶级的宪法里，并得到自觉地运用——这清楚地是一种幻觉，为这种制度的运行而必须的不平等，以致使最少受惠者受益，要比社会主义下的大得多。罗尔斯在采取这一立场时当然不是孤单的。亚里士多德在自己的时代就考虑到，奴隶制是一种潜在的正义制度；他断言，有一个主人，是奴隶的利益所在。同样地，圣·托马斯·阿奎那劝说道，封建主义——在做某些小小地改正以后——是正义的制度，它尤其是上帝的规定。这两个人都认为，天生为奴隶或天生为农奴并不比天生为笨蛋更不公平。我们在这里有了一个我们初步讨论的关于科学研究的社会限制的令人满意的说明。然而，非中性的社会研究还有另外的方面。正像沃尔夫评论的那样，② 约翰·罗尔斯写了一本企图为带有平等主义印迹的自由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做书面辩护的书。然而，罗尔斯所做的恰好确信地证明了，正义与他所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是不相容的。如果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不能够取得正义（为现代人类所理解的），和我们接受正义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目标，那么，这两种制度应当被摧毁（不是必然地被暴力），和被一种能够使正义具体化的社会制度所代替。因此，不管它的作者的企图是什么，《正义论》具有革命的涵义，这正是我们对它感兴趣的理由。

---

① *Theory of Justice*, p. 258.
② *Understanding Rawls*, p. 258.

第四节 正义社会的运行

我们可以通过引用罗尔斯下面的话开始我们的研究：

>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p. 1〉

虽然我接受了这个最初状态——以历史的内容和以正义和效率是正相关的观点进行修正，但在以后的分析中，我和罗尔斯分道扬镳了。我们俩的方法的基本不同在于，我不是在一种神秘的初始状态中而是在日常的实际生活中运用社会契约的观念的。这意味着社会关系的一个根本改变，这也意味着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论。我建议按照下面的程序来进行分析。

我们已经认识了在社会事务中对正义的一种普遍的探询，我们现在必须更仔细地探讨一个理想的正义社会的内容。对革命运动的分析揭示了它们共同具有的三个基本价值：自由、社会平等和人类团结。法国大革命明白地和非常精确地把这三个价值宣布为：liberté〈自由〉、égalité〈平等〉和 fraternité〈博爱〉。一个半世纪之后，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人权普遍宣言》，它的第一条重新肯定了这三个基本的价值理想："所有的人在尊严和权力方面生而自由和平等。他们被赋予理性和觉悟，应

当以**手足情谊**的精神对待彼此。"① (着重号是加上去的)

非常明显，这种历史的三位一体的价值观与罗尔斯建议的原则是一致的，罗尔斯本人也知道这一点。第一个原则反映了自由，2b 原则和原则 1 的一部分反映了平等，2a 原则反映了团结。头两个原则可以在资产阶级的宪法中被发现（如政治上的自由和法律面前的平等），但是最后一个价值却不是如此，因为它明显地不能操作。罗尔斯指出了它是可以操作的，这正是他的伟大功绩。对兄弟/团结的一个自然的解释是：不要利用那些比你更不幸的人来获得更大的利益。很清楚，这与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秩序不相容。这当然也与能人统治的国家主义的精英主义秩序不相容。

很自然地要问：为什么人类要坚持自由、平等和团结？一个可能的答案是：把这三种价值观归结为从人类历史中归纳出来的人的本性。实际上，可以把"人"定义得使之成为具有由三种价值具体规定的正义感。然而，在事实上，人类的实践不仅是正义的，而且也是非正义；人类的实践不仅是建设性的，而且也是破坏性的。对此，一个人可能补充说，总而言之，人类活动的建设性成分是占优势的，因为它确保了人类的生存；由于自我保存是一切动物的本能，所以满足这种生存需要的一种价值导向就会盛行起来。因此，ceteris paribus〈其它条件不变〉，正义的伦理学可以会比非正义的伦理学更为人所接受。

关于人的本性，基本上说，似乎有三种不同的学说：(1)宗教主义的——人是上帝的神秘世界的表现；(2)效用主义的——人是效用的外部世界的表现；(3)人道主义的——关注于人本

① *Yearbook of the United Nations* 1948 – 1949, New York, 1950, p. 535.

身，关注于人作为类的存在（就像马克思说的），关注于人类。前两种学说意味着根本的异化。它们可以是非常残忍的，就像宗教战争和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资本原始积累所展示的那样。它们意味着以个人的利己主义作为人的本性的基础，而不能够解释利他主义。利他主义被认为是上帝或党的旨意。用康德的语言来说，前两种学说把人当成是一种手段，最后一种学说把人的本身看作是目的。一个异化的、手段导向的世界和一个非异化的、目的导向的世界之间的真正差距就是一个阶级社会和一个无阶级社会之间的差距。在后者，个人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社会上是自由的。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之间的传统区别——这反映的是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具有敌意的对抗——失去了它的意义。远不止如此。因为个人的生命是非常有限的，在他的潜在能力中，只有少数几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人性的全面发展的一个前提是：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只有每一个其他的人都能够充分地过他们的人类生活，我才能充分地过自己的人类生活。这就是马克思的（前面的引文）的**互相完成**的原则：与资产阶级的竞争意识形态即互相利用相比，它“导致了人类生活，导致了真实的人类生活。”

我们的下一个任务是调查正义的这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精确的关系。前两个价值是紧密地相互补充的。如果每一个人都应当是**自由**的，那么，每一个人必须是**平等地自由**的。我的自由必须与其他人的自由相一致，反过来也是真实的，平等意味着自由。如果某些人具有较少的特权，那么他们在此范围内就是不自由的。平等的自由意味着自由的平等。在一种抽象的意义上，同样的相互关系却不适合于团结。人们可以想象一个这样的社会，在这里，个人是自由和平等的，但他们之间却没有

团结或手足之情。但是，那个社会并不是一个人性的社会。没有人类的团结，不平等和不自由将会立刻重现。因此，团结使（实质的）自由和平等成为可能，自由和平等使团结成为必需。

逻辑的分析可以补充以历史的分析。从历史上来说，这三种价值在不同的社会中有不同的涵义。考茨基认为这三种价值的涵义取决于在财产和生产上的地位。在原始的基督教中，平等是指产品的平等的分配；在法国大革命中，平等意味着平等的财产权利。在这两个社会中，自由分别意味着闲暇和以最有利可图的方式自由地使用自己的财产；而在社会主义下，它意味着劳动时间的必然的减少。[1] 虽然人们可以不同意考茨基的观点——例如，资产阶级的平等意味着主要是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而社会主义的自由和平等具有比他认识到的更深的涵义，以及社会不能等同于经济——但这三种价值确定无疑地是历史地决定的。然而，价值的改变不是任意的。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分析可以拓展如下：

我们生活在一个存在着社会阶级的分化的社会，在这里，社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有某些明显的（经济上的）被剥削的感觉和（政治上）被压迫的感觉。大多数成员接受了自由、平等和团结的价值观。在每一个人都被作为一个单位来计算的假设基础上（这是平等的一个方面），这些价值可能被作为相关的社会价值加以考虑。平等可能被解释成为社会的平等，平等的生活机会；自由被解释成为自我决定的自由。平等随之意味着自由，因为实际上平等是自由本身内容的一个部分。同样地，自由意味着平等，因为只有消灭了阶级区分，才能提高被压迫大众的自由。

---

① *Ethik und 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1906, Stuttgart: Dietz, 1922, p. 137.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由于采取社会是分化为阶级这一真实的假定而产生的一个困难:大多数人的自由的提高——由于更大的平等——可能会减少那些控制着稀缺价值如权威、地位、权利、财富、收入等等配置的少数特权者的自由,我们从而不得不使某些人的较大自由与另一些人的减少自由相等。上面已经提到,平等的原则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从哲学人类学的领域中寻找一个一般的解决方案。即运用经济和政治的权力以控制那些反对其利益和意志的同伴公民(否则,这将不是权力的运用,而仅仅是管理),使少数特权者作为权力的支配者遭受一种人性贬低的异化的经历。为了避免这种非人性化的过程——即人类的创造潜能或者不能发展起来或者被歪曲,少数特权者应该选择更大的平等。通过诉诸于相互完成的原则,这种选择得到了强化。人的潜能是无数的,一个人如果不能发展这些潜能,他就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这是一个非个人的能力所能企及的无限广大的任务。作为个人,人是极其有限的,他需要其他人帮助他实现他的自我完成。即使是作为一个团体中的人也是如此。缺乏有魅力的人生,就不能完成这个任务。通过所有的阶级、民族和摧毁了其它分界线的人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帮助,人变得更加人性化了。

自由、平等和团结显示出是社会正义的必要条件。如果缺乏了其中的一个,其他的两个价值就会瓦解,正义被破坏掉了。[1] 它们也是社会正义的充分条件。如果一个社会存在着自

---

① 设想作为自由的平等的正义观或多或少被普遍地接受了,但有时缺少了作为第三种价值的团结。没有团结,将会产生无法解决的问题。所以,团结随后在某些特殊的关系中是以其它的名字被补充进来了。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R.W.巴德文的分析。他把正义定义为平等的自由,然后得出结论认为,正义是不够的,第二个伟大的道德原则是利他主义或慈善。(Baldwin, *Social Justice*, Oxford: Pergamon, 1966, p. 112.)

由、平等和团结，这个社会一般被认为是一个正义的社会。这个结论需要一个限定条件。正义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相对于某些标准而言的。如果一个社会在历史所允许的可能程度上真正做到了自由、平等和团结，这个社会就可以被叫做正义的社会。因此，自由、平等和团结的程度可能大一些，也可能小一些，没有达到完美的最后阶段。但是，无论改善是如何做出的，这三种价值——它们是互相补充的——是一起变动的。与通常相信的相反，在一个既定的社会里，这三种价值之间是不能相互替代的。通过更仔细地检查这三种价值之间的关系，据说关于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的一个普遍被引用的例证是，以牺牲一种类型的自由（如政治自由）来换取另一种类型的平等(如经济产品)；或者为了另一些人的平等而牺牲了某些人的自由（如不同的两代人)。以牺牲一种类型的平等来换取另一种类型的平等，或者以牺牲一部分人的自由来换取另一部分人的自由，这些问题当然是真正的问题。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牺牲所有的自由来换取所有的平等。一个多平等和少自由的社会，或者一个相反的多自由而少平等的社会，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不顾这一事实而选择了这种类型的社会，那么，通常可以在意识形态和阶级利益的领域发现问题的所在。

迄今我们的讨论是在高度抽象的水平上进行的。如果要设计一个正义的社会，我们首先必须使它的概念具有可操作性。由于在正义的这三种价值成份中每一个都包括其它两个，我们可以通过在正义中的内容中选择可以更有效地操作的价值成份来简化我们的任务。团结当然不属于这样的价值成份。即使罗尔斯使团结变成了可以操作的价值，它既是不容易衡量的，也是不容易应用的。我们如何知道谁的境遇最差、和每个团体受

多大的影响？自由是可能的更便于操作的一种价值成份，它已经被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做了部分的试验。拉斯基把正义定义为实现自我的平等的机会，这意味着，平等是指，“我的最好的自我实现必须包括它的逻辑结果即其他人实现他们的最好的自我”[1]；这也意味着，作为正义的产物的自由是指，“渴望保持一种人人都有机会实现最好的自我的气氛”。自由有三个方面：**私人自由**是指，“在那些我的境遇主要取决于我的努力的生活领域里行使自由选择的机会”。[2] 宗教自由和合适的法律保护就是这种自由的两个例子。**政治自由**意味着对国家事务的有效的参与。最后，**经济自**由保证了一种安全的和合理的收入。这种方法明显地企图要为一种政治制度准备基础。对它的详细说明可以覆盖整个社会制度。然而，作为对这种理论的反映，人们一定会得出结论认为，结果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

我们剩下了正义的第三个方面——平等。平等的原则具有一个很长的和杰出的传统。罗马的立法家，遵循斯多葛派的主张，宣布：Omnes hominess，iure naturali，aequales sunt，（所有的人生来是平等的）。许多世纪以后，这种思想在欧洲的启蒙运动中得到了回声。在宗教中，平等典型地被转移到了另一个世界：在上帝的眼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有意义的是，社会主义传统总是特别重视平等，仿佛社会主义者推测到，平等是最适合于实际应用的。它的确是如此。自由可以包涵着许多内容，其中包括赚取利润的自由，而平等很少是模糊不清的。恩尼斯特·布劳茨评论道，除非以纯粹形式的术语来定义平等，

① *A Grammar of Politic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28, p. 153.
② Ibid., pp. 146－48.

否则平等（和博爱）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或者就不是平等。①

不管“天生的法则”，平等不是与生俱来的。人们不是天然就是平等的。实际上，他们在能力、需要和兴趣方面是非常不同的。这种多样化毫无疑问是需要的。因此，寻求的平等是指某些特殊的社会意义上的平等。平等意味着机会的平等。不管正义是什么，它们必须是有效的，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正义必须转变成为平等的机会。社会成员必须享有按照他们自己的选择来指引生活的平等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必须有社会的平等的生活机会。一种生活机会当然取决于个人的素质，如健康、天生的才能和有目的的劳动。社会的平等意味着，生活的机会不是依赖于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如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团体），或不是依赖于社会组织起来的方式（如市场对穷人的歧视）。一个以平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成功的社会，但不仅仅是如此。只有在平等的机会的条件下，成功才能被接受。成功受到团结原则的修正，这被补充到需要的内容中。

所有这些可以作为一个崇高的道德理想而被接受，但是，它是可行的吗？或者它仍然是另一种形式的乌托邦？我建议按照下面的方法使社会平等的原则成为可操作的内容：

每一个人都在各自的社会生活中从事着若干个典型的活动，或者换句话说，他们在生活其中的社会里扮演各自不同的角色。如果每一个人在各自扮演的角色中都有平等的机会和平等的权利，并且被平等地对待，那么，毫无疑问，这个社会一定是平等的。现在，在这个意义上恰好有三个基本的社会角

① Ernest Bloch, *Naturrecht und menschliche Würd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61, p. 187

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生产者、一个消费者和一个公民,① 因此，平等必须在生产领域中、在消费领域中和在社会领域中实现。

生产者的平等意味着平等地使用社会的生产性资本。从而生产性资本必须为社会所有——不是被国家所有。社会所有制意味着两个基本的结果。在任何一个人们为了生活收人的目的而组织起劳动的团体之内，任何一个生产者像任何其他人一样都有参与决策的相同权利。这就是自我管理—— 一个我们在以前的讨论中通过另一条路径的分析已经得出的结论。

第二个结果是社会计划。为了合理地使用社会的生产性资本，和为了足够地减少不确定性以便使自治的决策能产生预期的结果，生产单位的活动必须在 ex ante〈事先〉的基础上加以协调，这是计划的本质。认识到官僚或行政计划——被叫做中央计划② ——和社会计划之间的区别是非常重要的。前者意味着强制的协调——在命令基础上的协调——和破坏了企业的自治。后者意味着以实现需要的**全局**比例为目标的经济的协调——在经济利益基础上的协调——和让每一个**个别企业**在决策上有充分的自治（和责任）。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计划是劳动集体真正自治的前提条件。没有社会计划，它们将成为

① 它们之所以是基本的社会角色，是因为除非一个人离开了社会，否则他不能放弃这些角色。而其他角色——如作为一个父亲，或作为一个俱乐部的成员，等等——是可以放弃的。斯洛文尼亚的经济学家弗朗克·塞尔内（Franc cerne）在他的论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的博士论文中——一本几乎没有人知道的著作（一个小国的一个学者的命运的反映）——第一个运用了这种方法。按照塞尔内的观点，社会主义有三个基本特征：(1)共同体成员作为生产者的平等权利，这意味着社会所有制；(2)收人分配上的平等权利，这意味着按劳分配；(3)政治生活上的平等权利，作为公民的共同体成员享有社会主义民主。（“Planiranje in tržni mehanizam v ekonomski teoriji socijalizma”, Ljubljana, 1960, p. 281）

② 中央计划是一个用词不当的术语，因为所有的计划都至少是部分的，或归根结底是中央的，

未受控制的市场偶然力量的牺牲品。

在一个稀缺的经济中，由于我们自觉生活的绝大部分是与生产性劳动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生产者的平等对于人道的生活是至关重要的。

消费者的平等意味着一种平等的或公正的收入分配。同样地，它不是指一种机械的平等，因为在稀缺的世界里，这样一种分配将被认为明显是不公正的，从而将使产量和经济福利急剧地减少。我们的正义观告诉我们，一个懒惰的人和一个勤劳的人不能得到相同的报酬。一个个人从社会得到的应当正好是他贡献给社会的。这就是著名的按劳分配原则。它也是社会资本基本原理的必然结果。如果某人不是从他的劳动中获得收入，或者是在他的劳动收入之上——另一个人从而在此之下——获得收入的，那么，资本就不能被认为是社会化的。我们有了一个完全的、一致的理论，在这个理论中，生产者的平等意味着消费者的平等，反之亦然。

然而，这个理论需要一个重要的修正。劳动收入的原则不能是普遍适用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对教育、健康的保持和进入文化活动这类产品的消费，是不能由一个特殊的个人或他的家庭的收入能力决定的，否则将会导致永久性的社会差别，并且社会差别导致了一个阶级社会。更有甚者，生产者的平等原则遭到了破坏。受过不平等的教育的人，作为生产者是不可能平等的。平等的教育清楚地是生产者平等的一个基本前提。平等地进入社会的医疗和文化设施也是如此。这随之意味着，在对个人能力的发展有基本贡献的个人消费方面，按劳分配原则——从而市场和交换活动——必须被废除。在这里，按劳分配的交换原则必须被一个**按需分配**的非交换原则所代替，这就

是团结原则如何开始发挥作用的领域。

社会主义经济之所以要利用市场，是因为市场是实现生产者平等和消费者平等目标的可以得到的最有效率的工具。但是这既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也不是普遍化市场。这是一种受到社会计划严格控制的市场。并且这是由一个主要的、其重要性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提高的非市场活动的部分加以补充的市场。

最后，**公民的平等**意味着一种权力的平等分配和一种对政治决策的有意义的参与。即使在最发展的资产阶级民主中，这种要求没有被满足——在原则上也不可能得到满足。只有在取得了生产的平等和消费的平等之后，政治平等才是可能的。然而，政治的平等也是在生产和消费领域中的真正的平等的前提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私有财产和阶级区别使权力的平等分配成为不可能的。党的官僚——或者一个，或者更多——与一个联合体的社会不兼容的。即使是民主的概念也不能令人完全满意：除了多数人的权利之外，社会必须也要保护少数人的权利。让我们把能满意这些要求的政治制度结构叫做**自治**。

几乎不需要补充道，在现实的世界中，这三种平等不能全部实现，它们是作为标准和尺度发挥作用的。可以得到的经验显示了，当代社会可以在满足这些标准方面走得很远。在一个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中，它们必须被当作公民的基本权利来对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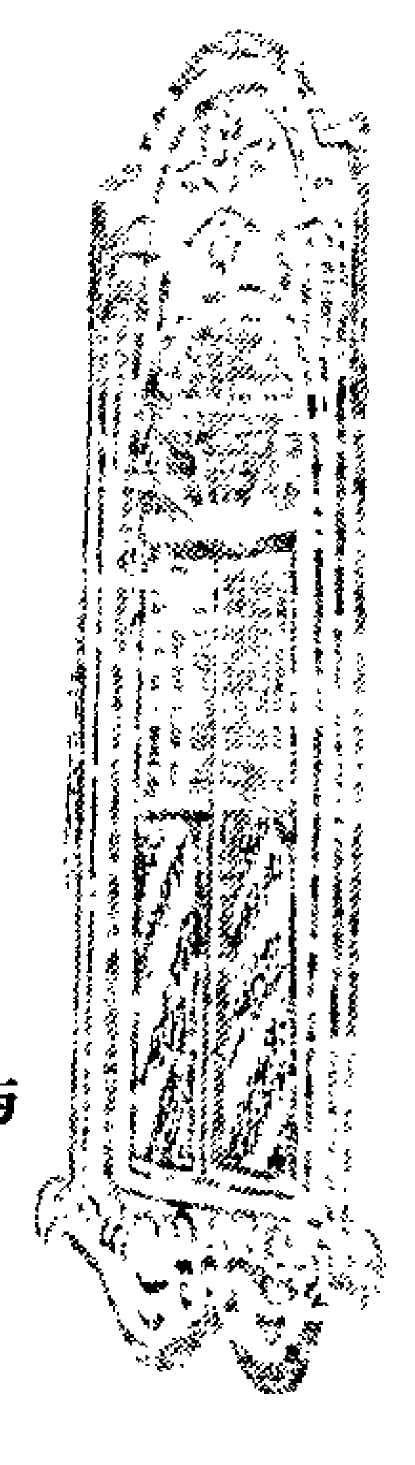
这三个基本的要求与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有着一种有意思的历史联系。在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不同发展阶段上都可以发现这三个基本要求，但它们从来没有作为自觉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完整的系列条件而被明白地阐述过。首先被发现的

是按劳分配的原则，通过马克思的普及，这一原则在今天已被普遍接受了。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南斯拉夫才显示了自我管理原则可以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得到运用，并且它代表了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与关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和消费的较为满意的知识和重要的实践经验相比，我们仍然不知道，即使在理论上，如何实现在权力分配上的平等。因此，公民的平等变成了最难对付的难题。从而，政治——而不是经济——似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问题。

生产者、消费者和公民的平等为设计成为一种正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奠定了基础。使这些价值成为可以操作的惟一方法是，在每一个具体的事例中寻找恰好可以使每一个人有参与评价这些标准的平等的机会。社会主义是一个参与的、自治的社会。

第3篇

自治社会主义的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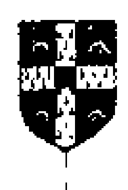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论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



第 8 章

生产者平等

第一节　社会财产

生产意味着占有，生产的最终结果即产品总是归属于某些人。因此，从经济制度的观点来看，**财产关系**就是**生产关系**；或者反过来说，生产关系就是财产关系。

在商品生产的世界里，财产关系受法律调解，这一调解过程产生了**财产权**。财产权的法律理论已经在罗马法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其基本观点仅仅有不太重要的改变。罗马人设想的财产权，是一种个人对物的无限制的、绝对的和排他性的权力。资产阶级法律用授予个人在某些确定方面的主观权利来代替罗马人的权力概念。代表资产阶级法律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的 1804 年的法国民法典把财产权定义为：ius utendi，fruendi et

abutendi（使用、收益和处置某一物品的权利）。在罗马和资产阶级的法律解释中，财产权都意味着排除他人对物品的控制。

在详细地阐明罗马—资产阶级的法律理论时，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论区分了三种类型的财产：私有的、集体的和国有的。在这方面，1922年苏联的民法典是一个里程碑。该法典的第52段列举和解释了上述三种类型的财产。第一种类型的财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而在革命后的社会中，它代表着过去的残余，因而必须尽快地被摧毁。第二种较高级的财产，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都是不稳定的，代表着一种过渡的财产形式。国家财产被认为是最高级的财产形式，因而，它提供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

在我们前面分析的基础上，不难认识到，国家—社会主义的财产理论仍然是误信资产阶级逻辑的另一个例证。在私有财产和国有财产之间并不存在基本的矛盾冲突。当然，前者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主观权利，面后者可以并入一种客观权利。但是，这仅仅意味着私人所有者被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所取代。结果是：私有财产产生资本主义，而国有财产产生国家主义——两者都是阶级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两种制度极其相似，而且它们与第三种制度——社会主义——有本质的不同。如果我们从财产方面来定义社会主义——记住我们在本章第一段的论述，这完全是合理的——那么，社会主义应该意味着一种新的、完全不同的财产类型。让我们把这种新型的财产称之为**“社会财产”**。这一概念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设计成为一种自治社会的社会主义，意味着不存在一个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特殊阶级，无论这个所有者是私人还是集体。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一个所有者，这意味着没有一个人特

殊地成为一个所有者。罗马—资产阶级财产权的具体特征即排他性在这里并不适用。如果没有人被排斥，那么，每个人都平等地进入社会所拥有的生产资料。结果是，财产并不授予任何特权。

很清楚，如此定义的社会财产并不适合于用传统的法律制度来解释。任何这样做的企图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人们可能争论道，社会财产属于财产范畴，因为它意味着收益和出售；人们也可能争辩道，它不是财产，因为不存在处置权和传统意义上的排他性。由于这种财产非常清楚地不是私有的，一个人可能认为社会财产属于公法的范围；而另一个人可以辩论说它属于私法范围，因为它明显地不是国家财产。以罗马法为基础的法律理论显然不是为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而设计的。这种法律将必然会随着上层建筑的其他因素的改变而改变。[①] 然而，这些变化并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要关注的。我们所必须做的一切就是，给出社会财产这个概念的精确含义。我建议通过考察社会财产的法律、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内容来做到这一点。

从形式上的法律观点来看，财产是关于具有经济价值的物品的一组权利和责任束。就社会财产的情况而言，我们可以认识到，有两种基本的权利和责任。权利是：

①使用、改变或出售商品，包括生产资料。

②从生产性财产的使用中获得利益（收益权）。

基本的责任是：

---

① 当然，这种改变已经在旧的社会制度中开始了。正像米洛斯拉夫·皮库里克（Miroslov Pecujlic）观察到的那样，私有财产经历了一个非人格化的过程。罗马和资产阶级的法律几乎不把法人作为法律对像，法人是从自然人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概念。除此之外，形式上的不可分割的权利被分解成两个领域：一个部分产生收益，另一个部分提供管理的授权。

③无论最初的资金来自何处，生产性财产的价值必须不能减少。

列举的这三条法律原则对自治的生产集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法律的调解是必需的。

从社会关系方面来说，生产性财产在阶级社会中意味着对其他成员的劳动的支配。因此，马克思非常恰当地把资本定义为在支配他人劳动的基础上产生剥削生产关系的生产性财产。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资本主义还是国家主义，都具有剥削性；而资本既可以是私有的，也可以是国家所有的。在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财产的控制和剥削他人劳动的权力消失了。很清楚，消费品（包括耐用消费品）的所有制是和这一要求相一致的，家庭生产和经过上述法律定义的生产性财产也是如此。剥削关系的消失意味着下述三个基本的权利：

①社会上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从事劳动的权力。

②社会上的每一个成员都有按照他们个人的能力竞争从事任何一种工作的权力。

③社会上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在平等的条件下参与管理的权力。

如果违反了三种权利中任何一种，那么，社会财产就不再具有充分的社会性。这必将导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能充分发展，甚至完全不能得到发展。

从经济上说，社会财产意味着对前社会主义社会的财产的真正本质——从财产中占有收入——的否定。不管是私人性还是集体性的，资本的收入都不可以被占有。如果从经济方面来积极地定义社会财产，就像我们以前所做的一样，那么我们可以加上下述的基本权利和责任：

——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仅仅是从劳动中而不是从财产中获得经济收入的源泉。

这种权利（对他的劳动产品的权利）和责任（只是从他的劳动产品中，而不是从其他方面获得收入）是按劳分配原则应用的基础，这种原则结果会产生消费者的平等（下一章将讨论这个问题）。

社会财产的经济方面的内容已经被并且继续被误解为它的社会方面的内容。无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非社会主义者，都继续混淆了形式上的法律所有制和经济所有制，把（法律上的）私有财产与社会财产相提并论，和把（法律上的）非私有财产与私有财产相提并论。这种推理导致了这样的结论，即每一次国有化都是朝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一步，以及私人手工业者和和农民的存在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现在，那种完全的国家所有制是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的观点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但仍然需要证明，农民和手工业者和那些在（法律上的）非私有部门工作的人一样，都是属于"社会主义的成份"。为了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把法律所有权与其经济实质明确地区分开来。

最早做出清楚的和精确的区分的人是亚历山大·贝依特〈Alexander Bajt〉,① 他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法律所有权和经济所有制不仅不是相同的，而且经常出现实质性的背离。例如，一个房屋的法律所有者是拥有该房屋法律所有权的人。如果房租受到了控制，或房客不能被驱逐，房屋的部分（甚至是全部的）经济所有者就是实际住在该房屋的人，因为他们从财

① "Socil Ownership—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In B. Horvat, M. Markovic, and R. Supek, eds., *Self - Governing Socialism: A Reader*, vol. 2, White Plains, N. Y.: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1975, pp. 151 - 63.

产中获得了利益。同样，个体农民在法律上拥有土地。然而，如果他不能雇佣外来的劳动者，并且地租为一种设计得恰当的税所抽取，那么，土地的经济收益就属于全社会。另一方面，一个国家可以在法律上建立社会财产，但某些产业工人的收入却大大地高于其他产业工人的收入（例如，就像在南斯拉夫发生的一样），这个收入上的差别或某些特殊产业的非劳动收入的相对规模反映的是社会财产的私有化的程度。

上述分析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与传统的观念相反，法律上的剥夺不仅不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充分条件。说它不是社会主义的充分条件，是因为完全的法律剥夺可能会而且已经产生了非社会主义制度；说它也不是必要的条件，因为问题的实质不是名义上的法律所有权的剥夺，而是剥夺由财产控制权而产生的经济利益。由于家庭生产是与社会财产的社会方面完全一致的——现在我们看到，它也是与社会财产的经济方面完全一致的——可以得出结论说，小规模的家庭生产通常是与社会主义相一致的。从社会财产的法律方面的内容来看，由于上述提到的责任3并不适合于家庭生产，因而可以放宽限制。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可以追随贝依特的建议，区分两种类型的社会财产：集体的和个人的。上面提到的所有的权利和责任都适合于前者。后者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仅仅涉及到家庭企业，并且由于某些权利和责任并不合适（法律责任3），某些权力和责任并不适用（社会权利1和2），个人财产缺乏社会财产的某些特征。

通过总结上面的讨论，我们的结论是：社会财产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财产，这种财产具有使剥削成为不可能的明确的法律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特征。在这里，剥削被定义为：①支配他

人的劳动；②非劳动收入的占有。换言之，社会财产仍然可以被看做是法律意义上的财产（一组经过恰当定义的权利和责任束），但不再是社会或经济意义上的财产（不再有以财产为基础而产生的人的特权），后者意味着法律的财产不能够转变成为资本。

第二节　工人管理：组织原则

像任何一种民主一样，工业民主是一个政治概念。一个由劳动者经营和管理的企业，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组织，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组织。这意味着工业民主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近于完全的和直接的自我管理只有在企业的范围内才是可能的，所以任何对自我管理的企业的研究都是恰当地从劳动者管理企业调查开始。其次，在企业中发生的一切，对在更大范围里发生的社会关系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社会主义企业的组织/政治目标是，在履行效率的同时，实现决策上的民主最大化。传统的组织理论认为，这种双重的目标是内在矛盾的。它们被认为同市场和计划这对概念一样是相互冲突的。社会主义的组织理论将视两个目标是相互补充的，但这一点必须得到证明。

民主最大化可以被定义为，在一个劳动共同体工作的每一个成员的意见仅仅是根据其对进行的决策的客观重要性加以权衡的。因此，形成的决策将独立于任何一个特殊成员的主观动机和利益。同时，它也将是最有效率的。民主最大化意味着效率最大化。

乍看起来，上述的描述很有吸引力。但实际上这完全谈不

上是解决问题的答案，它只不过是一种空洞的同义反复，就像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一样。在这里，民主被简单地定义成暗含着效率；而没有说明如何实现这一个目标或那一个目标，并使二者一致。它们之间的一致性是通过定义来实现的。因此，我们必须寻找更有意义的方法。

实际上，有两个根本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第一，谁来评判一项建议的客观重要性？第二，评判客观重要性的价值标准是什么？答案是：民主必须被定义为决策的**方式**，而不是决策的**性质**。现在，同义反复消失了，我们可以描述下述关于劳动者管理的企业的6个组织原则。头两个原则保证了民主，其次的三个原则保证了效率，最后一个原则使二者相兼容。

1. 在劳动共同体只有一个成员时，绝对的民主最大化才能实现。其他成员加入以后，决策的自由必然要受到限制，技术上的复杂性也将提高。同时，形成操纵团体意见的派系和联合集团的可能性也会出现。即使它们没有出现，由于真正的利益分歧而形成的两个小团体的出现，仍然是可能的。多数人可能对少数人实行暴政，他们可能漠视和践踏少数人的合法利益。由于所以这些理由，基本的工作团体应该很小和具有同一性，以便使面对面的活动、非正式的交流和成员之间的个人交流成为可能。在这种最基本的社会团体中：

a. 参与决策是直接的；

b. 决策的过程和达成的决策是透明的；

c. 由于工作具有同质性，非公正性和永久性的多数人的强制是不可能的；

d. 因为从a到c，所以，操纵意见的可能性受到限制。

我们现在可以得出第一个组织原则：最基本的组织单位不

是企业，而是具备上述描述特征的工作组织。我把它称作**劳动单位**。一个劳动单位不仅是一组工人，而且是被众所周知叫做企业的生产体系的一个确定的子系统。作为最小的生产性单位，并以这种资格，一个劳动单位又是一个**经济单位**。一个劳动单位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工作小组，该小组承担着各种生产和其他任务。①劳动单位联合成为一个**劳动共同体**，而经济单位联合成为一个企业。

2. 当一个劳动单位的决策实质上影响到了其他劳动单位的利益时，就应该把决策权授予下一个更高的组织层次。这就是建立作为第二级决策机构的**工人委员会**的理由。

有效率的管理包括：a. 正确的决策；b. 有效的执行。以下的组织原则试图满足这两个条件。

3. 进行决策的个人和机构应当承担决策的责任，换言之，权利必须与制裁相一致。

4. 决策的执行（行政工作和管理），是专业能力的事情，而与民主无关。

5. 原则4意味着分离了两个不同的活动领域：利益领域和专业领域。前者包括政策决策，后者包括专业工作和日常事务的行政管理；前者代表价值判断，后者代表技术执行。在利益领域，应用一人一票制；在专业领域，投票是按能力加以权

① 重要是要认识到，工作小组或有时被称为是自治工作组的职能受到严格的限制。维利克·卢斯（Veljko Rus）和米替·卡默希克（Mitja Kamušič）在研究一个斯洛文尼亚工厂的行为的基础上建议：它们"应该被限制到那些无法由工作组织的任何其他团体完成的职能上。我们记住，自我组织和自我控制的团体工作，代表着废除等级制组织和由管理的中层和下层部分进行控制……自治工作组不应该决定聘任和解雇，也不应该决定提升和成员的教育。在这方面，自治工作组的职能将是单一的和部分的，而不是多方面的和全部的。"（"Autonomous Work Group Within a System of Self - Management", Conference on Workers' Participation on the Shop Floor, Dubrovnik, February 1976, p36）

衡。

6. 由于政治决策和技术决策不能完全分离——劳动单位既不可能具有完美的同一性，整个劳动共同体也不可能是足够的小规模，总是存在着个人和团体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因此，应该在整个体制中建设一个特殊的安全保护装置。这是一种控制和解决冲突的制度化装置，一种保护个人利益免于受集体考虑不周伤害的制度化装置，和一种防止集体利益受个人不正当行为侵害的制度化装置。执行这一职能的是专门执行者，工作协调者和立法者。

第三节　工人管理：组织图示

如果上节所描述的6个组织原则能得以实施，那么，劳动者管理企业的组织结构将如图4所示。很明显，图表本身并不重要，它只是用来详细解释沙漏模型（见图3）。图的最上部属于政策决定领域，下部是技术执行领域。由于在这里主要是把企业作为一个政治体制来对待，我们也可以运用传统的政治理论，例如权力分立理论，来加以说明。立法权落在结构图的上部，行政权在下部。除此之外，并与组织原则6的要求相一致，司法权在图示中央部分的左边。

原则上，所有的决策都是在尽可能低的层次上做出的。只有当决策影响到其他劳动单位的利益时，它们才在高于劳动单位的层次上做出。大多数影响工人日常活动的决策可以在劳动单位的层次上做出，这些决策是：工作岗位的分配、工作条件、社会优先权、剩余的分配、就业和解雇、冲突的解决，等等。经验研究表明，这些都是在直接参与决策时工人们确实关

心的问题。另一些政策决策可以授权给中央立法机构，即工人委员会。然而，仍然有一类至关重要的问题，既不能由工人委员会做决定，也不能由个别的劳动单位做决定，而只能由整个劳动共同体在全体会议上或通过全体投票来决定。这类问题包括：合并，根本性的组织重新改组，重大投资项目，宪章和各种法令的通过，以及类似的事务。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每一个有选举权的劳动单位的多数票。

当一个新工人加入企业后，他签署一个"社会契约"。据此，他在既定的宪章和法令下，把自己的劳动与劳动共同体中其他人的劳动联系起来。

根据企业的规模和生产过程的复杂程度，一个劳动单位的人数可以在10人至200之间。它在全体会议上制定决策和选举在工人委员会中代表该单位的主席。除了代表"局部利益"的劳动单位的主席之外，工人委员会还包括代表"功能利益"的理事会主席。后者通过全体投票选举产生。由于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对一组特别的活动（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生产上的）负有个人的责任，所以满足了组织原则3的要求。

虽然工人委员会的理事会仅有咨询的权力，但它在自我管理的过程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在专业经理与工作团体的其他成员之间架起桥梁，它结合技术知识和政治统筹考虑，它使每一个人至少在准备决策阶段直接参与管理成为可能。因此，不仅技术知识得到开发，而且获得了宝贵的社会经验，这必将增进理解和沟通，并且帮助减少固有的社会障碍。从实际的目的而言，一个在收入分配委员会工作多年的力工，可以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他会知道为什么法令规定固定的工资差别的所有理由；他知道，哪一个决定会改善效率，哪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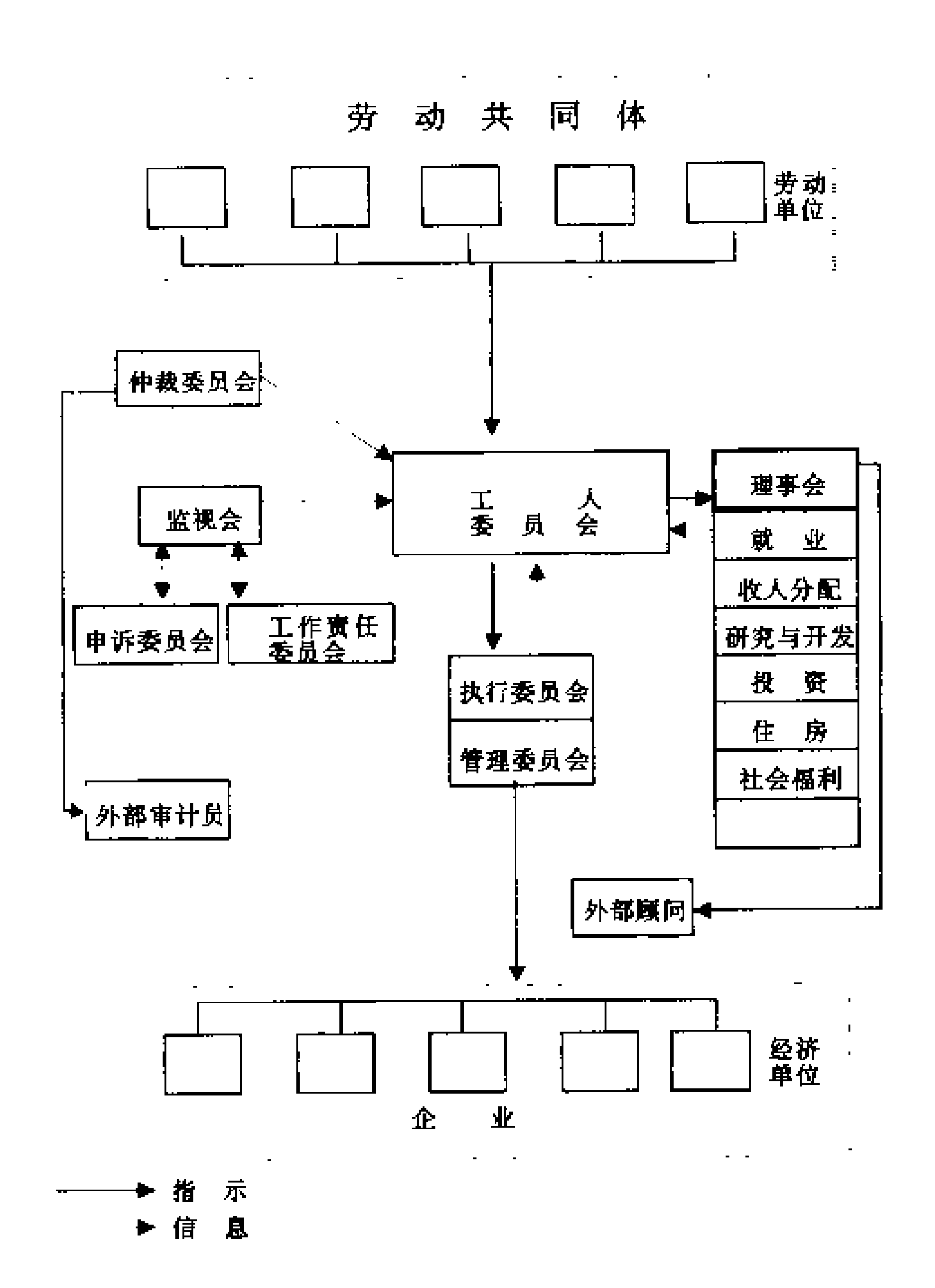


图 4　一个劳动者管理企业的组织

不会；哪一个会被接受，哪一个不会，等等。对投资计划者来说，一个在投资委员会工作的熟练技工是获得实际信息的宝贵来源。这些人成为积累起来的关于企业活动的知识的仓库。如果委员会对某一特殊事务缺乏专业技术知识，它将向外部寻求咨询。当决策机构是由选举产生，并建立在轮流制的基础之上时——任期通常为两年，理事会的成员资格则依赖于个人的爱好，并不需要任期的限制；而且对更具有技术性的委员会成员来说，不需要选举。对个人而言，存在着许多在某些特殊的企业管理领域里实行分工的机会。这不仅会提高效率，而且也会满足个人的积极参与的要求。

工人委员会在其理事会和其他委员会的推荐基础上通过决策。最重要的委员会是**执行委员会**，它代替了以前的董事会。担任执行委员会的总经理——也许称做总工作协调人〈general work coordinator〉更合适——由工人委员会任命。工人委员会的主席依照职权自然成为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执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由部门的负责人和企业的秘书组成，他们是经工人委员会推荐由经理任命。劳动单位经总经理同意后任命他们自己经济单位的经理。使经理人员的任命得到工人和总经理的最大接受，明显会提高效率。有趣的是，“联邦”单位将在企业的管理结构中得到双重的体现：在工人委员会中的主席和在管理委员会中的经理。主席是一个政治家，一个在良好工作关系方面的专家。经理是一个技师，一个在完成工作任务方面的专家。如果他们都得到了工人们的信任（并且具有和睦的个性），该劳动单位很可能实现了政治民主和经济效率。

总经理的任期通常为4年。他的任命是有条件的，取决于他完成发展规划的表现。一旦某一项发展规划得到了详尽的阐

述，并且为工人委员会所接受，它就成为一种内部的法律。无论是工人委员会，还是经理和他的人员，都有责任执行它。这意味着，工人委员会必须在政治上提供完全的支持（或者发起改变该规划的程序），而执行委员会对该规划的实现负有全责（原则3）。执行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可能会出现意见分歧，然后，总经理可能递交辞呈，或者在大选之前——即在全体劳动共同体和它的劳动单位面前——展开辩论（由于工人委员会仅有代表决策的权力）。总经理对所有的企业活动也负有法律责任，因此，有责任对工人委员会提出的违反法律的决策投否决票。另一方面，在每一个企业财政年度开始之前，在对企业上一年度的经营效益和下一年度的计划展开辩论之后，是对执行委员会的信任投票。如果企业经营效益差，使管理层得不到工人委员会的进一步信任，管理委员会必须改组。总经理可能不得不辞职，即使他的任期未满。

在所有的人类组织中，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某些个人可能会滥用他们的权力，或不能履行其责任。因此，每一个统治体制（也包括自我管理的体制）都需要执行两个格外的职能（除了立法和行政以外）：仲裁的职能和控制的职能。

在个人和集体之间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冲突：a）个人可能被集体行动所伤害（或者为代表集体的决策所伤害）；b）集体利益可能受到不负责任的个人行为的损害。由于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冲突，最好建立两种不同的组织：处理第一种类型冲突的**申述委员会**和处理第二种类型冲突的**工作责任委员会**。由于必须得到所有个人的充分信任，前者可以由劳动共同体的全体成员选举产生。由于必须得到立法者的信任，后者可以由工人委员会选举产生。两个委员会都是完全独立地行使其职权。劳

动共同体的任何成员都可以向这两个委员会中的任何一个提出案件。注意，第二个委员会代替了以前的纪律委员会。当然了，在目前的情景下，不仅仅是某一特定的违反纪律委员会的领导行使判决权，“领导”本人也可能被带到委员会面前。另一方面，当他们感到受到伤害，他们有使用申述委员会的权利。

在某些方面，两个委员会像法庭一样行事。它们执行宪法赋予的规则，运用先前的案例，并以这种方式创立某种类型的习惯法。它们不能改变规则，或坚持他们个人的偏好。但无论多么完善的规则，本身都是僵死的，所以，规则有时需要修正或重新解释。由于这一原因，最好让工人委员会充当上诉法庭的角色。如果工人委员会本身成了被告，那么，委员会是在企业里的终审法庭。然而，即使这样，上诉仍然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向一个叫做“自我管理的公共律师事务所”的外部机构上诉（在第十章将做详细的描述）。

两个委员会的主席依照职权成为**监视会**的成员。监视会是工人控制和监督所有的经理行为的组织机构。由于冲突提供了关于企业经营不善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在工人理事会和监视会之间建立一种联系是必要的。监视会的主席及其成员，或者由全体投票产生，或者由工人委员会选举产生。监视会向工人委员会进行推荐，并为工人委员会准备报告，但它在其他方面是独立的。为了工作得更有效率和及时地反应经营条件的改变，必须给予管理层酌情处理事物的权力。然而，像其他权力一样，这种权力可能很容易被滥用，因此，需要一个制度化的装置。监视会就是服务于这种职能。它可以查阅所有的文件，并检查任何经理的决定。至少一年一次，监视会雇佣外部审计

员为上面提到的经营辩论提供关于企业经营业绩的评估报告。然而，监视会不仅仅是作为控制的工具和管理层不愉快的批评者而行事的，它同时也是有活力的和有进取心的管理的有力支持者。积极的管理很可能会遭到劳动共同体中懒惰成员的阻挠。为了使其不满合法化，他们可能开始散布对某种管理行为的合适性和合法性提出质疑的谣言。对付谣言惟一有效的方法是使问题公开化，并与真相对照。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与谣言斗争，或将隐蔽的权力滥用揭露出来。任何传递给监视会的情报都被认为是机密的，直至和除非被证实是真实的，它是不会被泄露出去的。另一方面，委员会可以向企业内的任何机构和组织要求获得有关的信息，并检查它们的账本。因此，如果一个人捕捉到干某种坏事的迹象，但又不能肯定，他将向委员会报告。如果他的猜测是正确的，可以避免损失；如果他的猜测被证明是错误的，一个忠诚的人的名誉受到了保护，并且避免了不必要的争斗。对于一个企业的良好的人际关系面言，一个生气勃勃的监视会的重要性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的。这样一种委员会帮助使冲突减至最少。

不仅当不遵守规则和不尊重合法权益时会产生冲突，而且当双方在解释规则出现分歧时也会产生冲突。或者，在一种新的情况下，可能完全没有规则可以遵循。然而，某些人必须决定什么是正确的和公平的。这就是**仲裁委员会**〈council of reference〉[①] 的职能。它是立法法庭〈constitutional court〉和仲裁委员会的结合物。任何工人可以对任何决定的合法性提出反

---

① 我是从斯克特·伯德联邦〈the Scott Bader Commonwealth〉的法令中借用这一名称的，但赋予这一组织不同的职能。见 F. H. Blum, *Work and Communit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8, p156.

驳，而不管他本人是否被卷入其中。任何机构可以对任何其他机构的任何一项特殊行动的合法性提出反驳。其结果是，在一项重要的决定做出之前，产生了对规则的合理解释的要求。这类事情交由该委员会来处理。委员会的决定有约束力。它也监督选举。

由于令人满意的裁决需要掌握有关企业组织的完备信息和有管理的经验，所以，选举仲裁机构代表的一个好的办法是，视其在顾问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的先前工作情况而定。原则上，自我管理组织中的所有被选举者都要保留他们的生产性职务。只有工人委员会的主席在其任期内可以被允许不干原来的工作，因为在规模较大的企业里，他的责任要求他从事专职工作。

上述的组织结构并不是任何的特定企业的复制品，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它与南斯拉夫工人自治企业有些类似。此图示主要是我根据亲身的实践经验构建的。在过去的15年的历程中，我曾相继担任过各个不同企业的工人委员会的成员，许多其他各种专门委员会的成员，总经理和仲裁机构的成员。它是为中等规模的企业设计的。在一个小企业里，管理机构将会更简单些。而在大企业中，可能存在着工厂、企业和公司的工人委员会等几个管理层次。重要的是要认识到，mutatis mutandis〈在细节上做了必要的改动之后〉，相同的组织原则运用于任何其他的工作组织。

并不存在说明为什么只有在商业企业中才能实行自我管理的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无论何时，当人们为了生计而把他们的劳动联系在一起时，他们在自我管理的基础上组成劳动组织。等级制被合作所代替，并且形成了制度化了的治理的三

权（更正确说是四权）分立式的管理职能。对于目前这个组织图示，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说明。某些劳动组织可能具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即它们的行为会以一种重要的方式影响到社会其他部分人的利益。因此，完全的自治可能是不合适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托管局**〈board of trustees〉增添到组织结构图示中去，其成员将由劳动共同体的代表和受其影响的某特殊社会利益的代表所组成。

只有当实现了完全的公开时，工人管理才能有效运转。所以，关于即将进行的每件事情的信息的正确性和及时性是非常重要的。所有机构的决定都应该在企业的公告板上公布，每一个成员都应该获得所有会议的记录。

参与制组织在技术上要比传统的等级制组织更为复杂，所以它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一个学习的阶段，同时还必须要克服各种困难（下节将进行分析）。从所需要的时间来看，最初的成本将会提高。的确，如果会议代替了生产工作，那么，天真的和毫无经验的自我管理将会遭到严重的效率损失。然而，在运转正常的体制中，很可能会获得实质性的和全面的收益。等级制似乎运转得很快。不错，它可以迅速地发布指令，并且使指令必须得到执行，但是，这种体制产生了有害的副作用，并且为了克服这些负面影响而浪费了大量的和连续的工作投入①。参与制需要一个特殊的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行

① 在美国出现的一，重要的问题是，有相当人射的做出的决策，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弥补由先前的决策而产生的未曾预料到的结果。……在大多数时间里，这些没有想到的结果影响到了在做出决策之前并未与之商量的个人和团体。要尽早地发现这类的问题，再也没有比让那些可能受到决策影响的人参加决策过程更好的方法了。虽然这将使决策过程变慢，但它将产生更有效率的决策，因为通过预先发现暗藏的问题而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成本，它使成本变成了有效的成本.（F. C. Thayer, an End to Hierarchy! an End to Competition! New York: Watts, 1973, p. 290）

动计划将通知给所有有兴趣的团体，并征求他们的意见。一旦达成协议，决策就会毫无阻力地得以执行，并且会更迅速地达到预期的。

将自我管理运用于某些特殊生产组织的可行性有时受到怀疑。我们对组织设计图示的讨论表明，它是普遍适用的。然而，传统的等级制却不是如此。大学和研究所就是明显的例证。甚至是采用更为先进技术的企业也不能按照传统的模式来运行。如果常规生产被个人的研究项目所代替——这很可能是技术电子时代越来越显著的特征，那么，组织将成为多纬度的，单向度的权力结构将是不可行的。每一个项目涉及到许多不同的部门，需要将各个不同部门人员的服务结合在一起。威廉·哈勒尔〈William Halal〉，一个美国管理学教授，毫无夸张地这样写道：

> 不断进化的后工业社会将消灭大多数形式的体力劳动，取而代之的是，劳动将集中在“信息”产业部门。到本世纪结束的时候，主要的就业领域将是研究、计算机化、服务、通讯、教育，及其类似的部门。与那些为现存的组织形式而设计的体制特征相比，这些新技术引起根本性的巨变。与“信息—通讯”技术有关的任务组成是如此独特，以至于使管理常规变得经常不可行了。一个问题不同部分的相互作用，使把这一问题分离成为专门的分工变得更为困难了。与那种执行重复的相同工作的过程相比，由于缺乏理解过程而产生的不确定性，使预测结果变得更加

成问题了。①

不能用常规的方法来解决非结构性问题。这类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主动性和创造性。另外，环境的快速改变要求组织体制必须是开放的。经理们惯常运用的、通过企业内部权力结构进行控制的某些行为，在体制的外部开始变得不灵了。具有更大的适应性的要求，和通过建立临时组织以处理特殊问题的要求，使不同类型的协调成为必需。传统的官僚组织，和它的官阶制和按程序设计的角色预期一起，成为没有意义的，或至少是功能紊乱的东西。

我们再次得到熟悉的结论：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组织携手共进。自我管理不仅仅是和技术发展的大趋势相一致的，事实上，对于一个后工业社会的正常运转来说，有意义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第四节　工人管理下的潜在问题

对工人管理的提倡，遇到三种典型的反对意见。据说，自我管理将使纪律松弛；据说，工人委员会缺乏像董事会那样行动的能力；据说，工人将把所有的利润用于工资分配，因此降低了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这三种预言没有一个被证明是正确的。

第一种反对意见的含义是，工人管理将摧毁等级制（正确）；而没有等级制，就没有权威（不正确）；没有权威，纪律

① "The Post -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 Bureaucrat*, 1974, pp. 285 - 300, quote from p. 290.

必定会瓦解。这种推论混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权威：一种是强制性的，另一种是专业性的。强制性的权威随着等级制的消亡而消亡，但专业性权威在自我管理的组织中仍然保留着，甚至得到了加强。经验研究表明，纪律并没有松弛[①]，而无论是工人还是经理的有效权力得到了提高。一项国际比较的研究成果的结论是：

> 工人对决策的参与，对作为整体的工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意味着，工人体会到他们个人的影响力、信任和责任。在那些工人信任管理层和对工厂有责任感的地方，他们对经理们的影响意图做出积极的反应，而经理在这种条件下是有影响力的。因此，那些实行工人参与决策的工厂，一般都具有依据其成员进行相当高水平的控制的特征。在这种条件下，工人的影响力的提高，并未产生减少经理影响力的效应。因为，成员的信任感和责任心，如果没有提高经理的影响力，也为它的持续性提供了基础。[②]

关于工人委员会决策的有效性问题，我们对组织图示的讨论表明，这个最高的决策机构可以利用企业内的所有信息和知识。在对企业的运营所做的贡献方面，工人委员会比它的资本主义的相似物——董事会——处在更优越位置上。董事会——

---

① 见第 5 章，第 6 节。

② M. Rosner, B. Kavčič, A. S. Tannenbaum,, M. Vianello and G. Weiser, "Worker Participation and Influence in Industrial Plants of Five Countries", in *Participation and Self - Management*, Proceedings of the Dubrovnik Conference, vol. 4, Zagreb: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PP. 91 – 102, quote from P. 100。

它被神话般地描述成为股东利益的代表——实际上所做的事情，正像罗伯特·唐森德所描述的那样，“他们一个月碰一次面，盯住粉饰一新的浮夸的公司财务状况（从来不看经理经营企业的实际情况），听着总经理和他的助手们肤浅地谈论着企业的状况，问两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提几个象征性的建议（当面谦恭地做记录，然后把它丢到一边），然后休会，直到下个月再开会。”① 与此相比，在工人委员会中参加会议的，是那些体力和脑力劳动者，他们生活在企业中，对它的问题非常熟悉，并且对寻找解决问题的正确决策有浓厚的兴趣。

至于说到第三种反对意见，决定增长的不是利润，而是投资。如果有什么特别的话，也只是在工人管理的经济中存在着过渡的长期投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用较低的风险和未来的不确定性的减少而使投资边际效率的提高加以解释。

这三种反对意见，使人想起了两个世纪以前，亚当·斯密对联合股份公司提出的批评：“这些公司的经理们……由于管理的是别人的钱财，而不是自己的钱财，不能指望他们以像私人公司的合伙人关注自己的钱财那样，以焦虑的和小心翼翼的心情，来管理这些钱财……因此，在这些公司的管理事务上，或多或少地盛行着疏忽大意和混乱。”② 斯密认为，只有私人所有者才能够自觉地管理他们的企业，所有权和管理的分离，必定要产生疏忽大意和混乱。当代的理论家从实践中了解到并非是如此。但他们坚持认为，只有独裁式的管理才能克服这些问题。他们认为，疏忽和混乱是由于把决策和生产协调分离而引起的。

---

① R. Townsend, *Up the Organiza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0, P. 49

② *Wealth of Nations*, ed by E. Cann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7, P. 700

揭露这三种反对观点的虚假性并不困难，然而，存在着一大堆真正的问题，需要仔细地检查它们。

1. **在讨论上的时间浪费**。可以用“全体一致的综合症”这样的术语来概括参与制管理的特征。工人管理十分不情愿用投票表决这种方法来对某一问题做决定。它认为，应该有一个为每一个人都能接受的最好的解决方案。如果人们出现了意见分歧，他们总是试图说服双方，直至达到一致。如果某一会议准备得很糟糕，如果参加者没有掌握合适的信息，他们没有时间考虑涉及的问题和预先进行非正式的咨询，如果问题的技术的和法律的背景得不到清楚的和精确的说明——所有这些在工人管理的早期阶段都是非常可能发生的，那么，会议就可能花好几个小时甚至一天的时间，来讨论所有的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最后做出的决定，与其说是处理实际问题而产生的结果，不如说是与会者精疲力竭的结果。因此，就减少达成一致所真正需要的时间而言，在准备提议的咨询委员会中的初步讨论，和来自经理人员的法律和技术方面的忠告，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2. **违反组织原则 3、4 和 5**。既没有清楚地认识到立法工作和行政工作之间的区分，也没有指明责任。由于管理是经理们做的事情，而自我管理乍看上去是管理的工作，所以自然地存在着干预企业的日常行政管理这样一种倾向。这种倾向使总经理处于一种微妙的位置上，他可以好几种不同的方式对此做出反应：

a. 某一消极的和不称职的经理可以通过让工人委员会承担所有的风险而非常容易地逃避责任。

b. 某一蛊惑人心的政客会通过旗帜鲜明地表示永远和无

条件的服从来营造自己的地位，而不管不正确的决策会造成多么大的损失。

c. 某一操纵者会通过让工人委员会对琐碎的事情和那些需要委员会成员并不掌握的技术能力才能解决的问题做决策，既可以使后者成为他自己决策的橡皮图章，也可以避免任何个人的责任。

d. 某一真正投人的和有能力的经理可能被指责为篡夺了自我管理的权利。有了几次这样的失望的经历之后，情绪沮丧的经理可能逐渐变成上述三种类型人的其中之一。

与此有关的是，可以把所有的决策划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战略性决策、战术性决策、技术性决策和常规性决策。自我管理主要与战略性决策有关；战术性决策主要应由执行委员会来处理；专业技术性工作和日常行政管理应该让有关人员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用常规的方法来解决。不能将这四种不同类型的决策加以区分，将导致组织的混乱。

事实上，决策的问题是更复杂的。在自我管理的早期阶段，曾经有这样一种倾向，即特别强调制定决策时的集中，这好像是权力和权威的明显的标志。然而，决策至少有 5 个阶段，决策的制定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阶段。如果其他四个阶段没有得到控制，纯粹的决策本身与权力毫无关系，并且可能对效率产生副作用。把伊万·帕基（Ivan Paj）[1] 的方法做稍微的修改之后，我们可以用表 10 来描述战略决策的参与过程。

---

[1] "Uloga kolegijalnih izvr? nih organa u procesu samoupravnog odlu č ivajia", *Ekonomski pregled*, 1971, pp511 – 31, espec. P. 520.

表 10

战略决策的制定过程								
决策参加人 / 决策阶段	劳动共同体	劳动单位	工人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	总经理	专业人员	咨询委员会	个人成员
	1	2	3	4	5	6	7	8
I. 动议（确定问题）	×	×	×	×	×	×	×	×
II. 决策的准备（说明变量）				×	×	×	×	×
III. 决策的制定（选择变量）	×	×	×					
IV. 决策的执行				×	×	×		×
V. 执行的控制（和可能的修改）	×	×	×	×	×	×	×	×

有 5 个决策阶段和 8 个决策参加人。在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决策阶段，每一个人都参与决策。第三个阶段是为作为立法者的自我管理机构保留的。如果决策的矩阵函数中仅剩下 25 个要素，那么，他们将正确地——即民主地和有效地——行使他们的权力。第四个阶段特别地反映了组织原则 4 的要求，该原则表明，执行的工作仅仅与专业能力有关。

3. **对控制的误解**。它与第二个问题密切相关。自我管理自然地意味着对所有的管理工作的控制。然而，一个天真的想法是，只有通过直接参与所有的决策，包括行政的、专业的和日常的决策，才能更有效地进行控制。[①] 这也将导致在上述问

① 南斯拉夫在 1973 年以后的立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这种误解的基础上的。

题2所提到的干预。把技术性和日常的决策当作战略性的决策，和反对给执行委员会以酌情处置事情的权力，会导致下述的结果：

a. 因为经理不能迅速地反应经营条件的改变，致使企业在较低的效率水平上运行。为了预期的目的事先得到批准，经理们首先必须要求召开一个会议。由于工人委员会的成员是生产工人，他们不能在任何时间内被随意地召来开会，所以，决策将会被推迟，而在此时间内，条件可能已经改变了，计划变得没有意义了。如果不想耽搁决策，经理的行动就是不合法的，这将打击经理们的积极性，并使整个体制受到侵蚀。

b. 那种认为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控制企业的想法是非常荒谬的。将经理从劳动共同体其他成员区分开来的，既不是前者更聪明（任何人都可能更聪明些），又不是他们受到过更好的教育（研究人员受教育的程度更高），也不是他们有很高的地位（选举的官员的地位更高），而是他们对此种工作非常熟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时也许是因为他们对此种工作有特殊的天才。因此，受教育的程度并不能代替能正确地领悟信息的经验程度，而且那种信息也不可能在一接到通知就开会时得到领悟。一句话，经理的工作（战术的、技术的和日常的决策）是专业性的工作，并应该被当作是专业性工作来对待。外行的做法对任何人都是无益的，并且对所有的人都会产生非常大的伤害。

c. 由于a和b，控制不仅不能实现，反而很容易逃避控制，并且使它变成橡皮图章。可以用下述方法实现**有效率的控制**：

①通过对经营业绩的总体评估。如果企业经营得很好，那

就说明管理可能是好的；如果经营得很不好，管理人员就必须给予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②通过比较政策的决策和执行的情况。换言之，对特殊的结果进行评估。

③通过处理不满情绪。

4. 直接违反组织原则 3。即决策和责任的不对称，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每一个人都热衷于做出决定，但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我是通过研究我自己所属的委员会的行为而了解到这一事实的。我所在的委员会是由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组成的。有好几次，委员会试图强制作为经理的我执行（或不执行）某种确定的行为，而我确切地知道这些行为会对研究所造成伤害。在我没能说服委员会接受我的建议之后，我提出了执行这个多数人决定的前提条件，即由委员会承担责任和预先把这个条件在劳动共同体中公布。我认为，这是公平的协议，所以，当我得知我的提议触犯众怒时，我感到非常地不可思议。我被告知，委员会可以做任何它想要做的决定，无论如何经理必须执行这些决定，而后果由经理自负。我随之提出辞呈，却被认为是欺诈。由于这并不是孤立的插曲①，因此，我得出结论认为，遗传下来的独裁主义的思想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它不自觉地在出现在自我管理中。委员会执掌权力。无论是谁掌权，谁就会发号施令。不管命令是否有意义，它们必须得以执行。任何对这些决策持否定态度的企图，都被认为是对工人委

---

① 另一次，我认为委员会的一项决策是没有意义的。而我被告知，委员会不可能做出没有意义的决策，委员会代表的是共同体的意志，经理不能评价委员会做出的决策。还有一次，委员会拒绝接受在工作组织和其成员个人之间签订一个合同。这个例子可以不言而喻地说明了，一个成员与工作组织有确定的责任，但反过来却不是这样。在处理与其各个个人的关系上，委员会是不受契约的条款的约束的。个人和集体之间不能有对等的权利，前者必须从属于后者 [illegible]

员会权威的挑战，这是不能容忍的。一个好的仲裁委员会对解决这类问题是有帮助的。当然了，关于自我管理的经常的和科学的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

5. 朝令夕改或不一致的决策。这个问题与问题 4 密切相关。当自我管理处在决策的第三个阶段时，但决策没有准备好，那么，决策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支配着与会人员的情绪。在下一次会议上，如果换上了其他的成员，或者不管出自什么原因，态度改变了，那么，上一次的决议就可能被推翻。由于工人委员会在问题 4 描述的意义上是企业的主宰，朝令夕改的情况并不被认为是不合适的。有一次，委员会把一套未完工的公寓分配给在分房名单中排在第一位的某个人。不久之后，这个人应征入伍，而排在其后的另一个人也申请要这套公寓。现在，委员会把这套公寓分给第二个人。当公寓建成后，第一个人回来了。经理（被动型的）无辜地通知委员会，他不能把同一个公寓同时分配给两个不同的人。这个故事的结果很容易想象出来。另一个例子说明了因拒绝承担责任或受自己决策束缚而导致的委员会的不一致。我至今想起来仍然目瞪口呆。在研究所里，有一个遭受亏损的计算机中心。我们决定，引入一种激励机制，使中心的成员与以前相比，能分享正的和负的不同经营效果。结果没有出现多大的改进，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刺激的程度都是非常轻微的。然而，中心的新经理结果变成了特别能干的人，并且在每年讨论经营业绩的时间，中心吹嘘它的显著成就。委员会不是充分地认识到究竟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成就，而是宣布激励计划不可行，废黜了一年前自己的决定，并以武断的方式分配剩余。要求委员会对每个人必须履行合同的呼声，并没有制止这个灾难性的决定。我们不知

道他们在激励计划的刺激下能够做得更好，但让他们比其他人挣得更多，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在推行了几个类似的决定之后，中心重新陷入亏损之中，不确定和不安全的感觉遍布于整个劳动共同体。

6. **对公正的误会和对团结的误解**。如果经理是至高无上的，他们显然可能行为不端，并对个体工人造成伤害。由此认识到，需要有一个处理不满情绪的适当的程序。然而，如果由工人进行统治，那么，这种需要并不是明显的。如果某人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他会向工人委员会上诉，他的委屈会由于他的同事的抚慰得以减轻。这种态度说明了这样一种倾向，即让工人委员会处理一切，而忽视了解决冲突的制度化建设。结果是，用武断的方式来处理不满情绪——它通常被列人精疲力竭的委员会的长长的议事日程的最后一项，很少发言的、更柔顺的、更不引人注意的和更软弱无力的工人的冤情很可能得不到伸张。委员会的公正性显得令人非常失望。怨恨的工人们由此而转向工会，转向正式的法庭，或罢工——这些当然摧毁了自我管理的真正本质。然而，不仅仅是对个人的伤害行为仍然没有得到纠正，而且对集体利益的侵害行为也没有受到惩罚。这可以称之为“对团结的误解”。除非法庭宣判有罪，否则对铁路交通事故负有直接责任的车站职员是不会被解雇的；因盗窃公款而入过狱的出纳仍然再次干以前的工作，犯过重罪的经理再次当经理。

7. **完全分离政治工作和行政工作的不可能性**。教育意味着权力，信息也意味着权力。由于经理比工人受过更好的教育（就当前而言），和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企业情况的信息，因此，他们比其他任何团体掌握更多的权力。这种权力可以而且

经常地被滥用。那种试图通过参与行政决策来对经理进行控制的天真想法是如何导致相反的结果，在上面的分析中已做了说明。如何对付这种问题？经验研究揭示了某些与预期并不一致的有意思的事实。行使权力的是总经理和部门经理。他们的牺牲品是在小的劳动组织工作的工人和在大的劳动组织工作的专家。霸权帮派对工人和专家的敌视暴露了他们职业上的低劣性。是的，社会学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经理集团不倾向于和其他集团进行合作，不准备接受批评的意见，对正确的信息不感兴趣，并且对等级上的区别更敏感。一句话，能力越差的经理，就越可能是专制的和好斗的经理。他必须组成一个统治的帮派，因为这是他保持权力的惟一方法。并且，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政治的标准在经理的选拔上起更重要的作用，那些不称职的经理们就会倾向于和企业外部的权力中心结成政治联盟，这既窒息了工人管理，又窒息了效率。人事政策上的专制被发现是与劳动组织的发育不良高度相关的。我们再一次得出结论认为，管理人员的专业化是成功管理的先决条件。成功管理的另一个先决条件是，有一个充分发育的和稳定的组织结构。

8. **因分权而产生了分崩离析**。按照第一个组织原则，经济单位是基本的组织单位。如果一个企业被视为由经济单位联邦而成的，那么，该企业的内部组织就可能是相当复杂的，需要经验和专业化的知识才能使操作顺利进行。在资本主义的企业中，也实行了分权化，并且有研究其不同方面的大量的专门文献，相关的知识是存在的，而且可以利用。但这不能使问题的复杂程度减少，而且资本主义的文献是很成问题的。对这一问题的自然的和外行的反应是，让经济单位实行经济自治。如

果劳动单位是自治的话，它们必须在财务上是独立的；而只有当经济单位有自己的账号，和以市场价格向其他单位出售其服务时，它们才能做到这一点（当然，主要机关是联合财务的，在企业的水平上，存在着某些联合基金）。结果会造成经济单位像分离的企业那样行事。由于，事情的本质决定了，某些单位不能像独立的企业那样来运作（如会计部门和专门的修理车间），那些可以这样来运做的部门（它生产可以在市场上出售的最终产品）处在特权的地位上，并且开始利用它们的有利条件。企业分解成为争吵不休的各个独立的部门。如果保留企业的统一性，分权结果会变成一种装饰物。[1] 这里的错误是明显的。企业之所以叫做企业，就是因为它的内部组织是建立在非市场原则的基础上的。市场在企业的大门边止步了；如果它进入到企业的内部，企业便瓦解了。一个经济单位的自我管理的自治，可以通过合适的预算约束得以保留；但这同样需要适当的专业知识。

9. **冲突的加剧**。问题8描述的离心力可以提高冲突的频率。这正是南斯拉夫在建立所谓联合劳动的基本组织的糟糕的制度改革之后实际发生的情况。一项对南斯拉夫企业和英国企业做国际比较研究的成果表明，发生在南斯拉夫企业里的冲突是英国企业里的3倍。[2] 是的，即使是在设计得很好的自我管

---

① 朱帕诺夫（Jozo županov）在描述1974年南斯拉夫的情景时这样写道："那种认为经济单位应该是有能力挣得和分配自己的收入的完全自治单位的观点……在社会学的建议中盛行着……尽可能低水平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成为构建基本组织的积木……在大多数企业中，管理层事实上成功地保留了集权组织。"（"The Self – Management Work Organization—The Ideal and Reality in the Light of an Organizational Theory", mimeographed.）

② V. Rus et al., "Participative Decision – Making under Conditions of Uncertain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rticipation, Paris, 1977, mimeographed.

理的组织中，指望冲突将会消失是不切实际的，相反的情况倒更有可能发生。正像上述引用的研究成果的作者所假设的那样，权力分配得越平等，就越有可能发生冲突；而当两个集团之间的权力距离拉大时，冲突反而减少。这个假设通过发现这样的事实而得到了证实，即在英国的企业中，卷人冲突的主要是那些处在相同等级水平上的集团，而在南斯拉夫企业中，是那些在等级上非常接近的团体。一般而论，权力分配越平等，不确定性就越大，组织就越容易遭受冲突折磨之苦。由实行民主化而出现的不确定性可以产生一体化效应或分裂效应。在前者的情况下，更多次的冲突会产生更大的灵活性、更敏捷的反应性和更快地使冲突具体化，这些都会导致效率的改进。在后者的情况下，无论是内部关系，还是效率，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自我管理的组织对冲突的反应是很敏感的。因此，对有效的决策来说，一种合适的解决冲突的组织设计和方法显得极为重要。

10. **个人和集体为各自的私利而滥用民主程序**。即使所有的 6 个组织原则都能得到贯彻，而且组织结构设计得很完美，自我管理仍然可能运转得不好。虽然形式上有许多成文法规和法令、规则和详细的规定，个人和集体仍然可能滥用决策的规则，从而扼杀了民主的本质。任何熟悉工人委员会工作的人都完全知道这一点。下述的内容是我自己对一个由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组成的自我管理组织进行多年的经验观察的一个简要的和系统的总结，这一描述不是没有遗漏的，但它可以使我们理解这种行为会产生怎样的破坏性。

a. 某一个人或团体提出一项令人不愉快的动议，反对者想封杀这项动议。最简单的和最原始的方法是，不让这一提议

列入议事日程。为此提出的种种借口是：忘记了，放错文件夹了，还需要向其他团体咨询了，等等。

b. 如果该提议被列入议事日程中，那么，由于必需的信息资料出了问题，而不能列入讨论的重点。没有合适的信息，委员会将拒绝对它进行讨论。

c. 该提议被放到长长的议事清单中的最后一项。到了要讨论该提议时，每一个人都精疲力竭，或者休会，或者由于达不到法定人数只好推迟到下次会议再议。同样的技巧也可以用于使希望的决策获得通过。当精疲力竭时，潜在的反对者可能已经离开了，留下来的帮派成员可以更容易地施加压力，使一项赞同的提议获得通过。

d. 如果前三个设置的障碍被克服了，帮派成员还可以用其他方法干扰决策。所有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几个人提出完全没有意义的问题，以制造混乱。结果是，或者使通过的决议毫无意义，或者对问题的讨论被进一步推迟。当准备通过一项新的法令时，责任委员会有义务回答所有的建议和批评。为了使这一法令无效，也可以运行同样的诡计。

e. 决议虽然得以通过，但却没有记录在案，或者表述得含糊不清。

f. 如果没有其他的策略，执行官员也可以简单地拒绝执行这个决议。为了对付这种情况，就必须查找会议记录，和在公开场合批评那些不执行决议的个人或团体，但很少有人愿意这样做。

g. 一个更微妙的办法是，等待片刻，然后以“我们还不情楚应该怎样执行这个决议”为借口，把问题推给委员会，让其重新考虑。因为委员会可能有新人出现，态度改变了，所

以，新的决议可能稍微有所不同。这就为进一步制造混乱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如果可能，可以把重新审议的时间订在恰巧使最初提议者不能出席会议（他生病了，或外出了）。

h. 一个众所周知的诡计是，强调这个问题是如此重要，为此需要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进行特别研究。到了该委员会成立和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时，它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

i. 如果存在几个自治团体，执行官员可以使这个问题在它们中间兜圈子，假装不知道应该由谁来负责处理此事。由此而出现的混乱足以使该提议搁浅。也可以用同样的诡计使一项不受欢迎的提议获得通过：即向不同的权力部门提出同样的问题，直至它们其中的一个表示同意。当然了，必须小心翼翼，从最低的权力部门开始，逐级上报。

j. 如果规定了做某事的最后期限，可以使问题、提议和法令的讨论放到最后一天，这样不可能做重大的修改。

对一个不民主的和谋求权力的人来说，有许多的可乘之机。决策机构越多（主席、理事、委员会、全体大会），规章制度越多（相同的案例有28种规定），自我管理的权力滥用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法令、规章制度和规则准备得十分草率，为了使它们协调一致，就必须经常地做修改。人们很快地迷失在一大堆文件中。那些从事执行工作的人，那些其工作是出席所有的会议的人，比劳动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处在一个更有利的地位上。他们不仅掌握更多的信息，而且可以操纵决策过程，直至使那些不利的决策搁浅，而使那些有利的获得通过。当文件堆积成山时，就需要知道：做出了什么决策？什么时候和由谁来做出这些决策的？因此，简单化和很好的制度化的控制，对组织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解决办法是发展自我管

理的文化，而这种文化的形成需要时间、教育和积极的参与。①

11. **无效率和国家主义的危险**。如果经理们形成了帮派，不公正的行为得不到纠正，会议无止无休，那么，工人管理将不再是诗情画意般的。异化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进一步加强，人类关系明显恶化，效率将会下降，自我管理的信念将会动摇。工人们将自然地转向政府。代替由他们自己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工人们将请求政府的干预。这为国家主义的出现提供了社会群众的基础。不成功的社会主义堕落成为国家主义。

我们现在可以对关于生产者平等的讨论进行总结。很清楚，工人管理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产生了它自己的非同小可的问题。如果不是用极大的小心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将会冒着出现国家主义的极大风险。

自我管理是一种激进的新的社会组织。不能在一夜之间改变那些在其他制度下长大并对该种制度习以为常的人们。特别是，他们并不习惯于客观地评价其他人的观点，和并不准备容忍那些不是由他们自己而是由其他人进行的选择。从这里便产生了我们在上面讨论过的种种组织的错误行为。但是，即使组织在大体上是合适的，它仍然不可能正常地运转。并非每一件事情都是可以管制的。事实上，过分的管制和错误的管制一样，都有负面效应。需要的是大量的实践和社会的改变。只有当合适的习惯和传统形成之后，才能指望这种组织能有效地运转。想一想这样一个事实是很有帮助的，即早期的资本主义用

① 对培育这种文化的一个可能的贡献是：研究其不正之风，并把它们公之于众。自我管理的手册，不仅应包括那些建设性的规则，而且还应该系统地讨论这些规则的所有可能的滥用。

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摆脱了在劳动关系中的体罚和警察干预这类野蛮的行为。一旦第一代人通过了从幼稚园阶段开始自我管理的经历，社会将会更好地解决到目前为止在社会实践中暴露出来的11个问题。

目前的分析也指明了加速工人管理发展的若干因素，它们是：

a. 长期的工业传统。熟练工人比非熟练工人显示出对自我管理的更明显的积极态度。工业工人认为按劳动和专业能力进行分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b. 长期的政治民主传统。由于自我管理是一种政治的过程，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相关性是非常明显的。

条件a和b可以被这样一个真正的社会革命所代替（我不知道是全部地或仅仅是部分地），这个革命提高了社会的抱负水平，和为事业而牺牲的积极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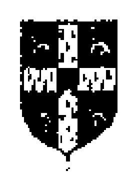
c. 使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高工资。由于生存的不确定性减少了，人们并非如此的贪婪，而更愿意与他人相处。竞争更容易地被合作所代替。

d）周工作日缩短，这为参与活动提供了充足的自由时间。

e. 较高的教育水平，这会减少沟通时的障碍。

很清楚，这5个因素，合在一起，意味着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这当然就是老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即越发达的国家就越容易接受社会主义。但是，社会的发展不是宿命论式的，潜在的因素可能得到利用，也可能得不到利用。这就是为什么工人管理不需要（也没有）首先在发达国家出现的原因。另一方面，如果出自某种原因，出现了工人管理，那么，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很可能使其窒息。

最后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真正的工人管理的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是非常可怕的。但这不是使人失望的理由。相反，如果我们对一个更为人道的社会制度感兴趣——这正是社会主义被期望的那样，那么，工人的管理就是社会变迁的最有力的工具。它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有意义的政治民主提供了日常训练的基地。



第9章

消费者平等

第一节 按劳分配

从普鲁东的时代以来，特别是自从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权威性地重新阐述了普鲁东主义的格言① 以来，按劳分配已被普遍地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它的真正的含义是指按照劳动的产品来进行分配。公正的交换很自然地要求使每一个人从社会所得到的，恰恰就是他或她贡献给社会的(更精确地，是生产贡献的一部分，因为存在着必须共同承担的社会成本)。这个原则被认为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它经常

① 这个格言是为了反对路易·布朗的按需分配的公式而提出的。普鲁东认为，这个公式是不现实的。实际上，第一个使用按劳分配术语的是圣西门的门徒巴札德（Bazard），他在《说明》（1830 年）一书中这样写道："在这里，所有的个人都是按照他们的能力来分类，和按照他们的劳动获得报酬。"

被用来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定义。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原则没有得到严格的分析。有一大堆关于按劳分配的话，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分析告诉我们，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事实上，个人劳动的结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社会决定的。似乎是建立这样一种标准是非常困难的，这一标准能够使我们把纠缠在一起的生产力中的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开来，而仅仅对前者支付报酬。为了确实做到这一点，我建议按下面的方法进行。

在一般情况下，某一商品的产量取决于两组因素，它们分别可以用劳动因素和非劳动因素来命名。我们希望对劳动支付报酬，但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还必须识别后者。而且为了配置资源的目的，我们也必须对后者支付“报酬”。评价一种要素在总产量中的重要性，意味着对那个要素加上一个价值的比重。因此，要完成按劳分配的任务，需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建立一个价格形成理论。对我们的目的而言，一个初步的和概略的价格理论就足够了。

产品中的劳动组成部分是由两个独立的因素组成的：①个人劳动；②集体劳动。这两种因素也可以被称作：①直接劳动；②企业家才能。前者需要个人的回报，后者需要集体回报。

个人劳动或直接劳动在有关文献中得到了很好的描述，因而无需做详细的说明。个人劳动的结果由两个不同的因素决定：①劳动的强度和长度；②劳动技能。劳动技能部分地依赖于天生的才能，部分地依赖于学习；而学习又是学习的努力程度和教育机会对工人开放的结果。如果，为了避免 reductio ad

infinitum〈无限还原〉，我们忽视了这个事实，即抱负水平、价值模式等是由家庭背景及当时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从而由是社会决定的，那么，我们可以识别直接劳动中的三个不同的部分。一个人对劳动的强度、劳动的长度和学习的努力程度负有完全的责任。天才是外在的自然界的赐予物，而不同的受教育的机会是由社会决定的；因此，严格地说，按劳分配的原则仅仅对于第一个因素是适用的。天才需要特殊地对待，受教育的机会对每个人都应该是平等的。

在资本主义或国家主义的企业中，企业家是所有者或他的代表。在劳动者管理的企业中，社会是所有者，而所有的劳动者都是社会的代表。他们是作为**集体的企业家**而出现的。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企业家才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不能在隔绝的状态下进行工作，工作必须集体地组织起来才能进行。企业家才能包括三种不同的成份：

1. 首先，工人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在他们的企业中建立其工作关系。他们可能吵架，也可能合作。工作的气氛可能有利于或不利于生产的努力。企业中的人类团体可能联合，也可能瓦解。集体的精神活力和物资活力，可能展现在努力生产之中，也可能浪费在相互指责和处理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冲突上。经验表明，劳动生产力是存在于某一集体中的人际关系的非常敏感的函数。

2. 第二个成份更具有技术性质。企业家才能意味着协调所有的活动。协调必须在好几个层次上进行：从经济单位开始，一直到企业的总体水平为止。协调需要技术协同、控制和监督。

3. 第三个成份涉及到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决策，包括创

新。劳动集体对做出的决策承担责任。一旦成功，每一个人将分享剩余；万一失败，每一个人将遭受他所承担的那部分损失。企业经营决策的基本内容是进行经常的川流不息的创新经济增长意味着生产力的持续提高，这正是创新的含义。那些没有进行创新的人们将会看到，他们的工资单上的薪水低于一般的水平。如果创新严重失败，例如，产品的质量不符合消费者的要求，那么，劳动集体将会出现亏损，工资额绝对地缩小；在生产力高度增长的相反情况下，个人收入将比全国水平提高得更快。

因此，企业家才能是由**人际关系**、**劳动组织**和**劳动集体**的**创造力**决定的。这样，每一个具体的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反映他自己的个人贡献（工资）；另一部分是他的企业集体努力的结果（分享剩余，或由创新活动而产生的利润）。企业保留着利润的未分配的部分，并用于投资。

我们可以总结如下：工资加分配的利润等于个人的收入，个人收入加未分配的利润等于劳动的收入。决定劳动收入的实际程序是，确定总收入并扣除其中的非劳动收入部分。

非劳动收入是由各种不同类型的租所组成的。当然，最清楚的是地租。从技术上讲，地租可以按照土地清册的收入被税收所抽取，后者是建立在土地的性质和平均的生产条件的基础上的。当土地的级差收入被税收抽取之后，剩下的部分就是劳动和创新活动的结果，它保留在农民或农民集体手中。

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城市租**。通过研究某一具体位置的供求关系，不难确定土地的均衡价格，或土地在每一单位时间内的服务价格。强制推行一种合适的税率，会使该租金被抽走。

对于如何通过一种合适的采掘税制来抽取**矿山租**，已经有

相当长的实践经验了。

资本的收入，或**利息**，是一种很特别的租金种类。由于资本是稀缺的，并为社会所拥有，劳动集体必须对使用资本的特权支付价格。在一种教科书式的理想状态下，投资的边际效率在整个经济中趋于一致，而均衡的利率将被确定到使投资的需求等于可利用的投资资金的供给。这种投资来源于外部的借贷资金，利息是指偿还贷款的年支付。这就是某些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在劳动管理的经济中，所有的投资都必须从外部获得资金来源。[①] 但是，并不真正需要这样做，事实上，它将是很危险的，因为它使劳动集体的自治程度减少，并加强了资金机构和政府机关的权力。所有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对使用外部资金的投资索取相同的利率，然而，这些索取的利息也可以保留在企业的投资资金中。

上面讨论的各种类型的租金，都是众所周知的，并且有大量关于它们的文献。然而，有一种类型的租，在文献中没有涉及到。我把它称作**“技术租”**。应该指出，它不是指由某一特殊的创新活动而产生的租，这类租已为大家所熟悉。准确地说，这一术语代表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任何时间内，客观的创新的机会从一个产业部门到另一个产业部门是非常不同的。在最近的二十年中，纺织行业的生产力提高得很慢，而电子行业的生产力却提高得很快。纺织工人对改变这种趋势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如果把生产力的提高作为按劳分配的标准——就像南斯拉夫的工会所提倡的那样，那么，纺织工人的工资将提高得很慢，而电子工人的工资却提高得很快；收入分配在这两

---

① 参见瓦内克（Jaroslav Vanek）教授的各种理论著作和实际建议。我在我的第一本关于自治经济理论的著作中，也曾持有相同的观点。

种情况下都与实际完成的劳动无关。为了按劳分配，技术租必须为税收所抽取。在技术上，是不难做到这一点的。由于使生产力出现差别的基本条件改变得很慢，可以根据过去的趋势，推断今后几年的未来发展。在此基础之上，再加上根据相对价格加以修正，我们可以估算税率。实际上，基本的原则与对级差地租征税是一样的。

早期的理论文献之所以没有讨论技术租的原因，源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要素的完全流动和即时调整的不现实的假设。在这一假设下，在逻辑上，技术租不可能出现。只要某一产业的相对盈利性提高，劳动和资本将会拥入该产业，从而使该产业产品的价格下跌。与此同时，其他产业的供给也将减少。因此，只要价格具有稍微的向下运动的粘性，投资的提高将加速技术的进步，这将导致提高生产力之间的更大的差距。作为其结果，技术租在若干年间始终存在。

当所有提到的租金被消灭以后，仍然会留下某些非劳动收入。无论出自何种原因，一个企业的卖方垄断或买方垄断地位可能产生额外的垄断租。垄断租具有很大的挥发性，而且不像其他租金那样，它不能客观地决定。垄断租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例如意外的损失）。吸取垄断租的惟一工具是一种全面的累进税。这是一种非常粗糙的工具，因为在某些企业中，它不能完全消灭垄断租；而在另一些企业中，它可能影响到劳动收入。但是，由于下述原因，这些歪曲的反映很可能在数量上没有意义。

1. 因为强烈的分权力量，因为企业经营活动的更大的公开性，劳动者管理的企业比它的资本主义同类具有更少的垄断倾向。

2. 正像以后将要分析的那样，一个产业的垄断力量可以受到控制，因此，可以消灭垄断租。一个真实的情况是，个别企业试图逃避控制；但另一个情况也是真实的，即它们不可能永远是垄断者。意外的收获和损失是以随机的方式碰到企业的，因此，一种平均的趋势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出现。如果每一个企业在相应时期的某些特定时间内都是小小的垄断者，没有企业会站出来反对的。

3. 社会计划提高了市场的稳定性，并最终减少了意外的收获和损失。

4. 由于资本是社会所有的，没有必要对未分配的利润征税。因此，一个有效率的劳动集体可以避免因把剩余用于投资而不是用于工资而招致的累进税制的惩罚。

一个幸运的集体也许把未分配的剩余用作储备基金的形式，对此做出相同的反应，这种基金可以帮助该集体弥补未来某时可能出现的意外的损失。

5. 垄断或剩余租金是和承担的风险密切相关的，而后者在社会主义中受到社会的限制。虽然不能精确地测量意外的收获，但正常的数值是大致知道的，并且有许多强大的和非正式的社会力量限制着个人收人的过分提高。较低的收入也同样不能容忍。一个招致严重亏损的企业，或者将被清算，它的工人在其他地方重新就业；或者将得到帮助。同时，收入不能落在保证的最低收人之下。但劳动集体必须对管理社会资本的失败支付代价，这种代价包括自我管理的暂时终止。在完全确定的教科书的世界里，垄断租金不可能出现。在现实世界中，它在任何时候都存在。但在一个合理地组织起来的自我管理的经济中，它没有重大的意义。

最后一个要强调的观点是，消灭租金并不意味着必须把它们全部从企业那里抽取出来，而只是意味着它们不能被当作个人收入加以分配。事实上，把它们，如利息、技术租和矿山租，留在企业里，对刺激技术进步和满足大项目的投资，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节 劳动收入的决定

可以用两个步骤来解决劳动收入的决定问题。首先，我们必须决定整个劳动集体的劳动收入；然后决定这个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劳动收入。

为完成第一个任务，将按照技术—经济上同类的产业划分经济，每一个产业包括20或更多的工厂。工厂的数目不能太少，否则谈不上统计的规律性。如果在某一特定的产业里，只有一个或两个工厂，收入分配决定问题的解决就变得更复杂些。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商业团体或工会对每一个个别的案例进行谈判，是必需的。

在每一个产业内，各个企业在非常不同的效率水平上运行。效率的变化反映到劳动收入的变化。在正常情况下，这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不同的效率是由不同的企业家才能造成的，而我们的分配原则要求对企业家的劳动支付报酬。

虽然不同产业的总劳动收入不是必须要求改变，但是实际上不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电子产业中所有的劳动集体比纺织产业中所有的劳动集体工作得更努力或更有效率。为统计的缘故，以正常的熟练程度所衡量的平均的劳动收入，在所有的产业中，必须大致平等。可能的差别应该采取一个合适的政

策加以消除，这种政策通过各种类型的税收来消灭租金，或通过对投资和外贸的调节而影响到投入和产出的价格。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市场必须受到严格的管制。但是这种管制不是专断的，不能让反复无常的当今政府行使管制权力。管制应该是在整个经济中建立平等的贸易条件，和一种清楚明了的和宪章化的保证原则。因此，政府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的必要组成部分，或者更正确些说，市场成为自觉的社会计划的工具。每一个企业仍然保留完全的自治——这当然是自我管理的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劳动者管理的经济比资本主义经济更接近于教科书中的完全竞争模式，但是劳动集体在所有的时间仍然在可接受的社会主义的框架内。很清楚，社会计划胜过价格计划。社会计划中还存在着可以使市场转变为计划工具的一系列其他因素，但就目前的任务而言，我们不需要对这一重要的问题做更详细的说明。

一旦收入在集体之间分配之后，它继续在集体之内分配。首先，收入的一部分为了投资和各种集体消费的目的保留下来。自我管理的机构对此做出决定。剩下的部分，也是大部分收入，在各个工人中间进行分配。用什么标准来分配？

可以用两个方面来区分劳动：劳动创造产品和劳动招致成本。[1] 更有生产力的劳动是更有价值的。更困难、更有责任、更危险、更不愉快、更不健康和更复杂的劳动，需要长期的训练和学习成本，所以也是更有价值的。究竟有多大的价值取决于对他的劳动量的估价和他的工人同伴对他的评价，当然，也

---

[1] 市场的估价把这两个方面并为一个单一的生产率标准，那就是产品的买和卖。如果工资成本提高，产品的价格也将提高，需求会下降。如果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斜率不是反常的话，那么，将在一种较高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之上形成一个新的均衡。

受一般的供求关系、传统和更大的劳动团体的影响。但是，决定实际工资差别的是具有独立自主权的劳动集体。它是商议、谈判和互相说服过程的结果。在正常条件下，它是一个反复和集中的过程。作为一种规律，在开始阶段，人们认为他们的劳动更重要或更困难，因而比他们同事的工作更有价值。到了结束阶段，达成了某些协议，并被记录在企业的法令中。

集中过程的原因是非常简单的。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与收人分配的公平性有利害关系。当人们认为它是公平的时候，它就是“公平的”。一个工人——更通常的是一伙工人——认为他们的工作被低估的，就不会全力以赴地工作，这会减少集体的总收人。如果他们的不公平的感觉非常强烈，提高他们的工资率，这对他们的同事是有利的。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中，提高工资的利益会一直增加到工资增量的边际成本等于收人增量的边际收益为止。在现实中，这一必要条件似乎自动地得到了满足。一个工人的生产行为似乎是不连贯的：他仅仅区分了工资决定的两个领域，即可接受的区域和不可接受的区域。落在可接受范围内的某一点，可能不是最大满意之点，但不会影响该工人的生产行为。因此，在不可接受的区域里——工资率太低，由不满意而产生的破坏性效应，总是大于在必须的可接受水平之下工资率的提高的收益。也许，这可以说明这样一种规律，即保持工资的提高直至达到可接受的领域为止，而这似乎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工人们发现确定的工资差别是可以接受的，但他们认为，他们的工作更有价值些。

也可以从其他方面达到均衡的工资率，即向下扩展可接受范围下限。这是一个社会说服的过程。社会心理学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经验发现是，个人的评价是强有力的社会评价塑造出来

的。当集体认为是公平的，那么，它就是公平。结果，一个较低的和同一的可接受的区域将被建立起来。不仅是边际工人，而且是所有的工人，满足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上述条件。

社会评价的一个普遍效应值得注意，那就是平均主义。劳动者管理企业的收入分配的差距要比资本主义企业的或国家主义企业的收入分配的差距小得多。① 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收入差距正在不断地被缩小。各种类型的体力劳动比以前得到更高的评价。所谓的体力的、单调的、枯燥的和不愉快的劳动，被认为是需要支付额外的成本，结果得到更高的评价。社会关系的改变导致了价值观念的改变。受教育的机会平等化的快速发展，也给平均主义一个额外的推动力。

对某些成员来说，集体决定的工资结构仍然是不可接受的。这种情况总是可能发生的。他们结果选择了自愿离开，并且经常这样做。

虽然劳动集体是自治的，但它们不是与世隔绝的。由于资本归社会所有，每一个工作空缺都必须公开宣布，只有最好的申请者才能得到那份工作。劳动的自由流动，产生了相同的工资差别，这具有重要的配置效果。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是某一劳动的供求一致时的情况。倘若二者不一致，便会出现不均衡，肯定要产生租金。技术进步创造了需要特殊技能的新的工作岗位，使在一定时间内，出现了该种劳动的供给短缺。例如，在一个国家的计算机化的最初阶段，程序工程师是稀缺的。因此，企业将竞相争夺

---

① 在人均1000美元的发展水平上，一个雇佣5 000名工人的企业的非熟练工人和总经理之间的收入差距是1：5，而在相应的资本主义企业中，收入差距至少是其的5倍。

他们，他们的工资将提高到被认为对相同性质的工作来说是合适的水平之上。但必须数目的程序工程师被培养出来之后，他们的工资将下降，直至他们可接受区域的下限。在此之前，程序工程师将享受个人的垄断租金。

相反的情况是某一种类的劳动的过度供给。过剩的工人必须接受再培训，否则将被重新安置到相似的、更不重要的和更没有价值的工作上。他们甚至可能成为失业者。但调整过程持续的时候，过剩工人挣得负的租金。

个人的租金也可能是永久的。特殊才能的科学家、经理、艺术家和运动员是非常稀少的，如果他们按其生产力得到报酬，他们的收入将是高得不能容忍。同时，恰好可以使他们全力以赴地进行工作的可接受的引致收入是相对适中的。在教科书中，总收入将由市场可承受的价格决定，但市场收入与刚好可接受收入之间的差额，将作为个人垄断租金，被税收抽取。在现实中，一个爱因斯坦将得到中等程度的收入，因为没有方法可以测量他的生产贡献的价值，而且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有关系的是，无论从社会方面还是从个人方面来说，要使一个科学家充分发挥他所有的才能成为可能。在娱乐圈里，总收入将会更高些，因为电影制片厂和足球俱乐部是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竞争的。但是，由于公众意见强制规定了一个可以容忍的最高上限，这种收入也不会高到市场能够承担的水平。另一方面，对个人租金的征税不是百分之百的，但是严格的累进式的，并且达到社会可容忍的上限时，向着百分之百的税率前进。

同样也有相反的情况。那些身体上和智力上有残疾的人的生产力低到不足以提供使他们过正常生活所必需的收入。一种

补贴，即负所有税，将被用来填补这个缺口。

第三节 论资源配置效率和最优的收入分配

在劳动供求平衡和不存在个人的垄断租的正常情况下，特殊的社会主义市场解决了个人收入按完成的劳动进行分配的问题。这意味着确定的资源配置的结果。当某一劳动集体在决定工资差别的结构时，工人们对不同种类劳动的生产力有某种标准。但没有人知道如何衡量一个会计、或一个秘书、或一个工头的生产贡献，也没有人知道如何衡量公平工资的组成部分。一旦工资被确定下来，它就成为成本而被加到企业生产的产品的价值中去。这种价值可能恰好和市场需求相一致，也可能与之相背离。如果企业生产的价值低于市场的价值评价，该企业将挣得额外的利润，并扩大产量。如果它高于市场的价格，该企业将必需降低成本，或改变其生产计划。

所有这些在多大程度上能满足资源配置的效率条件？

到目前为止，关于合理地详细阐述资源配置效率的惟一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按照这个理论的教义，如果使用劳动一直到它的边际价值产品等于工资率，该工资率在整个经济中都是一致的，那么，劳动将得到有效率的配置。据说边际相等原则保证了没有可以进一步提高产量的其他配置劳动的方法。如果劳动的边际产品不相等，那么，重新配置劳动，使其从边际产品较低的企业转移到边际产品较高的企业，将会提高总价值产品。因此，不存在一个更有生产力的替代方案，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定义。不难看出，在我们的体制中，理论上很容易满足这一必要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遵循新古典经济学家的

方法，假定工资率在整个经济中相等，只有个人收入中的利润成份随着不同的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但这并没有多大的启示。然而，我们也可以合理地假定，有三种市场力量会对个人收入（工资加分配的利润）的平等趋势产生强有力的推动作用。这三种市场力量是：在产业之间，新企业的加入；在同一产业的企业之间，劳动包括管理者的自由流动；在整个经济的同等熟练程度的工人们之间，从那些低估这一特殊技能的企业和产业大批地离去，拥入到那些高估它的地方去，再加上普遍接受的同工同酬的原则。

在我们继续进行分析之前，让我们看一看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是如何被运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

我们会立即注意到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个内在的矛盾。在一个理论分支中，企业家才能被说成是一种生产要素；而在另一个理论分支中，它被当做与所有其它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完全不同的东西来对待。对所有的生产要素来说，报酬率都等于边际产品的价值；惟独企业家才能例外，它的报酬莫名其妙地来自于某种剩余。然后，把这些搁置脑后，宣布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是，十分清楚的是，在任何时期内，企业家才能的配置都是随机性的，并且对其进行重新配置可能会提高社会总产品。

其次，边际相等原则运用于另一种要素——资本——是循环推论。由于资本的数量不能独立于它所赚取的利润而存在，所以，说资本的边际价值产品等于（或应该等于）利息率（或利润率），没有任何意义。现在，如果两种要素都不是按照其各自的边际生产力定价的，那么，假定第三种要素——劳动——的“正确”定价要比按其它某些原则定价将产生更高的

产量，便没有任何的理论基础。而且，为了使其成为可能，边际相等公式要求一种真正特别的生产函数。只有线性和同质的生产函数才能使要素的报酬的总和等于产品。由于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所有的生产函数应该是线性的和同质的，边际相等将导致剩余或亏损，实际工资——和其它生产要素——将通过讨价还价来确定。这是实际所发生的，也是为什么存在工会的理由。最后，边际相等是（也仅仅能）以价值的形式来表达的，但价值取决于收入的分配。由于新古典理论对最优的收入分配什么也没有说，帕累托精神的效率原则并没有使我们走得很远，新古典理论无须修补地破产了。我们必须寻找评价社会主义的效率的另外的标准。明显要做的事情是，把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加以比较。

以企业家才能为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家才能（虽然形式上有些不同）也是分配得不平等的。但是，在这里，制度框架使社会有可能把企业家才能扩展到帮助效率较差的企业。结果是，通过部分地重新分配企业家才能，社会资本得到了更有效率的使用，这在资本主义下是不可能的。程度较小的垄断导致了额外的改善。

工资的问题稍微复杂些。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有效的竞争使所有的工资都相等；因为企业家追求利润最大化，工资也等于劳动的边际价值产品或边际收益产品，这意味着劳动的边际产品在整个经济中也是相等的。[1] 经验研究揭示了这

---

① 巴里·布鲁斯通〈Barry Bluestone〉指出，在美国的经济中，技术工人的工资差别达到110 %。他还发现，“就我们所说的内生的生产（劳动者内在生产率性质既定下的潜在产量）与边际产品或工资相匹配的观点而言，美国的劳动市场是相当缺乏效率的。许多劳动力看起来不是按照与他们的可衡量的人力资本相匹配的比率得到报酬的。”（“The Determinants of Personal Earnings in the U. S.”, p. 53, mimeographed.）

一假定是荒谬的。不仅从企业到企业之间，而且从产业到产业之间，工资都有实质性的差别。很明显，一个盈利很大的企业的经理为了避免劳动纠纷，付给他的工人较高的工资。在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理论中，我们从企业到企业之间（不是从产业到产业之间）的边际产品和工资的不同开始。在一个无效率的抽象世界里，如果某一工人从边际生产力较低的企业被重新配置到边际生产力较高的企业，即从效率差的企业到效率好的企业，总产品将提高。然而，在资本缺乏可塑性的现实世界里，问题就变得非常不一样了。在均衡的条件下，可以假定，所有的工人都受到雇用，并且所有的企业都在平均成本的最低点上运行。但是，从企业到企业的平均成本是不同的。使一个工人从效率低的企业到效率高的企业，仅仅会稍微提高后者的“净产品”，却会对前者的产量产生破坏性的影响。结果是，总产量将会下降。同样的观点也可以表述如下：当工厂是在其生产能力之下运行时，边际产品大致等于平均产品和工资。而在其生产能力水平之上运行时，边际产品急剧地减少。为了达到一种最佳状态，每一个可生存的企业必须充分地使用可利用的生产能力。

上述的讨论表明，只有我们离开了教科书的抽象世界，就没有资源有效配置问题的完美答案。在企业的水平上——并从企业的观点来看——新古典方案是更适用的。作为一个方便的近似物，一个社会主义也许可以使每一种资源（包括劳动）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产品。在每年开始时决定的希望的工资，将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会计工资。通过把利润视为一种剩余，生产函数的限制将得以减少。然后，工资和边际产品将相等，但在不同的企业里，它们是不相等的。在这方面，社会主义企业

与资本主义企业相似。就企业家才能的配置和垄断的轻微程度来说，社会主义经济要比资本主义经济更有效率。由于工人不仅是劳动者，而且是企业家，社会主义企业和资本主义企业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当一个工人从一个企业转移到另一企业时，因为那个工人具有的企业家才能一起随之带走，两个企业的生产函数不需要保持不变。企业家才能意味着创新，而创新意味着生产函数的改变。由于这种改变是不能被确切地知道的，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当一个工人从工资较低的企业转移到工资较高的企业时，总产量会提高。在宏观经济水平上，我们可以把劳动和企业家才能作为可以产生剩余效应的两种生产要素来对待，而边际相等原则仅仅对非劳动要素适用。资本的成本是由计划当局通过制定合适的利息率外在地决定的。企业使用各种资源（包括劳动在内），直至使其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为止。就劳动而言，边际成本是由希望的工资决定的，后者作为相关时期的会计工资发挥作用。在企业家才能收益递减的假设下，社会应当配置企业家才能一直到企业之间的效率差别缩小。

当出现了能力分配的两极分化时，一个较大的社会必须干预分配的过程。社会将通过引进正的或负的所得税来进行干预。在这里，不是以生产贡献的观点，而是以劳动的努力程度的观点，来解释按劳分配原则的。天才和残疾是偶尔的，与劳动的努力程度无关，因此，应该忽视它们。

让我们进一步研究收入分配最优化的条件。它需要：a）生产的效率（在分配之前，必须生产出产品来）；b）公平的分配。前者以刺激劳动努力最大化为先决条件。由于这种刺激是社会地决定的，所以新古典经济学的著作从来没有讨论过它，

而只是简单地假定其存在。第二个条件被认为是在科学意义上是难以驾驭的，因为它涉及到个人之间的效用的比较，这种比较似乎是不可能的。是的，自由放任的市场（或政府的法令）是不能满足收入分配最优化的条件的；因此，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还是在国家主义制度下，最优的收入分配都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在社会主义经济学里，刺激成份在开始时就得到了充分的讨论。由于工人们：a）是为他们自己而不是为老板而工作的；b）他们亲身参与工资率的决定过程，所以，存在着劳动努力最大化的刺激物。分配的成份需要一个附加的评论。假定 ceteris paribus〈其他情况不变〉，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被普遍接受的假设〉，和消费者在基本感觉上是相似的，那么，使收入分配更平等化但不会对生产力有副作用的任何改变，都将提高社会福利。在可接受收入的区域内，收入将更平等地分配。但在没有达到该区域之前，收入分配的平等化将影响生产力。那些感到没有得到公平的报酬的人们，将减少他们的工作努力，总产量从而下降。形式上，我们可能遇到下述问题：使每一单位的收入增量从生产力较高的社会成员那里转移到生产力较低的社会成员手中，将提高社会福利；但同时，因为不满意，总产量将下降，从而使收入和福利减少。如何确定由于收入再分配而产生的福利增加恰好等于由于总产量下降而导致的福利损失之点？这是福利最大化之点，也是决定最优的收入分配之点。

从一个慈善君主的观点来看——这是福利经济学家在讨论收入分配的可能改善时的一个惯用的假设，不进行个人之间的效用的比较，就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而个人之间的效用的比较

是不可能的。但是，幸运的是，在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中，慈善君主的问题是毫不相干的。在这里，工资的差别（从而收入的分配）是通过一个涉及个人之间直接进行福利比较的程序决定的。一旦某一集体的成员达成了公平的收入分配的协议，就没有其它的可以提高他们的福利的分配方案。实现了公平的分配，意味着对该团体每一个成员的福利的完全充分的评价。如果他们认为还有某种分配方案可能会提高他们的福利，他们就必然会照此办理，那就是最优的收入分配。在一个正常的人类组织里，那种认为不公平会提高福利的观点，是行不通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最优分配问题的解决被证明是可能的，因为演员本人进行个人之间的福利比较和做相关的决策，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市场，还是国家主义的官僚，都不能做到这一点。

第四节　按需分配

对一个生产者来说，平等意味着他在发展他的天生才能方面享有平等的机会。在使用教育和医疗设施方面的差别待遇，致使生产者之间的平等成为一种欺诈。因此，医疗服务和教育应该从交换关系中被豁免出来，并且不是按个人的购买力来进行分配。一般而论，任何对发展个人能力有实质性影响的东西都不能以交换的尺度来分配，而要服从需要的尺度。让我对此做进一步的解释。

全部社会产品可以被分为两个部分：市场产品（或商业产品，或利润动机产品）和非市场产品。后者可以进一步分为：与社会福利内容有关的产品（如教育），和作为社会一般管理

开支的产品（如司法）。市场的产品和劳务的生产可以——而且应当，因为这是最有效率的方法——在交换的基础上组织起来，这意味着按劳分配。非市场产品的生产呼唤不同的组织原则。实际上，在我们未曾识别社会产品的市场部分和非市场部分之前，说的这些都是废话。在社会产品的非市场部分里，我们在这里只对与社会福利内容有关的那部分感兴趣。从对它的消费来说，我将称之为**集体消费**；而保留用**公共消费**这一术语来形容非市场产品中非福利部分的消费。

如果消灭了阶级区分，就必须在劳动的贡献的基础上来进行分配。由于这一缘故。社会主义者强调按劳分配。如果存在着私有的生产性财产，那么，社会收入中的一部分将流到财产所有者手中，这将为资产阶级的出现提供物质基础。如果国家垄断了生产性财产，那么，社会收入中的一部分将流到国家官员手中，分配结构将与等级制结构相一致，并且为官僚阶级的出现提供了物质基础。要建立社会主义，就必须消灭所有的非劳动收入。然而，即便如此，还是不够。如果一个富有的家庭能够为他们的子女买得起更好的教育和健康，社会的所有成员在开始就是不平等的。而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因此，再一次地，个人收入将不由个人努力独自地决定，而是由外在的一些因素如父母的财富和智慧决定。为了这一缘故，对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即使是严格地按劳分配，也是不够的。无论何时，只要是对发展智力和个人能力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就必须辅之以按需分配。一个人有一辆大轿车还是小轿车，这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因为它们都能把他送到他想去的任何地方；如果一个人只受过初等教育，没有上大学的机会，或者，如果他在童年时营养不良，那么，他在一生中都会遭受严重的障碍。我们注

意到，顺便提一下，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的要求，不仅符合社会正义的原则——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它也是与经济效率最大化相一致的一种原则，因为它使社会可利用的才能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下述的活动对个人能力的形成有贡献：

①教育；

②医疗；

③社会福利；

④文化；

⑤身心发展；

⑥环境保护和娱乐。

应当在非市场的基础上组织这6种能力塑造产品的生产，这意味着无论是供给还是需求，都应该按照与市场活动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在这里，我们仅仅考虑需求方面。至于供给方面，我愿意把注意力仅仅放到供应和生产的区别上：一种产品的集体供应并不是指某一公共团体的生产。让我也来制造一个术语：**集体产品**是涉及具有福利内容的那些非市场产品，它的本质特征是，对个人才能发展的有所贡献。存在着至少6个方面的集体产品。**公共产品**是不涉及福利内容而代表社会一般管理费用的那些非市场产品（司法、警察、军队，公共管理）①。

古典经济学家对需求言之甚少。他们谈及的是**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主观地决定的，而他们认为，对主观评价，没有什

① 例如，警察的保护服务是中间产品，而不是最终产品。社会总产品不是由GNP加警察服务组成的。一个鞋厂的产量是指生产了多少双鞋，而不是指后者再加上更夫的服务。保护法律和秩序，是使社会得以生产最终的产品和服务的先决条件，而不是最终产品的附加。

么好说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宣布，即使是使用价值也可以进而做分析。事实上，效用乃是他们研究兴趣的中心所在。各个消费者和他们的偏爱将决定总需求，各个企业和它们的成本将决定总供给，完全竞争的市场将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均衡。我们已经知道，这种过分简单化的做法，距现实所发生的甚远。让我们再一次分析需求。即使在市场部门，需求也是多纬度的；除了个人消费者之外，还有社会，它鼓励或限制（例如对毒品）某种消费。此外，还有专家，他们生产可接受的质量标准（例如，检验药品，检查商品质量，制定全国的标准化）。在非市场领域里，这三位一体的需求空间——包括消费者、专家和社会——是绝对必需的。某些时候，个人消费者的偏好是完全不予以考虑（例如，预防接种），或者被简化成只需回答是和否（当医生建议做一个手术时）。社会决定市场的规模。代替价格作用的是，专家执行某种形式的配给。

像经济学中的其它概念一样，需求具有社会的内容。像个人消费者的需求取决于受收入预算限制的个人偏好一样，集体的需求取决于受社会可利用资源限制的需要（在这两种情况下，需求都随相对价格的变动而改变）。我们可以想象一幅社会偏好图，在这里，个人的消费需求可以与集体的消费需求相比较，并且各种集体消费需求之间也可以相互比较。运用使每一单位的支出所得之效用相等的传统标准，社会把可利用的消费品划分为个人消费和集体消费两个部分。这可以通过一种政治程序来完成，对这一程序，我们知之甚少，并期望从政治学家那里获得启迪（然而，政治学家更愿意让我们等待）。我们甚至对应如何改善这一政治程序知之更少。最后，在各种不同的集体消费之间分配资源的任务，将主要由专家们来承担。

虽然在某种意义上，穷国的集体需要和富国的集体需要是相等的，但显示出来的需要，或由资源支持的需要，即集体消费水平，是有区别的；一般说来，它是发展水平的递增函数。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强制性消费（接种、初等教育）可能占很大的比重。之后，当个人将继续行使自由的选择时（大学教育、博物馆、艺术收藏馆、电影院和运动场），集体消费将扩展到由社会免费（或在补贴的价格下）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集体产品的供应，可能是按某种优先的计划提供的，而不是按边际主义的计算提供。因此（除了相当短的过渡期外），社会的计划，并不是要消灭一半的疟疾或四分之三的天花，或是要实现百分之八十的识字率或百分之一的大学教育率，而是要彻底地扫除传染性疾病和文盲，而不管其它的医疗和教育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这一事实。[①] 因此，似乎存在确定的社会决定标准，容忍较低水平上的消费，是社会注定不能接受的。

我们的结论是：每一个社会将决定——通过某种有效率的或无效率的政治程序——在社会产品中集体消费的份额。Ceteris Paribus〈其它条件不变〉，社会越穷，该份额就越小。但是无论这个份额有多大，集体资助的产品和服务不能使潜在的需求达到饱和。因此，在能力塑造的产品和服务方面，集体消费将辅之以个人资助的消费。在这种情况发生的范围内，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将被违背。除了在教科书中，我们无法防止这种由私人使用集体服务所造成的侵害（较高级的官员或富人将进人较好的医院，和接受较好的治疗；家庭影响不能被消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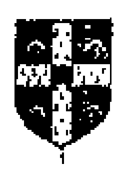
① 我们在个人的消费中观察到同样的现象。在边际效用计算的严格逻辑中，并且在可细分的假设下，只有当所有的欲望同时地得到满足，才会出现饱和；否则它们都不能达到饱和。然而，即使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对某些产品（如糖、食盐、水，等等）的消费，达到了饱和的水平。

腐败和裙带关系出现了，等等）。即使可以用强制防止个人对集体产品的购买行为，那也将破坏了每一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原则。社会福利不能通过减少其成员的选择自由（那些不会产生外部经济负结果的）得以提高。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对非市场产品也有一个受到限制的市场。这个市场受限制的程度将由存在的社会道德规范决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它很可能比在其它当代社会里更狭小得多。当社会越来越富裕时，当社会向社会主义更进一步时，这种不一致的但不可避免的市场将会缩小。因此在一个贫穷的社会里，建设社会主义是非常困难的。

一旦集体消费的数量被决定之后，产品和服务是按照需要分配给每一个人。需要什么，或者由个人自己决定（主要在文化、身心发展和环境娱乐等领域，部分在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等领域）；或者在强制消费的领域和消费者没有能力决定的情况下（如儿童、精神病人、患者），由专家决定；或者当专家的建议必须由个人接受时（外科手术），由两者共同决定。需要的决定总是在既定的社会制度框架内进行的。

总之，按劳分配的原则必须辅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就产品而言，这意味着，纯粹的消费品，作为市场产品将按交换原则进行分配；能力发展产品将在非市场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分配。至于讲到生产贡献，工作原则仅仅对这样的生产者才是完全适用的，这种生产者处在社会认为是规范的、某种确定的能力范围之内。超越此范围，就会起做出正面的和负面的矫正。在第二节中，这种矫正被解释为“生产贡献”标准辅之以“劳动努力”的标准；在本节中，它被解释为劳动标准辅之以需要标准。当运用于残疾人时，这种解释是特别合适的。

消费者平等意味着个人努力决定收入的变化。这是正常的情况，它运用于大多数能力在正常范围内的生产者。那些不具备正常能力的人——由于身体上或智力上的原因——在运用劳动原则之前，首先必须被提高到消费者的起点水平。在精神病患者和完全伤残的特殊情况下，全部的个人收人是由负所得税组成的，劳动原则完全被需要原则所代替。人们可能注意到，所有的社会都会照顾它们的残疾人的。但是，在阶级社会，这叫做慈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它是收人，并且与社会制度的基本前提是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个人的利己主义的基础上的，她也不是建立在利他主义或理想主义的基础上的，这些都是根据和利己主义的关系定义的，因此，不能超越资产阶级的世界。社会主义是简单地建立在内在于未曾异化的人类关系中的社会责任的基础上。



第 10 章

公民平等：分权与权力的非集中化

每一个社会制度都包括几个相互作用的子系统。不同的作者为了不同的目的对这些子系统有不同的定义。马克思把社会生活划分为物质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四个方面。后三个方面属于上层建筑，并由第一个方面即生产方式或经济结构决定。当代最流行的划分——即美国社会学家泰考特·帕尔森〈Talcott Parsons〉的划分——并不是与马克思的划分完全不一样。帕尔森争辩道，所有的社会制度都必须解决四个基本的问题：发展可支配的资源以提高制度适应环境的能力；实现目标；把各个参与者统一到一个较大的体系中去；和面对来自于文化渠道的改变习俗化价值的压力保持价值典范以稳定社会。因此，帕尔森区分了四个主要的社会子系统及相应的组织：适应的子系统（经济）、目标实现的子系统（政治制度）、运用规

范控制的同化子系统（作为规范的法律、政党）和习俗保持的子系统以及相应的制度化（家庭、学校、教堂）。[①] 经济学家肯尼思·鲍尔丁（Kenneth Boulding）曾经谈到了威胁系统（政治学）、交换系统（经济学）和同化系统（感情、爱和其它的情感）。[②] 人们也许补充道，这些系统涉及到三种不同类型的关系：强制的、效用的和规范的关系。人们也可能注意到，规范的关系是所谓的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强制的关系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效用关系是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丹尼尔·贝尔描述了一种由三种领域混合而成的社会：社会结构（由经济、技术和职业系统所组成），政治组织（它调节权力的分配和对个人和团体的冲突的要求进行裁决）和文化（它是关于人类存在的象征主义和意义的领域）。每一个领域都由一个不同的轴原则（axial principle）（被定义为围绕着制度发展的组织框架）支配：经济由功能的合理化原则支配；政治由功能的合法化原则支配；文化由自我需要的满足和提高原则支配。在经济领域，决策在技术专家的合理性的基础上做出；在政治领域，决策在谈判或法律的基础上做出。效用和效率为经济的创新和改变提供了清楚的法则。在文化领域，没有明确的改变原则。[③] 这三种领域，“相互之间是不一致的，具有不同的改变的节奏，它们遵循不同合法性的不同规则，甚至是相反

---

① T. Parsons and N. Smeler, *Economy and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56, pp. 16-19; T. Parsons,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Modern Societies*, Glencoe, III.: Free Press, 1964, pp. 45-47.

② "Toward a Pure Theory of Threat System", in Bell, Edwards, and Wagner, eds., *Political Pow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69, pp. 285-292.

③ D.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p. 10-12;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London: Heinemann, 1976, p. 10-14.

的行为类型。正是这些领域之间的不一致性造成了社会内部的各种各样的矛盾。"①

对我们的目的而言，只需认识到，每一个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都面临着三个基本任务：①提供生存的手段，更一般地说，为了征服自然以获得人类需要更大的满足而发展资源；②任务的全面协调和冲突的解决；③把个人统一到社会中去。因此，我们可以识别三个基本的社会子系统，它们分别叫做经济、政治和文化。前两个子系统从属于一种有目的的设计，因此，它们是目前研究的对象。第三个子系统即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活动的产物，在这里将不做讨论。

这种方法当然是会招致批评的。文化并不仅仅是 überbau（上层建筑），三个子系统明显是相互依赖的。文化既决定经济和政治的组织，又被后两者所决定。文化为制定动员经济资源的政治目标提供了价值的基础。相反地，经济发展导致了制度和文化的改变。然而，只有使问题简化，我们才能驾驭我们的任务。我企图要做的是，使既定的文化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并把经济和政治作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工具加以考虑。记住这一点，应该这样来设计经济和政治体系，以致尽可能地使真正自由的、无拘无束的和自发的文化得以充分发展起来。更精确地说，在对人类需要分析（第十五章）的基础上，我假定，当代经济发展产生了以自我管理需要为特征的制度的变革。自我管理开始被当做一个基本的人权来对待。从而，自我决定成为基本的价值之一；或者可能成为新文化的最基本的价值。文化的改变然后会巩固经济和政治的改变，因为新的价值体系具

①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London: Heinemann, 1976, p. 10.

有动员效应，并使动用力量以反对反常事物的行为合法化。最后，实现了某种形式的新的均衡，这种新的均衡就是自我治理的社会主义。

我们已经讨论了经济的两个基本的方面——生产和分配——并将在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再回到这一主题上来。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进行一种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的设计。

第一节 国 家

政治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它们与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生活在某一社会里的人们注定是意见分歧的。这种分歧遵循着某种模式，并且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来处理。如果处理争端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争论者的相对权力决定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各种关系中识别出政治关系来。为了把政治关系和其他权力关系（在家庭里的，在俱乐部里的，等等）区别开来，我们把政治关系与各种水平的全球社会联系起来。因此，对社会紧张关系的处理和冲突的解决，是政治制度的第一个功能。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决定“法律和秩序”，但这仅仅是政治制度的一个功能。还需要把权力解释成为合法化的权威，解释成为与社会内流行的价值相一致的合法性的权力。因此，政治制度的另外两个功能是：对社会目标的权威性说明和权威性地动用人力和资源以实现选择的目标。这两个功能说明了，政治制度不仅仅是与冲突有关的，而且是与协调有关的。在所有的三种情况下，决策的制定和执行形成对该社会的束缚。

主要的政治机构是国家。国家是在既定的领土之内具有合法地使用暴力的一种垄断的社会组织（马克斯·韦伯）。每一个

权力都是由制裁得以支持的。但是，并不是每一种政治关系都意味着肉体的强制。这只是国家所特有的，而国家仅仅是政治制度的一个组织部分。其它的政治组织——政党、压力集团，非党性的政治协会——并不具备这种性质。在一个阶级社会中，国家权力很自然地是为了获得和保护统治阶级的特权而使用的。

现代的国家以法律为基础。法律是一种以国家权力支撑的人类行为的规范的秩序。另一方面，国家权力是以法律认可的强制秩序的表达。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志。

在这里，简要地讨论一下马克思的两个著名的而又相互矛盾的概念是很有意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的消亡。如果法律制度和国家是以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组织起来的，那么，在资本主义，不论政体如何，国家是作为资产阶级专政发挥作用的。无产阶级革命应该实现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面，以便使国家可以开始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发挥作用。在这里，很明显，“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对“民主”的否定，而是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否定。由于无产阶级比以前的统治阶级在人数上大大占优势——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宣言》），无产阶级国家能够在更高的程度上实现政治民主。1871 年巴黎公社为此提供了证明。马克思把巴黎公社称作“工人阶级的政府”，恩格斯称它是“无产阶级专政”[①] 公社，正如众所周知的，建立了普选权，随时可以撤换的代表，轮换的公职人员（他们拿工

① K. Marx, *Civil War in France*, 1971. F. Engels, Introduction to the text by Marx, 1891.

人的工资），和大规模的参与。正如以前曾经提到的（第二章，第一节），恩格斯后来补充道，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

当列宁在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思想时，他同样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上述描述的推理的逻辑，他说道，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国家作为“最充分的民主”，“把民主大规模地扩大”。①然而，在以后，当列宁处在把理论运用于俄国实际环境的地位上时，他却急剧地向右转变了，把“专政的科学概念”定义为“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②在一本反对考茨基的书中，列宁这样写道：“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护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③列甫·托洛斯基完全分享这种观点。

然而，这些言词不是耸人听闻的，它们是在为了生存而斗争的白热化的战场上做出的。重要的是组织和决定，而不是法律上的吹毛求疵。当列宁废除法律和规章时，他可能想到的是沙皇遗留下来的法律结构。认为旧的法律和法规应当首先被修正，然后才能采取行动，这种观点是荒谬绝伦的。列宁和托格斯基依靠的是他们考虑的阶级本能和他们行动的正义性。即便如此，甚至是最有善意的解释也不能掩盖这样一种实际，即政体正在变成独裁式的。无论列宁和托洛斯基的个人企图是什么，这种改变不再是过渡时期的现象，而变成永久性的，并且

① 见列宁：《国家与革命》，第5章第2节和第1章第4节。——译者注

② 列宁：《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80页。——译者注

③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23页。——译者注

以这种方式，被他们的追随者所接受。

因此，在应用中，社会学意义的专政非常容易地被政治学意义的专政所代替，（无产阶级）阶级统治的思想被一种特定的（专政的）政治体制所代替，并且它在国家主义的社会里成为普遍被接受的术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初思想被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脆弱性而被清除了。在很早以前，季诺维也夫就已经指明了全部推论——和它的实际应用——的逻辑结果："每一个有觉悟的工人都必须懂得，除非通过它的先锋队组织——共产党，否则工人阶级的专政不可能实现。"[①]如果还有任何的怀疑，斯大林彻底消除了它们：国家的领导权，"**充分**地和完全地掌握在**一个单一**的政党的手中，掌握在我们党的手中，这是不能分享的，也不可以同其它政党分享对国家的统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着重号是原来的）[②]

作为统治阶级的合法暴力工具的国家，在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当然是不需要的。[③] 这个结论引起了极大的混淆。在资产阶级的观点中，它被作为乌托邦而不予理会；在国家主义的观念中，它被无限期地推迟到"发展的高级阶段"。结果是同样的：国家的权力增强了。这种混淆的原因根植于现代国家的双重角色中：它是一种镇压的工具；然而，它也提供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在迅速扩大，并且国家将继续执行这一职能。仅仅是国家

---

① G. Zinoviev, "Pressing Ques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Movement",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June – July 1920, pp. 2109 – 56, quote from p. 2131.

② J. V. Stalin, " O treh osnovnyh lozungah partii po Krestii po Krest' ianskomu voprosu" (1927), in *Voprosy leninizma* , Moscow: Ogiz, 1945, p. 163.

③ 在所谓的原始社会里，阶级区分是不存在的，所以，也不存在国家。这些已经在《没有统治的部落》（Y. Middleton and D. Tait, ed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4）一书中描述了。无国家的社会有政治行动，但没有分工化的政治机构，甚至很少有政治家。领土的界限是不确定的，没有至高无上的主权，也不存在合法权力的中央垄断。

的镇压职能应当消亡。用圣西门和恩格斯的术语来表达就是：对人的统治消失了，对物的管理保留着，并扩大了。①

然而，这后一句话并不是十分准确的。必须保护社会免于罪犯的侵害。因此，警察和某种形式的监狱制度非常可能仍然保留着，但是，它们不是用来反对"敌人"，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政治上的镇压将消亡，事实上，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现代社会中，ceteris paribus（其它条件不变），政治镇压的程度是衡量阶级剥削和与社会主义差距的最可信赖的尺度。

三个重要的社会制度——家庭、财产和国家，所有这三个已经被恩格斯选择出来了——似乎显示出相同的发展趋势。在封建家长制的家庭中，家长不仅仅是家庭的领导，他也掌握着支配家庭的绝对权力。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拥有他的家庭，并且他可以惩罚（甚至杀死）他的子女、妻子或妻子们。历史的发展逐渐地限制了家长的绝对权力，直至这种权力的最终消失和所有家庭成员被平等地对待。同样地，在罗马时代，财产是绝对的，非所有者被排斥在外。如果财产权当真受到了限制，那么，这种限制，而不是所有制的排他性，就必须被证明有正当的理由。历史发展再一次地侵蚀了排他性的财产权，并且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当采取了分享（生产性）财产时，只有被证明有正当的理由，才存在财产的排他性。最后，在中世纪，一个国君是他的王国的所有者。这意味着他拥有财产和政治的两种权力。在16世纪的晚期，国王的世袭权力转变成为君权原

① 伊沙克·德舒尔（Isaak Deutscher）这样描述这种观点："我认为，正是托洛斯基用了这样一个非常简单而又十分生动的比喻：警察既可以用他的指挥棒来管理交通，也可以用它来驱散罢工者或失业者的示威游行。这一句话就总结了管理物和统治人之间的经典区别。"（Roots of Bureaucracy in R. Miliband and J. Saville, eds,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69, London: Merlin, 1964, p. 20）

则。以后的公法就是以此原则为基础的。有权发布命令的君主是君权的体现者，而君权意味着绝对的、永久的统治国家的权力，亦即排除其他人进行政治决策的权力。资产阶级革命以人民代替了君主。人民主权开始了公民逐渐进人管理国家事务的过程。国家权力越具有非排他性，政治过程就越民主化；国家越缺少赤裸裸的权力性质，它就越成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在杰·鲍丁〈Jean Bodin〉以后的 3 个世纪，他的同胞莱昂·杜盖特〈Leon Duguit〉以公共服务代替君权作为公法的基础。按照他的观点，统治者没有统治国家的主观权力，只有利用这种权力组织公共服务的义务。所有的意志都是平等的。公法不再是用来处理国家权力和臣民之间关系的一系列的规则，而是调节公共服务的一系列的规则。同样地，法律不再是君权国家的秩序，而是公共服务的条例。[①] 方法上的改变是明显的，而法律理论的改变很自然地反应了实际关系的改变。臣民变成了公民，排他性被颠倒过来了；并且，通过越来越成为非排他性，旧的国家开始消亡了。

一个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至少可以用三种不同的方法来根本上减少国家的作用：(1)在非政府的基础上组织（某些）公共服务；(2)可以用市场、法庭外的调解、公众意见、专业化的道德标准来部分地代替国家的管理、司法或命令；(3)可以通过提供关于过去（统计、科学研究）和未来（社会计划）的信息来减少冲突。剩下的就是国家的合适的活动范围。在这里，我们要建立对国家的可信赖的社会控制。从操作的意义说，这意味着对国家权力的有效的分散化。

① L. Duguit, *Les transformations du droit public*, Paris, 1913.

第二节　权力的分立

绝对的权力、君主的专制和贵族的特权，显然与资本主义经济不一致。因此，人们可以期望，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不仅建立议会政府，而且将进行分权和把某些规则引入到国家事务的操作中，这正是实际所发生的。毫无例外，分权被知道是权力的分立原则，它出现在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英国。①

为了保卫自由，政府必须被分为三个独立的部门：立法、行政和司法。这种划分之所以能完成，是因为每一个部门都有自己的特殊职能。政府的这三个部门分别处理规则的制定、规则的执行和规则的判决。每一个部门由不同的人员所组成。以这种方式，每一个部门行使限制其它两个部门的职能，以保证没有一个集团的个人可以控制国家。

孟德斯鸠受他同时代的英国作者的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受被他误解了的洛克的思想的影响②，阐述了这个著名的原则：

> 当立法和行政的权力统一在同一个人或集团的手中时，就没有自由，因为出现了这样的忧虑：同一个君主或参政院将执行暴虐的法律，并以暴虐的方式执

---

① 第一个阐述这一原则的人是查理斯·达利森（Charles Dallison）（*The Royalists Defense*, 1648）。关于这一原则的详细的历史，见 M. J. C. Vile,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7.

② 对洛克来说，立法权是最重要的，应该在国王、贵族和平民之间分立。行政和外交及国家安全权力应当掌握在国家的手中。孟德斯鸠把行政权变成了司法权，把外交及国家安全权变成了行政权。洛克分立了一种权力，而孟德斯鸠分立了三种权力。英国坚决主张的立法权力保留在英国的议会政府中。但是权力并没有分开。不同权力分立的思想在美国的总统制度中得到了体现。与许多的思想一样，权力分立的这种智慧的思想的来源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 行这些法律……在审判权和立法权结合到一起的地方，臣民的生命和自由就暴露在专制的控制之下，因为法官于是成为立法者。当行政权力也加入其中时，法官就会像一个暴虐的压迫者一样行事。①

孟德斯鸠的思想在大西洋的彼岸热切地被接受了，并且很快地被吸收到美国 1776 年的第一个宪法（维吉尼亚）和 177 年的宪法（联邦）中。这些，反过来，又在 15 年之后，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的宪法。在下一个世纪，权力的分立在资产阶级世界里成为普遍的被接受的原则。

然而，僵硬地把政府的部门和政府的职能等同起来未能经受实际的检验。因此，权力分立原则被制约和制衡的原则加以修正。每一个部门被授予行使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其它部门的权力。在美国的情景中，最高法院可以以不符合宪法为由宣布某一项法律无效；立法机构可以弹劾总统；而总统可以否决立法法案。在欧洲，行政法庭制约官僚主义者的专断。但是，这种制约并没有防止行政部门作为支配的和最重要的政府部门的出现。进化的趋势似乎是在相同的方向上静止不动了。

事实是，各部门不可能在纯粹职能的基础上有效地组织起来。它们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多元化。规则不仅由议会制定，也由行政人员和法官制定（共同法）。不仅行政部门执行规则，法庭也执行规则。法庭不仅是司法机构，也是管理机构（它们登记抵押和其它实际资产的抵押权，决定不动产，注册

---

① 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Baron Montesquieu, *De l' esprit de loix* (1748), book XI, ch. 6, translation from H. Laski, *A grammar of Politic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28, p. 297.

公司)。司法决定不仅由法官做出，而由行政人员和议会做出(特赦)。后者也从事各个方面的选举（例如，在瑞士，选举联邦政府、联邦法院、军队的长官)。

但是，权力的分立原则在本质上是正确的原则。为了适合实际的要求，它仅仅需要稍微的修改。我们可以按如下的过程来重新表述这一原则的。政府——或者，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是自我治理[①] ——的活动是非常复杂的。为了能够运转，应该把政府的活动分解为基本的操作。这就是著名的劳动分工原则。每一次行政管理至少涉及三种不同的活动：规则的制定、规则的执行和规则的裁决。因此，需要在这些不同的活动方面实行分工，也需要有三个分工化的管理组织。每一个部门在形式上是多功能的，但在其专门化的领域内，是最终的权威。由行政人员和法官制定的规则（比议会制定的规则要多好多倍）不能与宪法和议会法矛盾；只有当行政人员执行规则时，法庭才能应用它们。行政和议会做出的判断服从法庭的判决。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两个不同的部门可以执行同样的职能这一事实，同样，如果目标是不同的（如在吸纳新管理人员的情况下)，分立的机构可以——也许应该——有不同的选民。

传统的分立原则到此为止了。我们现在遇到了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问题。很明显，每一次行政管理意味着上面提到的三种不同的活动。然而，仅仅就这些吗？答案部分地依靠管理程序的客观性质，部分地依靠社会制定的政治目标。

① 读者可能注意到，在关系到经济事务时，我使用的是“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这一术语；而当涉及到政治事务时，我用的是“自我治理”（self-government）这个术语。因而，我说“工人的自我管理”，和“公民”或“政治的自我治理”。当我把社会主义作为“自我治理的社会”来表示时，我也使用了自我治理这个一般的术语。

我们已经遇到了关于控制的问题。在每一个相互依赖的系统中——具有三种职能的政府当然属于这样的系统，系统的功能对其内部子系统的功能施以控制的影响。然而，正像每一个系统工程师都知道的那样，这远远不够。如果我们要的是最优的结果，我们必须在体系中建立特殊的控制装置，以防止任何对最优系统的偏离。在政治领域，这意味着控制的制度化安排。

我们现在有了公共管理的四个部门。它们的活动不是预先决定的，而是从根本上由在这些部门工作的人来决定。因此，如何在政治和公共事务中选拔新的管理人员便成为另一个基本的职能。在讨论这一职能时，我们必须提到远东的孟德斯鸠、中国革命家和政治家——孙中山。孙中山吸取了他的国家的历史经验，建议了五个部门的政府结构。前四个与我们在前面所描述的是一致的，而第五个叫作“考试机构”。它的任务是“考核文职官员的候选人的知识和能力”。[①] 孙中山注意到，相同的制度已经在英国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②]，所以，毫不奇怪，英国的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也是这种制度的极力的拥护者。拉斯基的观点是：(1)必须根据人而不是根据内阁或下属机构的政治岗位来任命文职官员；(2)任命的原则必须使个人的偏袒降至最低。拉斯基相信，如果对岗位的竞争公开化，如果选拔候选人的委员会的委员们可以像在特殊情况下撤换法官那样被撤换，那么，这些条件将被满足。[③] 但

---

① Sun Yat - sen, “Die Funf - Amter - Verfassung”（1921）, in K. A. Wittfogel, *Sun Yat Sen*, Vienna: AGIS, n. d., pp. 239 - 250. 按照孙中山的观点，古代中国的政府体制包括三个独立的权力机构：控制机构、考试机构和皇帝机构。后者行使司法、管理和立法的三种职能。控制机构负责所有的惩罚，甚至可以建议惩罚皇帝。(ibid., pp. 246 - 247)

② 在英国，对文职官员的公开的、竞争性的考试开始于1854年。

③ Laski, *Grammar of Politics*, pp. 398 - 399.

是，拉斯基并没有指出，选拔的职能是政府的一个基本的职能。而且，对管理岗位人员的选拔仅仅是问题的一小部分。主要的问题是对政治领导岗位的选拔。

如果政府是作为议会的执行机构来设计的，那么，就必须把执行的职能与行政管理的职能适当地分开。前者需要政治上的素质，而后者需要业务上的素质。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公共管理是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自我治理的职能。为了使事情变得稍微复杂些，我们注意到，正像普斯克（E. Pusić）指出的那样，可以把公共管理进一步区分为权力性质的和服务性质的；前者反映政治的冲突内容，后者反映政治的协调内容。

让我们总结一下我们的发现。自我治理意味着6个明确的职能：

立法——公布基本法；

司法——把法律应用于特殊的事例中；

执行——使前两者的决策生效；

管理——实现执行权力机构的命令和运用法律；

控制——监督其它部门的活动；

招募——为其它部门提供人选。

现在，仍然需要设计对提到的这6种职能负责的合适的机构。

第三节　自我治理六个职能的制度化

我将假定，我们所研究的是一个相当发达的自我治理的社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期”已经结束了，经济的发展远远超出了饥饿的水平线，社会可以为它的每一个成员

提供比较舒适的生活。换言之，我假定社会达到了目前西欧国家的经济和文化水平。为了避免个别的特殊经验和个人的偏袒的影响，或者至少限制这些影响，制度的设计将局限在要点上。此外，只有对特殊的社会和在一种具体的历史环境下，制度设计的细节才有意义。

1. **立法**。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扮演三个基本的角色，那么，在立法议会中，就需要分别有我们的这三个角色中的每一个角色的代表。另一方面，独立的消费者的代表实际上可能是不需要的。消费者的利益与公民的利益是如此一致地接近，以至于有联合的代表就足以了。而且，我们有另外的机构来负责照顾消费者的利益（见下面的第 5 条）。

我们可以识别出两种不同类型的利益：区域性的利益和职能性的利益，或者生活质量方面的利益和生产方面的利益。后者与生产者的代表是一致的，而前者与消费者（和公民）的代表是一致的。因此，联邦议会至少由两院组成：公民议院和生产者议院。① 公民议院的议员们将代表他们的地区，而生产者议院的议员们将代表他们各自生产部门。每一个议院将在各自

---

① 英国社会主义者和改革家悉尼·韦布和蓓特丽丝·韦布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们所号召的是，需要将处理国防、国际关系和司法管理的政治民主，与我们称之为的通过或经由社会全体人民授权的对工业和服务业的国民管理的社会民主分立开来。"这将涉及到建立两个议会：政治议会，它将沿着传统的路线行使职能；和社会议会，它将具有固定的任期，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它才能被解散。（*A Constitution for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of Great Britain*，London：Longmans，Green，1920，pp. 111 ff.）韦布夫妇也是以作为生产者的人、作为消费者的人和作为公民的人为基础来进行分析的（ibid.，pp. xvii and passim）同样的思想再现于德国革命的动荡时期。两个多数派社会主义者，马克斯·科恩（Max Cohen）和朱利斯·卡利斯基（Julius Kaliski），试图把委员会制度与议会制度结合起来。他们在 1919 年柏林第二次委员会代表大会上建议，在人民议院（Volkskammer）中建立独立的劳动者议院（Kammer der Arbeit）。企业中的所有的劳动者应该选举生产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应该垂直地隶属于中央生产委员会，所有的委员会都应该在相应的水平上选派它们的代表参加劳动者议院。（W. Gottschalch，*Parlamentarismus und Rätedemokratie*，Berlin：Wagenbach，1968，pp. 26，83 – 84.）南斯拉夫在实行工人管理之后不久，就第一次把这种思想付诸实施。

的分工领域做出独立的决策。只要决策涉及到共同的利益（例如，年预算、发展计划、政府的选举，等等），两院将共同参与决策，并由每院的多数投票决定。最后，以多数投票决定的方式，每一议院都可以宣布任何问题是有关共同利益的。

由于每一个议院代表的只是局部的利益，似乎需要建立第三个议院来处理共同的国民利益。然而，这实际上是不必要的，因为共同的国民利益将通过两院的相互作用得以保障。当两院的意见出现分歧时，就必须建立一个特殊的仲裁程序。

然而，如果选区单位的规模差别很大，民族上和经济上的变化也很大，就会出现问题。保护少数人利益的原则要求每一个地区有平等的发言权——就是说，有同样的代表人数。另一方面，以这种方式来决定，联邦的利益有时会与地区的利益相冲突。从而，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参议院和一个众议院。但是，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复杂的两院制实际上是不需要的。在特殊的条件下，一个地区的多数代表可以宣布一个问题是“地区性的问题”，或者是“一个局部问题”，然后，只有获得地区之间的一致同意时，该决策才能通过。某些问题可以预先作为地区性问题来确定，例如，发展计划。如果这种方式被接受，议会中的地区之间代表的权力仍然是不平等的，因为，在通常情景下，代表们不是作为个人来投票的，而是作为代表团的成员来投票的，而每个地区只有一个代表团。

联邦议会做出整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决策。这首先反应在立法上，也反应在一般的政治指导、协调地区性利益的冲突和动员国家资源等方面。议会控制着政府的行为，它任命各级国家公务人员和选举执行委员会。

似乎我正在描述国家权力的统一原则。这必须与权力的分

工相对照，而不是与权力的分立相对照，我把后者作为职能的分离来对待。在权力的等级制中，议会是最高的权力机构。然而，有一个限制：法律必须是宪法性的。这个限制反映了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即权力的最终的载体是所有的公民，他们作为政治的团体通过国家的最高法律。

2. **执行**。议会有便利于立法和政治工作的各种专门的委员会。最重要的委员会是执行委员会，它代替了先前的政府。执行委员会对由议会决定的政治目标的实现负责。当然，该委员会也被期望提出自己的计划和分享立法的主动性。经过议会的商议之后，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计划或特殊的提议，或者被接受（可能在修正后），或者被拒绝。如果议会接受了该计划，那么，它的实现就成为执行委员会的政治责任。未能执行议会的决策将会导致对该委员会的信任投票。如果结果是否决票，那么，该委员会就被解散。

委员会的主席像国家的首相一样行事。主席的特权和管理委员会职能的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气质和传统。选举的委员会可以有固定的任期，并且没有召回；如果委员会的成员愿意服务得更长久些，他们可以再次当选；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可以在年度的基础上实行轮换制——所有这些正像当代的瑞士的联邦议会一样。或者，委员会的任期取决于对其的信任投票；再次当选的委员不得连续超过两届；主席的人选由独立的选举产生，大大超过了 primus inter pares（两个中最好的，意指从西方的两党制中选择人选）。一般而论，对议会和集体而不是对个人的严格的负责，代表着与社会主义更加协调一致的特征。

3. **管理**。公共管理是由专业的文职人员而不是政治家来

承担的。各个行政事务部门的领导是执行委员会的永久性秘书。行政人员保有任期，他们不得被解聘，除非发现他们犯有重大错误和犯罪活动。行政事务的职能是应用法律，在这方面，它应享有充分的独立性。它的另一项职能是实现执行委员会的决策。

很清楚，这三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应当以这样的方式组织起来，以致使议会有完全的政治控制能力，执行委员会有充分的实施的主动性，而公共管理有高度的专业性和独立性。执行委员会是联系立法和管理的纽带。作为政治机构的议会和委员会活动的动力是政治上的考虑，而公共事务的服务是以专业的标准为指导的。这样一种制度需要的是有能力的人，它不需要专业的政治家或传统的政治领导人，至少不需要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注意到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是分散权力，而不是减少权力。事实上，社会主义社会对提高权力的总量是有非常浓厚的兴趣①，因为问题的解决需要足够的权力。为了这个原因，部门在不同的活动领域内实行分工，并享有充分的主动性（伴随着完全的责任）。

4. **司法**。法官管理审判。从而，错误得以纠正，罪犯受到惩罚。有四种类型的犯法者：公民（个人或相关者）、国家机构、自我治理团体和自我管理团体。相应地，至少有四种类型的法院。原来意义上的法院用来审判公民中的罪犯（民事的

---

① 社会权力的两个方面——权力的分配和总量——经常被混淆。然而，把它们明显地区别开来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类似的财富的例子可以帮助对这一观点的理解。一个社会可以是贫穷的，或者是富裕的；在这两种情况下，财富的分配可以是平等的，也可以是不平等的。我们所意愿的是一个富裕的和平等的社会。因此，政治制度应当以这样的方式来设计：在没有一个团体的公民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持不同意见的多数人这种意义上使权力分配平等化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解决社会问题的潜在的权力。

和刑事的)。处理国家官员犯罪的行政法庭是新近出现的。它第一次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出现（在 1799 年由 d' état〈政治〉委员会领导)。但是，在认识到行政法是独立的法律分支之前，它的出现经历了很长时间。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它在 20 世纪才出现。发展行政法的目的是为了从法律上限制行政的任意性。它的第一个原则是，没有法律的授权，作为负担强加给公民的行政措施就不能进行。[①] 当没有遵循基本法即宪法的规则时，立法者本人可以触犯法律。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法庭有权利和责任从司法的观点对立法进行评论，即决定立法机构的一项法律或执行委员会的一项法案是否符合宪法。这一功能通常由一个叫做**宪法法院**[②] 的特殊法庭来执行。这个法庭也对国家组织之间、包括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冲突进行仲裁。最后，自我管理的劳动组织的法令和法规——换句话说，它们正常的自治活动——产生了建立自治法的需要。如果自我管理的机制未能解决某一劳动组织内部的纠纷时，事情就交由一种特别的法庭来处理。这个法庭在南斯拉夫 1974 年的宪法中——它第一次在此宪法中成立——被叫做**联合劳动法庭**。各种法庭的名称和组织形式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是明显不同的。对我们的目的而言，重要的是建立司法机构的四种不同的职能。也有其它的专业法庭，如军事法庭、经济法庭，或仲裁法庭，等等。但是它们属于这四种不同的职能中的一种。

为了司法公正，法官必须是中立的。为了中立，他们必须

---

① C. J. Friedrich,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Democracy, New York: Blaisdell, 1964, p. 113.

② 在二战以前，有宪政责任的法庭特别稀少，它们主要存在于政治上采取联邦形式的国家，像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二战后，宪法法院在联邦德国、意大利、印度、南斯拉夫和其它国家建立起来。

是独立的。为了保护独立性，法官的选举必须免除政治的影响。拉斯基评论道，不可能在一项特殊的程序和个人的申请之前就产生司法职务的候选人。[1] 公共的意见是通过陪审团来发挥必要的影响的。更通常的是，独立意味着法官的人选不能根据他所持有的政治观点。当法官不能在政治上选出时，可以在业绩的基础上来任命法官。这就是招募委员会的工作，它的职责以后再谈。有几个例外。公共检察官办公室和宪法法院至少部分地是政治机构。这些职务的候选人应该由相关的议会选举产生。同样的程序可能也适用于选举最高法院和上诉法院的人选。

在社会主义下，私人生产性财产和官僚的权力——资本主义社会和国家主义社会的两个最主要的冲突源泉——将被消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冲突会消失，或冲突的次数会减少。一个社会越发达，专业化的职能越多样化，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就越复杂。他们之间的关系由规则来调节，需要有一定的法律知识来解释规则。因此，并不存在法律专业消失的危险。然而，如果法律的咨询是必须的——例如，就像需要医生的帮助一样，为什么律师业不应该实行社会化，就像医疗业一样呢？这正是哈罗德·拉斯基的思想——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地方真正实行了这种思想。拉斯基建议，把法律咨询办公室添加到法院服务的地方机构中去。该办公室可以在提供忠告方面实行分工

---

① *Grammar of Politics*, p. 56.

(遭受损失的普通公民①，“就像富人可以到他的私人律师那里一样，可以到……)，在调解（处理诽谤、诬蔑和吵架）和为法庭准备案件两个方面进行分工。

5. **控制**。初步的控制在前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存在。总是有人指出，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控制。通过对立法进行司法的审核，法院控制立法机构。立法机构控制执行机构；后者反过来控制管理机构。公共检察官办公室是控制的机构。一个特别重要的控制手段是公共的舆论。而真正的公共舆论的必要前提是获得适当的信息，这将在以后讨论。

除了上面提到的控制的源泉外，在社会的控制方面，至少还有两个专门的机构：一个在金融事务方面，另一个在其它的每一个事务方面。前者是“社会会计服务中心”，它控制着劳动组织和国家机构的金融交易；后者是“人民委员办公室”。

---

①　对纽约城的实际的一个描述，可以说明在现代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的普通公民是如何得到“司法的公平”的。这个描述当然不是被发现的最坏的情况。J·纽菲尔德（Newfield）花了一个月时间来观察一个市政的审判室，并发现：“例行公事地，30 秒钟的决定就使生命被毁灭，使家庭被解体。某些法官在下午 2 点就停止了工作，去打高尔夫球，而8 000名宪法假定无辜的男女们在过分拥挤的拘留所呆上一个月，等待着审判。另一些法官坐在板凳上发脾气，骂被告是‘畜牲和渣滓’。警察贿赂法庭的接待员……5 美元使他们的案子排在第一。法律援助律师每天为 50 个贫穷的顾客辩护，没有一秒钟的准备时间。保释制度让保证人为富人和名门买自由。书记员预先出售法庭文书和决定的内容。民事案件的判决总是有利于地主、商人或城市的代理商”（引自 M. Parenti, Democracy for the Few, New York: St. Martin' s Prese, 1974, p. 120)。英国的司法管理部门——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被 J·威斯特加德（Westergard）和 H·莱斯勒（Realer）描述如下：“多数人……被法庭的程序弄得不知所措，他们抱怨，法庭的气氛不利于公正的审判，得不到法庭官员的帮助。在刑事案件中，更是如此。特别是当大多数的被告是体力劳动者时，和目的是保护犯人的律师经常拒绝他们的时候。那些首先在警察局被拘留的人，如果他们请求，通常是不允许接触律师的。法官很少不顾警察的反对而准予保释，虽然以后的案件的审判结果经常证明是不值得入狱的，并且大多数被拒绝保释的人没有被告诉具有对此上诉的权利。法律的陈述在法庭上是罕见的，即使是当被告申辩他们无罪的时候。至少被法官判处入狱的相当大多数的人没有律师为他们的案件辩护。有关上诉的忠告和帮助进行申辩，经常是不合适的。所以，当进行民事或刑事审判时，法庭上的劳动阶级的人是他们并不了解的程序的牺牲品；对于这个形式上规定的、经常是全然的、冷淡的或直接敌意的程序，他们得不到任何的帮助”（Class in a Capitalist Society, London: Heinemann, 1975. pp. 189－190.）

人民委员办公室的雏形来自议会的申述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接受来自公民的抱怨，并把这些冤情转给相关的部门，敦促他们采取适当的措施。结果却不是非常令人鼓舞的。此外，公民乞求怜悯这种情况，公民的冤情可能或可能不会被理会的这种情况，是异化的国家权力最明显的表现。而且，为什么等着公民来抱怨？为什么不组织有力的和主动的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委员的真正的和现代的先驱是瑞典著名的 ombudsman〈调查官员舞弊情况的政府官员〉①虽然早在 1680 年，国家的首席法官就成为第一个 ombudsman，但是，现代意义上的 ombudsman 办公室直到 1809 年的宪法才建立起来。Justitieombudsman〈调查司法、执法官员舞弊情况的政府官员〉，正像它的名称一样，监督法院和行政机构，并以这种资格，作为议会控制政府行为的工具来行事。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瑞典产生了反军国主义的情绪。议会对此的反应是，在 1915 年成立了 militeombudsman〈调查军官舞弊情况的政府官员〉，以防止军事官员的不忠诚。militeombudsman 负责处理对自由的不适当的限制、无根据的逮捕和非法拘留。这种制度逐渐地遍及斯堪的纳维亚所有的地方，并在二战之后发展到了新西兰、英国、加拿大、西德和一些其它国家。除了民事和军事的 ombudsman，ombudsman 在限制贸易活动、保护

---

① ombudsman 这个词来源于 *om* = about〈om 是关于的意思〉，*bud* = messenger〈bud 是信使的意思〉，在北欧海盗时代〈8～10 世纪〉，它的含义是从罪犯那里收集罚金。以后，这个词意味着任何形式的代理人。

② 宪法规定，justitieombudsman，“以议会代表的资格，将监督由法院和由政府官员执行的对法律和法规的遵守，并且在胜任的法庭之前对那些在履行其责任时通过偏爱、偏袒或其它原因所犯的违法行为和玩忽职守行为的官员提出起诉”。（引自 A. Bexelius, “The Origin, Na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Civil and Military Ombudsmen in Sweden”, in *The Ombudsman or Citizen's Defender: A Modern Institutio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May, 1968, 377, 10－19. quote from p. 11）

消费者的利益免受虚假的广告、不受欢迎的市场活动和不合适的契约条款等方面帮助执行法律，保证新闻出版业的可信赖程度。南斯拉夫1974年的宪法建立了可以被称作自治的ombudsman（društveni pravobranilac samoupravljanja）。

到此，从历史上考察了ombudsman的职能，所以，我们可以把他作为人民的委员介绍到我们的制度中，因为这正是他所真正所代表的。人民委员办公室关系到行政过程的法律保障。这意味着下述的问题：在一次行动中被卷入的人是否被给予申辩的机会？是否发现了行政机构的足够的证据？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是否客观上平衡了？案件是否被耽搁了？决策是否受到了不合适的影响？公民向ombudsman抱怨的，大部分是关于就业的条件、工资、养老金，以及政府拒绝发给执照、准许和让步。经常性的抱怨是关于检察当局未能对罪犯提出起诉，警察方面的令人不满意的调查，或者偶尔是对警察的野蛮行为。在挪威，抱怨者中的相当大的比例来自监狱的囚犯。丹麦的ombudsman处理下列的案件：①官员在决策过程中的素质；②官员方面的偏见；③导致对请求者伤害的不正确的和不完全的信息；④官员不能说明决策的理由；⑤行政过程的不合适的耽搁；⑥专断的、不合理的和反复无常的作风；⑦官员的粗鲁和其它不文明的行为；⑧官员蓄意的疏忽大意；⑨工作中的其它的不良的、错误的和不负责任的行为。[①] 人们可以列举其它方面可以引起人民委员注意的现象，如由于排队和政府办公秩序的混乱而导致的时间的浪费，在公共服务方面（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对消费者未能履行神圣的责任，生态的破坏，消费

---

① H. J. Abraham, "The Norwegian Ombudsman for Civil and Military Affairs", *The Ombudsman or Citizen's Defender*, pp. 41 – 45. espec. P. 51.

品的粗制滥造，等等。在南斯拉夫，自我管理的公共律师保护社会的财产和联合劳动组织中的劳动者的自我管理的权利。

为了开展工作，人民委员不仅从抱怨者那里搜集情况，而且从新闻业和其它的媒介报导那里以及从他办公的视察的旅途中获得情报。他有权接触所有的机构和所有的文件，包括内部的会议记录。他可以举行听证会，和在他的监督之下出席所有机关的会议。然而，他与其说是内部控制和司法控制以及行政上诉制度的替代者，不如说是它们的补充。公民首先直接通过正常的渠道寻求问题的解决。如果行不通，人民委员才开始行动。他的主要活动范围是严格的法律和严重的犯法或犯罪之间的广大的区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可以由法律来调节的。事实上，如果制度能正常运转，只有相对很少的问题要靠法律调节。存在着行政权的滥用、玩忽职守、轻率妄为、粗枝大叶、缺乏理解、缺乏能力和其它不适当的行为有机可乘的相当大的空间。因而，人民委员的重要工作是：①向相应的机构和自我管理的团体通报问题和要求解决这些问题；②按照一定的方式警告犯法的官员；③下令对违法者采取纪律行动，或者；④在严重的案件中，起诉或命令公共检察官把案件带到法庭上去。普通公民的违法犯罪由普通的法院来处理，行政管理者的违法犯罪交由行政法院，对宪法的评价由宪法法院来进行，破坏社会财产和自我管理的违法犯罪者交由联合劳动法庭；⑤如果社会财产和自我管理的权利遭到了侵害，处理自我管理的人民委员可以暂时停止执行自我管理法和终止政治行政官员的职权；⑥人民委员可以向议会提议一项法案。

为了有效地运作，人民委员必须是独立的和容易接近的。他的职务显然是政治性质的。因此，他将由议会选出；或者，

更可取的是，由他被期望为其利益服务的社团的全体的普遍投票产生。他的固定的任职期限相对较长，譬如说8年；在其任职期内，不得撤换。作为团体的人民委员代表社会的监视委员会，自我治理的第五个机构。

在我们继续进行分析以前，让我把注意力转到一个普遍被忽视的新现象上——法人。研究这一现象将对人民委员的角色有更深刻的理解。为什么行政法院和普通法院被证明是不足以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因为政府机构和商业企业是法人，并以这种的资格，具有单个公民无可比拟的强大力量。到了大约15世纪，存在的社团，像庄园、行会和村庄，完全包括了它们的成员，并且对成员行使完全的权力和责任。此外，它们嵌入在封建的下级和上级的等级制度中。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地破坏了封建的纽带，解放了个人，并且产生了能够自由地从事交易的社团行为人。新的社团行为人，不是包括人，而是包括其成员的资源或所有者（企业），或其成员职务上的位置（官僚）。这一发展导致了法律上的创新：创造了与自然人相类似的法人。这个法律上的虚构物成为麻烦的源泉，因为两种"人"是非常不同的。詹姆斯·柯曼（James Coleman）指出："因为公司被当成法人，以及因为与自然人相比，法人的规模和掌握的资源在不断地增加，法律很晚才认识到法人和自然人之间的在权力上的差别。因此，权利在公司和个人之间的对称的分配，在实际上可以导致利益上的非对称性的实现。"① 与个人相比，支配着无比巨大的资源的法人，可以得到更好的信息，并且不为感情所困扰。由于这种原因，像工人和企业这样

① J. Coleman, *Power and structure of Society*, New York: W. W. Norton, 1974, p. 76.

两个法律上对称的人的“自由”契约是一种欺骗。工会的建立就是第一个企图消灭在自由的契约中出现的这种权力差别的行动之一。由此导致的权力的差别也可以，至少部分地，被法律咨询办公室和人民委员的活动所抵消。后者最初仅仅是针对政府机构的行为的。然而，人民委员对全社会的公司活动的控制也变成必要的了。

6. **招募**。为了统治，一种政权制度需要在政治上和管理上的关键岗位上有可信赖的人来掌权——极权主义政权把这种需要扩展到所有的岗位上。由于这一原因，国家和政党的领导非常忌讳地监护着在政治和管理岗位上任命他们的随从的权力。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下改变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性质不是关于统治，而是关于**自我**治理。她需要的不是领导①，而是轮换的、在任何时候可以撤换的决策团体。阶级冲突的消失、教育和人民在经济上的平等化使以某些客观的标准为基础招募人选成为可能的了。

我已经提到了，在以业绩为基础、通过公开的竞争选拔从事公共服务的人选方面，古代的中国和现代的英国走得相当的远。社会主义显然至少可以做得一样的好，人们可以期望，她做得更好。在自我管理的各级水平上，都建立招募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员由各自的议会选举产生，任期是固定的，并且不

① 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合适的领导类型被中国古代的哲人老子描述了：“最好的领导是哪些没有人注意他的存在的领导；其次，是那些人们注意到他并为他赞美的领导；差的领导是那些人们厌恶的领导”（引自 C. J. Friedrich, Man and His Government, New York: Mcgraw－Hill, 1963, p. 159.）（“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老子：《道德经》第十七章）。我所指的领导，也可能是老子所谓的领导，是作为领袖的领导，作为 Führer（元首）的领导，和作为在等级制度中发号施令的最高长官。当然，作为鼓励人们从事集体活动的创造性的协调者的领导，在任何社会都是受欢迎的。领导之间的这种区别在罗伯特·列恩（Robert Lane）的批判性评论中得以澄清。

得撤换。

社会主义消灭了阶级的冲突，但没有消除所有的冲突；她消灭的只是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利益的多样化。冲突必须得到解决，而多样化的利益得以协调。这需要进行政治决策，和政治家执行这些决策。当涉及到利益的冲突时，客观的标准就不起作用。政治家不能像管理者那样被任命，他们必须选举产生。我们将用下一章的篇幅来考虑这个问题。选举意味着全体人民组成一个招募委员会。然而，必须监督和管理选举。这正是我们的招募委员会的立法工作。

第四节 地域性分权：权力的非集中化

区域性的自我治理有四个基本的层次，这是与感情归属或根的递减相一致的。一个人的根就是他或她的出生地或养育地。这是地方一级的层次。一个人也是居住在确定区域的同种同文化民族的成员。如果该区域不是太大，或者该民族团体太小，两者就是一致的。其次，一个人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公民。最后，第四个层次是世界共同体。

即使人们离开了出生地和民族居住地，这四重的身份仍然是有效的。对这四重身份的忠诚使国家活动的四个阶段的分权成为可能。如果我们忽略了世界这个层次——因为在目前的研究中，没有涉及到国际关系，我们就可以识别出与余下的三个阶段或三个层次相一致的三种国家的组织形式。我把它们分别叫做公社、共和国（或地区）和联邦（或联盟）。这就像在瑞士，公民具有三种身份：本地的社团资格（同民族）州的资格和国家的公民资格。

分权意味着，在原则上，决策在尽可能低的层次上做出；只有当从根本上影响了更多的公社时，决策才提升到上一个较高的层次上做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从更高的层次开始进行分析，因为任何不明显地属于较高层次的事情就意味着属于较低的层次。

每一个政府享有立法和行政的自治权。代表社会契约的联邦宪法决定联邦政府的职权范围。剩下的就落入共和国的管辖范围，后者或者独立地或者在联邦的法律框架内制定法律。对地方政府而言的共和国宪法的职能是相似的。行政不是垂直的统一——也许军事事务除外，执行委员会只对各自的议会负责。

联邦负责国防和对外关系——换言之，负责国民联邦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关系。它也负责内部的协调，它的议会通过基本法和决定整体的政策措施。图 5 表示的是联邦的组织结构。①

这个图是不言自明的，仅仅需要几句话来说明。生产者议院缩小为经济议院，因为在联邦层次上只有经济事务需要永久性的指导。教育、文化问题和健康可以在共和国的层次上处理。就劳动组织的普遍性问题而言，应用于商业企业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其它的劳动组织。因此，经济议院完全能够胜任通过调节一般劳动组织的基本法律。

就司法而言，除了将要提到的一类案件之外，并不特别需要有一个在等级上高于共和国法院的联邦法院。因此，联邦法院不是作为上诉法院行事的，它仅仅审判那些与联邦活动有关

① 为了强调制度上的区别，议会、政府和各部在图表中分别用议会、执行委员会和秘书处来表示。一旦掌握了这些区别，这两套术语之间可以互换地使用。

的案件。同样，对其余的5个机构来说，也不需要有等级上的任何隶属关系。分权意味着联邦和共和国之间职权范围的很好的分离。提到的例外涉及到限定类型的司法案件，这些案件被认为对国家的法律制度的基本一致性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联邦宪法法院是国家的基本法的监护者，它可以作为挑选出来的案件的上诉法庭。由于联邦不是直接与公民联系，监视委员会的成员不需要普选产生。在联邦层次上，人民委员就是议会的委员。

对于另外两个层次的自我治理也可以画出类似的图表来，但这实际上是不需要的。对共和国一级的组织的总结性的描述就足够了。共和国大到恰好足以代表政治上自治的基本水平，而没有大到无法控制的程度。共和国有权脱离联邦和加入另一个联盟。联盟所做的，原则上是共和国之间一致同意的事情。共和国制定实际上得到执行的法律。共和国管理需要国家管理的一切活动。共和国议会有三个生产者议院：一个负责经济；一个负责教育（包括科学和文化）；另一个负责健康（包括社会福利和身心健康）。人民委员由普选产生，法院作为上诉法庭发挥作用。

政治结构中的公社的位置与经济结构中的企业的位置相似。它实际上向人民提供公共服务。公民与共和国之间的几乎所有的协议都是他们与公社之间的协议。在这一层次上需要多说几句。

有四个因素把人民和地方的公社联系起来，它们是：住所、工作场所、政治权限和通讯（信息的传递、目标和社会单位交互作用产生的个人的行为典范）。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地方公社组织的产生，并不是需要所有的这些因素都存在。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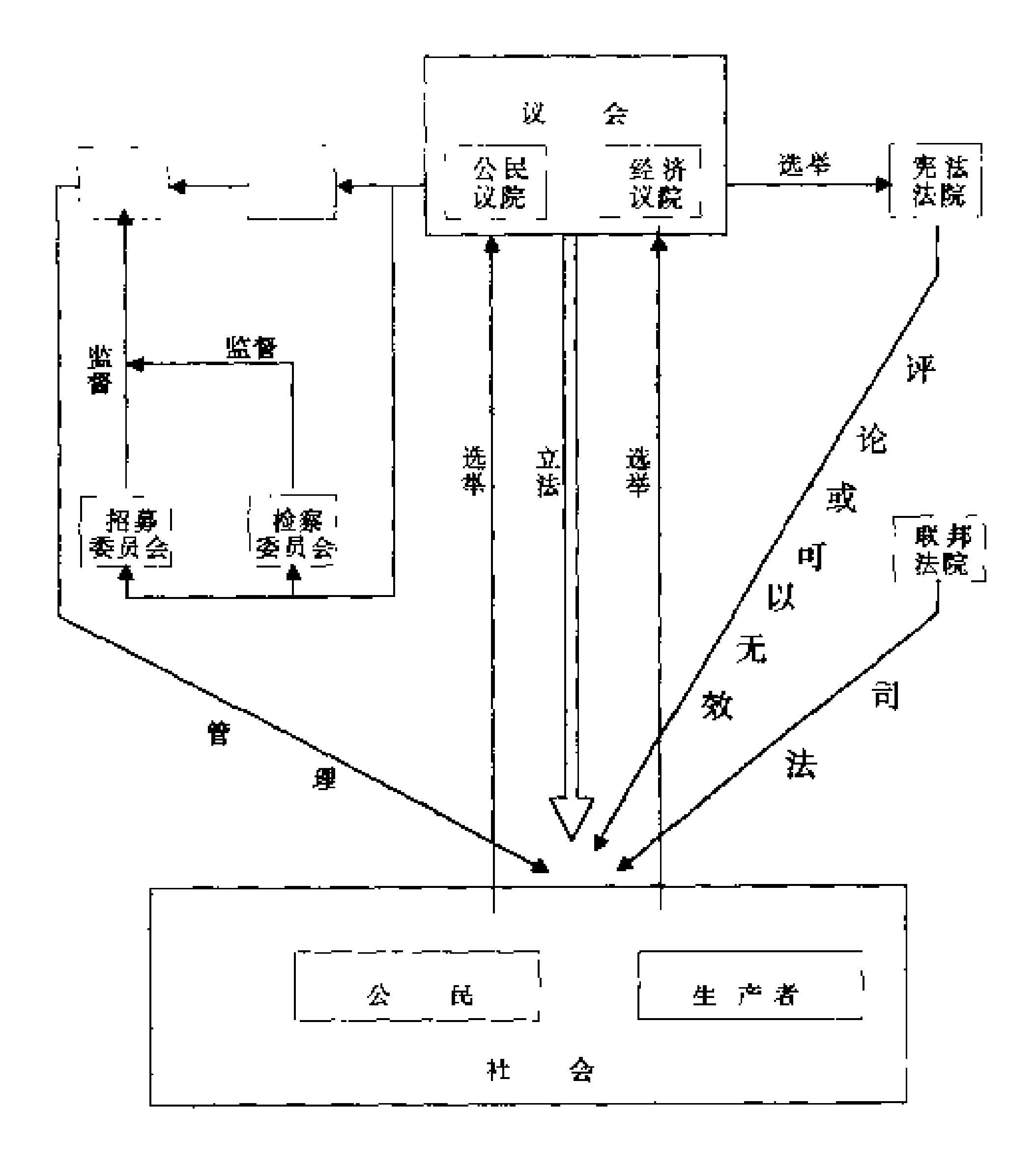


图 5 联邦一级的组织

如，某些人可以居住在其它地方，另一些人可以在异地工作。同一个人可以有两种政治权利：作为居民的权利和作为生产者的权利。在当今时代，通讯当然不局限在地方。然而，对大多数人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四个因素仍然是有效的。

地方公社经历了一个转化的过程，并且同样的趋势仍然在继续着。正像 E·普希克〈Pusic〉指出的，利益日益成为多样化，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利益圈“（劳动组织、专业、各种

协会、意识形态）中的越来越多的人民的参与。由于许多的这些圈子跨越了地方的地域性，地方利益的重要性和对地方公社的感情依附下降了。同时，地方提供的服务的数量提高了。[①]以这种方式，地方公社正在由人们在组织上很差、主要靠感情维系的团体变成伴随着居民的感情维系下降、而组织的公共服务的数量日益提高的社会实体。

公社执行三组职能。它们包括：①**社会经济**和**协调**的职能，如计划和协调地方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提供满足物质、教育、文化和公民其它需要的服务；②社**会政治**和**管理**的职能，如那些与法律的执行、合法的权利和生态有关的事务；③**保护**和**监督**的职能，如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维护法律和秩序，以及进行社会控制。

就像一个企业一样，一个公社对直接参与来说太大了。因此，公社很自然地被分解成若干个街区。一个街区负责儿童的看护、基础教育、基本的医疗服务、购物、娱乐设施和其它对日常生活环境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街区不是政府的一个单位，就像经济单位不是一个企业一样。它没有立法权。它是自我管理的最低层次。街区选举非专业的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来负责照顾永久性的地方利益。街区委员会的主席同时是街区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他也是公社议会的成员。同样地，公社议会的主席同时也是共和国议会的成员。两个议会的其他成员由分别的选举产生，成为议会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各自的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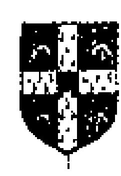
① 在世纪之交，克罗地亚的地方管理包括划分为 7 种类型的 30 组活动。半个世纪之后，它提供 12 个种类的 250 组活动（一般管理、经济、金融、城市规划和建设、教育、文化、健康、社会政策、劳动关系、公共服务、警察、和保卫）。(Pusić. *Lodalna zajednica*, Zagreb: Narodne novine, 1963, p. 101.)

共和国议会主席，和联邦议会主席一起，组成联邦主席团。[①] 主席团像国家的集体领袖一样工作。它的一个可能的职能是处理被声称是“局部问题”和不能用正常的程序解决的问题。这组成了保护地方和少数人利益的另一种手段。主席团不是靠投票而是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进行决策。在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宪法法院可以作为仲裁机构发挥作用。

* * *

以上描述的制度体系的目的，是在宏观层次上试图解决自我管理企业的组织结构在微观层次上碰到的相同的双重问题(见第 8 章第 3 节)：即与效率最大化对民主最大化。在这里，民主最大化意味着功能上和地域上的分权，以及对任何有能力的个人的机会开放。效率最大化意味着“强政府”，即在各个层次上行政职能的自治，和专业化的市政服务。此外，控制制度的设计使得行政或政治权力的滥用最小化。

① 如果共和国的数目太多，主席团可以建立在轮换制的基础上，一个共和国离开、而另一个共和国进来。



第 11 章

公民平等：社会主义的民主

第一节　政　党

我们已经指出，现代的政治制度有几个组成部分。它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国家——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讨论过了。它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政党——是本章研究的主题。

政党是公民组织起来的、以获得国家政权为目的、以反复的选举为手段的协会。这个定义包含了三个不同的制度：（世俗的）国家、国会和普选权。政党是相对较新的社会现象。贯穿历史，人们总是把自己与为政权而斗争的团体联系起来。然而，这些派别不是政党。只有存在上述提到过的三个制度中的一个或另一个——也许是所有的三个都存在，政党才会出现。

世俗国家在古代并不存在，甚至连这个概念也没有人知道。罗马法并没有产生一个合适的关于国家的概念。Civitas（公民）和 res publica（王政）分别表示世俗的和宗教的两个总体。罗马皇帝和东方的君主"是以最基本的宗教的权威和宗教的合法性一起来支撑的。"[①] lo stato（国家）这个术语只有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后才开始使用。尼克罗·马齐亚维利（Niccolò Machavelli）被认为是把这个词介绍到政治学的著作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 država 这个词，可以追溯到 14 世纪塞尔维亚皇帝杜斯翰（Dushan）抄本的第 39 段。

国会的前身是 14 世纪和以后的社会等级会议（在法国，称为 états généraux；在西班牙，是 cortés；在波兰，叫做 seym）。三个参加社会等级会议的阶级是：僧侣、贵族和资产阶级（居住在有城堡的市镇里）。在斯堪的纳维亚，在封建势力大大削弱的地方，自由的农民代表第四个等级。绝对的君主制度的发展暂时停止了社会等级会议的活动。在法国，从 1614 年一直到 1789 年，等级会议才重新召开。但是，当国王在 1789 年被迫召开等级会议时，革命已经开始了。在革命的过程中，旧的社会等级会议变成了在普选权基础上选举的国会（1792 年）。

在美国，独立战争导致了国会的建立。在英国，国会甚至在革命之前就存在，宣称它对君主的至高权力，但在革命之后才掌握了立法权。在 1688 年，国会在决定君主的继承权上建立了自己的权威；在 1707 年，安妮公主最后一次拒绝批准法律。国会逐渐地在欧洲的其它国家也建立起来了，但建立的过程非常缓慢。比利时在 1831 年引进了国会制度，丹麦和荷兰

① C. J. Friedrich, *Man and His Government*, New York: McGraw-Hill, 1963, p. 549.

在 1848 年。瑞典在 1866 年以国会代替了原来的社会等级会议。1888 年在塞尔维亚，1890 年在日本，也建立了国会制度。

一旦国会创立起来，国会的议员就倾向于形成具有相同政治观点的集团，这直接反映了他们的物质利益。这些国会的集团就是现代的政党的先驱。随着国会的建立，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于 1679 年左右在英国出现。前者是从苏格兰君主制的反对派那里得此名称的，他们赞成提高国会的权利和支持城市和商人的利益。后者因赞成天主教教义和传统的君主制而得其名，他们是一个宫廷党，受到大多数土地贵族的拥护。托利党在 1824 年为保守党所接续，辉格党在 1832 年被自由党所接续。后两个党分别继承了前两者的政治传统，并且今天仍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

历史上第二个派对的政党，其中的一个生存到了今天，是美国革命的产物。它们是：共和党（后来改名为民主党），它认为应当严格地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和它的反对派，联邦党。几年之后，作为法国革命的产物，第三个派对的政党出现了。雅各宾党，因在圣·雅各宾修道院集会而得其名，代表着激进的中产阶级；吉伦特党，因法国南部的吉伦特地区而得其名，包括作为其成员的富人及支持者。在日本，在革命之后的几年里，出现了为宪法、代议制和个人自由而斗争的政治协会。几年以后，在 1881～1882 年，三个日本政党第一次诞生了。

在法国，革命之后出现了复辟。在英国，革命的步伐开始放慢。因此，在 19 世纪的上半叶，议会民主相对在美国发展起来。在 18 世纪末，英国仅有250 000公民选举进入下议院的

代表。在19世纪的上半叶，法国的3千万人口中，有选举权的仅有200 000人。这样受到限制的投票权未能产生对选举组织的需要。如果创立了选举委员会，它通常在选举之后被解散。地方的显贵们仍然控制着他们的选民，而无论他们在议会中做些什么。上层社会的名流们彼此互相熟悉，用不着特殊的计划或组织来保护他们的阶级利益。然而，在美国，情况却有所不同。选举委员会必须挑选候选人和在选举中进行鼓动。此外，政治的肥缺制度巩固这种结构。一旦选举委员会成为永久性的、一旦选举委员会涉及到全国的规模，和一旦它与议会的集团建立了联系，羽毛丰满的现代政党就诞生了。

在欧洲，工人们组织起工会和合法的或半合法的政治组织，向上层阶级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一个又一个地消除了选举权的限制。这一过程在第1章第1节中已经描述过了。在这里，随着选举权的扩大，永久性的选举委员会作为支持和鼓动的工具也成为必要的了。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很快就发现，他们与那些掌握权力和财富的人斗争的惟一武器就是有效的政治组织。在19世纪的下半叶，两个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很快就合并了，并且为全世界的社会民主党树立了典范。以这样的方式，大规模的政党诞生了。

在政治进化的链条中，还有一个遗留的链环需要提到：共产党。如果统治阶级不愿意做出让步，渐近的社会改革就不能进行，只有以秘密党的形式才能组成政治上的反对党。这是沙皇俄国统治下实际发生的情况。为了生存，秘密党需要严厉的集权化、严格的等级制和独裁式的领导阶层。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组织其政党的方式和成功地夺取政权的原因。新的革命创造了新型的政党：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成功，和与此相对照的

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可耻的行为，产生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创建共产党的强大推动力，并成立了共产国际。共产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这个原则在实际应用中意味着，下级严格地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但这总是仅仅就同一等级级别而言的；选举包括对上级机构选拔的候选人的认定。基本的意识形态是卢梭的信条：只有在完全屈从于集体的意志时，人们才能发现他们的自由。这个信条被国家主义的附加物稍微修改了一下：集体的意志是由党来决定的，党掌握了历史的规律，党单独被授权领导劳苦大众奔向美好的未来。①

一旦政党存在，政治制度就包括几个为政权而斗争的党，包括两个政党，或只有一个党；可能有公开的反对组织，也可能没有；可能有对政权的真正竞争，也可能没有。各种各样的关系总结在表 11 中。

经验表明，涉及到联合执政的多党制倾向于不稳定；两党制或一党制是稳定的。原因在于政治斗争的动力学。为了在多党制中吸引选票，每一个政党夸大了它与最靠近的政党的区

---

① 掌权的共产党的非民主的实践和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最初传统毫无关系。但是，早期的社会民主党已经播下了未来不幸的种子。罗伯特·米切尔的批评将在以后引证。这里，我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中摘几段话。当左翼反对派被从丹麦社会主义党中驱逐出去时，恩格斯写信给特利尔说（1889 年 12 月 18 日）："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324 页）。当党的领导层对"青年反对派"采取行动时，恩格斯在致左尔格的一封信（1890 年 8 月 9 日）中指出："党已经太大了，在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帝国最大的党的存在不可能不在党内出现许多各种各样的派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435－436 页）。这当然与斯大林坚决主张的"完全的一统"是直接对立的。在联系到党的领导人拒绝刊登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时，恩格斯在写给考茨基的信中说（1891 年 2 月 11 日）："另外，还要使人们不要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做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8 卷，第 33 页）。

表 11

政党制度的分类①

<table>
<tr><td>单一中心或多元中心</td><td colspan="2">多元中心的政党制度</td><td colspan="3">单一中心的政党制度</td></tr>
<tr><td>每个选区的竞选政党的数目</td><td colspan="2">几个</td><td colspan="3">一个</td></tr>
<tr><td>存在或不存在着制度化的反对党</td><td colspan="2">政治反对党</td><td colspan="3">不存在政治反对党</td></tr>
<tr><td>为政权而真正竞争</td><td colspan="2">真正的政权竞争</td><td colspan="3">不存在政权的真正竞争</td></tr>
<tr><td>统治多数派的政党成分</td><td colspan="2">本质上联合执政</td><td colspan="3">不需要联合执政，政府建立在一党的多数派基础上。</td></tr>
<tr><td rowspan="2">政党制度</td><td rowspan="2">多党制
A</td><td rowspan="2">两党制
B</td><td rowspan="2">支配党制
C</td><td colspan="2">一党制</td></tr>
<tr><td>D</td><td>E</td></tr>
</table>

例子：A：某些罗马国家、瑞士、荷兰。

B：某些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澳大利亚、西德。

C：墨西哥、印度（以前的）、瑞典（持续了 44 年）。

D：坦桑尼亚。

E：国家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

别。每一政党倾向于借助于某一个特殊的集团、民族或宗教的仇恨势力而形成，国家处于四分五裂之中。在两党制下，政党

① 我是从波兰政治科学家杰斯·华特（Jerzy Wiatr）那里借用了这种分类，但在以下两个方面做了修改：我增加了“竞选政党的数目”这个分类特征，而去掉了他的“霸权党制度”（就像在波兰一样，形式上存在几个政党，但没有合法的反对党）的分类，因为它与一党制没有什么分别。（J. Wiatr, “The Hegemonic Party System in Poland”, in E. allard and S. Rokkan, eds., *Mass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0, pp. 312－321, espec. P. 318）

避免了极端的争议，诉诸于各种各样的社会集团，为了获得政治阶层的中间力量的决定性选票而强调共同的基础。严格地说，当意见是一致的时候，这被认为是真实的。如果社会分裂成尖锐的两极对立，这意味着意见的分布是双边模型的，那么，两党制就会使冲突变得更糟。在一党制中，党宣称代表社会的共同利益。如果它容忍公开的讨论，如果每一个席位由好几个候选人来竞争，一党制仍然可以是非常民主的。最后，除了一党制以外，独立的候选人在形式上没有被禁止职掌政权，但是，资助竞选活动的昂贵的成本使这种可能性比理论上的可能性小得多。① 党的选择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各个候选人的个人素质没有太大关系。② 即使这不是关于政治实际的正确描述：正是党的领导在作秀。③

上述描述的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非常相似。用经济的术语，我们可以说寡头、双寡头和垄断。用相当简单的分析就能证明，第一个制度是不稳定的；而最后一个制度虽然稳定，但

---

① 对一个议会席位的竞选很容易花上15 000～25 000美元，一个参议员的竞选活动的成本是50万美元以上。（R. A. Dahl and C. E. Lindblom, *Politics, Economics and Welfare*,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53, p. 315.）1966～1968年，在康涅狄格州，竞选众议院议员的成本是53 000美元。尼尔森·洛克菲勒在1966年竞选纽约州州长时，花费了5百万美元。理查德·尼克松在1972年的总统竞选中，花去的捐赠的3740万美元和贷款的160万美元（C. Anderson, *Statecraft*,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77, pp. 157－58）。约瑟夫·拉潘列巴里（Joseph LaPalombara）在评价现代的竞选时指出："在美国，对公共职务的竞选成本已经达到了天文数字……所以在每一个有当总统抱负的人中，有男用服装商像哈里·杜鲁门，有几个亿万富翁，像约翰·肯尼迪或阿维莱尔·哈里曼。也有不那么富有的、但穿着考究的野心家，像理查德·尼克松。一大群富有的支持者站在背后时刻准备着把美元变成选票——有时借助于臭名昭彰的违法行为。（*Politics Within Nation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74, pp. 486－487）

② 在英国，议会候选人的个人成就和人格魅力仅仅影响到每个选区的500张选票。（H. R. Winter and T. J. Bellows, *People and Politic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77, p. 160）

③ 贝特拉德·德·朱文纳尔（Bertrand de Jouvenel）指出："两个或三个为最终获得人民的选票的候选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由'内部领导阶层'挑选出来的"，他强调说："让人民自己来不加限制地挑选候选人，这种情况是完全不可能的。"（Reine Theorie der Politik, Berlin: Luchterhand, 1967, p. 149.）

是不需要的。第四种理论上的可能性——有许多买者和卖者的完全竞争和一种没有党作中介的政治制度——在历史上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能的。

然而，资产阶级的创立之父们——让·雅克·卢梭、亚当·斯密和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所想到的恰恰就是这样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像卡特尔一样（不用说垄断了），政党限制了自由的选择和导致了低效率。创立之父从来没有想到过政党，也没有在他们设计的民主制度中为政党保留任何的位置（虽然出自于不同的理由）。第一个宪法并没有提到政党。利益集团或政党与其说提高了促进公众利益的机会，不如说提高了促进某些特殊利益的机会。对政党反感的情绪如此之强烈，甚至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许多议会还禁止直接涉及政党。在政治理论中，代表被认为是隔绝的和独立的，恰似在经济理论中，企业被认为是隔绝的和竞争的一样。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异化的政治和经济的力量支配了社会。

第二节　政治角色的更新：选举

党的出现代表着对自由的民主理论的失望，就像不完全竞争和非充分就业的均衡代表着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失望一样。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罗伯特·米切尔，一个德国的社会学家和前社会主义者，就对党组织（和工会）提出了经典式的批评。米切尔研究了他自己所属的社会民主党，该党在当时可能是最民主的大党。他观察到，在一个组织内，那些处在下属地位的人不能有效地控制那些掌权的人。理由是：①技术上的原因：因为在大组织内的劳动分工，某些个人被授权

以代表组织的名义行事，成为专业的领导者。②心理上的原因：一种需要对普通成员进行指导和领导的普遍的感觉，和对那些指导他们的人心存感激的感觉。①

塞蒙·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在评论米切尔的“寡头政治铁律”时——这当然不是什么“铁律”，而是一种极大的可能性，列举了三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大规模组织的官员具有近乎垄断的权力：

(1)他们控制着信息的来源，这可以用来使他们的计划得到同意；

(2)他们控制了与成员进行交流的正式的工具，如新闻出版、旅行和组织会议；

(3)他们有高超的政治艺术，比非专业者更精通于演讲、写作和组织集体活动。②

由于失去了对他们的组织的统制意味着失去了他们作为个人的重要性，所以，当领导们面临着对他们的权威的威胁时，他们变得极其赋有攻击性。任何民主的权力很容易被压制下去。当涉及到强大的和邪恶的反对派和经常存在的敌人造成的损失时，这种态度有了辩护的理由。对领导的批评意味着对组织本身的背叛，因此，是对其应该为之服务的理想的背叛。

米切尔本人的结论是：在一段时间内，领导赢得了他们要求的对他们自己是必不可少的承认，并且投身于巩固他们自己

---

① *Political Partie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49,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11 under the title Zur Soziologie des Parteiwesens in der modernen Demokratie.

②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8, pp. 413, 415. 弗兰克·戴博（Frank Deppe）和他同事们几乎用相同的语言这样描述了在西德的工会和社会民主党：(a) 决策权威的集中；(b) 官员成为资产阶级化的趋势；(c) 工会和党的新闻集中；(d) 操纵代表大会，这成为舞台表演；(e) 金融权力的集中。（*Kritik der Mitbestimmun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69.）

的权力地位的活动中。很快地，他们就把组织和他们在其中的角色看得比组织宣布的目标更重要。米切尔因此准确地预言了，在半个世纪之后，被委婉地称之为“个人崇拜”的这种极端的现象。

政党也许不是非常需要的。但是，如果我们无法摆脱它们，如果政党是“现代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政党能够干些什么。这种观点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是盛行的。在西方，表述得更直截了当：“政党是人民和代议制政府之间的必不可少的桥梁”①；或者“如果存在着任何像代议制一样的东西，政党就是必要的，因为意见必须被组织起来。”② 在东方，共产党的角色完全等同于社会主义。至今还没有一个可以接受的、并被经验验证过的关于政党职能的理论。西方的有关文献提出，政党有四个主要的职能。

1. **政治社会化：整合**。在传统社会里，一个人的地位是由他出生时所属的身份预先决定的。他与领导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在现代社会中，预先决定的附属关系并不存在。一个公民，“面对国家这个陌生的、他无法理解的非人格化的实体，是无助的和迷茫的，对此，他感到他只是一个可怜的臣民。人要想属于任何一个有意义的国度，他就必须属于该国度中离他最近的、更被他所理解的和比中央行政权力对他的影响更具约束力的那些组成部分。”③人们可以顺便评论道，在最迫切地需要国家一体化的社会里——在必须创建对国家的认同和共同体

---

① G. M. Carter and J. H. Herz,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65, p. 108.

② R. Rose, *The Problem of Party Government*, Harmondlsworth: Pelican, 1976, p. 1.

③ Ithiel de Sola Pool, “The Public and the Polity”, in I. De Sola Pool, ed.,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McGraw-Hill, 1967, pp. 22–52, quote from p. 35.

的地方，政党制度似乎是最支离破碎的，党是作为瓦解的力量来行事的。

2. **政治的社会化：反对。**经验研究表明，儿童——尤其是在当代西方文化下——不反对权威。他们必须学会如何这样去做。他们是通过政治的社会化来做到这一点的。另一方面，如果个人没有被教会和平地解决他们之间的争论，利益的冲突就会导致混乱和暴力。德·索拉·普尔再一次为我们提供关于这种观点的很好的说明：

> 一个稳定的国度由于其内部的忠诚的中介集团的存在得以促进。陛下的忠诚的反对派与其说是不稳定的因素，不如说是稳定的因素。对于反对派的政治角色来说，不同意见的表达远没有指导人民应该如何表达他们的不同意见和束缚他们按照这些规则玩游戏来得重要。一个没有培育出由子集团来控制社会成员的次序紊乱的社会比一个鼓励多元化的对各种各样的中介组织忠诚的社会更加肯定地走向骚动。①

3. **利益的代言人和集合体。**加布雷尔·阿尔蒙得（Gabriel Almond）把利益代言人定义为个人和团体对政治决策者提出要求的过程，把利益集合体定义为将要求转变成为一般的政策选择的过程。“所有类型的政治制度都过分依赖政党：极权主义社会把政党作为支撑的工具，民主社会把政党作为发言和表达总体需要的渠道，在过渡性的社会里，政党是创造和构建新的

① “The Public and the Polity”, p. 39.

行为规范的机构。"[①]

4. 政治选拔。很明显，为了在政治职务上有合适的候选人可供挑选，特别是有可供挑选的领导和组成的政府，必须存在着某些特殊的公民团体。

由于在这方面没有进行过经验性的研究，上述列举的4个职能必须被认为是规范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在政党进行社会化、作为利益的代言人和集合体以及帮助对政治职位进行更新这些职能方面，可能没有不同的意见。然而，政党对所有这些职能是否能做得很好，甚至它是否在这些方面扮演一个中心的角色，却是令人怀疑的。拉潘列巴里把政党的政治社会化和教育、以及利益代言人和集合性的职能归结为立法。[②] 至于整合的职能，安瑟尼·金（Anthony King）注意到："如果普遍存在着对政党的反感甚至冷淡，政党与其说执行了积极的整合职能，不如说执行了恰恰相反的职能。"[③] 至于利益的集合体，同一个作者指出，这个职能"由多种结构来行使，政党只是其中的一个；并且不是最重要的一个。"他的结论是："看起来政党最有能力做的事情就是，呈现给选民以高度普遍化的纲领和对一般政策立场承诺的替代的候选人。"[④] 在涉及到领导更新的地方，至少在美国，"不用说高级职业官僚，对内阁官员、军队长官和利益集团的领导的选拔，经常与他们所属的党派无关，并且通过与政党毫无关系的程序选出……即使联系到选举

① G. A. Almond and G. B. Powell, *Comparative Politics*, Boston: Little Brown, 1966, p. 117.

② *Politics Within Nations*, pp. 154－161.

③ "Political Parties: Some Sceptical Reflections", *in* R. C. Macridis and B. e. Brown, eds., *Comparative Politics*, Homewood, Ill,: Dorsey Press, 1973, pp. 233－251, quote from p. 239.

④ Ibid., pp. 249－250.

官员的更新，党的角色也是令人怀疑的。”[1] 在美国，党不组成政府。在瑞士，更是如此。甚至在英国——普遍被认为是政党政府的典范，按照理查德·罗斯的观点，“政治制度与其说是党政府，不如说是行政政府。”[2] 总体上说，记录似乎没有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如果政党表现得如此之差，人们可以会问，为什么它会存在？答案是：因为它的主要职能与学院式的政治理论指派给它的职能毫无关系。政党的主要职能是以有秩序的和一般被接受的方式引导政治游戏，以支持和保存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使其合法化。对于这个职能，它执行得特别的好。它使非民主地选择出来的精英们之间的竞争这种被叫做和被认为的民主成为可能——不仅如此，这就是所谓的民主。

在国家主义的版本下，单一统治党的职能有所不同。杰斯·华特描述了波兰共产党的下述职能：

> (1) 党代表和表达作为整个政治制度基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决定构成我们国家政治和社会政治机构职能基础的基本目标和价值。
>
> (2) 通过在国家机构和社会组织中的党员活动，党协调这些机构的功能与制度的基本目标相一致。
>
> (3) 党决定国家机构决策的一般方向。
>
> (4) 党动员若干公民参与各级政府的政治决策。
>
> (5) 党选拔和教育在党内和在国家机关工作的政

---

① Ibid., pp. 243.
② Quote in ibid., p. 246.

治领导干部。①

资本主义社会和国家主义社会中的政党职能——假定它们是真正执行的职能——在多大程度上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关？我们需要政党吗？② 让我们按照上面提到的顺序逐一检查这些职能。①如果从幼儿园的儿童时代起就开始进行把个人整合到自我管理的结构中去，就不存在个人感觉到隔绝、迷茫和无助的危险。如果国家是可以接近的和可以控制的，它就不再是一种异化的权力，不再是神秘的和不可接触的。②每天的参与活动可以比在寡头政治组织的指导下更好地学会反对。③除了已经存在的机构：新闻出版和其它的大众传媒、研究机构、大学、政治协会（像费边社）、专业团体，以及，当然了，自我治理的合适的机构，利益代言人和集合体不需要附加的机构。我们剩下了，④政治选拔这个惟一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就国家主义的情况而言，华特描述的前4项职能可以适当地属于各个层次上的议会，因为作为无阶级社会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照顾所有的人民，而不是照顾某个特殊阶级的人民。第五项职能在资本主义的情景下也是一样的，它是我们要研究的下一个问题。

---

① "The Hegemonic Party System in Poland", in Allard and Rokkan, *Mass Politics*, pp. 317－321. 纳基丹·帕西克（Najdan Pašić）识别了作为国家机器组成部分的苏联共产党的三个职能：(1)党为国家管理选拔官员；(2)它直接控制所有的国家机构的活动；(3)国家机构所有的重要决策由党的相关机构的相关的决策先行提出。（*Uporedni politički, sistemi*, Belgrade: Institut za političke stuije FPN, 1976, p. 199.）

② 在我们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之前，有两个实际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美国接近三分之二的超过5 000名居民的社团举行非党派的选举。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候选人更依赖于企业的捐献，虽然可以获得党的金钱。（T. N. Clark,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Decision Making*", in T. N. Clark, ed.,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Decision Making*", San Francisco: Chandler, 1968, pp. 91－128, espec. P. 108）在瑞士，联邦政府是在非党派的基础上选举产生（虽然议会不是）。

在这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建立两个普遍的原则：

(1) 为政治机构选拔候选人是选举人的特权，而不是党或某些中间组织的特权。

(2) 候选人必须直接接近选民，就像任何一个生产者在公开竞争下可以申请任何工作一样，任何公民在自由的、秘密的和直接的选票下可以申请任何的政治职务。社会财产意味着平等地接近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民主意味着平等地接近政治职位。

第一个原则要求为选举人提供合适的信息。第二个原则要求政治竞选由社会之外的基金资助。虽然这两个原则没有被发展成为一种完整的制度，但它们都已经被付诸于实践了。[①] 记住这两个原则，可以沿着下面的路线来组织选举。宪法和法律详细地规定了每一个候选人必须符合的正式要求（如规定的年龄、公民资格、精神健康状况和没有犯罪记录）。未来的候选人从选拔委员会那里获得证明他们合格的资格证书，然后，以标准的形式，在相关的报纸上公布他作为政治工作者所能提供的服务。如果他得到的签字达到了要求的数目，他的名字将被列人候选人的名单中。所有通过了签字测试——初选的一种形式——的候选人被要求回答由选拔委员会设计的选举问题。他

① 超党派的信息通报的一个例子是《华盛顿晨报》，一个报纸；和“妇女选举人同盟”，一个为促进政治责任的组织，它们一起公布带有关于候选人和他们所渴望的职位的信息的选举指导。在1974年的选举中，众议院的候选人被要求回答下面三个问题：“1. 对于你作为一个合格的代表，你具有什么样的特殊的素质、文化或经历……？2. 哥伦比亚地区现在有一个选举的市长和市政委员会，你如何看待下述问题：(a) 哥伦比亚地区代表团在议会中的角色和 (b) 议会地区委员会的角色？3. 你将在议会中发起和支持什么样的行动来解决哥伦比亚地区最迫切的需要？（“Electoral Guide”, *Washington Star – News*, October 24, 1974, p. 2）至于谈到资助，德国可能是第一个为竞争的政党系统地提供公共资助的国家。在挪威，如果会议遵守规定的程序，国家支付提名的费用。在坦桑尼亚，存在着单一党，但在每一个政治职位上有许多候选人，在初选中两个最成功的候选人的竞选由公共资助。

们的回答，与相关的信息一起，发表在《**选举指导**》上。最后，在大众媒介上给予每一个候选人以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他也被给予在公共组织的大会上向听众进行演讲的机会。如果仍然存在对一种特殊宣传工具的需要，选择由抽签来决定。那些赢得最多数选票的人当选。如果选票太分散，需要在两个最成功的候选人之间进行再次投票。其他几个从名单上淘汰下来的代表似乎仍然需要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他们可以形成一个代表团，一个对选举代表提供咨询和为选民提供联系的积极分子的团体。第二名最成功的候选人可以作为副代表而活动。

描述的这种程序严格地限于公民议院的选举。就生产者议院的情况而言，选举可以是间接的。可能仅仅从工人委员会的成员中间选择候选人。在这里，代表团，再加上选举代表，可能也是需要的。

立法者的选举只是工作的一半。第二部分工作是控制他们。代表不能被转变成由选民的主要决定束缚的代表，因为这将使在议会中达成一致成为不可能。他们必须当场自由地做出选择。事实上，没有党派对本党议员的投票命令，对达成一致是有利的。不应该用另一种形式的投票命令来代替党派的投票命令。但是，如果代表不能代表他们的选举人，就应该停止他们的代表资格。正是选举人对他们的代表的行为进行评价，如果他们感到不满意，他们应该有能力撤换代表。①

公民也可以直接地控制和参与立法。这是通过全民公决和人民的主动性来实现的。宪法的采纳或宪法的修正必须义不容

---

① 马克思在关于1871年巴黎公社的演讲中宣布，代表不是政治领导人，而是公众的仆人。选举人应当以任何雇主挑选他的工人、工头和会计的同样方式来挑选代表。

辞地经过全民公决。只要一定数量的公民或公社或共和国提出要求，就可以对一项可供选择的方案（关于一个法律或一个条约）进行全民公决。以同样的方式，一个新的法律可以从下面提议创立。[1] 撤换、全民公决和主动性是公民控制和直接参与政治决策的三个工具。

这就完成了对政治体系的制度设计。人们可能提出相关的问题。它可行吗？与此种制度相关性很大的瑞士人的经验证明了，它是可行的。由于政治不再能控制或很少能控制国家的权力，它被剥夺了耀眼的光环。政治活动变成了社会分工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此而已。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政治权力可以有效地被分散化和分权化。然而，这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自我治理有它自己的危险。其中的一个是平庸化。瑞士被描述为 volkommen Mittel－mässigkeit（彻底的平庸）——瑞士人自己却喜欢这些的描述。另一个与平庸相关的危险是保守主义。[2] 当我们有了关于这些问题的更多的经验时，我再进一步分析它们。对我们的目的而言，只要注意到这两个危险比目前的权力集中的威胁要小得多就足够了。

---

① 这种全民公决和主动性的制度在瑞士得以实施。在那里，公民每年就10至18个政治问题进行全民投票。参与的人数达到50%和60%（E. Gruner and B. Junker, *Bürger, Staat und Politik in der Schweiz*, Basel: Lehrmittelverlag, 1968, pp. 114, 116)。卡尔·弗里德里希这样评价瑞士人的经验："全体选民反复地拒绝那些为特殊的利益集团设计的宪法和立法措施，说明了全民公决是一种整合的机制"。(*Trends of Feder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Pall Mall, 1968, p. 152)

② "甚至在（*Volksbegehren*）实行的第　年，全体人民明显地比议会中的精英们更倾向于保守"（Gruner and Junker, *Bürger, Staat und Politik in der Schweiz*, p. 119)。在一个对十个国家的评估中（瑞士没有被包括在内），瑞典似乎是其中的政治制度最民主的国家（R. A. Dahl, "The Evaluation of Political System", in de Sola Pool,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pp. 166－181）。对瑞典1974年的政治生活的调查揭示了，每一个议会政党的支持者，包括左翼和右翼，都比他们各自的领导人更加保守。南斯拉夫公社的公民比地方政府机构的官员更加保守（E. Pusić)。研究显示出，精英们为了提高他们的权力而从事改变，主动的政治参与将政变态度，和最后的结果将证明是现存条件的反面（Vesna Pusić)。

第三节　参与对自由主义和集体主义

反映了自17世纪以来资产阶级秩序的政治哲学建立了一个典型的关于人的双重概念：一方面涉及到效用，另一方面涉及到人的能力。第一个方面把人视为要求得到满足的欲望束，第二方面把人视为寻求得到发挥的自觉能力束。政治民主的任务是，为后者提供最大的活动范围而使前者最大化。很明显，只有用不同的方法才能实现这个任务。两种不同的方法从一开始就产生了。一种是个人主义，另一种是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来源于自然权利的概念。每个人被授予这些自然的权利，应该以他所愿意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社会不得干预，至少，必须使干预最小化。这些思想与约翰·洛克联系在一起，他所考虑的是一个相对较小的、高度限定财产公民权的特权公民的社会。在一个大的、所有的公民都有民主权利的国家里，无拘无束的个人主义行不通。所以，卢梭用“公共意志”的集体主义的纪律代替了个人主义。国家自然是普遍意志的工具。那些持不同政见者是叛徒。洛克的个人主义导致了18世纪的寡头政治。卢梭帮助准备了法国大革命。马拉在1788年的第一个俱乐部中向激动的听众宣读《社会契约论》，在巴黎公园即兴演讲。卢梭的集体主义很快地就在雅各宾恐怖中得到了实行，并且，在一个世纪多之后，出现在斯大林恐怖中。不是在极端形式上继承了这两种主义的是现代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现代官僚

集体主义。[1] 前者为之辩护的逻辑是：由于个人是自由的，所以，个人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自己。后者宣称：由于我们都是平等的，个人的命运掌握在他的手中。这两种意识形态的谬误太明显了，以至于不需要评论。

当代资产阶级的和官僚的政治制度明显是非常不同的。然而，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都是精英统治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它们都是建立在每个社会都分为精英和群众这样一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的。群众是无能的、迟钝的、蛮横的、不可靠的和被动的。群众的被动性甚至被认为是西方的民主制度良好运行的前提条件。东方的政治制度更进一步：群众放弃任何的主动、仅仅成为被动的还不够，他们必须成为是"积极地被动的"，即他们必须支持领导人做的每一件事情，并且总是赞美领导的英明决策。既然变成了群众，他们就需要有主动精神和创造性的领导。西方的理论把领导归结为精英，东方的理论把领导归结为先锋队政党。

传统的理论把精英视为民主的一个主要危险。现代理论把精英当作是民主不可缺少的。这两种观点的区别显然不是认识过程的结果，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与封建主义相比，资产阶级在政治民主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它也遇到了由精英

---

① 考虑一下《社会契约论》中两段著名的话："为了使社会契约不至于成为一纸空文，它就默契地包含着这样一种规定，只有这一规定才能使其它规定具有力量，即任何人拒不服从公共意志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共意志。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因为这就是每一个公民都有祖国从而保证他免于一切人身依附的条件"。（第 1 卷第 7 章，着重号是加上去的）"……公民也不应当自己判断法律所要求他去冒的是哪种危险；当君主对他说：'为了国家的缘故，需要你去效死'，他就应该去效死；因为正是由于这个条件他才一直都在享受着安全，并且他的生命也才不再单纯地只是一种自然的恩赐，而是国家的一种有条件的赠礼。"（第 2 卷第 5 章）把"公共意志"读做"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不是"所有人的意志"，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你就得到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始终宣传的思想。但是，卢梭也清楚地是——可能主要是——真正的民主理论的代言人。

的存在而设置的障碍。正如拉斯维尔指出的，如果精英和群众的划分是普遍，人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对精英的结构施加某些限制。因此，具有了以下的条件，民主才能实现：①选举人能够在竞争的精英中间进行选择；②不能通过给予精英世袭的权力而使他们自我复制，新的团体能够进入他们的行列；③没有单一形式的权力处于支配地位，因为支持来自于变化的联盟；④各种精英（企业、军队、公共服务，等等）没有结成一个共同的同盟。在大多数资本主义民主中，这些条件只是以非常不完整的形式得到满足。在官僚的集体主义里，大多数条件被直接地违背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将必须做的事情就是克服精英与群众之间的基本矛盾，精英的民主必须让位于以参与为基础的民主。

参与制的政治哲学已经在对正义社会的讨论中（第七章）描述过了。人被看作是创造性的自我实现的人。只有当每一个其他人都能实现最大的潜能时，人才能实现他的最大的潜能。正如已经提到过的，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还是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都意味着把公民从根本上区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领导和群众。[①] 社会主义意味着消灭了这种区分，并以参与制取而代之。如果不存在阶级，为什么要由某一个特殊的集团来统治？为什么要有一个职业领导等级？为什么"群众"不能进行自我治理？

一个政治制度的中心范畴是权力，就像一个经济制度的中

① 统治者决定目标、解释和执行规则，宣判和为政治支持而竞争。被统治者受规则支配，要求判决和希望影响立法者（H. V. Wisemen, *Political Systems*, London: Routlege and Kegan Pual, 1966, p. 131）。政党的一个基本的职能是使这种区分永久化，因为党选择领导和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提供联系（See Friedrich, *Man and His Government*, p. 518）。

心范畴是财产一样。在社会主义下，两者都必须社会化。我已经把社会财产定义为自由地和平等地使用生产资料（第八章第一节），我们可以把公民在政治方面的权力（权力在这里意味着“带有责任约束的权利”）定义为自由地和平等地进入政权的职位。这当然意味着消除了政党。由于政党为政治领导者提供了明显的好处，政党不会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① 所以，政党必须被禁止。这是不是对自由的一种限制呢？约瑟夫·熊彼特为政党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政党“是它的成员试图在竞争政权的斗争中协同行动的一个集团。”② 把“政权”这个词换成“利润”这个词，你就得到了关于一个卡特尔的定义。商人中的卡特尔组织必须被禁止，至少在法律上禁止它们，这已经成为普遍被接受的观点。然而，政治家的卡特尔组织却允许自由地运作。为什么？难道不是因为政治学比经济学对永久的阶级统治更重要吗？换言之，不是私有财产的剥夺而是政治权力的剥夺，是社会主义的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③

我们所说的“政治权力的剥夺”指的就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因而，不能把社会主义民主缩减成为一种争夺人民的选票和以获得领导职位为目标的竞争斗争——这是当前最流行的关

---

① “一旦一个代表组成政党，他的反对者也必须如此。所以，一个政党在政治上的很大好处是，在一个代议制的民主中，一个没有政党的政治家就是一个没有权力的政治家。”（R. A. Dahl, *After the Revol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283）

② J.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s., 1950, p. 283.

③ R. 达赫兰道夫（Dahrendorf）在考虑一个无阶级社会的观点时这样评论道：“设计这样一种社会是可能的，这个社会的结构包括行使不同的权威权力的职位，但任何个人集团不能经常性的和排他性地占据这些职位。……在这里，不存在有能力垄断权力职位的集团，事实上不可能形成连贯的冲突集团。这种社会或共同体就是无阶级的”。（*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7, p. 219）

于自由民主的定义。[1] 按照这种观点，一个公民的主要政治活动是选举统治者。这又是把人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一假定的证明。社会主义民主是不能够建立在私人活动领域和政治活动领域分离的基础上的。当然了，公民要投票选举代表，但这既不是主要的也不是惟一的政治活动。“在参与和自我治理的民主中”，澳大利亚政治哲学家卡若林·帕特曼〈Carole Pateman〉这样写道：

> 直接的民主和代表的民主不再被当作权利结构的两个分离的形式来对待。相反地，这两种民主被作为在一种民主权力结构中的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找到了各自的位置。……政治权力可以暂时地委托给一个负责任的代表，但这不是公民的异化。在参与制民主的实践中，公民不再需要周期性地从私人生活领域……到政治上的“拉大旗作虎皮”之间变换角色。他们不需要如此，因为他们作为实际的政治公民每天正在参与政治领域的活动。政治参与、公民的民主的职责和权利，和个人的私人活动一样，是每天生活的主要内容。[2]

---

① 一般来说，这个定义来自于经济学家熊彼特（*Capitalism, Socialism, Democracy*, pp. 242, 269)。他也观察到，在民主投票过程中，“社会职能仿佛是附带地被完成了——恰似生产对牟利来说是附带的事一样。”（Ibid., p. 282)

② C. Pateman, " A Contribution to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Democracy", paper delivered at the 1974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废除了政党[1] 并不意味着废除了政治，就像废除了卡特尔不是窒息了经济而是使市场更有效率一样。所有要做的事情是，禁止由党的首脑提名和选拔候选人。换言之，党的机器和它的政治垄断权必须被摧毁。政党的消失将不会留下一种政治的真空。相反，这会使更加紧密的政治参与成为可能。一个、两个或几个政党将被无数个政治协会所取代。至少有三种这样的协会：a. 费边类型的协会；b. 促进或原因导向的集团，如环境主义者的、女权主义者的（或男权主义者的?）、宇宙开发支持者的，和赞成社会资助的各种交通体系的；c. 代表特殊职能或其成员特殊利益的利益集团。这样的政治协会可能有以下的特征：①重叠的成员制将防止组织对其成员的完全支配。一个人不可能在名义上同时属于几个党派，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禁止他或她成为几个政治协会的成员。事实上，这是取代单一政党纲领的紧箍咒、表达多样化利益的惟一方法。一旦去除了政党的专制，真正的个人利益就会显现出来；②多元化的团体意味着权力的有效的分散；③某一个特殊的目的实现之后，或者目标改变了，或者它不再有关系了，集团将被解散。因

---

① 在说明没有政党的政治时，我当然是逆当代政治理论的潮流而动。除了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当然是受到蔑视的）和少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者（他们被认为是慈善的乌托邦主义者），很少有人宣称自己有这种“奇怪”的思想。因此，让我也至少引用一个赞同的观点。它来自米哈伊罗·马科维齐（Mihailo Marko-vic），一个并不出乎意料地与我有着同样的文化背景和相同的革命经历的人。马科维齐指出，政党“可以逐渐地被一种多元的和灵活的特别政治组织所代替，这种政治组织代表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将为每一个公民的直接参与提供无可比拟的更多的机会，将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提供计划和候选人。这种政治组织的显著特征是，没有永久性的党的机器和党的官僚。它将不再是将经济和政治权力玩弄于职掌之上的特权精英的工具。相反地，它将成为无论直接还是间接的真正的政治民主的形式”。（*From Affluence to Praxi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4, pp. 166－167）废除政党并不是非常困难的，或者需要完全破除传统。已经有许多的征兆表明政党制度的衰弱（国会外的反对派）和政党的非正统性（像各种观察所表明的那样，对党的支持率下降，对党的忠诚减弱，等等），见 J. Christiansen et al., “Political Parties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Kapitalistate*, 1977, no. 6, pp. 7－38, espec. pp. 31－32.

此，大多数集团将是短暂的——不像政党那样是永久的，所以，政治上的忠诚不再具有继承性质；④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它的许多决策中心，比传统的议会制度更有灵活性。多样化的团体产生了更恰当和更合适的议会外的解决办法；⑤由于①—④，永久性的政治结盟是不可能的——它产生的前提是人数很少和秘密交易的可能性。因此，在一段时间之后，废除政党将不再被感到是一种政治的限制，恰似在现代社会，废除了奴隶制并不被认为是限制了私人或市场的自由一样。

像任何其它的社会一样，社会主义社会将会有冲突。需要用政治手段解决冲突。这意味着利益集团和促进集团的形成。由于冲突涉及的只是特殊的问题，而与全体人民的处境无关，所以，随着问题的出现和解决，集团也将形成和消失。社会也将有自己的社会运动。但是，再一次地，这些运动将由许多组织来促进，不可能被束缚在两个或三个僵化的组织之内。一句话，政党的消失变成了克服目前普遍存在的政治被动性问题的前提，它被社会绝大多数成员——不仅仅是政治活动家——将参与的一种丰富的、多样化的政治生活所代替。

第四节　社会主义民主

劳动组织中的自我管理和共同体中自我治理并不意味着，人民必然要把他们的全部时间都用在出席一个接着一个的会议上。但是，经验显示出，可能会发生某种类型的真正危险。我们已经观察到，在企业内，对自我管理的天真和肤浅的解释如何会导致把参与等同于行政管理。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政治领域。公民可能被要求对象教育、科学和文化这样的需要很

高的素质才能理解的事务进行表决，而他们被认为是缺乏专业知识，并且经常是缺乏基本兴趣的。结果是：a. 事实上，实际进行决策的是那些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官僚；b. 因而无可挽救地丧失了对公民参与政治活动有意义的时间、精力和动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类比来说明。如果一个企业的所有者对企业管理不感兴趣，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他将做些什么？他不能避免参加一些会议，并经常被告之企业经营的效果。但是，除了这些，他将雇佣经理、会计、审计和其他人为他工作。工人委员会将做同样的事情。Ceteris paribus（其它条件不变），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公民想要在对他们特别有吸引力的职业上进行分工，只有少数人选择公共管理作为他们的终生职业。公民的合理的利益一般包括两个成份：a. 政治决策符合他们的偏好；b. 管理有效率。要实现这些，公民选举他们信任的代表和雇用行政管理工作的专业人员。他们经常对他们的代表和公务人员的表现进行评价，解雇那些被发现工作不令人满意的人。一般而论，自我治理不是指每一个公民将亲自解决他的所有问题，而是指由在他的处置下的适当的社会机构来进行工作。

上面描述的原则是简单明了的。当运用它们却是相当的困难。为此，我们需要有合适的制度体系和一系列的运行规则。权力的六种职能的分立使大部分工作在专业的基础上以有次序、熟练的和以宝贵时间最小投人的方式完成。现在，我们将通过设立民主参与的运行规则来补充阐述过的制度体系。

1. **重要性原则**。仅仅在对重要的政治事务进行决策时才要求参与。琐碎的和没有分歧的问题要忽略。何者为重要，将由它们的影响决定。这把我们带到了第二个原则。

2. 利益影响原则。每一个受到决策严重影响的人都有权利参与那个决策。落入参与范围的决策问题的数量，由于要遵守下一个原则而大大减少了。

3. 排除原则。只要企业正常地运转，调查、干预就不能进行。换句话说，大量的决策权力可以委托给代表和行政机构来行使，而不是放弃这些权力。

4. 多数原则。决策由多数票表决通过。这个原则消灭了少数人的专制，但没有消灭多数人的专制。因此，我们需要附加的原则。

5. 保护少数人原则。民主不仅意味着没有多数人或少数人的专制，也意味着在所有的人都平等的条件下少数人成为多数人的可能性。通过提供一系列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使两者得以保证。

从1776年的“独立宣言”和1789年的“人权宣言”①，到1948年联合国一致通过的“人权普遍宣言”，到1966年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②，一系列的人权已经普遍地被接受了。现在，它们代表了人类的共同遗产。这种权利不再以“自然”的权力为理由，不再从“自然”法中演绎出来。这些权利很明显是社会进步的结果，它们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觉悟。这些共同被接受的基本权利可以被分成五组。前两组权利保证了个人的完整，剩下的三组权利调节着社会的交往。它们

---

① 这两个宣言都受到了在此之前的1689年英国革命之后的“权利法案”的影响。然而，后来的法案没有打算定义出一般的人权来，它的目的是通过加强议会和法院的权力来限制国家的权力。

② 48个国家投赞成票，6个国家（国家主义国家、南非和沙特阿拉伯）投弃权票。让我加上一点：甚至像萨拉扎（Salazar）和斯大林这样的独裁者也不得不承认包括国际公约中的基本权利，至少在形式上写进了各自的葡萄牙和苏联的宪法中。

可以表述如下：

1. **个人的生命、自由和安全**。这包括解除了对隐私、家庭、住所或通信的任意干预，解除了对荣誉和名誉的攻击，这也包括在国家内移动和居住的自由，离开和回到该国家的权利。

2. **思想和意识的自由**。这也包括宗教自由。

3. **表达意见的自由**。这包括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和不受国界的限制寻找和传授任何形式的信息和思想的权利。它也包括不说和不听的权利。

4. **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这包括和平的示威和游行。

前四组权利是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结果，它们可以而且应该被并入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之中。在这方面，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之间惟一重要的区别是：在前者，权利基本上是形式上的——这些权利在实践中有利于那些掌握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人；在后者，它们也必然是实质性的。换言之，不受来自可能的行动障碍束缚的**消极的自由**应当补充以公民做他们愿意去做的**积极的自由**。高的教育程度、高的生活水平和每一个人所支配的技术设备使积极自由成为可能。

工作的权利，健康和教育服务的权利，和选择职业的权利，也普遍地被接受了①，虽然在大多数国家中这些权利是不是实质性的还是个问号。它们是经济的权利，我们在讨论生产者和消费者平等时提到了或暗示了这些权利。然而，两种基本

---

① 这些权利，加上公平工资的权利、社会保障的权利和免除饥饿的权利，受到 1966 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保护。对这些权利的承认，是当代取得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完全没有做到的一项重要的成就。人民可能会说，18 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公民权和政治权利，而 20 世纪的反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经济和社会权利

的社会主义权利显然是没有的：自我管理的权利和政治上自我治理的权利（当然，更一般的不受剥削的权利）①。原因是明显的。另一种政治权利也是没有的，值得特别提到和讨论。

5. 信息的权利。 一个公民有权获得影响他的利益的任何信息，这意味着接触他的劳动组织的文件和接触处理关系到他的事务的行政管理机构的文件。更一般地说，这个权利意味着，除了严格地说明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案件外，作为社会传媒机构的新闻界必须接触国家搜集的所有信息。新闻界和其它的大众传媒不仅有权搜集信息，而且有责任传播信息。如果公民们没有充分地和正确地获得信息，一个自我治理的社会就不能运行。

在现代社会中，大众通讯传媒是政治权力特别重要的杠杆。那些有钱人和/或控制国家的人可以有效地控制大众传媒。谁控制了大众传媒，谁就控制了公众意见的形成。思想就像商品一样，可以生产、做广告和出售。信息可以被歪曲，或者简直就是假的——或者根本就封锁信息。如果我们再加上受雇佣的教育家、作家、牧师和各种各样的宣传家的影响，公共意见可以被有效地制造出来，就更清楚了。那些挥舞着权柄的人不会不利用这个机会的。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容忍这种情况。②

如果我们总结一下散见在这一章的我们关于大众传媒的观

---

① “公民权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确禁止奴隶劳动和苦役劳动，但没有禁止雇佣劳动。换句话说，它谴责奴隶制度和封建秩序，不谴责资本主义或国家主义。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公约是这个时代的代表性文件。

② 在论述英国——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古老的和最发达的民主国家——的有关情况时，弗兰克·沃德（Frank Ward），一个工党的官员，指出：“使选民免除获得不正确的和歪曲的信息的权利必须作为一项民主的基本权利建立起来。整个社会必须能够影响舆论的内容和向它的价值观念挑战，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听任其由一个狭隘的报业所有者小集团通过精心地选拔自愿地服从他们的标准的编辑和记者来控制，或者听由网络细密的BBC（英国广播公司）和ITV（独立电视台）的机构来控制。”（*In defence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London: Rye, 1978, p. 126）

点，我们的结论如下：

①大众传媒是非政党选举的主要工具。它们在选举人和候选人之间提供了双向的通讯，作为利益代言人的工具发挥作用。

②通过暴露行政管理的违规及违法行为，大众传媒是社会控制的至关重要的机构。

③更一般地说，传媒是（非统计性的）信息搜集、传送、传播的重要工具，这也包括广告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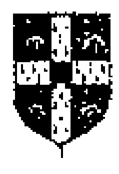
④在①—③的基础上和通过立法活动和管理实践的严格评价，媒体对公共意见的形成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列举的这四项职能使大众传媒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一个必要的和合适的制度化的角色。对这样一种制度的细节的描述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围。在这里，只要提一下它像法院一样必须不受政治控制和金钱控制就足够了。对大众传媒的社会控制是由相应的人民委员来执行的。

*　　　*　　　*

我们完成了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问题的分析。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自我治理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自我治理产生了它自己的问题和危险。正像阿纳德·泰南巴姆〈Arnold Tannenbaum〉注意到的那样，在一定的条件下，参与可能提高压迫。如果少数人的权利得不到适当的保护，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其次，政治权力的平等分配并不必然意味着偏好的最大化。选举的悖论即不是最合适的政策和候选人得到大多数选票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从基本原则通向令人满意的技术执行的

路途既不是顺畅的，也不是快捷的，特别是在社会环境下更是如此。而且，权力的平等分配——如果制度在技术上设计得不完备或者社会条件是不利的——与其说提高了不如说减少了共同体解决自己问题的权力。然而，如果说参与制存在确定的风险，它也为更大进步的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去掉了参与，这些可能性就被摧毁了。压迫性可能提高，但不是必然如此；没有了参与，绝对是压迫性的关系；甚至是在一个理想的善良的独裁者的统治之下，也是如此。偏好可能没有达到最大化，但没有了参与，偏好不可能达到最大化。技术上的效率可能下降，但不是必须如此；然而，没有了参与，就根本不可能利用巨大的发展潜力。



第 12 章

计划和市场

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无论是专家还是门外汉都普遍地认为，计划和市场代表两种互不兼容的组织形式。在这方面，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很好地表达了新古典主义学派的立场：

> 所谓经济“计划”的优越性——即它提供了关于未来的确定性——依赖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在现今控制力量的“计划”之下，个人消费者和储蓄户的选择被置身于计划者的控制之下。因此，就出现这样一种悖论：或者计划者被剥夺了他企图为之服务的社团目标的工具；或者，如果恢复这些工具，他就是消灭了

‘计划’存在的理由。①

按照持相同观点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私有的市场就意味着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产生资本主义的关系。因此，应该由国家计划取而代之。私有制只能（而且必须）由国家所有制所取代。因此，个人的自主决定要让位给国家的集中的等级制的决定。

随着我们的分析进程，将会清楚地知道，上述的悖论和无政府状态只属于意识形态和辩护，而不属于科学思维。

第一节　市场失败

如果消费者能够独立选择，他们将把自己的收入用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需要的商品和服务上。如果生产者在其经济活动中是自由的，他们将调整购买的投入量，以便使成本最小化，并生产利润最大化的那些产品。最具有赢利性的产品将恰好变成对消费者是最有价值的产品。因此，通过进一步追求他们的个人利益，通过使**私人**所得最大化，市场活动者自动地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亚当·斯密定义为“看不见的手”的那种自

① L. Robbins, *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London-Macmilan, 1932, p. 113. 威廉·卢克斯（William Loucks）在他的一本第6版的书中，把罗宾斯的悖论发展成“社会主义的不一致性”。他争辩道：“**没有实质性地干预消费者的选择自由，或者干预职业选择的自由，或者同时干预这二者**，社会主义经济，连同它的综合目标的必要选择和对这些目的的任意估价一起，将不能存在。如果选择了综合目标，个人的行动就必须服从它们；反之，如果让个人的行动自由，综合的结果就将由此来决定。”（*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1, p. 257.）卢克斯显然不知道，长达一个世纪的经历显示出，“如果让个人的行动自由，综合的结果”就将是经济周期、失业、垄断的扭曲和以反复无常的市场来代替自由选择而出现的其它的相似的不合意的结果。资产阶级的观念是不能理解这样一个常识性的结论，即为了做出预期和实现一致，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真正的自由需要对市场的适当的控制。这又是一个商品的拜物教。

由市场观点，是古典经济学说和新古典经济学说的基本的市场模式。

我们知道，现实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这种模式偏离的。偏离的原因分析起来是相当简单的。为了运转，这种模式要求活动者有确定的环境，拥有完全的信息，所有商品能及时调整并具有可分性。现实世界则是另一种情况：决策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的，信息是昂贵的，调整是相当滞后的，投资经常庞大并不可分割。其结果就是生产遭受经济周期，很多人失业，垄断和广告扭曲了价格和生产结构，经济福利则显然大大低于应有的水平。

为什么这种不可靠的模式会如此长期地存在呢？至少有三个原因。首先，它很好地满足了意识形态的需要（想一下罗宾斯！）。模式“证明”资本主义制度使经济福利最大化。第二，模式被当作一种有用的方法论工具。经济现实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分析研究时必须大大简化它。模式的构建和研究有根据的假设条件，有助于建立一门精巧的经济科学。第三，模式可以用作比较的标准。我也打算这样使用。我们将遇到与罗宾斯有所不同的悖论：即只有在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的有效运作才是可能的！让我们来着手研究一般市场的不完善和失败的地方。

1. **消费者选择不正确**。消费者的选择经常是不合理的，是按照习惯和风俗进行的，并且缺乏知识。经常举的例子有，使用麻醉毒品和酒精饮料，炫耀性消费，购买相对于支付的价格而言营养价值低的食品，等等。如果使用者必须支付医疗费用，则常常忽视健康，而是购买某些无用的消费品。只有真正的有识之士才买书、读书，推荐人们观看戏剧演出。受过教育

者才珍惜教育。莫里斯·多布指出：

> 消费者及其需要部分都是社会的产物，是由进入他的经验的商品和他在其中得到养育的社会标准和习惯塑造的。因此，在设计的发展方向中，经济政策必然设计出改变消费者需要的模式来。①

如果我们的选择是由社会决定的，那么，我们应当更好地考虑如何控制对这些决定负责的力量，就不要侈谈多么尊重个人的独立性了。

2. 生产者的选择不正确。不确定性和缺乏知识是造成意外盈利和亏损的原因。即使知道现有商品的价格，但是不知道未来商品的价格。因此，经济主体的计划是前后不一致的，从而使资源的有效配置成为不可能的事。市场力量的集中产生垄断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消费者及其它生产者的剥削。正如马克思和凯恩斯所指出的，个人所得的总和可能导致社会的亏损，比如，在总储蓄高于总投资时就会产生这种情况。如果需求赶不上现有的供应，生产就要下降，工人就要失业。治理失业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惟一的良药就是社会计划。

3. 市场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性是由产品的特殊性造成的。如果供给和需求是极无弹性的，如主要食品，略微的短缺就大幅度地提高价格；同时，略微的过剩又使价格大幅度下跌。如果生产时间长，比如橡胶、咖啡、猪肉、船舶，就会出现所谓的蛛网周期。如果产品的不可分性很大，比如在重工业，就会

---

① M. Dobb, *On Economic Theory and Socialis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5, p. 79.

出现投资周期。因此，调整价格和投资对于保持市场的通畅运作都是同样必要的。

4. 货币价格可能不存在，或者可能不适用。即使是在完全的市场中，也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有货币价格的。如果我培植了一个美丽的花园，我的邻居也能欣赏。如果我在花园里弄出某种噪音，我的邻居的满足程度就会下降。既然我们在社会中生活，我们的活动就会影响我们的同胞，而这种影响往往是不可占为己有的。有时，在真实的社会成本和货币成本之间、真实的社会收益和价格之间会产生很大的差别。空气污染、职业病、美学价值的降低可以表现在成本上，而享受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医疗保障、就业保障，则可以表现在收益上。这里也包括所谓的公共物品。如果消费者的数量增加，提供公共物品的成本通常是不增加的，或者增加得不多。或者，没有人会因为增加一个消费者的消费就必须减少自己的消费物品。阳光、灯塔和国家就是例子。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买卖交易的一般市场机制是不起作用的。

5. 技术和金钱的外部性的出现。价格在这里原则上是适用的，但是生产没有做出正常的反应，而且不受控制的价格制度会导致不经济的生产决定。静态的外部性被发现在日常生产中和新工业布局的外部经济效果和外部经济负效果中，而这些被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忽视了。例子是众所周知的。如果工业生产者在规模经济条件下生产（比如钢铁工业），其生产的提高将以成本较低的形式对工业的买方（比如煤炭工业）有利。水电站可以通过增加供水来帮助农民；由于天气的变化，它也可以是造成损失的原因。炼油厂可能破坏旅游业，而化工厂则使鱼类遭殃。在一个地方有两个互补的工厂比只有一个工厂或两

个在不同地区的工厂有更大的效益。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价格和市场都不会提供合理的解决办法，计划机构的干预是必要的。

一种特殊的、动态的外部性至今仍未被市场理论家们注意。它是任何经济吸收投资能力有限的一种结果。对某个企业来说，投资的边际效率可能是高的和正的，而同时，对整个经济来讲却是负的。当组织的限制和资源的短缺使所有其它企业的总产量的下降程度高于投资企业生产增加的程度时，就发生上述情况。没有任何市场信号提供这种信息。

6. 社会决策按其本性取代个人决策。任何经济都应做出两种十分重要的决策，但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能听任市场力量自由运行。每一种价格制度都会使收入在社会成员中间进行一定的分配，使社会产品在投资部分和消费部分形成一定的分配比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这两种情况都要求达到最优。

从以上的分析得出下列结论：a. 价格机制的职能是相当无效率的；b. 在生产领域有时不用这个机制（有错误的信号）；c. 在分配领域基本上不用这个机制（因为分配决策原则上是社会性的，而市场组织则是分散的个人决策）。这是相当难以克服的缺点。看来市场难以为社会主义所接受。当市场出现故障时，我们能做到的一切就是计划。如果是这样，我们是否应当选择计划而忘记市场呢?

回答是不。首先，选择并非是既可这样又可那样。第二，我们发觉（中央）计划也同样是无效率的（第六章）。那么，也许可以把二者结合起来——一种混合经济？它可能包括一种不需要的折衷主义。我们希望保护消费者的基本独立性，因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组成社会的个人的偏好基础上的。我们也希

望保护生产者的独立性，因为这是自治的前提。把这些因素同时予以考虑，我们就需要一个市场，但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我们需要一个不多也不少地恰好能行使刚刚表述过的这两种职能的市场。换句话说，在严格确定的重点范围内，我们需要**作为计划工具的市场**。为了使市场正确运作，应该通过计划的干预纠正市场的六种缺陷。这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计划作为有效率的市场的前提**。为了增加社会的经济福利，计划代表完美的市场选择。市场和计划并非完全互不兼容或矛盾的，相反，它们是互相补充的，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任何一方本身都不是目的。二者都是社会主义经济有关组织的手段。在以下各部分，我们将研讨如何达到这样的组织。

第二节　计划的职能

显然，经济活动在所有的层次上都必须是有计划的。对我们的目的而言，我们将局限在是国家一级的计划上。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从假定在自治市场经济中，基本经济决策单位（企业）在做出其经济决策时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开始。当然，这并不是自由放任的经济，不是盲目自发的，也不是天真地相信“看不见的手”的效率。我们在上一节已经谈过这些了。然而，这意味着，在协调劳动集体的主动性方面，计划和经济决策机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使用行政性的控制措施，使用正常的经济工具也意味着提供有关信息。我们还假定，社会计划包括专业部分和社会部分，二者是同样重要的。专业准备不足和带有失误的预测及错误分析的计划（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到处发生）是不能通过任何民主自治行为来变成有效的指导工具

的。另一方面，即使运用最现代的资源配置技术和经济计量预测模型，如果缺少社会基础（在我们的例子中，这意味着应当以与自治一致的方式被接受），计划是没有效果的。计划本身应当是参与性的。因此，我认为，在各级层次上都要制定计划，并通过协商和讨论的反复过程制定全面的计划。剩下的最后分歧由联邦议会的政治程序予以清除。

应当注意的事实是，不能把计划归结为编制计划，这只是工作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容易的），计划还包括对各种计划的监督和检查。因此，计划和经济政策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社会计划有四项基本职能：

1. 计划首先是**预测**的工具。除了标准部分，计划文件必须包括对经济运行的分析及详细的预测。极其详细公布的计划预测的目的是使生产者看到最为可能的经济运行情况，并向他们提供一切必要的信息来制定其业务政策。从事这些预测的计划局对预测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承担全部专业责任。

2. 作为预测工具的计划同时也是**协调经济决策**的工具。只有涉及国家机关的那部分计划才是指令性的，而且也只是对这些机关而言的。对任何其它机构，计划仅仅提供经济指导而已。社会计划是共同参与制定的，它包括各个地区、经济联合体、企业发展的重点协调。计划一旦制定完成，它不仅是一种可能变化的方案，也是相互同意变化的方案，这种协调越是有成效，计划完成的可能性越大。

3. 在预测可能的发展状况以及协调基层经济决策单位主动性的基础上，应该通过运用现代的经济分析方法和与所有的有关社会单位进行协商，以确定什么样的经济运行变化从全国来看是最好的。当这些确定下来之后，就应当选择相关的经济

工具，把它们的效果加以量化，使它们适合运用，以便最有效地实现提出的社会目标。这些步骤还包括另一项基本的社会计划职能：**作为经济发展的指导**工具。

4. 对于一种详细说明的经济政策来说，计划对**采纳它的单位代表着一种责任，对执行它的单位代表着一种指令**。就社会计划而言，它对联邦议会是一种责任，对联邦执行委员会及其所属的国家机关则是一种指令。这些机构必须执行议会制定的、或由劳动组织、共和国和消费者同意的经济政策。它们应为达到既定的目标负责——提高生产、增加就业、保持外贸平衡的顺差、稳定价格、提高生活水平，等等。为有助于这些目标的实现，计划机关必须掌握一系列有效工具。在正常条件下，这些机构对没有完成计划目标承担政治上的和专业上的全部责任。

我还要补充一个技术性的特点。计划要求连续性。只要有新的信息，就必须修改计划，做到最好地利用可能的机会。其结果就是出现所谓的滚动计划。如果中期计划覆盖五年时期，长期计划是二十年时期，那么，每年的计划视野将向未来移动一年，以便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五年计划的视野。在原有五年计划结束时，长期计划视野要向未来移动五年，从而为完成决策保持二十年的计划视野。

传统的选举做法同这些要求是不一致的。连续的计划要求连贯的政府，每一年或二年，联邦议会部分成员退职，同时相应数额的新代表被选进议会。按这种方式“更新的”议会保持所有计划活动的轨迹。执行委员会则在任何时候都是能适应这种游戏的。

社会计划不仅提高宏观经济效率，还为经济过程注入新的

性质。以不受控制的市场为基础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是竞争性的经济。但是，以合作和团结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是与你死我活的竞争不相容的。社会计划介入了合作和团结的空间。竞争并没有被取消，而是直接指向商品质量的改进和生产费用的降低，而不是指向把竞争对手赶出市场。不能购买竞争性的企业，也不能以其它方式将其吞并；因为企业是不会走向破产的。垄断行为是不可能的。金融权力没有很大效果，因为市场是有组织的；可靠的项目总是会得到需要的资金的。此外，充分就业、相对的稳定和快速增长，为所有人提供了相当自由的空间，所以具有走向合作和分工的强烈趋势。这本身不仅是一种社会愿望，在经济上也是更有效的，特别是与有工人管理特色的企业内部合作相联系的时候。如果比较按合作原则和竞争原则组织起来的集团的行为，经验研究指出了前者的优越性。

> 合作集团能更有效地对待难题，细微地分析人际关系问题……在合作集团的内部，个人职能有很大的差别，也就是有较多的分工；另一方面，在竞争集团中，重复劳动是大量的，因为大家都要去做必须做的事。在合作集团中，信息沟通是比较容易的……正像谢里夫和道茨对微观经济学的认可的结论所做的实验……这早就清楚了：降低集团之间紧张程度的最有效的方式是，推动个人参加到对成功是绝对重要的合作的活动中去，简单地说，合作在这里是职能性的。①

① R. A. Nisbet, "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1968, vol. 3, pp. 388 – 390, quote from pp. 388 – 389.

社会计划使合作成为职能性的，并且使工人管理与宏观经济制度合为一体。

第三节　调节机制的五种类型

经济是一个包括大量的具有滞后效应的反馈和易于波动的庞大的体系。这个体系的稳定性及其最优运作要求构建自动稳定器和运用一定的调节机制。自动稳定器要求发展制度体系和行为的规范。我们将在以后研究这个问题。调节机制涉及经济政策。本节的对象就是能够用于经济政策宗旨的调节机制。

与工程体系比较，经济是更加复杂的，因此，完全自动调节的可能性是有限的。于是，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就更大了。运用这种体系的类比是要强调，关于基本社会难题的决策一旦做出，问题的解决在客观上是有限的，留给政治协商的空间也不大。

从事物的本质看，应在整体上对体系的功能加以调节。因此，如果在联邦一级没有做出基本的宏观经济决策，共和国和公社的经济是不可能有效发展的。因为是参与制的计划，联邦的经济政策必须建立在共和国之间的协议的基础上。为了使这些协议有效，必须实行制度化。共和国之间协议制度化的一种最重要的工具就是社会计划。

到目前为止，我们探讨了市场和计划是协作和协调的两种机制。然而，它们仅仅是五种这些机制中的两种。以下将继续简要地和历史地表述这五种调节机制。事实上，按照协调经济活动机制的主导类型，就能对经济体制实行分类。

1. 历史地看，经济调节的第一种形式（在现代经济中）

是**自由放任市场**。自由市场作为一种工具，把早先的分割的封建制经济整合成统一的国民经济。原则上，国家是置于经济之外的。它的作用是保护财产，容许无限制的个人主动性。由于人们能够出售的东西是其他人愿意购买的，所以，希望获得利润的每个人，其活动就必须以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为导向。正是从这种推论中，亚当·斯密得出了他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每一个人，“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它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① 单单受个人利益所驱动，私人生产者就能生产出社会需要的、成本最低的产品。

2.“看不见的手”并没有被证明是特别有效的。我们已经提到一些理由。生产过剩和失业的周期性危机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增长是相对缓慢的（大约每年增长2%，现在世界平均增长率是5%，当代最迅速的经济增长率则是10%）。此外，有效需求与社会的需求不是等同的，事实上，它与社会需求可以明显地分开。因此，资本主义市场的社会主义批评者们把“看得见的手”当作是调节的工具。国家的主动性代替了私人的主动性，**中央计划**代替了市场。

3.三十年代初的经济大危机把资本主义的经济调节机制带到了完全崩溃的边缘。中央计划和剥夺私有制显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接受的选择。此外，把中央计划当作行政计划来设想和执行，是有严重缺陷的。逃避崩溃的出路在于，引进作为**经济政策**机构的国家，部分地对经济进行干预。我们可以把这

① A.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37, p. 423.

种解决办法称为“间接的手”。

4. 经济统计、经济分析和信息收集、加工、分布技术的发展，使经济决策者能够得到更多的相关信息，这和过去是无法相比的。如果市场代表了一个信息系统，那么，技术进步则代表了市场的完善。这种完善表现在两方面：(a) 最新的和丰富的经济统计没有任何耽误地给经济决策者提供了有关经济形势的全面的信息（而老的市场提供的是部分的和滞后的信息）；(b) 现代预测方法有可能降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这样一来，以往的**事后**决策便用**事前**决策加以完善了。这两方面加起来就意味着，经济决策者能够获得对正确决策很重要的、相当完整的数据系列，也就是说，这些决策使生产的商品正是那些卖得出的商品。我们可以把经济决策者以**有组织的信息传播**对市场功能进行的这种完善，称为一种改善的“看不见的手”。电子计算机大大提高信息收集和加工速度和准确性，从而也大大地完善了“看不见的手”。

5. 最后，“看得见的手”是能够进一步完善的，就像“看不见的手”用经济政策来补充那样。这包括各种大量的合同、咨询和仲裁。它们都是与国家行政指令有本质区别的非市场协作工具。

经济调节机制的五种类型——自由放任、行政计划、经济政策、信息生产和市场外的非行政性协调，历史地看，正是按照上述顺序发展的。但是历史的顺序并非必然与等级制度或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相等同。机制的各个类型是互补的。主要的问题是达到组织上的最优化。不同的社会制度具有不同制度的经济组织的效率。

自由资本主义是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这就是说，自由放

任是宏观经济组织的主导原则。行政计划是**国家主义**的基础。在这里，国家官僚取代个人企业家作为生产的组织者。在经济政策理论方面，凯恩斯的革命使市场的不稳定有可能受到作为经济政策机关的国家的相对有效的监督。加上国营（公共）公司的建立以及越来越多地利用事后和事前的信息系统，这些便造成了所谓的**混合经济**（或“福利国家”），这是当代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最后，**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应是，最优利用所有五种类型的调节机制，以使社会成员的福利达到最大化。

第四节　工人管理型企业的行为

我们在第六章第二节研究了工人管理型企业的比较效率，在第八章，我们详细分析了工人管理型企业的组织问题。我们将在本章探询该类型企业的市场行为。因为，当然了，如果该企业面对市场经营得不好，那么，它的假设的优越性就必须受到质疑。工人管理的反对者正是这样做的。工人管理的企业理论仅是工人管理经济的一个主要理论问题，它也是国际上广泛讨论的主题。自从本杰明·沃德分析了他的伊利里亚企业和得出某些奇怪的结论以来①，这些发现就被当作工人管理型企业效率低下的主要证明。我简单地重复一下这些讨论。

考虑一个具有简单的生产函数的企业，它有2个投入变量：劳动（x_1）和其它资源（x_2），

①　　　　　　　　$q = f(x_1, x_2)$

---

① B. Ward, “The Firm in Illyria: Market Syndicalis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8, pp 566－589. Ⅲ

这里还有某些固定成本 k，k 可以解释为折旧或资本税。利润是：

② $$\pi = pq - (wx_1 + p_2x_2 + k)$$

这里，p 是产品的价格，w 是工资率，p_2 是其它可变投入的价格。在新古典主义的文献中，通常假定资本主义企业使短期利润达到最大化。经验主义的研究则表明，当代资本主义企业的这种行为是很成问题的。[①] 为了准确起见，我将谈一下"新古典企业"。要使利润最大化，第一类的条件就是众所周知的边际公式：

③ $$\delta\pi/\pi x_1 = 0, \rightarrow pq_1 = w,$$
$$\delta\pi/\pi x_2 = 0, \rightarrow pq_2 = p_2。$$

如果像到处假设的那样，假设收益递减，第二类条件则被满足。

条件③的分析表明：a. 产品价格的提高使生产和就业增加；b. 要素价格的提高使生产和就业下降；c. 固定成本的变化不起作用，因为 k 在条件中并没有出现；d. 对待劳动和对待其它资源是一样的，这里是完全对称的。

我们现在来改变一下企业的规章，以工人委员会来代替新古典的管理者。由于不存在工资，我们也就无法确定利润。沃德在问自己这个新的企业家的目标函数应该是什么这一问题时，他的回答是每个工人的平均收入：

(2a) $$y = pq - (p_2x_2 + k)/x_1$$

他不肯定实际的南斯拉夫企业是否像这种理论那样使 y 最

---

① See Y. Simon and H. Tézenas du Montcel, *Economic desresources Humaines dans l' entreprise*, Paris: Masson, 1978.

大化，所以，他宁愿谈论“伊利里亚”[①]企业。我也接纳这个名词。假设伊利里亚企业使每个工人的收入最大化，这就导致新的第一类条件：

(3a) $\delta y/\delta x_1 = 0$，$\rightarrow pq_1 = pq -（p_2x_2 + k）/x_1 = y$，

$\delta y/\delta x_2 = 0$，$\rightarrow pq_2 = p_2$

显然，第二类条件也得到了满足。

我们不能直接分析（3a）条件中的最初条件，所以，我将用下列公式加以转换：

④ $q - q_1x_1 = k/p + p_2x_2/p$

可以容易地看到，以下是正确的：

⑤ $\delta/\delta x_1（q - q_1x_1）= - q_1x_1 > 0$

通过类似的分析可以得出下列的结论：a.p 的提高会使等式④的右方减少，为了保持均衡，也必须使左方减少；按照⑤，相应地减少就业 x_1，以及（由于①的变化）生产下降；b. 其它资源的要素价格的提高在新古典企业中也有相同的效果；c. 固定成本 k 的增加使生产和就业增长；d. 由于工资并没有在（3a）中出现和条件的结构是不同的，因而各种要素的对待是非对称性的。

表 12 清楚地表明了整个情况。

---

① Illyria 是莎士比亚故事中一个国家的名字，被沃德用来泛指一种独特的（南斯拉夫自治式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译者注

表 12

产量和就业的各种变化效果

变化的类型	新古典企业	伊利里亚企业	工人管理企业
产品价格的提高	+	−	+
工资提高	−	0	0
投人价格的提高	−	−	−
固定成本的提高	0	+	0

这些结果提供了低效率的证明。通过把劳动与其它物质投入要素区别加以对待，伊利里亚的行为是古怪的，并且在无可挽回地伤害它们企业的效率，当产品的价格在市场上提高时，它们却在减少产量！因此，经济很不稳定。当政府要求增加就业时，它必须征收大量的税！税额越大，生产和就业就越多。工资政策是无用的，因为伊利里亚抛弃了工资。由于 $y > w$，q_1（伊利里亚企业）（q_1（新古典企业），在这里，q_1 是劳动的边际产品，伊利里亚企业雇佣的工人和产量都低于资本主义企业。由于同样的理由，它用的资本也比所需要的多。较低的就业及较高的资本意味着在既定的时间内较低的增长率。后者由于较低的储蓄而更低了，因为社会财产不可能按市场利率使资本立即增值。

我们将如何评价伊利里亚企业的理论及其对它的预测呢？任何有意义的理论必须经得起两个基本的考验：假设有效性的考验和预测的考验。即使经过这两个考验，理论也未必是正确的。如果没有经受一项或二项考验，那肯定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如果理论假设经不起检验，它就没有说服力；如果预测是

错误的，它就是无用的。由于预测的考验很简单，并且是比较确定的，所以要首先加以考虑。为此，我们依靠的是南斯拉夫经济的经验研究。

伊利里亚企业的理论预测到提高价格将使生产下降，但并没有看到类似情况。价格的提高，作为需求未满足的信号，很快地导致了增加供给的努力。

理论也预测了 k 下降将使供给减少。没有专门的经验研究就不可能反对这种预测。但是，当 1960 年南斯拉夫取消了 6% 的资本税时，我并没有看到生产下降的结果，据我所知，也没有一个人报导过类似的情况。

理论预测说，工人管理经济是劳动节约型的。相反，南斯拉夫经验表明，在企业里是长期的过度就业。政府不断地抱怨生产的“粗放性”。

当考虑到储蓄和投资时，理论预测又是错误的。企业内部的储蓄是中等的，而借款是巨大的，以至于国民储蓄率在国民总产值的 35% 左右波动。另一方面，过量的投资造成慢性通货膨胀。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相反，这正是凯恩斯主义者预测到的：利率与时间选择没有任何关系，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导致了增长，储蓄并不决定投资，投资创造储蓄。社会财产和计划使风险下降，从而使投资机会扩大。二者都使利率下降和增长率提高。

在保持人均收入最大化的这个基本假设的同时，通过长期的自由进入和其它的若干修正，挽救伊利里亚企业仍然是可能的。① 尽管如此，用更加符合实际的理论来取代，则要简单得

① 雅罗斯拉夫·瓦内克在《劳动者管理制市场经济概论》中（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对此获得了令人赞赏的成就

多。此外，在科学研究方面存在一条普遍接受的规则，即预测能力相同的两种理论，优势在更简单一方。

当我第一次面临我的学生让我提出一种替代的理论的挑战时，我问我自己的问题不是工人将做什么，而是我们作为工人委员会的委员实际上做了什么。回答是这样的：在新的报告年度的开始，工人委员会确定应该达到的期望的收入水平。期望的收入包括去年的收入，或者某种标准的个人收入（w）和变化即增加的收入——通常是当年应当达到的变化数（△w）。期望收入是下述因素的函数：a. 预期销售额；b. 其它企业的收入；c. 去年及前几年的收入；d. 劳动生产率；e. 生活费用；f. 税收政策；g. 收入和就业增长的长期远景。

由于个人收入是固定的，剩下要做的就是使剩余最大化。

⑥ $$\pi = pq - \{(w + \triangle w)\ x_1 + p_2x_2 + k\}$$

期末根据企业的成就来协调期望收入的高低。因此，我们必须区别两类收入：簿记账目收入（w + △w）及实际支付的个人收入（w + △w + △w*）。只有前者才是客观的函数；对所有实际目标来说，它具有工资的定位作用，而不是工资率。

看一下等式⑥就足以使我们相信，这个等式的数字特性是与来自等式②的那些特性相同的：工人管理型企业的行为将类似新古典的企业的行为，并且具有同等的效率。惟一的差别（一个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后果）就是，劳动不再是商品，它不再向雇主出售，因此，真正挣到的个人收入没有在我们的表格中出现。在解释⑥时，人们不能犯谈论利润最大化的错误。用来正确描述总收入最大化的客观函数是受限于 w + △w 簿记账目的个人收入的。

有意思的是指出另一个常见的错误，即把剩余最大化同剩

余量等同起来。最大化不表示剩余量应该最大，或者剩余必须存在。很可能的是，企业行为是由剩余最大化原则决定的，而实际剩余却很少，甚至下降。比如，1965年以后的南斯拉夫企业即是这种情况。剩余应多大决定于以往的收入扣除，也就是决定于期望的个人收入，其余要做的事就是最大化，这决定着对市场变化反应的模式。

与自然科学永远是实证的科学不同，社会科学是规范的科学。这就为挽救伊利里亚企业的理论提供一个最后的可能。也许真正的工人管理企业利用的目标函数正是公式⑥中描述的，即使这也许不是**合理**的；也许**工人应该**使就业的个人收入最大化。因为在资本主义环境中是合理的，不需要在社会主义环境中也是合理的，我们在这里遇到了把合理性标准及决定特殊制度合理性等同的难题。这个问题超越了本书的范围。但是，至少可以表明，公式⑥满足了新古典合理性的标准。我们可以想象，工人委员会能够按共同选择的标准采取使每个就业工人收入最大化的长期计划。然后，计划将分为一系列的短期计划，各有各的核算期。所得到的个人收入即是有关时期的期望收入。

第五节 最优投资率

在第一节第6点中，我们确认了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取得收入分配和最优投资率的需要。我们在联系有关消费者平等时讨论了第一个最优。现在我们将讨论第二个最优，但不能过分强调其重要性。

我们看到了新古典主义的范式是不可能发现最优收入分配

的。同样，这个范式也不可能确定最优投资率，除非是学院式的目的。标准的做法如下：我们确定一个计划范围，在这个范围内使消费最大化，并且对消费流运用合适的贴现率，以使未来的消费折算成现在的价值。我们选择使消费最大化的投资计划，但有一定的限制。因为任何计划范围都是专断的，由于不可能发现适用的贴现率，于是，整个做法便进入死胡同。持温和批评态度的作者用市场利息率代替时间偏好率和衡量投资边际效率的尺度。但这是绝对不许可的。正如凯恩斯以及他的许多前人和后人指出的那样，市场利息率是基本的货币现象，并且与社会时间偏好率和贴现率没有共同之处。至于投资的边际效率（MEI），在增长的经济中，即使消除了所有市场的不完全性，企业和整个经济的 MEI 都是不同的。正如在第一节第 5 点已经提到的那样，这两种投资边际效率甚至在符号上都是不同的。在一个既定的点上，投资企业还将提高其生产（个别的 MEI 是正数），而在一个系统中的其它企业的生产却不知不觉地下降，而且这些小亏损的和总将大于那个投资企业的所得（社会的 MEI 是负数）。

这两种 MEI 的混淆对经济结构特点引起普遍的误解。投资边际效率至少在达到某个点以后会下降，当然，这是大家所接受的。然而，由于个别企业在它们的投资边际效率等于零以前早就停止投资了，结果，社会的投资边际效率等于零就意味着，这一大笔投资会使消费大大下降。因此，饥饿水平代表经济增长的上限。这当然是错误的。在正常的条件下，当消费扩大时，增长达到了最大界限（社会 MEI = 0）。我们能够有效地做到的一切，就是把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投资比重每年增加 1% 或 2%，直到总投资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 0.35 ~ 0.40 左

右，那时增长可能不再加速。现在，1%的小变化在较长的时期内会创造出奇迹来。南斯拉夫在制定1960～1980年长期发展计划时，我比较了两种投资抉择：a. 投资率保持在23%水平上不变；b. 投资率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直到23%，到那时保持不变。两种消费量的最大差别是在第10年出现的，等于延缓一年；换句话说，抉择②在第11年达到了同样的消费量。两种抉择在第14年的年消费量是相等的。如果拿余下的23年得到的消费量同最初的14年所牺牲的消费量做比较，是50：1的比例。假设举行公民投票，要求公民通过一项计划，这个计划要求在最差的一年把可能达到的消费水平推迟1年，而在整个计划期内许诺他们在消费量上比最初几年所牺牲的消费量增加50倍，这样的计划是很可能被通过的。

现在我们具备了解决最优的储蓄和投资问题的所有要素。我们假设：

1. 在社会成员寿命期使消费最大化。这或是通过举行全民投票来保证，或假设一项福利函数来保证，该函数表示在人的生命时期，消费多要比消费少好。实际上，生命的某个时期可能比其它某个时期有更大的需求（当然，我们不能准确地知道我们将活多久）。我们可以接纳这一切，并假设个人需要的差异是可以如此补偿的，即平均而言，社会行为使每代人的消费达到最大化。

2. 社会是民主的，这意味着每个消费者都有一票。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平均预期寿命是35～50年之间。这同时就是一代人要顾及使消费达到最大化的生命跨度。

3. 由于吸收投资的能力是有限的，经济中的投资边际效率下降，而单位时间的投资是增加的。如果技术进步的速度比

较快，投资边际效率的下降则较慢，但在任何情况下是下降的。

4. 在现实世界中，投资决策结果的不确定性随着计划期的延长而增加。长期发展计划很少超过20年，几乎没有超过25年的。这种实践含有一种信念，即20~25年以后的未来事件是如此的不确定，以至于规划或预测那些事件不可能改善当今的投资决策。

5. 于是，产量最大化的相对时间范围是20~25年。因此，在这个相应的时间内，投资边际效率必然归为零。

6. 既然每代人的寿命期要比计划期长得多，因此每代人不仅使产量最大化，而且也很可能使消费最大化。因为生产的一部分要用于投资，而这部分投资在该时期是不产生效果的，所以在20~25年内，消费不是最大化。如果投资的见效期相当短，那么，在这代人一生的余年里，这种投资会生产出消费品——通过直接或间接地进一步投资。因此，如果每代新生儿把一代人的一生的重点往前推移，那么，每一代人都将使自己的总消费最大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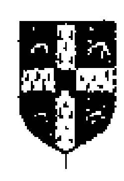
从以上6点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现实世界的特征是，如果我们同意每代人使消费最大化是国家投资政策的正确目标，那么，生产最大化决策和消费最大化决策是一致的。当然，对我们来说，不是在逻辑上非要同意这点。但是，目标及假设都是相当现实的，肯定要比经济理论中的一般假设要现实得多。

简短的澄清也许是必要的。消费最大化已被证实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每个人的自由王国尽快满足社会的物质需要一种努力。这与造成资源破坏、国际紧张局势以及环境污染的过度

增长速度是毫不相干的。这三种令人不快的结果不是经济增长本身的结果，而是增长的特殊社会组织的结果。投资可以用于改善环境，创新可以保护资源，增加的财富可以用来帮助落后的地区。

从技术上讲，最优投资率由投资曲线上的某一点决定的，在这一点上，20～25年期的投资的社会边际效率成为零。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在正常条件下，这样的投资政策不表明消费缩减，即使暂时的缩减。如果最近的经验和国民收入统计是可信的，那么，一旦投资政策发挥作用，它使投资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到达35～40%，产量和消费的年增长率约10%左右。

因为在经济中，通常无法在不变的条件下重复实验，所以，投资边际效率等于零这个点是无法直接和严格确定的。但是，可以用间接的方法来很接近地确定这个点——例如，通过观察各个投资成熟期的改变，通过研究总投资和新投资的平均和边际资本系数的改变，通过考察生产能力利用率的改变，和通过比较本国和其它国家的成果。这些方法的准确性可能不特别令人满意，但是，这和自然科学中的计量错误有本质不同吗？



第 13 章

宏观经济组织

第一节 四个基本机构

与通常一样，我们从简要的历史回顾开始。市场经济的发展伴随着自由竞争的思想，伴随着“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和所谓的萨伊定律。这些理论假定，任何生产不仅使商品供应增加，而且还创造对商品的需求。在整个 19 世纪中的激烈的循环波动并没有防止新古典经济学在 70 年代的出现。这种学派主张通过边际调整使经济自动稳定，并在列昂·瓦尔拉斯发展起来的美学式愉快的一般均衡理论中达到巅峰。在一个更加实际的层次上，人们已经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在该世纪的下半叶，政府通过建立中央银行或国家银行开始调节货币业务，通常的做法是选择一个已经存在的私有的银行，将其改成半公共

机构或公共机构。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已经相当清楚地认识到，货币政策对于稳定是必要的，而固有的市场力量无论如何是不够的。但是，货币理论从来没有真正结合到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理论中去。此外，人们相信，货币政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足够的。

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从根本上粉碎了这种幻想。不久，凯恩斯指出，萨伊定律是荒谬的①，经常出现的是在非充分就业水平上的均衡。凯恩斯说明了，在通常的情况下，为什么单单是货币政策不能使非充分就业的均衡转变为充分就业的均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在游戏中加入了财政政策。

用居民的时间偏好来解释实际的储蓄，是直到我们时代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坚持的一个珍爱的信条。本世纪的经济理论家们（跟上个世纪的他们的同行一样）并不担忧“时间偏好”的极大波动，如反映在美国衰落时期的负储蓄率上和在日本繁荣时期的35%的储蓄率。凯恩斯这样解释这个秘密，即在工业化的国家中，低投资率的原因不是高度的时间选择，而是相反；换句话说，过高的储蓄造成过低的投资。这看上去像黑格尔的辩证法，实际上，这是严格的实证经济学。然而，在“纯理论”领域，教科书中还在用个人的时间偏好来确定国民储蓄率。

潜在地说，凯恩斯主义的充分就业经济学也是增长的经济

---

① 马克思早在75年以前就做出了同样的结论。凯恩斯对他所称之为的“马克思的地下世界”并没有给予重视。琼·罗宾逊，一个最主要的剑桥经济学家，非常好地描述了这种由于意识形态的愚蠢而无法理解环境的情况：“在英国，从来就没有过少于一百万的失业工人。我的老师教导我说，因为萨伊定律，失业在逻辑上是不可能出现的。现在，凯恩斯出现了，并且证明了萨伊定律是废话（当然，马克思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我的老师从来没有让我注意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On Re-reading Marx*, Cambridge: Students' Bookshop, 1953, pp. 19-20.）

学，因为，在既定的技术进步比率下，生产的最大可能的增长由劳动力的增加单独决定——正像后来在哈罗德—多玛建立的模式中得到详尽说明的一样。实际上，凯恩斯从来没有超过短期均衡分析。在他的时代中，经济的增长率每年为2～4%。在我们的时代，5～10%的普遍的增长率被凯恩斯及其同代人（回想一下停滞的理论）认为是不现实的、空想的和不可能的，不值得为其费心。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填补这个空白没做多少事。苏联式的行政计划，在高度发达的国家中既没有引起兴趣，也没有产生效果。然而，问题是相当清楚的，并且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确定：为什么不把财政政策用作增长工具？为什么政府没有建立一个类似于体现货币权威机构的中央银行的单独的投资权威机构？

现在，我们准备直接谈论机构建设。当然，有许多经济机构。它们的数量，它们之间的联系，将在下面描述。但是，我们只描述若干机构，这些机构中有四个是基本的，它们实际上决定着整个制度的运行。一个机构编制计划。另外两个机构运用经济政策来完成计划；其中一个机构主要做短期调整，另一个做长期修改。四个机构解决了特定的争端。

1. **计划局**。计划局实际上是生产信息的机构。但与统计局不同，它生产有关未来的信息：预测和发展计划。计划局没有任何行政隶属关系。它惟一的职能是**事先**去做市场**事后**要做的事，而且做得更好。换句话说，计划局的任务是根据相关的选择项目对经济活动完成事先的协调。如果计划局的预测良好，计划本身的存在将作为有力的协调工具起作用。余下的事可以由其它三个机构完成。

2. **国家银行**。国家银行必须向经济提供相当数量的本国

货币和外国货币。它作为最后的贷款提供者，防止货币制度发生周期性崩溃。国家银行通过控制货币供给，对一般经济稳定施加重要的影响。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任务也许是控制价格，而控制货币的供应量必须是绝对胜任的。货币数量理论把通货膨胀原因的解释为货币的过度供应。凯恩斯的通货膨胀缺口并未超出这种解释，而且这种解释也并非不对。因此，对货币供应量的限制便成了明显的药方。但是，在运用时，它通常产生对经济活动的限制和失业。那时就发现，通货膨胀还会造成结构上的比例失调。而且货币政策也无能对付这样的通货膨胀。第三种的通货膨胀是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失调造成的①，这种类型的通货膨胀一般被看成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同某些不太重要的形式相伴而生。显然，货币政策也不能解决这种情况。

借助一个类比有助于理解国家银行的职能。没有油，汽车发动机就不能开动。同样，没有货币，业务往来就不能进行。如果油量不足，发动机会受损，甚至完全坏了。因此，给发动机上足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发动机彻底不工作，任何量的汽油都消除不了麻烦。必须对发动机本身进行修理。国家银行实行错误政策造成的损失比实行正确政策克服困难所提供的帮助要大得多。这是边际和短期调整的机构。

除了价格以外，通过调整贴现利率，银行也可以试行控制投资（以及总需求）。经验表明，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是很敏感的。然而，重要的不是利率，而是有利润的投资机会（在工

①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类型的通货膨胀是工会与雇主之间斗争的结果。当工会力量弱小时——比如在马克思和凯恩斯的时代，没有人知道这种类型的通货膨胀。在一个自我管理的经济里，它的产生是由于通过适当的政策措施不匹配而出现的不同产业之间的生产率增长的差别。（see B. Horvat, *Ekonomska politika stabilizacije*, Zagreb: Naprijied, 1976.）

业化国家中)，或者给贷款提供者合理利率的投资基金的获得(在发展中国家)。

3. **发展基金组织**。银行自身不一定是非常有效的，但是与发展基金组织在一起，它就能产生奇迹般的结果。基金组织通过稳定投资、总需求、收支平衡以及价格，它们的变动是由结构失调造成的，来补充银行的货币业务。从长期来看，基金组织负责达到期望的增长率。

基金组织的活动取代了传统上由财政部执行的财政政策。这个政策一般与预算政策联系紧密，以致理论分析难以把它们分开。然而，差别还是十分明显的。预算是从计划来源给国家行政机关以及各种公共机构的计划活动拨款的资金。稳定、发展和收入再分配是预算外的活动，属于财政政策。前两项由基金组织操持，而第三项只属于省议会的职权范围。

如果发展基金组织是作为单独的投资权威机构建立的，则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基金组织不能用新的税收投资或改变税收的累进数，并且一般地说，不能影响社会团体或经济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但是，它可以修改附加税，以使总需求和总供给达到均衡。基金组织是在议会决定的社会福利职能界限内活动，在帕累托类型效率的条件下，它对稳定和增长负责，目标是在不妨碍分配的情况下提高效率。从理论上说，这个目标不是十分清楚，在实践中的偏差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里的情况与货币领域的清况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后者，国家银行普遍被当作独立的货币权威机构而接受。

基金组织可以完成四类目标：完成投资计划，对专用项目的流动资金做短期投资，实行补贴和补偿，影响总需求和总供给（通过吸收剩余和赤字支出来取代过去的预算剩余和赤字）。

投资资金来自于由偿还的贷款、指定的税收以及各种形式的借贷。

在组织意义上，基金组织是政策制定机构，而不是商业机构；它是金融机构，而不是行政机构。对实际的贷款管理让商业银行来做，而实际的税收管理留给财政部。短期经济政策要求这三个机构紧密合作。财政部制定预算，基金组织制定年度干预计划，银行准备预测资金流量。行政预算、投资干预计划（包括补助）以及资金流量预测代表着年度发展计划的三个组成部分。年度计划是由计划局准备的中期发展计划的分段执行。

4. **收入和价格仲裁**机构。只有在其商业风险得到合理的预测时，自治经济才能很好地运作（假设风险进入计划的总体框架，风险不是过大的，等等）。更确切地说，所得的收入应是劳动的成果，而不是偶然因素和不受控制因素的结果。政府及其机关负责保证经济中的这些条件。

如果不确定性太大，劳动组织会得到意外的收获或遭受意外的损失。对意外的获利并不难解决，集体不会抱怨，而且大部分收获由工资累进税自动吸收。不当的亏损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工人要求正常的收入，也不存在自动的负累进税来弥补亏损。因此，意外的亏损或不当的收入下降是政治麻烦的经常原因。政府没能采取正确的行动，这是真实的；但更真实的是，意外亏损是有意的政府行为造成的，比如冻结某些商品的价格，实行进口配额或取消特殊的消费计划。如果什么都不做，经济政策的道德基础（以及效率）将严重败落。有一种倾向是通过形成压力集团来强制补偿损失，计划被置之不理，政府变得小心谨慎和不负责任，把主动权和责任推给议会，而议会并

没有能力解决日常问题。

正确的解决办法是建立收入和价格仲裁机构，由它来解决争端。由于能够建立一系列的合适和简单的规章制度和标准，能够对收入和价格效果加以衡量，仲裁（而不是议会里的政治对抗）是正确的方法。仲裁委员会是独立的机构，由有各利益集团（政府、工会、商业、科学院）有资格的代表组成，它被委托解决对政府机构各种歧视措施的投诉，并要求建立平等的经营条件。委员会可命令政府修改某些政策和措施或对受亏损一方提供补偿，补偿费用由发展基金支付。

第二节　联邦：经济政策的三项基本职能

在指导经济方面，联邦有三项基本任务：①**经营条件的平等化**，没有这一项，就没有按劳分配，就会导致垄断剥削；②从短期来看，**保证市场均衡**，没有这一项，任务①就完不成，或者说，劳动组织的自治就遭到破坏；③从长期看，**保证经济增长**，没有这项，①和②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能的。

这些任务是不容易或不简单的。因此，一部分经济政策机构不断地把经济失误的责任推给其它机构，特别是推给企业。一旦在投资上发生了错误，不是纠正错误或承认经济组织的生产投资行为是由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决定的这一事实，而是责备承担投资的企业以及给它们拨款的银行。如果价格上涨时，企业就要为其提高价格受到指责；如果个人收入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应责备劳动组织缺乏社会意识。如果经济没有偿还能力，出口太少或进口太多，则又指责企业没有适应改革意图，没有严守劝告和经济政策。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理解，部

分政府机构的这种行为也是如此普遍地把经济政策的本质和社会分工要求相混淆的结果。即使政府不能发布行政命令，它要对经济运行负责，因为它掌握了充分有力的经济指导工具。另一方面，**企业的自主**并不意味着对其行为的宏观经济后果负任何责任。劳动集体是在确定的条件下、即在决策参数既定的一定条件下运作的，它们在考虑这些参数的同时按照自身的物质利益来进行决策。正因为经济活动的动机来自物质利益，所以官僚主义的等级制是不必要的，真正的自治是可能的。但是，某些局部利益的满足，不应该使其它局部利益受伤害；否则就会出现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剥削。是否会导致剥削，或者自治劳动组织的决策是否导致经济的均衡和增长，则要依赖于制度的机构和参数。而共同体的机构要对此承担责任。

更具体地说，三项基本职能包括：

1. **均衡经营活动的条件**就是必须这样来组织经济，以使所有的经济决策单位在相同的起始条件下获得收入。如果在收入上出现差别，那么，这些差别是劳动和经营的结果，而不是劳动集体不能控制的外部条件的结果。为使条件均等，必须：a. 保证经济的稳定性；b. 取消行政干预，尤其要消除调节的经常改变，这会造成经济活动参数发生变化；c. 防止产生垄断和消除整个市场的不完善性。

经济活动条件的平等程度客观上是比较容易确定的。方法与确定按劳分配（第九章）相同。所有工业部门（统计上要求的机构数）的平均收入在整个经济部门应该是均等的。

经济条件的平等化包括对因政府干预而蒙受损失的那些工业部门的补偿。它也包括地区发展的平等化。但是，这不排除赞成或不赞成作为社会计划接纳目标的生产。

2. 在像**经济这样的相互依赖的体制**中，很少能独立地在个别点上决定事情。任何个别企业的业务成就，大部分都是由整个经济制度的运作预先确定的。如果这个制度运作得比较差，集体和专家们的努力或者企业经营的技巧就不能保证良好的业务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保证市场平等**就是：a. 使劳动力及其它生产要素达到充分就业；b. 稳定价格；c. 达到收支平衡。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仅仅建立一个合适的经济体制是不够的。一方面，必须运用相应的反周期政策来对付停滞和失业；另一方面，则要对付通货膨胀。通过货币政策、信贷政策、财政政策以及收入政策的相应配合是可以完成此项任务的。

3. **经济发展**是社会经济制度进步性的最终考验。如果社会主义要生存下来，其经济发展率就要高于任何可选择的社会的比率。充分就业是不够的。在经济发展中落后的社会制度必然衰亡。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制度则是向发展最快的那些制度适应。关于发展是否令人满意这个伪哲学的讨论，是离题的。事实是，人民要求经济发展，如果他们没有得到经济发展，他们会有强烈的反应。现在比较流行的担心是，发展将导致环境的破坏，这是非常不正确的：空气、水等是污染还是纯净，这一切由经济政策决定，而不是由发展来决定的。众所周知，学院式的经济学家们有一种错误的论点：增长要求投资，投资增长就表示消费下降，而消费者是不能忍受这种下降的。在发展最快的经济部门中，实际个人收入（也包括消费）也是快于其它部门的。此外，前面已经说过（第十二章），最大化的增长率使每一代生活期的消费也达到最大化。

增长不等于发展，但它是发展的必要前提，两者都是联邦

的责任。

第三节 联邦：机构

可以把自治经济想象为一种引力系统，其中，议会是引力中心，生产单位排成周围。在中心和周围之间不是物理接触。生产者的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是保证系统稳定的引力力量。共和国也是类似的引力系统，它在整个体系内部运转。以这种方式，作为整体的体制像一个多中心的系统来行事。然而，不能做过分的类比，在宇宙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其中的差别之一就是，在经济体制中，在中心和周围之间存在5种特殊的联系类型。我们已经在前面谈论过（第12章第3节），这就是行政的、经济协调的、市场的、信息的和协商仲裁的联系类型。机构和联系共同保证经济制度的“自动”调节。

联邦的任务是统一所有的子系统的运行，以保证整个系统的全面运行。在这项任务中，联邦在执行这个任务时有三项职能，这在上一节已经讨论了。这三项职能要求为国家的整个经济做出统一的决策。然而，统一的决策并没有预先决定以什么样的方式做出决策。这种方式可以是专制独裁式的、寡头政治式的，或是民主的和参与式的。尤其不能把联邦与联邦政府等同起来，也没有必要以官方的专制来说明集中的决策。

在考虑联邦机构模式方面，我们可以再次依照协调联系出现的历史顺序。我们从在自由市场上企业的完全自治以及置身于经济之外并只从事公共管理的国家开始。由于市场是内在地不稳定的，所以，调节是必要的。这是国家首先主要关心（但

不是惟一的）的事情。因此，国家建立了一定数量的在经济政策方面各有分工的机关。这些机关通过行政联系接触，但是必须执行政治中心的指示。如何看待中心，中心如何做出决策，我们在第十章中已经分析过了。

在图6上，中心是联邦议会，它的执行机构是执行委员会。议会处理三类不同的问题。一类是传统的政府活动，我称之为**公共行政管理**，它包括外交事务、国防和专门的公共行政。第二类可以称之为**社会服务**。这里包括教育、医疗保健、社会保险、科学、文化等等。所有这些活动的特点是，不要求在联邦一级对它们进行每天调节。有时，有选举权的共和国就一些问题专门达成协议，并提出法律来通过；其它的事则留给共和国（或消费者）它们自己。由于这个理由，联邦政府没有设各种社会事业的秘书处（部），而是建立了可以称之为委员会的非行政性协调机构。剩下的问题是经济，它要求在整体水平上即联邦水平上谨慎地和连贯地调节。

联邦政府建立执行经济政策措施的**经济秘书处**。在市场经济中，一种市场（货币市场）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建立了单独的控制货币的机构——国家银行，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独立于财政秘书处的。国家银行调节商业银行的业务，后者直接进入市场。通过控制货币流量，国家银行对企业及其它机构的活动的合法性进行最简单的监督。**社会簿记局**对每项往来进行注册以及定期进行常规核查，在联邦机构中，只有它同经济决策单位建立直接的行政接触。这样做是因为社会簿记局的作用类似监察员。这种行政接触不是命令，而是核查。同时，社会簿记局是业务往来信息的极重要的来源。社会簿记局的计算机使经济政策机构立即得到有关经济状况的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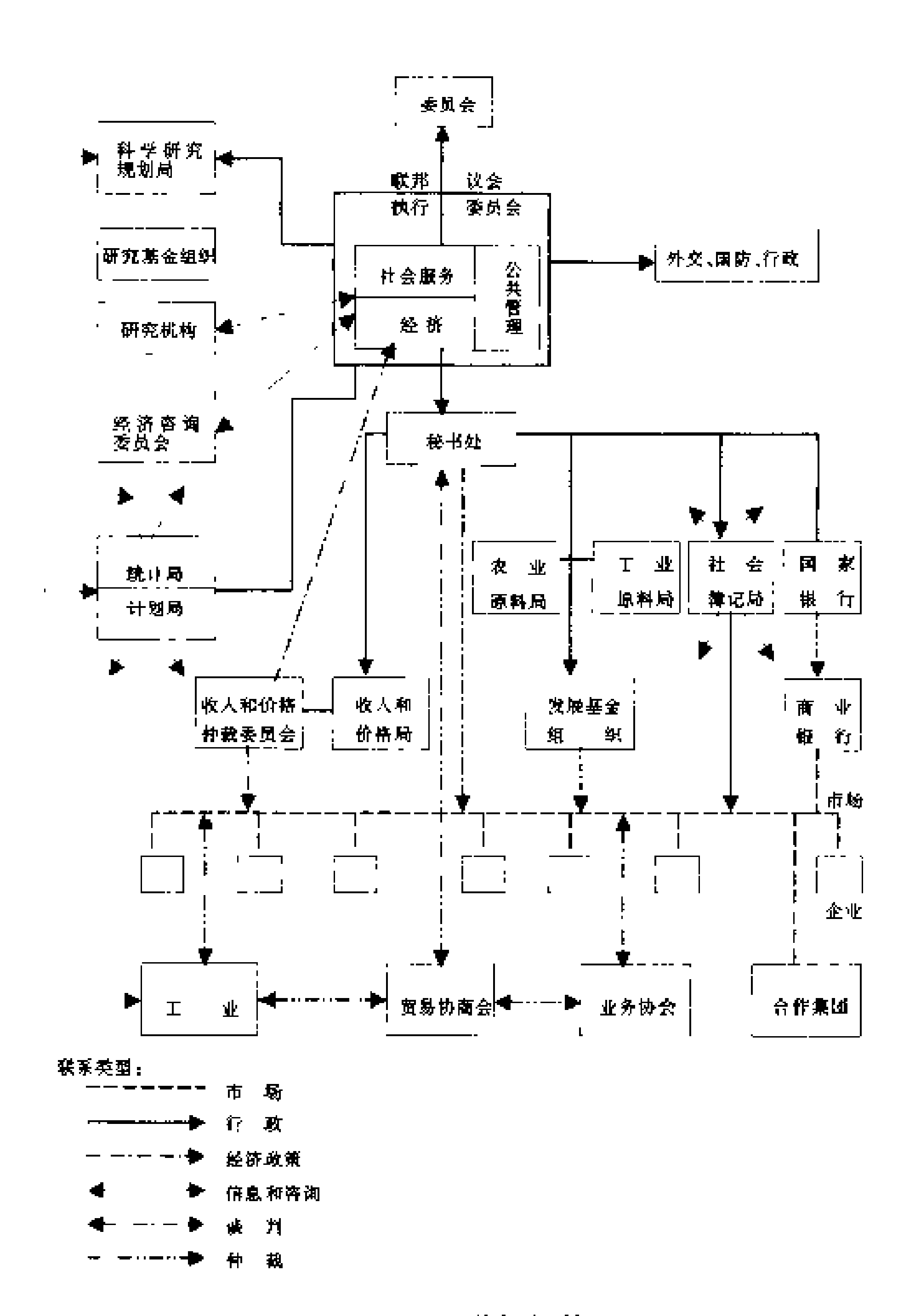

委员会
科学研究规划局
联邦执行委员会
议会委员会
研究基金组织
社会服务
经济
公共管理
外交、国防、行政
研究机构
经济咨询委员会
秘书处
统计局
计划局
农业原料局
工业原料局
社会筹记局
国家银行
收入和价格仲裁委员会
收入和价格局
发展基金组织
商业银行
市场
企业
工业
贸易协商会
业务协会
合作集团
联系类型：
市场
行政
经济政策
信息和咨询
谈判
仲裁

图 6 联邦机构

即使存在列举的各种机构，市场仍然运行得不好。经济经常遭受某种冲击，它们造成的麻烦是个别企业及其联合组织无法消除的。因此，一般的社会干预即联邦干预再次成为必要了。这种干预的最适当的形式就是一个或几个缓冲冲击的机构来管理以稳定价格为设计目的支持价格计划。**农业原料局**以其缓冲冲击的手段来消除农产品供应中的波动。此外，该局还实施农产品的保护价和最低保证价计划，以此为农民提供稳定而平等的条件，而不管生产的极不稳定（农业产量很容易波动，波幅可达到±20%）。**工业原料局**有着类似的任务。此外，它的工作还包括消除因世界市场上价格及供应条件波动而产生的那些混乱。

为了使描述的制度运行良好，必须要有个机构来克服在市场上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的、因垄断（不论是国家机关还是个别企业）所造成的滥用职权情况。这个机构就是**收入和价格仲裁委员会**，它根据有关方面的需求来决定合适的收入和价格。仲裁委员会由劳动组织的代表、工会（如果存在）、高等学府及政府机构的代表组成，在一定的任期内由议会任命。他们的决定是最终的决定，对所有单位包括政府在内都是有约束力的。仲裁委员会是政府机构实际上使经济活动条件平等化的行为的保证。如果政府对某些工业部门采取歧视措施，后者可向委员会投诉，由委员会做出损失评估。如果实施的政策在市场上使某个工业部门处于不利地位，而政府没有采取必要的修改举措，仲裁委员会将确认事实，规定解决问题的最后日期。仲裁委员会也是决定补偿数额的合适机构。如果政府必须采取某些重要的但不受欢迎的措施，它可以请仲裁委员会做事先的判断，有了仲裁委员会的同意，就能比其它方法更加有效地克服

特权集团的阻力。委员会将决定农产品的保护价和最低保证价，按照各种资格条件来确定有代表性的收入差别，等等。简言之，仲裁委员会避免了单独由政府机关解决上述问题而必然产生的政治压力、非原则的妥协及不负责的决策。委员会在工作中可以依靠类似价格局这样的专业机关。

上述结述的一组机构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发展迟缓。如果增长率偶然提高了，就会出现比例失调，而结构性的不平衡会导致不稳定，使增长率又下降。为了达到高增长率，必须事前协调经济决策，最大限度地利用科学来发展现代技术和管理经济，在地区和个别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方面都要保证必要的比例。当然，必须把这一切列入社会计划，但是还不够。我们也需要政策工具来保证达到计划的目标。

大部分投资有一段两年的形成期。因此，如果某些工厂没有及时完成建设，而经济增长又缓慢，通过暂时地增加进口可以很容易地弥补不足的供应。然而，建设大型水电站或钢铁厂，或开发大矿山，需要5年到7年甚至更长时间。此外，这样的项目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都要求大量的投资基金。如果这些资金不能及时保证，如果建设不能及时开始，如果经济发展迅速，在物资平衡表上就将出现很大的比例失调，以致收支平衡不堪忍受，其后果不可避免地造成强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并且伴随着增长的减速。还将有其它的负面后果。一方面，由于缺少资本高度集中，导致建设分散，工厂无利可图；另一方面，资本到达相当高度集中又将导致出现不受社会控制的生产和金融垄断。

明显的解决办法是建立**联邦发展基金组织**。该组织的任务是：(1)参与对资本要求特别高度集中及建设期长的那些项目的

拨款；(2)由于任何原因而使市场不能成功地平衡供求时，干预消除生产能力的比例失调；(3)帮助消除地区性的比例失调；(4)为纠正市场的缺陷提供资金。

联邦计划局负责经济决策的事先协调。它的作用主要是信息的作用，它同各共和国的计划局、消费者及商业协会有信息联系。**联邦统计局**收集和分析过去的信息。**经济顾问委员会**把合适的和独立的经济思考推荐给国家行政机构。**科学研究规划局**和有关基金组织一起保证把研究项目导向对国家最有利的方面。

这些就是主要的联邦机构。经济本身也要求设立若干机构来填补市场和联邦政治中心之间的空白。这些机构首先包括**合作集团**（通常是一个大型的做最后决定的企业加上许多合作企业），它代表纵向的一体化市场的子系统，并且导致了持久的市场结构。还有具有横向一体化的一般职能的**业务协会**。**贸易协商会**的任务是协调工业部门的利益，通过代表经济与政府协商来影响日常的经济政策。最后，表中的**工业**代表特殊类型的业务协会，它们的任务是执行一体化的职能和保护企业的独立性。现代经济不能忍受分散化而要求一体化。然而，通过合并形成的一体化意味着创造了经济力量的高度集中，建立垄断组织和取消自治。问题的解决在于，企业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实行一体化的仅仅由于使直接的协调成为必须的这样两项职能：①基本研究和发展工作，这是一定的工业部门技术不断现代化的前提；②预测供给和需求及对国内外市场行情的有效洞察。为了达到①项的协调，各工业的研究和发展部门与联邦的科学研究规划局直接联系。在②项方面，由各工业部门的计划局与联邦计划局联系。这些联系是信息和咨询性的，它们能提

供各方面的信息，对多数决策继续进行协调并揭示不一致的地方。在发生这样的冲突时，贸易协商会和国家执行机关承担的任务是寻找满意的解决办法。通过这种方式，使永久的计划体制得到完善。

第四节 共和国

共和国有类似联邦一级的政治中心和机构。在共和国和联邦之间职能是这样划分的，即联邦主要负责对外关系（外交和国防），而共和国负责内部事务（司法和公共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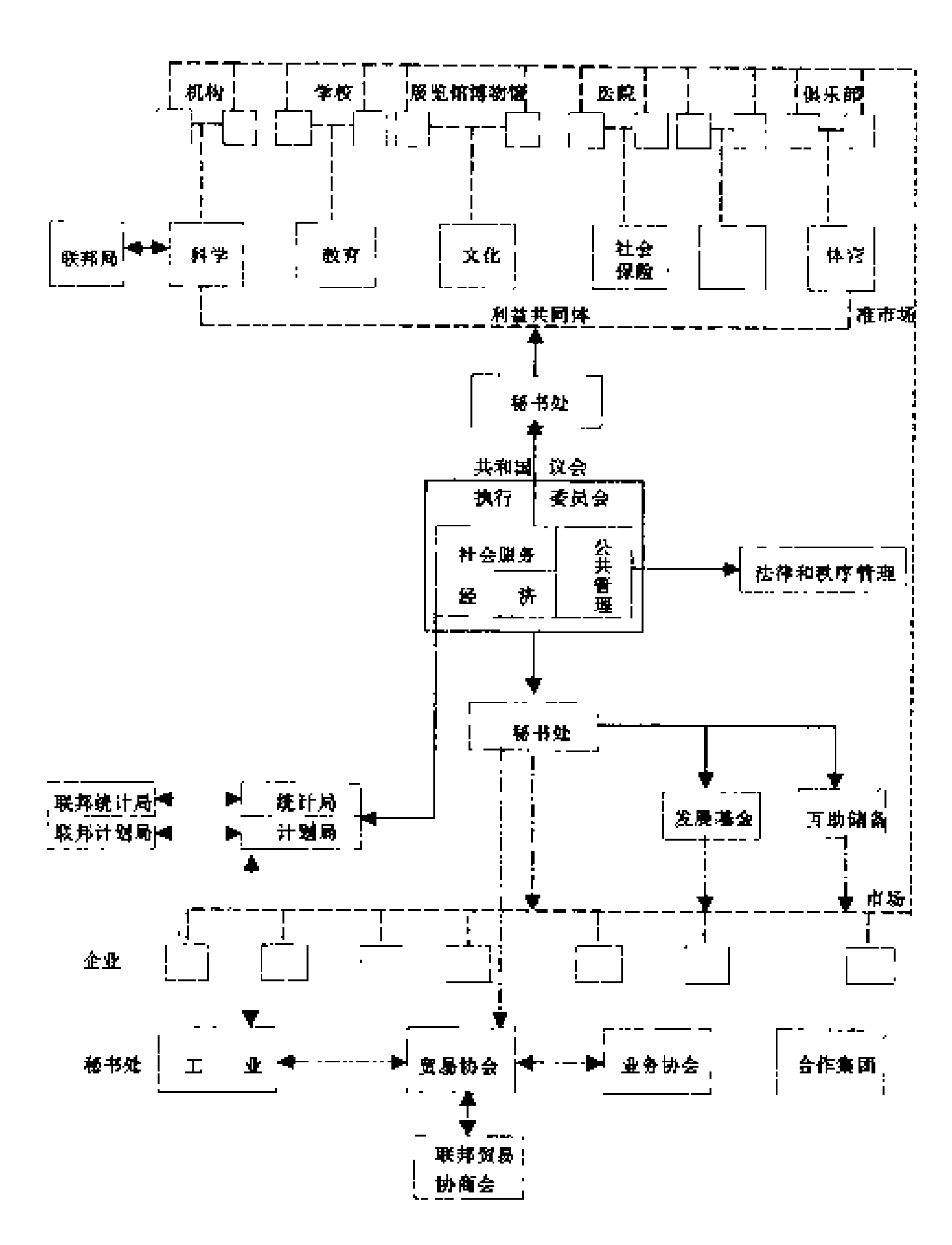
由于大多数联邦机构在经济领域从事均等经营条件和稳定市场的活动（对整个国家来说，这只有通过中央的决策才能做到），共和国免除了这方面的职能。因此，它的机构在经济领域是相当简单的。在经济发展方面，共和国的基本任务是实现共和国的均衡发展。**共和国发展基金组织**服务于这项宗旨。共和国通过免税和优惠条件（解决社会问题、培训劳动力、参与贷款等）吸引其它地区和外国的投资者，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加快经济发展。

在市场稳定方面，共和国可以通过建立**互助储备基金**进行干预。该基金可用于弥补亏损和改组无赢利的企业。但是，该基金的使用不应仅仅只停留在资金的再分配上，而应在基金下建立人事更动机构或专门的业务组织机构对亏损的企业提供完整的财政、技术和干部支援，包括取代整个管理人员。

就其性质而言，共和国在经济领域的职能是相对少的，它的基本职能是在社会服务领域。共和国机构制定并执行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政策。联邦的任务除了协调，就是从财政

上（由联邦预算给补助金）和立法上保证给不发达地区居民一定的最低限度的卫生标准和教育标准。在共和国议会的生产者院中，有三个委员会，而不是像在联邦一级那样，只有一个。这些委员会中，一个专门负责经济，一个负责教育、科学和文化，一个负责卫生、社会保障及有关问题。

为了以某种方式使共和国摆脱社会服务——如果可能，为了避免政治机构的庇护，这总是需要的——可以建立**利益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由所有相关的社会团体的代表组成，并且作为管理者和受托人行使职能。议会通过政治决议为各项服务分配基金。利益共同体接受这些基金，并代表消费者付费给提供服务的医院、学校、博物馆等等。这样的制度有以下若干效果：a. 国家和基金最终使用者的分离可以克服行政—政治机构在这个敏感领域的专制作用；b. 社会服务部门的劳动集体在原则上和经济部门的劳动集体有同等的经济地位；它们不请求预算补贴，它们出售自己的服务；c. 用契约协议取代预算拨款，使得教育、医疗及其它活动的经济意识得到发展，从而能够更有效地使用稀缺的资源；d. 与按劳分配占主导的市场部门不同，在社会服务消费中，从整体上说，分配是以需要为基础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青年应当受教育，而病人不论其财产状况和政治状况如何都应当得到治疗。这种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和生产中的市场效益激励正是由利益共同体制度来调和的。在这里，利益共同体以准市场方式从生产者手中为消费者购买服务。在市场和非市场部门之间也有直接的联系。这些联系在数量上不一定很重要，但在生产者的自治和消费者的自由选择上有重要的意义。劳动集体可以直接购买非市场部门的服务；企业可以建立社会服务组织，参加利益共同体，并为特殊目的



(各种线型的含义见图6)

图7 共和国机构

建立独立的基金（类似私有经济的基金）。大学、教育服务、文化和健康对人民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基础性的。教育和卫生保健的机会均等或有差别使无阶级社会与阶级社会区别开来。因此，联邦的任务是维持整体制度的运行，而共和国的日常任务是把社会主义内容融入制度之中。前面（第十章）做过的政治分析只能强化这个结论。

第五节　公　社

当我们走向国家机构的较低层次，即从联邦到共和国再到公社时，政府在逐渐失去其政治权力的品性，并日益成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大部分公共服务是在公社一级提供的。同时，这一级也最接近真正的政治民主条件。古老的希腊城邦在现代的公社中找到了继承者。当然，这不是指公民聚集在城内广场上通过法律和讨论战争与和平，而是这样的含意，即公社是自主的，不是等级制的一部分，其官员是选举出来的，是公民都认识的，每个人都可以参加公社议会的会议，通过地方大会进行批评或提出有特殊意义的问题。等级制自治是指共和国或联邦机构不能给公社政府发布命令，公社的宪法不受法律的限制，只受共和国宪法和联邦宪法所限。公社和古希腊城邦一样，是“公民的集合体，或者，换言之，是掌握接近职务机会的人们，所以是真正的或者可能的统治者。”①

既然公社主要是为自己成员服务的机构，所以，实际上可以方便地用服务的关系界定公社的任务。在这样的意义上，公

---

① Aristotle on the polis *in Politics* III, 130.

社有五项任务：

1. 第一项任务是配置公社资源以解决各种经济问题。正如早先指出的，社会主义国家三种公民身份的第一种是公社公民身份。如果一个人没有生存手段，他的公社必须关心他。如果劳动者成为失业者，公社必须给他提供新的工作。公社保证给位于所在区的企业提供贷款，它帮助建立新企业，吸引外来的投资者。对经济发展关心的动机不仅是由于需要保障足够的劳动岗位，也是为了需要得到资金以给各种社会服务拨款。为了这一目的，公社有独立于联邦及共和国的自己的税收来源。① 公社的一项经济责任是兼管亏损企业。如果某个企业经常亏损，公社可以让它破产。但是这种情况是少有的，因为公社有责任为失业工人提供新的工作岗位。因此，公社更愿意做的是挽救企业。为此，有时要暂停工人管理，任命看管者，并从共和国的互助储备基金中得到改造企业的贷款。当企业重新自立时，再交给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公社也通过完善税收和公社服务来调节收入和价格。

2. 如果第一项任务是提供工作岗位，公社的第二项任务就是关心公民的精神和身体。上面把这些相关的活动称之为社会服务。它们包括：提供照顾儿童的设施、学校、医院、社会福利机构、博物馆、艺术馆、剧院、体育场及娱乐设施等。由于公社是自治的，公民有充分的余地按自己希望的方式来组织文化生活和医疗服务。他们有充分的余地，但要受到物质限

① 下述的例子可以提供有关数字的观念：南斯拉夫是财政分权得以相对较好地发展的国家——实际上，它比任何地方都更彻底，公社所有预算额的50%不包括国防。公社支出的最大比例用于公共效用（公社的87%对共和国的16%）和教育（公社的78%对共和国的22%）。在这两方面，联邦政府的支出为零。See B. Horvat, "Yugoslav Economic Policy in the Post - War perio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1971, supplement, p. 157.

制。由于经济贫困的公社公民将受到任意的处罚，较大的共同体必须用援助资金进行干预。设计这些援助资金的目的就是在考虑客观经济条件的情况下，保证可以接受的社会服务标准。但是，这些公社可以通过额外的税收或发行公债来获得资金，超过这些标准。

3. 第三项任务是提供专门的**公社服务**，它们是各个共同体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这些包括：住宅、电力、水、供热、公共交通和通讯、商业中心，等等。

4. 第四项任务是**司法和公共秩序**。公民们希望有好法官、有效率的检察官和可信赖的警察。法官由招聘委员会选择，由公社从基金中发给他们工资。检察官由公社议会选举。警察属于公社政府。护照、公民的证件、出生证以及其它类似证件由公社行政部门颁发。

5. 最后，公社必须把自己所在地的各种活动**连结**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为此，公社有一个议会，它是各个团体、机关利益之间冲突的投诉法院。议会有两院。公民院建立在地方共同体中。生产者院由劳动组织选举的代表组成。公民院只参与第 4 项的问题，生产者院参与第 1 项的问题。其它各项的各个问题归入某个院主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共同的会议上做出决定。

各种问题可以在几个公社之间寻求合作解决。如果这种合作是经常性的，各公社将建立公社联合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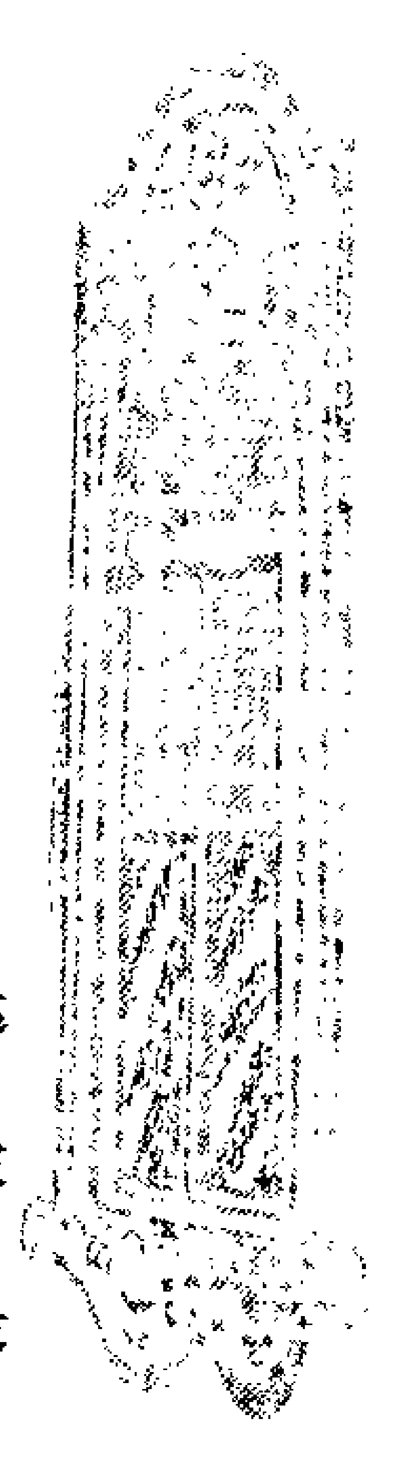
*　　　*　　　*

以上最后三节描述的机构模式是以我在计划工作中的经验

为基础而设计的。因此，带有我所熟悉的机构的色彩，但不是现存的任何特殊经济的抄本。有些机构还要建立。不应把建议的组织说成是直接模仿的现成蓝图，而是一种方案，在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条件变化很大的情况下，在应用之前必须调整和修改。

第4篇

过渡时期



◇第14章　历史脚本
◇第15章　过渡的战略
◇第16章　过渡的途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第17章　过渡的途径：国家主义国家
◇第18章　过渡的途径：不发达国家
◇第19章　新国际秩序

人们自己创造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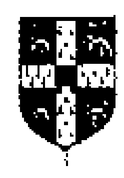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1864）

合作工厂提供了一个实例，证明资本家作为生产上的管理人员已经成为多余的了……在合作工厂中，监督劳动的对立性质消失了，因为经理由工人支付报酬，他不再代表资本而同工人相对立。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



第 14 章

历史脚本

第一节　理论与现实

(一)"马克思主义"的过滤理论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直集中在欧洲，并受到了 19 世纪革命传统的滋养。这次大战之后，社会主义运动分裂成了两个流派：革命的社会主义和改良的社会主义，分裂的原因有下述几个方面：a. 西方国家提高了的生活水准和政治民主化（这使得革命不大可能出现了）；b. 俄国革命的胜利（这证明了革命是可以发生的）；和 c. 第二国际在道义上的破产（这使得其后继者失去了信誉）。革命派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将另一派称为修正主义。在政治上，前者组

织了共产党，后者则组成了社会民主党。

社会民主党埋头于日常议会政治和小打小闹的改革，除了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正义这类含糊的词句外，他们从未提出一种逻辑严密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过渡学说。共产党人发挥并应用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我将这一词语加上引号，是表示它只是一种奇怪的拼盘：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元素与列宁、斯大林等人引入的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元素的拼盘。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后者活得更久一些）在其生命历程中也多多少少地改变了自己的理论，以适应历史条件的变化。

既然革命派的理论是仅有的一种成体系的过渡学说，既然它已经成了——而且一直是——在所有成功地实现了反资本主义革命的国家及其他国家的工人政党的正统理论，这种理论值得特别重视。它的基本点可概括为下列一组命题。

1. 在所有社会体制之间，都有一个过渡时期。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与其他一切过渡有根本性的不同。以往，新体制将在旧体制内长成，革命只是助产婆。然而，社会主义只有在革命之后才能创造出来。在资本主义内部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的因素。革命时期俄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叶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Evgeny Preobrazhensky），他本人是一位党的领导人和国家官员，将这一理论解释如下：

> 资产阶级革命只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段插曲。资本主义发展早在革命前很久就已开始，在革命后行进得更快。社会主义体制则与此相反，它的起点只能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算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 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成份作为一个单一的复合体是不可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以分子的形式形成的。商人资本可能从封建社会的间隙中生长出来，第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可能与当时的政治结构和财产形式和平共处……国家社会主义生产的复合体却只能表现为与旧体制的彻底决裂，表现为社会革命的结表。①

这种学说在其形成之时（100 多年前）似乎是言之成理的。当时，工会是被禁止的，罢工是非法的，不存在劳动阶级政党。社会主义改良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2. 既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能在资本主义内部出现，而统治阶级又不愿意放其特权，那么只有用暴力消灭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才可能出现。革命是阶级冲突的结果，因此任何产生社会紧张、强化阶级冲突的策略都是一种目的性战略。一般说来，随着无产阶级的兴起，阶级斗争的强度提高了，而无产阶级又与工业化水平一同增长。因此，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将会发生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事实面前人们被迫放弃了最后这一命题，在两次大战期间，这一命题被代之以“薄弱环节”理论：世界资本主义链条将会在其最薄弱的环节断裂②。然而，这种机械式的类比很难与理论的其余部分保持一致，而且不能解释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事实。

3. 尽管革命出现的时间是不确定的，社会体制的更替却是完全确定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只能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别无

① *The New Economics*, trans. by B. Pier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6, p. 79.

② J. Stalin, *Ob osnovah Leninizma* (1924). Moscow: Gospolitizdar, 1945, p. 50.

他途。因此，实证的社会主义理论、对新体制的设计都不是十分重要的。惟一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取得权力，消灭资本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4. 最基本的阶级冲突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冲突。资产阶级感兴趣的是保存现有的体制，而无产阶级却要为了自己的利益消灭这一体制。因此，过渡便只能是一种无产阶级专政。我已经指出，马克思的“专政”是指阶级统治。但在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术语中则是指专制政体。

5. 工人是革命力量，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是他们的历史使命。他们是惟一用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阶级。美国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这样说：

> 这些工人被假定获得了某些特定的无产阶级（和反资产阶级）的态度和价值观：团结、合作、平等，等等，这是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本身的结果。无产阶级被视为是由资本主义造就的“新人”，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拥有推翻现行体制并带头建设社会主义的意愿和能力①。

他们的客观利益只能通过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因此，他们将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结果，“一切权力属于工人”。

6. 工人阶级不能作为阶级进行统治。为了统治，他们需要一种政治组织，一个政党。实际上，他们需要一个了解历史

① P. M. Sweezy and C. Beltelheim, *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71, p. 113.

规律，能领导该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的先锋队党。党当然需要领袖，领袖代表工人阶级。既然工人阶级是进步的承担者，它的党、党的领袖当然也是代表进步的。结果，不存在其他进步党；既然其他党都不是进步的，这些党就要被禁止。与过渡时期相容的只有一党政治。出于同样的原因，有组织的反对也是不能容忍的，先锋队党——或它的领袖——也不能容忍无组织的、个人的反对。谁反对党的路线，谁就是阶级敌人，也就是进步和人道的敌人，他必须闭上嘴巴。

7. 最后，集权的政治体制要求集权的经济管理。私有制被国有制取代了，个人积极性被中央计划取代了，资产阶级企业家被政府雇员取代了。通过这些方式，商品生产即便未被消灭，至少也受到了改造，异化和剥削都不可能了。

上述理论尽管在逻辑上不是无懈可击的，但它确实还是比较严密的。因此，是对是错，就要看它能否通过历史的检验了。

在对该种理论的一个批判性评论中，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元素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元素分离开来是没有太大必要的，这是马克思学〈Marxology〉的任务，而不是本文研究的任务。我愿意顺便对某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元素做些评论。我们也按上述命题的顺序来讨论。

1. 如果像革命派描述的那样，社会主义意味着对私人生产性财产的剥夺、社会的完全无产阶级化、国家所有制、中央计划、工作安全和社会服务，那么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存在很多社会主义了。必须做的只是把工资－薪金关系从80%或90%扩大到100%，通过对其他工业的国有化，把国有财产的比率从现有的20%或40%进一步提高，并强化国家计

划机器。强大的工人政党在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都存在；在某些国家，他们甚至控制了政府，在议会中占据了多数席位。

如果我们用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确定的目标——八小时工作制。每周工作五天、社会和失业保险、带薪假日和假期、工资的绝对上升和相对上升、普选权、义务教育、工会组织等等这些已经实现了目标来判断，我们肯定会得出结论说：工人阶级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大大改善其地位，因此在革命发生前就走向了社会主义。

最后，如果我们考虑相对力量地位，从《共产党宣言》发表时日起，工人阶级的力量无疑已大大提高了。想一想有力量的工会和执政的工党就够了。除此以外，各种工人参与管理形式的发展也被证明是可能的——包括少数但数目不断增长的完全由工人管理的企业。

概而括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无疑已在旧制度的膝下发展起来。在这方面，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与以往社会体制间的过渡没有什么区别。另一方面，没有暴力革命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教条，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为了这种教条，我们不得不等待革命，许多政治运动的确是这样做的。通过限制建设性的社会主义活动，它们没有促进社会主义，相反却保护了资本主义。为了“提高群众意识”和“点燃革命火炬”，人们的另一种选择是进行恐怖主义和其他破坏性活动。历史的经验表明，这第二种方法可能会产生法西斯主义。

比利时马克思主义者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提出了一种有趣的观点。他指出，以往的过渡社会都以特定的生产关系，而不仅仅是行将灭亡的旧生产方式与正在出现的新生

产方式的组合为特征的。西欧和南欧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4 世纪至 7 世纪）经历了一个与奴隶解放相伴随的半自由的和自由的小农制阶段；西欧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14 世纪至 16 世纪，按曼德尔的分析，是从 15 世纪至 17 世纪）经历了一个生产者大众既不是由农奴也不是由工资劳动者，而是由从事非封建、非资本主义的简单商品生产的自由农和工匠组成的阶段。我们现在仔细考察这一阶段。

它的开端以 14 世纪的农民起义为标志——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国 1358 年的扎克雷（Jacquerie）起义和英国 1381 年起义，大约终结于 16 世纪晚期尼德兰的漫长革命。整个时期都以农民起义为特征（意大利 1307，法国 1320，弗兰德尔 1323，瑞典 1474，波斯尼亚 1420 ~ 1434 年的 Hussite 战争，Catalonia 1462 年的农民起义以及德国 1525 年的农民战争）。继之而来的资本主义的形成时期——16 世纪到 18 世纪——我称之为商业资本主义，是以资产阶级革命为特征的：荷兰（16 世纪）、英国（17 世纪）、美国和法国（18 世纪）。封建主义在西欧的朽烂始于 14 世纪，十字军东征后，贸易的复苏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和货币经济的发展。13 和 14 世纪商业资本的更大集中以及细密的信贷机制的建立是货币经济发展的反映。封建领主感到日益需要更多的货币来购买新的、更尖端的商品。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逐渐被货币地租所取代，并随着货币贬值更趋于减少。农奴在城镇寻求庇护，用货币购买自由——有时是不得不如此。效率较差的庄园制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小规模的小农农业（Small - scale peasant agriculture）。小商品生产在农村和城镇都更加扩大。小商品生产者，即独立的农民和工匠，成了下一个时期资产阶级革命的推动力量。被我称为从封建主义向资

本主义（按生产方式定义）过渡时期的两个世纪通常被历史学家描述为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时代（这是其相应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

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同样是特定的。曼德尔认为这一社会的特征是一种混合的链接：基本上是非资本主义的计划社会和仍然与资产阶级分配关系相对应的商品生产的链接①，曼德尔的这一说法与其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观点是一致的。现有研究的分析表明这二者未必就是不相容的。曼德尔的理论可以重新表述为更令人信服的形式。过渡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国家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同时，十分显然的是，国家所有制和计划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在这种意义上，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可以被认为是两种形式的过渡社会。前者意味着通过政治民主过渡，后者则通过经济安全过渡。

2. 革命将在最发达国家爆发的预言是错误的，这已经成为常识。通过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和政治民主的持续开展，成熟的资本主义已经减少了社会冲突，避免了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似乎是一个分水岭。无产阶级变得更缺乏革命性，甚至变得更保守了（美国这一最发达国家即是如此）。激化阶级冲突的战略已是无意义的或是自拆台脚的。它脱离群众，并为镇压手段提供了合法性。“最薄弱环节”假说可以改造成更易为人接受的形式：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世界在经济上已经一体化了。在这一过程中，一国层面上的工人与雇

① E. Mandel, “Zehn Thesen Zur Sozialäkonomis Chen Gesezmässigkeit der übergangsgesells Chaft Zwid Chen Kapitalismus und Sozialismua” in P. Henniche ed. *Probleme des Sozalismus under derübergangsgesells Suhrkamp*, Frankfurt am Main, 1973, pp 15 - 37. esp. pp. 16 - 22.

主的社会对抗已经变成了世界层面上富国与穷国的国家对抗。结果，穷国的社会冲突放大了，穷国成了革命的策源地。

3. 在《资本论》序言中，马克思写道："工业较发达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展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一观点已不再是正确的。坦桑尼亚这样的国家能在苏联、在美国、或在目前尚不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实际上是裘力斯·尼雷尔和他的同事所喜爱的）看到自己未来的景象吗？如果不存在严格的决定论，权力本身虽然是必要的，但却不是充分的。对新体制的设计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传统上对权力问题的片面关注导致了许多成功的革命。列宁、铁托、毛泽东和卡斯特罗——这只是一些最重要、最有创造性的政治领导人——已经对如何夺取政权、赢得革命胜利做出了表率。与斯大林和其他更多的人一起，他们也对如何保持权力做出了示范。在政治理论发展的程度和应用技术一定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复辟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也没有出现。然而，尽管我们已非常清楚如何消灭资本主义，但我们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还是不很清楚的。

命题 4 是为了弥补漏洞而添加的逻辑学上的无根据的推理〈non sequiturs〉。它通常是用黑格尔式的术语来处理的。自在阶级〈class an sich〉只是潜在的是阶级，工人还不清楚他们的阶级地位。当他们了解了他们自己相对于其他阶级的利益后，他们就成了自为阶级〈class für sich〉。如果对自为做同义反复的解释（这种事常有人做，但不是很有用），命题 4 中的"客观利益"就不会产生预测性的结果。首先，自为阶级展示出的身份意识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后者可以美国的情况为例。美国工人的组织是相对完备的，也从事暴力性的阶级斗争，但他们却信仰资本主义。俄国工人中的许多人相信他们自

己是社会主义生产的主人。如果身份意识是正确的，那么它就会成为客观利益的一个来源。客观利益被说成是客观决定的利益，即它反映着一个社会团体的全部生活境况。与主观的或非理性的感觉不同，它是理性的、实际的或真实的，对其判断标准是人类尊严和个人自主的概念。在后一意义上，工人也许有消灭资本主义的“客观”利益，但他不见得就愿意去做。同样，一个人根据其医生的建议，参加锻炼、保持苗条是有客观利益的，但他可能发胖或早死，或抽烟抽的得了肺癌。这类的生活境况实际上不计其数。因此，眼下的或短期的主观利益很容易与客观利益发生冲突，造成不同的行动取向；前者未必就由后者决定。“客观利益”经常被等同于“历史利益”，这同样是一个含糊的说法。它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历史决定论，它也回避了谁来解释历史、如何解释历史这些问题。统治党的任何唯意志论行动都可以——而且通常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历史利益”来加以辩护。最后，即使考虑了客观利益和历史利益，个人利益和团体利益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这种差别由公共产品理论做了完美的阐述。作为团体，工人可以投票赞成公共学校，反对贵族上院，赞成国有化。但作为工人，只要有可能，他们常常会送他们的子女去专门的私人学校，进入贵族院，积累公司股票，因此出力保护了旧社会体制。显然，上述两重选择序列可以在任何阶段上出错，结果工人会拒绝消灭资本，就像1918~1919年大多数德国工人所做的那样。

然而，无根据推理还没有就此结束。即使工人拥有革命意识，即使他们渴望消灭资本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将要建设社会主义——像命题5所要求的那样。并且，他们的“客观”利益与他们的行为是两回事。为了说明问题，我们继续引

用斯威齐的说法。有人质疑斯威齐对马克思的解释，让他拿出证据，斯威齐做不到。“很容易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援引大量段落来证明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作用。然而，我还未发现具体讨论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能力或意愿的话。但却有一些话，特别是那些关于劳动分工对工人影响的内容，显然暗示着对无产阶级能力的一种否定性评价”①。斯威齐发现列宁也是持有类似观点的。在其写于 1907 年的《怎么办》一书中，列宁指出，历史表明工人阶级单纯利用自己的力量，只能发展出一种工团主义意识，使工人超越这一意识，将社会主义意识带给无产者是革命知识分子的功能。因而，无产者就从革命的主体变成了革命的工具。除此以外，还有另一种困难：如果整个阶级的意识都是错误的，我们怎么能肯定一个小的、自封的团体就能有正确的意识？显然，为了能够“代表”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按照自已的利益行事，宣布阶级领导权是件很便捷的事，不论这些利益是什么。

如果命题 5 是指建立一种人们已熟知的“工人阶级权力”，那么这里就包含着另一种矛盾，赛尔格·马莱〈Serge Mallet〉注意到了这一问题②。工人阶级只有与另一种非劳动阶级，即统治阶级相对比才存在。由于这一原因，恩格斯提出了他著名的论断：工人阶级通过占有国家权力而成为统治阶级的第一个行动同时就是否定他自己作为工人阶级的行动。因此“工人阶级权力”这一说法要么没有意义，要么被利用来隐蔽一个事实：工人阶级仍然存在，但权力却已被他人所有。至于这些人

① Sweezy and Beltelheim,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② S. Mallet, *Nova radnič, ka Klasa*, Belgrde: Komunist, 1970.

是谁，下面两个命题说得很清楚了。

命题6和命题7。如果先锋队党的作用不仅仅是代表工人阶级进行统治，还要对工人灌输一种社会主义意识，教导工人了解自己的实际利益，那么社会主义的承担者就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党和党的领袖了。既然任何一种社会体制的承担者都是该体制的领导阶级，我们终于得到了一种与事实相符的理论，尽管不是一种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经济集中加上政治极权，权力大大集中于统治阶级手中，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国家主义。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革命理论成了建设国家主义的理论，改良主义—修正主义理论则是有助于保护资本主义的。两种方法对我们都没有用处，除非是在否定的意义上。因此，建立一种过渡理论的任务仍然有待于完成。在我们从事这项工作前，必须更详细地分析两种对我们所探讨的主题极为重要的社会现象：革命和无产者。

（二）革命

如果一种社会改革没有引起社会秩序的根本性变化，我们称之为改良。如果变化是剧烈的，体制本身发生了变化，我们称之为革命。革命应该有两个特征：a. 存在结构性转变，b. 结构性转变不是渐进的。反过来，改良的特征则是渐进性和不存在结构性转变。然而，革命和改良不是对立的，二者也不总是截然可分的。两者互相包含，一个可以演变为另一个。改良的积累可能导致结构性变化，一场和平的革命看上去与比较剧烈的改革非常相象。最后，就事物的本质而言，革命不一定就比改良更有效率或更为可取。当我们谈革命时，我们假定结构变化不是由所讨论社会以外的力量施加的。

按照定义，革命导致主要价值观念、社会结构、生产关系

和各种社会团体所行使的政治权力的急剧变化。革命可以是暴力的，也可以是和平的。由于急剧变化通常需要或引起某种数量的暴力，革命就往往被与内战带来的暴力性社会变革等同了起来。在本书中，革命是指急剧的社会变化，分析的语境可以清楚地表明其形式是不是暴力的。

另外要注意的一点是，反革命和复辟也不一定像通常所认定的那样是一回事。革命（例如社会主义革命）可能败于反革命（例如国家主义的反革命）而不是败于旧制度的复辟。俄国革命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在过去的 200 多年中，历史已经记录了 20 起左右的资产阶级暴力革命和反资本主义革命。其中大多数都出现在本世纪。因此，我们比 19 世纪的社会主义者更有条件得出一些关于革命的结论。

1. 革命是阶级冲突的结果，被剥削阶级反叛统治阶级。但旧体制的被剥削阶级并没有取代他们的主人，也没有建设新的社会体制。古罗马的奴隶时有反叛，但从未成功。当古代社会被一波又一波的蛮族的进攻消灭之后，奴隶并没有成为下一种社会体制——封建秩序——的建筑师。中世纪农奴和农民也反叛其主人——有时甚至还取得了成功（如在瑞典和保加利亚），但他们没有建设资本主义。反资本主义的革命也没有将工人（和农民）变成统治阶级，相反，这些革命像以往一样，常常产生新的统治阶级。这些现象与前面引述的曼德尔关于相继社会体制之间过渡的不连续性的说法是一致的。

2. 参加革命的不是一个，而是几个弱势阶级。参加革命——甚至发动革命——的阶级的阶级利益与革命的最终结果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一致的。革命领袖经常来自统治阶级的

异化了的团体或其边缘。17世纪英国清教革命是由土地士绅领导的。在200多年里，政治权力一直保持在贵族手中。革命的领袖，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是一个绅士农场主，但他的军队却主要是由自由农、佃农、工匠、徒工和茅屋农〈Cottagers〉组成的。在这些人中，我们可以找到平等派，他们提倡政府民主化，各阶级平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时是贵族反叛〈révolte nobiliaire〉，但很快便激进化了。它的领袖包括像奥尔良大公〈the Duke of Orléans〉和德·拉法耶特〈de Lafayette〉和德·孔多塞〈de Condercet〉侯爵等贵族，像拉瓦锡〈Lavoiscer〉那样的科学家，还有记者，特别是许多律师（罗伯斯庇尔、丹东）。在1789~1794年的一系列聚会中，贵族和第三等级中的富裕成员逐渐被官员、律师和专业人士取代。尽管在开始时，中上层成员为革命活动提供了一些金钱，但暴动者中却没有银行家和商人，甚至很少有工业家（当然这种人本来就不多，法国当时只有12台蒸汽机）。革命大军是由小工匠、雇工和小店主、城市无产者、所谓的无套裤党人和农民组成的。当时，小资产者和工人间的分界线尚不分明。1789~1795年的激进的雅各宾派俱乐部中，大约60%是小资产者，40%是工人和农民。这些人所为之奋斗的理想自然是一种保护他们的小财产，使他们能独立自由地养活自己的家人，不剥削人也不受人剥削的社会。以一种多少有点简单化的方式，我们可以说，小资产阶级及其盟友为革命而战，对旧制度本无可抱怨的中上层阶级则收获了经济的和政治的收益。革命实际上在1830年完成了，当时一次大起义推翻了波旁王朝，而中上层阶级又捧出了“公民国王”〈Citizen King〉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lippe〉。在法国，小资产阶级毕竟参加了战斗，但在日本，

情况却不是如此。1868～1873 年的革命——被贴切地称为明治维新——很难说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资产阶级几乎没有参与（只有极少数个别人，最有名的是银行家三井，为倒幕派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日本的革命是由下层贵族——贫穷的武士阶层进行的。武士作为一个阶层，在德川幕府 200 多年的和平时期已丧失了其大部分功能。外国（西方帝国主义）的威胁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商人，被认为比贵族低下，仍然是被动的。农民则在维新前线两面作战。农民起义动摇了封建秩序，为革命做好了准备；农民军队与武士军队并肩与幕府作战。但另一方面，在明治时代早期，却发生了 250 多起反对新政权的农民起义。一些武士领导了革命，而另一些武士则成了革命的主要受害者。1870～1873 年的资产阶级改革之后，紧接着就来了武士起义，导致了 1874～1877 年的血腥内战。武士作为一个社会团体丧失了其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特权。日本革命的阶级动力学对以一二次欧洲革命为基础而做出的简单概括提出了严重警告。

大约半个世纪后，在另一个大陆，作为农民起义的结果，墨西哥革命（1910～1917）爆发了。墨西哥革命的奇特之处是工人没有加入农民的战斗。相反，他们的红色旅却与农民作战，并帮助拯救卡兰萨〈Carranza〉的压迫政权，以此报答官方对工会的承认。一年以前，工会曾为了爱国而支持了反动将军胡尔塔〈Huerta〉。农民战败了，但城镇和农村革命的许多要求后来都得到了满足。在卡德纳斯〈Cardenas〉总统的任期内（1934～1940），国家有了新宪法，普遍的劳动保护立法、正式教育和土地改革，这些一开始都是缓慢发动的，但都终结于剧变。

尽管前面提到的四次革命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同的，他们的领袖经常属于不同的阶级，而且其中有一次革命，资产阶级根本没有加入，但这四次革命无疑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它们都建立了资产阶级社会秩序。俄国1917年革命和1949年取得胜利的漫长的中国革命在意识形态上和组织上是由革命知识分子准备，由农民和工人（俄国）进行的。它们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但农民和工人都没有成为统治阶级。

3. 革命不是在被剥削阶级的压迫达到最大时爆发的。革命爆发之日，正是人们意识到除了压迫性环境，他们有其他切实可行的选择之时，而这又往往是繁荣时期因经济上或军事上的失败而突然中断的时候。在这样的时期，生产力发展与陈旧了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达到了最大化，达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挫折感和对权力的追求——而不是苦难——是革命念头的源泉。在16世纪，低地国家是欧洲最富裕的地区之一。西班牙王室增加税收的企图在1572年激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革命。英国革命之前曾有伦敦和布里斯托尔富商的不满，他们认为试行的税制改革是对他们的繁荣和地位的一种威胁。法国革命前的经济繁荣曾因1786年的关税减少而中断；由于东欧和黎凡特地区〈Levant〉爆发战争，对这些地区的出口减少，两者合起来破坏了许多纺织业和金属制造业的生产，失业增加，引起了经济危机。1785年的坏收成，其后的饥荒，和1788－1789年的寒冷的冬天将穷人的苦难和富人的不满汇合在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十年，俄国工业扩张迅速，战争导致的军事失败和巨大痛苦激发了俄国二月革命。墨西哥1910年革命则是在经济经历了20年的迅速发展后出现的。在这20年中，矿、糖产量都翻了两番，外贸和税收增长了十倍。与迅速增长

相伴而来的是同样迅速的贫富差距的扩大。金融和贸易被外国人和国内寡头所控制。在农村，1%的人口拥有 85%的可耕地，95%的农民无地可种。城市阶级无权参与政治，他们必然要与暴动的农民组成联盟。

4. 成功的革命往往是不成功的战争的结果，这些战争严重地削弱了旧统治阶级的抵抗力量；革命也常常是由民族解放战争激发的，人们在这种战争中看到了消灭可恶的外国者的支配的可能性，形成了彻底改变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意愿。不成功的战争导致的金融危机迫使查里一世召集了议会，使路易十六召集了三次会议。两次大会没有为皇家财政提供增加的财源，而是提出动议限制皇家权力。两位君主掉了脑袋。两个国家发生了革命。继法德战争之后而来的是巴黎公社，沙俄的军事失败产生了 1905 和 1917 年革命。西方军事威胁在明治维新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中国革命不得不对抗日本侵略和美国干预。荷兰（1572～1609）和美国（1775～1783）的独立战争是最早爆发的两次民族解放战争，这种战争有过许许多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战争给许多国家（南斯拉夫、朝鲜、阿尔及尔、越南、莫桑比克、安哥格拉）带来了社会变革。这一事实表明，在现代革命中，民族因素至少是与社会因素同样重要的。

5. 任何时候，革命只能在少数“富有创新精神的”国家爆发，也可能出现在少数在发展水平上大大落后的国家。统治阶级自然不愿有求必应地放弃权利和特权。通常，一种新体制在诞生以前没有人能确定它的生命力有多强。因此，统治阶级——或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乐于沉浸在自我欺骗之中，认为它能保护旧制度并因而动用暴力实现这一企图。结果，在一

些走在前面的国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愈演愈烈，终于酿成血腥的内战。新体制的生命力一旦充分显示，其他国家的统治阶级便别无选择，而只能步其后尘了——前提是他们的国家在发展水平上不是落后得太多。因此，先行国家的几次革命都是暴力的，而继之而来的其他国家向新体制的过渡则常常是和平的。除此以外，在非常落后国家的极端情形下，革命也许是走向发展、开始赶超过程的惟一手段。

6. 既然对各种可能性的清楚认识是至关重要的，知识分子在创造革命环境这方面就具有了重要作用。这就是安东尼·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的知识分子，是"每个阶级随自身而创造的"①。这一过程似乎有两个阶段。首先，一般文化环境开始起变化。先进的时代精神削弱了现行秩序的合法性基础。法国大革命即以伏尔泰、约翰·洛克、孟德斯鸠、卢梭和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建树为先导。哲学家和科学家用经验研究和理性分析动摇了习俗和信仰。按照自然法学说，一切人都是平等的。重农学派昭示了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原理。同样，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也都以空想社会主义、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蒲鲁东和巴枯宁、马克思、恩格斯和很多社会主义思想家以及两个国际的理论思潮为先导。它们彻底破坏了封建秩序和资本主义秩序的合法性，并提供了发动和领导革命所必需的基本思想。

在第二阶段，这一颠覆性的意识形态开始渗入易感团体，新的更大规模的革命团体进一步阐述和应用这种新意识形态。莱福德·爱德华兹（Lyford Edwards）和克雷恩·布林顿（Crane

① Q. Hoare and G. M. Smith, eds.,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 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1, p. 6.

Brinton〉注意到知识分子忠诚的转移是风雨欲来的最可靠的征兆①。在 18 世纪的法国，soctétés de pensée〈思想协会〉是非正式知识分子团体，这些知识分子从讨论启蒙著作开始，然后转向政治鼓动，最后为控制三级会议的选举出了力。君主专制在共济会〈Freemason lodges〉和雨后春笋般的政治评论中受到了毁灭性的批判。在 17 世纪的英格兰，清教教会起了类似的作用。在革命前的俄国，几个民粹主义〈Narodniki〉派别，如“土地与自由”派〈Zemlia i Volia〉和“人民意志”派〈Narodnaia Volia〉和虚无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造反学生也起了类似作用。俄国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因为在这里，马克思主义者即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在工人组织和工人运动出现前就已经存在了。裴多菲俱乐部〈Petöfy Circle〉的建立先于 1956 年的匈牙利起义。所有这些团体都是培育意识的组织。一旦社会意识的重要性被清楚地认识到了，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社会改革家传播新观念并从事政治活动，以此加速社会改革。但如果统治阶级方面对这种思想活动的爆炸性潜力有所觉察，事情则另当别论。一切专制政权都对知识分子进行控制，无情地镇压任何不顺从者的思想活动。

7. 革命的动态常常服从特定的格式。即使是暴力性的，革命开始时也往往是不流血或很少流血的（法国巴士底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然而，失去特权地位的阶级迅速开始反扑。革命面对着“贵族共谋”。一场内战继之而起。激情高涨，前所未有的英雄主义和献身意愿出现，但同时出现的还有前所未有的仇恨。运动激进化了，从温和走向极端。越极端越需要暴

① L. P. Edwards,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7, p. 41; Brinton, *Anatomy of Revolution*, pp. 41 - 45, 167.

力。过程的终点可能是一种恐怖状态。对被认为太温和、“太软弱”的担心又为革命激情火上加油。在道德上有所顾忌的人也许不能承受恐怖开始退缩。在一个激情四溢的氛围中，这是不容忍的。不仅敌对者被看成是叛国者，就连不完全合作的盟友也被认为是叛国者。陷于这样一种事态，法国吉伦特分于微尼奥（Vergniaud，他于1793年被处决）得出了他的著名观点：革命像农神一样吞食自己的孩子。俄国布尔什维克布哈林及其同事也可能说过同样的话。恩格斯有言，“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对派造成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①] 代价是沉重的。与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一起，革命也带来了道德上的卑鄙和堕落；各种无赖都搜寻着自己的希望之乡。革命一旦成功，继之而来的政权可能是专制的。执迷于权力的恐怖，加上一种宗教性的心理结构，造就了极权主义。对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终结果可能看上去很像格拉古·巴贝夫（Gracchus Babeuf）眼中的法国革命。巴贝夫在1797年受审时，对法官说：“我和我的同伴一直在为革命的不幸结果而呻吟……它只是用一伙新无赖取代了原有的无赖。”[②] 如果革命不成功，它几乎总是以法西斯主义而告终（就像匈牙利、德国、西班牙、希腊和智利所发生的那样）。

8. 在一个实行政治自由制度的国家，革命是不可能的。

---

① F. Engels, "On Authority", in. Marx and F. Engels, *Selected Works*, vol. 1, Moscow, 1958, p. 68.

② 转引自 H. J. Laski, *The Socialist Tradition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Fabian Society, Allen and Unwin, 1930, p. 23.

反过来，如果统治阶级用血腥暴力维护自己的特权，反攻的惟一办法是进行地下政治运动。一切革命都以秘密社团（早些时候）和非法政党（自布尔什维克党成立以来）为先导。非法的地下党不可能是民主的，在规模上也不可能非常大（俄国布尔什维克在 1917 年初不超过23 000人；中国在 1925 年初，即漫长的革命过程开始之前，只有 900 多名党员）。严格的集权和等级关系是必需的。领导人制定一切决策，党员则只有服从命令。国家机关的镇压活动和组织的地下性质创造了一种神秘的奉献气氛和救世感觉。二者都对宗教意识的苏醒和随之而来的一切后果施加了强大影响。这种意识在革命之后不会也不可能迅速改变。因此，结果就只能是一种救世主式的专政，而不是革命民主。当然，革命本身迅速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政治热情，极大地扩大了他们的政治参与范围，使他们拥有了非同寻常的政治经验。由此派生了各种组织自治政府的尝试。然而，恐怖、救世主义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过于强大，自治政府难以存活和发展。之所以如此，还有另外的原因，一个多少有些偏见但却十分聪明的观察者看到了这一点。托克维尔指出："因此，一个国家在刚刚结束一场长期的流血革命时，比在任何时候都更倾向于扩大中央政权的职能，这样的革命在把财产由其原有的所有者手里夺下来以后便动摇了全国的人心，使人们产生了疯狂的仇恨心理，把国家拖人利害冲突和党派倾扎的境地。此时，爱好社会安定的心理变成了一种盲目的激情，而公民则对秩序产生了一种反常的热爱。"①

9. 最后，不论真正的社会革命能否贯彻一种新的正义观

① *Democracy in American* (1840),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7, p. 318.

念，它们都成功地消灭了老而无用的旧体制，建立了一种使经济能够更迅速发展的新体制。革命是历史的真正火车头。随之而来的是爆炸性的经济增长、丰富的文化发展和令人瞩目的政治权力的扩大。17世纪的尼德兰和英格兰，18世纪的美国和法国，19世纪的日本和20世纪的墨西哥、俄国、南斯拉夫和中国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在这种意义上，不发达国家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尽管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却并不是全然无用或对历史没有影响。它们是经济增长的有力工具，起初在发展水平上落后的国家主义各国一直追赶着率先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

上述历史分析表明革命带有巨大的社会风险。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成功了，往往导致国家主义；流产了，则导致法西斯主义。革命经常造成人类生命的巨大损失并为革命后社会漫长的专制铺平道路。不容置疑的收益只是更快的经济发展和更平均的收入分配。收益是否能补偿牺牲呢？难道人们不该倡导改良避免革命吗？

这类问题不是真问题。因此，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是没有意义的。真正的社会革命无法设计，也不能禁止。被剥削人民对压迫和暴政的反抗也是不能被禁止的。在某些社会形势下，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进步运动能做的只是对革命过程施加某些有意识的控制。上述分析的目的不是要表明革命是坏事（既然它们一般情况下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或好事（既然它们加速经济增长），而是要提供一种解释，说明革命后社会的特征以及这些社会带给人们的失望。如果我们了解了有关风险，我们也许能在某种程度上避免这些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许能驾御革命，使之产生更合人意的结果。

第二节　工人阶级

(一) 革命与改良

第三等级要获得解放，前提是消灭一切等级。这意味着建立一种资产阶级秩序。同样，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是消灭一切阶级。既然它不只是被剥削阶级，而且是当代社会的主要生产阶级，不消灭阶级社会，工人阶级就不能解放自己。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因此，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的承担者。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动人的历史概括，但它的简单性是具有欺骗性的，而且很容易引人误入歧途。

虽然，统治阶级的利益在于现状之中。变化的动力只能来自被压迫者的不满。在被压迫者中，农民是旧体制的残余，中间阶级——小店主和工匠——将和农民一起被资本原始积累从经济上消灭。1848 年的《共产党宣言》得出结论说，真正的革命力量只能是工厂工人——工业无产者。他们是新的、最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工业无产者的另外两个特点也受到了重视。工厂工人是集中的、富有纪律性（因为生产纪律的缘故），因此很容易组织起来。他们不拥有财产——不像农民那样——因此他们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这三大特征使他们成为当代社会的革命阶级。

毫无疑问，19 世纪欧洲的产业工人是倾向于革命的。革命在这里既意味着急剧的变化也意味着暴力。19 世纪的社会政治史实际上是由一长串的暴力事件组成的。1811 ~ 1817 年，英国卢德派砸碎了节约劳动的纺织机器，对抗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秩序，这一秩序剥夺了他们自以为是不可剥夺的权力。

1830年，巴黎爆发了七月革命，一个月以后，比利时革命接踵而至。第二年，后来又在1834年，里昂爆发了织工起义。英国宪章派在接下来的20年中一直不懈地战斗。1844年，西里西亚织工暴动。1846年，克拉科夫（Cracow）爆发了起义。1848年，巴黎、维也纳和米兰出现了路障。第二年。路障出现在俄国、德国城市。革命遍及欧洲。1871年的巴黎公社代表了革命的最高潮。俄国革命是一个落后国家的反应。在19世纪最后30年的阶级和睦之后，革命工团主义和总罢工又掀起了新的革命高潮。它在俄国1917年的两次革命和欧洲更多国家战后伊始的革命动荡中达到了顶点。然而，欧洲工人的革命暴力行动此后即告结束。何以如此？

欧洲最发达的国家——英格兰，带着一种与现代极权主义相类似的社会政治组织进入了后拿破仑时代。工人、农民和大多数人口都没有政治权利。结社是被禁止的。间谍和奸细比比皆是。虚伪的审判实施残酷的惩罚。工人领袖被捕。工作条件恶劣。实际工资很低，甚至还在下降。罢工被军警驱散。无产阶级自然要造反。局部罢工变成了起义。工会和社团只能非法地或半合法地活动。有组织的抵抗酿成了宪章运动。此后，态度发生了变化。资本原始积累基本完成了，新增加的投资可以从利润中或从股票发行中（1855年，股份公司合法化了）筹集；企业家不需要节衣缩食地积累了。雇主更愿意谈判了。实际工资开始上升——从1850年到1900年提高了70%到80%，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再扩大。工人不再被看成是危险的兽类了。选举权不断推广直至变成普选权（当然只是男人的普选权）。工会合法化了。最后，工人政党出现了。1848年以后，推翻资本主义的企图被一种阶级妥协和阶级合作所取代。这一

趋势在另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出现了中断，但从那以后，就基本上持续不断地行进着。

在欧洲大陆，对英国这一榜样的追随有一段时滞。在19世纪下半期，工会在所有欧洲国家都取得了合法地位。同时，社会民主党在各国相继成立。1864年，第一国际的建立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当工人政党形成政府，工人领袖开始进入议会时，这一时代就正式确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活水平的持续上升，体力劳动者在劳动力中所占份额的下降，新工作种类的大量出现，都与革命精神渐行渐远了。保罗·斯威齐指出："像在工场手工业时代一样，无产者又一次高度分化了，职业和地位意识又一次要吞没阶级意识。"①

人们也许会得出结论说，当工人力量过于微弱，不足以推翻资本主义体制时，他们有革命倾向。当他们的数目增长起来，当他们成功地组织起来，形成工会和政治团体，甚至形成国际性组织时——简言之，即他们有了足够的力量完成推翻资本主义的任务时——他们却自我约束，不去完成这一任务。为什么会这样？显然，合法性杀害了革命。市民平等待遇使无产者找到了依靠。如果实情如此，它是否可取呢？下一章将回答这个问题。现在我们考虑另一个问题——无产者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是怎样的。

(二) 不同的工人阶级

欧洲工人阶级在总体上是进步的，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工会组织罢工或是威胁要总罢工，迫使奥地利、德国、比利时、瑞典和其他地方的统治阶级推行了男子普

① P.Sweezy, *Modern Capitalism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72, p. 160.

选权。在这方面，马克思的预测是正确的：为了求得政治上的解放，工人迫使（西）欧洲统治阶级建立了面向所有人的政治民主。在上一世纪，工人及其政党支持了盖里鲍迪〈Garibaldi〉、考苏斯〈Kossuth〉和波兰解放战争。在本世纪，他们迎接了十月革命，采取了反对西班牙弗朗哥的立场，抵制了慕尼黑对希特勒的退让，并谴责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1933年以前，德国城市工人阶级比其他社会阶级更坚定地抗拒了纳粹的诱惑。在法国抵抗运动中，工人（劳动者联合会和共产党）起了中流砥柱般的作用，一切劳工党派、社会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都宣布社会主义是他们的最终奋斗目标。

工人运动不完全是进步的，它也包括保守主义团体，这些保守主义团体主要是面向职员或是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后者惟其民族资产阶级马首是瞻。保守派别在欧洲一般不很重要。然而在美国，情况却截然不同。这里，保守派极为普遍，社会主义则是极罕见的例外。对美国这种现象，我们需要做出解释。

工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建立了两类组织——工会和政党。工会行使两种职能：一种与解决冲突有关，一种与福利有关。工会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减少工作时间，禁止使用童工。如果必要，他们会举行罢工与雇主对抗。工会还制定各种各样的保险计划和养老方案，提供教育设施，并提供必要的帮助。在保护其成员的利益方面，工会显然是资产阶级的对头，工会越是强大，雇主的让步越大。然而，在这两种功能上，工会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界限。从这个角度看，它们是保守的。只有当工人政党出现后，运动才不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这一论断在美

国获得了精密的证实。

在欧洲，工人阶级是在半封建的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为了改善其社会经济地位，他们首先必须获得政治权利。在争取其自身利益的战斗中，工人阶级推动了社会的民主化。他们的态度由其社会的和政治的地位而决定，因而必然是进步的。在美国，在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政治民主已经出现了。经济发展迅速，工人数目急剧增长。早在 1828 年，世界上第一个工人政党（实际上是从事政治运动的地方工会的联合体）就在费城出现了，这一发现并不令人吃惊。在后来的 6 年中，类似的党出现在 61 个城镇和村庄中。他们主张免费教育、限制童工、10 小时工作日，主张废除对欠债人的监禁和选举税。1832 年，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第二次当选为总统，他支持了工党的主张。很快各州便实施了一个又一个工人纲领。各党派解体了。此后，大约与欧洲同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美国建立了。但这些政党从未取得全国性的成功。第一国际总部甚至也迁移到了美国，直至该组织于 1876 年消失。由于美国工人从一开始就被整合进了政治体制，他们并不觉得需要有自己的政党。

美国缺少强大的工人政党的另一原因是美国土地充足。那些得不到满足的人总能离开、西去，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大规模的地区性流动。这种流动性当然不利于党和阶级团结的发展。第四个原因是，由于经济快速增长和移民的大量流入，较大的纵向流动出现了。美国是一片充满希望的土地。涌入的移民提供了肮脏、简单和低薪的劳动力供给。早来的人地位自动上升。较高的移民比率同时也意味着阶级团结常常被种族团结所取代。种族界限与技术方面的差别

恰好重合——移民大都是半熟练的或无技术的工人，这使得现存于技术工人和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冲突更加强化。另一方面，大量的纵向流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身份障碍。

最后，免费公共学校、迅速上升的生活水平和该国不断扩张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创造了国家自豪感和对社会制度的认同。80%以上的人相信“美国的生活方式比其他任何国家更为优越”。①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美国工人阶级只想在国家馅饼中分得更大的份额，对其他的一切没有兴趣，也从未形成一种社会主义阶级意识。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曾一度濒于崩溃，失业持续增长，1500万人失去了工作，当时，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人数很少——试图组织失业者闹革命。在1932年的总统选举中，美国工人没有选择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而是将票投给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罗斯福没有让他们失望，这是后话）。没有阶级意识并不就是说阶级关系是田园诗一样的。相反，美国商界人士是野蛮凶恶的对手。与他们相比，欧洲资产阶级几乎可以说是温情脉脉的。煤矿矿主是特别残酷的。赫伯特·阿贝尔〈Herbert Abel〉描述了在大选前一年哈伦〈Harlan〉和贝尔〈Bell〉县是如何用恐怖来保护美国生活方式的：“矿兵队伍夜间在乡下巡逻，恐吓居民。用催泪瓦斯驱散集会，搜查几乎每晚都有，并经常造成人员死亡，房子被拆，财产被罚没，邮件被损毁，极小的抵抗都会遇到枪弹弹压。”② 许多人因工团主义罪被逮捕。外来者受到毒打，被赶出县界，其财产

① R. Lane, “The Legitimacy bias”, in Denitch, *Legitimation of Regimes*, p. 63.
② 转引自 I. Bernstein, *The Lean Years*, Baltimore: Penguin, 1966, P. 381.

被强占，一个臭名昭著的枪手受雇杀了数人。罢工者不得受救济。到 1931 年末，工会被粉碎了，矿主控制了工人。①

在美国，工会活动（集体谈判）直到 1935 年才随着罗斯福当政时通过的“国民劳动关系法”一起取得合法地位。为了阻止这一法案的通过，雇主们曾组织了全国性的游行示威。参议院的一个调查委员会（拉·弗来特委员会）的记录对当时的情景做了这样的描述：

> 洛杉矶最有影响的商业和金融利益集团试图破坏“国民劳动关系法”中所表述的集体谈判政策……他们进行了一系列有组织的密谋来毁灭劳动者的民事权利……他们与当地报馆、警察、执法官组成联盟……有组织的密谋干预包括：大量应用通常的反工会手段(例如劳工队伍渗透)，使用专业性的罢工破坏者，使用武力、黑名单、歧视性解雇……企业和行业的领导人（不论是名誉的还是实际的)、银行业和金融业团体、地方报馆的领导人，最近还有许多官员站在这些普通而坚决的活动背后。②

在哈伦煤矿，公司卫队“迫害居民，惩治劳工运动组织者……私人帮派恐吓工会成员……充当私人雇佣的代理司法长官部队的帮手”。“在公路边、在开阔地和他们的家中”，受雇帮派“不断枪击工会领导人，对他们进行绑架、攻击，炸他们的

---

① 同上。

② 转引自 M. Dobb,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3, pp. 354—357.

房屋”，同时，“用许多不寻常的金融手段策动和腐蚀高层司法长官”。在加里福尼亚的农村地区，大商业利益集团资助的帮派用枪手、刺探和暴力“不受惩罚地实施着一种暴虐体制”。[1]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将委员会的其他发现总结如下：

> 美国大公司花费了大量开支购买军火。雇佣武装卫兵，用来对付罢工和工会组织者。……对个人时时处处尾随盯梢加以恐吓，在每个工会内部安插密探，以刺探并瓦解工会，这些都是比较温和的手段。他们[私人警察]对个人进行攻击，驱散集会和示威，毁坏工会办公地点。

拉·弗来特本人报告说，私人雇佣的“卫兵”和“代理”经常是从侦探社雇佣的。许多人都有犯罪前科。用这些人来篡夺警察地位成了乡下许多地方和工会领导人有巨大危险地区的惯例。[2]

阶级斗争的严酷性并不意味着被剥削阶级就是进步的。尽管美国劳工运动史上有许多进步性活动，但工会仍然是保守的并被完全整合进了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以一种做生意的方式与雇主打交道。工人的物质利益合法化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只要条件允许，所有人都指望通过竞争改善自己的地位。作为回报，“管理者特权”（Prerogatives of management）必须受到尊重。在舆论中，大工会领导人与雇主、经理和国家官员具有同等的地位。美国工人信任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私有企业。在战后的

① 转引自上书。
② 同上。

危机形势——冷战、麦卡锡主义、对中国的干预、种族主义、越南战争——中，美国有组织的劳工采取了保守，有时甚至是反动的立场。有时还表现出了种族主义态度。抗议和战斗的是学生、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激进派和黑人活动家，而不是工人。这些团体在华盛顿游行示威，撕毁征兵卡，组织宣讲会。而工人则几乎毫无例外地采取了“负责任的爱国主义”〈responsible patriotic〉立场，支持政府，继续制造凝固汽油弹，有时拒绝装卸中国船只（码头工人），有时殴打不爱国的示威者（像建筑工人所做的那样），南方工人则支持种族隔离。美国显然是有阶级斗争的，这一斗争比别处更为激烈，但这一事实并不一定就把工人变成进步阶级，进步的美国人不是在工厂而是在大学。

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区分两种不同的工人阶级：欧洲进步的无产阶级和美国保守的工人阶级。在殖民地国家和落后国家中，还存在第三种工人阶级。在这些国家，规模不大的现代工业部门（通常由外国大企业支配）是一个位于城乡极端贫困大海中的富裕之岛。工厂工人和矿工通常有点文化，收入也比农业劳动者和大多数不识字的农民高出许多倍。简言之，城镇无产者是一个特权阶级。他们可以接受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与民族资产阶级共同作战，对抗殖民力量和帝国主义的控制。然而，他们对生活于赤贫中的大多数人口的社会解放并没有特别的兴趣。这些工人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中间阶级，他们生活条件并不适合于马克思的阶级解放公式。

（三）社会化的后果

我们能注意到一种更深层的复杂性。一个阶级的态度并不完全是由其经济地位决定的：低下的国内经济地位未必就会使

之成为进步阶级。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在维护全世界的不平等交换方面具有特定的经济利益。而不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则是这种不平等交换的受害者。工人有更多的经济方面的理由成为沙文主义者而不是资产阶级。马克思本人曾在1870年4月的一封信中指出："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作会使自己的生活水平降低的竞争者。"很久以前就有人注意到，在经济上，工人有一种自由主义倾向。他们赞成消除贫困、赞成社会安全、免费教育、高工资、累进税制和社会平等。从社会主义运动早期开始。他们就一直被认为是如此行动的。然而，后来人们发现，他们的政治态度——关于政治权利、国际关系，等等——却不是如此自由的。相反，工人常常是不宽容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有时是种族主义的，并常常支持专制政权。对这一已为研究所证实的事实，我们需要做出解释。

赛摩尔·马丁·李普赛〈Seymour Martin Lipset〉注意到政治权威主义可以以当代三大阶级的任何一个为基础建立起来。① 上层阶级经常是表现为君主制的传统权威主义的基础，这一点已为人们所熟知。人们也比较清楚，地位不稳、挫折重重的中间阶级往往倾向于支持法西斯主义。工人阶级权威主义则另有其特性，它通常以两种形式出现。这两种形式可以分别称为斯大林主义和庇隆主义〈Peronism〉。我们已分析过斯大林主义，现在来看庇隆主义——一种以军事和下层阶级的联盟为基础的反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民粹论。

胡安·庇隆〈Juan Peron〉在一场由军队和工人支持的政变

① S. M. Lipset, *Political Man*, p. 108.

后，于1946年成为阿根廷总统。在取得权力前，他一直掌管劳动部。他的职责是控制工会并阻止罢工。庇隆利用这一地位赢得了工会领袖的支持。在他掌权期间，庇隆对某些工业实行了国有化，通过法令改善工人生活水平、提高工资、保护农业劳动者和佃农，并实行了社会保障制度。群众的社会经济权利写进了1949年宪法。庇隆的反帝倾向吸引了民族主义官员、爱国资产阶级和工人。他的主要支持者是工会，工会在庇隆执政期间扩大了力量，并完全为庇隆主义者所把持。庇隆与城市无产者和贫苦农民的联盟遭到了中层阶级、大企业和地主的强烈反对。

到此为止，这个似乎很进步的领袖的故事没有什么特别的。然而，庇隆也鼓吹强国家，赞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些人又“无条件地崇拜斯大林的天才”）①，强调领袖的主导作用，领袖的权力被认为是直接来自人民的。庇隆主义鄙视议会政治及其“无能、腐化的政治家”，对宪政法制也没有什么尊重。1955年，庇隆被异己军官和教会废黜了。在流亡中，他本人也被证明是一个腐化的政治家；但这一事实并没有减少阿根廷工人对他的兴趣。下台不到20年，他又成功地回国就任总统。他不久后去世，国家陷入混乱。

拉丁美洲其他地方（如热图利奥·瓦加斯在古巴）也试行过庇隆主义，但不是很成功。

斯大林主义和庇隆主义表明工人可以受煽动、被利用去反对他们的历史利益——这虽然可能有利于他们的短期利益，但却肯定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有利于他们的利益。这仍然是由

---

① H. Arendt, *Elemente und Ursprünge totaler Herrschaft*, Frankg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anstalt, 1962, pp 460 - 461.

工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工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他的心理态度。诞生在下层阶级——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一个阶级——中的孩子面对着一个敌对的世界。家庭的低下的生活水平本身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社会对他的歧视。他的母亲受教育不多，也没有多少时间照顾他。家里不会有多少图书，因此，他的读写能力很有限。缺少早期家庭教育，家里没钱，这又使他很难受更多的教育，导致他无法通过竞争性的考试。家庭行为模式可能是权威性的。父母擅用惩罚，无暇讨论。在工作场所，他也必须服从。为了成功，人必须受人役使。久而久之，等级式的社会组织就成了理所当然的。幼年时，也包括他成年以后，他很少有消息来源。他与流行的中间阶级文化格格不人。他缺乏安全感，失业的威胁使他的不安全感进一步扩大。他没有理由相信社会，他的个人经历告诉他，权力才是惟一重要的东西。童年时的紧张和攻击性气氛和糟糕的教育一起，助长了种族偏见、政治狭隘性和简单化世界观的发展。例如，大多数美国工人不允许共产党人和无神论者在公共集会上发言，反对将他们的书籍放人图书馆，甚至赞成监禁坦白的共产主义者。个人的总的生活情景使他狭隘（对观念不同的人必须怀疑）、服从那些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否则这些人会进行报复），并对每一种变化狐疑不定（变化极可能造成痛苦）。对不顺从者的不容忍和在权力等级中的顺从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社会地位越低，受教育越少，这种态度就越明朗。加人工会和政党使它们有所改变，权威主义的锋芒有所减弱。如果工会不发达、政党不合法，这种态度会很显著。如果出现了一个政党，与之俱来的还有安全、信任和简单的解决方案，它的诱惑将是十分巨大的。既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社会化规定他

们尊重权威，那么他们就可以被作为支持权威主义政体的纪律严明的军队来利用。国家主义中出现的似乎就是这种情况。虽然专政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除非它是从外部强加的），但无产阶级却支持这种专政。

至此，我们已经考虑了资本主义工人的态度。关于国家主义工人的态度，我没有可资比较的经验性资料，虽然可能没什么两样。革命之后，在自治的背景下，发生了什么事情？了解这一点可能是极为重要的。只有一个国家可以作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的对象，这就是南斯拉夫。乔佐·佐拉诺夫〈Jozo Zupanov〉对调查资料做了分析，发现经过一代人的工厂自治之后，国家主义倾向在工人中间仍然深入人心。① 维列克·鲁斯〈Veljko Rus〉对另外 15 个集体的研究表明，工人有明显的亲国家主义倾向。生产工人比其他任何失业团体都更经常地认为国家之强化对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远比扩大自治团体或专家的权力更为重要。② 兹夫克·马尔科维齐〈Zivoko Markovic〉通过评价对减少国家权力、提高自治机构在工作组织中的作用以及将自治作为一个基本原则的态度，度量各社会阶层的社会主义意识水平。他得到了下列结果（100 为最高水平）：农民，36；工人，54；知识分子，65。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倾向比技术知识分子高出 6 点。③ 米海洛·波普维奇〈Mihailo Popovic〉指导的一项雄心勃勃的研究项目考察了塞尔维亚的社会结构。

---

① J. županov, *Samoupravljanje i dručtvena moć*, Zagreb: Naše teme, 1969, p. 56.

② V. Rus, "Novi model samoupravljanja i njegova relevantna društvena okolină" in J. Obradović, V. Rus and J. županov, eds., *Proizvodne organizacije i samoupravljanje*, Zagreb: Filozofski, fakultet, 1975, p. 50.

③ ž. Markovic, "Samoupravljane i klasna svest komunista," *Gledišta*, 1975, pp. 609 – 620，特别参见 pp. 618 – 619.

在这项研究中，社会意识是用多种“意识形态方面”来描述的。它假定诸如自治的倾向、对世界的开放性、对社会财产的认可和人道主义等价值观或态度是社会主义意识的特征。结果发现，非体力工人在所有这些方面的得分都比体力工人高出很多。农民的社会主义意识水平最低，非技术工人拥有传统的或典型的工人阶级意识。N·洛特（Rot）和N·哈维尔加（Havelca）发现，父母是农民或非技术工人的中学生具有民族主义倾向，而受过大学教育雇员的子女具有国际主义倾向。[①] S·弗尔加恩（Srdjan Vrcan）报告说，体力工人比知识分子更有宗教倾向[②]。一般而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形成的态度在自治的环境中仍会持续，上述高下次序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会保持不变。然而，必须注意，这只是就第一代工人而言。他们大都是农民子女，其意识是在传统农民的价值观和态度的影响下形成的。与非体力工人相比，体力劳动工人受教育少，收入低，社会经济地位低（在体力劳动者内部，非技术工人和农民比起技术工人也是如此），这些调查数据似乎证明教育水平、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有利于社会主义态度的发展。

我们所分析的真实世界和不得志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或党的鼓动家所描绘的浪漫且近乎神秘的景象相差甚远。这种反科学的浪漫主义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它阻止人们从对经验事实的分析中获得可靠的知识。工人不是天生的社会主义建筑师。否则，资本主义就不会是一种异化的压迫性制度了。资本主义为了顺利运行，必须使工人相应地社会化。它实际上也正是这样

① N. Rot and N. Havelka, *Nacionalna vezanost i vrednosti kod srednjoškolske omladine*, Belgrade: Institut društvenih nauka, 1973, p. 247.

② S. Vrcan, "Radništvo, religija, crkva", *Revija za sociologiju*, 1977, p. 12.

做的，在家庭、学校、公共场所和公共生活中都是如此。这种社会化意味着对把等级制和服从作为至高无上的价值观予以接受。

特别要强调的是，工人不是被送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人类的救世主。在几乎长达 200 年的时间内，工人一直是一个被无情地压迫和剥削的团体。但他们不得不承受的苦难和经历的遭遇并没有——也不能——使他们获得精神上的升华，工人并没有因此成为圣人。宗教观念和伦理标准与科学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它们只能拖长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人民团体之所以采取某种行动，不是因为他们天性好坏，不是因为他们天生进步或反动，而是因为其客观的或想象的阶级利益决定了其行为。经验和经验性研究表明休戚与共、同志关系、平均主义和战斗纪律一般是体力劳动者的特征。权威主义、不宽容和服从也是他们的特征。这两组特征可以按不同的方式组合并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我们已经注意到，无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蕴涵着巨大的进步潜能。我们也注意到了工人态度上的局限，这种局限可以用于反动的目的。一种潜能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不是预先决定的；一种事件在发生以前是不能写进教科书的。一切决定于社会行动；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第三节　新工人阶级

（一）劳动力结构的变化

历史的景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又一次发生了变化。中间阶级的消失这一预测在若干时日前已被清楚地证伪。旧有的中间阶级确实近乎消失，但代之而起的却是由专业人员、技术

人员、职员和销售人员以及政府官员组成的新中间阶级。实际上，这一新中间阶级还在迅速扩大。其扩大的速度远比工人阶级更快。活动人口的职业结构已出现了简单却非常一致而且分明的变化。在上一世纪前后，农民或农业者的份额以从 50% 或 60% 以上下降到了 10% 以下。体力工人的份额因此从 15% 或 20% 上升到了 50% 左右。同时，新中间阶级的份额从大约 5% 上升到 1/3 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人力后备实际上已经枯竭，进一步的结构转换只能以牺牲体力工人为代价了。体力工人的份额下降，而非体力工人（不知他们是否还应被称为工人）的份额上升了。同样，商品生产部门的份额，即便不计算农业部门，出现了下降，而服务生产部门的份额则上升了。工党和社会民主党通过扩大其阶级基础对此做出了反应。工党变成了人民党。10 年、20 年后，众多共产党也开始仿效这种做法。政治学词汇表中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劳动人民。"

劳动力结构的这些变化对社会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体力工人的社会团体萎缩，它们便不可能提供新社会制度发展的基础。**既然现代工人——不论是工厂工人还是其他工人——都在相同条件下工作，我们有理由将工业无产阶级的概念予以扩展，包括一切体力工人，简称为无产者。从数量上看，这种广义上的无产者的重要性是不断下降的。当然，工业部门的份额也在不断下降。一个人数越来越少的社会团体不可能怀有革命态度，他们更可能采纳正在扩大部门的价值观，并以进入非体力职业为目标——即便不为他们自己，至少也得为他们的后代做这种考虑。

为了避免误解，我们需要做一点解释。旧有的工人阶级（工业无产者）已不再是革命的主体，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革

命潜力在一夜间蒸发掉了。我们也不认为在团体规模和其意识间有一种机械式的联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特定的社会变化和技术变化条件下，旧有工人阶级现存的革命潜能只会递减不会增加。

关于工业无产者革命地位的全部思想来源于这一事实：工业生产相对于其他部门不断扩大，因为它比传统的生产形式更加优越；工业创造了工业无产者。在最发达国家，这两点都已不再是正确的：（1）现代非工业（服务业）生产并不比工业生产落后，而且前者比后者扩张得更快。（2）在工业（产品）生产内部。传统体力劳动者的份额不断下降。为了理解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必须简要考察上两个世纪的劳动史。出于前面已谈到的理由，我仍主要考察英国劳动史。

（二）发展阶段

工业革命之初，工匠——师傅和徒工——受雇生产较为传统的商品。这些人常常是有文化的，在本行业经历了长期的技术培训。接下来一个世纪左右的历史是工人逐渐非技能化以及工人被变成工厂人手的历史。我们的工匠不可能明白这一点，但他们知道他们必须保护自己的利益。为此，他们联合起来，形成公谊会和最初的工会。有时，像在早期美国工会或波利维亚的第一个现代工会——1905年的国民印刷业工会中那样，所有者和学徒在同一个工会中联合起来。因此，直到19世纪40年代晚期，在许多英国城镇，“实际的核心是由鞋匠、织工、鞍工和马具制造者、书商、印刷工人、建筑工人、小生意人等组成的。劳工运动从这一核心获得思想，围绕着这一核心

组织起来并接受这一核心的领导”。①

扩大的市场有力地推动了某些传统行业的发展，因此，印刷工人、裁缝、家具木工、装订工人以及其他少数行业的工人（在英格兰是如此，在别的地方也没有太大不同）将他们的协会一直保持到19世纪的60年代和70年代。另一方面，工厂制度生产出了工人大众，他们被剥夺了自由权，被残酷无情地剥削。工匠和劳工这两组工人之间的鸿沟的确很大。工匠继承了等级意识，以为他们自己与其雇主是同一社会阶层的人。他们试图保持或提高（如果可能的话）自己的社会身份。劳工觉得受到了排斥，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兹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注意到，“工厂工人不能建立稳定的组织，很少参与社会活动……一旦当他们如此做时，其表现往往是极端暴力性的，一触即发。”②

因此，在19世纪上半期，现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无产者尚不存在。它只是刚刚开始从一群小生产者、半无产者、外勤工作人员、小生意人和乡下人中分离出来。所有这些受剥削团体，与真正的无产阶级一起，被称为劳动人民〈working people〉或劳动贫民〈laboring poor〉。尽管大多数工人以工资为生，工资却不是作为劳动力的价格，而是按提供的商品（例如，布匹数或煤的吨数）的价格支付的。与此紧密联系的一个现象是霍布斯鲍姆〈Hobsbawm〉所说的联合剥削〈co－exploitation〉：熟练工人作为其同伴或不熟练工人的联合雇主。工程雇主雇佣“段长”〈piece master〉，段长雇佣工匠，工匠雇佣并支

①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Gollancz, 1964, p. 193.
② Bauman, *Between Class and Elite*, p. 41.

付他们自己的劳工。在棉纺织业，资本家付给走锭精纺工计件工资，后者雇佣接头工和干洗工。在矿、铁、瓷和其他行业，情况与此相似。“古老工业（例如，19世纪早期的英国工业）的结构性的特征是，除了最底层的劳工以外，每一层的男男女女都有某种‘利润激励’”①。明确的转包方式成功地生存到了第二阶段，直到19世纪70年代后才开始衰落。

由于工会是非法的，工人为了保护其利益必须为政治权利而战。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伦敦的工匠、兰开夏和约克夏的工厂工人和手工织工以及纽卡索和威尔士的煤矿矿工在宪章运动中团结起来，要求男子普选权。1848年后，这一运动瓦解了，新工人阶级发展的第一阶段也随之结束。

1850年前后，铁路建设、汽船的出现和精密工程的发展导致了新技能的出现，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差别扩大了。在这一期间，建立工会的几乎都是技术工人。这些工会在英格兰被称为“新模范工会”（new model union）。首先出现的1850年的工程师混合工会（the Amalgamated Society of Engineers）。该工会的理事会很快就表明了态度，希望雇主“不要将我们这样的协会看成祸害。他们将会理解协会不是为了损害他们的利益而是为了提高其工作人员的素质并成比例地减少他们的责任，以此促进他们的利益。”② 待遇低劣、缺少技术的工人大众被雇佣来修建铁路，在工厂内外做那些又脏又重的工作。在前一发展阶段，工匠拥有相对较高的社会身份，而新技术工人则没有社会认可的身份，他们希望获得这种身份。为

① E. J. Hobsbawm, *Labouring Men*,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8, p. 297.

② 转引自 W. Lazonick, “The Subjection of Labour to Capital”,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78, pp. 1-31, 引自 p. 22.

此，技术工人接受了资产阶级价值观，模仿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并试图与其他无产阶级划清界限。为了在金钱上表示尊贵，他们结成了资金较为雄厚的公谊会并反对罢工，罢工能消耗他们的资产。

工人投之以桃，统治阶级报之以李。1867 年的改革法〈The Reform Act of 1867〉赋予所有可尊敬的工人以公民权。次年，工会大会建立，巩固了新工会的利益。1871 和 1875 年的法案使工会拥有了适当的法律地位和纠察权。又过了一年，臭名昭著的主仆法（按照这一法案，工人违约可被监禁）被废除了，雇主和劳工法（违约成为纯粹民事问题）取而代之。阶级斗争似乎结束了，但这只是假象。

在第三阶段，工业生产的机械化减少了技术工作和非技术工作的数量，而半技术工作的数量却增加了。半技术工人被雇佣来看管机器，这是只需要敏捷而不需要手艺的工作。装配线和其它大规模生产方法的运用是这种发展的顶点。没有特别技能的工人无法形成特定技艺的工会。新技术要求为监督工作提供正式的技术教育。因此，向上流动受到了阻止，技术工人与管理层之间的障碍出现了。另一方面，劳动力彼此之间变得更加相似。鲍曼〈Bauman〉注意到，内部统一和外部分离将工会从职业性组织变成了阶级组织。工人的态度从顺从转向革命。劳工运动还建立了独立的政治武装——工人党。半技术工人比工匠更需要这些组织。20 世纪最初 10 年，在欧洲，在某种程度上也在美国，出现了成熟的阶级战争，表现为欧美的革命工团主义、总罢工、对工厂的占领和实际上的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劳工代表开始进入资产阶级政府，工党甚至建立了自己的政府。技艺工会和产业工会的区别就像

工人内部的区别一样消失了。这是一个成熟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时代。工人阶级能够通过强有力的组织、全国性的工会和政党保护自己的利益。但这些组织并没有用作激进社会变革的工具，而是成了谈判手段，有时是管理现存社会的手段。劳工领袖作为工会职能人员、政府部长、各种政府委员会以及大公司和国有化工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如果他们退出，他们不会回到车间，而是成为政府官员或经理。集体谈判和升迁的可能性减少了摩擦，将工人阶级重新纳入社会体制。革命被改良取代了。

除了社会和政治因素，技术变化像影响以前各阶段一样大大影响了第四个发展阶段。科学和技术的应用以及大规模生产要求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会计师和财政专家、销售人员和职员的数目不断增长。直接生产中雇用的劳动力比例开始下降。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体力劳动和职员之间的工资差距开始缩小。举一个例子，1913 年，英国男性职员的收入与男性技术工人的收入持平；到 1960 年，前者的收入则下降到了后者的 86%。就其对非技术工人的比例来说，职员收入从 169% 降低到 128%，工人成功地获得了解雇费、假期和公司养老金，并获得了股票期权——所有这些以往都只是薪水雇员的特权。工资劳动和薪水劳动之间的严格界线已逐渐模糊。当工会普及所有体力工人、扩展到全国范围后，后者也工会化了。低级白领工人现在可能在蓝领工人被解雇以前就被辞退。领薪者〈Salarist〉加人了无产者。

态度也自然而然地开始变化。体力工资劳动者的传统集体主义弱化了，非体力雇员的传统个人主义也是如此。两个团体共同走向约翰·哥德索普〈John Goldthorpe〉及其同伴所说的工

具集体主义（将集体工会行动作为经济利益保护和升迁的工具）和家庭中心倾向（将个体婚姻家庭作为中心生活利益）的双焦点。[①]

至此，这些变化——不论其任何重要——基本上是在传统的边界内进行的。不论是技术工作还是非技术工作，都仍然是体力性的。虽然职员受更多的教育，但职员工作也是一种体力劳动。技术的下一步发展是革命性的，体力劳动者被机器取代了。这就是自动化。非技术性的工人、半技术性的工人和职员都已经被计算机化的机器所取代。机器人开始取代装配线上的工人。体力劳动与非体力劳动之间的传统分工——前者操作物体，后者操作符号——开始消失。在工作场所，现代技术工人读数、看图、看符号已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工程师和经济学家、技术人员、信息处理人员、制图员、实验室人员大量进入生产。科学家和工程师成为较重要的“研发部”成员。系统分析师、计算机程序员和市场研究人员填满了其他各部。技师取代了技术工人。在与职员一起或独立控制自动化机器的过程中，**从事体力工作的劳动力**所占的比例开始下降——不仅在工业内部是如此。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也是如此。在传统形式的小工厂中，工人受经理的支配。现在，由一个工程师和几位技术人员组成的小而精的队伍取代了他们。权力和身份等级被一种专业领域结构或知识等级所取代。

技术变化伴有教育变化。在发达工业国家，文盲在很久以前就已消失。完全的中学入学率——中层阶级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下层阶级至多只上了小学——也实现了。大学教育也

① *The Affluent Worker in the Class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27.

普及了相关年龄组的人口。许多工人和农民都接受了大学教育，大学教授、警察和军官都建立了工会，在这些现象面前，我们一定会注意到旧有的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区别已开始模糊了。不断缩小的收入差距也证明着同一种事情。这些趋势将对各种团体的社会意识产生重大影响。下面，我们就将看到这一点。

（三）新工人阶级

受过教育、生活富裕的工人——他们的收入经常比传统的中间阶级收入更高——是工人阶级还是中间阶级？低工资办公室职员的社会地位与车间工人相比是高是低？各类不断增加的技术人员大军应视为高度熟练（体力）工人还是应视为初级技术工程师？不久以前，这些问题的答案已经不再那么直接了当了。已经有人给出了两个一般性答案。

首先，既然工人阶级的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已经大幅度提高，而且至少达到了下中层阶级的水平，而且富裕工人已开始采用中层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们就应该被相应地分类。这是人们熟悉的一种说法：工人阶级贵族变成了中层阶级的一部分。第二种答案与此正相反。如果技术工人消失了，月薪代替了工资，工资和薪金的差额大幅度缩小，办公室和车间工人的身份差别已经消失，那么，我们可以说出现了主要由技术性的体力和非体力工人、技术人员以及相关类型人员组成的**新工人阶级**。

中间阶级概念意味着还存在一个下层阶级。然而，如果工人和先进技术一起被提升，成为中间阶级，就没有了下层阶级，除了注定要消失的旧有下层阶级的残余以外。因此，第一种答案并没有提供一个令我们在逻辑上满意的分类。这种观点

在经验上也没有依据。哥德索普、洛克伍德（Lockwood）及其同僚们——和其他国家的社会科学家一起——在经验上检验了资产阶级化命题，发现这种观点没有根据。他们得出结论说："工人并没有进入中产阶级社会；而且，在主要倾向上，这也不是工人所希望的目标。"①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坚持那种被视为最先进生产方式产物的传统的工人阶级概念，并注意每一种经济体制必定有其生产阶级，那么，新工人阶级的概念似乎更为合理。这一概念的获得方式表明它不是静态的。如上所诉，历史上，工人阶级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在每个阶段，相对于其历史时代，它都是"新"的。意料之中的是，这些阶级与资本主义技术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各阶段相对应。在这一过程中，建立在技术差别基础上的体力劳动内部的社会分化，逐渐被瓦解了。"新"工人阶级的出现意味着体力劳动与非体力劳动之间以及劳工和工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新工人阶级将包括越来越多的社会团体，直至每个人都认为他自己是工人——这当然意味着这一概念的本来含义将彻底消失。到那时，我们将拥有完全的社会主义了。

为了避免可能的误解，我们要强调一点，上述说法不应被解释为过去的区别和分界线已经消除了。它们显然还存在，它们也不会自动消失。阶级斗争仍不可避免地持续下去，虽然这种区别越来越不合时宜，但消除它们需要付出巨大的、自觉的努力。这在其中最根本性的一个方面——监督（非体力）劳动和其他劳动之间——是特别正确的。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所提到的那样，纵向流动中主要的断裂正是出现在体力（加上职员）

① "Affluence", p. 157.

和非体力职业之间。新工人阶级尚不存在，它正在生成〈in statu nascendi〉。另一方面，本章的分析并不是面向过去或现在的，我们这里讨论的是过渡社会的问题。我们需要过去，只是为了发现内在的趋势；需要现在，只是为了确定我们的起点。与这些变化相联系的一切可能出现在未来。

马克思在他的时代面对着同样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作《共产党宣言》时，一个整齐划一的工业无产阶级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英国——也不存在。工会发展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莫里斯·多布注意到了一个事实（前面已提到了）：家庭工业和制造业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后半期，结果是，

> 工人大多数保留了资本主义早期的印迹，他们的习惯和兴趣。就业关系的性质和工作环境都是如此，他们尚缺乏长久组织的能力和有远见的政策。他们关心的利益常常是行业性的，甚至是小地域性的，而不是阶级性的。工匠和艺人的个人传统的存留，与他个人成为小雇主的野心一起，对工联主义（更不用说阶级意识了）稳定而广泛的增长形成了长期的障碍。迟至1870年，许多工人的直接雇主仍然是中间性的转包商而不是大资本家。这些转包商既是雇主也是劳工和小雇主。实际上，19世纪中期的技术工人常常是一个转包商，他们的心理和视野都带有这一身份的印迹。①

① M. Dobb,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3, pp. 265－266.

只是在马克思去世之时，工人阶级才开始具备了工厂无产者的特点。那时和现在一样，理论必须发展；那时的无产阶级和现在的无产阶级仍处于形成过程中。

（四）新的社会冲突

上述概念框架使我们有可能解释近期发生的事件：例如，1968年前后学生运动席卷了所有工业化国家；在危机情势下工人、农民、甚至工程师一起游行；以及新冲突源泉（如工作中缺乏满足）的出现。我们简单分析这三者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

青年总是激进的，原因很明显。为什么这种激进化——特别是在知识青年中——在今天比过去更加流行？大学环境并不比昔日更有压迫性。为什么学生现在起来造反而过去却不造反（至少造反的程度不同）？这一问题的答案与知识分子不断变化的社会作用有密切的关系。

只要大学教育仍是少数人的特权，只要受教育者大都属于统治阶级或与统治阶级有任何形式的联系，知识分子就是一个与统治阶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特别的社会阶层。当然，杰出的知识分子在整个历史上、在所有社会制度中都发挥了进步的和革命的作用，但他们的大部分同行却安于现状。

一旦大多数人接受了大学教育，情况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所共知，在大学中，像在别处一样，也有外部的激励（美国比欧洲更多，因为美国的资本主义更纯粹、更发达）。外部报酬包括身份、权力和金钱。如果追求者众多，则只有少数或是特别运气或特别有才能的人可望获得这种报酬。他们的大多数同僚将永不可能加入一个特权社会阶层——知识分子过去

是这样一个阶层——而是被弃入某个无人区或被纳入新工人阶级。他们的报酬会比体力工人稍多，但在其他方面，与体力工人不会有很大的区别。

对生活前景失望的年轻的未来知识分子起来造反。其中一些人发现多年的学习和考试这些荒唐代价换来的只是即将来临的无意义的生活。于是，分支众多的嬉皮士运动诞生了。另有些人不接受被动的抵抗，他们觉得应起来消灭社会制度。由于缺少适当的社会理论，他们经常将社会制度及其价值观念的毁灭与大学财产的毁灭——扮演 20 世纪卢德派的角色——和下流行为的展示混同起来。

如果人们对生活前景不满，他们就会质疑其所处社会制度的基本方面。因此，学生概莫能外地发现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和异化、马尔库塞的一维人和弗洛姆的精神错乱世界。他们开始为其个人的不满寻找依据并更加关注社会。他们本身是压迫性制度的受害者，他们因此开始同情其他受害者，那些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受害者。通过这种方式，学生造反这种由自我利益推动的运动像历史上的其他造反一样，成为当代社会最进步的运动之一。

无论数目如何众多，学生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个年龄组。他们能发动社会革命却不能将其进行到底。在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背景下，教育体制只要是压迫性的，只要它能灌输官僚结构在一个异化的生产世界中运行所必须的纪律和服从，它就是生产性的。如果教育体制失去了这方面的作用，后果将迅速在生产体制中表现出来。

指望大学会直接改变社会或应当直接改变社会，显然是空想。但当代社会——与以往社会不同——没有大学便不能生

存，指出这一点却不是空想。因此，大学片刻不能停办。如果政府过于愚蠢，更多采用压迫性手段，反应只会是更为暴力性的。社会通过这种方式在其内部构造了一种革命性的反馈。

毕业后，充溢着革命思想的年轻知识分子在一种新环境下开始了他们的生产活动。这种新环境至少在两个重要方面发生了变化。首先，机器逐渐取代了体力劳动者；成为主要生产力的是知识而不是肌肉。因此，受过教育的劳动者是一个正在出现并将为社会提供基本的生产性服务的社会阶级。第二，这种现象发生在一个丰裕社会，单纯保证物质生存的斗争已不复存在。如果人们不再忧虑食宿，他们便开始忧虑自由、平等、体面的社会和生命的意义。自我中心、追求金钱、玩物丧志的生活开始变得荒唐了。新工人阶级所受的教育使他们足以理解有关问题。在自我利益的推动下，它将诱发根本性的社会变革过程。西方如此，东方亦然。

在一个相对丰裕的社会中，关于生活和工作意义的焦虑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或诅咒了。人们越来越不愿接受作为机器或职位附属物的生活。雇主不能只通过允许工资的增加来消灭不满和暴力，至少在长期中是如此。安德烈·高兹（Andr Gorz）指出：“生活的不可能性，对上个世纪的无产阶级来说，表现为劳动力再生产的不可能性；对现在科学或文化工业的工人来说，它则表现为使用他们的创造性工作能力的不可能性。”①

不满足在学生、工人和“中间阶级”中同时出现不是偶然的。这一社会酝酿过程是激烈的意识变化的指示器。波格丹·丹尼奇（Bogdan Denitch）指出：“表面上相互分离的细流——

① A. Gorz, *Strategy for labour*, Boston: Beacon Press, 1968, p. 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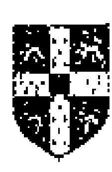
在最发达工业社会中学生的大量不满、专业人员独立性的减弱、许多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的无产阶级化和处于重要地位的技术工人团体日益加强的战斗力——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它们是现代工业社会中一个可以称之为新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发展的早期阶段。"① 人们对这一发现不会感到惊奇。

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面对的社会过程和我们今天面对的社会过程具有相似性。19 世纪工业革命创造了工业无产阶级，后来的发展逐渐使旧有的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化。当前的科技革命创造了一个新工人阶级，它开始吸收中间阶级。厄内斯特·曼德尔评论说，科学革命使农业、分配、服务和管理——实际上，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实现了工业化，领薪劳动者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②

历史的相似性还有另一方面。旧有的无产阶级没有成为更发达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基础，虽然它在一种与资本主义并行的制度——国家主义——中发挥了作用。这与历史上更早时候的情形相似。当时，过渡意味着一种特定的断裂。曼德尔注意到了这一点。新工人阶级的形成标志着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不连续性。在此，相似性终结了——我们希望如此。我们希望未来发生的不是另一敌对社会阶级的形成而是无阶级社会的出现。

① B. Denitch, "Is There a New Working Class?" *Dissent*, July – August 1970, pp. 351 – 55, 引自 p. 353.

② E. Mandel, "Radnici i permanentna revolucija" *Marksizam u svetu*, 1974, no. 11, pp. 28 – 46.



第 15 章

过渡的战略

为了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我们必须找到社会变革的主要载体。我们可以很方便地从对人类需要的研究开始。如果社会主义具有生命力，它必须能比与其相竞争的任何制度更好地满足人类的需要。如此，则人们将有动力去实现社会主义。在第 4、6、7 章关于社会主义异化、比较效率和伦理基础的考察中，我们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这里，我们需要完成这一分析，探索过渡的战略。

对早期人类学的讨论稍做推广，我们会注意到“人性”的三个方面。人首先是一种生物的或自然的存在。其次，他是一种群居的或社会的存在。最后，他拥有某些特别的或独一无二的人类特性。这一分类当然很粗略，但还是有用的。人作为自然存在，有其生物性的需要。为了保持身心健康，这些需要是必须满足的。作为群居的存在，他有某些心理的或社会的需

要。作为人类，人是自我创造——通过劳动改变环境和自身——和自我实现的生灵——既然他能够自我创造，他便会尽力使用这些能力；正如亚里士多德和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每一种自然的存在都努力实现其力量，在这些力量受到阻止无法发挥时感到痛苦。人只有自由使用其力量时才能获得完全的自我实现。因此，人又有了自决的需要。

我们会想到人性的三个方面以及与之相联系的需要，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彼此依存的。毕竟人是单一的而不是三重的存在。我们也能想到，存在着某种与人类发展各个阶段大致对应的需要等级。

与本项研究的一般方法论相一致，我们愿意将以上命题付诸经验验证。不幸的是，这种经验只能是不完备的。对人类需要的心理学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因此，我们对下面提到的两种理论都不得不使用它们自己的术语进行讨论。

第一节　人类需要

需要理论只是在最近才出现。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开创了对个体需要的研究。[①] 马斯洛利用他的临床经验和实验，区分了五种基本需要。这些需要按一个相对强度等级组织起来；也就是说，较高级需要只有在较低级需要已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满足后才出现。用强度而不是用存在与否来描述等级可能更为正确。需要总是存在的，但其强度不同，组成了

---

① A. Maslow,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0 and *Toward a Psychology of Being*, New York: Van Nostrand, 1968. 该理论最先发表在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943, pp. 370 – 396.

一个等级结构。这一结构可以表示如下：

①所有需要中最有影响的需要是**生理**需要（对水、食物、性的需要）。在得到满足前，它们决定着人类全部情感的、思想的和实践的活动。

②**安全**需要是等级中的第二层。包括对保障、稳定、依赖和保护的需要，摆脱恐惧和混乱的自由，对结构、秩序、法律和限制的需要。

③一旦相对安全有了保障，情感的**归属**和**爱**的需要就出现了。埃里克·弗洛姆刻意强调的根基感属于这一类。

④更高一级的需要是**自尊**或**自敬**的需要。这些需要可以分为两组：a. 对实力、成就、优势和能力、面对世界时的信心以及独立和自由的渴望；b. 对名气、地位、名声、承认、重要性、尊严和称羡的渴望。

⑤即使上述四方面的需要都得到了满足，人仍然会感到不满足和不安，除非她或他能够做她或他作为个人所适合做的事情。"人能是什么，他就必须是什么。他必须对他的本性真实。"① 能力暗生动机。马洛斯将自我实现，成为一个人潜在能是的愿望称为**自我实现需要**。在这种自我实现需要中，我们可以不把马克思主义的人性看成哲学问题而看成经验心理学问题。我们可以类似地看待罗尔斯的亚里士多德原理（第七章）。这里有一种重要的非对称性。前面四种需要在得到满足后，其强度就会减弱；而自我实现需要越是得到满足，其强度越大。②

已有人指出，上述需要中的一种——安全需要——与其余

① Maslow,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p46.
② Maslow, *Psychology of Being*, p. 30.

需要不相一致。这就好像把食物分成了“食物”和“美味”。显然，人**需要**食物，但人**喜欢**美味的食物。真正的需要是因其自身而为人们所追求的，但心理健康的人不可能为安全而安全。安全只是一个前提、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①] 社会产品核算中也有同样问题。统计师把“安全产品”〈output of safety〉——即警察和军队的服务——与满足消费者欲望的商品和服务相加。有没有警察，一双鞋都是一双鞋，警察做的事情只是——如果他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使鞋的使用成为可能。因此，在相对安全的条件下，我们只有四种需要。这些需要中，第一种与纯粹的肉体生存有关，接下来的两种来源于人生活在社会中这一事实。第四种反映了个性发展是人类的专有特征。

我们现在来考察需要等级的特性。马斯洛对此做了很多描述。下面四种可能是最为重要的。[②]

①较高级需要代表了后来的系统发育或进化的发展。对食物的需要为植物、动物和人所共有。爱的需要为人和高级猿类所共有。自我实现的需要则为人所独有。“需要越高级，就越是人所独有的。”

②较高级需要是后来个体发育的发展。人在出生时，只有生理需要。几个月后，新生儿表现出情感联系的最初迹象。再晚些时候，孩子需要尊重和赞扬。完全的自我实现则要求成熟的个性；在异化的世界上，它也许永不会出现。

③“需要越是高级，对于纯粹的生存来说，就越不迫切；

---

① 见 J. C. Davies,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63.

②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p. 98.

满足得越晚，就越可能永久消失。”高级需要在主观上不那么迫切。然而，一旦人们经历了高级需要，他们便不会很快消失，即使需要满足的总体水平大大下降了。

④较高的需要满足水平意味着较高的生物学效率、较长的寿命、较好的睡眠，等等。“较充分的需要满足既有生存价值也有成长价值。”

我们怎么知道这些需要是真正的基本需要而不纯粹是神经性的或是社会性地规定的？马斯洛提供了四种可能的证据：

①这些需要的缺失是病源性的，也就是说，它使人在生理上或心理上致病。

②相反，这些需要的满足则是健康的。神经性需要的满足与此不同。

③在自由状态下，满足也是自发选择的。

④对这些需要可以在相对健康的人们身上进行直接的研究。

如果马斯洛是正确的，那么，阻挠这四种需要的满足会产生病态的个人，而病态的个人组成病态的社会。病态社会的症态是什么？它如何运行？埃里克·弗洛姆对此做了研究。① 另一方面，一个能比其他社会更好地满足基本需要的社会在某种基本意义上是更进步的社会。

到目前为止，马斯洛与众不同的动机理论除了关于自我实现需要部分的内容外，没有得到很好的经验支持。对实际生活状况的经验研究没有能辨识出5种独立的需要或证实一种简单

① 见 *Escape from Freedo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x, 1941; *The Sane Societ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55.

的需要次序。[①] 有人试图将需要种类减少到两种或三种，以消除需要的重叠，并在保留等级的同时引入更复杂的排序。克莱顿·埃尔德菲尔〈Clayton Alderfer〉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②] 他对需要的分类与我们关于人性的初步命题是极为接近的。

埃尔德菲尔将马斯洛的 5 种需要压缩为 3 种，分别称为存在性需要、关系性需要和成长性需要。人必须首先生存，必须彼此发生关系；并且，作为人，他必须创造，必须改变环境，改变自己。因此，存在性需要包括了物质需要和心理需要。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处于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稀缺世界，一个人所得是另一人所失。关系性需要包括重要的与他人的关系，包括了承认、肯定和理解。在这里，活动不是零和博弈，满足依赖于分享和互动的过程。成长性需要的满足“决定于一个人对使他最大程度地是其所是并成为他所能是的机会的发现。”[③]

埃尔德菲尔在组织背景下测试了其理论。关于三需要等级〈the three – need hierarchy〉运行的 7 个命题，有 5 个以多多少少做了修改的形式通过了检验。于是，便出现了下列在经验上受到支持的动机理论。[④]

①存在性需要越少满足，就越是被人们渴望。

②在存在性需要和关系性需要的满足水平都很低时，关系性需要越少满足，存在性需要就越是被人渴望。这也就是说，在生活水平很低的权威主义背景下，人们将极为关注物质对象。

---

① C. P. Alderfer, “An Empirical Test of Human Needs” *Organizational Behaviour and Human Performance*, 1969, pp. 147 – 175.

② C. P. Alderfer, *Existence*, *Relatedness and Growth*, New York: Free Press, 1972.

③ 同上，pp. 9 – 12

④ 同上，pp. 148 – 149.

③在关系性需要满足的水平很低时，对其渴望程度与其满足程度成反比；在关系性需要满足的水平较高时，对其渴望的程度与其满足的程度成正比。

④如果关系性需要和成长性需要都得到了相对的满足，那么，关系性需要越是满足，成长性需要就越是为人们所渴望。

⑤在成长性需要满足水平较低时，对成长性需要满足的水平与其被渴望的水平成反比；反之，在成长性需要满足水平较高时，对成长性需要满足的水平与其被渴望的水平成正比。他还发现，在富有挑战性的权衡中，人们越是满足就越是渴望，越是渴望就越是满足。因此，一个面向成长的人可能不断地成长。

结果，简单的缺少—欲望命题只能无条件地应用于存在性需要。挫折—回归命题适用于关系性需要和成长性需要。关系性需要的相对满足使成长更趋可欲（命题4）。埃尔德菲尔未能发现对这样一个类似命题——对关系性需要的渴望是存在性需要满足的函数——的经验支持。然而，其他研究已发现了某些证据。低级需要的满足启动高级需要这种一般性假说可以获得证实，因为较高级需要变得越来越迫切，释放的能量必须得到生产性的使用。反之，如果低级需要的满足受到阻碍，能量被用来修补缺失，就不能有更多地用于高级需要。

显而易见，虽然埃尔德菲尔质疑了马斯洛理论的简单性，但他仍然坚持了这一理论的基本思想：人类需要是客观的、可以辨识的，而且是等级排序的。排序并非一成不变。通过控制环境因素，可以使个人需要向低级层次调整。反过来，既然所有需要无时不在（至少在其潜伏的形式上是如此），个人也可以被引诱，更快地进入成长阶段，体会自我增强的满足—渴望

过程。如果马斯洛和埃尔德菲尔是对的，阻挠基本需要的满足不仅会使社会进入病态，而且还会生成改变现状的动机。改变现状意味着更充分地满足基本需要。

我们如何能知道哪一种社会能更充分地满足基本需要？需要等级的存在使这一问题有了简单的解答。一个更好地满足较高级需要的社会自然也能更好地满足一切较低级的需要。因此，要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或国家主义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因而是更优越的制度，只需要证明它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自我实现需要就可以了。

第二节　社会水平上的需要

在进一步阐述之前，有一个障碍必须清除。从个人发展角度对基本需要的分类与从社会制度角度对基本需要的分类是不同的。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办法，将微观层次上的多阶段图示——生理的、情感的、自尊和自我实现需要，或者说存在性的、关系性的和成长性的需要——转化成一种可在宏观水平应用的图式。如以往一样，对历史经验的分析对此提供了答案。

①既然生理的或存在性的需要是生存的基础，不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必须在这些需要得到满足时才能生存。在社会水平上，这类需要更加广泛，包括了衣、食、住等一切**物质**需要。

②当基本的物质需要得到了满足时，各种可称之为**文化**需要的需要，开始被强烈地感受到了。人们首先关注他们的身体，然后关注他们的心灵。教育、娱乐、艺术和科学都属于后者。健康也应算入这一类。在最低阶段，人们经常牺牲健康换

取物质。只是在超越了某种最低生活水平后，健康本身才成为主要的考虑。

③前两个阶段着眼于生活水平，后两个阶段关注生活质量。在一个相对丰裕的社会，人们对所谓政治自由越来越有兴趣。**政治**需要（言论自由、良心、集会，等等）与马斯洛的自尊需要是相对应的，埃尔德菲尔的关系性需要包括了这种需要。

④最后，在一个丰裕的、政治开明的社会，人们关注的主要是个性的成长，是每个人内在潜力或潜能的充分发展。仅仅活着，享受生活，被看成是一个团体的独立的、（在形式上）平等的成员，这还远远不够。人还必须过自己的、自我决定的、真实的生活。这种对**真实性和自我决定的需要**当然是与马斯洛的自我实现需要和埃尔德菲尔的成长需要相对应的。它包括了情感需要，如果集体感、爱和友谊等等受到了阻碍或异化，个人生活不可能是**真**实的。

第一和第四阶段在个人和社会水平上都是一样的，但第二和第三阶段却有所不同。并且，历史证据也不是直截了当的。上述分期与国家主义的发展一致。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政治自由在广大群众的文化需要满足之前就已经建立了。我们不难对这一历史的非决定性做出解释。

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是自由市场的建立。这进而又要求摆脱封建主义的政治束缚，不仅贵族要有政治自由，资产者也要有政治自由。另一方面，如果政治自由不能不问出身，不计财产地普及所有社会成员，工人不可能改善其相对于资产者的地位。以这种方式，阶级斗争产生了政治民主，而文化需要的满足仍停留在非常初步的水平上。

现在，我们来考虑一种不同的历史状况。在这一状态中，由于发生了一场革命，经济增长大大加速，其收益相当平均地扩散到了整个社会。人们现在比关心政治更关心生活水平的改善。这解释了国家主义的社会稳定性。当然，如果没有公开的政治压迫，政治民主的缺乏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但压迫不是国家主义的特色。资本主义也存在压迫，所不同的只是它采取了经济压迫的形式。如果人们不再能容忍持续的经济剥削，经济压迫就会立即被政治压迫所代替。

随着人们的消费和文化水平的不断增长，在国家主义环境中，政治民主的充分发展越来越不可阻挡。同样，物质丰裕和政治民主使文化需要（各种水平的免费教育、健康保险、博物馆和艺术馆的建立，等等）逐渐得以满足。两种制度以这种方式走向同一状态：物质的、文化的和政治需要的相对满足将产生使社会在自决方向上彻底变化的压力。

第三节 劳动：分解与重组

需要由劳动满足。这不仅在琐屑的意义上——劳动提供消费用的产品和服务——是正确的；而且，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即劳动是人类不可缺少的活动，也是正确的。因此，在需要满足的类型和劳动类型之间会有某种相关性。在前三种需要满足的阶段，劳动只是工具性的，因此也是异化的。人出卖他的劳动力，为获得别的东西劳动。劳动本身是麻烦、痛苦，是一种代价，是要被避免的。在第四种需要的满足阶段，情况发生了彻底变化：劳动成了享受和需要，劳动本身就是目的，我们要更仔细地分析这一过程。

劳动是一种多维度的复杂活动。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发展伴随着劳动在各个维度上的分解。整体被分解为部分，部分变得独立，这一过程导致异化。工匠或农民的劳动是不曾分解的整体。劳动过程分解的第一步是使生产者与供给来源和顾客分离。生产者保留了他的生产工具和对直接劳动过程的控制，但依附于资本家并受资本家的剥削。这就是发包〈putting - out〉制度。第二步是将生产者与生产工具分离。这也是最为困难的一步。时间持续了几个世纪。在英国，这一过程意味着圈地运动；在苏联，即集体化。它将人类变成了机器的附属物，变成了与资本和土地一样的生产要素。劳动被简化为体力劳动——不折不扣的劳动——而工人成了“被雇佣的人手”。生产者当然拒绝工作，他们进行了抵抗，并试图组织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所有者对此十分清楚。

> 工人间的联合被代之以粗暴的惩罚，鞭打、监禁和流放是对罢工的惩罚。工人必须长期服务，经常长达数年，如果他们离开岗位，会像开小差的军人一样受到追逐……各类特权机构经常进行强制性的劳动征募，不把孩子送去做工的父母被威胁课以重罚。①

这些方法，曾是16世纪至18世纪欧洲的特征，它们在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的殖民地再度出现。

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不仅意味着劳动分化为自由劳动和雇佣劳动，而且也分解为体力劳动和非体力劳动。所有者自

① M. Dobb,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3, pp. 234 – 235.

己承担了后一类型的劳动。经济发展以及其后的劳动分工进一步推进了这种分解。所有者开始雇佣应付各种不同生产问题所必需的专业技术人员，工作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这种方式，雇佣的体力劳动得到了雇佣的脑力劳动的补充。所有者只保留了企业家职能，即全面性的控制和监督职能。最终，最高级监督劳动也是雇佣的，所有者只是一个所有者，纯粹的所有者。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劳动分解的最后阶段，管理者与食利者分离了；后者，作为纯粹的资本家，不再有生产职能。同时两类雇佣劳动——体力的和脑力的——碎裂为简单的、例行的、不需要技能和智能的动作。

这种造就了数种局部工人的分解过程至少产生了三个重要后果。首先，分解的次序——体力劳动、受雇佣的脑力劳动、受雇佣的监督劳动——同时就是当代阶级社会中社会经济地位或社会阶层的等级次序：体力工人处于最底层，商界和政界领导人处于最高层。第二，不论看起来如何费解，在特定限度内，在保护现有制度方面各阶层拥有共同利益。对统治阶层，这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体力工人仍然发现他们自己处于最低需要领域，这些需要的满足与现有社会制度是相容的。在美国，这一点反映在工会的保守主义态度上，它主要面向物质生活的改善。在苏联，知识分子在争取政治自由时很少得到工人的支持。既然需要不是心理常数，而是（有一个心理核心的）文化变量，这种状况可以通过人为地膨胀低级需要而长时期地保持。第三，纯而又纯的所有制——私有的或国有的——丧失了生产功能而阻碍增长，进而又成了反功能性的。无功能的或反功能的制度迟早要被那些具有积极生产功能的制度所取代。另一方面，在低级需要得到了相对满足后，纯粹的劳动，

即异化劳动便不能再被人们所容忍。因此，接下来的进化步骤只能是逆转过去的趋势。劳动分解已臻极限，未来发生的只能是新的基础上的重组。这一新的基础只能是自决。

第四节　基本战略

生产者和生产工具、劳动各组成部分的重新结合如何实现呢？使之实现的社会力量是什么呢？传统看法认为这一社会力量是无产阶级。但我们已经看到，无产者不可能超越工联意识，也就是说，它仍会将自己封闭在分解的、异化的劳动制度的限度内。如果这种制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低级基本需要，情况就更是如此。对这一难题，人们提供了两种解决办法。

第一种办法是列宁提出的。与其工人阶级不能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社会主义意识的理论相一致，他强调创造纪律严明的政党，由革命知识分子领导。它可以领导并教育工人，实行专政，直至社会主义意识确立。这一战略在技术上是有效率的，但在社会上是失败的。它产生了国家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第二种战略是寻找无产者以外的另一种革命力量。这种力量被认为是学生、激进的知识分子，在不发达国家是农民。如果我们暂时不考虑农民问题，那么第二种战略的代表就是赫伯特·马尔库塞的著作。马尔库塞认为：

> 因其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基本地位，因其众多人数和受剥削的程度，工人阶级仍是革命的历史承担者；因为分享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需要，它已成为一

个保守、甚至反革命的力量。客观上，“自在”劳动者仍是潜在的革命阶级；但在主观上，“自为”的劳动者却不是革命阶级。①

在工人日益变得保守的同时，弱小的有组织的战斗知识分子团体却从中间阶级中分化了出来；同时，它作为少数群体，也从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中分化了出来。“因为，他们的意识和他们的需要在大多数人（按其阶级出身，他们是属于这个大多数的）的反叛中充当了潜在催化剂。”② 将这些思想变成最后结论，马尔库塞却走进了死胡同：

既有民主仍然提供了改变现状的惟一合法框架，因而必须加以保护，不让右派和中派限制这一框架的企图得逞。但与此同时，对既有民主的保护也保护了现状，限制了革命。这一矛盾还有另一面：彻底变化决定于群众基础，但为了彻底变化而进行的每一步斗争都将反对派从群众中孤立了出来，并激发了强化的压迫……因而减少了彻底变化的可能……因此，激进派是有罪的——或者是屈从于现状的力量或者是破坏了现状的纪律和秩序。③

与列宁的战略不同，马尔库塞战略是不成功的，也不可能成功。

---

① *An Essay in Liberation*, Penguin, 1972, p. 25.
② 同上，pp. 57.
③ 同上，pp. 71－73.

我们从这里走向何方？社会主义改造是像化圆为方那样不可能吗？如果一种特定的解决方案失败了，先找一找其失败的原因是一条很好的规则。既然（蓝领）工人占了人口的半数——受剥削的半数，没有工人阶级，就没有社会主义改造。列宁和马尔库塞都会赞成这样说法，事实上这一说法也为人们广泛接受。列宁和老左派错在把无产者当作了改变的对象，尽管他们说的和做的相反；认为无产者必须被教育，受领导。实际上，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由工人——真正意义上的工人——本身来实现，而不是由接受了天启的领袖和精英政党来实现。马尔库塞和新左派的错误则是将现实简单地一分为二：或者是法律和秩序，或者是彻底改变。为什么不能是为改变而使用法律和秩序呢？

考察历史上的一种相似情形有助于澄清问题。如果我们置身于封建社会，想着如何加速资本主义改造，我们怎么办？最清醒的做法是发现根本性的资本主义制度——那种在根本上统治着资本主义的制度——并将它移植到封建环境中。我们寻找的制度显然是普遍化的市场，既包括产品也包括要素的自由市场。移植当然也有其问题，社会机体也许拒绝移植。但假定我们移植成功，该制度将从内部逐渐侵蚀封建结构，封建结构将开始瓦解。如果一切都能够买卖，封建等级和贵族头衔也将很快出售，领主很快就会喜欢从自由佃农那里收取货币地租，而不是从农奴那里收取劳役地租。这种思想实验当然不完全是虚构。欧洲绝对君主制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如此行动的。封建领主在这一过程中失去了权力。像亚当·斯密所观察到的那样：“为了满足最幼稚、最可鄙的虚荣心，他们逐渐卖掉了他们全部的权力和权威。”并“变得像城市中殷实的市民和商人一样

平庸了。”①

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自治。本项研究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是考察和证实这一命题。如果普遍自治（不论是在市场部门还是在非市场部门）被植入资本主义社会或国家主义社会，它将逐渐瓦解旧的生产关系，被瓦解的制度最终将被某种与自治更相容的事物所取代。通过参与管理（如地方自治），通过将参与范围不断扩大直至达到完全自治的斗争，工人在日常生活中学会了如何控制自己的命运，如何克服劳动的碎裂和分解，如何获得有意义的社会平等，如何消灭旧的等级制。他们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没有全知全能领袖的指导。他们准备着自治，并为此使用法律和秩序。自治显然不会一蹴而就，资本主义市场也不是一夜之间就建立的。然而市场发展，不论如何缓慢如何混乱，不能是反资本主义的；同样，参与从其最原始的共同磋商形式向完全自治的成长也不能是反社会主义的，尽管有人出于保存现状企图对之进行错误的利用。

基本战略问题不应以简单化的方式解释。特别是，社会制度有很强的包容明显的矛盾的能力，持续存在和运转很长一个时期。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是政治民主和私有制，但所有制意味着工作场所的专制。政治民主和经济专制之所以能够相容，是因为资产阶级生活分解成了不同活动领域，资产阶级个性分解成了公民、生产者和消费者这些独立的、局部的存在。劳动的工具性、被动的消费主义和形式上的政治自由使这些领域保持着分离状态，使资产阶级个人保持着人格分裂。只有在这三个分离的领域再度组合后，一个领域的民主和另一个领域的专

① A.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1976),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37, 第三篇，第四章, pp. 387—3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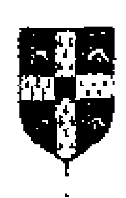
制之间的矛盾才成为明显的，才必须被解决。这种现象似乎正在出现。

后资产阶级社会也不能免除类似的矛盾。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发达国家也许以工业民主和政治权威主义为特征。工作场所的自治和工作场所以外的等级显然是矛盾的。在过渡时期，出于后面（第18章）要讨论的原因，这样做也许是有道理的。然而，如果不有意识地努力解决这些矛盾，它将长期持续下去。制度的功能性要求将由格子化来满足，这当然意味着异化并拖延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自治是社会主义变革的最有力量的工具，但它并不是灵丹妙药。

自治重组是可能的，技术发展推动了这种重组。尽管在资本主义时代，技术较为简单的大规模生产不一定就会造成劳动的碎裂和技能的毁灭，但它至少使劳动和技能变得更符合成本计算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监督者是劳动的协调者，工人知道的一切他都知道，他甚至还知道的稍多一些。监督者在技能等级中的地位似乎为他们在权利等级中的地位提供了理由。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复杂技术逆转了这一趋势，推动了技能创造。简单的生产任务由机器完成；自动化使得劳动的碎裂既不必要，也不符合成本计算的要求。非技能性劳动，后来是半自动性劳动，开始消失。协调者不再处于掌握其合作者全部技能的地位；他必须依靠他们的建议，他的社会优越性失去了客观基础。协调者现在只是许多专家中的一员。虽然新技术不一定消灭权力等级，但它却表明了权力等级的不合理。自治，在一个肌肉被机器所取代，参与者的受教育水平大致相同的情况下，显然是更自然的生产组织。

自治可以通过暴力的（和革命的）或和平的（和改良的）

手段引入。它可以在不发达的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或发达国家进行尝试。它可以在资本主义中生长，也可以在国家主义中生长。因此，我们在理论上可以区分 12 种不同的过渡。然而，并不是所有这些情况都有经验内容。由于前面分析过的原因，暴力革命不可能发生在发达国家。此外，这样的革命不曾发生已是一个历史事实。这便减少了两种可能。其次，不发达国家受到贫困的困扰。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区别对它们的意义不大，这又减少了两种情况。最后，在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一般是容易的，而在贫穷、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这两种极端情况得到了解决，正在工业化国家这种中间情况就不会是特别困难的了。因此，在下面各章，我将考察以下三种过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



第16章

过渡的途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1852年，马克思写道："在英国，普选权的实行，和大陆上任何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称号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将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在这里［在英格兰］，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① 恰好40年之后，马克思的朋友和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一封信中谈到："马克思和我在40年间反复不断地说过，在我们看来，民主共和国是惟一的这样的政治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下，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斗争能够先具有普遍的性质，然后以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告终。"②

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普选权

---

① K. Marx, The Chartists, *New York Daily Tribune*, August 25, 1852.
② Letter to Turati, February 6, 1892.

都已实行了很长时间。这些国家大都是共和国，那些不是共和国的国家有时比共和国还要民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的那两个国家——英国和德国，工人是人口的大多数，工党正在执政或已多次执政。在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已掌权多年。然而，这些国家却并没有建立社会主义，短期看来也没有这种希望。至今为止，不论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小打小闹的）改良都未能产生社会主义。

我们的分析已说明了产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资本主义的发展非常迅速，这使各阶级都能分享——尽管不是同等程度地分享——这种发展的好处。统治阶级能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做出大量让步但同时又保留了对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控制。工人专注于低级需要的满足，未能形成有效的社会主义意识。工人组织——工会和政党——已在很大程度上被整合进了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提供可行的替代方案。为了谋取生存，工会和工党不得不建立起官僚机构，这种结构巩固了他们的权力，却大大降低了他们的社会主义潜能。简言之，社会还没有成熟到建立社会主义的程度。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政治民主中存在最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必须研究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些条件。我们分6步进行：首先研究社会变革的两个基本前提，然后考虑现有的工具，最后为三种制度变革做出设计。

第一节　满足需要的危机

如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后者迟早要进行调整。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表现，是资本主义制度不能满足某些基本需要。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看到了工人阶级长时间的苦难，他们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提高生活水平，它所造成的日趋强烈的不满终将导致革命的爆发。这种信念已经破灭，被另一种信念所取代。新的信念是与生产社会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联系在一起的。面对着周期性衰退，许多社会主义者（路易·布丹、弗里茨·斯特恩伯特，以及观点有所不同的亨利茨·格罗斯曼）开始相信资本主义将越来越无法调节供求关系，经济周期将日趋严重，失业将越来越多，资本积累将无法持续，资本主义制度将会崩溃。然而这种想法也未能成为现实。崩溃（Zusammenbruch）论错了。资本主义制度确实大幅度提高了生活水平甚至还缩小了收入差距。失业和经济周期虽然未被消除，但却受到了控制。而增长率和积累率则提高了。

第三种流传甚广的信念与殖民地有关。这种观念认为，殖民地对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行是不可或缺的，它为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提供了归宿（罗莎·卢森堡）。帝国主义之所以出现，正是出于这种保证市场不断扩大的需要。没有殖民地，资本主义便无法生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帝国土崩瓦解，过去的殖民地取得了独立——而资本主义却活了下来，贸易量比以往增长更快。一般说来，资本主义未能满足的需要不是消费、资本积累或市场结构方面的，它出现在劳动过程本身。

1969年，密歇根大学调研中心进行了一项包括对1 500多位美国工人的研究，该研究很能说明问题。当时，美国人拥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该研究发现，在30岁以下的工人中，有1/4的人对工作不满。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都是如此。不同

的受教育水平对这一比率没有影响。在工作的 8 个最主要的方面中，有 6 个方面与工作内容有关。高收入只排在第 5 位，位于有趣味、工作中足够的帮助和设备以及充分的自主之后。① 对工作的不满导致了对生产的破坏，例如自发罢工、大量的劳工流动、缺勤、产品质量低劣、消极怠工和公开破坏。“这个年轻人……说他讨厌工作，特别是单调的工厂工作。有时他对工作讨厌到了极点，竟至于故意把活动扳手扔进机器里或者靠吸毒逃避厌倦。对他来说，工作好坏、报酬高低已失去了意义。”② 显然，这个**富裕**、受过教育的工人不愿将他的**工作**视为纯粹的获得他物的手段。他要从事**有意义的**工作。年轻人觉得“他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他打算一有机会就跑开。这就是缺勤的原因”③。

后续研究表明，1973 年以后形势更加恶化。在 1973 年和 1977 年间，美国工人对工作的满意程度明显下降，他们不情愿留在现有的工作岗位上，生活满足水平和健康水平大幅度降低。“各方面工作的满意程度降低，几乎所有人、各种职业都受到了这种影响。”④ 自我雇佣者的情况与工薪劳动者的情况相似。一般生活满足水平的下降幅度是一般工作满意水平下降幅度的两倍多（用标准差计算）。工人对将他看成是某种“工资类别”的集体谈判也不满意。他也不能容忍在不同工作间被“搬”来“搬”去（being “moved” from one job to another）或像

① N. Q. Herric, “Who's Unhappy at Work and Why”, *Manpower*, January 1972, pp. 3-7.

② H. Johnson 和 N. kotz 在 *Washington Post*（April 10, 1972）的报道。

③ 对美国汽车工人工会主席 Walter Reuther 的电话采访（他在几星期后去世）。转引自 R. Edwards, M. Reich, and T. weisskop: *The Capitalist System*, Englewood Cliffs, N. J., 1972, p. 259.

④ G. L. Staines, “Is Worker Dissatisfaction Rising?” *challenge*, May-June 1979, pp. 38-45

其他工具那样被"投入工作"（being "put to work"）。资本主义制度面对着一种不可解决的矛盾。失业不再能约束工人了；它创造的是危险的政治动荡。另一方面，有保证的就业却产生了掌握自己命运的意愿。

更好的教育和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将使这些态度更加强化。妇女地位平等化所带来的家庭生活的改变也具有同样的作用。当男人是惟一的挣钱养家的人时，他将忍受任何艰难困苦。他将通过他的家庭寻求其个人的满足。"只要能够挣来钱，只要他还是挣钱养家的人，大多数男人都将忍受工作的乏味和困难。然而，男人挣钱养家的地位越来越不稳固了，全部脆弱的交易行将崩溃。"① 在这方面，妇女就业和儿童免费教育带来了影响深远的变化。婚姻双方分摊财务责任，由于存在社会保险和公共教育，为养老、医疗和学费而进行的储蓄变得没有必要。社会关系和工作条件——生活质量——成为最重要的人生问题。

工人对他们所受到的待遇越来越敏感，雇主变得越来越脆弱。工作不满对雇主来说是一种重大的危险。奴隶和农奴只能操作最简单最原始的机器。工业革命中发明的较为精密的机器，则需要自由的工资劳动者。同样道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高资本密集度的工厂和自动化生产线也需要新型的劳动力。如果班组中少了一个人，整个装配线就会停止。在一个连续生产车间，差劲的工作会造成与工资成本不成比例的巨大损失。生产成本的大量节约不能靠削减工人的工资，而是要靠改进产品、减少消耗和避免停产。现代生产力要正常发挥作用，工人

① D. Yankelovich,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Work", *Dialogue*, 1974, no. 4, pp. 3-1. 引文见 p12.

必须是负责任的和可靠的，他们必须对其工作感到满意。这就是为什么雇主——不论他们持有怎样的个人和阶级偏见——必须找出解决对工作不满问题的方法。实际上，他们也忙碌于实验雇用的专家们所建议的各种方法。美国曾创立了特别法律，资助"对美国工人异化问题解决方法的研究及试点工作，并提供有关的技术援助。"①

如果工作日趋单调，令人厌倦，工作就应该轮换、丰富和扩展；工作必须升级，使工人超越死气沉沉的工作状态，孤立的附属单位可被自主的工作小组代替，专制管理可被代之以参与式管理。"科学的"泰罗式工作组织（在这种组织方式下，复杂的操作被分解为基本动作，工人被要求像受过训练的牛一样做这些动作）必须摒弃。碎片应予重组。汽车厂的生产线应分为独立的班组。电话公司的收费员应负起对某些账户的全部责任，而不只是每一个账户上的一次通话。计件工作应被代之以班组式工作，班组在设计上应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性。工人应该有控制产品装配和装配线旁的工作分配的权力。小时工资应被代之以周工资。侮辱人的身份差别应当消灭。蓝领工人的待遇应与白领工人相同。劳资联合"工作生活质量委员会"（像美国 1973 年汽车工人联合会那样）应予建立。在瑞典，1969～1970 年的自发罢工风潮被认为是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的爆发。在工会的鼓励下，社会民主党政府成立委员会，制定法律提高工人在工作中的地位。这些法令很快得以实施，就业安全得到了改善，工人获得了公司董事会的少数席位、工会代表

① 见 H. Wachtel: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Stratification in the Labour Process" in R. Edwards et al. *Labour Market, Segmentation*, Lexington, Mass: D. C Health, 1977, pp. 95－122. 引自 p. 112.

的工作场所活动范围也扩大了。其他国家也曾出现过大量的自发罢工，政府也都被迫做出类似的反应。

所有这些措施都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纪律改善了，监督成本和管理成本降低了。它们也对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劳动的人道化起了促进作用。

看到资本家竞相改善工作条件，这很令人高兴。这和马克思时代所发生的一切正好相反。当时，血汗工厂制度、过长的工作日和过低的工资是高额利润的源泉。不过。目前的改善并没有触动问题的本质——生产场所内部的专制等级。劳动仍然是异化的，工人仍然不满，生产制度仍处于危机之中。

既然劳动具有存在上的重要性，对工作的不满会带来对生活的不满。密歇根调查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对工作持否定态度的人对生活也持否定态度。在这两个方面，自我雇佣者的不满程度都是最低的。这显然是因为他们享有独立性，有自决的可能——无论这种可能是多是少。但自我雇佣者的份额在不断下降。此外，前面已经提到，后来的研究表明，就连自我雇佣者也受到了影响。工作不满和生活不满正在加剧。这个社会已到了变革的入口。将要出现的变化不是出于物质贫困，而是因为这种制度不能满足较高级的、历史地决定的需要。“也就是说，对资本主义的主要控诉不再是它不能生产出像样的生活水平所必须的产品，而是它无法创造人类自由和自我表现的基本条件。它不承认个人在任何水平上的自决。”①

---

① R. Aronson and J. C. Cowley, “The New Lef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R. Wiliband and J. Saville eds , *Socialist Register*, London : Merlin, 1967, p. 84.

第二节 合法性危机

在战后第一个动乱的年份——1919年，诺森伯兰矿工的代言人威廉·斯特拉克尔〈William Straker〉对桑基矿山国有化委员会〈the Sankey Commission on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Mines〉陈述了这样的观点：

> 过去，工人们一直想着获得较稳定的收入和令他们满意的工作条件。雇主想着满足工人的这些要求。工资提高了，条件改善了；但不满和不安并没有绝迹。许多善良的人得出结论，认为工人过于胡闹，欲壑难填。实际上，造成不安定的不只是元、角、分，虽然这些也很重要。问题的根子在于对人类自由精神的束缚。①

然而，在英国这一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还不可能出现生产者的自由。罢工失败了，矿山仍为私人所有，雇主的专制重新建立了。只是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这种自由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要。这一认识当然对现存秩序的合法性产生了深入持久的影响。

如果一种秩序未能满足某些基本需要，其合法性就会受到人们的质疑。合法性“包括该制度使人们产生并确定现有制度是最适宜的社会制度这种信仰的能力。”② 如果有越来越多的

① 在桑基矿山国有化委员会的证词，1919。
② S. M. Lipset, *Political Man*, New York: Doubleday, 1969, p. 64.

人对生活和工作感到不满，这种制度就不可能是最适宜的。如果该制度不能良好运行，社会的价值观念结构就必须做出改变。这实际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现有社会安排不再是合理的。他们感觉改变是可能的，既然可能，就应当尝试。

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如自由、民主、机会平等——可能不会改变，但它们渐渐有了新内容和新解释。以民主概念为例，如果一个社会的民主只适用于政治生活，在工厂大门前驻足不前，这个社会能否被称为民主社会？在大门里面，民主权利被搁置起来，压迫性专制取代了它们。这种两面性是合理的吗？应该被容忍吗？1965 年，德国商界的喉舌《工业通讯》〈Industriekurier〉写道："经济民主化，像学校、兵营和监狱的民主化一样，是毫无意义的。"① 一个世纪以前，人们对这一声明不会有太多的异议。在今天，这句话并不是说经济民主是不可能的，而是在说公司要组织得像兵营和监狱一样。今天的人们对此是根本无法容忍的。

类似的推理也适用于上面提到的其他价值观念。进入企业工作不再是纯粹的自由契约了。如果企业组织得像兵营和监狱，工资契约就是出让自己的人生自由。与此紧密联系的是对财产的看法。财产可能仍是神圣的，但人们开始认为使用财产剥削或支配他人的劳动是不合理的。这类似奴隶制，雇佣奴隶制因此就成了一个有社会意义的概念。民主与雇佣奴隶制显然是不相容的。至于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者弱者和强者之间的机会平等，听起来就像一个笑话，没法当真。

① 1965 年 10 月 7 日；另见 1968 年 11 月 6 日。转引自 F. Deppe et al . Kritika Saodlu? ivanja , Belgrade: Komunist, 1974, p. 153

合法性的瓦解总是伴有公共生活道德标准的瓦解。信用差距（credibility gap）这一新术语逐渐投入了使用，被人们用来描述这一现象的某一方面。法国军事机器在阿尔及利亚的残暴和美国在越南的杀戮在这两个国家造成了深刻的道德危机。水门事件、国际电话电话公司（ITT）对智利的颠覆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洛克希德腐败案都是这种信用差距的例证。

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并不困难。商界权威主义常常扩展为政治权威主义，而政治权威主义则意味着民主的消亡。备战和压迫的成本毁灭了经济理性。自由企业在全世界范围毁灭了生态平衡，阻止了贫困国家的发展。这些例子俯拾即是。

成功地保持其合法性的社会秩序是不可能被改变的。因此，资本主义合法性的瓦解对社会义改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上所述，这一瓦解是自发地出现的。但它是可以被加速的，知识分子的革命使命就是加速这一瓦解过程。列宁和考茨基都会同意我们的这种说法。我们对革命的研究已经表明知识分子对现存秩序的厌弃出现在成功的革命之前。知识分子质疑旧秩序的合法性，重新阐释价值观念，并创造新的意识。他们探讨改变的前景并设计行动方案。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列宁）。

资本主义制度已陷入一种道德危机。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情绪都十分沮丧。总的来说，气氛很像是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前的气氛。在考察了以美国为背景的文献后，罗伯特·莱恩（Robert Lane）得出结论说："确有证据表明，某种与近期历史有关的事物在45岁以下的人口中造成了心理压抑和沮丧。"接下来，他更加概括地补充说："有证据证

明人们对他们自己和国家的前途感到悲观，他们不再相信社会问题能够解决，不相信人们能掌握自己的命运。"[①] 迈克尔·克洛泽（Michael Crozier）这样描述了他所在国家的社会环境：

> 体制［法国当局］陷入了道德危机。精英不再对使他们从中获益的体制的优点抱有信心。青年人批判我们社会体制的意识形态，虽然他们仍然有意无意地坚持他们从中获得的特权。任何人都不再有勇气或有意识去获取充分的权威——那种基本上是贵族式的等级秩序的责任。结果，整个体制日益受到自身重量的压迫。塑造和追求社会目标的能力越来越差。[②]

其他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遭遇了类似的批判性评价。人们日益感到与社会疏远，既有价值观念体系受到了集中的抨击。

并非一切对现有价值观念的抨击都能损害制度的合法性。相反，抨击有时还能强化制度的合法性。下面我们将资产阶级保守主义价值观与嬉皮士反文化价值观摆放到一起：

资本主义保守派	嬉皮士造反派
努力工作	玩乐
进取	无目的
体面、严肃	惹人生厌

---

① "Cognition, Consciousness and Depression" 提交给第 11 界国际政治科学联合会世界大会的论文，莫斯科，1979，p. 39

② "Why Is France Blocked?" in H. Leavitt *et al*, eds, *Organizations of the the Future*（New York: Praeger, 1974）pp. 42－56，引文见第 50 页。

增长　　　　停滞

虽然嬉皮士也有其道理，但对现有价值观念单纯的否定只能产生强烈的抵制。人们会捍卫旧有的价值观念，而视貌似激进的〈pseudoradical〉批判为愚蠢，置之不理。因为努力工作可能意味着清教伦理，也可能意味着为社会工作。工作作为一种存在性活动，在一切社会里都是受到尊重的。玩乐只能是对工作的补充而不能是对工作的替代。人们要做的是增加工作的自发性和创造性，而不是废除工作。进取心也许是异化性的，如果它只是积累金钱和追逐权力，但它也可能是技艺的完善。无目的显然不是人性化的选择。道貌岸然的资产阶级陈规陋习是既愚腐又伪善的，但轻薄下流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严肃。增长的破坏性后果不能指望通过停滞来消除，而只能诉诸对增长的社会控制。

嬉皮士或颓废派的反文化不可能创造社会重建的基础，其反面的效率也不很明确。但它明确地表现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在文化领域中的合法性危机。丹尼尔·贝尔写道："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其传统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以一种从视工作为神圣的新观念中滋生出来的道德偿付体系为基础。"在西方工业世界，制度的需要与文化的发展趋势是相互矛盾的。资本主义制度需要功能理性、技术专家决策和按能力偿付的制度；但现代文化却强调享乐，推崇反认知性和反知识性的情绪并提倡反理性的行为规范。① 公司要求人努力工作，理性、节俭并有志于事业发展。而与此同时，它的产品和广告却刺激着欲望、非

①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London : Heinemann , 1976, p. 84.

理性的花费和“率性而为”〈letting－go〉。人们白天“严肃认真”，夜间却“放浪形骸”。①

这种对文化矛盾及其在貌似激进主义中的反映的简单描述意味着积极行动应遵循以下的简单规则，没有必要否定文化发展中的历史连续性。社会主义不只是否定，它更是一种新的——如果你愿意，可以说是辩证的——综合，因此，首创性、责任、个人自由、竞争、民主和其他古老的价值观念应被列入激进的政治口号并予以重新阐释。例如：

——联合的生产者的首创精神——不是公司寡头的垄断控制

——自由社会的自由人——不是雇佣奴隶制和富豪或官僚的统治

——真正的全面参与民主——不是老板的假民主

——自治——不是管理的权威主义

——机会平等——不是阶级分层

——自治政府——不是党派机器

——在健康生活中竞争——不是剥削或杀戮

——尊重人的个性——不是尊重财产所有或权力

——一种个人充分发展的文化——不是畸形的唯利是图者或职位拥有者的原始主义〈primitivism〉

——为更好的生活而生产——不是为了毁灭而生产

——有用产量的增长——不是浪费和污染的增长

① 同上，pp71－72.

——更高的效率——不是失业和资源浪费

在 1976 年的德国选举中，保守主义反对派与执政的社会民主党进行斗争的口号是“要自由还是要社会主义”。他们的自由与本书中的自由，含义不尽相同。但保守主义者可以用这一口号争取选票，而且几乎在选举中获胜的事实证明传统社会主义出了问题。它的两大分支——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未能破坏资产阶级秩序的合法性。资产阶级革命创造了某些不可缺少的个人自由，社会主义革命不需要否定也不需要反对这些自由；它应该**超越**资产阶级自由。如果自由要成为真正有意义的事物，它必须包括对一个人自己生活的存在性条件的控制。在这一基本意义上，社会主义制度将比其他任何制度更能实现人们的自由。因此，资产阶级社会最强大的意识形态武器可以被掉转过来指向它自身，用来发起对其合法性的攻击。在 1968 年 6 月 17 日至 14 日的动乱中，在巴黎的索尔本学院〈the Sorbonne〉公布的第 29 条论纲宣称：“资产阶级革命是法律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是经济革命。我们的革命将是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人将真正成为人本身。”①

第三节　工会、社会主义政党及其政策

在漫长的阶级斗争中，工人阶级创造了两种组织，保护自己的利益——工会和政党。这些组织可用作社会主义改造的工

---

① 转引自 M.. Markovic, “Nova ljevics i kulturna revolucijia”, *Praxis*, 1970, pp. 927－944. 引文见 p. 943.

具。但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这种组织的局限性。两者都有某些与旧体制共生共存的利益。它们的领导人不会突然爆发出建设真正社会主义的革命热情。然而，满足需要危机和合法性危机产生了自下而上的压力。此外，斗争的逻辑是斗争的各方必须利用对手的弱点，取得主动权。在争取主动权的斗争中，工会和倾向社会主义的政党会支持社会主义改造。我们来看看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

传统的两难困境——暴力革命或和平改良——已经得到了解决。暴力既不可能也不可取。社会主义在利用与其本质相适应的手段时进展最快。今日的仇恨不可能产生明日的爱。态度和意识是不能一夜间就发生变化的。变化是一点点发生的，是在改造过程中发生的，人们也许会将和平的革命看作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改造的最有效的工具。

然而，传统的两难困境还有一种更微妙的形式——不是暴力，但也不是合作！必须给阶级敌人尽可能多地设置障碍。越坏越好，成了一种适当的战略。长期斗争使斗争精神活跃，使资本家不能腐化工人，两大阶级间的差距越大越好，没有桥梁，没有合作，坚决的对抗将迫使统治阶级让步并最终降伏。

历史没有认可这种战略。社会关系的紧张带来的不是革命而是独裁；阶级差别的保持没有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而是延长了资本主义的寿命。像所有的否定性战略那样，这种方法反映出的是虚弱而不是强大。它表现出的是建设性的备择方案的缺乏而不是精心构筑的社会改造纲领的存在。如果我们真清楚要做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使资本家与我们合作，一起完成我们的任务？另一方面，如果将不合作和维持冲突作为指导原则，那么 a. 潜在的同盟军分道扬镳；b. 雇主有了国家进行协

调性压迫和干预的借口；c. 工人将因放弃参与管理的责任而失去学习管理企业的大好机会；d. 作为这一切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寿命可能就会毫无必要地延长。坚持积极的社会主义建设纲领将是更好的战略，让敌对力量去承担破坏经济、损害社会的罪责吧。比起简单地与统治阶级唱反调，这样做也是更为困难的。然而，如果工会包括了大多数工人——它本当如此，如果倾向社会主义的政党赢得了大选——它肯定能做到，那么，这项任务就可能成为现实。在这种时候，合作的限度和改革的速度决定于反对派的态度。他们越是维护其特权，越是拒绝合作，他们就越不能为其行动提供合法性，公共舆论就会更快地转而支持社会主义建设。

如果这两个条件——大多数工人加入工会和控制了政府——得以满足，工党或社会民主党或共产党政府的最佳政策是什么呢？这样的政策似乎至少有七个方面：

1. **增进社会富裕的高增长率。**至少从理论讲，这是有利于一切人利益的。经验表明，增长带来的富裕创造了安全感，而安全感则产生变革的动力和承担风险的意愿。相反，衰退产生了不安全感及与之俱来的保守主义态度，人们萌发了保留一切现存事物的愿望，不愿进行实验，渴求提供安全的权威。快速增长消除了失业，提高了工人的谈判地位。工作安全和丰裕使他们转向自治。生产力的提高和由此产生的工作时间的缩短也具有同样功效。当然，利润也可能增加，这没什么不对。一方面，资产阶级要尝到甜头才肯合作；另一方面，一种社会主义政策将会确实保证这些利润用于社会主义目的。一种高增长率预示着一定程度的社会计划，而这种计划本身也是一种社会主义措施。

2. 为消除大众眼中的贫困而进行的收入再分配。对社会服务的支出也应有助于生活水平差距的普遍缩小。其余的一切都留给劳资双方的集体谈判。在这一方面，利益显然是对立的。但利益冲突已成功地制度化了。工人和穷人从收入再分配中得到的好处是有目共睹的。由于避免了罢工，雇主也有收益。尽管利益对立，双方还是有共同点。社会服务有助于男女平等（使妇女有可能参与生产性就业），消除对生存性风险的恐惧，为高级需要的出现提供条件。

3. 使一切人不受除了他本身的努力和动机以外的任何限制而发展自己潜能的各种水平的免费教育。我们在前面已经发现教育有助于培养民主态度并加强对自治的兴趣。除此之外，它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如果再分配的任务是通过政策2而完成，教育的负担由所有人分担，政策3也就顺理成章了。党和联盟应提供关于政治自治和企业管理的教育。

4. 对**文化的大力支持。**在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环境中，物的积累是进步的标志、名望的象征。高压广告、习惯、缺乏其他经验以及不被他人抛在后面的压力创造了所谓的消费主义，即对物质对象的极度膨胀的需要。结果，收入、时间和能量都被投入了最低级需要的满足上，高级需要则被作为代价牺牲掉了。人成了纯粹的“消费人”〈Homo Consumens〉。消费人与晚期资本主义很相称，但却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为了发展较高级的需要，人必须滋养心灵。教育是通往这一方向的一个步骤，但仅有教育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存在有效的社会与文化手段。既然对鲜为人知事物的兴趣必须先行培养，重头广告、竞争性定价和补贴就是必不可少的。优秀文学作品的价格必须便宜，让出租车司机也有心购买并在等待顾客时阅读——就像谚

语中的莫斯科出租司机打算做的那样。如果工人家中摆满了书本，工人的头脑里就会充满了社会主义思想。博物馆、美术馆和公共图书馆应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并不收门票。戏剧、芭蕾音乐会的票价应该尽可能低，让剧院和音乐厅爆满。业余戏剧、音乐和艺术团体应受到鼓励。"文化厅"（houses of culture）应和学校和市政厅一样常建常修。某些国家主义国家的经验证明这是可以做到的。大众文化参与一旦实现，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前提条件也就水道渠成了。欣赏音乐、油画，经常出入博物馆的人是不会玩物丧志的，物的积累将不再是他们人生的首要目标。雇佣劳动和管理独裁在他们的眼中不会是理所当然和不可避免的。

这四种政策，不论它们如何重要，只能用来创造过渡的前提条件。实际过渡是其余三种政策的任务。第一种与产业民主有关，第二种与对资本的剥夺有关，第三种则是前两种的综合。这三种政策将逐渐消灭阶级剥削的基础。

第四节　产业民主

历史研究表明劳资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起初，雇主是绝对的老板，工人只是仆役。雇主在雇用、解雇和处罚工人方面拥有无限的权力。剥削十分残酷，两大阶级之间剑拔弩张。工人建立保护性组织的企图遭到镇压，工会是非法的。在上一世纪下半期，工会逐渐合法化，成为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它们经常将行业活动和政治活动结合起来，既为产业问题而战也为政治问题斗争，第一国际就是由工会而不是由党派建立的。罢工被用来改善工作条件，扩大政治自由。总罢工被认

为是激进社会改造的适当手段。在整个时期，公开的和无情的阶级战风起云涌。这一时期即自由资本主义。它终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本世纪初，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和产业组织分离开来，形成在制度上相对完善的政党和工会。大战之后，第一批工人政党——在德国、英国、斯堪的纳维亚等国——掌握了权力。阶级战制度化了。雇主和工人创造了全国性的谈判组织。这就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开端。工会被整合进了资本主义制度。从工人的角度看，工会的功能是保证高工资和提供社会保障。从雇主的角度看，工会的功能则是保持劳动市场秩序。雇主逐渐认识到，与工会合作，不再坚持专断权力会更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利益。两条总的合作原则确立了：a. 工会将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产业冲突方面，避免政治对抗；b. 管理特权（management prerogatives）不服从集体谈判。后一原则意味着过去那种无限制的权力被称为“管理特权”的战略性权力代替了。管理特权包括雇用、更换、调转和辞退雇员的权力以及指挥和组织生产的权力。这些都在瑞典 1906 年中心劳资协议著名的第二十三节中做了清楚的说明。瑞典雇主联合会还规定了关于集体谈判合同的强制性条款。共同协商与这两条原则没有矛盾，权限划分似乎是既清楚又明确的。

然而，工人仍一直把工会看成是反对剥削的首要武器，而不只是把它作为改善生活水平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决制开始在德国出现，人事主管进入了高层管理机构，劳工代表坐在了监督席上。起初劳工代表的声音还是微弱的，逐渐地与管理者平分秋色。劳工委员会的权力不断扩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效仿了德国的榜样。试图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建立分支

的欧洲跨国公司也要让劳工代表参加董事会。1976年——第二十三节（原书）出现整70年后——瑞典政府法案规定公司管理、公司的结构、对工作的监督、设备、工作时间、工作环境等等都是可以谈判的。管理的特权彻底松动了。劳资关系的这一阶段——第三阶段标志着过渡时期的开始。

1865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写道："雇主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将逐渐变成伙伴关系。在某些场合，这种伙伴关系将是劳动者之间的联合。最终的形式也许是后者。"① 穆勒的资产阶级同行当然没有认真看待穆勒的这一预言。一个世纪后，第一种形式的伙伴关系开始出现。工人不再被看成是仆役（英国主仆法于1867年废除）或雇佣的人手，他成了伙伴，成了合作者。1973年，在挪威关于雇员代表参加董事会的法律辩论中，连保守党都投了赞成票。旧秩序已失去了合法性，无法维持下去了。

共决制意味着在车间内部和公司一级的参与，工人直接介入前者，而工会参与后者。工人赢得了参与工作检验和评估、决定作息时间、制定休假计划、工作设计和制定安全措施、岗位调转等决策的权力。他们坚持要被事先告知拟采用的合理化措施，拥有检查管理决策的权力。但如果工人被排斥在关于新组织或技术、投资和合并等战略性决策之外，在工作场所的参与和自治并不会起多大的作用。这就是劳工代表要进入董事会的原因。在这里，横跨全部行业的工会有更大的活动空间。

工会还参与"宏观经济管理"，参与国民经济政策的决定。英国工会大会的代表与管理人员一起服务于国家发展委员会。

① J. S.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48), ed. by W. J. Ashley, New York: Kelley, 1961, p. 764.

瑞典工人代表参加了劳工市场管理局，制约私人投资决策的时间选择。法国工会参加了国家经济委员会，参与计划和社会立法的准备活动并加入了30多个决定投资、出口和其他目标的现代化委员会。在荷兰，工会代表进入了劳动基金会和社会经济委员会，参与制定工资和物价政策；在奥地利，工会参加联合工资物价委员会，并在劳工局中派有代表，介入社会立法的准备工作。

工会的制度化活动有时会得到自发性罢工和占领工厂的补充——这常常违背工会领导者的意愿。后一种情况出现于企业即将破产之时，工人接管以拯救企业（保持自己的工作）。这是当代私人管理相对无效率的证据之一。在产业以外，大学里的参与问题是最为突出的。按欧洲的传统，大学实际上是最古老的自制机构，但国家权利不断侵蚀它的自主权，教授权威主义的发展缩小了大学的自治范围。20世纪60年代著名的学生造反逆转了这一趋势。最后，随着公共雇员的日益社会化，参与在公共服务中也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共决制受到了大量批评。某些批评言之成理，但另一些批评则大错特错。据说，共决制起到了约束工人，避免罢工的作用，因此增加了利润。自治团体、工作委员会和公平代表制，这一切都使工人将自己与店铺和企业认同；这些地方本位主义破坏了工人的团结，它们只是个人主义的扩大。监督管理局的成员受其新增特权的腐蚀，忘掉了自己代表的是谁，言行都像老板极了。那些由工会提名进入董事会的人尤其如此。谈判桌上的工人代表在两种忠诚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他们必须为工人争取更好的条件，但同时他们又必须捍卫公司的利益。工会必须拒绝对生产、销售和利润负任何责任。否则，他们作为

工人利益代言人的基本作用就受到了限制。共决制可能是真实的——在这种情况下，它诱使工人远离工会，削弱了工会力量——也可能只是假象。但它无论怎样都是含混不清的。

共决制显然是一种十分自相矛盾的制度，然而，一切过渡都充满了矛盾。试图保持组织的纯粹性，避免矛盾，这和维护现状的保守派没什么两样。董事会位置的腐蚀性影响也许可以通过轮换、接受普通工人的民主控制以及禁止多重委托予以消除。如果工会能促进变革，它们便会最大程度地服务于工人利益。目前，变革就是参与。一切参与都意味着责任。个人主义是不能用异化来解决的。要减少异化，工人必须对他们工作的店铺和企业产生兴趣，为他自己的工作赋予意义。如果参与制确实增加了利润，减少了罢工，那它就是一种十分可取的制度，因为它表明经济效率的提高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后才能实现。

趋势似乎是确定无误的。工会必须做的是扩大参与，走向平等——并继续前进。为此，所有制关系也必须发生变化。

第五节　生产资本的社会化

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资本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制度。这当然是陈词滥调。但这种陈词滥调却可以使我们注意一个重要的事实：对人所熟悉的组织—分配公式的意识形态辩护。按照这一公式，工人劳动获得工资，服从所有者的命令，而所有者用其资本而获得利润（利息）并实施控制。对一个在资本主义环境中长大的人来说，这一公式是属于天赋权利的范畴，是不证自明的真理。然而，如果我们剔除其意识形态的基础，如果资本

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这一公式就突然变得虚妄武断了。为什么工人不应分享利润，参与决策？19世纪的理论是所有者暂时牺牲了消费，因此必须有利润（利息）来补偿。对所有者和工人的消费水平做一简单的比较就可以看出这种观点是靠不住的。现在的正统理论是所有者承担风险因此必须得到补偿。然而，工人也承担了风险——他可能丢掉工作。实际上，他所承担的风险相比较而言还要大一些。所有者可以获得多样化的股票组合，以此分散风险；工人只有一种劳动力，只有一种工作。至于说对劳动的控制，这是一种"自由的"工资合同问题。只要另一方比较弱小，管理特权便不会受触动。如果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这些权利本身也就会成为可谈判的内容，支配和特权就不再是资本家的天赋权利了。

因此，这一问题不能只用理论来解决；起作用的是社会关系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意识形态的变化。工人正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伙伴，成为合作企业家。结果，工人分享利润，参与决策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自动产生了财富和权力的集中，这与公开表白的民主理想是不一致的。通过参与管理、分散生产性财富可以建立民主控制。这便意味着某种利润分享。我们因此又一次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既然前面已经讨论过共决制，我们现在主要考虑利润分享。

关于利润分享的讨论和实验与资本主义一样古老。利润分享被认为是一种使工人对企业忠诚，提供工作激励，抵制工会的手段。目前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新现象：人们坚持对利润分享的权利；**股票分配**取代了现金支付；最后，股票不是由个人占有而是建立了**集体信托基金**。如果一部分利润是以现金支付的，表现为工资的增加，事情就到此为止。如果利润是以股票

形式付给工人，这些股票可能被买掉，小股东人数增长，这对产业的控制不会产生影响。然而，集体所有制却代表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

法国是这方面的先驱者，它在 1917 年通过了建立员工参与制公司的法律：为了提高雇员的地位，免费赠予他们股票，通过这种办法创造集体基金。这一创新的条件当时尚不成熟，该项法律成了一纸空文。在半个世纪后的 1967 年，法国成了第一个强制 100 人以上的企业实行利润分享的国家。拿出的钱存入各种基金会，贷给企业或用来购买企业股票。用于后一种用途的只是一小部分。虽然这一法律推动了参与制的发展，但它并没有跨越从**保护**资本主义的改良走向**消灭**资本主义的改良的门槛。几年之后，在另一个大陆，终于有国家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建立了反资本主义的利润分享制度。1970 年，秘鲁通过法令，强制企业每年将一定比例的利润——在制造业是 15%——以股票的形式划入不可分工人基金。随着工人拥有的股票份额的增长，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因此，通过集体所有制，资本主义游戏规则成了工人取代资本家的手段。在一个多世纪前，约·斯·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第四编第七章）要求"工人不要从资本家手中抢夺他们或其前辈用劳动获得，凭节俭保存的财富，而是用为他们自己诚实地收购资本的方法"来解放他们自己。今天，这种设想已经可以实现了，尽管实现方式与穆勒的想法有些出入。

除了直接的政府干预（迄今为止，这似乎是惟一的办法），私人生产资本的社会化可以通过其他三种方法或综合使用这三种方法实现。秘鲁的办法，我们已经看到，是用利润购买股票。分配的数量因此与企业获得的利润成比例。另一种方法，

我们可以称之为丹麦法，是将标准工资加成。然后将这一数额转换成企业权益资本。在这种情况下，分配的利润不再与投入的资本〈Capital invested〉成比例，而是与用工资计量的投入劳动〈Labor invested〉成比例。也许可以说，工人和资本家是两种担负风险的生产要素，因此，利润应按其在生产过程中的投入比例分配，即按工资对资本的比例或是按某种更复杂的公式分配。这种理论与前面提到的那种理论一样虚妄武断，但它可以更好地适应变化的时代情感。在实践中，这两种理论的后果是不同的，我们马上会看到这一点。

最后，还可以将积累的养老金投资于担负风险的资本。既然这些基金由来自工人工资的部分组成，由此获得的有表决权的股票〈Voting Shares〉应当用来建立工人阶级对产业的控制。这种方法（可能只是一种补充性方法）可以名之为瑞典式方法。在瑞典，共同养老金〈allmäna pension fonderna〉包括的钱数超过全部现有公司股票价值；其中的一部分——并不算小的一部分——可以按议会的决策用于对担负风险的资本的投资。

丹麦式办法的主要好处是管理简单。储蓄是与工资相联系的，因此可以说储蓄的是工人，工人应控制自己的储蓄。其次，即使在非营利性组织，也可以对工资加成。最后，按这种方法，雇主很难逃避自己的义务。从管理的角度来看，秘鲁式的办法是缺乏效率的。在秘鲁，雇主想尽办法破坏法律：虚报盈亏，为腐蚀工人和减少利润而增加工资。私人投资减少了。制造业企业与服务业合并，或是将划转利润的企业出售。跨国企业是特别令人尴尬的问题，因为它可以非常容易地将利润从某个特定国家的账面上勾销。而工资是必须支付的，因此对工资的加成无法回避。但丹麦法也有缺陷。劳动密集型企业比资

本密集型企业负担得更多，这意味着前者将比后者更快地由劳动者所控制。但一般来说，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技术上都不是最先进的，也不是最有效率的。这可能会造成一种假象：工人管理缺乏效率。此外，工资与利润不同，它不是一种剩余，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也许会受到残酷打击（其股票价值降为0），而在利润较高的产业，利润也许会被中饱私囊。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将加成按盈利性和劳动密集度做出区分，但这样又会使管理难度加大。其次，开始的加成必须小，并且只能是逐步提高。但即使这样，雇主也可以把它作为膨胀性定价的借口。

概括起来，我们的初步分析表明工资加成在不发达国家也许是可取的，在这些国家，政府管理不是很有效率，市场也不完善。而且，在这类国家，投资资源——可用于投资的利润——十分稀缺，可以通过工资加成予以扩大。实际上，丹麦工会建议背后隐藏的正是这种动机：为了加快经济增长，工会赞成较大的利润份额，但工人必须分享对新增资本的控制。在经济发达国家，情况可能正好颠倒，因此，利润分享的办法也许更为可取。在这方面最先采取行动的国家——秘鲁和丹麦——却南辕北辙，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历史悖论。

现在我们来仔细考察利润分享的办法。由于利润是一种剩余，因此利润分享的办法对成本、工资和价格都是中性的。变化只能是在人们所希望的方面——所有权的分配——发生。如果对基金的贡献是20%的税前利润，股利和税收为40%，毛利率分别为5%、10%和20%，那么，基金取得公司1/2的股

票所需要的时间就分别是 75 年、35 年和 25 年。[1] 由于股权分散，通常只需要掌握很少份额的股票就足以控制企业。如果这个份额是 20%，假定其他条件相同，工人控制企业所需要的时间就分别是 23 年、12 年和 6 年。许多后果将继之而来。股权分散使工人有可能迅速实现对企业的控制。利润率越高（当然对基金的贡献份额也越高），这一控制就实现得越快。如果，像人们广泛相信的那样，资本主义管理偏爱高利润，工人现在可以全心全意地赞同并与之合作。工会的团结共济工资政策更容易实现，也更有效了。由于技术和需求的原因，各产业赢利率不同，团结共济工资，即各产业工资大致相同，将导致利润率的重大差别。但现在超额利润将不会被资本家装人腰包（尽管他们也拥有一定份额），而是被用来加快有利可图产业的社会化。新股票发行会拖长过渡时期，但如果基金的收益（工人的股利）用来购买新股票，这种影响可以被抵销。养老金也可以用做同样的目的。基金是不可剥夺的，它是社会财产。因此，对基金是不征税的。由于它们仍作为权益资本留在企业内部，税收减免也就意味着净盈利的增加和投资资源的增加。资本主义管理者将对此表示欢迎。只有不在所有者（股东）才会不满，因为他们的股票价值将要下降。然而，我们也许可以补充说，经常发生的税收增加或利率上升也会降低股票价值。任何东西，只要能降低股票价值，就一定会提高对基金的贡献与股票间的比率，也就是说，加速基金的相对增长。自治的发展

---

① 此类计算的一般公式是：

$$\frac{F_t}{S_t} = 1 - \left[\frac{1+\pi(1-\lambda-u)}{1+\pi(1-u)} \right]^t$$

其中，F = 基金，S = 股票，π = 毛利率，λ = 毛利中属于基金的部分所占的份额，u = 股利 + 税，t = 年份。参见 Meidner，*L? ntagarfonder*，p. 129

经常会改善企业伦理。同样的结果也会在此出现。出于税收方面的考虑，股票价值会被低估，低于市场价值。股票价值的低估将会意味着更多的股份被分配给基金，上面列举的结果就会随之而来。因此，诚实会得到回报。

工人参与管理这种要求应按其本身的价值来评判，未必要与所有制联系在一起。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有权的取得将有助于这一过程的发展并大大加快这一过程。最简单的解决方案是使工人对某个特定企业的管理参与和董事会参与和基金中积累的股票所有权相联系。如果基金的相对规模足以有效控制企业，工人委员会就接管企业。然而，最简单的解法往往不是最有效率的解法。人们期望的不只是财富和权力的再分配，而且还有向一种新社会制度的有序过渡。有两种制度可以成为这一过程的工具：工会和国家。由于人们希望尽可能少使用国家权力，重建生产关系的艰巨任务就不得不由工会承担了。对工会而言，这当然是其全部历史上最困难的任务。如果成功了，工会本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因为那将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

工会将运营两种基金。一种是单一的，积累劳动者收购的权益资本，这是“社会财产基金”（Social Property Fund）。另一种将包括数种对劳动者拥有的股票支付股利的基金，这是劳动基金。

社会财产基金——面向全国的基金，具有最重要的象征意义。它实际上是一种簿记制度。劳动者收购的全部股票都存在这里，但其收益按协商好的计划流向劳动基金。国有公司和非公司形式的企业可能被认为是联合股份公司，股票可用所有权证书代替。证书可以像在联合股份公司中那样，按照利润的相

对数量，每年发放一次。这一数量是企业资本的百分数。这个百分数在社会财产基金中积累、相应的股利（按净利润的某种平均比例计算）转入劳动基金。按照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社会财产基金持有的股票和证书成比例地产生投票权，这些权利也由劳动基金管理。

按地域分，劳动基金至少有三种（中心、地区、地方）；按行业分，至少有两种（企业的和产业部门的）。这些基金的适当功能是什么呢？由于工会的新任务是参与生产决策，产业部门基金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现代工会与较古老的行业工会不同，也是按部门组织的，这将有助于它运营基金的工作。基金由选举出的董事会管理，政府也派代表参加。部门基金的主要内容就是为充分的工人自治做准备。工人对现场操作是十分熟悉的，因此可以直接参与这一层次的管理。为了将参与扩大到企业一级，工人需要来自外部的帮助。没有这种帮助，工人就会被原有的管理人员操纵，或者做出错误的决策，损害自治的名声。部门基金，像部门工会一样，熟悉一个特定产业的工作状况，了解这一产业的产品和市场问题。因此，它能够直接向工人委员会提出建议。基金会将与工人委员会合作，选择董事会成员和高层管理人员的候选人。只有当委员会选举后，这些人才能获得提名。部门基金会协助委员会起草章程并提供组织方面的帮助。他们举办自治讲座。他们用股利收入购买新股，收购即将破产的企业（如果工人有这种要求），并在本部门建立完全由劳动者自治的企业。当前，部门基金也许仍保留了制定某些战略性决策的权利：例如合并与重组、大规模投资与现代化项目等方面的权利。在股东大会上，工人委员会就所有这些问题独立投票。

企业一级的参与一开始包括三个部分。工人选举工人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完全由工人组成（既包括蓝领也包括白领），主要关注现场问题。劳动共同体包括了企业雇佣的所有人员，也就是说工人和经理，运营企业的劳动基金。劳动基金是一切人工作的结果。劳动基金会将一部分经协商认定的年股利收入——例如1/2——转入部门基金和中心基金。其余一半由劳动共同体自由支配。劳动共同体可以用其所拥有的资源购买企业新发行的股票，对企业借贷，捐助地方劳动基金，赞助教育、文化娱乐活动或机构，用于社会福利支出或提高工资。关于这些事务的决策将提供集体决策的实践经验并促进着三部分参与的综合，最终走向单一的自治。

“中心劳动基金”主要意图是消解地区性差别。当必须大量购买股票或投资时，它不能袖手旁观。它为与劳动者自治有关的研究、教育、信息扩散提供资金。它为劳动者自治提供讲座，为经理进修出资。仅仅教育工人是不够的，经理也必须受教育。否则，大学将继续为资本主义企业培养经理。因此，工会必须介入，中心劳动基金比较适合用做这一用途。中心劳动基金也可以建立审计机构，为工人委员会服务；或者建立提供咨询服务的管理局，对劳动者自治企业提供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帮助，并为私人企业提供由劳动者任命的经理。

若干年后，由增加的股票所决定的投票权会变得重要起来；劳动基金可支配大量基金，劳动者自治企业逐渐增多。这时，就必须建立地区性的协调机构。这也许要求建立地区性劳动基金。过渡大体完成之时，劳动基金将成为第13章描述的那种劳动自治经济的机构。中心劳动基金、地区劳动基金和地区劳动基金将被改造成为联邦劳动基金、共和国投资基金。股

利将成为社会财产的使用价格。企业基金将与企业业务基金合并。在过渡期间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部门基金将失去意义。也许它们会形成部门银行或各种部门性研究机构、教育机构或其他机构。与此同时，它们将会建立起部门计划。

第六节　可能会被提出的两个问题

也许有人会问：雇主为什么要接受终将剥夺私人生产资本的利润分享政策？我们的回答是：他们不会接受。他们会尽一切力量反对这种政策，破坏这种政策。但他们将会明白，其他两种情况——劳动者动乱与政府干预（如果社会主义政党掌握了权力）对他们更为不利。从雇主的角度看，在若干年之后才会造成重大变革的渐变比一种突然的不可预计的变化要好得多。与此同时，政府也许会落败，情况会变化，政策会改变。从劳动者的角度来看，过渡时间不一定就是固定不变的，工会和政府活动也许会使发展加速。过渡完成之前花费的时间并不是损失，工人将学会如何管理企业。双方都有可能是对的。正是人类事务的不确定性，才使这项政策能被容忍。结果不一定是预先决定的。它取决于各方的参与，取决于人的行动。在这一过程中，重复和习惯将使初看起来令人震惊、令人恼火的关系变得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最后，就连雇主——如挪威保守派——也将投票赞成工人自治。毕竟，职业经理，就其真正职业性质而言，在工人委员会手下可以将企业管理得像在董事会手下一样有效率，甚至可能更有效率。

在此，我们也许会遇到另一个问题：如果劳动者自治企业确实比资本主义企业或国家主义企业更有效率，为什么它没有

在市场竞争中胜出呢？关于过渡政策的所有讨论是不是错了？如果劳动者自治的企业是更有效率的，它们将扩大，社会主义无论如何都会建立。如果它们缺乏效率，以降低效率为目标的政策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劳动自治企业无论怎样潜在的有效率，在资本主义环境下，都难以生存。我们做一个历史类比。

资本主义企业的特征是管理者雇用在法律上自由的工人，支付工资，它显然比封建地产和古代奴隶工厂更有效率。这就是资本主义能够取代以往社会秩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原因。然而，这些潜在地有效率的企业与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一起一直蛰伏于以往的社会，并未繁荣壮大。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的三大元素——要素流动、契约法和产权，也已经存在，但却没有太大作用。面对这一事实，马克斯·韦伯写道："与那些古老的资本主义赢利形式相反，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以理性技术为基础的严格理性的工作组织，这一组织没有，也决不可能，在这些非理性地构造的国家中产生，因为这些现代组织及其固定资本和精确计算，在法律和行政的非理性面前不堪一击。"① 资本主义有哪些非理性限制了工人自治的成长呢？

劳动者自治企业与生产合作社类似。大多数生产合作社都失败了。这至少有三个原因：

①合作社难以获得银行或行业贷款。在所必需的原材料供给和产品销售方面，它们受到了与私有企业不同的待遇。资本主义经济就像一个接受了器官移植的有机体；它自发地拒绝外

① M.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Totowa, N. J: Bedminister Press, 1968, p. 1395.

来组织。

②合作自治意味着经理工资变动范围的减少。因此，资本主义企业不难招揽最有业务能力的管理者。毕竟，发布指令比与工人合作更愉快。

③如果合作社扩大，必须雇用新工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会造成社会分化。合作社的缔造者常常把新工人当作雇工。不用多久，合作社就蜕变成了普通资本主义企业。

最后一点意味着自治与私人或集体所有制在行为上是不相容的。自治要求社会所有制。因此，我们离开生产合作社，考虑真正的劳动者自治企业。

④社会所有制意味着参与决策的权利来自就业而不是来自所有制。这又进一步意味着全部法律体系的变动。南斯拉夫工人自治进行了25年，宪法变更了三次。由于不适当的法律和制度环境，本来鸡毛蒜皮的可以自动解决的问题都变得极端复杂，为此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才能。一种异己的体制产生着不必要的成本。

⑤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对抗合作企业。对资本主义而言，工人自治是离经叛道。就连好心肠的业务伙伴和权力机关也不知道如何对待它。它是不是一种商业性的或政治性的风险？对它应使用什么标准？工会的立场是极其含糊的。这里谁是雇主谁是工人？如何看待工人的团体共济？工会在自治企业中处于什么地位？因此，这些都是令本意良好的社会成员狐疑不定的。并非所有人都是善意的，也有公开表示敌视的。即使是发生在现有企业中的效率改进，如果与官方意识形态或既得利益发生冲突，也是会遇到反对的。“只要权威主义企业能获得正常的或合理的利润。执政者就会倾向于保持现有秩序，不愿创

造更有效率但更为民主的组织，因此，保护现有权力差别、身份差别和收入差别的目标就比全局性的企业效率更受推重。"[①]微观企业的效率潜力只有在宏观经济社会发生了相应改变时才可能发挥出来。这是一个易于理解的现实。

社会环境的改变需要持续不懈的政治斗争。这一斗争的基本战略，像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是做有助于人类发展的任何事情。因为，社会主义只是人道主义的另一个名词而已。

第七节　生产合作社的角色

从罗勃特·欧文开始，社会改革家们就时时鼓吹生产合作社是社会经济改造的适当工具。但英国和美国的合作社发展史并未给人们留下太深的印象。在其余各国，生产合作社则一直微不足道。前面一节已分析过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人们也许会由此得出结论，说虽然生产合作社是可取的，但它在经济上不可能有太重要的作用，因此也没有必要重视。这种结论是错误的，原因至少有三种：

①现代合作社似乎比过去的资本主义合作社更有生产性。

②在资本主义解体的年代，社会环境对合作性实验比以往更为有利。

③人们不必重蹈覆辙。合作社的组织形态可以设计得符合其生存和扩大的需要。

合作社常常是中小企业。他们通过三种不同的方式建立起来。a. 传统方式。工人将资源汇合起来（也可能有外部的贷

① L. F. Karlsson, "Experience in Employee Participation in Sweden: 1969－1974", *Economic Analysis and Workers' Management*, 1975, 296－330, 引文见 p. 316.

款)，建立合作社。这些通常是很小的企业；b. 近来越来越多的是工人接管即将破产或即将售出的企业，自己进行管理，保持自己的工作。这些企业常常是较大的企业，工人有时能获得社会支持。c. 进步的雇主将股票赠与雇员，企业成为合作社；改造过程经常历时数年，分步到位。

下面，我将集中分析 a 中的情况，当然大部分分析也适用于其他两种情况。

生产合作社是一种介于私人所有企业和社会所有企业之间的形式。它们以集体财产为基础，集体财产是一个有些含糊的概念。这提供了一种组织上的灵活性。合作社在形式上可以与私人合伙制企业毫无分别，也可以走向另一个极端，表现为纯粹的工人自治企业。因为这种灵活性，合作社常常能在刻板的资产阶级法律框架中组织起来。

我们寻找的合作社战略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企业即使在一种异己的环境中也具有经济上的生命力；它们必须能为向社会主义经济的平稳过渡做出准备。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合作社的成败，我们能看到一些规律性。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规律性制定更可取的战略。以下七个因素似乎最为重要。

1. **成员出资。**加入合作社的人应“购买”他的工作。现付必须充分大，但又不能过大，不应阻止有兴趣的人加入。成员存款用于三种用途：它是一种资本来源；作为贡献证明，它有教育价值；在市场经济中，它将个人利益与企业的长期成功联系在一起。如果申请加入者没有现金，他可以得到贷款，或者将这些费用从他某一时期的收入中扣除。部分费用（在蒙德拉贡，是20%的费用）转入合作社不可分的准备金账户。余额进入个人账户，按固定的年利率支付。如果一个人有权力提

取个人余额，他可以用债券或股票（而不是现金）提取。股票是没有表决权的，但只要不转让，可以获得一些名誉性的特权(例如，参加会议，拥有讯问权)。以这种方式，合作社资本可以保持完整，退休成员仍会对他为之奋斗过的共同体保持强烈的兴趣和感情上的联系。

2. **外部资金**。现代资本密集技术要求大量人均投资。会员费不足以弥补这些投资的成本，余额将由外部资金提供。为此可以利用普通的金融工具（借贷、发行债票和没有表决权的股票)。

3. **非成员**。非成员是二等公民，为了防止合作社变质，非成员常常是禁止的。可能的例外有两种。在合作社里，工资差别不大。在资本主义社会，工资差别可能会很大，这使合作社无法留住高素质的经理。因此，几种管理岗位可能会留给非成员和作为雇员的经理。这当然颠倒了通常由经理雇佣工人的程序，但这正是合作社的性质。美国胶合板合作社的经验表明这是可以做到的。另一种例外是季节性生产，非成员被雇来满足季节性需要。

4. **支持结构**。一个孤立的合作社是不能长久存在的。全国性合作协会会起到某种作用，但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当合作社在经济上形成一个部门时，合作社才能发展壮大。部门不需很大，但必须自成一体。在一国经济中，可以存在几个这样的合作社体系。为此，合作社需要雅洛斯拉夫·瓦内克〈Jaroslav Vanek〉所说的支持结构〈Supporting Structure〉，这种庇护性组织是第二级的合作社。因为合作社没有进入传统资本市场的途径，渴求资本，支持结构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合作银行。银行是投资资本的来源，提供短期贷款，认购债券，并为

合作社发行的股票和债券提供一种市场。其他两种重要的部门活动是教育和管理人员一起提供的法律服务以及管理建议。蒙德拉贡体制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其支持结构的良好组织。这种支持机构兼顾了所有这三项活动。随着合作部门的增长，就可能将劳动者从一个部门向另一部门调转，以此保证就业。

5. **养老金和保险。**为了降低风险，养老金和保险方案另行管理。开始时，可以只将少量保险基金通过合作银行转化为合作社投资。随着合作社数量的增加和整个合作部门的增长，保险基金中可以有越来越多的部分用于投资。投资的来源因而扩大了。

6. **增长是存在的前提。**技术进步需要不断的再投资。市场竞争需要规模和财力的增长，这也要以资本投资的增长为前提。依赖外部资金，风险太大。因此，一大部分净利润必须用于投资。一部分利润（在蒙德拉贡，这一比例是正常利润的20%，或超额利润的更大部分）存入不可分的准备金账户。一部分利润用于附加工资（增加或减少）。还有一部分要用于社会支出和教育支出。如果还有余额，则付入个人账户。不可分的准备基金是社会财产的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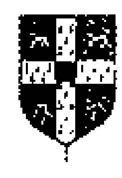
7. **共同体精神。**合作社也是一个劳动共同体。很自然地，成员会对共同体事务产生浓厚的兴趣。部分收入将用做各种共同事业的支出。另一方面，在需要时，合作社将获得地方共同体的帮助。其中一项显而易见的需要是认购债券。

在其他方面，第八章讨论过的组织原则都适用于生产合作社。不用说，自治的基本原则——一人一票——完全有效。

我们不能指望说，一旦合作社服从了上述七条戒律，就一

定能获得极大的成功。决定成败的是人和人的行动。但我们可以说，现代合作社拥有获得成功的机会。

除去例外情况，合作社不可能成为社会经济改造的主要工具，它甚至也不会成为很重要的工具。在这方面，对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参与和工资劳动者基金比起合作社要重要得多。但合作社运动能在创造适宜环境、培养意识、揭示私有制及其社会等级制和权威主义的不合理性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此外，合作社能够解决许多个人存在的问题。由于这两种原因，生产合作社是一般社会主义改造战略的组成部分。



第 17 章

过渡的途径：国家主义国家

第一节 改变的动力学

在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通常存在政治自由。所以，我们可以假定，工人有自己的工会，而公民有自己的政党。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社会倾向，即某些这样的组织可能会选择社会主义。期望社会主义政党赢得选举和组成政府，这是非常现实的。因此，我们的任务是探讨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对这样的政府可以推荐的政策。

国家主义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在这里，政治自由受到如此的限制，以至于从所有的实践的目的而言，政治自由被认为是不存在的。工人没有自己的工会，公民也没有自己的政党。

不存在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接管政权的一般可能性，因为没有组成这样的政党的一般可能性。因为禁止派别主义的存在，系统内的反对派（组织内部的反对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至少是不正规的。所有这些是否意味着只有暴力革命——像托洛斯基所说的“政治革命”——才能改变制度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肯定不是。当然了，暴力革命是可能的，就像匈牙利1956的起义所显示的那样。但是，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就是进行一种和平过渡的尝试。

问题要比 1917 年头脑简单的革命者所能想象的复杂得多。布哈林在 1920 年写的一部关于过渡时期的著作中发表了这样一个普遍被接受的观点：“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主人’的问题解决了，因为‘剥夺者’被‘剥夺了’。”① 财产是被剥夺了，但是政治权力却没有。专政就是权力，而权力被新的主人占有了。起初，布哈林和他的同事们是新主人，所以，他们并不担心。主人的问题解决了。当他们在权力的游戏中被技高一筹的斯大林击败时，已经太晚了。他们没有时间再提供关于处理政治权力集中问题的类似的过渡理论了。

国家主义的处境是非常荒谬的。哈里·布拉维曼评论道：“在历史上所有的特权集团中，苏联特权集团是惟一的和与众不同的。它必须使人明白它自己的特权和统治社会的权力的非正统性；出自历史的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它或者必须假装这些特权并不存在，或者争辩道它作为一个未曾到来的时代的监护人对社会的托管权是暂时的。”② 事实上，统治阶级总是如此：

① N. Bukharin, *Economics of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71, p. 158.

② H. Braverman, *The Future of Russia*, New York: Grosset and Dunlap, 1966, p. 110.

它隐瞒自己的特权和强调它的暂时性——虽然统治期一再延长。国家在反对社会主义的同时又宣布忠诚于她。党通过阻止任何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出现而建立起其垄断地位，但同时却宣称自己是这一运动的先锋队。这种矛盾的处境既有优势也有劣势。由于社会主义有巨大的感召力，借助于社会主义的口号，政治官僚集团巩固了其统治的合法性。然而，在实际上反对社会主义却使统治阶级的地位变得特别的脆弱。国家主义政治官僚集团比当代任何其他的统治阶级有更多的权力。但是，正如爱沙克·德舒尔〈Issak Deutscher〉指出的那样，它的地位比其他统治阶级的地位更不安全和更不稳定；因为，不像资产阶级和贵族，政治官僚不能作为一个统治阶级公开地行动，它必须隐藏它的实质。“它感觉到就像历史的私生子。”①

两种结果随之而来。统治阶级必须制造一连串和无休止的谎言，同时防止社会受到关于真相的信息闯人的扰乱。资本主义承认它是资本主义，而国家主义不承认它是国家主义。它也必须保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成功。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大灾难或军事失败中正常地生存了下来，但同样的情况却是对国家主义制度的一种严重的威胁。英国可以增长得很慢，但波兰却不可以。在资产阶级的背景下，一组持不同政见者的声明很少会引起注意；但在官僚制度中，这会吓坏政[illegible]，并且几乎动摇了政体。国家主义必须证明并且反复地证明它的优越性和绝对的正确性。说谎的习惯——或更正确地说，是需要——来源于领导层无法兑现革命的诺言。尤其是，国家主义是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继承物。德舒尔写到，起初，布尔什维克领导者

① I. Deutscher. *Nedovršena revolucija*, Belgrade: Centar za durštvena istraživanja pri, Predsjedništvu, SK, 1971, p 27.

并不试图掩盖社会发现自己所处的困难情况，他们试图保持活生生的希望，并用真话鼓舞他们的同事们。但真实太残酷了，无法去除绝望。因而，真话逐渐地被安慰的谎言所代替。目的仅仅是掩盖梦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但是很快地，谎言就被用来作为一种证据。[①] 并且走上了不可返回的道路上。这个过程由于历史决定论而加速了。党只是按照历史的规律行事。由于党的政策是符合历史规律的，所以它不是也不可能是错误的，党不对失败负责。结果是，说谎并没有产生良心上的不安。

没有能力承认制度的真实性质，不仅意味着说谎的必然性，而且也意味着一种接受社会主义责任的需要。我们已经看到了（第二章第三节 D），基本福利——寿命预期、教育、医疗——在国家主义社会要比在资本主义社会高。我们注意到，国家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更平等些。在这种情况下，接受的社会主义责任至少部分地被完成了。在其他方面——主要在政治领域，它仍然没有被完成，虽然一再反复宣布要实现它，例如，宣布这是今后最近 20 年的行动计划。苏联共产党在 1961 年的第 22 次代表大会上宣布："社会主义国家组织的演变将导致国家逐步地向一种由苏维埃、合作社和其他劳动者共同体联合起来的共产主义的自治共和国转变。这一过程将涉及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在今天包括国家机器在内的计划和行政机构、经济管理和文化发展机构将丧失它们的政治性质，成为社会自治组织。共产主义社会将成为高度组织起来的劳动者共同体……历史的进程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的废除。" P·德米切夫（Demichev）和其他的苏联作者宣布，在这里，已经发生了

---

① I. Deutscher, *The Prophet Unarme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ch. I.

“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所预见的事情”。然而，我们然后从德米切夫那里听到，当社会变成无阶级社会时，当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全民国家时，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仍然被保留着![1] 另一位作者说明了工人阶级的这种领导作用的含义是指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发展的所有阶段中，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带领下行使其领导作用。”[2] 德米切夫宣布，在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党的统治作用加强了！包括着这些矛盾的制度被表示为“在政治领域里的发达社会主义”。[3] A. K. 波尔雅〈Belyh〉把这一点表达得更清楚：社会主义自治意味着领薪水的、专业的和总是不经过选举的官员。完全选举的和随时可撤换的官员被推迟到未来的“共产主义自治社会”。[4]

在由科学院行政法研究所集体编写的一本书中，某一章的标题是：“共产党在社会中**支配**作用的提高是发达社会主义中**民主**的发展规律。”（着重号是加上去的）然后，这本书提到，党员占成年人口的9%；党制定政治路线，**指导**和**协调**国家和社会组织的工作，并且为**自我活动**和**创造性**创造前提。在苏联社会中，反对派的组织和力量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整个苏联社会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这意味着国家的**阶级性质**的发展。苏联国家的意识形态作用进一步拓展，法律保障了工人的权利和雇员参与生产管理的权利。这个权利包括对组织的改

① 在这方面，马克思讲得非常精确：“如果说无产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共产党宣言》）我们的作者当然知道这段引文，但是——和其他的作者一起，出自于明显的理由——更愿意忽视它。

② S. A. Styepania ed., *Rabochiy klass SSSR i yego vedushchaia rol' v stroitel' stve kommunizma*, Moscow: Nauka, 1975, p. 310.

③ P. Demichev, “Razvitoy socializm: stupen' na puti k kommunizmu”, Problemy mira i socializma, 1973, no. 1, pp. 9-15.

④ A. K. Belyh, *Upravlenie i samoupravlenie*, Leningrad: Nauka, 1972.

善提出建议，管理者有义务考虑这些建议。至于讲到工人管理本身，这个博士团体把这种思想当作无政府主义的口号、把所谓的生产民主当作现代的机会主义而厌恶地加以拒绝。①

在苏联政治学发表的一篇有代表性的论文中，鲍里斯·托普尼〈Boris Topornin〉争辩道："在发达社会主义下，国家活动的范围大大地扩展了。"社会主义通常是与国家的消亡相联系的，一个强大的国家被认为是对个人自由的严重威胁。但是，托普尼简单地断言："由特别强调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辨别发达社会主义的国家。"② 这些观点明显地反映到苏联 1977 年的新宪法中，例如，第 20 款宣布："与共产主义的理想相一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国家追求的目标是：给予公民运用他们的创造力、能力和才能的越来越多的真正机会，千方百计地发展他们的人格。"自由对公民来说意味着控制国家。在国家主义却不是如此。在那里，国家控制着公民，并且把自由作为一种慈善的礼品配给公民。

上述搜集的引语总结了流行的政治意识的本质特征：a. 革命在口头上继续着；b. 术语被重新解释而变成了毫无意义；c. 真正的改变被推迟到有关共产主义的遥远的未来。③

然而，语言的结构——如果不是意识形态——对言词的使

---

① G. M. Manov et al., *Demokratiia razvitogo socialisticheskogo obshchestva*, Moscow: Nauka, 1975, pp. 90, 98, 105－106, 110, 118, 219, 146.

② B. Topornin, "The Dynamic Political System of Developed Socialism", in *Political System: Development Trends*, Moscow: Social Sciences Today, 1979, p. 12.

③ 萨瓦·西瓦诺夫〈Sava Živanov〉在分析苏联的意识形态的发展时指出，1939 年党的第 18 次代表大会宣布：苏联已进入"完成无阶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逐步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第 21 次和第 22 次党代会把这个过渡期推迟到 20 世纪的 80 年代。1961 年第 22 次党代会通过的新纲领宣布：在今后的 20 年，即到了 1980 年，"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将基本上在苏联开始建设。"在 70 年代准备新宪法的有关讨论中，新的权威观点是：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后，将有一个长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而不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Novi ustav i osnovni pravci razvitka političkog sistema SSSR", *Socijalizam u svetu*, 1979, no. 12, 193－209, p. 197）

用规定了确定的限制，人类的心理对未能实现的诺言的忍受力也有一定的界限。不管政治上的垄断，国家主义的国家是非常脆弱的。它不允许自由的讨论，不能开放它的边界，它不能给予政治自由，它不能忍受批评。它甚至不能在占领的其他国家里可靠地使用它的军队。①

同时，现代技术的革命化影响在这里也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样被感觉到了。从农民那里招募来的、老式的、半文盲的和贫苦的工人阶级逐渐地被新式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和富裕的工人阶级所代替。在1970年，苏联的工业中，具有技师文凭的所有毕业生中的四分之一受雇于工人的岗位。教育快速发展，文化设施大规模使用。广大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满足必定要产生对下一个层次需要——政治上的需要——满足的强烈要求。然而，这必须加上一个限定的条件：这种需要既不是立即也不是自动地出现的。在资本主义环境里，消费主义延缓了高层次需要的出现。在国家主义的环境里，与虚假的政治积极性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分裂化扮演着同样的角色。技术的要求很少是含糊不清的。技术复杂程度的提高要求分散化控制和工人的更大的独立性。它同时也要求与国外企业的更多的接触和与国外技术发展中心的更紧密的联系。组织上的僵化和孤立主义招致落后和无效率。

---

① 在匈牙利起义期间，驻扎在匈牙利或罗马尼亚的苏联军队不得不被来自苏联不发达地区的、经过洗脑的新的派遣军队所替换。在第11届联合国大会上，匈牙利特别问题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有时，匈牙利人得到来自苏联军队的同情……一些苏联官兵站在匈牙利一边战斗和牺牲。”（A/3592，1957，pp. 24－25）吉瑞·派利肯（Jiri Pelikan）这样描写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联士兵：“普通的苏联士兵感到非常困惑和士气沮丧。在每一处当我们的人民问他们为什么入侵一个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时，苏联士兵不知道如何回答。在这一时期内，有若干个苏联士兵自杀。”（R. Blackburn，ed.，*Revolution and Class Struggle*，Sussex：Harvester，1978，p. 257.）

国家主义在经济上的优越性意味着较高的增长率。然而，当经济到了很高的水平时，这种优越性逐渐地消失了；并且，就像第六章指出的那样，超过了某一点之后，似乎变成了劣等性。国家主义在政治上的优越性意味着坚如磐石般的国际支持。这种情况不复存在了。西方共产党自由地批评国家主义阵营。党专政的斯大林主义教条已经被这个阵营之外的大多数主要的共产党抛弃了，真正的政治民主这一最初的社会主义原则已经被重新树立起来了。因此，除了在落后的国家里，国家主义在这两个方面都处于劣势。在国家主义阵营内部，“忠实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反对派”的出现，就像最重要的异见者团体称呼自己的那样，预示了新纪元的来临。

国家主义国家的矛盾处境导致了矛盾的结果。政府越成功——生活水平越高——平民百姓要求政治改革的压力就越强烈。政府越不成功，它就越不具备合法性，就越发感到不安全。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这种制度将不得不进行改变。

第二节　怎么办?

75年以前，列宁第一次提出了怎么办这个问题。今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在上一节讨论的观点中，这个问题可以被稍微地重新表述为：应怎么办才能加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由于有组织的政治活动是不能容忍的，所以推测如果允许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应该怎么办是毫无意义的。一种秘密的列宁主义政党也不是真正的替代办法。一旦出现了这样的秘密党，这个制度就将处于崩溃的边缘了。

一个官僚化的国家主义社会是分裂化的社会。官僚等级制

代替了社会的纽带。个人没有**他们的**偏好、**他们的**组织和**他们的**私人生活，正是国家、“党和政府”决定了每一件事情。私人生活是与官僚总体不相容的。那些反对国家、反对集体的人将犯有不道德的罪行。他们立即失去了他们的朋友，被当作敌人来对待，并被逐出社会。在一种更加极权的国家主义环境中，他们被逮捕和被送进强迫劳动营。他们不能指望得到来自社会其他成员的团结互助，因为团结是以友谊、其它纽带和共同目的的觉悟为基础的一种相对牢固的结构为先决条件的。这些东西都被警察的镇压和入侵性的洗脑所摧残了。因此，在政治活动可以发起以前，必须在一种更为基本的水平上创建团结的结构，它显然是中性的、与非政治活动相联系的。一旦开始了国家主义社会的重新构造，这将是政治霸权结束的开端。为了这一理由，一种秘密的政党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最初，知识分子可能再一次扮演关键性的角色。事实上，知识分子的作用比在他们在其它任何制度下的作用都更重要得多。莱斯扎克·克拉考斯基（Leszek Kolakowski）说明了原因：

> 一种苏联式的制度的好处是它不必要向公众解释其行为的合理性：根据定义，它代表了公众的利益和愿望……然而，它也暴露了一种在民主制度下未曾存在的危险之中：即它对意识形态上的批评特别敏感。这意味着，在其它事物中，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是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一种在智力上对制度合法性的威胁，或对一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的赞同，代表了一种道

德的危险。①

在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的任务比其它地方的都要简单。为了改变现存的意识形态和削弱权力机构的合法性，他们不需要制定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已经存在着，它是在大革命产生的，但它的意义在后来被破坏了。知识分子所必须做的事情就是恢复语言的本来意义，描绘社会主义的蓝图。剩下的工作由未被拒绝的革命传统来完成。

事实上，不仅仅存在着革命的传统，还有其它的因素。外部世界也已经改变了。以一种有些荒谬的方式，外部世界帮助抑制了阵营内部的反革命力量。很早以前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可能性的争论永远是有意义的。但在新的情景下，在某种意义上，这个问题被颠倒了过来。我已经提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立场的激进改变。这一分支被叫作“欧洲共产主义”。② 当阵营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是完全免疫的，但共产主义者的批判却是灾难性的。在隔绝的状态下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是可能的，以引证遭遇到的巨大的困难和未知的障碍为内部的反革命辩护也是可能的。然而，在宣布社会主义胜利之后再回到自我强加的封闭状态却是不可能的。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国际社会的整体进步力量的影响。拒绝各种各样的国际人权公约被

---

① L.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 3, Oxford: Clarendon, 1978, pp. 90 – 91.

② 这一术语显然是由一名从罗马报导的南斯拉夫记者弗拉尼·巴比里（Frane Barbieri）制造出来的。这一分支的主要发言人圣地亚哥·卡里罗（Santiago Carrillo）说明了欧洲共产主义的涵义：“需要向民主的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这意味着多党制、议会和代议制、通过普选制正常地行使统治权……工会独立于国家和政党，反对派的自由，宗教自由，文化、科学和艺术创造自由，以及在所有社会活动方面和所有水平上的更广泛的参与的发展。”（' *Eurocommunisme*' *et état*, Paris: Flammarion, 1977, p. 165.）

证明是不可能的。一旦这些公约被批准，它们就不能完全被忽视。如果这样做，就会遭遇合乎宪法的、并且只有通过严重地削弱政权的合法性才能被镇压的内部反对派。捷克斯洛伐克的第77宪章——它得到了阵营之外的共产主义者的支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苏联的人权委员会和波兰的一个类似的委员会（成立于1977年）也是证明。因此，在国家主义环境中的社会主义者应该做的，不是发动暴力革命，而是要服从法律和尊重公民自由。① 坚持合法性和实现宣布的目标变成了最革命的行动。

虽然知识分子可能充当领导，但工人不可能永远都是被动的。他们将在传统的劳动关系领域开始行动：反对不利的生活条件，以及反对老板。他们将举行罢工和组成独立工会。就像在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工人们一样，他们将很快地认识到，只有在政治自由的制度下，工会才能起作用。工人们然后将为了共同的目标加人到知识分子的斗争中去。事实上，这种情景不是纯粹的想象，它已经发生了。在1970年12月，由政府提高食品价格的法令而触发了波兰工人的示威。工人们开始要求若干关键性的改革，如在工厂实行关系的民主化，工会的自治，废除职务的特权，对官僚主义的有效斗争，和发布没有扭曲的信息，等等。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苏联，警察和军队的派遣

---

① 在1977年的6月，因为突然提高食品的价格，罢工浪潮席卷了波兰的城市。权力当局以各种各样的镇压措施做出反应。在9月，一组波兰知识分子创立了“保卫工人委员会”（KOR），目的是为受迫害的工人提供法律、医疗和物资的援助。这是波兰战后第一次成立的代表左翼反对派的独立组织。委员会要求对警察的暴行进行公众调查。一年之后，KOR转变成为“社会自我保护委员会”，其目标是：(1)与任何形式的以政治、宗教和种族为理由的压迫进行斗争，对受迫害者提供援助；(2)反对所有的违法行为，帮助那些违法行为的受害者；(3)为尊重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而斗争；(4)支持和保护每一个试图运用人权和公民权利的社会主动性。（Z. Erard and G. M. Zygier, *La Pologne: une société en dissidence*, Paris: Maspero, 1978, p. 41.）

队镇压了一系列的罢工和工人的造反。在这些行动中，工人被杀害或受伤。1978 年 1 月，苏联矿工维拉迪米尔·卡列巴诺夫（Vladunur Klebanov）和其他工人建立了叫做自由工会的组织。像在早期资本主义时代一样，大多数工人立即被解雇，许多工人被逮捕。卡列巴诺夫和几个其他工人被监禁在一家精神病院里边。① 因为这样的行为被解雇或被关进监狱当然说明了无产阶级在一种阶级制度中的困境。然而，这种对待不可能阻止苏联的工人们像他们的同事在其他国家和在其他时代的行动。在 1978 年 2 月，一组波兰工人在卡托维兹建立了“自由工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得到了“保卫人权运动”的支持。

工人和其他人民一起将要求自我管理。② 就像经验显示的那样，在开始威胁到政治霸权之前，工人管理在工厂范围内发展得相当的快。在压力之下，政治官僚集团可能理性地选择向工人管理屈服。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第一个信号已经可以看到了。在 1965 年改革的一次讲话中，柯西金总理说：“除非管理变得更民主，除非大规模地扩大群众的参与，否则更好的管理是不可能的……应该使每一个工人都感到他是工厂的一个所有者。”③ 20 世纪 60 年代的后半段，苏联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讨论参与的问题。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工人对他们的工作感到极度不满。工人、工程师、学者，甚至党的官员中的绝大多

---

① Tamara Deutscher, “Voices of Dissent”, in R. Miliband and J. Saville, eds.,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78, London: Merlin, 1978, pp. 21-43, espec. p. 41. 其中的一名患者被报告说：“在她寻求正义时遭受精神过度紧张发作的折磨。”德舒尔这样评论道：“这是对一种把‘寻求正义’送进精神病房的制度怎样的控诉呀！”

② 在更发达的国家主义国家中，工人始终自发地这样做。在 1956 年的布达佩斯和波兹南之后，在 1968 年的布拉格之后，和在 1970—1971 年的格坦斯克（Gdafisk）和辛格塞茵（Szczercin）之后，工人们就是这样做的。异见者团体总是不可避免地要求自我管理。

③ Quoted in M. Yanowitch, *Social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in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Robertson, 1977, p. 146.

数（从 89%到 77．2%）都支持基层的管理人员由选举产生。只有高级管理者似乎对此没有明显的热情（赞同的为 52%）。在 1963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苏联经济学家 A·波尔曼可能是第一次毫不含糊地宣布，社会主义不仅仅意味着公有制和高水平生产，它使“劳动人民参与生产管理、参与整个国家的管理成为必不可少的。然而，甚至‘参与’这个词是不够的，它是由劳动人民本身行使管理权。社会主义是劳动人民——通过国家——自我管理的社会。”① 为了使文章发表，不可避免的国家不得不被包括到论点之中，但与“客观的必然性”不一致，波尔曼清楚地表达了他希望工人有权决定雇用和解聘企业人员和报酬制度。

因此，工人管理可能是最初的突破。然而，我们很难指望，这将导致快速的社会和政治的转变。延续了几代人的政治社会化的负面影响太强烈了，制度在一段时间内的稳定是非常可能的。② 由于工人管理延长国家主义的生命，我们是否应该摈弃它？情况与资本主义下的相类似，回答是一样的。我们不仅仅对摧毁现存制度感兴趣，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开始得越早，引起的社会分裂越少，就越好。工人管理意味着企业方面一定的自治，这要求实行分权化。分权要求法律的保障，而法律保障是政治保障的先决条件。

工人管理还具有更直接的腐蚀作用。前面（第 16 章第 6

---

① Quoted in M. Yanowitch, *Economic Analysis and Workers' Management*, pp. 408－409.

② 资产阶级的秩序是政治民主和经济独裁相结合，政治官僚的秩序可以恰好相反，是经济民主和政治独裁相反。统治阶级在其权力基础的领域内保持着垄断。

节）提到的1968－1970年阿克齐〈Akchi〉参与制农业的试验就是第一个独立地预示可能会发生什么的先兆。由于它太成功了，所以试验被中止了。但是，它引起了公众的讨论。莫雷·雅诺维齐〈Murray Yanowitch〉对试验的总结如下：

> 它贬低了对专业经理这个大的社会阶层的需要。虽然以一种有限的形式，它坚定了由“直接生产者”进行自我管理的思想。它否定了苏联农业经济经营不善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落后这种观点。它确认了平等的收入分配（至少在工作小组内）和有效率的劳动作业的一致性。也许更重要的是……那些没有谈到的东西。在阿克齐，党的“动员”和“监督”作用……几乎是不必要的，在选择轮换的经理职位上的参与不是农场生产操作方式的一种结构上的要求。用对试验发表的一个评论的语言来说，阿克齐是从“法律上”的财产社会化向生产关系的“真正”转变、向社会化财产的“集体管理”转变的一个证明。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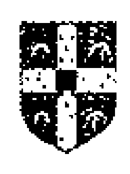
阿克齐的试验失败了，但其他人将会以他为榜样。对此没有任何的怀疑。

一旦权力的分散化过程开始启动，它发展得相当地快。几乎在一夜之间，言词将获得它们的正常的意义。统治阶级将同样快地丧失它的不稳定的合法性。反映党纲和宪法，托普宁和他的同事们宣布：“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主要方向是民主的深

①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p. 415.

化。"[1] 在变化的环境下，这可能非常认真地进行下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语言框架已经保留着，并可以使用了。国家主义上升到社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显示了这是如何发生的。因为成熟的国家主义制度的基础的不稳定性，布拉格之春能够触发连锁的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它必须被扼杀在摇篮之中。捷克斯洛伐克人沉默了，但是，其余的世界觉醒了，欧洲共产主义诞生了。国家主义只有在削弱它的合法性的情况下才能生存，从而，破坏了它自身的生存。

① Ibid., p. 18.



第 18 章

过渡的途径：不发达国家

第一节　征服政权

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政治自由。无疑地，这不是真正的民主；用莫里斯·杜沃格尔〈Maurice Duverger〉的话来说，宁可说是富豪民主〈plutodemocracy〉，因为政治权力是以平民（demos）和财富（plutos）为基础的。[1] 但是，某些基本的政治自由得到了十分有效的保证。我们看到，在这些国家里，过渡的主要问题是建立经济民主。

在国家主义国家里，作为社会主义先决条件的某些福利非

---

① M. Duverger, *Janus - - Les deux faces de COccident* Paris: Fayard, 1972 , p. viii.

常好地实现了。在这里，过渡的主要问题是保护政治自由，建立有效的政治民主。

不发达国家被知道既没有政治民主，也没有经济民主。它们或者是殖民地——因而受外国人的支配和剥削，或者是独立国家——这意味着受国内反动寡头的支配和剥削。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政权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极端压迫性的。加之，这些国家的人民很穷，未曾受过教育。

我们看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国家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如何特别的艰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定是毫无希望的。坦桑尼亚总统朱利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他本人不得不面临这样一种困境，把这种困难总结如下：

> 在很少有社会主义者的情况下，我们正在试图建设社会主义；在人民很少有民主基本要求意识的情况下，我们正在试图用民主的手段完成改变；在很少有技术员的情况下，我们正在试图实现对我们经济的根本改造；以及在一个其全部教诲是鼓励个人提升动机的教育精英面前，我们正在试图促进一个平等的社会。①

如果在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中，社会主义明显地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还要试图实现她？回答是：上面陈述的问题是一个虚假的问题。如果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一蹴而就，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走不同途径的机会，通往社会主义

① Quited in *What Now*, the 1975 Dag Hammarskjöld Report, presented in *Development Dialogue*, 1975, nos. 1－2, p. 59.

的某些途径并不比其他途径更快。一旦我们抛弃了连续阶段的历史决定论，我们就可以开始思考发展的捷径。一个新的非洲或亚洲国家可以，但不是必须，遵循资本主义的或国家主义的发展途径。它可以选择一条更直接地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1]我们现在的任务正是要探索实现这样一条道路的可能的设计。因为这里涉及到极端多样化的国家，所以，这种探讨只能仅仅是非常一般化的。

不像在发达国家，暴力革命在不发达国家是可能的，甚至是非常合适的。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变成了社会革命。越南、也门、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也许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或者在国内战争中，或者由于年青军官的起义，过时的君主政体被摧毁了，中国、埃塞俄比亚和某些阿拉伯国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和平的和“议会”的权力转移是一种例外。坦桑尼亚和几内亚成功了（到目前为止），而智利失败了。

社会主义是不能作为一种礼品而被赐予的，如果社会主义从根本上实现了，她也只能是长期斗争的结果。上面引证的例子说明了，这种斗争很可能涉及到暴力，这种暴力经常是非常残酷的。社会主义者不能选择斗争的条件，他们仅仅可以选择斗争的策略和战略。如果以暴力强加于他们，他们不可以退却。但是，暴力的不可避免性并不意味着应该赞成使用暴力。越是使用暴力，胜利之后重建社会主义的机会就越少。尼雷尔说明了为什么：

> 甚至是最成功的和最流行的革命也无可挽回地留下了

---

① 在1967年，60个非洲政党中的43个在它们的纲领中选择了社会主义。然而，在许多情况下，社会主义仅仅是民族主义和经济增长的代名词。

> 苦难、猜疑和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仇视的种子。这些不会导致平等的制度的建立，并且使在全体人民中间建立一种合作的精神变得困难起来。特别是，总是存在着这样一种恐惧，即那些在革命时期饱受折磨的人可能会伺机进行报复。受到伤害和遭受丧失亲人的痛苦折磨，记忆犹新，这些毒害了社会内部人们之间的关系。一种暴力革命可以使引进社会主义的制度更容易些，但它使给予这些制度以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态度的发展变得更困难了。①

在国内战争中摇摇欲坠的封建的或法西斯国家——因为和平转移权力的机制并不存在——可能被一种将实行生产资本国有化但似乎不能接受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权所代替。反动派的专政被革命派的专政所代替，后者往往容易退化成为来自内部的反革命。苏维埃政权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很显然，这不是不向独裁政权做斗争的理由，但它的确表明了在权力和平移交中的社会主义者的既得利益。

由于过渡是从现存的秩序开始的，所以，必须利用这一秩序的机构。因此，政党将是绝对必要的。这一政党将要完成双重的任务：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为此，它必须由为之献身的政治活动家们所组成。党需要严格的纪律和强有力的领导，从而，它必须是集权的。如果党被迫转入地下，就要以更大的力量保证这些条件。最适合于这一任务的政党类型就是如同列宁所设计和缔造的“革命家的组织”。

① J. Nyerere, *Freedom and Socialism*, Dar es Sala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24–25.

党由革命的知识分子组建起来。它发动的运动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运动在城市开始，根源于经济的进步。但是，为了成功，革命必须征服农村。农民占总人口的70～90%，所以，他们是主要的革命——或反革命——力量。当（在资本主义）农民拥有土地的时候，他们倾向于保守，忠于教会和权力当局，并且抵制变革。20世纪西欧的农民通常就是如此。但不发达国家的农民却不是这样（上一个世纪的欧洲农民也不是这样）。在这里，农民在经济上受剥削，在政治上受压迫，不堪债务的重负，丧失了他们的土地给高利贷者和地主。推销员和大众传媒向他们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教师告诉他们说，他们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结果是，除了极少数富裕农民是可能的例外，农民们准备好了接受革命。像中国革命和南斯拉夫革命这样不同的当代革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①]

工人阶级中的潜在的革命者是相当地少。工人在人数上很少，挣得的收入是农民收入的好几倍，他们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代表了一个特权的集团。不像19世纪欧洲的工人，当代不发达国家的工人组成了工会。[②] 工会照顾着使他们结合到现存的社会之中。当无土地的农民为了改善他们的处境而必须向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展开攻击时，工会化的工人们仅仅坚持他们在企业收入中的一个合适的份额。一个对工会施加影响的政党可以实质上提高工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

---

① 用阿尔及利亚革命理论家弗拉兹·法农（Frantz Fanon）的话来说，就是："在殖民地国家，农民是惟一革命的，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并将得到一切。在阶级制度之外的饥饿的农民是被剥削阶级中第一个发现纯粹的暴力是值得的。对他来说，不存在妥协，没有可能的条件，殖民地化和非殖民地化仅仅是相对力量的强弱问题。"（*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 p. 284.）

② 在20世纪的50和60年代，37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中工会劳动者所占的比重，要大于美国的比重。

流氓无产者是由流入城市的和无法找到永久性工作的农民所组成的。他们生活在贫民窟和破烂的乡镇里，并且在拉丁美洲，他们占城市人口的大于四分之一。他们是贫穷的和被剥夺的，但这不能使他们进步。他们经常受到保守派领袖的注意。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列举了他们为什么缺乏激进思想的四条理由：(1)离开了农村，他们感到社会地位的提升；(2)他们带来了乡下的观点和态度，如对社会的服从和被动性；(3)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立刻得到食品、工作和住房，而这一切是不能通过进行反对制度的斗争就可以得到了；(4)为了生存而斗争，他们彼此之间互不信任。虽然他们本身并不激进，但一个受欢迎的和决定性的政党可以使贫民窟居民变得激进起来。

毛泽东发现，在中国，手工业者、小商人、白领雇员和专业人员是革命“可靠的同盟军”。这可能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也是真实的。例如，在拉丁美洲，银行职员的工会是激进的大本营。毛泽东还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暂时的同盟军。因此，只有一小撮寡头反对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这包括大地主、富裕的资本家和作为国际资本代理的政治家。他们必须从权力的位置上被推翻。对于这个任务，党可以动员实际上全体人民的支持力量。

在秘密的列宁主义政党不存在的地方，这一任务可以由军队来完成。军队是一个具有严格纪律和统一意志和目的的组织。一个开明的领导集团可以使这个组织转变成为一种进步的工具。学生和军官是社会中两个最现代的集团。如果学生不能组织起政党，军官们可以接管。因为受过训练，军官们是民族主义者；因为其功能，军队是社会中最现代的部门。结果，军

官们将向落后和腐败进攻，并拥护效率和民族的统一。如果军队被卷入了国家的社会—政治的矛盾之中，他们可能很快地培养起社会觉悟，参政，向寡头挑战，并且在政治和经济改革中充当领导。在农村中展开反游击战的行动有促进秘鲁军队觉醒的效应，使它亲身体会到了农民的令人震惊的生活条件。血腥的殖民地战争的恐怖经历促使葡萄牙军队的军官推翻了独裁政权。在皇家的庭院内连续举行盛大的宴会的同时农民正在挨饿这一事实的对比震撼了埃塞俄比亚军官的觉悟。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军官们在接管政权之前没有社会改革的纲领，他们的新的责任也可能使他们转变成为社会主义的改革者。一系列的亚洲和非洲的军事政变就有这样的经历。

第二节　政治稳定

获取政权只是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政治体制的选择。这种选择是由体制的稳定性预先决定的。正如贝尔特拉德·罗塞尔在很久以前评论的那样："我们必须……首先寻找稳定的政府，哪怕它是独裁式的；只有当政府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我们才有可能成功地希望使它变成民主的政府。"① 从而，"主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一种合法的公众秩序的建立。"② 虽然没有自由的秩序是可能，但没有秩序的自由却是不可能的。

建立一种有秩序的政府尤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就更困难了。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达到很高的劳

① B. Russell, *Power*, London: Unwin, 1967 p. 18.
②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pp. 7 – 8.

动生产力，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建成稳定的政治民主。二者需要渐近的积累：前者需要资本的积累；而后者需要政治的经验。事实上，除了贫穷以外，如果说不发达国家有什么共同特征的话，那就是政治的不稳定性。正是因为如此，它们的脆弱的民主结构被破坏了，并被这样或那样的独裁所取代。经常有人说，资产阶级发展所取得的一个伟大的功绩是政治民主。让我们简短地回顾一下法国大革命的一个半世纪之后在大部分资产阶级欧洲发生了什么。我想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两个十年。

欧洲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政治历史包括了军事政变和法西斯政变，议会制度的一连串的失败，和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民主整个被独裁所取代。在这一进程中，欧洲资本主义的陈列馆出品了下列独裁者和独裁政权：1920 年，海军上将霍希〈Horthy〉成为匈牙利的摄政王；1922 年，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1923 年，斯坦波林斯基〈Stambolinski〉在保加利亚被谋杀，他的政府被推翻，1933 年扎沃诺夫〈Zvenov〉的军事政变和 1934 年的波利斯〈Boris〉国王接踵而至；1923 年，普利矛·德·李维拉〈Primo di Rivera〉将军在西班牙成立了一个军事独裁政权；在实行了几年的议会民主之后，又在 1936 年出现了臭名昭著的弗朗克将军的军事起义。在 1923 年和 1925 年，在希腊的两次企图军事政变之后，麦塔克塞斯〈Metaxas〉将军在 1936 年建立了他的军人政权。在 1926 年的立陶宛，有一次军事政变，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的非议会制度政体。在同一年，皮尔舍德斯基〈Pilsudski〉元帅在波兰发动政变，在 1935 年他死后，这个独裁政权在陆军上校们的统治下继续着。在 1927 ~ 1928 年，萨拉哲〈Salazar〉在葡萄牙夺取了政权；1929 年，亚历山大国

王废除了宪法，并在南斯拉夫建立了他的独裁统治。就是在1933年，21个德国的总理在14年里连续继任之后，希特勒加入到欧洲独裁者的陈列馆中。在同一年，多尔福斯〈Dollfus〉接管了奥地利的独裁政权，内战开始了，几个月以后，多尔福斯被纳粹杀害，在1938年的德奥合并中，奥地利丧失了它的独立。1934年，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所有的政党被禁止。最后一个形式上的独裁政权是罗马尼亚的卡洛尔〈Carol〉国王在1938年建立的政权，但实际上，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内，罗马尼亚人都在独裁的统治下生活。议会民主只是在这样一些国家（一战前独立的）存在着，即在危机时刻到来之前，这些国家的政治民主，以成年男子的实质上的投票权和负责的政府来衡量的，至少持续了一代人——一般是好几代人。它们是英国、法国、瑞士、比荷卢三国经济联盟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前没有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芬兰和爱尔兰应当包括在内。这些国家代表欧洲最发达的部分（意大利和德国是个例外）。对于这一规律① 的惟一重要的偏差是瑞典，在那里，一个比较负责的政府也许不可能在1917年之前出现。然而，在这个国家里，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在关键时刻被选举上台，并且在以后的几十年的时间内，瑞典的社会民主党人设法使他们的国家转变成为世界上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领先的国家之一。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的故事。即使存在政治民主的国家也经历了政治上的极大的不稳定。在1919～1933年，挪威的内

① 这一规律不需要适用于其他大陆：智利就是证据。就意大利和德国的情况而言，[illegible]法西斯[illegible]政权

阁平均维持的时间是 1 至 2 年。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丹麦、瑞典、比利时、荷兰和法国的内阁维持时间不到半年。毫不奇怪，经济发展总是处于停滞状态。

在二战以后，整个不发达国家重复了欧洲欠发达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历。在第一个 30 年，20 个拉丁美洲国家中的 19 个国家成功地发动了政变；换言之，除了墨西哥之外，所有的国家都屈服了。这可以在真正社会革命的可信赖的基础上建立政治制度。非洲和亚洲的政治形势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原因是不难发现的。经济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变动，摧毁了旧的价值观和社会结构，但没有立即以新的取代它们。每一个民族集团和社会集团的第一国民推动力是追求它们自身的利益。蛊惑人心的政客的活动有着肥沃的土壤，分裂的势力强大，局势如此紧张。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城市要比在农村大得多，并且工业化进一步提高了整体的不平等。但是，人民并没有准备好把这种不平等当作合理的而接受。教育提高了抱负水平，但新需要的满足却是滞后的。政治参与的发展比政治进程的制度化快得多。最发达的国家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建立了普选制，而普选制的取得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普选制在现在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不是在每一个地方普选制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地实行的。施加在政府身上的压力简直太大了。不起作用的商议和自由的协定被命令和独裁的安排所取代，后者是可行的。

在这些条件下，对稳定的目的而言，一党制毫不奇怪地是最好的安排。如果党领导了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它将实际上博得普遍的大众的支持，这是一种宝贵的政治资本。

很明显，一党制既代表了一种危险，又代表了一种机会。

弗拉兹·法农描述了前者，而朱利斯·尼雷尔描述了后者。法农指出：

> 党扮演着行政和警察的替身角色，控制着群众，目的不是确保群众参与到治理国家的事务之中，而是经常地提醒他们，政府希望他们服从和遵守纪律……支离破碎的人民群众被认为是一种盲目的力量，必须经常地或者用神秘的事务或者用警察所制造的恐怖而加以制约。党像晴雨表和信息中心一样行事。好斗分子变成了告密者，他受到了反对村民的派遣队的信任。用棍棒和投石块消灭处于萌芽状态的反对党。反对派候选人看见他们的房子着了火……在这些情景下，党没有挑战，99.99%的选票投向政府的候选人。①

很清楚，这样的党是不能作为社会主义重建的工具发挥作用的。

另一方面，尼雷尔探索了使党比它的对手更民主的可能性。如果统治党以传统的方式行事，领导将选择候选人，后者将自动地选举出来。人民没有选择权。

> 这意味着，我们的程序实际危及到了民主和统一；如果人民总是默认……由党的机构提供给他们的候选人，他们将丧失了控制他们的代表及行为的有效的权力。如果人民反对该候选人，就会使我们民族的敌人

① *Wretched of the Earth*, pp. 181–182.

> 有了可乘之机，并且危及到他们希望保卫的原则的未来。我们因此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即维持假定被用来保护民主实践以及对多党制是合适的制度和程序，实际上消灭了人民选择代表的权力。①

解决办法是，通过法律建立一党制和给公民选择他们自己的代表的完全机会。在议会的预备选举中，党在地方代表大会的代表团选拔代表名单。两个得到选票最多的候选人成为（在原则上）普遍选举的候选人。他们的竞选活动由国家资助。他们自由地表达他们的观点，但是他们不能攻击社会确立的价值观，如国家的统一、对宗教、民族和种族的宽容，等等。

一党制可能被滥用。它可以变成法农式的而不是尼雷尔式的政治制度。然而，选择不是在一党制和多党制之间进行的；选择是在由资产阶级政党或国家主义政党支配的政治制度和由社会主义政党支配的政治制度之间进行的。

第三节　过渡的经济学

政治稳定性是经济迅速和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先决条件。然而，它不能自动地导致增长。事实上，一个政治上稳定的社会可能在经济上增长得很慢。快速增长需要有目的的设计。然而，快速增长产生了不稳定的因素。另一方面，如果经济增长很慢，就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希望。这些追求的不同目标之间似乎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我们的任务是探索使这些目标一致和

① *Freedom and Socialism*, p. 36.

相互促进的可能性。

增长意味着工业化。在一个农民占总人口的 70～90% 的国家里，工业化意味着劳动力由农业向城市职业的转移。历史经验证明，这种转移以每年最高 2% 的速率进行。因此，将需要 5～20 年的时间使农业人口所占的份额下降到 60%，并且使国家进入迅速增长的工业化阶段。

在最初阶段，在发展的最低水平上，增长似乎很慢，积累率很低：10～15%，而资本—产量比是很高的，可能还会进一步提高；工业混合兼并的条件是不具备的，缓慢发展的农业占主导，而快速扩张的制造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一个很小的百分点。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基本生产性设施将建成，国家将进入卢多福·比卡尼克（Rudolf Bicanic）所说的经济增长的门槛。至少有四个不同的理由说明了为什么在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会加速发展：

①资本—产量比下降——增长越快，下降就越厉害。例如，在战后南斯拉夫第一个发展的 20 年里，平均的资本—产量比率由 7．5 下降到 5。这种下降主要是由于工业混合兼并条件的改变：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份额在下降。

②因为另一种非常不同的原因，每单位产量的资本成本下降。在一个静态的经济中，所有的投资是用来替换耗费的资本品的。增长率越快，重置投资所占的份额就越小，每单位产量的资本成本也就越小。如果年增长率为 10%，所有的总投资（超过 95%）实际上都用来生产额外的产量，每单位产量的重置成本减少到其静态价值的七分之一。经济表现得就仿佛资本成本接近于零。

③全员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似乎与要素的投入率的增长相

关。投入扩张越快，联合要素增长率就越快（“技术进步”）。这种效应似乎是实质性的。

④快速扩张的制造业所占的份额的增加提高了经济吸纳投资的能力。换言之，经济可以吸收更多的生产性投资，投资的边际效率提高（投资率不变），所以经济能取得较高的增长率。

这四种效应（它们中间某些是部分地重叠的）向同一个方面起作用：经济增长越快，未来的加速增长就越容易。在工业化阶段，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可能提高到30～40%；在这种情形下，年增长率大约是10%。

并不出乎意料地，最大的困难才刚刚开始。当农业到目前为止是最大的生产部门时，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农业所发生的一切。第一个步骤是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寄生所有者，和把土地交给耕种它的农民。大的不动产应该为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的商业生产者和技术进步的中心保留着。在组织上，它们将转变成为国家或劳动者管理的农场。除此之外，土地的再分配应该使所有的农业居民都成为可以自食其力的生产者。农业的扩展服务、价格支持的安排、消灭了剥削的中间人的市场设施的提供、合作的计划和农业信用，完成了第一套政策措施。

最重要的是要保证农业劳动力的生产就业，这将导致食物自给自足，可能还会产生一些剩余。可获得的投资资源的一个实质性份额也将投入与农业相联系的方面。灌溉和改良计划将扩大可耕作面积和提高产量。投资在工厂生产出来的农业器械、肥料和杀虫剂代表了工业化的自然开始。原来维持生计的农业居民形成的购买力将为简单的消费品提供一个大市场。消费品工业的扩张，与为农业提供资本和中间产品的工业、道路和铁路建筑的工业一起，将为建筑材料、冶金制品和其它生产

者产品提供一个市场。产量的提高必将伴随着能源生产的扩张，工业化将获得了推动力。

为了利用国家所有的潜在的增长能力，一个中央的计划机构必须建立起来。它的主要工具将是一种国家投资基金，和把可获得的物质资源配置到关键的地方。中央计划由地区和地方的利用地方资源发展的积极性加以补充。

如果要恰当地引导和控制市场经济，政府必须控制金融流量和对外贸易。后者要求严格的普遍监督和对某些重要的进口和出口流量的许可证制度。前者要求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全部国有化。

相反地，对经济的生产部门的全部国有化尤其是不必要，也是不可行的。许多的所有者——毛泽东把他们称作民族资产阶级——将会积极地与社会主义政党合作，他们掌握其他人所没有的极端稀缺的技能，不应该是国有化的对象。为了国家发展的目的，需要用金融手段赎买外国人拥有的公司。另一方面，对一个或两个外国公司控制的部门——如油田或铜矿——实行国有化被证明是绝对必要的，这些部门对于国家的经济独立太有利了和太重要了，以致不能不实行国家的全部控制。至于其他部门，议会可以使外国公司感到有责任任命本国的公民担任经理职位，在所有的企业中引进联合决定，并且可以运用丹麦的建立工资劳动者基金的方法，使在安静地进行生产性资本社会化同时，产生额外的投资资源。外国企业将不会抗议，因为同样进程也将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中开始。

因此，在最初阶段，经济将由几种类型的生产企业所组成。少数的大农场、制造业、采矿业和运输业企业将由国家所拥有。将存在着一定数量的生产者合作社和消费者合作社，以

前的未被国家没收的大地产将由农民来经营。农业之外的许多小的劳动者管理企业将由工人自然地从失败的私人企业中产生出来。大多数企业将仍然是私有的，但是依靠联合决定和工资劳动者基金被社会地转变了。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最大多数的家庭企业——农村中的农民、城市中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完成了这样多种形式的最初的财产结构。

五种不同的所有制成份的并存使管理经济的任务变得极其复杂和非常微妙。社会—经济的均衡明显是不稳定的。经济政策的目标不是要保存这种并存的均衡，而是要控制变化的动力学。占优势的公司和家庭拥有的私人部门倾向于发展资本主义。如果以压制性措施制止这一趋势，就很可能出现国家主义。国有部门是其财产的基础。劳动者管理的部门不仅是最小的部门，而且是最脆弱的部门。许多年之后，农民才能学到如何管理他们的农场，工人才能学会如何管理他们的企业。在此期间，效率不会是很高的。工资可能低于私人部门和国有部门的工资，这将使最好的工人和管理者流向后两个部门。只有党的组织很好地运转时，才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红色专家”将被派往农场和工人企业，来帮助他们管理他们的企业，并将和他们的工人和农民伙伴工作和生活在一起。党员将使私人企业中的联合决定保持活力；并且，当然了，党员将管理国有企业。

制度的动力学现在应该清楚了。国家投资基金将主要被用于发展老的国有企业和建立新的国有企业。联合决定将被引入到这些企业之中，以阻止国家主义发展的倾向。联合决定将逐渐地扩大，并将向着发育完全的工人管理方向发展。总经理将由政府任命，可以给他有限的否决权，但其余的组织将以劳动

者管理为基础。私人部门也将发展，新企业可以创立。但是，公司企业发展得越快，它们将被社会化的进度就越快。首先在国有部门发展起来的联合决定也将在私人部门进一步发展，但滞后些。最后，劳动者管理部门将扩张，将得到技术上和基金上的支持，和将提高它们的效率。这三个部门将被引导朝向一个单一的劳动者管理经济方向汇聚在一起。在一代人左右的时间内，该任务可以被完成。

工人管理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但它还不是社会主义本身。其他的两个因素是：合适的政治制度和一定的最低水平的经济发展或生产力。假定后者是一个限制性因素，让我们看一看一个不发达国家将面临怎样的时间远景。如果从一个农村人口占总人口80%的国家开始，它将需要15年的时间达到快速的工业化阶段。与此同时，人均产量将提高到譬如说平均年增长率为3%，到了该阶段结束时，它将提高到大约60%。如果人口每年增长2.5%，国民生产总值将增加到大约120%。在工业化阶段，增长率可以提高到人均7%。[①] 如果把1939年西欧的占优势的经济发展水平当作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有意义的社会主义可能开始的水平[②]，那么，假定的生产率不变，它将在30年内达到这种水平。因此，在一个贫穷的亚洲或非洲国家里，向社会主义过渡将花费45年的时间。国际援助将缩短这段时间间隔。人们可以从这些假设的计算中得出

---

① 日本实现了9%的增长率。

② 我的这一假设主要是根据我对南斯拉夫的经济和社会进程的分析。(see B. Horvat, *An Essay on Yugoslav Society*, White Plains, N. Y. :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1969) 这种发展水平使完全的识字率、普遍的十年教育、平等的收入分配和政治民主成为可能。可能有人评论说，西欧国家已经远远地超出了1939年的水平，但仍然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答案是它们正在试图保存资本主义，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它们没有走捷径，而是走迂回的道路

的结论是，即使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社会主义不是遥远的和无法企及的乌托邦。那些生活在过渡进程开始阶段的人有希望看见它的实现。

第四节　过渡的政治学

在一个不发达的国家里，原始的忠诚作用很大，而一致的意见很少。人们不知道有可能的替代办法。国家的社会政治的统一是必须完成的任务。经济和政治制度必须建立起来。权力需要合法性。在自由放任的局势下，在稳定的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实现之前，可能要经过一个世纪的政治上的不稳定、政变和反政变、残酷的阶级斗争，甚至内战。拉丁美洲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这样一个过程所涉及的社会成本太大了，持续的时间长得令人不能容忍。更有甚者，最终的结果达不到我们这个时代历史的可能性。但是，另一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创建一个先锋政党，它的主要工具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在这种场合下，惟一的（虽然是主要的）区别是，意识形态是有目的的设计的产物。所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我是指某些人类的基本价值与使这些价值可能实现的社会理论的结合。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使党能够开展广泛的运动，把社会凝聚在一起，给社会以社会主义重建所必须的目的和意识。由于意识形态不能轻易地改变，一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牢固地建立起来，它就成为一种自动的、对连续的政府和党的领导控制的力量。心理学家宣布，儿时的经历对后来的成年生活产生了基础性的影响。历史似乎证明了，一种成功革命的意识形态塑造了许多后代人的觉悟。

先锋政党的基本角色是实现恰当的政治社会化。这是在过渡时期要完成的最困难的任务。我们对涉及到的这一过程仍然知道得很少。如果党没有完成这一任务，但仍然保持着权力，它将退化成为一种纯粹的权力机器，自我永久保存是其存在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化将被操纵所代替。因此，把这两个过程清楚地区分开是很有意思的。在这方面，我依靠的是德居罗·苏斯吉克〈Djuro šušnjić〉的研究[1]。作为一种方法，社会化是指教其他人如何思考、做出评价和行动，提供普遍公认的事实和标准，指明可供选择的方法，变得习惯于方法上的质疑，做出理由充分的陈述，以及建立合理的权威。另一方面，操纵意味着以一种规定的方式诱导人们思考、做出评价和行动，人为地使一般不能接受的东西变成可以接受的，消除选择，禁止对甚至可怀疑的事务进行质疑，毫无理由的谴责，强加一个非理性的权威。就其内容方面，社会化是指避免强迫接受“正确”的思想，提供观点，可能**不自觉地**传播谬误，转让知识，建立一种互教互学的关系，以及提供作为信息的真理。而操纵者则相反，他诱导别人按照他要求他们思考的方式去思考，强迫接受意识形态，自觉地散布谎言和半真半假的消息，创造信仰，建立权力的关系，和提供他的作为真理的信息。就其目的而言，社会化工作者要使其他人了解关于事物的所有本质，提高他们的知识，发展对自由和个人尊严的感觉和需要。另一方面，操纵者以诱使其他人相信他认为对他们是好的东西和限制他们的理性选择为目标；对他而言，自由和尊严代表着麻烦。社会化工作者的动机是：说明他的观点，发展公众的鉴

① *Ribari ljudskih duša*, Belgrade: Mladost, 1976, pp. 24－26.

赏力和需要，扩大另外的可能性，和为他们准备创造性的自我决定。操纵者企图加强或改变现存的态度，利用群众的鉴赏力和需要，强化他的权力，和为他人准备好了调整的培训。最后，社会化结果是一种开放的头脑和独立思考；而操纵的结果是一种封闭的意识和依赖。通常，做出概念的明确区分要比设计出促进社会化和防止操纵的政策容易得多。然而，认识到两种态度是不同的，以及存在一个理性活动的范围，是非常重要的。

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以四种不同的方法完成整体的社会导向和解决冲突。忠诚产生了对制度和宣布的目标的认同，法律调节着公民的日常行为，不同的利益通过商议来解决。在极端的情况下，而且仅仅是作为例外，政治当局使用暴力。在这个顺序中，忠诚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给所有其它程序以合理性。忠诚是共同的意识形态的结果。如果这种顺序被颠倒了，社会主义的建设注定要失败。

在一种更技术的意义上，最初阶段需要严格的集权。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是极度稀缺的。经济和政治的选择既少又简单。目标是众所周知的，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尽快地赶上更发达的国家。需要的是自力更生和取得成功的坚强决心。明显的战略是：集中少数受过训练的人于政府机构，让他们开始发动经济增长和教育—文化发展的进程。然而，就是从新的集权机器开始运转和制度运作的那一刻起，应该把政策颠倒过来，长期的分权化趋势开始启动。集权是一种权宜之计，不是永久性的结构。地方和个人的积极性在分权的情景下能得到最好的发挥。社会主义的安排可以和应该充分地利用以这种方式而产生的效率。

经济和政治的集权产生既得利益，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而且一旦官僚的地位巩固起来，想要把趋势颠倒过来是非常困难的。社会计划者至少有三种安全装置可供选择。第一个是地方的自治政府。在国家水平上的集中化意味着重要决策的集权，这是与日常事务的地方自治完全符合的。而且，自治一旦建立起来了，就有它自己的既得利益，它将作为一种抵消力量而发挥作用。

第二个是联合决定。从开始之初，就将明确，联合决定仅仅是第一步。工会在这里发挥重要的作用。一种组织逐步转变的计划被设计出来，每一个社会计划都包含了向自我管理进一步发展的措施。一般而论，过渡时期的组织框架不是制度的框架，而是一种改变的框架。正是由于统治的先锋政党的存在，它是由循循善诱的社会主义者和有奉献精神的活动家所组成的，使这种改变变得容易了。

第三个安全装置是教育。迅速增长要求教育水平的迅速提高，为其本身的缘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强调教育。因此，这两种要求相互支援。历史上，相对较高的教育水平有时是与政治独裁相兼容的，如德国的法西斯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但它们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产生的。在一种工人管理的环境中，教育加强了民主化和分权化的趋势。较早就有人认识到，在不发达国家，教育一般被证明是破坏性的。在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教育在宣布的社会目标方向上发挥作用，因此具有稳定效应。

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发达国家面临的主要危险是阶级的分化。迅速增长产生了社会的阶层。如果不加阻止地任其发展下去，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社会主义将变成一个空洞的

词。在农村，富裕的农民将开始雇佣他们的村民伙伴，高利贷者将以债务的交换获得土地，一个新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将会出现。然而，遏止这一进程相对比较容易。既不需要土地国有化，也不需要禁止土地的买卖。所有需要做的就是，确定一个土地拥有的最高限额，这个限额是由一个平均农户在没有永久性地雇佣外部劳力条件下所能耕种的亩数决定的。随着新技术的应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拥有的最高限额逐渐地提高。这当然会释放出剩余的农业劳动力，但工业化在其他地方创造出新得岗位。作为其结果，农村中的收入分配可能达到近乎理想的平等主义。

在城市，由于存在着人才外流的威胁，收入分配将会更不平等些。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不能闭关锁国。如果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薪水太低，他们将倾向于移民。由于经理社会化，工人管理使他们准备接受相对较低的工资。同样的压力也向上传递到政府的管理机构。

工厂所有者和银行家并不代表一个很大的威胁，因为他们很少存在。而且，银行是国有化的；在工厂，工人管理在逐步的社会化的条件下发展起来。在不发达国家，致富的主要源泉是腐败和对公共基金的私人占有。政府高级官员接受巨额的薪水，其收入可能是农业平均收入的200倍。因此，主要的危险来自于政府的官僚们和政治领袖。为了减轻这种危险应该怎么办？

已经指出，一党制并不意味着没有政治选择。每一个议会的席位都必须通过竞选。部长的位置必须是轮换的。党政必须分离。政治领袖必须被禁止从事像出租房屋或土地和剥削工资劳动者这样的活动，他们必须对存在的私人企业不感兴趣，或

不能保持私人企业的管理者职位。领导者的薪水应该由议会来决定，并且与工人的工资连接起来。最后，大众媒介必须完成其提供客观信息、各种观点对立的文件和社会批评的职能。无可否认，开出的是一个令人生畏的要求的清单，但既不是不可能，也不是不知道的。如果一个革命从这样的一种纲领开始，就有机会贯彻下去。可以引证的历史的失败和偏离都是与缺乏其中某些关键性因素的革命联系在一起的。

一旦我们摈弃了自由放任的方法而选择了有目的的设计社会的发展，我们不能指望这一目标由一种自发的社会力量来自动的完成。我们需要一个可以信赖的社会掌舵的工具，这就是先锋政党。这样的党对于民族独立的胜利斗争和征服政权是必需的，它被发现对维护政治的稳定性也是必要的。现在，我们看到，社会主义的重建也需要政党。没有政党，一个不发达国家就没有希望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在过渡时期理论中，先锋政党理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像过渡时期的其它制度一样，先锋政党受迅速改变的支配。不同于传统上的政党，它的主要目的是使它自己尽快地成为是多余的，为了创造一个政党作为权力斗争组织而消亡的社会销毁自己。它开始作为一种列宁主义的政党而出现，发展成为一种政治活动家的联合体，最终消失了。党没有一个现成的、仅仅需要粉碎各种各样的敌对势力即可生效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公式，这是经常需要修正、控制和改善的社会实践、科学（因此，是科学社会主义）和重建社会主义理论的工作。党必须执行下述的四种基本职能（或者两对补充的职能）：克服历史遗留下来的矛盾与在道德上和政治上整合社会，和克服社会主义内容上的政治冲突和建设一种民主文化。

1. **克服历史遗留的矛盾和冲突。**一个不发达国家很可能在伦理上和在语言上是非常不同的。城乡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距也是如此。迅速的增长导致了带有许多破坏性效应的迅速的社会变革。在这样一种潜在的和实际紧张局势下，在这样一种制度体制建设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和在这样一种迅速的和强烈的变化形势下，社会需要一种作为稳定器发挥作用的并控制和了解所有这些复杂过程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

2. **在道德上和政治上整合社会。**第一个职能仅仅局限于建立一种作为任何社会制度运行的基本条件的社会均衡。这里的问题是建立永久性的社会统一，这是社会自我继续的基础。价值被知道在每一个社会具有整合的功能，也知道价值是一种历史的或社会的范畴。因此，在一个异质的社会里，几种价值体系，彼此之间可能是冲突的，可以同时并存。价值是决定社会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它不是惟一的决定因素。社会行为是一种复杂的个人和团体的社会反应体系，这种反应以遗留的和获得的评价和观念体系、或以伦理的和人类生活存在的成份体系和个人的经历以及对符号交流解释的模式为条件。在一个异质的社会里，即使当单一社会集团的客观利益不是对立时，也很容易丧失交流的可能性—— 一种然后可以以各种蛊惑的方式加以利用的条件。当利益实际上对立起来时，或者各种各样的集团察觉到它们时，可能性就变成确定的了。

社会行为由社会性格来决定。“任何社会为了生存”，爱瑞茨·弗拉姆评论道，“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塑造其成员的性格，以致使**他们想做的是他们必须做**的**事情**：必须使他们成为和必须把他们转化成为他们是出自于内心的需要，而不是强迫

去做某件事情的。"[1] 社会性格使外在需要内在化了，因此，以这种方式，把人的身体的、智力的和情感的能量引导到满足既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需要上。[2] 就这一点来说，区分四种不同的性格类型是会有帮助的。我们在农村发现一种**传统**导向的性格类型，在这种小小的居住地里，人们彼此之间相互熟悉，教育水平很低，与外界的联系很弱，人们仍然生活在原始的集体之中。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个人主义**的性格类型，个人是隔绝的、自私导向的和感情枯竭的生物。官僚政治的国家主义和领导干部的长期政治垄断，伴随着对国家安全力量强制的服从，导致了**集体主义**性格类型的发展和相应的心理，个人缺乏独立性和个人的尊严，人性被融解到了集体之中，服从和顺从是主要的品德。与此相联系，可以观察到三个重要的事实：

①从一种价值体系向另一种价值体系的转变，或者更广泛地，由一种社会性格向另一种社会性格的转变，不是立即发生的。在间隔期间内，存在一个旧的标准体系不再起作用、而新的标准体系还没有形成或发展的混乱时期。这是"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和"社会纪律丧失"的非常危险的时期。更危险和更激进的是社会转变的时期。而社会转变是经济增长率的函数。

②明显地，这三种类型的社会性格都不能够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基础。我们因此寻找第四种社会性格类型，这在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至少没有完全地发展起来），但是它可以而且必须出现。如果自发的社会力量不遵从自觉的社会控制，它的随意发展很可能会产生或者是个人主义的或者是集体主义的社会性格，亦即资本主义或国家主义。

---

① E. Fromm, *Zen budizam i psihoanaliza*, Belgrade: Nolit, 1964, p. 229.
② E. Fromm, *Bekstvo od slobode*, Belgrade: Nolit, 1964, p. 259.

③与社会主义一致的社会性格可以被称之为**联合**的性格。联合的品德实现了与社团的完全统一——不是以一种不自觉的、未加思考的和因此是强制的方式，就像个人在不发达社会的原始集体里所做的那样；而是以一种自由的和自治的品德方式，依靠通过他或她存在的基本条件所做出的可能的和自觉的选择的方式。自然地产生联合性格形成的先决条件的制度是在所有的人类活动领域的自我管理。

在某种意义上，社会性格只是社会关系的另一个名称。联合品德只是社会主义品德的代名词。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形成可以很慢或很快。无秩序的发展当然不是最快的。发展将会被加速到使社会可以形成联合品德的先锋派的程度。不像精英，先锋派不要求统治，而要求行动；它与“群众”没有区别，但是它包括了来自各种各样的表达清晰的社会集团中最成熟的个人；它不依靠政治权威——特别不依靠警察，而是依靠道德权威。在这个意义上，党员的道德标准在实现其道德整合的作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3. 克服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政治冲突。如果我们检查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我们发现明显缺乏修复的努力，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但论战的政党不是对社会主义提出疑问，而是对其他集团对社会主义的解释提出疑问。从革命后早期苏联的工人反对派的被击败，到中国包括毛泽东遗孀在内的“四人帮”的被逮捕，最危险的冲突发生在对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框架之内。以夺取政权为惟一导向的和相信一个单一的、简单的被揭示了的真理的列宁主义政党没有准备好处理这种类型的冲突。在夺取政权之后的复杂条件下，形式上的统一被证明是不合适的。真正的统一需要充分的民主，而民主意味着不同意

见的自由。为了有效率，党必须使每一个成员表达他的意见成为可能，然后使所有的成员有责任服从多数人的决议。这就是民主集中制的最初涵义，在它蜕化到领导人的独裁权力——民主的决策，但集权地执行——之前的涵义。但是，即使是在最初的意义上，民主集中制是不够的。**少数派不能阻止行动，但没有人能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意见**。甚至更进一步，他们必须有在一种恰当的时间里再次提出问题的完全可能性。所有的创新集团——包括革命党本身——开始时都是作为少数派而出现的。如果党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存在，就一定不能阻止辩论和自由的观点交流。①

为了成功地执行它的基本职能，党必须是一个政治活动家的牢固的组织。为了巩固，党必须是真正统一的。并且为了统一，党必须是充分民主的。这个结论把我们引导到第四个职能上。

4. 建立民主文化。在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之后，一个不发达的国家没有可以使公民的民主修养逐渐形成的和平发展的百年历史。它也不能容忍用其后的一百年扩大建设民主修养进程的奢华。同时，很明显，如果公民不能以一种合适的方式运用他们的民主权利，民主就无法运转。或者没有批评，或者批评退化到一种疯狂的、不负责任的攻击。

在工人政党中，反对派的批评出现得非常早。对此，恩格

① 马克思对党内少数派的观点体现在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 1875 年哥达代表大会的态度上。他写了对提出的纲领的批判意见。党领导人压制了他的意见。在 1975 年 5 月 5 日写给的批评信中，马克思声明，他和恩格斯不同意这个纲领，并且补充道："我的义务不容许我即使只用外交式的沉默方法来承认一个我认为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见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1875 年 5 月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第 130 页。）今天，哥达纲领之所以被记起，主要是由于马克思的批判。

斯在80年多年以前的反应是："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①同时，一个党，像每一个官僚组织一样，必然会抵制批评（以普遍利益和有使敌人利用任何弱点的危险为辩护理由）。组织越是集权，抵制就越强烈。这适用于一个合法的党，就像恩格斯所想到的一样；但这更适用于一个非法的党，它必须使批评降至最低限度。结果所发生的是，在非法条件下形成的习惯被带入了根本不同的条件之中。

缺少批评通常被解释为，没有人喜欢批评，那些成为潜在批评对象的人竭尽全力地阻止它。然而，这仅仅是故事的一半。比起他们作为环境的产物，那些有权势的个人对环境的影响力要小得多。环境本身是不民主的。因此它不能容忍不同即背离的行为。如果政府的一个部长受到了批判，这通常被认为是攻击政权和攻击社会主义。如果政府对批评没有做出反应，受批评者本人被认为是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并且批判被认为是来自官方的消息，它只不过代表了撤职的宣布。在这样一种环境里，不仅当个人受到了实际上的批评时，他受到了惩罚；而且当他发表了一种反常的、与标准的模式不同的观点时，他也受到了惩罚。

这并不意味着批评消失了，它只是被转移了。它成为不负责任的，或者隐藏在幕后之中，或两种情况都有。如果在人民的日常关系中不鼓励批评，人民就没有机会习惯于批评。这种情况产生对个人和团体的稀奇古怪的、破坏性的、无根据的和完全不负责任的、有时公开化的批评。更有甚者，阴谋、秘密

① 恩格斯致格尔桑·特利尔，1889年12月18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24页。——译者注

报告、公然指责代替了意见之间的民主斗争。代替读报纸，政治领导人必须雇佣警察告密者来了解到老百姓想些什么。

在一种家长制的环境中，对政府的一种批评态度被认为是不能容忍的对政权的颠覆。家长制的环境没有评价争论的习惯，争论等同于人身攻击。在逻辑上，这被知道叫做 argumentum ad hominem（诉诸于感情而不诉诸于理智）的谬误。“一个人思考的逻辑修养和逻辑训练的水平越低”，苏联逻辑学家阿斯莫斯（Asmus）指出，“他就越不能把一次辩论的证据说服力与辩论激起他的情感、同情和偏见分离开来。”① 不幸的是，这不仅仅是一个由于糟糕的逻辑修养所引起的谬论问题。因为真实的社会形势，权力当局在争论中增加了事实的和经验证明的内容，以至于使争论的逻辑内容变成了仅仅是第二位的东西了。

还存在着民主文化的另一个方面：积极性。家长制环境创立了权威，为的是运用他们。在同样的程度上，官僚也需要权力，家长制环境使官僚利用权力。这是一个封闭的和一致的体系，在这个体系内，公民不希望（或不知道如何，这是一回事）运用他的民主权利。一旦他转向上帝，他现在就变成了寻求指导、帮助和保护的一个“较高级的典型”。“我是被环境逼迫行使权力的”，按照记者 S·德基凯克（Djukić）的报道，一位南斯拉夫公社的党委书记这样声明。由于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政府行政部门的效率是低下的，保守的公民实际上对权利很在乎。为了使法律保护的权利得以实施，干预是必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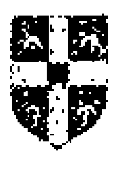
批评和自治的积极性问题不应该被降低到仅仅是“允许批

---

① V. F. Asmus, *Logika*, Moscow: Ogiz 1947, p. 373.

评”或“以规则保障积极性”，虽然它们当然是重要的前提条件。由于我们不得不对付一个被传统凝固了的社会心理结构，像这种的被动的允许是做不成任何事情的。另一方面，在一种没有批评的环境中，批评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在一种没有接受过批评的教育的环境中，甚至最合理的批评也可能得到不正确的理解，因而丧失了它的意义。在一种公民还没有学会如何充分地和具有完全责任心地使用他们的公民权利的环境里，社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在一种对权威崇拜的环境里，在一个没有批评的环境里，公民的权利是得不到实施的。并且在一种公民不能行使其权利的环境里，不可能存在着批评。只有当一个政治的力量至少是部分地独立于这种环境之外时，官僚一家长制的丧钟才能被敲响。这种政治力量就是先锋政党。

作为民主关系和教育公民行使他们的政治自由权利的基础，促进批判态度和自治的积极性是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如果党员首先在他们的各自岗位上发展起民主文化，他们将以最有效的方式完成这一任务。



第19章

新国际秩序

第一节　引　言

无可怀疑，世界经济正处在巨大的变化中。它的三个组成中的任何一部分都无法回避深刻的危机。第一，发达资本主义世界要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失业不仅使拥有的劳动资源和资本资源的利用率大大下降，而且造成了严重的混乱。第二，集中计划世界经历着增长率的下降和效率的急剧恶化；资本效率不断降低，技术进步通常比第一世界的低得多，发展计划的目标经常完不成，为生存的斗争取代了主要的目标。第三，不发达世界经受着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逼迫；此外，不断发生饥饿、疾病及经济发展的差距拉大。从理论上讲，在康德拉切夫曲线底谷50年之后，我们又经历了第二次底谷。虽然有以下

的直接原因，也说明不了什么：1971 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中断；1973 年石油价格增长了 3 倍，造成了通货膨胀加速。凯恩斯主义的疗法在第一世界没有成功，经济理论加给我们认知的就是想出了一个新名词：滞胀。在第二世界，行政计划的药方也同样有缺陷。无尽的机构改革使事情更加恶化。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不完善，总体上自发的发展带来的这两个世界的内部困难，导致了旧有的世界经济制度的瓦解。

我们看到的后果是：扩大保护关税政策，封闭哲学，制造相邻矛盾，民族仇恨，增加冲突，恢复冷战和庞大的军费。我们生活在令人不愉快的世界里，不合理、不公正，充满了危机。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社会主义意味着平等、团结和合理性（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特征同我们所处的当今社会的情况是对立的。但是，它们有广泛传播的价值，会对变化产生影响。我们利用社会主义的这些原则来使分析系统化。合理性是每个人的利益，我们将从研究更合理地组织世界经济事务的可能性开始。对于弱小的、被剥削的、落后的那些国家来说，重要的是平等和团结。在讨论较不发达国家以及鸿沟加深时将运用这些原则。因此，平等和团结的道德原则有助于合理地组织新的世界秩序。非道德的合理性和传统的道德影响力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是一成不变的。教育的现实主义和正确的理想主义在共同起作用，因此有着积极活动的空间。

第二节　联合国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如果真正讨论当代世界是什么，那么可以说，当代世界是

一体化的和相互依赖的整体。它是很庞杂的，至少有三个很不同的但又相互依赖的部分。种种隔离似乎少了，地球小了。人们有共同的遗产，如生态环境、海洋，迁居以及要求共同管理的重要资源。各国进行贸易，以大量的不同方式相互影响。这些都要求制定行为准则和建立全球性的协调机构。

共同利益和共同遗产与国家主权经常发生矛盾。这两个原则是不相容的，而世界制度必须以它们为基础。看来，这基础是相当不稳固的。

现代国家内部的情况是否另一样呢？国家有明显的共同利益。在一定的重要意义上说，公民是独立自主的。比如，他们拥有消费自主权，作为生产者拥有自由创造性，有完整的法律(人身保护法)，能够作为自由和平等的个人参加政治活动。当然，这一切都是在社会准则、政治及法律准则之内的。可以用相同的方式建立国际制度，这将作为另类制度或全球性制度出现，成为国家制度的组成部分或分支制度。主权的载体是一国的公民和全球的国家。显然，两种主权之间存在重要的区别，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过渡时，差别总是存在的。重要的是，制度是由功能上相互依赖的各部分所组成。制定制度就应当考虑各部分在功能上互相依赖，而不是无功能地互相依赖。

制度可以用各种方式形成，但是过去的模式不符合现代的需要。联合国欧洲委员会书记亚涅茨·斯坦诺夫尼克按阶段描述了世界制度的进化：在19世纪是超国家主义制度或殖民主义制度，此后是跨国主义或新殖民主义制度，而国际主义也才建立。这里，国际主义一词表示没有专制统治，而是存在国家主权。

建立和管理国际性世界制度的机制当然是联合国制度。它

由众多的机构组成，诸如，联合国大会、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安全委员会、工业发展组织、粮食和农业组织、贸易和发展会议、国际劳动组织、国际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电信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等。这些机构极其类似议会、外交部、工业部、劳动部、农业部、文化和教育部、卫生部和通信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中央银行和发展银行。在这样的机构中，当然不存在内阁政府、财政部和国防部。这是否表示应当并建立不存在的世界政府机构呢？

回答当然是不！尽管最近两个世纪中，经常有人建议世界政府的思想。说不，至少有两个理由：a. 世界政府会成为经济和军事强国的统治工具；b. 简单地说，不需要。

既然世界政府是不合适的，于是便要在特别的国际会议上寻找自愿协商的解决办法。经常修改的规章以及有决策实力的机构，使人们担忧是否在筹备世界政府。人们是阻止这种做法的。但这是不合理的推论，还存在第三种可能。

为了使制度发挥职能作用，必须有三个组成部分：在意见一致基础上的决策机构；基于职业化专业和进行职业化劳动的技术机构；以及各种行为法典。显然，国家条约中的任何新变更必须由主权方自愿谈判，只有批准协定的那些国家必须恪守。当一定数量的国家通过新协定时，所有的国家就必须遵守这个协定。对不执行协定的惩罚，不是警察式强制性的，而是在道德上不赞同以及取消优惠利益。这都是国际调停的结果。在特别严重不服从的情况下，可以把“自由骑士”从联合国的一个或几个机构中开除出去。在特殊的情况下，可以开除出联合国大会。在原始社会中，被开除出共同体就意味着死亡。在

现代相互依赖的世界上，不能参加国际合作安排就类似国家的自杀。利益永远包括义务和责任。

为了使现代经济制度起作用，至少要有这些机构：

①中央银行，它关心短期的调整；

②发展基金组织，它可以充分使用长期拥有的一切资源；

③社会金融机构，它为市场干预和非市场干预收集货币资金；

④计划机构，它根据预期变化来协调各种活动；

⑤法庭，它对各方面的冲突进行裁决。

除了这些机构和职能外，由于需求不稳定造成的原料价格剧烈波动，还需要有某些次要的机构，如粮食管理局、原料供应局，

现在，我们把以上方案换成联合国的机构：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显然是世界中央银行的候选人。像所有的中央银行一样，它是最后的贷款来源，只帮助各国的中央银行。但不同于其它的中央银行，它与业务银行没有往来。因此，它在世界经济方面帮助各国建立收支平衡。这方面，它拥有合法的支付手段，以保证国际财政往来的必要的清算。限期提款权是可能的合法的手段。为了成为世界货币，有特殊提款权的“纸黄金”必须像其它通货一样地服务。现在特殊提款权已为各国银行所信任，下一步是保证进入国际货币市场。扩大自由提款权的作用在于把这些权利和发展财政联系。

顺便提一下，人们怀疑惟一的一种国家货币比如美元能够在未来成为世界货币。首先，世界经济的增长快于美国经济，尽管美国仍然是经济上最强的国家，但它不能统治全球的经济。其它发达国家的出口和货币储备加在一起要比美国多几

倍。其次，世界经济不再由某个国家的经济变化来决定。在这个意义上讲，1971年取消美元兑换黄金，不仅是一些国际条约的终止，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过渡时期，美元将联合经济最强国的若干货币共同起着世界储备货币的作用。最后，对世界财政的管理，要求以一种国际承认的储备货币取代黄金。至于其分配是否中立、是否将实际资源转给落后的国家（这的确与以往的做法不同，那时将世界存余拨给最富的国家），则决定于各自的利益及社会主义平等和团结原则。但是，在任何情况下，由自由的主权国家来协商解决。

2. 现在有很多的联合国基金组织，比如，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组织、投资基金组织、经济资源复兴基金组织。还有提供无息贷款的国际联合发展组织以及鼓励私营企业的国际金融公司，二者并到世界银行。还有一些专门的基金组织，如人口事务及麻醉品控制基金组织。这些基金组织起不到世界发展基金组织的作用，但是它们很有益，不应取消，而应补充。实际上，可以把发展基金组织设想为因不同目的而设置的各种基金组织的统一制度。在这种情况下，预算基金组织在法律意义上应与各种基金组织分开。

不久前，布兰特委员会建议了世界发展基金组织。这肯定是正确的一步，但是应该继续扩大它的职能。发展要求投资，为此要求三项分开的决定：投资的地区定位，以达到所有地区协调发展；各工业部门之间的配置，以建立于供需相符的恰当的工业结构；投资绝对数的决定，以便使所有的资源都动员起来。这些决定是按照世界经济重要性的顺序列举的。第一种类型的决定与发达国家及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相关。改正结构性的比例失调，对于不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是同样重要的。

尽管发达国家拥有很多资本，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情况良好，但在处理无效率的纺织工厂、为农业剩余人员提供岗位、实行其它结构调整等方面，也特别困难。在国际协作调整的支持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较容易地完成任务，并大力促进世界的效益。最优投资数的决定要求在经济组织上有较高的水平，如今则将由拥有的资源决定。

3. 联合国制度运作的财政费用由成员自愿和协议缴纳，并以这种方式继续拨款。这种拨款的方式以联合国社会金融机构收集的税金加以补充，空间是相当大的。

收人税是国家税收制度的一种合理的工具。在最近的未来，它也许还不会在国际级别上运用。但是还有很多其它的税收来源，比较重要的有：

①使用全球共同遗产税。当经济伙伴关系平等时，人类共同遗产是无限制的，税收就没有意义。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税收就有意义。发达国家利用全球资源要密集得多，转让资源税将有助于确立平衡。

a. 在专有区域（国家海岸线200航行海里）以外利用海洋活鲜动物资源。鲸和海豹的捕捉已由国际公约制约。此外，要支付国际税款。税收使动物免受滥捕杀。

b. 天体范围资源的利用，包括无线电辐射的电磁范围，安置人造卫星的天体的利用。前者已充满，后者还空着（根据现今的科技，约有1000个位子，在2000年前不会占据200个以上的位子），现在使用的原则是："谁先到，谁利用"，并且是免费的。10%最富有的国家拥有90%左右的使用权。

c. 越洋通行和洲际飞行。

d. 未来对海底及南极地带的利用。

②熟练干部调动（人才外流）税。例如，在60年代，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高技能移民的教育费用要高于这三个国家在那个时期向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费用。

③对于给外国援助做贡献的纳税义务人完全免税。

④联合国分享各国的烟、酒税。

⑤军备课税对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都是平等的，这有利于缓和军备竞赛。在联合国大会第7次会议上，苏联建议安理会常务委员的军费首先减少10%，把节减的部分用于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布兰特委员会建议征收武器出口税。向所有国家建议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的备忘录将推动普遍裁军，从而将节余资金的大部分用作不发达国家的补充资金。事实是从来没有通过一个这样的建议或要求，也没有做进一步的努力。如果对军备征税使我们更加接近和平，那么，就应该征这种税。世界军费额是富国向贫国提供财政资金净额的30倍，这是相当重要的和有潜力的国际税款收入来源。

⑥自愿援助捐赠。1970年联合国大会要求每个发达国家在发展的十年内将其国民总产值的至少1%作为不发达国家财政资金的净收入；其中，0.7%以正式发展援助形式提供。但是，该目标的实现令人失望：1970年为0.52%，1979年为0.39%，只有瑞典、挪威及荷兰超过了这项目标。而经互会的成员国只划拨了其总产值的0.12%。但没有理由失望，至少一些国家已直接行动起来，另一些国家也会适时行动。

建立联合国国库意味着多边援助。多边援助一般说来比双边援助更加有效和有利。但这不是取消双边援助的理由。比如英国给印度和巴基斯坦援助要比给玻利维亚援助的可能性大，法国给其在非洲的伙伴国家援助，苏联给蒙古、阿富汗及越南

的援助要比给其它许多国家的援助要多。利用这样的双边选择，援助总量也在大大提高。实际上，为什么不能把援助的资金安排为国际的免税资金呢？这样做可以使交税人选择援助形式和他们的接受者。

4. 在12年前的一次会议上，我第一次建议设立联合国计划局，我没有期望这个想法被认可。发达国家的发言人说，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大国不会放弃其影响世界关系的实力。也有人认为，单一集中的计划是危险的和无效率的（罗宾逊、奥赫林）。马赫波从第三世界的立场说话，认为这种想法是不合适的、不实际的和不能接受的。他的结论是，“应该让不发达国家按自己的方式和自己的发展阶段来发展，而不是依靠来自一个中央预先制定的发展模式”。我在不发达国家出生并成长，所以我同意他的看法。但是，问题被完全误解了。也许我使用了一个令人疑惑的名词。

像民主一样，计划是多义的。由于苏联第一个实行计划，它的计划是集中的、行政的和权威性的，基本上被当成样板。然而，这不是世界组织中可以利用的计划类型。需要的是预测、预期和协作。行政命令在这里是没有地位的。

联合国制度有着复杂性，协作起决定作用。联合国大会的第29次会议上，由坦桑尼亚的艾·诺·卡塞姆杰特的25位专家的会议上，得出了与我的建议类似的结论，这是不奇怪的。会议要求恢复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它应成为世界性的经济机构。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秘书处即类似计划局的单位可以协助这个理事会。秘书处包括2个部门：发展和研究及经济政策。合并的有经济合作及发展顾问委员会。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

劳工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的各位主席以及地区秘书委员会的秘书。这就是由专业计划局、作为政治决策机构的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联合国各种机构和委员会主席组成的**世界计划组织**。

如果计划就是商谈式的事先协调经济活动，那么，世界计划组织就应完善四个以下主要方面的国际经济发展的现状：对发展的财政拨款，商品流程的稳定，贸易的推动和稳定，在制定计划方面提供咨询和帮助。要做到这些就应参加以下的活动（摘自 1970 年的著作）：

①协调现有国际机构的活动。协调是指对各种活动共同商议的计划。世界计划组织也将从事搜集和加工信息的职能。

②为联合国及附属机构制定发展预期及发展计划。各国计划组织可以和世界计划组织联合，这样，便能够用真正的民主方式，用来自有关方面的充分的信息，来制定世界计划。同时，也不应低估这种协作的政治教育价值。

③或者应人们的请求或者主动做出，在发展方面提供建议和服务。世界计划组织应当成为任何政府在任何时候都能请其提供帮助和建议的可信赖的组织。大部分工作是由世界计划组织以外的其它组织进行，但是它必须给予有效的指导。

④对地区和国家之间拥有资源的分配提出建议。由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同意，计划即可实施。

⑤监督援助接受国的效果，监督援助提供国的行为。

为了信任和有效地行使职能，世界计划组织应当是行政上独立的机构，必须有高度的专业性，有知识特点，并拥有充分的财政资金。

5. 在最近 20 年，国际经济法得到迅速发展，各种仲裁规

章及各种行为法典（多国公司及行为转让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况。国际法要求有国际法庭。海牙是候选地点。如果各方面（私方或公方）进行谈判，不应该附加由国际法庭取代各国的地位。

在国际经济周期受到控制时，稳定粮食原料流程的任务可以完成。经过相应的修改，可以实施各国的解决办法——商品储备、稳定出口收人的财政补偿、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提议的共同基金。当然，说总是比做容易，北南谈判至今还没有很成功。但是，局部的行动比作为全球一致的计划组成部分的谈判的情况要更困难，效率也较低。

经过努力，在国际关系上有了某些秩序，但常有妨碍商品、资本和劳动自由流动的指责。在联合国大会第 7 次会议上，荷兰总理强调全球的制度不再由自由企业和自由市场组成。原料低关税及工业品高关税的实际做法，是与贸易开放及增长的原则相对立的，并阻碍贫穷国家的工业化。此外，关税贸易总协定的自由贸易哲学常被农业保护关税政策及发达国家的各种保护措施所破坏。因此，甚至也富国也不能同意。美国和欧洲主宰了资本和信贷制度，取代了技术的自由流动。“这表明，国际经济制度并非我们常说的自由制度，我们不是在基于自由经营的自由制度和集中计划经济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基本上由富国操纵以及旨在解决收入和资产分配问题、生产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问题的制度之间做我们的真正选择。”①

① 联合国大会第 7 次特别会议文件。

第三节 克服差距

富国和贫国之间的差距（以个人平均产品衡量），前20年低于2:1，今天是39:1，并且还在扩大。18世纪开始的欧洲工业革命使少数国家进入增长轨道，而多数国家仍然停滞不前，有时甚至陷入倒退状态。

如果一个社会的富裕部分和贫穷部分之间的差距超过一定的临界点，就会威胁内部的平衡，开始残酷的阶级战争，经济解体，各种社会危机造成国家正常生活的中止。巨大的国际差距的破坏性后果对全球社会的正常生活甚至生存都是有不少危险的。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们造成很大耗费；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是致命的。小国不可能与世隔绝地生活，在发生世界性严重灾难时，它们难以避免地成为牺牲品。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足够的备忘录。为了不使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人类不能让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

人们关心文明世界的意识在增加。在这样的世界里，富裕的和贫穷的人民的差距将缩小，以往的不公正将得到纠正，所有的人将感到像在家里一样。因此，围绕这样的境界来做些什么就是合理的。社会主义平等和团结原则提出令人满意的主题，也有助于使我们的做法制度化。

1974年5月，应阿尔及利亚的要求，召开了联合国大会第6次特别会议。会议的成果是发表了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这个事件宣布了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宣言认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应建立在以下原则上：

①国家主权平等、自决和互不干涉。

②对自然资源的完整主权，包括私有企业国有化的权利。

③对多国公司的监督。

④不发达国家出口商品和进口商品价格之间的正确比例。

⑤对不发达国家非互惠的优惠行为。

⑥向不发达国家提供相应的实际资源。

⑦鼓励向不发达国家转让技术。

头两条原则是不成文的世界宪法的某种权利，另一些条例表示平等和团结。为了解释，我把平等归到起始地位的平等，团结则是援助。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分析 1974 年宣言的实质。假设有两条主要的推动发展的渠道：(1)保证走向市场和保证公平交换、这是发展贸易的前提；(2)对资源真正转移包括技术转移。

（一）起始地位的平等

一国的政治制度由执政者来体现。同样，世界秩序由世界大国为着自己的利益来体现。美国强制下的和平取代了英国强制下的和平，而现在进行的过程则是前者为三边强制下的和平及苏联强制下的和平所取代。在布雷顿森林条约中，美国的立场占主导；关税贸易总协定类似联合国以外的富国俱乐部，要改变是很慢的、难度很大；世界银行有美国的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少数富国控制；富国支配着国际资本市场；跨国公司的中心和研究活动都在富国。这些公司主宰着世界贸易，生产着 1/5 的世界产品。这种状况只有慢慢地改变，而且通过政治手段。因此，不发达国家也在建立关心它们利益的组织。世界政治生活民主化的中心机构当然是联合国大会。尽管政治决策是决定性的，但不能停在这点上，还是来注意一下经济。

如果让一国的经济按自己的意愿、按自由竞争方式发挥职

能，发展中的最初的地区差别将扩大，并将迅速出现两极分化过程。用外部经济和部门间关系可以解释这种现象。如果第三个工厂建在已经有两个工厂的场所，它就可以利用现有的运输网、通讯、社会基础设施、熟练的劳动力和修理设施等。这样的外部条件对新企业也许是决定性的。另一方面，不发达地区部门间关系的表格上的空白要受制约，发达国家的资本以及中间商品的购买是任何生产增长的前提。发达地区的增长也会很快。但效果差别很大。即使发达地区给不发达地区提供资金，发达地区的生产也高于不发达地区的增长。富人即使做慈善事业时也会更富。

如果在共同的边界、共同的税收制度和预算制度以及共同的民族利益之内，两个地区投向一种经济，那时跨越国家也许只能使情况恶化。关税障碍、非关税障碍以及限制办法、发达国家的巨大的财政协调实力、外部的国际机构、保护性商标——这一切都给世界市场的晚到者造成极大的困难。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贸易实际上是真正的不平等和真正的贸易障碍。为了确立平等的起始地位，非互惠的优惠权是必要的。此外，也必须对巨大的跨越公司实行国际监督和取消限制性做法，联合国已经朝这方面迈了第一步。

各国部门间表式上空格的另一重要后果就是不存在有级差的出口。不发达国家只出口 12 种产品，获得其出口收入的 80%左右。商品的需求弹性较低，而价格波动很大。由于这些原因，又没有其它来源的外汇，所以商品价格低廉，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出口价格。也许，出路在于指数化、财政补贴和商品储备。考虑这方面已有了大量的技术书籍，没有必要再补充什么了。在国民经济一级，世界经济类似的一级制定相应的

稳定的制度，就足够了。

最后，如果按照教科书上的完全竞争模式开展国际贸易，则又是不平等的交换。正如艾·埃曼努指出的，由于国家支付方面的差别和发展水平的差别，贫穷国家的大量劳动（收入）通过国际贸易正在流向发达国家。发展落后就表示日工资低，这对整个费用结构又会产生影响。不发达国家出口两种商品：无竞争的商品，如热带水果；和竞争性的商品，如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品。发达国家对劳动密集型商品的进口实行高关税，以此保护本国市场；通过购买无竞争的特殊产品来占有贫穷国家的剩余价值。教科书和我们的原则是要求取消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关税。此外，必须实行无竞争商品的某种出口税，以便使穷国和富国的日工资差别平等起来。可以由该国或联合国财政来征收这种出口税。

据此，我们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为了使起始地位平等，发达国家必须取消从不发达国家进口的一切关税保护和非关税保护，并转让一定数额的资金。关税保护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被取消，因为它是与发达国家的旧工业很协调的。因此，不是立即取消关税，而是可以保留，但是要把收入归还做出口的那些不发达国家。在行政价格的国家中（经互会及其它行政计划经济国家），这是指在进口价和出口价之间规定差价。这样，发达国家就有动力来尽快地降低不发达国家商品的关税，世界计划局和联合国发展基金组织可加速全球调整的过程。

至此，仅只谈论了世界经济的两部分，发达部分和不发达部分。由于发达国家数量比较少，它们之间的经济差别不大，可以把它们当作一类。世界不发达部分则情况不同。有些解释是，在发展水平和增长率之间存在着极不成比例的关系。退一

步的分析为不发达国家分类提出简单明确的标准，按发展水平分成四类：

①最贫穷的国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按人口平均的基础处于几乎停滞的经济状况。它们和世界其它部分的鸿沟在很快加深。

②不发达国家，它们在"往上爬"，但还没有赶上其它国家。

③迅速工业化国家（如南欧、经互会的某些国家、拉丁美洲和远东部分）它们达到高增长率，有时很迅速地赶上发达国家。这一类有日本，而这时期它也赶上了其它国家，现在列入⑤类。

④极重要原料的拥有者，当今是指石油拥有者。因此，应把石油生产输出国成员单独归类。这些国家不必像③类那些国家发达，石油的高收入使它们迅速增长。

有时人们认为，这样的分类是不合适的，会破坏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团结。但是这种理由没有意义。如果要用公正原则，就应普遍运用。如果发达国家（可以算作⑤类）开放并向其它各类国家单方面取消一切贸易限制，对所有其它类国家，也必须运用同样的原则。换句话说，类别高的那些国家有什么样的优惠，也必须给类别低的那些国家。这就是"最特权的国家"的老条款的当代意义。只有这个世界上的最贫穷的国家没有义务提供非互惠性的优惠。

这种情况使我们面对集体依靠自己力量的问题。尽管没有发达国家发展游戏玩不起来，但是不发达国家为改善自己的地位，有许多事情可以做。特别有意义的是地区发展计划，可以由相邻的不发达国家自己管理。多样生产的盈利额常比一个穷

国的市场份额大得多。由于环境而不能把剩余资本用在有利润的出口上，所以有生产目标的地区经济一体化是加速发展的重要条件。至今已做过许多尝试，但没有什么突出成就。原因可能是各国的限制。联合国大会第 6 次特别会议以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要求为共同的市场参与、有序的商品交换、改进进出口收入及交换条件建立生产者联合会。现在已有香蕉、铝土、铜、可可、天然橡胶、茶叶、锡、钨、磷酸盐和咖啡生产者联合会。77 国集团马尼拉会议通过了制定不发达国家合作纲要的提议。除了上述合作地区外，还强调在航空运输、海洋运输、保险业及银行业建立多国企业的必要性，石油输出国给不发达国家提供财政援助的必要性。

（二）援助

即使取消贸易和增长的限制，甚至转移某些资金来均等起始地位，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仍然是巨大的。人类的团结要求帮助不发达国家加速经济发展，为此需要大量转让实际的资源。

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区分两类资源：知识和财政资源。只要做到改进技术援助和技术转让，就可以做到知识转移。联合国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发展纲要对此应表示关注。发展基金组织对资金转让是有影响的。在特殊条件下，可以用实际资源（比如粮食）代替资金转让。

首先是把资源转让用于投资。发展投资分为两类：社会基础设施投资（学校、医院、流通网等）以及直接的生产投资。发展援助包括单方面的转让（赠礼）及有利条件下的借款和商业贷款。第一类基本上是预算援助（补助金），第二类是发展借款。援助用于基础设施拨款，借款则直接用于生产投资。

至于资源转让，可以提出这些标准。如果人有生存的权利，不论他生于何处，他应该有食品、医疗服务和教育服务。原则上，这三项要有预算补助金（单方面的转让来满足），比如，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调节。对此，还有另一个原因。如果使人们受到教育和保持健康，他们将很快找到加速发展的方式和手段。在最贫穷的国家里（1 类），流通网的投资也来自预算补助金拨款。否则，这样的国家要背上很高的债务，从而使增长率下降。

联合国的分析表明，当一个国家按人口平均的收入达到 400 美元左右（按 1940 年价格），它就接近了当代文明所标志的教育标准和卫生标准（以寿命、新生儿死亡率、食物的热量价值、食物的质量、教育的普及程度和识字水平衡量）。换句话说，具有一定程度、不是很高发展水平的中等发达国家能够从自己的收入中给公共服务拨款，而不要求补助。

一般地讲，(1)类国家非常依赖补助和无息贷款；(2)类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以极有利条件的贷款来取代补助，其它发展需要由适当条件的借款提供；(3)类国家不要求补助，大部分贷款是根据商业原则；(4)类国家是财政资本的净出口国。所需要的资金量及其分配可以按逐步消除鸿沟的标准确定。这就是说，四类不发达国家均应比第 5 类发达国家的发展快得多。

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可以在某个时期加速自己的增长，以保证的社会基础设施资金和大量外汇，并通过扩大外国市场，来保证得到支付债务的足够的收入，依靠已达到的成果获取发展资金，即通过这些手段来消除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

整个国际社会都有责任消除差距。任何一类国家都不能例外。在这方面，要评论一下经互会国家的立场，它们不认为要

承担消除差距的责任，因此没有义务性的援助。在联合国大会第6次特别会议上，苏联代表安德列·葛罗米柯表明了这种立场：

>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接受把世界分成“穷国”和“富国”的错误概念以及这样一个观点，即社会主义国家与吸取殖民地国家大量财富的某些国家处于同样的地位。观点的作者不仅掩盖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本区别，同时也完全疏忽了如何以及因为谁才落到高度依赖地位的问题。

首先，声明是不准确的，是不能令人接受的，也与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共同点。至于讲到历史的责任，沙皇俄国也曾经是帝国主义列强之一，东德也是另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部分继承者，甚至小小的匈牙利也剥削过其统治下的国家。世界战争中的德国、匈牙利和保加利亚都是法西斯同盟，它们给世界造成了相当的贫穷。而经互会的前驱、共产国际给我们国家也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所以，与其它国家相比，经互会国家并非有更好的历史见证。其次，没有殖民历史的发达国家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加拿大，也接受分担援助。最后，我们在街上看到一个流浪的人，我们会给他某些帮助，并不在意他受难是谁的错。经互会包括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经济潜力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潜力，所以它们的国际经济义务也比较少。但是，在经互会的总进口额中，不发达国家所占的比重只有1/5，资源转让只是其社会产品的0.12%，显然比它们的国际义务要少许多。此外，这种隔绝状态也不利于它们自己的经济。

然而，还有另一种责任问题、自我负责问题。不发达国家有权利要求国际援助，如果它们能负责地加以利用的话。贫穷不等于必须受穷受害。如果一国之内的富人和穷人的差距在扩大，消除国际上富国和穷国的鸿沟的意义就不大了。如果国际援助进到部长和领导阶层其他人物的口袋里，那就是失败。

一国之内的公民是有主权的，他们基本上对自己的选举负责，在国际上则是国家。国家必须满足获取国际援助的条件(医疗、教育、粮食援助计划没有任何准则)。如果有助于法西斯制度，那就是让居民继续承受法西斯恐怖。如果有助于收入分配上差别过大的经济制度，那就是支持使富人更富、穷人却陷入困境的阶级剥削制度。如果有助于同邻国开战的国家，这就是不仅浪费资源，还是煽动侵略。这和人类的团结或国际责任就毫无共同之处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标准是明确的，但广义的社会意义上的最好标准还没有制定。这方面的工作还没有认真开始。危险是显然的：为了增加自己的价值和优惠，标准有可能被滥用。但是，不必要对此加以猜测。用保护人权（社会、政治经济权利）的方式即可实现良好的条件。既然联合国关于人权和国家义务的各种公约获得普遍支持，也应高度赞同这样的看法：假如一个国家是文明国家，那就必须满足当代国家的最低标准。这些标准是可以用极准确的概念定义的，能加以客观地检验。比如农业改革，收入分配均等，减少军费，控制通货膨胀、减少支付平衡赤字和支付利率，都在这些条件之中。没有通过检验的国家待将被从国际援助计划中除名，它们将在发展中处于落后，最终也将实行改革。因此，援助发展也有利于国际道德标准的提高。

国际团结是道德原则。只有把世界看成一个道德共同体，这个原则才能起作用。为了使这个原则不只是“空洞的愿望”，就必须加强和大力发展联合国的国际法和国际制度。

第四节　是否起职能作用?

由于自身的性质，机构发展的长期计划不可能立即完成。如果单独来看，某些部分是不现实的。但是，作为前后贯通的各部分，它们不仅是现实的，也是必不可少的。现实主义得到加强，所有的组成部分都可在萌芽状态中被发现。在这本著作中，我关心的是，在分析那些已经存在的发展要素中的具体表现。

但是，任何计划不论是怎样形成的，都决定于行动的意志。实际估量的共同利益起决定性作用。在对《恢复国际秩序》草案提出重要论证时，约翰·廷伯根说：“作为技术发展和生态发展的后果，地球上所有部分的相互依赖关系已达到这种高度，即只能把整个人类的财富当成应该确立的制度的目标以及应该遵循的政策。”

发达国家对原料和石油进口的高度依赖（一般为 80～100%）是众所周知的。因此，第一世界非常关心这些市场的稳定供应。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出口总额的 75%走向发达国家市场。因此，第三世界很关心这些市场的稳定和发展。如果市场不发达，交换条件将变得对不发达国家不利，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关于控制原料价格的建议得不到实行。生产率的增长将无济于事，因为只能降低出口价格。

虽然发达国家基本上是在相互之间进行贸易，但是把贸易

扩大到其它市场去，也是有利的。因此，为了能吸收增加进口量，第三世界经济发展是大家希望的。此外，我们看到，即使是纯赠与，它们在赠与国经济中产生的附加消费也是大大高于受赠国经济所产生的。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发达部分的迅速增长，实际资源转让的可能性增大，也使不发达国家加速发展。在停滞的世界里，差距不断扩大。转让是与保证所有提供者正确分享贸易利益的方案相联的。用于粮食资金的预算补贴有助于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农业生产者让出剩余部分，同时减少欧洲农业生产者的竞争压力。第二世界则将从出口不发达国家的总贸易量中增加外汇收入，并将有能力从发达国家增加进口先进的技术。

效率论据在这方面起着作用。发达国家可以用第三世界比较便宜的进口取代劳动密集型的老工业。日本的服装、欧洲的小麦和肉类的高额进口并不增加生活费用。如果可以从热带国家进口蔗糖，欧洲国家为什么必须种甜菜呢？如果已有现成的产品，发达国家为什么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研究农产品的代用品呢？显然可以大大降低费用，增加贸易，消除贸易限制，对所有国家都有很大的利益。可以提一下环境的效益方面。在原料产地加工原料可以减少高度工业化地区已经过度的大气污染，这对较不发达出口国的工业化也有积极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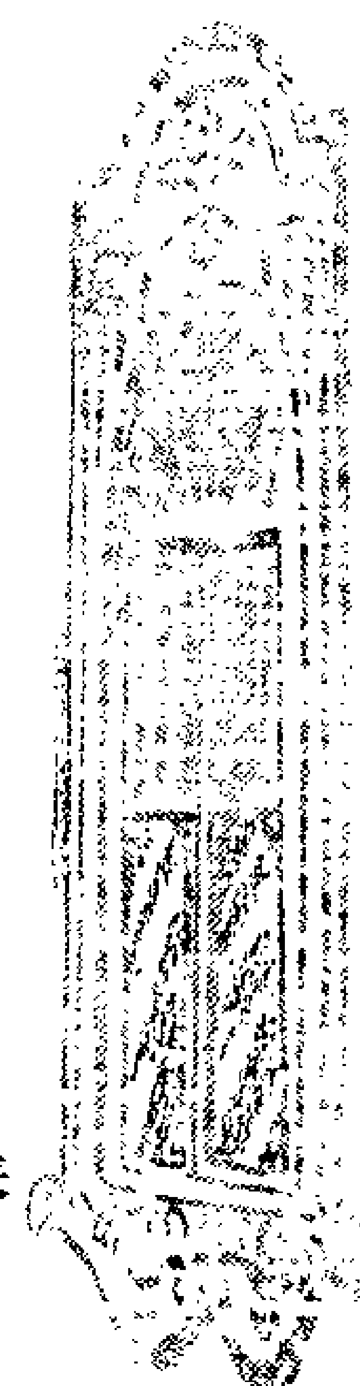
有少数人反对致力于加强国际发展，而多数人则认为，这不是不实际的。因为货币不是统一的。对这些问题至少可以有三种回答。必要的资源转让仅仅是以上提过的全球费用的一部分，它们是外国援助计划所费总额的30倍。如果能达成降低军费协定，如果把那些资源用于国际经济发展，大家就都有了。其次，如果把19世纪的资本出口作为基数，美国必须恢

复马歇尔计划（每年两次），以达到英国在 19 世纪的对外贷款。第三，多数国家作为援助或通过贸易转让的只是本国社会产品的 1%多一点而已。因此，这样的做法是可以的，并且能运作得更好。如果加上国际纳税提案以及与发展资金有关的特殊权利，我们是不应该悲观的。在必要时，国际共同体会以某种方式施加压力。联合国组织的成员国是可以用完成经济合作义务加以约束的。

最后，欧洲和美国 2400 万失业者是当今组织安排不合理性的强烈反映。不发达国家的债务达 8000 亿美元以上，它们很难偿付。某些不发达国家每年偿债额高于外汇总收入。这必然影响发展，走向事物的方面。失业和金融破产当然是资本主义的老毛病，但是许多老毛病已经令人不堪忍受，特别需要相应的治疗。不希望也不需要把不发展国家置于向富裕国家乞求的贫困圈子里。要求富国公民表决同意国际惠顾，也是不必要的。受惠国和施惠国都是发展中的伙伴。必须以明确规定的国际责任代替持久的要求和让步。世界已到了这样的阶段，消除鸿沟和保持全球经济正确发挥作用是同一模式的两个方面。即使没有不愉快的起因，无论是国际差别鸿沟的加深，还是全球的经济危机，都是令人不能忍受的。

我们到了做结论的时候了。当代世界就是这样结构的，社会主义导向的决定，或者，某些人所倾向的称呼——人道主义的决定（社会主义就是 20 世纪的人道主义），不仅是人们所愿意的，也是必要的。必要是因为合理。讲道德的和现实主义的步子正迈入这个方向。事实上，如果世界应该作为文明的生活场所存在，还能有其它某种长期的选择余地吗？

跋



◇第 20 章　社会主义及其未来

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

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第20章

社会主义及其未来

第一节 自由和自我决定

为什么社会主义应该是更人道的，因而比其它的对立的制度是更合意的？答案是：因为她能比其它制度更好地满足人类的真正需要。在需要的层次中，最高的、也是人类纯粹的、特有的需要是自我决定的需要。自我决定就是真实的人类存在。"这一原则强调每一个人具有全面地发展他的能力和力量的权利，完全满足他的需要和欲望的权利。这个权利……同时也是人类的责任，总是代表着给予他的生命以意义和价值的'人的决定'"。[①] 这就是自我实现，即人的内在能力的全面发展；这

① Marek Fritzhand, *Eticka misao mladoga Marksa*, Belgrade: Nolit, 1966, p. 76

也是指可以作为完全的自我实现的那些特殊条件：人对其所处地位的觉悟、对各种可能性的批判性评价，以及对环境和人本身的创造性改变。[①]这些条件和目标一起，使自觉决定人在世界上的位置成为可能。对此，最根本的前提是自由。事实上，全体的自由——与各种局部的自由相区别，如行动和意志的自由，正式的和有效的自由，等等——只有以自我决定来描述才变得有意义了。特别是，传统意义上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不受束缚**的自由和**主动做**的自由——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这两种自由合并成为一个单一的自我决定的自由。

自由是图书馆藏书浩瀚的一个主题。为了目前的任务，没有必要再写一篇关于自由的论文。我企图做的就是把自由融入到本书的概念体系的框架中。

朱利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把社会主义制度定义为"为人类平等服务的人类不平等的组织。"[②] 人们可能按字面的意义理解这个定义，把社会主义说成是一种限制自由最大化的一种制度——如禁止私人资本和国家资本，禁止剥削工资劳动者，等等。如果自由和平等只是同一个正义社会的两个方面，就像我在第7章论述的那样，那么，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社会 eo ipso（事实上）就是一个自由的社会。

一个自由的社会，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是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每个人都生活在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之中。为了行动的自由，他们

---

① "自觉行动的能力，把人类与其它有生命的有机体和自然的其它部分分开的关键性的和创造性的能力"。（M. Marković, "On Human freedom and Self-Determination", Washington, D. 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1976, p. 8, mimeographed.

② *Freedom and Socialism*, Dar es Sala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4.

必须对自然、对他们自己和对社会都是自由的。换言之，自由有三个组成部分：身体的、心理的和社会的。

身体的自由意味着免除匮乏的自由。匮乏当然可以是绝对，如当肉体的生存受到威胁时；也可以是相对的，如当用由生产力决定的一定的生活水平来衡量时。某些所谓的原始社会甚至成功地克服了相对的匮乏，在平均主义的条件下和足够低的技术水平下提供的衣食住的适当数量满足了所有存在的欲望。一个狩猎的社会是不需要电视机的，因为根本就没有电视机。在一个技术发展的更高阶段上，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超过了维持生存的水平，社会很快就分裂为阶级，统治阶级占有剩余。在所有以后的历史中——都是阶级社会的历史，相对的匮乏始终存在着。只有一小撮人能够享受劳动生产力提高带来的好处，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生存线上。只有当技术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时，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才能获得必需的商品和服务，并且社会集团之间生活水平在质量上的差距被缩小至只有数量上的差距了。在这个水平上，社会主义变成有意义的了。某些人仍然有特别宽敞的家庭住房，而另一些人仅有不太大的公寓；但是每一个家庭都有健康的和舒适的住所。某些人有大的汽车，而另一些人有小的汽车；但是，每一辆汽车都是交通的工具，每一家庭都有汽车。同样地，黑白电视和彩色电视之间的差别主要是数量上的。普遍的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差别也是如此，如果不管家庭的收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的话。一旦达到了这样的生活水平，免除匮乏的自由就成为现实，自我实现的需要就成为一种迫切感觉到的需要。

心理的自由意味着没有受到扭曲的精神上的发展和安宁。按照克里斯丁·贝（Christian Bay）的观点，我是从他那里借用

了这个思想和术语的，心理自由意味着基本动机和公开的行为之间的和谐。[①] 它使个人有能力知道和表达他的内在自我。正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发现的，在阶级社会里（用他的话说，是“文明”），人的自然驱动力受到了压抑。结果是，各种各样的精神病症发展起来了。病态的个人产生了一个病态的社会——这是由爱里齐·弗洛姆（Erich Fromm）进行的把弗洛伊德的分析明显地拓展到社会方面的一种努力。弗洛伊德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到性欲的压抑上。不难看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这样的压抑在保存家庭财产——从而保存阶级地位——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在政治官僚社会里，它在保持政治纪律——从而保持统治阶级的合法性——方面所起的作用。然而，除非不把生命力的意义从性欲扩展到生活的所有方面，否则就会发现，一个阶级社会存在着其它方面的压抑性特征。在一个市场普遍化的社会里，独立、自由和权力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后者意味着肆无忌惮的竞争。随之而起的你死我活的竞争产生了尖锐的不安全感、倾向于把所有的人性都浓缩成为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和表达的单一的维度，大规模地产生了神经官能症。在国家主义的社会里，国家的普遍化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在这里，权力和物质所有的积累决定于人在政治官僚等级制中的地位。贪得无厌地追求的，不是金钱，而是权力。但竞争同样是残酷的，人再一次地被浓缩成为一个单向度的人——现在是用权力来衡量的。在这两个制度中，一个专制的家庭、专制的学校和专制的企业——在一个阶级社会中，它们是必要的——产生了专制的综合症和神经病或这两种病症。一句话，个人是注定要

---

① *The Structure of Freedom*, New York: Atheneum, 1965, pp. 84, 371.

生活在社会环境中.为此,他们必须被社会化。一个阶级社会的社会化必然是压抑性的。阶级的废除将不会自动地产生内在的脆弱的心理与所需要的公开行为之间的完全的和谐,但至少可以消灭由压抑的社会化而造成的某些重要的心理扭曲。

社会的自由有三个内容，因为权力是一个三维的范畴。如果一个社会是自由的，它的成员就必须免除肉体的强制、经济的强制和操纵的强制。换言之，他们必须自由地参与政治决策，他们必须在生产过程中是自由的，和最后，他们必须被保护不受企图为了一个特殊集团的利益而对他们的价值和认识过程进行塑造的操纵。对我们的初步分析来说，很难在这一点上再补充其它的内容。一个政治参与制度负责照顾政治上的和道德—智力上的自由。自我管理和按劳分配为经济自由提供了基础。

当人类不自由时，他们就与他们的人类潜能相异化。他们自己创造物就不再受他们的控制，而成为威胁的力量。这就是经济中的市场和政治中的国家所发生的事情。政治的异化和劳动的异化倾向于相互补充，并产生了现代的阶级社会。如果没有自由意味着异化，那么，非异化的过程不是别的而是人类普遍自由的过程。人获得了控制他的自由的条件，并且按照他自己真实的而不是外来的标准来塑造自己的自由，这就是理想的人道主义的自由。

第二节　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宣布，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一种 contradictio in asjecto（自相矛盾的术语）。或者是社会

主义的生产，或者是商品生产，两者不可能同时存在，因为后者意味着市场关系，它导致了竞争、周期性危机、商品拜物教和其它各种各样的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异化现象。社会主义需要计划，计划是市场的否定。保罗·斯威齐在批判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时争辩道，市场制约了社会主义关系，把社会所有制变成了某种形式的集体所有制。物质刺激和市场导向必然要产生贪婪的心理。利润作为社会有用性估价的标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典型特征，以贪得无厌取代了社会主义的价值。[①] 需要的道德刺激不能在市场的环境中发展起来。市场产生了异化和道德的退化。如果真是如此，这的确是严厉的指责。因此，我们必须非常仔细地检查它们。经常被认为的废除市场会导致更不受欢迎的国家主义和一个全能的国家是一个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回答。问题比这更复杂。

首先，从历史上回顾一下市场作为一种解放的力量是值得的。罗伯特·雷恩（Robert Lane）指出，“市场对放松传统的束缚和对集体的依赖（社会学上的解放）做出了贡献，培育了掌握自己环境的渴望……鼓励了认识的复杂性和更合适的信息处理，以及更可疑地和更有选择性地，促进了学会善于应对和适应的行为。”[②] 当然不能把市场的所有这些长处解释成比它产生的异化和物化现象更重要。历史尤其不是复式簿记中的账号，但它集中说明了制度的进化性质。

从更加专门的意义上来说，市场是有效率的计划的工具，因为它可以用价格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琼·罗宾逊列举了一

---

① P. Sweezy,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to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1964, pp. 569 - 590.

② “Autonomy, Felicity, Futility: the Effects of the Market economy on Political Personality”, *Journal of Politics*, 1978, pp. 1 – 24, quote from p. 14.

个合理的价格体系的四个好处：第一，如果价格的决定使供求达到平衡，黑市投机活动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不需要政府的干预；第二，市场把稀缺的物品配置（合适地调节）给那些最需要它们、从而最可能从中得到最大满足的人；第三，“每一个家庭应该以市场的评价支付它们从共同的源泉中选择的东西，这似乎是公平的和合理的”；最后，价格表示了各种物品的相对稀缺性，因此，由此导向的投资结构将使可以利用的资源可能得到最好的利用。①

其次，那种认为商品生产自动地产生资本主义的观点应当被颠倒过来。商品生产存在于奴隶制度、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中，也存在于国家主义中。很清楚，商品生产并不决定所有的这些社会经济制度；相反地，它本身是由更基本的社会关系决定的，和由相应的社会制度来塑造的。② 例如，资本主义来自于普遍化的私有制，而国家主义来自于同样普遍化的国有制。既然有那么多的各种类型的商品生产，所以，如果我们发现了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消灭了私有制并不必然会产生社会主义，虽然这可以大大限制市场的作用。如果国有制代替了私有制，那么，资本主义就被国家主义所取代，商品的拜物教为官职拜物教所取代。在这两种情形下，人们之间的关系都被物化了，社会的不平等保留着，阶级剥削继续着，不可能有真正的人类存在。在社会主义中，社会所有制使每一个人平等地使用社会资本成为可能，而私人管理或国家

---

① J. Robinson, *Exercises in Economic Analysis*, London: Macmillan, 1961, pp. 203-205.

② 爱德华·卡德尔（Edward Kardelj）中肯地评论道，市场并不决定生产关系的特征，相反地，“在相应的阶级关系下的生产决定着市场的特征”。（*Pravci razvoja politič sistema socijalističkog samoupravljanja*, Belgrade: Komunist, 1977, p. 73.）

管理的独裁为自我管理所取代。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意味着这样一种市场体系，在这里，劳动力第一次不再是一种商品。

关于计划和市场之间不相容的争论已经作为一个谬论被暴露了。第十二章显示出，市场完全是计划的工具。不需要用个别企业的利润作为衡量社会有用性的标准。事实上，实际的关系颠倒过来了：利润——或者，宁可说收入的动机——被运用了来影响与社会计划相一致的资源配置。

把物质刺激和“道德”刺激并列——认为后者是更高尚的，因而是更可取的——完全是一个错误。“道德”刺激是一个错误的名词。合适的术语应该是“非金钱的刺激”。“道德”是指某种操行本身是善的，而不是说因为它导致了其它别的事情。因此，这个术语本身是矛盾的。这两种类型的刺激之间没有社会的或本质的区别。如果一个人是为了得到勋章、奖章、等级头衔、领袖的公开表扬、提高地位和特权而工作的——或者，他可能由于害怕被“耻辱委员会”提名、公布或讽刺而不去干坏事，他并不比另一个为了金钱而工作并由于害怕金钱的损失而不去做某事的人更好。在这两种情形下，个人都是被以某种方式引诱行动的，利用的都是个人的利己本性。如果物质刺激使人贪婪，那么，道德刺激就强加了与权力的等级制相符合的顺从。某些作者把道德刺激视为集体主义的动力，把物质刺激作为个人主义的动力，而认为前者有更大的社会价值，因为后者刺激了私人的收益。但是，这是一种被宣传家熟练地利用的错误观点。想象上的集体的动力代表掌握在领导手中的一种操纵的工具，帮助保存社会等级制。道德刺激暗含着竞争，恰似物质刺激与竞争关系一样。当奖赏是通过“社会主义竞赛”获得时，强调的是二者的同一性。最后，道德刺激是封建

的非金钱的地位区分的残余。在德国革命的时期，罗莎·卢森堡描绘的“斯巴达克派纲领”的第 6 款要求：“废除所有的地位区分、勋章和头衔。”①

真正的区别并不在于各种类型的刺激之间，而在于刺激和自治的决定之间。在一个严重稀缺的世界里——社会主义也继承了这一事实，劳动被感觉到是一种重负和负效用。就像我们看到的，正义要求，ceteris paribus（其它条件不变）等量的劳动与等量的劳动相交换。由于劳动之间不能直接进行比较，就需要有一个价值的工具，一个共同的尺度。这就是货币或荣誉、或者两者。选择哪一种刺激，主要取决于效率，而不是道德（虽然也必须考虑到不可取的负效应）。这是共同的经历，并且被阿米塔·艾西奥尼（Amitai Etzioni）很好地描述了：当使用报酬而不是使用强制或规范的力量作为控制的主要工具时，一个有经济目标的组织是更有效率的。② 古巴、中国和其它国家，以全国规模的经历，无意地证明了这一命题。道德刺激减少了经济效率，并且使动用警察和其它强制性手段迫使懒惰的人和不负责任的人劳动成为必需的了。③ 因此，在国民范围内，道德刺激不仅意味着低效率，而且意味着提高压抑。

一种特殊类型的市场因而完全是与社会主义一致的。但是

---

① W. Gottschalch, *Parlamentarismus und Rätedemokratie*, Berlin: Wagenbach, 1968.

② “生产是一种合理化的活动，它需要劳动、权力、通讯和高水平的合作之间的系统分工。因此，生产也需要高水平的、系统的和精确的操作控制。只有当制裁和奖赏可以被方便地测量并且直接与执行情况挂钩的时候，才能实现这些要求。金钱的制裁和报酬是惟一可以应用的尺度，因为货币的差别远比威风、威望和其它的权力差别更精确地可以被衡量”。（A. Etzioni,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mplex Organiz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1, p. 80.）

③ 在 1971 年，古巴政府通过针对400 000名游荡者的一个法律，对从工作到学校那些被宣判为装病、惯常的缺勤者的惩罚是 6 个月至 2 年的在康复中心的强制劳动。

它不是没有危险的。市场是社会资源配置的**工具**。但是，没有工具是完全中立的。交换，即使剥夺了其剥削的成份，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概念。物质刺激和竞争加强的是贪婪的本性，而不是人类的团结。如果对金钱关系的惟一依赖成为社会的永久特征，自我管理或许会逐渐地蜕化成某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合作社。如果永久地用收入作为衡量劳动结果的尺度，米哈伊罗·马克维齐警告说，如果尽可能多地赚取金钱成为一个工人的永久的和基本的兴趣，这种生产下的人格将与资本主义生产下的人格没有本质的区别。① 生活水平越高，这种危险就越小。低层次的需要越是得到满足，金钱的刺激就变得越不重要了，对那些“金钱买不到的东西”的强调就越大。但是，危险仍然存在，被动地等待直到物质刺激的作用完全消失，当然不是一个好的政策。用“道德”刺激代替物质刺激也不是好的办法。应该要做的是，用自我决定代替刺激、用合作代替竞争，用团结代替交换，用人性的发展代替对物的积累，用是代替有〈having by being，参见第四章第二节物化〉。社会主义不是自动地发展起来的。自觉的社会行动是需要的。特别是驯服的教育、对阶级社会的适应性必须被自由的教育和对无阶级社会的适应性所代替。一个自由的人不可能把他的生命浪费在小玩意上，为了一点点的边际第纳尔而失望，或乞求上级的厚爱。

---

① M. Marković, “Socijalizam I *samoupravljanje*”, *in Smisao I perspective socijalizma*, Zagreb: Praxis, 1965, pp. 54－71.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类型的事情似乎在南斯拉夫发生了。为了提高工人管理的自治，减弱等级制，避免民族的争端，和防止国家的干预，*dohodovni princip*（收入原则）被赞美为组织的最高原则。每一个集体应该是“它自己”收入的主人，所有的个人分配以货币来衡量。由此导致的经济单位、机关、大学、研究所对货币的追求造成了很深的异化效应。无需说，同样的任务可以——更好地——由一个将消除大部分异化结果的练达的设计来完成。

第三节 发展趋势

我们看到，免除匮乏是成功建设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个前提。肉体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是对我们的社会设计的一个物质限制。这种限制可以通过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功地加以消除。让我们检查一下有关的经验证据。

可以获得的数据显示出，在发达国家，生产持续提高，扫除了文盲，食品消费的足够或过剩的卡路里；数据表明，许多疾病被消灭了，寿命的期望越来越长，一般来说，生活水平很高并持续地提高。许多其它方面的数据也可以被引用来说明同样的趋势。然而，我希望，把注意力局限在三个在战略上非常重要的发展趋势上，它们是：生产力发展趋势、工作周长度和收入分配的发展趋势。

生活水平由劳动生产力决定，这是老生常谈的真理。劳动生产力一直在不断地提高。现代的经济计量学的方法使衡量全员劳动生产率——无论是活劳动或是物化劳动——成为可能。如果我们在选择一个足够大的国家（譬如说美国），并且对其进行足够长的时间（譬如说一个半世纪）的观察，那么，我们将会发现，下述的每单位的要素投入产出率（以百分比表示的美国私人部门的年要素生产率增长率）①：

1800－1855年	0.3
1855－1905年	0.5

① M. Abramovitz and P. A. David, "Reinterpreting Economic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1973, p. 430.

1905－1927年	1.5
1927－1967年	1.9

技术进步在加速。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主要是建立在就业的扩张和资本形成上。技术进步的加速发展在接下来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时代翻了四番。没有理由相信，这已经达到了极限。因此、科学的纯理论及应用正在成为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在美国，商品生产部门（制造业、煤矿、建筑、农业、林业和渔业）的就业率，从1820年的84%下降到现在的大约三分之一。由于它们是受技术支配的部门，所以技术对劳动关系所产生的潜在的负面影响正在日益减少。

工作周的长度不仅是劳动人道化程度的一个指标，也是低层次需要如何得到满足的一个标志。自从上一个世纪开始以来，美国的平均每周工作日的长度如下①：

1800年	78小时
1855年	70小时
1910年	55小时
1940年	44小时
1960年	39小时
1975年	36小时

在英国、法国、德国和其它国家，趋势或多或少是同样

① A. Dragićević. *Potrebni rad I višak rada*, Zagreb: Kultura, 1957, p. 355. R. Richta et al.. *Civilizacija na raskršću*, Belgrade: Komunist, 1972, p. 333.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Washington, D. C., 1976, p. 204.

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期间里，工作日平均每年以 2 个小时的速度下降；战后，这个速率提高到每年 3 个小时。到了本世纪末，发达国家的工作日将减至 30 小时或更少。

最后，甚至资产阶级社会和政治官僚社会正在提高平等化。不同职业之间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减少。在上一个世纪的上半叶，实际工资是停滞的，甚至下降。这意味着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提高。在上一个世纪的下半叶，不平等的指数稳定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大地减少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①]除了收入差距减少之外，农业劳动力和非熟练体力劳动者所占份额的下降，也产生了全面的平等化趋势。有代表性的数据证明了同样的发展趋势：在较低的水平上，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倾向于提高；但是，随着增长的继续，收入分配变成了更平等些。最后，官僚主义制度显示出，仅仅通过改变资本主义的制度，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就会大大减少。

我们现在必须从观察的趋势中得出结论。一旦工作周缩减至 30 个小时或更少，几乎日历周的一半都是闲暇时间。有太多的时间花费在看电视和足球比赛上。剩余的精力将不得不花在日常工作之外的活动上。由许多机械的奴隶来伺服的现代自由人将自然地从事于和由人类的奴隶伺服的古代的自由人一样的追求。他将参与关于他的共同体的政治事务的决策，他将关注体育，他将享受艺术和高雅的哲学；主动地利用闲暇时间，

---

① 英国税后个人收入分配的 A. M. 卡特（Carter）的不平等指数的变化说明了这一过程：1880 年：41；1913 年：38；1937 年：23；1948/1949 年：16（*The Re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Postwar Britai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p. 75.）不平等指数代表为了达到人均分配的平等而收入由高收入组向低收入组转移的百分比。因此，0 % 表示收入的绝对平等，100 % 表示收入的绝对不平等。

意味着为了享受一个完整的人生而发展自己的能力。技术进步、闲暇和长的寿命将使进行一生的教育既成为可能的，也成为必然的。曾经是决定性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对立将倾向于消失。平等的收入分配将提高了生活的平等化的机会，这将反过来便利社会成员之间的有意义的交流。先进的技术被应用于相同方面。计算机化的投票使即刻统计全民公决的结果成为可能，并且把政治参与扩大到全国水平上。由电视频道联接到每一个家庭的数据库中，有每一个人可以处理的巨大的积累的社会知识的储存和当前的信息。控制装置和双向频道允许观众之间和观众与演讲者之间的通讯。全频道和附近的天线（UHF、微波和卫星转播）使代表和管理者与他们地区的公民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

不像他的古代前辈，社会主义的自由人不可能从事战争。从性的、经济的和其它形式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他更可能成为非攻击性的，因为破坏的本能将不会再由压抑面得到加强。而且，技术进步使大战等于自杀。当然了，社会化的过程从来不是平坦的和自然的过程——弗洛伊德在这一点上是相当正确的，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将仅仅这样来约束人，以致使他的破坏本性得到升华。”①

第四节　鉴往知来

上面提到的观点在这里被放到历史的考察中。对于我们的目的，区别在人类历史发展中代表三个重要阶段的四种社会形

① A. Stern, The Science of Freedom, London: Longmans, 1969, p. 125. 作者讲的是“团结的阶段”，没有提到社会主义。

态就足以了，它们是：原始的无阶级社会、以资产阶级和政治官僚为代表的最发达的阶级社会，和共产主义的无阶级社会。我们对这四个社会主要特征的研究成果总结在表 13 中。

表 13

社会组织的历史趋势[a]

		历史			设计
经济	社会组织类型	原始的无阶级社会	最发达的阶级社会 资产阶级	政治官僚	共产主义无阶级社会
	经济体制基础	直接满足需要	市场	国家配置资源	社会计划
	主要资源	土地	机器		信息
	主导生产部门	狩猎和/或采集	工业		服务业
	技术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知识密集型
政治	政治制度基础	团结	权力		自我治理的参与
	利益	共同体	阶级		自治联合体的多元化
	利益的代言人和体现	习惯	政党	政党	组织的多元化和直接的通讯
文化	伦理基础	宗教神话	效用		人类团结
	规范	神秘力量的命令	法律		道德（自我调节）
	认同的目标	氏族	国家		人类
	社会特征	集体主义/传统支配	占有欲/顺从		合作/自治
	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人受集体支配	个人主义竞争	官僚等级制	自治人们之间的合作

a　这个图示是我的同事欧根·普希克（Eugen Pusić）建议我做的。然而，他无须对他的建议解释负责。

当然，这个总结是过分简化的，因而可能引起误解。制作这个表的目的只是对我们的研究成果给予一个简明的结论而已。它几乎是不言自明的，仅仅需要几句附加的评论。

旧石器时代的狩猎者和采集者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定居者并不是以他们的劳动为谋生手段，而是通过劳动直接满足他们的需要。如果气候条件是风调雨顺的，这些人既不贫穷，也不困苦。正如马歇尔·沙赫林〈Marshall Sahlins〉和其他人类学家已经指出的那样，他们生活在一个富足的社会里。富足当然是相对于他们的欲望和技术而言的。他们一天工作3到4个小时，大约相当于现代工人劳动时间的一半。一天的狩猎和采集劳动可以养活4到5个人，这比南斯拉夫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农业生产率还高。他们营养良好，身高大致相当于现代人的平均水平；当他们定居下来之后，他们居住在舒服的和健康的住所里①，并且从事各种各样的艺术活动。由于简单的工具和其它的东西很容易制造出来，所以它们特别没有价值。另一方面，游牧部落不得不把他们背上的积累的财富看作是一种运输上的累赘，毫不奇怪地，他们对私有财产特别不感兴趣。大量的闲暇使劳动变得有兴趣了。某些澳大利亚土著人用同样的词汇表达劳动和玩。新石器时代的人没有获利这个概念。他们是受传统和复杂的社会动机的驱使从事劳动的。特波兰特岛人〈Trobriand islanders〉生产的东西超出了他们所消费的，剩余的东西

---

① 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指出，"猎人遗留下来的骨架证实了他们通常是营养良好的这个事实。"他引用了L·安吉尔〈Angel〉的关于男人平均身高的数据：公元前30 000年，平均身高是177厘米；公元前10 000年，为165厘米；1960年，美国男人的平均身高是175厘米，哈里斯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冬天，直径为20英尺的圆形地面的住宅早在20 000年前就已经被使用了。有着厚厚的毛皮作为地毯和床，和大量和干燥的动物粪便和肥油骨来取暖，这样的住宅在许多方面比现代贫民窟的住房能够提供更舒适的遮蔽场所。"（Cannibals and Kings. *The origins of Cultur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7, pp. 10. 14.）

任其腐烂。他们并不试图减少劳动。事实上，他们之所以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从事劳动，其动机可以被解释为出自美学的理由（维护整洁的花园，修建美丽的和牢固的栅栏，等等）。有用的东西，即使它们是非常稀少的，也不认为是特别有价值的。但是，一件需要不成比例的高质量的劳动投入才能产生的东西受到了极大的尊重。在几千年的历程中，这种原始的**富足生存经济**在逐渐地改变着，直到现代的以市场或国家为配置资源基础的**丰裕经济**阶段。下一个进化的时代应该将产生一个新的富足社会。

经济制度也是如此。经济制度是与政治制度相配套的。后者必须适应处于支配地位的利益，以及为表达和体现这种利益提供制度组织。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配套，它包括占支配地位的道德、调节社会生活的规范、个人的认同和他们与社会的关系。**配套**这个词意味着不存在着单一的因果决定关系。社会生活的三个方面是相互依赖的，并以复杂的反馈圈连结在一起的。然而，这三个方面有一个共同的发展特征——人的逐步解放和向着自我决定的方向发展。

原始社会的政治组织有首领，但首领有很少的或没有**政治上的权力**。他们之所以受到羡慕和受到拥戴，是因为他们个人具有的品质。“领导在这里是家庭关系的高级形式，从而是互惠和慷慨的高级形式。”[1] 国家的组织是不存在的，就像我以前说明的那样。公共的利益占优势，这些利益是以传统来表达和表现的。“在纽尔村庄（Nuer village），除非所有的人都在挨饿，否则没有人挨饿。”[2] 进一步的发展产生了国家、权力、

① M. Sahlins, *Stone Age Economics*, London: Tavistock, 1974, p. 132.
② Ibid., p. 213.

阶级和政党。共同体解体了，许多的人民在挨饿，而另一些人在享受富足。

在原始社会，人不能作为个人而存在，他依赖于集体。他在感情上受不友好的自然的威胁，为禁忌、神话和传统所支配。而且，他仅仅把他自己部落的成员看作是人，并且这样来称呼他们。外来人是不同的种类。人的逐渐从自然之下解放出来，伴随着他在心理上从集体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他正在变成一个个人。同时，他的社会纬度拓宽了。当这种个人化的过程完成之后，当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变成形式上平等和法律上对本人负责的时候，社会组织采取了现在的形式。如果这些人是通过市场的中介彼此联系的，他们就建立了一个资产阶级社会；如果中介机构是政治—官僚等级制，这个社会就是政治官僚社会。指导自由的个人和异化的个人的基本价值是占有欲和升官发财。作为其结果，他们是服从的，代表着一个"寂寞的人群"。进一步的发展导致了在保存个人的独立性的同时，个人被重新统一到社会之中。个人现在关心他们是什么，而不是有什么。这是在这样一种不断提高的自由的条件下出现的，即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的自由是相互决定的和相互促进的。

人类学研究已经表明，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概念并不适用于每一个社会。如果首领被认为应该是慷慨的，就像在原始社会中经常被发现的那样，那么，当首领得到有价值的东西时，每一个人都高兴，因为它们将很快被分配。卢斯·波纳迪克特〈Ruth Benedict〉注意到，不具备侵略性特征的社会有这样一种社会秩序，在这里，个人对自己的利益效力也是为集体的利益效力。用现代的术语来说，这样的社会没有显示出很高的道德水平。但是，他们的行为代表了对相应的社会结构的功

能性反应。首领是慷慨的，因为首领的地位是一种血缘关系的形式，后者是一种互惠和互助关系。他和任何的"富"人由于慷慨获得了巨大的个人满足。① 普通的人是慷慨的，因为如果同伴认为他们得到的东西比给予的东西更没有价值，慷慨将帮助他避免他可能经历的不愉快。为了避免与陌生人接触的固有的不确定性，两组人交换的是礼物而不是商品。一个热情的礼物是一种表示安全行为和期望得到互惠的友好象征。马林诺斯基〈Malinowski〉发现，特波兰特岛人的财富的主要特征是慷慨，而贪婪是所有罪恶中最受蔑视的。在库拉〈Kula〉，一个慷慨的人比一个小气鬼与更多数量的人们建立了联系。慷慨意味着权力，在礼物没有得到回报时期，接受者对捐赠者的关系是周到的和响应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效用主义者的贪欲的个人主义是没有人知道的和不起作用的。阿伯拉翰·马斯洛评论道："人们可以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使个人相互厮杀；或者人们可以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以至于使一个人的利得，与其说是对另一个人利益的损

① 阿伯拉翰·马斯洛〈Abraham Maslow〉描述了北美印第安黑脚族的一个"富"人在太阳舞庆典仪式上的行为："在庆典中的某一时刻，他……谈到了他的成就：'你们都知道我做了某某事情，你们都知道我是多么的聪明，我是一个多么好的放牧人，多么好的农人，和我积累了多么大的财富。'然后，用高傲的姿态，一种非常骄傲的但不是侮辱人的姿态，他把这堆积起来的财富送给寡妇们和孤儿们，送给病人们和瞎子们。在太阳舞的庆典仪式结束时，他被剥夺了他的所有的东西，站在那里，除了身上的衣服，一无所有。以这种协作方式（我不说自私的或不自私的方式，因为明显地超越了这个两极），他给予了他所有的东西。但这一过程说明了，他是多么的聪明、多么的强壮、多么的努力工作、多么的慷慨，因而是多么的富有。"（*The Further Reaches of Human Natur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1, pp. 211–212.）

害，不如说是另一个人的利得。"① 资产阶级和政治官僚秩序是与第一种情况相一致的，而共产主义是与第二种情况相一致的。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个人的财富不再以经济的条件来衡量，因为富有是人"作为内在的必要，作为**一种需要**，他的**自我实现的存在**。"② 认同不再与任何一个特殊的人类团体联系在一起，而是与人类联系在一起。社会特征改变了。真正自由的人像自治的人那样行动，能够超越利己主义和顺从，并且按照他自己的标准来决定他在世界上的地位。后者根植于他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这种改变正在朝着更人道化方向发展。

物质丰裕程度的提高将逐步地缩小工资差别的刺激内容。它们将丧失其社会合理性，并且消失。劳动的配置将按照与自我决定相一致的能力来进行。大部分不愉快的劳动将被机器所取代，如果这种的劳动还不能被取消，它将被共同承担。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使对闲暇的偏好成为受人尊敬的。以交换的正义

---

① Maslow, *Human Nature*, p. 221. 这被马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对新几内亚的三个邻近部落的经典研究（*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 1935,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1962）证明是非常真实的。在一个部落里，劳动被认为是友好的协作，战争是不经常的，仅仅在典礼和宗教节日期间才需要领导。社会生活的问题是，违反少数更有能力的人的意愿，强迫他们承担组织令人兴奋的典礼的责任。在大约160公里以外，居住着一个食人部落。其社会组织是建立在对同性人的自然仇恨的基础上。男人和女人是一样的鲁莽和具有进攻性，并且不尊敬规则。第三个是一个艺术家的部落，在这里，男人和女人的传统角色是互换的。当男人是不负责任的和情感上是依赖时，女人是处在支配地位的。哥林·图布尔（Colin Turnbull）描述了在扎伊尔东北部热带雨林的有社会化和合作的头脑的莫布提（Mbuti）猎人与北乌干达高山地区的自私的Ik农民之间的相似的契约。（"Human Nature and Primal Man", Social Research, 1973, pp. 511–530）进一步研究似乎表明，所有这些部落之间的不同，部分地或主要地是由于生殖的压力、生存的激烈化和环境的耗竭。（cf. M. Harris, *Cannibals and Kings;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然而，这一种发现，如果是真实的，也与我们目前的研究无关。由于采取先进的现代技术和科学研究使征服自然的潜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不仅能不破坏我们的环境和生态平衡，而且有可能再创造它们和改善它们。换言之，在现代先进技术水平下，物质环境的制约比游牧部落和原始农民面临的微弱得多。从而，决定论很少再是必须遵守的，选择的余地一定非常大。

② K. Marx and F. Engels, Rani radovi, Zagreb: Kultura, 1953, p. 197.

和以交换为基础来表达的资产阶级道德让位于以分配的正义为特征的共产主义道德。应受奖赏的人让位于一个贡献的人。自由，就像财富一样，将以是什么而不是有什么的尺度来衡量。

在一个稀缺的世界中，劳动是一种为了生存的活动，由此产生了刺激的作用。后者诉诸于自私自利。为生存而斗争的竞争趋向于扭曲了生命的意义，由此产生了积累的心理。生存不需要被缩小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它涉及到由技术发展决定的生活水平，但是越是接近于维持生存的水平，为生存手段而进行的斗争就越残酷。在一个富足的社会里，生存是不成问题的，生命的意义要在别处寻找。无论在哪里发现生命的意义，它需要与其他人合作的相互作用。为了实现自我，人需要其他人的帮助。自私自利现在意味着团结。在这个意义上，富足使实现一个不同的世界成为可能，我们正是要利用这种可能性。

本特拉德·罗塞尔〈Bertrand Russell〉这样写道："我们所要寻求的世界，是一个创造精神活跃的世界；在这里，生命充满着欢乐和希望的冒险；与其说是建立在保持我们的所有、或掠夺他人的所有的欲望的基础上，勿宁说是建立在建设性推动力的基础上。"[1]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没有人被迫一天劳动四个小时以上，每一个有科学研究兴趣的人将能够醉心于其中，每一个画家将不会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作画……规定要做的劳动足以使闲暇变得令人愉快的，而不至于产生筋疲力尽……普通的男女们，享受着幸福人生的机会，将变得更加善良、更没

---

[1] B. Russell, *Socialism, Anarchism and Syndicalis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18, p. 210.

有虐待之心和更不会用猜疑的目光看待别人。"①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就像达尼罗·道尔茨〈Danilo Dolci〉所指出的那样，命令将被协调所代替，权力将被责任所代替，剥削为稳定价格的措施所代替，服从被同意所代替；罪恶将被认为是无效率，惩罚让位于治疗。② 在这样一个被马克思认为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的世界里，"迫使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③

这个世界不是没有冲突或问题的。但是，这将是不同类型的冲突和问题。这样一个世界不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它不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然的下一个阶段。它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如果人类本质上是自由的和创造性的动物，那么，一个自由的社会就不会是简单地出现的。它不是只需要被发现的某些自然法则演化的必然结果。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是一种设计。它应当被创造出来。必须为之奋斗。

它是一个更幸福的社会吗？这是那些不必回答的虚假问题之一。叔本华争辩道，惟一可能的选择是在不满足和厌倦之间进行的选择。但这也不是对人的实际的好的描述。人类的悲剧（或幸运）在于目标没能实现，而不在于欲望不能被满足。人类注定是不满足的和"不幸福"的。某些目标的实现产生了新

① B. Russell, "In Praise of Idleness" (1932), quoted in Fromm, *Socialist Humanism*, p. 210.

② D. dolci, "Reflections on Planning and grup", quoted in Fromm, *Socialist Humanism*, p. 422.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译者注

的、在更高水平上的不满足。每一个新的和更高级的发展阶段提高了满足欲望的可能性，但也提高了抱负的水平。这两者从来不是一致的，进步是永远的。人类的困境是自我创造出来的。这必须被认为是一件好事。否则，发展将会终结，这将是所有可能命运中最坏的———一个无聊的、无目标的和毫无价值的人生。我们对人类不完善性的认识应该使我们免除狂热和偏狭。这也是正是人道主义的含义。如果存在着像幸福这样的事情，它意味着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能力。幸福必须被个别地争取，而不是给予的或靠社会的安排来保证的。因此，未来社会可能不比现代社会更幸福。但它无疑地是更合意的和更符合人类的需要。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确信这一点，因为它的成员将不可能愿意重建我们现在的异化的生活条件。正是因为它是更合意的和更人道，这样一种社会是值得为其奋斗的。